

Святослав Рыбас  
Екатерина Рыбас

СТАЛИН  
СУДЬБ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 斯大林传

命运与战略 ②

〔俄罗斯〕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 叶卡捷林娜·雷巴斯 著

吴昊 张彬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ee more please visit: <https://homeofpdf.com>





2009年在“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话”电视直播交流节目中被问及“概括地说，您对斯大林的行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时，普京回答道：

“我保留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这一问题的尖锐性。社会上对此有非常之多的争论，我能看到这里的‘圈套’：你说‘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满意；而你说‘是否定的’，另一部分人又会不满意。”

“不过既然时至今日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话题仍然争论不休，我就特意留下了这一问题。依我之见，这个问题无法笼统地下结论。显而易见，从1924年至1953年，这个国家，这个当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

“诚然，农业未能得以保留，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农业方面的困境，特别是在集体化的后期，记得人们排着长队去购买食品等等。在这一领域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均未给农村带来任何积极的效应。不过工业化的确实现了。”

“我们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还是要谈损失，你们知道，现在谁也无权指责那些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们，因为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对我国产生的后果将是惨不忍睹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不容置疑、客观存在的正面的东西，但却为之付出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尤其是存在着镇压。这是事实，我们有数千万同胞遭受了镇压的摧残。用这种方式来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不可取的……”

“对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208-12042-6



9 787208 120426 >

定价：168.00元(上下册)

易文网：www.ewen.cc

Святослав Рыбас  
Екатерина Рыбас

СТАЛИН  
СУДЬБА И СТРАТЕГИЯ

# 斯大林传<sup>Ⓣ</sup>

## 命运与战略

〔俄罗斯〕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 叶卡捷林娜·雷巴斯 著  
吴昊 张彬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ee more please visit: <https://homeofpdf.com>





苏联英雄格里佐杜博娃、奥西片科和拉斯科娃在驾驶“祖国号”飞机启航前合影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1934年5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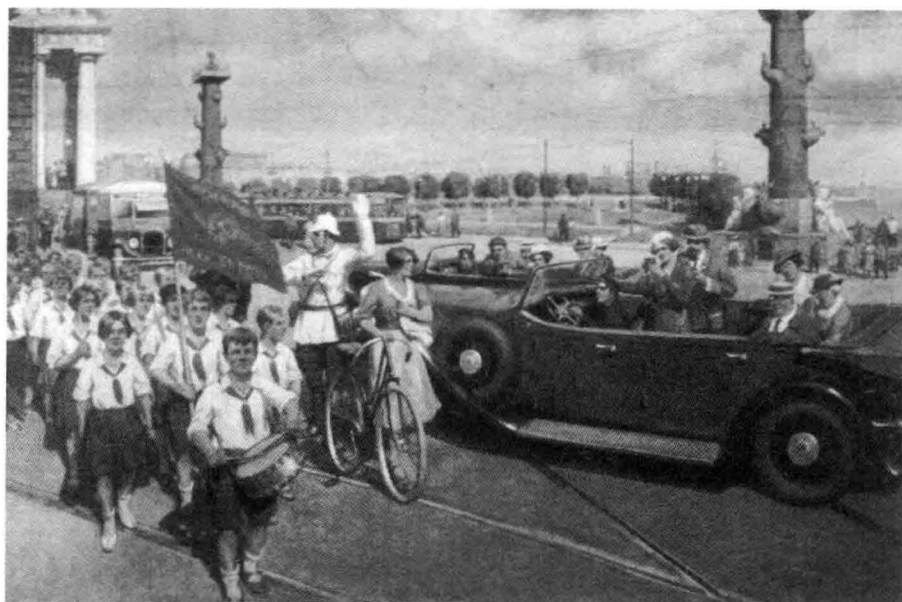


斯大林在顿河，19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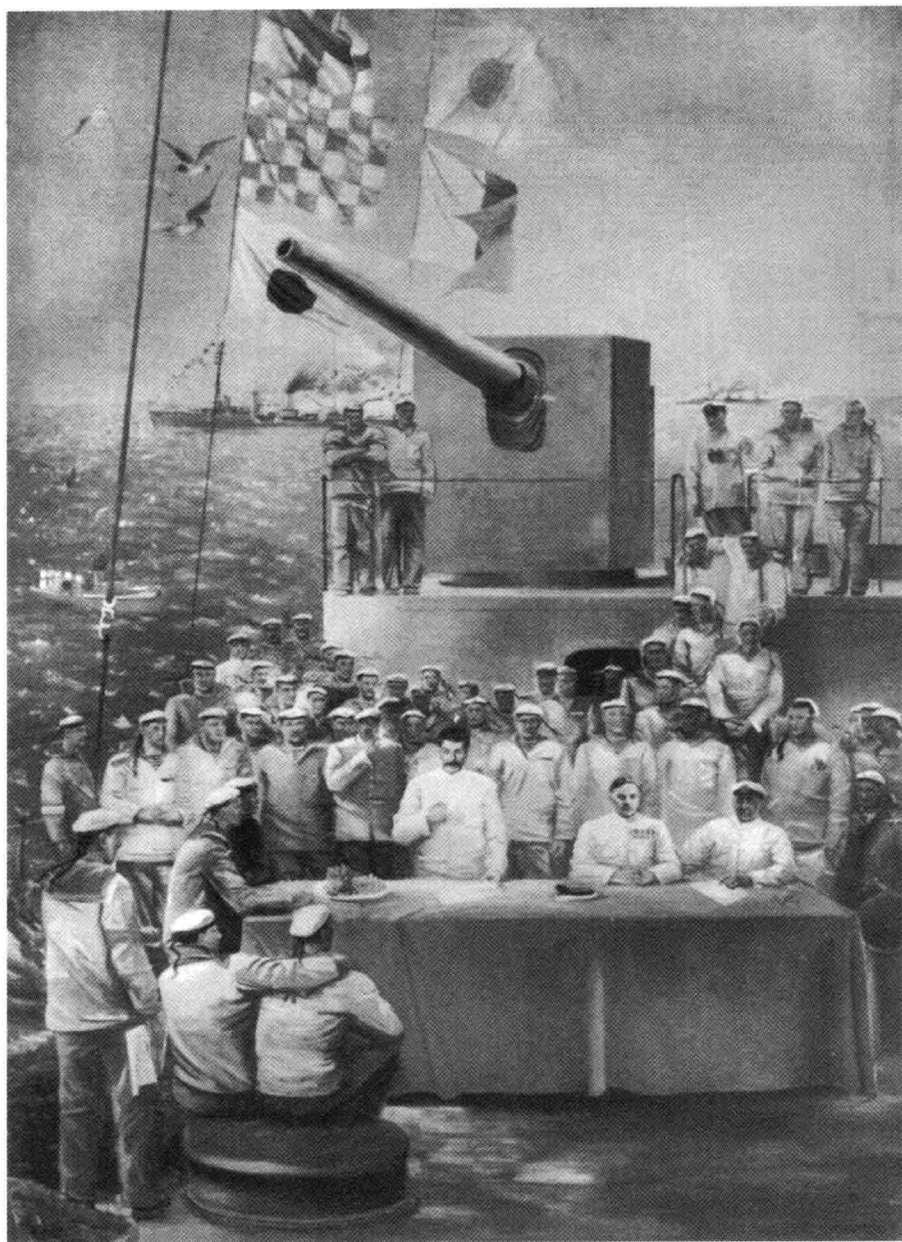


赫鲁晓夫和贝利亚在地铁里

《外国旅游者在列宁格勒》，伊万·弗拉基米罗夫画于1937年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上》，康斯坦丁·维亚洛夫画于1933年



20 世纪 30 年代的宣  
传画

地铁建筑工地，1933  
年（后排建筑物是现  
在的国家杜马大楼和  
工会大厦）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



科尔尼洛夫将军

邓尼金将军



弗兰格尔将军





斯涅萨廖夫将军，从 1918 年起在红军服役



波兰元帅约泽夫·毕苏斯基

“安东诺夫人”，第二起义军指挥部，基尔萨诺夫县基比亚吉村





希特勒（左一）在囚室里接待采访者，右二是他的秘书鲁道夫·赫斯，1923年

与波兰签订友好协议，站在斯大林身后的是波兰流亡政府首脑西科尔斯基将军，1941年





日本外相松冈（右）与莫洛托夫在签订《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

苏联元帅朱可夫、艾森豪威尔将军、斯大林、安东诺夫大将及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在观礼台观看体育大检阅，1946年8月12日



国防委员会成员（1941年）

	斯大林
马林科夫	贝利亚
莫洛托夫	伏罗希洛夫







纪念十月革命庆祝会，“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1941年11月6日

红场大阅兵，1941年11月7日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儿子鲁本和斯大林的养子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194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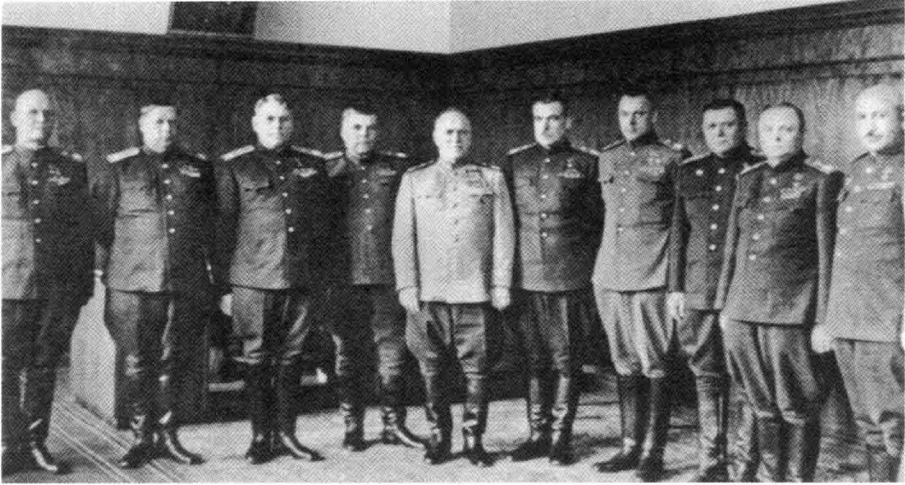


画家维克多·科列茨基在1941年创作的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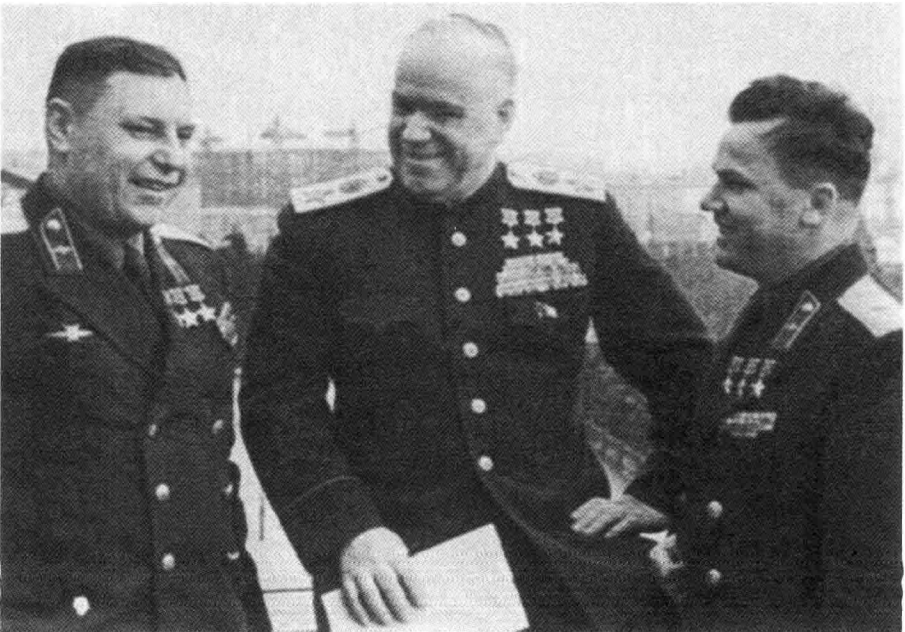
雅尔塔会议，  
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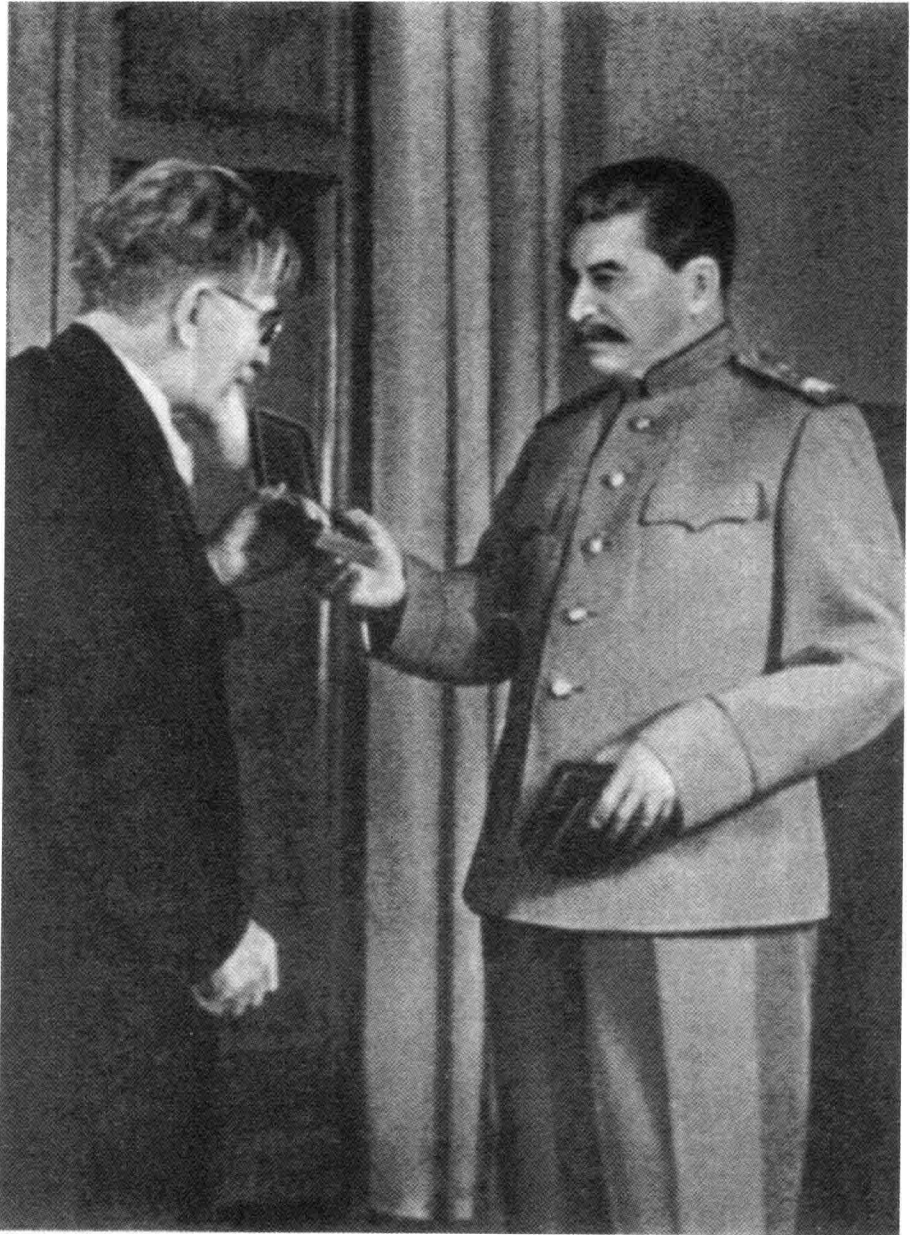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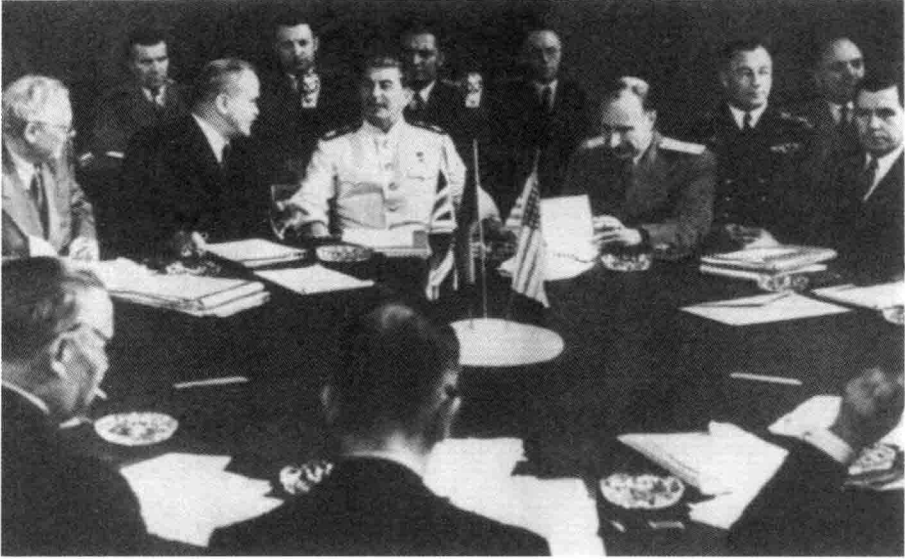
二战后期各方面军的司令员们：苏联元帅科涅夫、托尔布欣、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朱可夫、戈沃罗夫、罗科索夫斯基、叶廖缅科大将、苏联元帅梅列茨科夫、巴格拉米扬大将，1945年

三次“苏联英雄”奖章获得者波克雷什金少将、朱可夫元帅和阔日杜布少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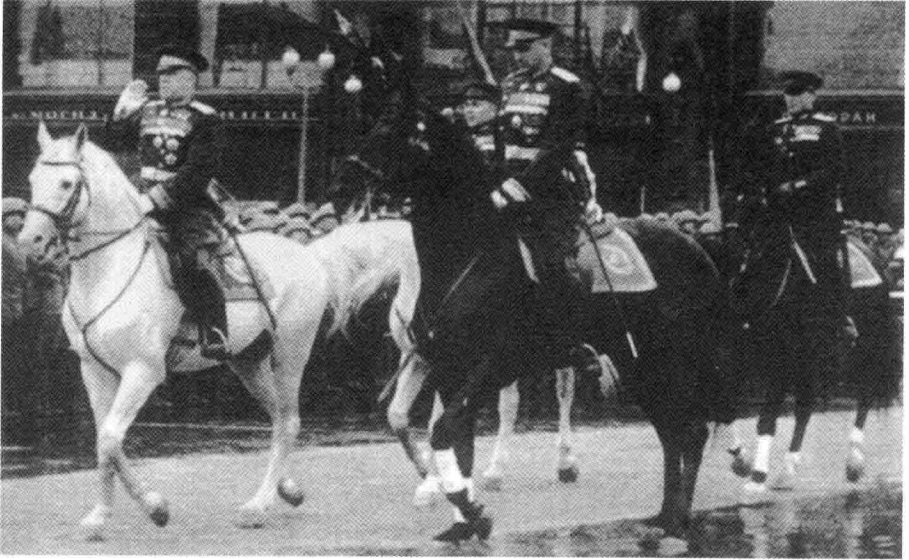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授予斯大林“胜利”勋章，1944年11月5日



苏联代表团参加由反希特勒同盟国领导人出席的柏林（波茨坦）会议，1945年8月

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出席波茨坦会议，1945年





朱可夫元帅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在胜利大阅兵式上，1945年6月24日

#### 胜利大阅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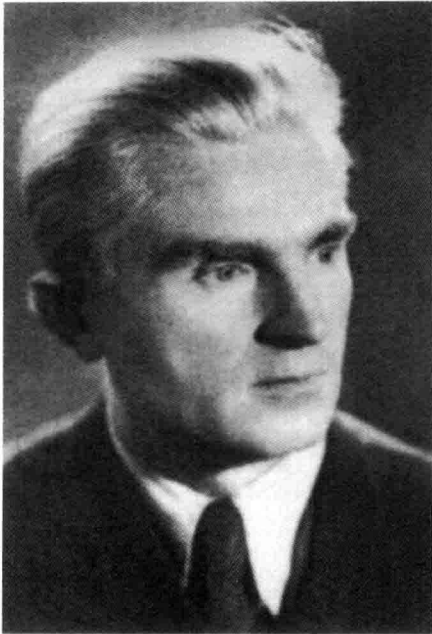




红军后勤部长赫鲁廖夫、军事人民委员乌斯季诺夫、弹药人民委员万尼科夫，1943年

苏联原子弹项目科研带头人库尔恰托夫和核工业的卓越领导人斯拉夫斯基





新型坦克装甲的发明者、冶金工程师扎维亚洛夫



1945年的苏联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马雷舍夫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顿巴斯煤炭工业的领导者之一、白卫军分子格里戈里耶夫，1923年



为国家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尤里·雷巴斯，1944年





斯大林和电影工作者，1936年

多夫任科和赫鲁晓夫在被解放了的基辅，1943年11月6日





《前线来信》，亚历山大·拉克季诺夫画于1957年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帕维尔·科林画于1942年



《游击队员的母亲》，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画于194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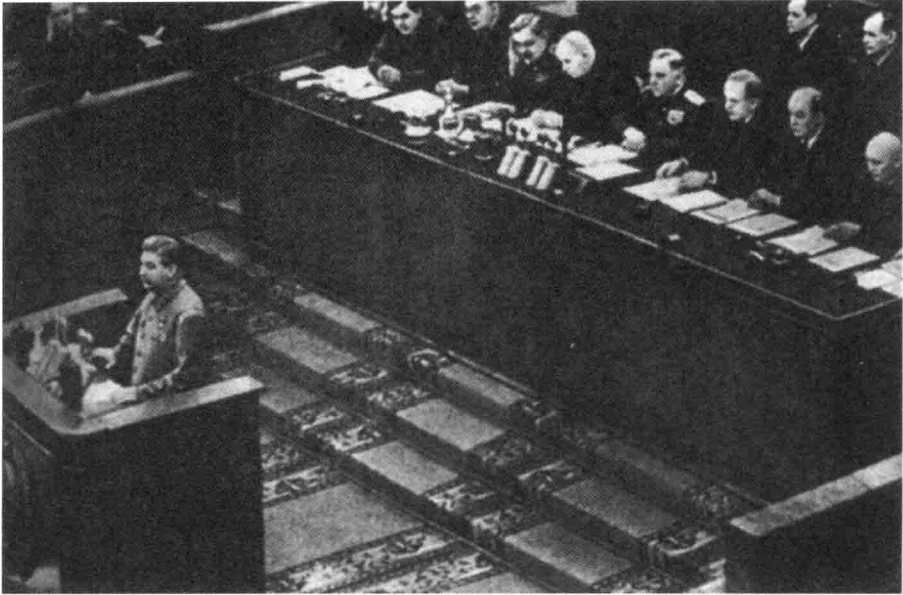




《我们祖国的早晨》，费奥多尔·舒尔平画于 1948 年

《新莫斯科》，尤里·皮缅诺夫画于 1937 年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

孔策沃别墅，斯大林去世时坐的沙发





躺在棺木中的斯大林



苏联领导人护送斯大林的灵柩，1953年3月9日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尼古拉都主教（亚鲁舍维奇）在为斯大林守灵



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勃列日涅夫和马林科夫，1956年







新西伯利亚州“新生活”农业合作社的集体农庄庄员在收听斯大林安葬当日红场追悼会的转播节目

## 第二卷



## 第一章

# 莫斯科军事哗变的尝试

莫斯科军事哗变的尝试、斯大林否定了恩格斯、斯克雷普尼克为何自杀、作家协会成立、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洛夫遭暗杀、亚戈达被撤职

整个 1934 年都贯穿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是国内局势的自由和稳定；另一方面是强力镇压方式的恢复（例如在夏秋季的粮食收购运动中的方式），并在 11 月份将原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的职权转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不过，自由的结果还是使众多以前遭到流放的富农得到了赦免，而且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即失去了选举权且无法获得食品供应证的人从居民人口总数的 4% 降至 2.5%。这也间接表明，粮食市场得到了巩固。

苏联的国内生活直接受制于外部的威胁。1933 年 12 月 29 日，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表示，苏联对外政策的方向就是莫斯科要竭力避免哪怕是极小的风险：

——在任何冲突中苏联都应该保持中立，本国的武装力量不会参与进去。

——对德国和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只要不被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利益都应居于首位；对“我们的德国同志”的同情不应该“凌驾于我们的政策之上”。

——苏联应该加入国际联盟，并在防止和控制冲突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苏联的对外政策对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是公开的。

如果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即从希特勒上台直至 1941 年 6 月那一段时间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如同世纪之初一样，认为新一轮世界大战的临近只是一种假象，是可以使用巧妙的外交手段来避免的。

1934 年 1 月 26 日，德国和波兰缔结了条约，考虑到华沙毫不掩饰的反苏主义，莫斯科明显感到来自西方攻击的威胁急剧增加了。这也使得波兰多年以来的庇护国、早在克列孟梭时期起就一直装备和支持波兰，并把反对德国放在首位的法国陷入了尴尬境地。至于法国在 1932 年 11 月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淡淡的安慰，因为波德条约实际上阻断了来自与德国接壤的苏联一方可能提供的援助。1934 年 2 月，苏联与匈牙利建立了外交关系，7 月又与所谓的亲法小协约国的成员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建交。7 月和 9 月，苏联还分别与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建交。9 月，苏联还得到了国际联盟的接纳，并随即成了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表明苏联的大国地位得以恢复。

此外，苏联还在沙俄债务问题上捍卫了自己的立场。

当然，所有这些进展并不意味着苏联改善了其在欧洲的军事地位，但这毕竟表明作为继续推进基础的外交局势发生了变化。正因为如此，苏联领导人支持了法国外长路易·巴尔杜的提议，即包括法国和苏联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再签署一份法苏关系条约。这些条约的签署将奠定欧洲新秩序的基础，但德国未必会对此感到满意。

1934 年 10 月 9 日，法国外长路易·巴尔杜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马赛德国情报机关代号为“条顿之剑”的行动中被杀。此前，1933 年 12 月 29 日，奉行反德政策的罗马尼亚总理伊昂·杜卡在布加勒斯特遇刺身亡；1934 年 7 月，在奥地利，希特勒的支持者、奥地利纳粹分子企图发动政变，亲意大利的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被杀身亡。

这还算不上战争，只不过是一盘棋上棋子的小动作而已。在欧洲，刺鼻的火药味儿越来越浓了。

斯大林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关注，他的脑海中也始终有着“托洛茨基的因素”。他明白，针对苏联的入侵在任何时刻都能获得来自内部的支持。

8 月份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声势浩大、排场豪华，即召开了作家代表大会；另一件不太引人注意，但意义更为重要的事是斯大林禁止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篇题为《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文章。

此外，在莫斯科，炮兵营参谋长 A. C. 纳哈耶夫号召学员们发动新的革命，企图煽



动他们造反。纳哈耶夫事件引起了斯大林的过度反应，此事我们稍后再表。

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但顷刻之间却变成了我们主人公的即使算不上敌人，至少也是反对者。焦点在于，这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是欧洲人，他不能接受沙俄 1890 年执行的对外政策。按照恩格斯的话就是，沙俄的外交就是要不断扩张帝国的版图，“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膝，重金贿赂，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向前走……”

斯大林准确捕捉到了这篇文章在当代的意义，并坚决反对该文出现在中央委员会的主要理论刊物上，他预感到该文的刊登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实际影响”（这里顺便说一下，杂志的编辑部并不是没有或是不愿看到这一影响，季诺维也夫本人就是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之一）。

1934 年 6 月 19 日，斯大林在致政治局委员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阿多拉茨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列举出恩格斯推论的一个主要环节：在展望日益逼近的欧洲战争前景时，这位奠基人直截了当地说，“德国的胜利，也许，就是革命的胜利”，“如果俄国发动战争，就会有人走到俄国人及其盟友的前面，不管他们充当着什么角色！”

斯大林向同僚们解释说，恩格斯对 1890 年至 1891 年形成的反对奥德同盟的法俄同盟深感不安，因此他提出此说的目的就是要损毁沙俄对外政策。

类似于 1934 年在欧洲所发生的这些事件不胜枚举。斯大林立即就明白，读者将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该文。但他对于这一相似性却只字未提。相反，他在解释自己反对刊登该文的原因时似乎希望掩盖这一情况。其实恩格斯的观点没有给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留下余地。换句话说，这使得恩格斯看上去像一个爱国主义者，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像是叛国者。

对于一个放弃世界革命教条主义和在苏维埃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是可以不必重提列宁的斗争策略的。但斯大林却提了出来。

这是为什么？多半是因为斯大林认为，在共产党人具有一定势力的希特勒德国，这种方法有可能被再次运用。

最终，《布尔什维克》杂志没有刊登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却出人意料地刊登了一篇社论。社论中对恩格斯的一封信件进行了评论，并将恩格斯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的观点介绍成了仿佛他是“完全站在失败主义的立场上”。

斯大林读了这篇社论非常震惊。他刚刚向理论家们解释了恩格斯是怎样一个人，而他们马上就用这种最愚蠢的方式（或是最恶毒的方式）对他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做出了回应。

这一次斯大林很果断，他称编辑部的立场是“托洛茨基孟什维克式的”，是“腐朽



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否定了列宁的革命经验的。

原来，这篇社论的作者是季诺维也夫。但斯大林并没有抓住这一点不放，而是要求撤掉责任编辑克诺林。克诺林被降为编委会的普通成员，而季诺维也夫被从编委会除名，“前布哈林派分子”、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文化宣传处处长 A. И. 斯捷茨基被任命为书记。

冲突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恩格斯的问题依然存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提出刊登一篇新的社论，阐述一下斯大林对经典著作的见解。斯大林并不喜欢这一建议，认为把自己与恩格斯作比较是“不理智的”。起初，他曾试图修改这篇文章，随后还是放弃了。他陷入了意识形态的迷途：不能“辱骂”恩格斯，不能“降低”列宁的作用，不能解除德国共产国际主义者的武装，也不能侮辱俄国(即便是沙皇俄国)。因此，也就不需要刊登什么社论。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不把这个理论吞到肚子里去。

在这起事件中，斯大林展现了一个学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他要比自己的战友们略胜一筹，是一位高超的战略家。他又一次确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并不完全适合他所领导的国家。

谈到“又一次”，我们指的是中央政权与各民族精英之间存在的没有停止过的斗争。尤其令斯大林感到不安的是乌克兰领导人的举动，以及乌克兰知识界避免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被“俄罗斯化”的不断尝试。斯大林并不反对“文化自治”，但认为剥夺地方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各加盟共和国的政府应该充当莫斯科代言人的角色，而不是去充当独立的政治家。冲突的主线正是存在于这一权力斗争中。各共和国被解除了独立的权力机关(早在1930年各共和国的内务委员部就被解散，1933年各共和国的检察院划归刚刚成立的苏联检察院管辖；经济管理机关也作了同样的变动)。斯大林的实践越来越明显地调整了“列宁的民族政策”，从而结束了斯大林与列宁之间由来已久的关于创立苏联原则的争论。以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金融工商界人士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党和革命政党的活动导致了俄国的瓦解，而现在这个被瓦解了的俄国已经复苏，尽管是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等待那些阻碍这一进程的人的，是悲惨的命运：他们相继倒在国家所需要的这辆列车疾驰而过的车轮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十月革命的创始人”也开始经受磨难。1933年7月8日，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在自己的办公室中自杀身亡。斯克雷普尼克是功勋卓著的党务活动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伦敦，1905年)的代表；十月革命期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过对抗克拉斯诺夫将军

的普尔科沃战斗；1918年当选为乌克兰工农政府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1920年任西南方面军特别处处长，1921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7年任乌克兰司法人民委员和总检察长，1927年至1933年担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

1927年7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保障各民族语言平等和促进乌克兰文化发展》的决议。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在这个过去的小俄罗斯地区进一步推行乌克兰化，把俄语从乌克兰境内排挤出去。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只有来自大俄罗斯的居民被保留了使用俄语的权力。乌克兰共和国当地的居民被宣布为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要求必须转而使用乌克兰语，今后只允许使用乌克兰语进行科学和教育工作、诉讼程序和公文处理（只有专门指定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机关除外）。其所有的中央机关都成立了部门的委员会，任务就是“制订相关国家机构全盘乌克兰化的措施”。所有国家机关和组织的工作人员凡被发现“消极对待乌克兰化”的，都将根据此项决议处以行政解职，且“不予发放退職金，也无须提前警告”。条款中还指出，对违反本决议条例者，“当事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正是斯克雷普尼克积极倡导了“乌克兰化”的政策。在他当政的时期，乌克兰超过80%的普通中学和30%的大学开始使用乌克兰语授课，这引起了传统上偏重俄语和俄国文化的乌克兰共和国工业区和大城市居民的不满。使用乌克兰语授课的中学和大学在数量上的脱节（80%和30%）就说明了这种抵触：大学的传统是偏向俄罗斯的。1928年，斯克雷普尼克批准了国家委员会关于新的乌克兰正字法的方案。方案中建议乌克兰语采用拉丁字母书写（这一建议也惊动了莫斯科的学者，遭到了斯大林的否决）。斯克雷普尼克拒绝了拉丁化，但批准了新的正字法。该正字法拉远了乌克兰语与俄语的距离（音译转写是通过与西欧语言更接近的方式实现的）。这不是斯大林第一次察觉到斯克雷普尼克在偏离国家的统一。早先，斯克雷普尼克就曾激烈反对过加强财政方面的中央集权制，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乌克兰政府分配商品和食品的权力。

结果，1933年初被派往乌克兰的波斯特舍夫展开了针对斯克雷普尼克的批评运动，免去了他所担任的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并强迫斯克雷普尼克承认自己犯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

在苏共七大上谈到民族问题时，斯大林回忆起了这位西南方面军的同事：“斯克雷普尼克及其团伙在乌克兰的堕落不是个别现象，这种失常在其他民族共和国的个别同志身上也有体现。”

斯大林解释说，“乌克兰民族主义与武装干涉者联系紧密。”这显然是在暗指波兰，也是在影射恺撒德国分离乌克兰的政策和希特勒的东进计划。

语言和文化、地缘政治、中央集权、让居民准备打仗以及其他众多问题，所有这一



切就构成了我们主人公精神活动的全部关注点。周围的人私下称他为“主人”。当有人当面说出这个字眼时，斯大林怒斥道：“我是什么主人？我又不是中亚地区的巴依老爷！”

正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有了一种自己是个俄罗斯人的感觉。对此他是这么表述的：“我是格鲁吉亚族的俄罗斯人。”他也要求别人具有这种二位一体的概念：首先是俄罗斯的国家、文化、语言，其次才是你们个人的爱好和特性。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早在孩提时就注意到了父亲对待俄罗斯的态度：“父亲强烈而真挚地热爱着俄罗斯，整个一生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格鲁吉亚族人，能够像他那样忘掉自己的民族特性，能够像他那样酷爱着俄罗斯的一切。父亲早在流放西伯利亚时就真正爱上了俄罗斯：那里的人们、语言和大自然。他时常回忆起那些被流放的岁月，似乎这段时间他只是在捕鱼、打猎，在原始森林中漫步。他终身保持着这种热爱。”（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96 页）

其实，斯大林从童年时就感觉自己与东正教的世界和教会传教的天职紧密相连，他内心深处保留着一种自己与众不同的感觉，不是与教民一起的，而是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感觉。有一次，斯大林向军人发表演讲时，提到西伯利亚渔民对同伴的死亡很是镇静，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随后就用这个例子概述了民众对死亡的冷漠。这种观点的一些局限性引起了人们的警惕，让人再次想起了冷酷的约瑟夫·沃洛茨基。

斯大林对俄罗斯民族的看法是有别于高尔基的。高尔基非常不喜欢俄罗斯民族，准确地说是不喜欢这个民族的农民阶级。在 1934 年 8 月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高尔基的这一特性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陋守旧仍在折磨着至今还是野蛮的农村，并正在向大大小小的工厂、向城市蔓延。”而当时斯大林对待俄国农村尤其是集体化农村的态度整体上则要温和、乐观得多。

（政治局筹备作家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波斯特舍夫、斯捷茨基和格隆斯基。斯大林不想把委员会的领导权指派给旁人。）

作家代表大会不是为高尔基举办的，尽管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这位老人。这次大会另有目的：“正是大会能够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形成和巩固苏联各族人民的知识分子阶层。这对我们非常重要”（见斯大林 1934 年 8 月 25 日写给卡冈诺维奇的信）。

总之，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8 月 17 日开幕当天，工会大厦前人头攒动，挤满了期盼一睹著名文学家风采的人们。肖洛霍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法捷耶夫、潘菲洛夫、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诺维科夫-普里波伊、塞富林娜、杰米扬·别德内、绥拉菲莫维奇、尼古拉·吉洪诺夫、费奥多尔·格拉德科夫与来自各加盟共和国的同行们一起，理应展现出他们对建设新生活的忠诚、他

们的团结一致,不存在什么派别活动。当然,出席者中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正在密切关注着这次代表大会。

某些代表企图用在拉普的那一套进行内讧,但刚刚当选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 A. A. 日丹诺夫(前下诺夫哥罗德边疆区委书记,是基洛夫提拔的人)对以非常方式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作家提出了警告,要求他们对中央委员会承担责任,随即迅速使滋事者平息了下来。根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日程中安排了一场关于各民族文学与俄罗斯文化之间的联系的报告。下面这个小插曲就能够证明这一话题的严肃性。还在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休假中,斯大林会见了格鲁吉亚作家 M. 托罗舍利泽,以了解其报告的主要内容。当得知格鲁吉亚文学实际上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出现的时候,斯大林不无挖苦地说:“请以我的名义转告格鲁吉亚的作家们,如果他们创作不出任何像我们先辈在文化和文学领域中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那就请他们至少能够去介绍这份遗产。”

在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后,立即展开了密集的文化交流活动:各民族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俄语开始大量出版,而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则被译成苏联各族人民的语言出版。斯大林通过对作家与翻译家提供物质帮助和向大众介绍文学成就的实际行动,抵制了斯克雷普尼克等人的文化孤立思想。

顺便说一句,回忆一下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怎样一种氛围中召开的还是颇有益处的。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能够增加多方感性认识的行程:参观莫斯科地铁的建筑工程、莫斯科河—伏尔加河运河的工地、“我们的成就”展览、军事摩托技术部队、克里姆林宫,并与首都新兴建筑工程的科学家和建筑师举行会谈。那几天,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苏联电影《羊脂球》、《关于列宁的三支歌》、《一个人的起义》和《快乐小伙儿》。

总体而言,作家代表大会建立起了控制社会舆论的强大组织,就是当时所说的“对劳动者进行教育”。

“各族人民友谊”成为这种教育以及整个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

斯大林从卡冈诺维奇那里拿到了几乎囊括了所有俄罗斯和各加盟共和国著名文学家名字的作家协会理事会的名单后,提议把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描写伏龙芝之死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的作者),以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共和国的代表纳入作协的领导层。同时,斯大林对把阿韦尔巴赫选入主席团的提名提出了反对,理由是他的忠诚毋庸置疑,但其时代已经结束了。

斯大林能想到德意志族作家并非偶然。他没有指名道姓,因为显然他并不知道作家的姓名。对斯大林来说,重要的是要向德国知识界表明,苏维埃国家是关心德意志人的。像一位高明的棋手那样,斯大林构建并累积了未被大多数人注意到的优势。

斯大林推荐加米涅夫进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主席团,悔过之后的加米涅夫





如今是“科学院”出版社社长和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值得注意的是，高尔基明白他的名义将遭到垄断，而享有垄断权的主要人物将不是他，而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他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倾向于不去提及代表大会之前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中央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撤销了拉普。

斯大立即对此做出回应：“高尔基对党不够忠诚，在报告中只字未提中央委员会关于拉普的决议。”（见斯大林 1934 年 8 月 30 日写给卡冈诺维奇的信）

但主要的事情高尔基已经完成了，对于这些小节可以不去关注。

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打下了许多事件的结子，其中一些结子很快被斯大林解开了，而另一些他并未注意到。布哈林的报告明确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转向现实主义，形式主义探索和夸张主义的时期正在结束。布哈林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而不是《消息报》主编的身份发言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例如：他排斥马雅可夫斯基（“革命的歌手”），把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提升到第一位。高尔基是支持布哈林的，包括在对待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上。

很快，斯大林就把马雅可夫斯基称作苏联“主要的”诗人，极力推崇其为苏维埃国家效力的思想。他仿佛在对布哈林和高尔基说：“同志们，你们错了！你们的文学评价不该是这个水平。”

是的，革命结束了！于是，它的歌手也就化为了灰烬，但斯大林却赋予了他新的生命：斯大林需要的不是倡导古典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而是号召进攻的马雅可夫斯基，是他把现代化建设中的祖国讴歌为“人类的春天”。

帕斯捷尔纳克非常准确地将斯大林称为“基督教出现前的领袖”。这表明，应该可以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承认斯大林身上具有领袖的一切品质、意志、战略思维，并有能力实现目标，总之，就是具有除了对罪孽的理解和对救赎的信念之外的所有优点。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则是东正教的信徒。

其他艺术领域也成立了类似作家协会这样的机构，如美术家协会，作曲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等。各类协会还吸纳了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保皇党人。这些创作协会的会员享有优惠，正如科技工作者一样，可以获得多至 20 平方米的额外住房面积。

当局明白，要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控制创作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给各类创作协会拨出巨款，让他们自主管理。从他们时而得到奖励，时而又受到制裁上就表现出了这种自主管理。于是，在这样的政策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也领到了住房。关于此事他写进了日记：“这是一座极好的房子，我发誓！我的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住满了作家。”

在把创作者联合起来之后，斯大林仿佛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作家成为苏维埃社会中受人尊重的享有盛名的人士，他们的地位高于官员和军官，要知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好比政委或牧师。

当然，在得到安抚的作家队伍中，个别作家与当局的冲突一直都未停止过。

1934年5月，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被捕。曼德尔施塔姆属于圣彼得堡社会文化的核心层，他认为当前状况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场可怕的悲剧。在他1933年创作的《寒春——饥饿胆怯的克里米亚……》一诗中有着这样的诗句：

大自然已辨认不出自己的模样，  
乌克兰、库班可怕的黑影……

“可怕的黑影”指的不仅是忍饥挨饿的农民，也是指在那里领导粮食收购委员会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

1933年11月，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诗歌，矛头直指斯大林：

我们活着，却感受不到是置身于故国，  
十步之外便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在那里只能低声细语，  
在那里人们会想起克里姆林官中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如同肉蛆般油腻，  
他的话，如同沉重的砝码，总是准确无疑，  
他的长筒靴总是擦得锃亮，  
他蟑螂般的眼睛总是在笑。  
他的身边围着一群伸长着脖子的领袖，  
他玩弄这些人，犹如玩弄人妖。  
有的吹口哨，有的学猫叫，有的在哭泣，  
只有他一人哼哼唧唧，唠唠叨叨。

如同钉马掌，他发出一道道命令——  
有的钉屁股、有的钉额头，有的钉眉毛、有的钉眼睛。  
至于他下达的死刑令，也是让人高兴的事，  
它显出了奥塞梯人宽广的胸襟。

在接受审讯时，诗人告诉侦查员，他认为这首诗是“表达一定的社会人群，即老知识分子认知和态度的文献，而这一人群认为自己是传统文化精髓在当代的载体和传



承者”。

本诗第四行最初的文字是：“只能听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强盗和莽汉。”

5月底，曼德尔施塔姆受到轻判，被判流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切尔登市3年。6月10日，在斯大林的介入之下，案件被重新审理。切尔登市被改为除首都和另10个城市之外的任何一座城市，具体流放地由诗人自选。曼德尔施塔姆选择了沃罗涅日市。

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信为诗人求情：“我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评价是，他是一流的诗人，但完全不合时宜。毫无疑问，他并不完全正常，他觉得自己受到了陷害等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也对曼德尔施塔姆被捕感到震惊不已……”

在回复布哈林的信中，斯大林做出批示：“是谁给了拘捕曼德尔施塔姆的权利？不成体统……”（引自：列克曼诺夫 O.，《曼德尔施塔姆》，莫斯科，2004年）

在这之后的6月13日，斯大林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并告诉他：曼德尔施塔姆案件正在重新审理，一切都会好的。

这次通话中，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发生了冲突。斯大林责备帕斯捷尔纳克没能为被捕的曼德尔施塔姆多方奔走，并说：“如果我得知自己的朋友被捕了，我会四处奔跑。”对于斯大林的下一个问题“难道他不是您的朋友吗？”当时对同行作品评价不高的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议论起诗人之间（像女人一样）的嫉妒关系来。显然，斯大林觉得他跑题了：他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在不着边际地空谈。斯大林想把对话者拉回到通话的实质上来，问道：“难道他不是大师吗？大师？”此时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失控了：“问题不在这里。我们谈来谈去总是曼德尔施塔姆来曼德尔施塔姆去的。我早就想与您见面，认真谈谈了。”“谈什么？”正在非常认真谈话的斯大林惊讶地问道。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有关生与死。”斯大林于是挂上了话筒。

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记述下了此次通话，他也感觉自己未能抓住这一良机。事实上，在1935年10月，当安娜·阿赫玛托娃因丈夫尼古拉·普宁和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被捕而请求帕斯捷尔纳克帮助时，他丝毫没有耽搁，立即给斯大林写了信，两天后他们便获释了。

不过，像“红色伯爵”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这样的众多作家还是正确地理解了党的指示，并积极与当局进行了合作，而当局越来越关心的是国家的巩固。（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对曼德尔施塔姆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想必是他感到他们从属于不同的亚文化。）

例如，按照 K. 丘科夫斯基的叙述：尤里·特尼亚诺夫称斯大林是“改造世界的最伟大的天才。如果他除了集体农庄之外什么都没干，那么他就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时代最天才的人物”（丘科夫斯基 K.，《1930年至1969年的日记》，莫斯科，1994年，第9页）。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本人也指出：“集体农庄是俄罗斯的唯一生路，是解决本

国农民问题的唯一方法！10年之后，整个延续千年的农业的罗斯国将完全变成另一种景象，将神奇地发生根本改变……”

而伊萨克·巴别尔在1930年2月至4月间曾亲自参与过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的农村集体化工作。回来后，他对自己的朋友、诗人巴格里茨基说：“您相信吗，爱德华·格奥尔吉耶维奇，我现在学会了平静地观看如何枪毙人了……”巴别尔用了几年时间写出了描述契卡人员的作品，并称他们“简直就是神圣的人”。（《回忆巴别尔》，莫斯科，1989年，第327页）

总而言之，苏联文学界就是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国家手中握有长期影响它的几乎所有的杠杆。

1934年夏天，除了召开作家代表大会和“否定”恩格斯的文章之外，还发生了另外两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斯大林会见了来到苏联访问的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与基洛夫和日丹诺夫一起讨论了如何在大、中、小学里教授历史课的问题。

7月23日，我们的主人公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这位英国作家。威尔斯1920年曾来过莫斯科，与列宁会过面，并写了一本名为《阴霾笼罩的俄国》的书，这一情况给本次的会见增添了特殊的背景。

威尔斯向斯大林坦言：“全世界仅有两个人，他们的意见以及每句话都有百万人在聆听，他们就是您和罗斯福……我已经看到了人们的幸福面庞，并且我知道，你们这里正发生着某种非常重要的事情。与1920年相比，反差是惊人的。”

在本次会面前夕，威尔斯访问了俄国，目睹那里发生了“深刻的改造、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

斯大林向客人证实，在保留私有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产生了争论。威尔斯说：“在那些建设性思考问题的人看来，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是一种障碍。”斯大林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举出在德国发生的事件为例：“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来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您对法西斯分子将怎么办呢？劝告他们吗？说服他们吗？但要知道这对他们是不会有丝毫效力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因此共产党人对工人阶级说：要准备用暴力回答暴力……”（斯大林 И. В.，《斯大林选集》，3卷本，第2卷，基洛夫，2004年，第318页）

这次谈话记录很快就刊登在了《布尔什维克》杂志上（1934年第17期），其内容触及了当时正困扰着斯大林的几个原则性问题。

第一，恐怖手段的问题。他向威尔斯举了英（克伦威尔革命）、法（法国大革命）、俄（十月革命）三国历史上的例子，并强调说：“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



第二,知识分子问题。“不论在 17 世纪的英国,在 18 世纪末的法国,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站在旧秩序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还少吗?”显然,斯大林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的忠诚问题(知识分子也分成各种各样的)。

威尔斯未必能够感受到斯大林的忧虑,但无疑看到了他的逻辑性、连贯性和意志力。

看过该谈话的记录后,斯大林下令予以发表:我们的主人公的智力和理论水平尽显其中。

告别这位英国作家之后,明显对党与知识界关系不满的斯大林继续思考起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最后斯大林得出结论,有必要对青年人的教育进行深刻的改变。

1934 年 8 月初,斯大林在索契与基洛夫和日丹诺夫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随后,讨论结果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即《关于〈苏联历史〉提纲的意见》和《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按照公布的文本来看,他们纯粹是在谈论用马克思主义来诠释历史的问题(“君主专制是各族人民的监狱”、阶级斗争等),但仔细阅读之后就会发现,斯大林认为,主要的任务是要巩固苏联这一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参加这次谈话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时年 15 岁的尤里·日丹诺夫。(后来他成为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的丈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工作,斯大林死后他当过罗斯托夫国立大学的校长。)

尤里·日丹诺夫回忆说:“他们多次谈到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克罗夫斯基习气。”

M. П. 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当局早期一个有点让人害怕的显要人物。按学历他是一个历史学家,1905 年入党,是列宁所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的编辑。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6 月,波克罗夫斯基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自 1918 年 5 月至 1932 年去世之前,一直担任副教育人民委员,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在 1920 年出版了名为《俄国历史概要》的单行本,提出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就是一连串对劳动人民所犯的罪行史。该书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因为这符合国内战争的情绪。波克罗夫斯基领导了中学和大学历史教程编写的组织工作,一直担任共产主义科学院的院长。事实上,波克罗夫斯基也会为了政治而篡改历史。

斯大林称这种作风为“波克罗夫斯基习气”,并对之作极坏的评价。时代开始变迁,需要另一种历史。

午饭时,在众人嘲笑波克罗夫斯基对历史时期划分的哄笑中,斯大林开玩笑说:“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母系氏族时期、父系氏族时期和书记时期。”

尤里·日丹诺夫记住了一些重要细节:“斯大林指出了修道院的文化作用:‘他们为人们带来知识和书籍。’在谈到其他时期时,斯大林说,彼得大帝在混乱时期之后成功地建立了稳固的俄国,‘他是一个强硬的人,但人民喜欢有人能够有效地管理他们。’”(日丹诺夫 Ю.,《回首往事:一个目击者的回忆录》,顿河畔罗斯托夫,2004 年,



第 147 页)

看得出来,斯大林对俄国政权的本质进行了很多思考,他考虑到了本国的严酷气候、多民族性,以及在最具国家意识的俄罗斯民众中出现的国家虚无主义趋势。

年轻的尤里从其讽刺的语句中听出了这些思考的间接引证:“在回顾革命年代时,斯大林回忆了高加索山区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与会代表成分极为复杂。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大会的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民主主义者,还有不少宗教活动家。

代表们群情激昂,就国家体制和经济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辩论,吵嚷声喧哗声响成一片。一个毛拉(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译注)发话了,很简短:“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人民想要沙皇。有了沙皇就会有秩序。”(日丹诺夫 Ю.,《回首往事:一个目击者的回忆录》,顿河畔罗斯托夫,2004 年,第 148—149 页)

总之,在讽刺和幽默方面,斯大林具有明显的才能。

“有一次,在收到令人尊敬的‘全俄班长’М. И. 加里宁的便条后,斯大林即兴写了一首题为《献给加里宁同志》的诗以作回答:

阅读巴克尔、密尔、  
孔德、康德,  
并领悟他们的实质  
比理解你,我的朋友  
要容易百倍。

И. 斯大林 1933 年 1 月 21 日

(日丹诺夫 Ю.,《回首往事:一个目击者的回忆录》,第 173 页)

在索契时,斯大林把注意力从历史转到了政治上,说德国正在加紧对青年人进行战备训练。

从 1934 年 9 月开始,在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开设了历史系,开始培养历史教师。

1935 年 6 月 18 日,斯大林使用了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有些意外的措辞“祖国母亲”:“我不怀疑,当需要保卫我们祖国母亲的利益不受外敌侵犯时,贵师的战斗员、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会光荣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这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或是世界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完全另一种——自己故土的利益。”(致斯大林红旗勋章特别骑兵师的贺词)

1934 年夏天,还有一个问题严重困扰着斯大林,那就是粮食收购问题。尽管农



业形势好转,但斯大林却不准备松懈下来,他把自己所有的战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日丹诺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丘巴尔以及地方领导人派到各个地区去。斯大林的指示中并没有实行强力手段的命令,但却提出了采取几项经济施压措施的建议:“立即把为歉收地区准备的商品储备调拨到丰收的地区去(即认为,商品短缺现象的出现可以迫使农民按国家的定价向国家出售粮食)。增加丰收地区的货币税收压力(大幅增加狠狠增加!),以便在那里造成货币紧缺,从而让人们产生出售粮食的愿望(我甚至不反对在丰收地区采取一些‘半自愿半强制的’措施以促进粮食收购)。”(《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年—1936年)》,第455页)

建议提出,对于地方一级的党务工作者,可以采取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促进办法:登报批评或撤职。

应该说,这些胁迫并不总是管用,那么就可以回到过去“三人小组”宣判枪决的惩罚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在党的领导人,甚至高层领导人中,都不能确信恢复1928年粮食收购运动中的方法是否合适。连强硬作风不逊于同僚的基洛夫都在7月19日出版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粮食收购时对农民滥用职权的做法。他指的是采取这些方式应该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比例。

鞭策和经济手段达到了目的:收集和采购的粮食数量使得国家有能力在1934年底取消了粮食供应证。

1934年11月26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言,把废除粮食的凭证供应制评价为巩固经济和贸易的一个重要步骤。

1934年11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递交给斯大林一封特殊的信件。这封被截获的有关斯大林国内政策的信件是美国大使V.布利特发往美国国务院的:

苏维埃联盟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没有改变。有关这里饥荒肆虐的报告完全夸大其词,但与此同时不能否认,有大面积的地区粮食歉收,并将出现食品供应不足……但组织良好的分配系统将摆脱这种窘境……

可以说,在正常条件下,以前蔓延在居民中的那种饥荒已成为过去……

苏联要达到我们的工业产量,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苏维埃联盟只是在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发动世界革命。它早就停止了开展符合世界无产阶级需要的工作。(《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1936年12月)》,第574—575页)

原则上,对于斯大林来讲,布利特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大使还指出,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五年计划的最低指标还要慢。这同样也是事实。

其他一些被截获的信件让斯大林掌握了有关欧洲的局势情报。法国驻德国大使通报了希特勒的灵活战术:他力图通过做出各种承诺以造成欧洲各国的相互敌对,“并使这种情况为己所用”。在宣布了正在与法国进行谈判之后,德国开始对意大利、苏联和小协约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施压。

也许,在这里我们应该寻找一下斯大林对有关欧洲各国活动情报持总体怀疑态度的根源所在。下面就是他所获悉的情报:

——毕苏斯基关于成立法国—德国—波兰同盟的构想和法国总理杜梅格的踌躇;

——在日本进攻苏联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德国和波兰保证给它提供军事援助;

——红军注定灭亡,因为它缺乏国内的后勤保障;

——波兰控制着但泽走廊;

——希特勒完全赞同分裂苏联的政策;

——希特勒有一个在苏联境内安置 6000 万欧洲失业者的计划;

——德国、波兰、意大利和英国之间正为签订一个反苏联的条约进行着紧张的谈判,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发动一场对苏战争;无需考虑美国的立场,因为他们已经提前确定了自己的中立态度。

将这些情报上报给国外处的苏联间谍做出了最主要的结论:“苏联现在受到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实际。”斯大林用铅笔把这句话勾了出来。(《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1936年12月)》,第541页)

武装干涉!这正是一直困扰斯大林的事情。只要发生一点不大的危机,不管是泛泛挑衅、边境冲突或是国内混乱,原本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

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苏共十七大上提出了阶级斗争在加剧的警告。

1934年要结束了,这一年总归要比上一年轻松一些。

这一年,在离斯摩棱斯克州格扎茨克市不远的克卢希诺村,有一个名叫尤里·加加林的小男孩呱呱坠地了,他后来成了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这一年,后来成为苏联终结者(或者说极不成功的改革者)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经3岁了;他成长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户集体农庄庄员的家中。而他的战友和敌手、后来成为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第一位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也3岁了,他生长在乌拉尔地区一个被流放的家庭。

斯大林不可能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情况。他的视线只放在了日渐逼近的威胁上。



1934年12月1日,苏联安全和斯大林本人遭到了被我们的主人公认为是灾难开始的重击。这天16点37分,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被杀害。

就在基洛夫遇刺前夕,在上报给高层领导人的外媒综述中援引了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1934年11月8日)上的一篇文章——《红色的俄国正在变成粉红色的》。文中谈到苏联在对集体农庄和工厂的管理中采用了经济刺激的手段,取消了平均主义和党员干部最高月工资,出现了包括甚至在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标志的各种各样的零售商品(如人造丝制成的透明长袜),餐厅里有了爵士乐队、网球得到了普及(同样是“资产阶级”的运动)。除了一些表面上的特征之外,整体氛围给人的感觉是,最可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这一点也得到了独立观察家们的证实。

纽约《前进报》编辑 M. 希诺伊在到达苏联 5 个星期之后说道:“我应该指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恐惧感消失了。以前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及程度稍轻一点的警察局的那种噩梦般的恐惧消失了。这种恐惧的消失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前耐普曼和手工业者身上。从广大的普通民众那里也看不到这种恐惧了。在这方面,唯一例外的是那些还没有经过清洗的共产党员。但是在清洗之后,共产党员变得更加坦率。引人注目的还有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被照顾、讨好和收买。当局是需要他们的。”(引自:戈里诺夫 M.,《工业革命年代的人民和政权——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历史》,莫斯科,1999年,第361—362页)

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来到了,但在经济管理越来越合理和经济逐步增长的背景下,已经能够感觉到局势的稳定。当然,广大的民众并不知道,他们行走在一层薄薄的变硬了的火山岩上,而在其下面,地火仍在涌动。

斯大林明白,地火没有熄灭,随时会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喷涌出来。他获悉,流亡的白军(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仍像过去一样计划要杀害他;其中一个刺杀方案就是先杀掉基洛夫,然后在苏联领导人到列宁格勒奔丧时再杀掉斯大林。(维克多·拉里奥诺夫大尉是冰上行军的参与者、驻加里波利的俄国军人,曾在1927年6月7日与 Д. 莫诺马赫和 С. 索洛维约夫一起策划了列宁格勒党员俱乐部爆炸事件,像他这样的恐怖分子在国外不算少数。)

此外,国内的反对派也没把撤掉斯大林这一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抹去。斯大林获悉,贝加尔-阿穆尔干线施工负责人、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С. В. 姆拉奇科夫斯基 1934 年秋天在一个小圈子里就谈论过此事(是 Ф. Д. 博布科夫报告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是一个严谨的人,在托洛茨基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期间,他指挥了普里沃尔日斯基军区。

今天,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斯大林把自己最亲密的人基洛夫的遇害视为实施刺

杀他本人计划的开始。

总之，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全世界的领袖们都命悬一线：日本首相滨口雄幸遇刺（1930 年 11 月）、法国总统遇刺（1932 年）、日本首相被杀（1931 年 5 月）、美国总统遇刺（1933 年 3 月）、遇害的还有秘鲁总统（1933 年 4 月）、阿富汗领导人纳迪尔-沙阿（1933 年 11 月）、罗马尼亚总理（1933 年 12 月）、奥地利首相（1934 年 7 月）、南斯拉夫国王和法国外交部长（1934 年 10 月）。

按照另一种划分，这份名单中还应该加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名字。他曾是罗斯福总统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935 年 9 月 10 日在不明情况下被杀害。除去他对统治集团有利，因此人们一直是从这一角度看待这起事件的。

我们没有论及军事政变和此类的企图，但这些事情也不少。

因此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只身枪击基洛夫的事件震惊了斯大林。尼古拉耶夫的妻子叫米尔达·德劳列，她是一个长着棕红色头发的拉脱维亚族女人，是基洛夫的情妇。当然，斯大林知道他的朋友和战友基洛夫喜好女色，特别是对马林斯基剧院（基洛夫剧院）的女演员情有独钟。斯大林虽然知道这些，却并不相信杀人动机是报私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不可能让任何个人私自接近政治局委员的，只有经过串通才能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接下来的所有举动让人确信，他立刻接受了是反对派阴谋的说法。他大约是这样判断的：“我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原谅了他们，给了他们好的职务，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但是，他们竟然这么卑劣地欺骗我！”

布哈林了解斯大林对欺骗和背叛是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刚一得知斯莫尔尼宫刺杀案就马上明白，等待着所有过去反对派的将是什么，这并不偶然。据作家伊利亚·爱伦堡证实：布哈林脸上变了颜色，并说道：“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现在他可以想怎样对付我们就怎样对付了。”一分钟后他补充道：“而且他还将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布哈林同样也不相信，基洛夫是被一个人单独枪杀的。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人呢？要找出几百个痛恨斯大林并进入党内高层且无所顾忌的人并非难事。

这是一个阴谋。只可能是一个阴谋！那谁是这个阴谋的中心呢？当然是托洛茨基！

有代表性的是，很快了解到自己被指为谋杀组织者的托洛茨基，马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意见：是斯大林本人除掉了自己的对手。（对于那些只要注意到领袖对基洛夫的兄弟关系及提拔其进入政治局、书记处和组织局的同时代的人来说，显而易见这一推断是毫无说服力的：基洛夫进入政治局、书记处和组织局就足以说明一切。斯大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需要竭力批判斯大林的残酷镇压以便跳出那个时代，于是采用了托洛茨基的说法。）

此时，斯大林还应该回忆起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彼得·斯托雷平被杀一事。



1911年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家杜马中的党团就此发表的声明中说，斯托雷平“死于一名警卫之手，该人得到了警卫队高级官员的协助”。尽管杀害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的确是一个人下的手，是他愚弄了警察局和暗探局，但民主的社会舆论却把体制本身及其维护者搞成了替罪羊。

需要提醒一下，案发之时斯大林是杜马党团的协调人，他理应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报纸对这一谋杀事件报道很多，国家委员会对此展开了调查，杜马议员们也进行了讨论）。如果抛开细节不谈，除掉这位总理大臣的确巩固了他众多对手的地位，其中也包括在内务部工作的那些人，也符合革命党派的利益。

把这两次谋杀联系起来很简单：基洛夫在政治精英中同样树敌不少，警卫队也同样令人奇怪地轻易放过了尼古拉耶夫。由此不仅让人产生了阴谋论的想法，还产生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参与其中的推测。

让我们回到12月1日悲剧的主要人物身上。这一天，基洛夫原来没有计划去斯莫尔尼宫，他在自己有2万册藏书的5间居室的住房里起草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成果的报告（此次全会做出了废除面包和粮食供应证的决定）。他本应该于18点到塔夫利达宫作此报告。大约15点30分，基洛夫还打电话给此时正在斯莫尔尼宫主持研究废除供应证工作的州委第二书记M. C. 丘多夫，说自己不去斯莫尔尼宫了。

因此，不清楚是什么使得他突然又出现在州委的大楼里？

基洛夫没有使用专用通道，而是像平时一样，和大家一样从正门走了进去。理应有一名警卫陪同他，此人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专员、53岁的鲍里索夫，但基洛夫经常会请这位警卫离自己远点，有时干脆不要护送。

天完全黑了下來，空空的走廊里亮着灯，基洛夫走向自己位于第三层的办公室，在他身后大约20米的地方跟着鲍里索夫。在三层楼梯口的警卫室那里，鲍里索夫停了下来。有什么能够威胁到基洛夫呢？没什么。

与此同时，尼古拉耶夫从第三层的洗手间走了出来，并看到了基洛夫。他背过身，等着基洛夫走过去，然后跟着他。这样他们走到了走廊的尽头，那里正通向基洛夫的办公室。

尼古拉耶夫从大衣口袋中掏出左轮手枪，几乎是顶着基洛夫的后脑勺开了一枪。基洛夫俯身倒下，当即身亡。这时立刻有一个穿着军装的男子从旁边最近的门里飞奔而来。尼古拉耶夫看到他，马上朝自己开了一枪，但或是过于匆忙，或是在最后一刻害怕了，子弹没有打中自己，他昏倒在死者身边。

一切都结束了。接下去自然是一片混乱。鲍里索夫跑了过来，医生们也来了。大家发现尼古拉耶夫还活着，于是他被押往位于利捷伊内大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大楼。



刺杀发生在 16 点 37 分,8 分钟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员拉扎尔·卡甘就开始审问米尔达·德劳列了。德劳列是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总局干部处的监察员。

这个米尔达·德劳列是突然从哪儿蹦出来的呢?此时她应该在列宁格勒管理总局,而该局到斯莫尔尼宫还有不短的距离。

显然,她当时就在斯莫尔尼宫的附近,而基洛夫改变计划来此要见的正是她。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还没有审讯昏厥过去的尼古拉耶夫,就先审问他的妻子?侦查员是在哪里找到她的?答案只有一个:所有人都知道德劳列和基洛夫的关系。

德劳列是谁?她是失了业的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1919 年入了党,曾在卢加市的区委会工作过,后来同丈夫一起迁居列宁格勒,在“进步”工厂中当杂工;1930 年出人意料地成为列宁格勒州委的日常工作人员,在那里结识了基洛夫,并由此开始传出风流韵事;1933 年被调入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管理总局,在那里她的社会地位飞速上升(工资与工程师同级,为 275 卢布,有住房,享受去疗养院疗养福利)。

审讯持续了 2 小时 45 分钟,但打印出来的笔录却只有一页半纸。她的哪些供词没有被写进这份笔录呢?可以说,笔录中去掉了所有有关基洛夫与德劳列私人关系的口供。不仅如此,那些说尼古拉耶夫吃醋是其杀人动机的列宁格勒人遭到逮捕,并作为反革命分子受到审判。因此米尔达·德劳列在初审之后便注定要遭到厄运。她、她的姐姐奥莉加和奥莉加的丈夫于 1935 年 3 月 10 日一起遭到枪决。

让我们还是回到斯大林这里。在最初的忙乱之后,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打电话给在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通报了这一事件。

几分钟后,斯大林就给丘多夫打去电话。随后斯大林又打了电话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代局长 Ф. Т. 福明,并提出了几个问题。问题包括尼古拉耶夫的着装,他身上是否携带有什么外国的东西。在听到否定的回答后,斯大林沉默了片刻就挂上了话筒。

很显然,斯大林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里面有白卫军的介入。但是,关于尼古拉耶夫的初步信息没能证实此类的猜测。

尼古拉耶夫曾是党员,出生于 1904 年。他 4 岁时,父亲死于霍乱。十月革命后,还有两个女儿的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当上了有轨电车的车辆清洁工。幼年的列昂尼德长期患有佝偻病,这是贫困生活造成的后果。11 岁前他还不能行走,腿部弯曲,个头矮小(身高 150 公分);他的教育程度是小学 6 年级;16 岁开始在萨马拉州担任村苏维埃秘书,后来先后成为钳工学徒、共青团卢加县委员会的工作人员;1933 年起,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的指导员,再后来担任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的指导员。他来到州委



工作的时间正值米尔达·德劳列从那里调离,这么做似乎是专门为了批驳德劳列与基洛夫有染的传言。

1934年3月,研究所党委把尼古拉耶夫开除出党,同时他因拒绝到委员会做动员党员从事运输作业的工作而被单位开除。但区委把这一惩罚改为记入个人档案的严重警告,还为他他在工厂提供了工作,但他拒绝了,请求安排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并开始写申诉书,还试图与基洛夫见面。有几次还真让他抓到了机会,当基洛夫从轿车里下来的时候,他向基洛夫递上了申诉书。在其中一份里他写道:“如果没有人回应我,我准备去干任何事,因为我再也没有力气了。”在行刺前9天他写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没有人理会我。在我死前我还会给您写去很多东西,这些就是遗言。”

他有一把左轮手枪和过了期的持枪许可证。10月15日,尼古拉耶夫曾被基洛夫的警卫截住,从他身上搜出了武器和基洛夫的行车路线图。在简短的审问后他被放了。为什么放了?想必答案在于,警卫也清楚他们三角恋关系的棘手之处。在从尼古拉耶夫身上找到的信中说:“基洛夫在我和我深爱的妻子之间种下了仇恨。”

于是,斯大林听到的不是他猜想的与西方情报机关有联系的白军恐怖分子所说的说法,而是普通的犯罪行为。这无论如何都不符合他对世界图景的构想。按照他的观点,像基洛夫这样驾驭民众的高级人士,是生活在超出日常生活的社会中的。

尼古拉耶夫的一击推翻了这一观点,但实际上却丝毫没有缓解紧张的气氛;基洛夫已经死了,真正的敌人深不可测,那个倒霉的吃醋男人实际上掩盖了他们邪恶的计划。能向人民说些什么呢?难道是说好色之徒基洛夫被受到侮辱的小人物枪杀了吗?

12月7日,所有报纸都刊载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条消息。消息说,基洛夫死于“工人阶级敌人的背叛之手”。但在政府发布的通报中却包含了一些与上述消息不符的信息:凶手身份正在调查之中。

12月1日,斯大林亲笔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确立恐怖案件特别审查制度的决议(12月4日公布)。决议规定这类案件的侦查应该加快进行并在10天内完成;被告人在法院审理前一天才能领到起诉书;案件的审理无需原告人和辩护人出席;不得对判决进行上诉和请求赦免;极刑的判决应立即执行。

这种人为加快的诉讼程序很像是战地军事法庭。

12月8日,苏联检察长阿库洛夫和苏联最高法院院长维诺库罗夫下达指示,规定法律具有回溯效力,并要求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确定的新法令来审理12月1日之前尚未结案的恐怖案件。同时,列出了一份人员名单,对于这些人的谋杀行动将一律视为恐怖活动。

12月2日,一趟专列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叶若夫、亚戈达、阿格拉诺夫和一群契卡人员送到了列宁格勒。从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的全程铁路

线由捷尔任斯基师守卫。

下了火车，斯大林朝前来汇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菲利普·梅德韦季脸上打了一巴掌。

梅德韦季是捷尔任斯基的战友，后者早在1907年就推荐他加入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从1918年5月起，梅德韦季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的委员；1919年5月出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是彼得格勒实施“红色恐怖”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亲自参加了对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镇压，在1919年至1921年间领导了西方面军的特别部；从1921年起，领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莫斯科州分局；从1930年1月起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领导镇压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驱逐“剥削阶级”代表出城的行动。梅德韦季是基洛夫的密友。基洛夫膝下无子，非常喜欢梅德韦季的小儿子。正是基洛夫的坚持，才使得梅德韦季留在了列宁格勒，尽管亚戈达想要换掉他。

12月2日，斯大林索取了关于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地下活动的资料。（这里提醒一下，在基洛夫之前，正是季诺维也夫领导了列宁格勒的党组织，而季诺维也夫派分子长期与基洛夫唱着反调。）

有人向斯大林汇报了代号为“内兄”的间谍案件（指的正是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娶了托洛茨基的妹妹为妻，因此他们成了郎舅关系）。斯大林在案卷中看到了几张早在10月份签发、但尚未得到基洛夫批准的拘留“季诺维也夫派分子”的逮捕证。斯大林的怀疑更加深了。于是马上逮捕了3名季诺维也夫派分子，事件开始扩大化。

斯大林决定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但此人依然处于神经质发作的状态中，只是大叫：“我报了仇，请原谅我！”

斯大林下令好好照看被捕者，让他多吃一点，以便恢复知觉、交代供词。

也是在12月2日当天，斯大林下令把行动专员鲍里索夫带到斯莫尔尼宫来，但在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鲍里索夫当场死亡。这种离奇的死亡引起了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契卡人员的怀疑。鲍里索夫是用卡车接来的，绝对清醒的司机在撞到一幢大楼的墙体之后，不知为何突然把车开上了人行道，而鲍里索夫的头就撞在排水管的钩子上了。（60年代，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重新调查了基洛夫一案，其中认定鲍里索夫死于不幸事故；卡车的传动轴折断了，将他往右抛了出去。）

但是在12月2日，斯大林怎么也不可能把鲍里索夫的死亡视为一次不幸事故。原本可以讲述许多内幕的警卫员的死亡，加之谋杀基洛夫看似出于普通动机，这就让人觉得是一场经过巧妙掩盖的行动（1937年，除了司机之外，所有与基洛夫死亡有牵连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遭到枪决）。

12月4日，斯大林下令由副人民委员Я.С.阿格拉诺夫领导的新侦查小组来代替



列宁格勒的侦查员,并指派叶若夫来监督侦查情况。这样一来,斯大林可以说是采用了双重管理制——在列宁格勒是如此,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也是如此。这一举措影响深远,导致了属于老布尔什维克的亚戈达的垮台,也引发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清洗。

后来,由赫鲁晓夫组织的委员会在重新审理尼古拉耶夫一案时,未能证实他与洛茨基派分子或季诺维也夫派分子有牵连,但在1934年,阿格拉诺夫的小组很快就从尼古拉耶夫口中拿到了需要的供词。12月13日,尼古拉耶夫供认:“应该将刺杀基洛夫描述成我的个人行动,以掩盖季诺维也夫集团参与其中的事实。”一周后他供认,枪杀基洛夫本应成为引发国内“爆炸”的信号。

12月17日,各家报纸都报道说,基洛夫死于“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前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的无耻败类所派遣的暴徒、杀人犯之手”。

的确,从被捕的季诺维也夫派分子那里搜查到了许多黑材料:过去的反斯大林传单、柳京纲领的文本和武器。

各报同时还报道了栖身在西方的白卫军组织所从事的恐怖活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四地共有99名被指控筹划恐怖行动的“白军分子”遭到枪决。他们被匆匆枪决本身表明,当局还不知道该沿哪个方向进行调查,因此他们就从两个方面同时行动。

枪决“白军分子”同样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他并不认为需要如此匆忙。

整体说来,斯大林对调查进程和刺杀案之后有关事件的态度表明,他与基洛夫的死亡没有牵连。他想保住作为证人的尼古拉耶夫,想审问鲍里索夫,并对“白军分子”遭到枪决感到不满。就连押送不幸的鲍里索夫的契卡人员没有立刻被枪毙(司机还活了下来)也表明,斯大林并没有考虑销毁罪证和杀人灭口。关于这一切,如斯大林所认为的,是其他人策划的。有可能让斯大林感兴趣的是反对派的组织构架。在那个时期见过他的人都注意到,目击者指出,他为失去基洛夫感到非常难过。

“他消瘦了,脸色苍白,眼中有种隐隐的苦痛。他会微笑、大笑和开玩笑,但我看到他时,我心里总是有些伤感。他很痛苦。在基洛夫去世后的最初几天里,帕夫卢沙·阿利卢耶夫正住在他郊区的住所——帕夫卢沙与约瑟夫两个人坐在饭厅里。约瑟夫用手托着头(我从未看见过他的这种姿势),说道:‘我完全孤苦无依了。’帕夫卢沙说,这是那么的感人,于是就上前吻了他一下。”(《玛丽娅·斯瓦尼泽的日记摘录》,引自:《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莫斯科,1993年,第168页)

10月16日,阿格拉诺夫在州委市委非公开联席全会上说,刺杀案是季诺维也夫派分子组织的,即前共青团列宁格勒州委的负责人И. И. 科托雷诺夫、B. B. 鲁缅采夫、K. H. 沙茨基等;而他们的精神支柱则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

卡耶夫以及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其他支持者。

同一天，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另外 30 个人在莫斯科被捕。

的确，所有这些被捕的人之间都是有联系的：被认为是“列宁格勒中心”领导人的科托雷诺夫在苏共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但在 1928 年恢复了党籍，而且他的请求恢复党籍的申请书得到了加米涅夫的亲自批阅。

此时他担任着一个不大的职务：列宁格勒工业学院一个系里的党委书记，是一个反映出反对派拥有广阔土壤和其滋生环境的小人物。

他没有向审讯人员隐瞒与季诺维也夫派老同志有联系，并负有“政治和道德的责任”。他是在侦查人员让他相信尼古拉耶夫“接受了用恐怖手段反对党领导的恶毒情绪”后承认这一点的。

科托雷诺夫没有昧着良心说话，这些“情绪”确实存在。尽管如此，季诺维也夫派分子中任何人都未曾怂恿尼古拉耶夫除掉基洛夫，从法律上讲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一罪行。

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斯大林很快明白了，他是在与像幽灵一般的捉摸不定的敌人打交道。当需要的时候，这个幽灵就会固化，然后再度溶化在空气中。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就像亚历山大二世在第 7 次遇刺时才被杀那样，这个幽灵早晚都会在斯大林身上得手。必须铲除反对派赖以生存的所有层面的土壤，这个土壤中充斥着陈旧的党内民主（甚至可以说是阴谋）传统，同时也要铲除“白卫军”阶层。

当代历史学家瓦季姆·罗戈温强调，从这一刻起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开始了新的对决，不分析这种对决就不可能理解后面“种种案件”和审判的逻辑。

这种观点只对了一部分。斯大林需要展开针对包括已在国家管理层中谋得一席之地之新一代党员的更深层次的清洗。拿尼古拉耶夫的例子来说，他不是托洛茨基派分子，不是季诺维也夫派分子，也不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的恐怖成员，这表明还有另一类人对体制不满。

内务人民委员部 12 月 22 日发布的消息证实，斯大林的确是这么评价时局的。该消息称，“前季诺维也夫反苏集团”的 15 名成员 12 月 15 日在莫斯科被捕，其中 7 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扎卢茨基、费奥多罗夫、萨法罗夫和瓦尔金）未参与谋杀基洛夫（没有找到“充分证据”），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决定只对他们判以行政流放的惩处。

的确，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很快就成了“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案”的配角。这个集团构成如下：77 人中有 65 人是共产党员（其中 23 人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入党，40 人在 1917 年至 1920 年间入党），大部分人参加了所谓的“列宁格勒反对派”。

1935 年 1 至 2 月，在列宁格勒逮捕了 843 人，他们都属于过去的“新反对派”，或



是“列宁格勒反对派”。

斯大林亲自分析了“莫斯科中心”和“列宁格勒中心”的人员组成情况。他亲笔书写的名单被保存了下来。他把一些人的姓名从这份名单移到了那份名单上，或者是相反，这表明，他对待这一问题是多么认真。

1934年12月28日至29日进行了法庭审判。科托雷诺夫在审判中重申：“我在道德上对尼古拉耶夫干的枪杀案负有责任，但我没有参与组织这场谋杀。”

该案的审理进程引起了庭长B. 乌尔里希的疑问，他打电话给斯大林建议进行补充调查，对此斯大林下令不得推迟做出判决。

于是乌尔里希宣布了判决：极刑。

听到判决，尼古拉耶夫叫道：“你们骗了我！”显然，在长时间的审讯过程中，有人与他达成了某种协议。而当尼古拉耶夫距离死亡仅一步之遥时，他试图引起大家对此的关注。

在执行判决中，只剩下科托雷诺夫一人还活着的时候，阿格拉诺夫和维辛斯基似乎有些怀疑判决，忍不住问道：“马上就要枪毙您了，还是说实话吧，是谁又是怎样组织对基洛夫的刺杀的？”这也就是说，不论是进行侦查的领导人还是检察长都不清楚最主要的一点！

而科托雷诺夫的回答应该让他们感到了震惊：“整个这个审判过程都是胡扯。大家被枪毙了。现在就要枪毙我了。但除了尼古拉耶夫，我们所有的人根本就没有罪……”（基里林娜 A.，《不为人知的基洛夫》，圣彼得堡、莫斯科，2001年，第302—303页）

斯大林无疑是知道这些临终遗言的，但这会对他有什么新的启示吗？

他不是按照法律的准则来审判的，也不可能松开捏着企图逃脱的幽灵的拳头。按照他的逻辑，根除恐怖活动的任务理应当被当成信仰问题来看待。背叛信仰的人（反对派之前已经忏悔过，并发誓效忠）应该遭到消灭。

被审讯摧垮的萨法罗夫招了供，指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没有被解除武装的反对派分子。由于他的这一指证，早先被判处行政流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在“莫斯科中心”案中被定罪。季诺维也夫获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判决书中指出，尽管“莫斯科中心”的成员们不知道列宁格勒同谋者的恐怖计划，但也对“发生的谋杀负有政治责任”。

调查证明了主要的一点，反对派集团的确存在，其成员保持着经常性联络，还进行着反斯大林的宣传。他们能够在任何时刻成立“影子政府”，并发动政变。

海军元帅伊萨科夫证实了斯大林那段时间的艰难处境：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在基洛夫被杀后很快出现的。那时我正在一个与重大军事工程项目有关的委员会里供职。每个星期这个委员会都召开一次例行会议，有时是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举行,有时是在其他地方。会后有时会安排一个很小范围的晚餐,或者是在这样一个小范围里观看电影。我们边看电影,边喝点酒、吃点菜。

“我要说的那一次,晚餐是在下面一层的一间房里:一个相当窄的客厅,比较而言不大,四周摆满了书柜。从我们开会的办公室到这个客厅是一条要拐几次弯的很长的过道。过道的每个拐角处都站着哨兵,准确地说不是哨兵,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值勤军官。我记得,会后我们来到这个客厅但尚未入座时,斯大林突然说:‘你们注意到他们有多少人站在那里了吗?每次经过走廊时你若是想:是他们中间的这个人吗?如果是这个人,那么他将朝你背后开枪,如果你转过拐角,那么下一个人将迎面向你射击。当你穿过走廊经过他们身边时就是这样想的……’我像所有人一样,沉默着听完了他的话。当时那种情况的确让我大吃一惊。现在,在多年之后,此事在某种程度上让我理解了斯大林的生活和举止,当然不是全部,但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西蒙诺夫 K.,《我这一代人的见证》,载于《旗帜》杂志,1988年,第5版,第69页)

这种陈述是否可信呢?Ф. Д. 博布科夫认为,这种说法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这不符合斯大林非常谨慎和镇定的个性。如果斯大林怀疑警卫的忠诚,他不会向客人们诉苦,而会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但不管怎样,斯大林已经有理由不再相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层。调查过程中显示,以亚戈达和秘密政工局局长 Г. А. 莫尔恰诺夫(是波斯特舍夫提拔上来的人)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有意加快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老反对派分子的调查——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遣送到最远的集中营,而那些被证实与恐怖活动有牵连的人,则遭到了审判和枪决。整个过程毫不声张,并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用最快的速度予以完成。

斯大林用的则是另一种方法:声势浩大的法庭审理、揭露左的和右的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出示季诺维也夫派分子和托洛茨基派分子一起转向恐怖、间谍和破坏活动的证据。

契卡人员的所作所为让人有理由相信,他们有麻烦了,因为就在不久前(在1934年),莫尔恰诺夫还致函中央委员会,称不存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的地下组织。现在的情况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后果是造成“党的宠儿”基洛夫遇刺身亡。

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和亚戈达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

1935年2月23日,斯大林收到了副内务人民委员 Г. Е. 普罗科菲耶夫的报告。报告称,从一个被捕的人那里找到了托洛茨基在1927年的档案。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示:“此事极其重要,建议把托洛茨基的档案交给叶若夫;其次,委派叶若夫监督调查工作,以便肃反委员会能与中央委员会一起开展调查工作。”

从这一刻起,亚戈达开始走下坡路了。起初他并不明白,这对他是一种威胁,他



仅是出于部门竞争的角度去阻挠叶若夫获取情报，他不希望在他和斯大林之间出现一个监督员，而这个人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降了一级。

亚戈达没有想到，浑身肌肉的小个子叶若夫像一条斗犬，是不会放过他的。叶若夫是斯大林的人，时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一职。他在机关中的分量超过了亚戈达。叶若夫有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作和在国内战争中参加过革命斗争的经验，担任过马里州委、塞米巴拉金斯克边疆区和哈萨克斯坦边疆区委三地的书记。他曾经和巴斯马奇分子(1918至1924年间活动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反革命匪徒——译注)作过斗争，在中央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任过职，参加过集体化运动，以及中央委员会分配处、干部处和工业处的领导工作。1933年，他成为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叶若夫经常被说成是一个偶然得势的没有用的人物，但实际上他是党的强有力的干部。

很快，叶若夫就发表了一份让自己新的被保护者们“高兴”的声明：“按照他自己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国内存在一个尚未揭露出来的托洛茨基派中心。”从此，中央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人员之间产生了看不见的对立。

亚戈达禁止所有工作人员向叶若夫提供任何信息，而莫尔恰诺夫则嘱咐：“有叶若夫在场时什么都不要说，审讯要停止。”(图姆什斯 M.，《全俄肃反委员会：宗派之争》，莫斯科，2004年，第126页)

在明白有人不许自己接触业务上的材料之后，叶若夫也不再客气了，他不打招呼就径直出现在审讯被捕者的现场，要求查看文件，深入了解所有细节，亲自传唤和审问犯人，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以及侦查员们见面。

当然，亚戈达及跟随他的官员不可能让所有的契卡人员都奉行某种方针。不仅如此，叶若夫还查到一些能够证明亚戈达亲自包庇托洛茨基分子并阻挠对他们的案件进行侦查的事实：这位人民委员在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弗里茨-达维德、卢里耶的审讯笔录(《关于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关于托洛茨基下达的谋杀联共(布)和政府领导的指示》)上作了批示：“……胡说八道，无稽之谈……绝不可能。”

叶若夫把这些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拿给自己的上司看。斯大林再一次需要做出决定，应该怎么做。但亚戈达的时代还未结束，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中到处都安插着他的人。从诺里尔斯克和远东的建筑工地到各级院校和各个党组织，契卡人员都睁着警惕的双眼注视着国家的安全。

斯大林没有下决心换掉亚戈达，还因为从1935年1月起已经开始对“克里姆林宫案”展开了调查。该案指控一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工作人员“准备谋杀政府成员和斯大林同志”。

谈论叶若夫与亚戈达的相互关系以及后来亚戈达政治分量的减轻，就应该提到

B. B. 古比雪夫的死亡。古比雪夫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委员，1935年1月25日47岁时去世。他死后，叶若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选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35年2月1日），米高扬和丘巴尔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和艾赫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毫无疑问，这些人事变动加强了统治集团的地位。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职的丘巴尔是乌克兰上层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此时实际上成了莫洛托夫的第一副手。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继承人日丹诺夫博学多识，深受斯大林的赏识。此前，日丹诺夫从1924年就开始担任下诺夫哥罗德州委书记，并作为工业化方针的坚决拥护者进入了最高领导层。

米高扬过去曾是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从1934年7月起开始领导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他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创下了一项独特纪录——提了41次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虽然也批评过他，但还是信任他的。

然而，在七大上主持了反对斯大林幕后谈判的艾赫为什么也得到了晋升呢？答案是下列两个中的一个：或是斯大林并不知道那些密谈，或是他对这个冷酷无情的拉脱维亚人并未产生怀疑。

这些变动没有直接触及亚戈达，但叶若夫和米高扬（曾经想把他安排为内务人民委员）的晋升未必会加强内务人民委员的地位。不但如此，亚戈达的个人品质（高傲、虚荣、粗鲁、放肆）也不可能得到清心寡欲的斯大林的喜欢。斯大林是理智的，他容忍了这些。但他能长期容忍下去吗？

1935年6月17日，政治局批准了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关于实施逮捕的程序》的决议。从这时开始，所有的逮捕行动无一例外必须得到检察院的同意方可实施，而逮捕领导成员和专家还必须征得他们领导的同意。这样一来，对于亚戈达来说，除了斯大林和叶若夫之外，又多出了一位监督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如果不是敌手的话）维辛斯基。在亚戈达不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拘留所里私设法庭以审理被捕者的犯罪案件时，正是在维辛斯基的努力下使得亚戈达的决定得以撤销。

其实，认为斯大林在1935年上半年已经把亚戈达看成了危险的敌人是不正确的。不，不是敌人，但也不是朋友。似乎是，斯大林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当年没有任命明仁斯基，而任命了这个斯维尔德洛夫的连襟，他是否做错了？

## 第二章 和平与农民

与农民和解、“莫斯科审判案”、叶努基泽垮台、洛米纳泽为何饮弹自尽、“老革命家们”的倒台

对基洛夫被杀的调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事件，无疑中断了政治局势稳定的进程，但却阻止不了经济的自由化。斯大林最重要的决定，也就是实际上意味着终结与农民之间战争的决定，是1935年2月在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大会对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4月17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批准了该章程。

集体农庄庄员从事个体副业经济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保障。根据不同的地区，准许个人拥有0.25至0.5公顷的自留地（一些地区高达1公顷），家禽、兔子等数量不限，牛可有2至3头；在游牧的畜牧业地区可达20头牛、100至150头羊、10匹马、8匹骆驼。允许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集体农庄庄员对集体农庄的管理权也得到扩大，把集体农庄庄员开除出去的处罚现在需要由全体会议决定等等。

农机站政治处的撤销和示范章程的批准表明，时下进行的政治斗争只是精英阶层内部的事，只涉及一小部分人。

由于签订了这一“经济和约”，到1937年，自留地经济占集体农庄经济总量的百分比分别为：土豆和蔬菜占52.1%，果类作物占56.6%，牛奶占71.4%，肉类占70.9%，皮革产量占70.4%。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市场贸易额从75亿卢布增加

到 178 亿卢布。与 1933 年相比,1938 年的市场价格降低了 63.9%,粮食价格降低 82.8%,土豆价格降低 79.9%,蔬菜价格降低 39.2%,肉类价格降低 29.4%,牛奶价格降低 43.1%。这些价格或是等同于国营合作社贸易价格,或是更便宜。

在那场集体化运动的悲剧之后,传统的务农习俗得到了部分恢复(尽管这种自主性以及市场因素都大打折扣)。

由于在实践中转为采用购买粮食的方式,1934 年在苏联的农村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完成了粮食征购计划的情况。这等于与农民战线至少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合约。如果不是这样去做,斯大林集团就会被推翻。

斯大林是否明白,他所推行的变革,规模之大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看来他领悟到了,因为他不是偶然才从历史中去寻求帮助。斯大林研究了与大贵族集团作过斗争的伊万雷帝和对国家管理体系及工业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彼得大帝两者的经验。但无论是伊万雷帝、彼得大帝,还是亚历山大二世、斯托雷平,他们都没有涉及改变经济关系的问题。甚至 1917 年发生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两场革命,也保留了农民的所有权。所以,斯大林遭遇到的内部的战争及其战线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前辈都要猛烈得多。

斯大林面对的斗争尽管都很残酷,但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是大规模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斗争都会涉及老百姓。同“老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是在意识形态和党政机关内部的斗争,与军人的斗争同样仅限于上层,同老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斗争也是局部性的,而同民族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战争则是区域性的。虽然所有这些斗争导致的结果不是生存而是死亡,但这些斗争绝不能与在工业化和集体化推进中对居民的巨大掠夺相提并论。正是在这里,俄罗斯人民(革命前的概念是指信奉东正教的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总称)经历了痛苦的根本性改变。传统的俄罗斯,其核心是亚历山大二世、维特和斯托雷平未能实现彻底改革的古罗斯,摧毁了原有的国家体制,并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体制,用自己习惯的集体主义和公正原则去充实自己陌生的世界共产主义。

集体化不是像天空中的惊雷一样突然爆发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它就以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地方集体农具仓库、采购和销售机构以及储蓄所的形式出现了。

在阿尔泰的老巴尔达镇发生的情况就是农村合作社繁荣程度的一个绝好例子。在那里,被斯托雷平迁移过去的人们组建了向欧洲出售奶油的贸易合作社,在自己住的地方修建了发电站,把电接进了农村木房,还在乡村俱乐部里安装了为全村服务的电影放映机和电话站。但这些农民富裕起来之后并没有成为大俄罗斯的公民。不管怎样,也如高尔察克的将军 A. 布德别尔克证实的那样,正是他们和类似他们这样的人对白军给予了最顽强的抵抗,对红军也是这样。他们的自主和富足并没有增加他们对国家体制这一概念的归属感。



因此,当斯大林与农民“和解”后,当伟大的社会主义基本建设使上百万获得了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普通民众成为可用之才时,他就可以投身到其他战线中去了。

如果基洛夫没有遇刺,情况会是怎样的呢?那场类似恐吓行动的,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集团”的冲突大概就不会发生了,加米涅夫将从事文学方面的管理工作,季诺维也夫会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或在其他哪一个部里供职,而持反动立场的青年们也会逐渐得到改造。这样的情景是完全可能的,但其现实的可能性不超过10%到15%。经过三次革命和内战洗礼的几代人已经领略了暴力、流血和光荣。历次革命的经历让他们确信,获胜者之间将展开残酷无情的斗争。

似乎是为了再翻版出一个要强化与战友们进行斗争的理由,1935年1月开始了对“克里姆林宫案”的调查。这起案件的实质是,斯大林早在巴库时的战友、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教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阿韦利·叶努基泽原来是一个腐化堕落分子。他把形形色色的分子招募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和克里姆林宫各个部门工作,并与许多由他安排担任了各种职务的年轻妇女同居,还挥霍国家的资金。审讯表明,受他保护的那些人四处散布谣言,称好像是斯大林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基洛夫被杀是因为有人争风吃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表示有必要杀掉斯大林。如果考虑到,正是叶努基泽掌控着克里姆林宫警卫队,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长P. A. 彼得松在国内战争期间曾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个人警卫队队长和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列车长,那么斯大林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

引起斯大林特别注意的是,告密者是他的内弟——第一任妻子的弟弟A. C. 斯瓦尼泽。斯瓦尼泽和叶努基泽一样,都是领袖最亲密的“高加索”圈子里的人。并不能排除叶努基泽是个骄奢淫逸的人,他控制着保障精英们日常生活供应的庞大部门,而在自己的交往和谈话中会走得过远。

M. A. 斯瓦尼泽在自己的日记中写过:“在他的部门中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是他所有过错的直接后果:只要给他送惹人喜欢的姑娘或是妇女,那么你就可以在他鼻子底下为所欲为……”

按告密者的话,这些阴谋者的计划包括逮捕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计划由图哈切夫斯基或是军长B. K. 普特纳担任独裁者的角色。拟定在这些人的住所或是卡瓦列尔斯基楼二层的电影厅中实施逮捕行动。

上述计划未能得到证实,但其存在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的。还有,克里姆林宫的图书馆里有好几位与叶努基泽走得很近的人,而主持这个图书馆工作的就是加米涅夫的弟媳H. A. 罗森菲尔德(正如审讯中记录下来那样“出身于别布托夫公爵家族”)。

下面就是其他同案犯对罗森菲尔德的指证:她说,阿利卢耶娃自杀“是因为她不



赞同国家现行的政治方针，似乎是这种方针使农村实行了导致贫穷的集体化，也造成了城市居民食品供应不足等等……列宁最亲密的老一代学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国家缺乏民主的要素”。

其他被捕者并未否认自己有过反苏的谈话，并认为如果红军发动起义会得到农民的支持。

同样遭到逮捕的还有加米涅夫的弟弟、画家 H. B. 罗森菲尔德及其儿子、莫斯科能源局的工程师 B. H. 罗森菲尔德。父子两人均承认，他们曾经谈论过撤掉斯大林的话题，加米涅夫本人也参与了这些谈论。

总的来说，他们所描述的情景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卷入“克里姆林宫案”的有加米涅夫、他的妻子（即托洛茨基的妹妹）、罗森菲尔德全家及他们的侄子、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还有众多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亲戚和熟人。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承认确实存在四个恐怖集团，其中一个就是“托洛茨基集团”。因“莫斯科中心”案件被判了 5 年的加米涅夫又被判处 10 年监禁。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亚戈达呈送的提出各种惩罚标准的报告上，斯大林先在 H. B. 罗森菲尔德这个姓氏旁边写上了“枪决”两字，但随后又勾掉了所写的字，保留了亚戈达提出的 10 年监禁的建议。

斯大林不能确定是否存在这种密谋，但要知道，针对基洛夫同样也不存在什么密谋。因此，在权衡尼古拉·罗森菲尔德的命运时，斯大林应该会产生一种类似站在悬崖边上的感受。

在审理“克里姆林宫案”的同时，在列宁格勒进行了一场清洗“遗老”的运动。这些遗老包括贵族、各个部门的官员、军官、教师、牧师、医生和工程师等等。结果，到 1935 年 3 月底，有 1434 个家庭被迁出。不过他们获得了在非首府城市中生活和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权力。从这些人那里收缴到 9 支来复枪和卡宾枪、204 把左轮手枪和普通手枪、129 支小口径步枪和猎枪，以及 3 枚手榴弹。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当斯大林步入卡瓦列尔斯基楼的电影厅，当灯光慢慢熄灭，银幕上出现人影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他这时已经知道，一些果断的家伙有可能会进入电影厅，那时他看到的将不是《夏伯阳》英雄的、或是《快乐小伙儿》淘气的梦想，而是卢比扬卡的内部监狱，或是他脑中中弹，僵直的身子平躺在地上，如同他的朋友谢尔盖一样（这两部电影都是 1934 年上映的，斯大林与自己亲密的战友们曾一起观看过这两部影片）。

斯大林解除了叶努基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调任他为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除名。这同样是斯大林个人的损失。这个他从 1900 年起就相识的老熟人，不再是朋友了，而处于背叛的边缘。



当然，随着党员最高月工资限制的取消和领导人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精英们面对的诱惑也越来越多。革命结束了，现在可以用犒劳自己来补偿过去的艰苦生活了。斯大林允许在合理范围内这么做。他并不反对在莫斯科河边靠近大石桥的地方建造一座有 500 套住房的住宅楼，其中每间住房都配上了当时能有的最全的设施，如煤气、电话和热水（这座大楼后来被称为“滨河路大楼”，苏联几乎所有的人民委员、部长和将军都住在这里）。

是的，斯大林放松了对大家的约束，但他没有料到，日常诱惑这么快就在国家的最中心处构成了一个距他一步之遥的敌对环境。

有一种无法驳斥的说法，称叶努基泽、彼得松和莫斯科军区的领导们确实筹划了谋杀（解职）行动，但 1934 年 12 月 1 日斯莫尔尼宫意外的枪杀事件打乱了阴谋家们的所有计划。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叶努基泽和彼得松 1937 年招供的基础上的，那时身处不同城市的他们却同时供认：他们计划逮捕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并在必要时枪毙他们。

1937 年 5 月，当时已被捕的亚戈达在受审时说，叶努基泽和他讲了准备发动政变的事情，政变的领导人包括彼得松和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科尔克。此外，亚戈达转述了叶努基泽的原话，称密谋者选定的人是图哈切夫斯基。

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是无中生有，那么呆在哈尔科夫的叶努基泽和呆在基辅的彼得松即便在侦查员的强压之下也未必会承认足以让他们被判死刑的行为。更主要的是，他们未必能列举出四套搜捕领导人的详细方案作为自己供认的论据。“甚至指出了房间和办公室的位置、警卫的情况和逮捕主要领导成员最佳也是最可靠的方案……”（茹科夫 Ю.，《另一个斯大林》，莫斯科，2003 年，第 181 页）

如果这个阴谋的确存在，而且完全不是因为叶努基泽的情人们让斯大林发生了兴趣，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揭露这位滥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克里姆林宫案”被宣扬了出去，而准备发动政变的“线团案”则不为人知呢？

结果看来有两个原因。第一，和反对派进行思想斗争与他们被控的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应该在某一点上停下来，否则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敌人。第二个原因是，在与法国和所谓的东方集团建立起同盟后，莫斯科不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苏联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斯大林停止了“线团案”的扩散。

2 月 14 日，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克里姆林宫警卫工作》的决议：原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部转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来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训练班（8 个中队）从克里姆林宫撤出，而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团进驻。彼得松被派往基辅军区，担任军区司令员亚基尔的副手，负责物资保障方面的事务。莫斯科军区参谋长 A. M. 沃尔佩从军事工作调整为行政工作，被任命为工农红军行政动员部部长。此外，在未能立刻撤出克里姆林宫的全俄

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班中成立了受亚戈达领导的军事反间谍部。克里姆林宫电话站和政府车库也交由亚戈达管理。

这样，“线团案”虽未能进行彻底的清查，却获得了行动上的许可。结果是斯大林集团更换了整个安全机构，撤掉了其中前不久还看似最可靠的“高加索”分队。军人们仍然受到怀疑。亚戈达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由于这一点，他的处境（在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的监督之下）变得更加危险。

1935年5月2日，亚戈达宣布“克里姆林宫案”的调查工作结束。

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斯大林面对军事院校毕业生发表了演讲，不动声色地对时局做了暗示：“他们用子弹威胁我们中的某些人。”斯大林没有解释“他们”到底是谁。可以推测，他指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但是他不需要隐瞒他们的姓名，所以没有被指名道姓的“他们”多半是与“线团案”有关的人事。

在这次招待会上，斯大林还谈到另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表示反对现实中存在的把几乎“所有我们的成就”都归功于“领导们和领袖们”的现象，并解释说，国家的成就如今取决于“干部们”，应该“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位有益于我们事业的工作者”。他寄希望于新社会群体的人们，不再理睬那些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失望的老一辈干部。

从未经修改的速记笔录来看，在斯大林1935年5月4日在军事院校毕业生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他的社会文化立场。在1000多名这一年毕业的军校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工程师，他们中80%的毕业生没有被分配到军队中，而是到了各工业类的人民委员部。

在对他们讲话时，斯大林这样描述了革命前的俄国：“按照其组成，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燃烧着几处工业炉灶、闪烁着几点文化小火花；而按其实质来说，则是中世纪的。”（涅韦任B.，《斯大林论战争：宴会上的讲话（1933—1945年）》，莫斯科，2007年，第50页）

可见，这里关键的定义是“中世纪”。但在修订后的速记笔录和在《真理报》发表时，这个字眼不见了。

在斯大林讲话中，第二个极重要的定义是：当代干部是从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中选拔出来的。我们要补充一句，这些农民不仅渴望取得社会成就，还承载着中世纪村社心理的深厚传统，而这种传统不是一代人就可以根除的（出现了与摧毁原有社会精英和强力推广“进步”的“瓦良格人”的扩张类似的情景）。也就是说斯大林在从过去的（就算还没有完全成为过去的）井中舀水。新的社会精英对帝国的行政遗产能够掌握多深，这是一个大问题。

很快就变得很明朗，变革来临了。

变革表现在以下方面：

起草苏联新宪法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新宪法打算实行新的甚至是多党直接无



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制度。

1935年7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关于撤销对集体农庄庄员的判罪”的决议,把选举权归还给被法庭剥夺了选举权的人。被判不超过5年监禁的集体农庄庄员得到了赦免。到1936年3月1日,也就是在7个月的时间里,有将近80万人获得了选举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按斯大林亲自起草的“1932年8月7日令”(即“三穗法”)被判有罪的。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也得到了改组。代替庞大的文化和宣传部的是5个新的部门:党的宣传鼓动部(负责人是A. И. 斯捷茨基)、报刊和出版物部(Б. М. 塔尔)、文化教育工作部(A. С. 谢尔巴科夫)、学校教育部(Б. М. 沃林)、科学部(К. Я. 鲍曼)。政治行政部由共产国际最有威信的领导之一И. А. 皮亚特尼茨基来领导,此前他负责共产国际的秘密活动,主持着国际联络部的工作。(这一任命表明,受自己和法国关于建立国际安全体系倡议的制约,苏联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也是大幅地缩减了共产国际在国外的工作。)

在1935年7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尖锐斗争进一步证实了苏联已脱离老的共产国际的实践。在这次大会上,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引起了激烈争论。这份报告提出了在西方国家成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结盟的统一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参与到议会斗争中去的想法。在地下斗争中锤炼出来的信仰阶级斗争和街垒战英雄主义的共产党人,立刻感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风向。

政治局6月17日批准通过的由维辛斯基起草的《关于实施逮捕的程序》的决议也属于这次变革。

除此之外,根据政治局1935年3月9日做出的决定,重新调整了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职责范围。这是由领导集团成员的变动引起的:基洛夫和古比雪夫去世、日丹诺夫被调至列宁格勒、叶若夫得到提升。斯大林把原来由日丹诺夫监管的部门(政治行政、党的领导机关、计划财政贸易部门和农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实际上中央机关是斯大林在直接领导。

但当负责干部事务问题的叶若夫为了核查党务工作人员的履历表而试图调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的档案和业务资料时,斯大林予以强烈反对(茹科夫Ю.,《另一个斯大林》,第129页)。毫无疑问,我们深谋远虑的主人公看到,这将对领导层本就脆弱的力量平衡构成威胁。

这样,可以说一个新的时期在基洛夫去世后开始了。这是一个对于广大居民阶层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结合在一起的时期,而对于执政高层内部而言则是镇压的时期。

在整顿过列宁格勒之后,赫鲁晓夫和列坚斯又对莫斯科进行了小规模“清洗”。

政治诉讼、清洗和流放的机制开启了。那些发动了“红色恐怖”、实行过十惩其一

措施、组织过征粮队的人们没有料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会把他们抛到车轮之下。而那些抛弃他们的人同样也不可能知道，他们自己也时日不多了。

1935年1月18日，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市委书记洛米纳泽开枪自杀。在因参加“瑟尔佐夫-洛米纳泽集团”而失势之后，洛米纳泽仍然像过去一样受到奥尔忠尼启则的支持。他是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批评自己参与了“左右倾集团”。

在乌拉尔，洛米纳泽与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厂厂长 A. П. 扎韦尼亚金发生了冲突。扎韦尼亚金不愿向这位急于展现个人才能而紧逼自己的格鲁吉亚人屈服。

阿夫拉米·帕夫洛维奇·扎韦尼亚金不是一名普通的专家。他1917年11月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担任过师政治部主任和顿巴斯尤佐夫卡区委书记；后毕业于莫斯科矿业学院，并立刻成为该院冶金系主任，后来担任过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冶金工业总局的副局长；从1933年1月起，担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捷尔任斯基冶金厂厂长；从1933年8月起，担任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厂的厂长，并在党的十七上当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扎韦尼亚金还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兴建了诺里尔斯克矿业冶金联合厂，是苏联核工业的组建者之一，任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1956年，在核武器试验中受过辐射的扎韦尼亚金不幸去世，享年55岁。)

洛米纳泽与扎韦尼亚金的冲突在那一时期是很典型的：一个“小斯大林”(或者“小奥尔忠尼启则”)来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并想立刻崭露头角。他介入厂长的职权范围，用记过和威胁诉诸法庭来折腾工程师，干预计划的制定。但扎韦尼亚金却顶住了压力，洛米纳泽拿他也没有办法，尽管洛米纳泽有来自人民委员的支持。1934年夏天，冲突闹到了政治局，奥尔忠尼启则平息了这场风波。

但在基洛夫死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员开始把以前所有反对派分子的案件翻出来重新审查，也就又找到了洛米纳泽这里。洛米纳泽不想受辱，就自己结束了生命，死后被控犯有背叛行为。

洛米纳泽不是什么背叛者，只不过是其所觊觎的那个位置被更内行、更可靠的人员占据着。

透过这场人事纠纷的镜子，也许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明白20世纪30年代政治精英的更替现象。这在所谓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始后尤为明显。1935年，顿涅茨克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于8月30日夜里在一个班次里用气动风镐采出了102吨煤，而生产定额是7.3吨。这项世界纪录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斯达汉诺夫个子高大、身体强壮、忠厚老实，他未必意识到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风口浪尖之上。



1935 年秋开始的提高工作定额的群众运动，旨在提高采煤量、金属冶炼量，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等等。除此之外，它还为新一代敞开了社会地位上升的大门。

斯大林越过所有的人民委员和厂长们，开始关注这一运动。这是斯大林的一项天才的创举，立即使他成为人民之父和人民的保护人。斯大林向冶金工作者、联合收割机手、集体农庄突击手和地铁建设者们发表讲话。他们被授予勋章、受到赞扬、享有各种优惠，并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全国民众在短时间内就领悟到，支持和重视他们的主要人物就是斯大林。

1935 年 11 月，在与相聚于莫斯科的 3000 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见面会上，斯大林发表了长篇讲话，阐述了几点重要和明确的主张。

第一，应该追求“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为此应当像斯达汉诺夫一样去劳动；

第二，要保证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不受不支持创新者的“行政官员”的干扰，而对这些官员“应该轻抽几下”；

第三，应该提高生产定额和真正掌握新技术。

斯大林在讲话中的一些话，后来被说成是对被镇压者的嘲笑：“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实际上他是另有所指。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就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于是就产生了高的生产定额，于是就产生了男女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首先就在这里。如果我国有危机，如果我国有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失业，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得不好，不像样，不愉快，那么我国是决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斯大林 И. В.，《斯大林选集》，3 卷本，第 2 卷，基洛夫，2004 年，第 357 页）

斯大林甚至敞开了自己的思想：单靠一个由革命获得的政治自由是难以生活的，而我们的革命“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财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得愉快了，这也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发展的土壤”。

这段话与镇压没有任何关系，但与正在进行之中的精英集团的更替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斯大林时常在思考“干部”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他 1935 年 5 月 4 日在克里姆林宫对军事院校毕业生发表的讲话中得到证实。正是那一次他谈到“干部决定一切”、谈到领导人“对我们的工作者表现出了关心的态度，推动了他们向前进”、谈到“人才和干部是最宝贵、最具决定意义的资本”。拥有他们，“我们的国家将不可战胜”。

难道可以说，这是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人所说的话吗？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

斯达汉诺夫运动在排挤老一代专家，向工人阶级表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高层向他们敞开了沿着巨大的社会阶梯上升之路。



这样，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尼基塔·伊佐托夫和米龙·久卡诺夫突然成了两家最大的煤矿联合体“斯大林煤田”和“伏罗希洛夫格勒煤田”的领导，而这两家煤矿联合体担任了给几乎全部工业提供燃料的任务。对于勋章获得者、著名人物、勇士之类的人员，主抓采煤工作的Л.卡冈诺维奇保障了他们的前途，斯大林和整个宣传机构也支持着他们。但他们没能取得什么成绩。从总体上看，许多被提拔上来的人没能守住新任的职位，最终被年轻的工程师们取代了。

28岁的亚历山大·扎夏德科替换了伊佐托夫，而久卡诺夫则被30岁的孔德拉特·波琴科夫取代。这两位新人是另一种类型的管理者，并敢于同“铁一般的卡冈诺维奇”争论，敢于证明有计划地组织劳动优于紧急突击运动。

当时谁都没能看到，以这些厂长们为代表的工业领域的精英开始聚集力量，后来慢慢开始与党的上层人物进行竞争，并将工人的主动性和“群众充满活力的创造”（列宁语）挤压到了次要地位。

当然，年轻专家并不是工人阶级（人数急剧增加）与政权产生脱节的主要原因。但工业化越来越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需要调整好企业主与雇佣工人的相互关系（工业化对其他所有的国家机构，特别是对军官系统和情报机关也是同样的要求）。

托洛茨基称斯大林的政策是“热月政变”，这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热月政变”，具备了革命结束、进行国家建设和非革命性这几个特征。

顺便说一下，在斯大林与不赞同自己方针的反对派作斗争并发展了经济的时候，身在法国的托洛茨基一直在关注着斯大林。1935年4月4日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苏联整个日常社会体制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将引起新的剧烈的政治痉挛。”

其实，“痉挛”已经开始了。托洛茨基指的是斯大林个人的报复心理。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是技术学院的教授，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但遭到了逮捕，并下落不明。

当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会同情这位流亡者，并对他的坚强不屈充满敬意。这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但没过几天，4月9日，托洛茨基就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杀写下笔记：“镇压的严酷性向所有人表明，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停下来。沙皇一家被处以死刑，不仅是为了震慑、恐吓敌人并使他们失去希望，还是为了激发自己的队伍，向他们表明已无退路，前方要么是完全的胜利，要么是彻底的毁灭。”（托洛茨基Л.，《日记和书信》，莫斯科，1994年，第118页）

托洛茨基未必能够料到，他的孩子们的悲惨命运将类似于俄国皇帝的孩子们。

正如我们所见，托洛茨基的“恐吓和激发”的公式具有普遍性，被应用在了这一进程的所有参与者身上。在随后的一系列镇压中，其残酷是亦步亦趋的。



除了因“基洛夫案”和“莫斯科案”被判有罪的人之外，在这一时期，“工人反对派”集团也未经声张地被判了罪。这个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为领袖的党内集团与列宁就曾有过辩论，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被解散。而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 1933 年被开除出党，1934 年 12 月遭到逮捕，1935 年 4 月被判 5 年监禁或流放（共有 15 人被判刑）。在审讯时，很多人表现勇敢，显示出了大无畏的气概。

1935 年 3 月，最不妥协的集团“民主中间派分子”的成员遭到逮捕。其领袖 T. B. 萨普罗诺夫和 B. M. 斯米尔诺夫在历次清洗和清党时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斯大林集团在苏共十五大上进行了“针对无产阶级的国家政变”。他们指责用强力的手段来推行集体化，称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畸形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且他们在审讯和法庭上的表现没有给法官任何借用诉讼程序以达到宣传目的的机会。

他们都是斯大林坚定的反对者，并公开承认这一点。萨普罗诺夫被判处 5 年监禁，而斯米尔诺夫被判了 3 年。

他们拒绝与侦查机关做交易，即先承认错误再试图溜走。这表明，可以说 20 世纪 30 年代这些所谓的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不管受审人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其特点都是局限在党内，并且是按照另一些规则在处理。

关于审讯是如何进行的，托洛茨基分子、И. H. 斯米尔诺夫的妻子 A. H. 萨夫罗诺娃在 1958 年，即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写的回忆录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没有刑罚。精神上的施压则归结为一条——我们被告知：既然放下了武器，就彻底一点吧。我们要求您提供的这些供词是党所需要的……”

“……审讯过程中，卢洛夫尝试用其他方法来施加影响，这些方法是：

“有一次他问我：‘您在高尔察克军事独裁时期曾经受过严刑拷打，如果我们也尝试采用刑罚，您会说些什么呢？’我回答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停止供述。在此之后，这一话题就再也没有提及过。”（引自：《同代人回忆录和同期文献中的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第 267 页）

这份证明材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斯大林的手下不怕拷打和死亡，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在最近出现的一些说法中把他们描绘成软弱的、妄自菲薄的人，这就远离真相了。

萨夫罗诺娃证实，在她的圈子中不止一次谈论到要撤掉斯大林、谈论到托洛茨基做出的相应指示；证实存在“产生针对斯大林的恐怖主义情绪”的先决条件。

的确，她也说过，虽然斯大林有很多不足，但她和她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在正确地执行政治路线，尽管人们会因农村中的过火行为而愤怒”。

所以，当谈论斯大林的镇压和无辜的受害者时应该记住，他们都是同一个革命派别中的人；一旦获得胜利，斯大林的反对者同样会继续推行带来各种后果的工业化。

但是,斯大林越来越远地背离了革命原则。1935年年中,两个与俄罗斯帝国作过斗争的老战士组织——“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成员大多是过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服苦役政治犯和流刑移民协会”被取缔。

在基洛夫被暗杀后,国家不再支持以前的恐怖主义者,禁止正面谈论“民意党”的恐怖活动等等。从这些决定中可以透视出前不久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恩格斯斗争的原因。如果斯大林不怕驳回马克思战友的在他看来是反国家的文章的话,那么要掩护一些老爆破手对他来说就要容易一些了。此外,约50名老战士因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关系密切而遭到逮捕。

其他惊人的变革也在继续进行。这些变革被党内的革命分子认为是反革命的变革,但其他人是赞同的。

为了推广普希金的作品和筹办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庆典,1935年成立了全俄普希金委员会,并由高尔基来领导。《真理报》还因此刊登了题为《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社论。不久前还被归入沙皇(白卫军)文化的亚历山大·普希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

在军队中恢复了军衔制,高级军事将领被授予元帅称号和星章(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工农红军参谋部开始像1917年以前那样被称为总参谋部;哥萨克骑兵部队也得到恢复,同时“考虑到哥萨克人对苏联政权的忠诚”,哥萨克在工农红军中服役的所有限制均被取消。

许多在公共意识里司空见惯的传统文化的载体逐渐回到日常生活中来。乐团和合唱团的剧目中出现了俄罗斯民族歌舞,开始刊登俄罗斯文化和科学方面杰出代表人物的文章。普通中学恢复了以前旧俄中学中的实习课、校服,甚至还有5分评分制。

中学里还恢复了历史课、地理课,以及一些开阔眼界和确立世界观的课程。

1935年12月30日颁布的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下发的《关于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录取规则》的决议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该决议取消了一切与中学应届毕业生社会出身有关的录取限制。几万名年轻人摆脱了“反革命的出生污点”,获得了全部的公民权。

斯大林对东正教和教会的态度,转变尤为明显。《无神论者报》被取缔,反宗教宣传也大大减弱。1935年复活节前夕,买卖用于烤制复活节圆柱面包的食品颜料和小模具等得到了许可(起初是在市场上,随后是在国营商店里)。最终,在1936年新年前夕,圣诞树(此时开始称为“新年树”)也回来了。这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度喜悦和成人们的异常惊讶。大家都还记得1927年对买卖枞树的禁令,当时曾宣布由共青团进行反对买卖枞树的“讨伐”。但1935年12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波斯特舍夫的文



章《让我们在新年前为孩子们组织好美丽的枞树吧!》，这如同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他写道：“我相信，共青团员们将以最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并根除那种认为儿童枞树是资产阶级产物的荒谬观点。”

可以说，斯大林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反革命。这场革命在整个 1936 年都在进行。4 月份，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传达通知说，在讨论新章程草案时，斯大林删去了关于要与宗教作坚决和无情斗争的条例，而换成了他的要耐心解释“宗教偏见的危害”的指示。

也许，在修订这份文件之时，斯大林回忆起了那段情景：他的儿子瓦西里向老太太们脚下扔爆竹，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训斥了儿子，还举出自己笃信上帝的母亲为例。

的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总归还是变好了，只有少数人更加惊慌不安了。

国家的历史根基在持续恢复之中，但在这一分成了若干支流的大潮之下，其他的一些进程，有时甚至是相互敌对的进程也得到了发展。可以给它们做这样一个划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与地方派系和经济派系、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教会、中央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代表人士。

常常一条支流被另一条盖过，然后又被第三个支流淹没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人死去，后来他们都被算入“斯大林镇压”牺牲品的总体统计数字中了，尽管这种提法模糊了历史事件的意义。

依据党员数量的变更资料和对肃反年代党员人数增减情况的比较，当代历史学家 B. B. 科日诺夫得出结论：“把那一时期(1934 年至 1939 年)称为‘党的悲剧’比称为‘人民的悲剧’更为合适。”

如果深入挖掘一下“党的悲剧”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分党员对另一部分党员的消灭，也就是主张国家强权的人消灭了主张世界性革命的人。当然，一些与此无关的人也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们是“敌人”的熟人或是同事。这还代表着血腥和残酷的国内战争的彻底结束。

在谈到这一战争的党内特征时，科日诺夫强调：“1934 年至 1939 年死亡的人数仅是 1918 年至 1922 年的三十分之一。”(科日诺夫 B.，《斯大林镇压的真相》，第 239 页)

在谈到 1937 年至 1938 年的镇压时，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分子都被消灭的时候，苏维埃社会里新的内部战争却激烈起来？还有，为什么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完成了比现行宪法更加民主的新宪法的起草工作？

假定斯大林有一个国家建设的长期计划的话，那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计划大体上是这样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在通过极端手段达到这些目的之后，斯大林集团得出结论，如果他们不扩大自己的根

基,那么将不可避免地被解除政权。

斯大林应该回想起了在国家杜马议员党团中的工作,而在国家杜马中汇集着所有政治力量的代表。除此之外,斯大林没有议会的其他经验。想必,斯大林的议会实践经验使他能够认识到,欧洲共产党在争取议会的合法讲坛的斗争中,与首先受到轻视的社会党人结盟是有着实际的利益的。

在苏联境内扩大民主理应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因为敌人赖以生存的体制和根基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管这看起来有多么奇怪,在这里主要对手还是自己人,是那些不善于在民主选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党的领导层中的代表人物。

斯大林真的想要削弱自己实际上是独裁的权力吗?

是的,他确实这样努力了。但正如我们所见,他遭到了机关人员的强烈反对,在这方面没能获得成功。这里可以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经验。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一个小圈子为巩固自身的地位,绕过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老干部,走上了一条将政权交给民主选举出来的苏维埃的道路。他们相信,这样就能够保全整个领导层。将州委拆分为农村党州委和工业党州委的赫鲁晓夫同样也与机关人员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集团也曾有过类似的打算。

历史学家尤里·茹科夫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到1935年年中,已经宣布了但实际上并未开展的新宪法的起草工作被迅速加快。这说明,热月政变(“斯大林主义”)需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而是与社会大多数成员开展对话。这些社会成员对世界革命少有兴趣,想要的只是和平富裕的生活。

1935年7月8日刊登了宪法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和成立12个分委会的消息。12个分委会分别由斯大林(总纲和统稿)、莫洛托夫(经济)、丘巴尔(财政)、布哈林(法律)、拉狄克(选举制度)、维辛斯基(司法机关)、阿库洛夫(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日丹诺夫(人民教育)、卡冈诺维奇(劳动)、伏罗希洛夫(国防)和李维诺夫(外交)来领导。

在对委员会委员们讲话时,斯大林建议改变现行的权力体系,将其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即类似于典型的西欧民主制的立法和执法两部分。

尽管斯大林能够监督宪法的起草工作,但他却不得不平息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其他实际掌权者的争论和异议。

新宪法破坏了1918年起形成的惯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H. B. 克雷连柯(1917年任苏俄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反对权力分立和法官选举制。法官选举制是维辛斯基提出的。布哈林则不同意把选举权赋予所有的公民。

斯大林终于明白了,需要靠自己的干部力量来拟订宪法草案。于是,从4月17日至19日,再到22日这几天内,斯大林、雅科夫列夫、斯捷茨基和塔尔写出了一份草案。草案中增加了一条,确定苏联的政治基础“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而经济基础



是“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苏联的政治成分被界定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平衡发生了改变,倾向联盟中央一边。

但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现行宪法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不见了,该宣言曾经宣布要实行世界革命,表达了与“全世界劳动者”联合成“一个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必胜信心。

这显然偏离了十月革命的思想,而在托洛茨基看来,这就是投降主义。

斯大林的宪法草案还改革了选举制度。

按照 1924 年的宪法,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城市苏维埃(每 2.5 万城市选民中选出 1 名代表)和农村苏维埃(每 12.5 万农村选民中选出 1 名代表)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而是从复选中产生的,其人员组成受到了边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领导人的控制。

斯大林提出的是什么建议?他建议,选举应该在“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斯大林提出了按地区推荐候选人的原则来取代由生产单位(由大小工厂的全体人员)推荐候选人的原则。推荐候选人的权利被赋予了有关社会团体和劳动者协会:共产党组织、工会、合作社、青年组织和文化团体。

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明显是反列宁主义的原则:在他所制定的宪法中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一说,哪怕只是暗示。党的作用现在不再表现在列宁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公式上,而是自由得多——劳动者的先遣队、“所有社会的和国家的劳动者组织”的领导核心。

换言之,习惯了以前自然而然就能被选入苏维埃党的领导层的人们现在应该不断证明自己有资格担任。另外,还宣布了法院具有独立性。

显然,在新宪法被通过之后,党的精英将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所有的权力都将回归人民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这是斯大林与当权官僚相互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斯大林建议推行削弱他们权力的改革,而他们在目睹了“基洛夫案”的诉讼程序和“克里姆林宫案”的过程之后,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只能被迫表示同意。

然而,正像尤里·茹科夫强调的那样,斯大林对获得胜利信心不足。在 6 月 1 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以最枯燥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报告。他全篇援引了以往历次全会和会议上做出的有关新宪法草案的所有决议,好像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说服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他在完成他们的嘱托。但愿他们不要突然怀疑他有什么密谋。

有时候,控制选民的纯粹机关方式本身就表明了存在着潜藏的目的。

斯大林在他的报告中间接承认了自己的另一个计划。他宣布,居民的政治面貌



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谈到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时，斯大林指出一些概念、术语存在不对应的问题：“无产阶级是受到资产家剥削的阶级。但我们消灭了资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交给了国家，即交给了组成国家的工人阶级。”他反问道：那苏维埃的工人阶级是否是无产阶级呢？同样如此，斯大林证明了集体农庄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现在也是与工人阶级平等的社会成员。他断言，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现在把“工人和农民的称号”固定在新宪法之中，是为了“动员人民创造新的成就”。现在斯大林不再只依靠“无产阶级”了，他向“人民”发出了呼吁。

此后，老的机关工作人员是否还敢提出诸如国家其实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人民需要像过去一样用极端的方法加以管理的不同意见呢？胆敢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应该明白，这样他就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就得去索洛韦茨基群岛在监视下继续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了。

顺便说一下，托洛茨基用他惯常的做法，又一次用自己的批评证实了斯大林的论点：“整个不从事直接生产劳动，而从事管理、命令、指挥、赦免和惩治事务的阶层，教师和学者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不谈，数量应该在 500 万至 600 万人。这是一个估计性的数据，就如同它的构成有交叉重叠一样，无论如何都不要指望它的准确性有多高；但它作为约数还是适中的。它使我们相信，领导层的‘总路线’并不是无形体的幽灵。”（托洛茨基 JI.，《被背叛的革命》，莫斯科，1991 年，第 117 页）

被托洛茨基列入他所指的管理者范畴的还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 150 万至 200 万人）、无党派积极分子、工人和集体农庄中的特权人士以及他们的亲戚和亲友。“两个互相交叉的阶层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约有 2000 万至 2500 万人”。

托洛茨基没有谈到居民的高度社会流动性和对底层民众进入几乎所有领域的开放性。那一时期的历史到处都有平步青云的例子，这也是对斯大林的“热月政变”的一种经常性的宣传。许多俄罗斯家庭里都有因勤劳、坚强，且受到社会支持的家人获得升迁的例证。当然，他们还要表现出对政治体制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忠诚老实，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具有吸引力且明白易懂，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至于那些对这些任务不感兴趣的人，他们的道路就要艰辛得多。

托洛茨基的统计数字与参加讨论新宪法草案的公民人数大体相当。这样的人大约有 4000 万。而且，他们的意见很少涉及政治自由，而是与退休金、医疗服务、劳动权、休息权和受教育权等问题有关。

文化学者维克多·索博列夫认为，1935 年斯大林开始对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圣彼得堡核心的残余势力进行彻底清除。他把列宁及其战友们也归入这一集团，他们都曾是帝国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

斯大林获得了来自底层民众的支持，主要是来自“红色百人团”和“平民罗斯”的



支持。“红色百人团”出现于 17 世纪，由贫苦的农民阶层、城市贫民和哥萨克人组成，在 20 世纪初其人数约为 1500 万。他们一贯对宗教漠不关心，并具有平均主义的思想，而且对“好沙皇”抱有信心。

“平民罗斯”是一个有着 6000 万人的集团。视其受多神教影响的程度，内部又分成 3 个小集团。正是从这个具有民族特点的、彼得一世之前就形成的平民罗斯中，斯大林的精英们招募到了推行现代化所必需的干部。

“黑色百人团”(约 500 万人)在国内战争和集体化时期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影响。“黑色百人团”产生于 15 世纪伊万三世统治时期，由手工业者、零售商贩、小商人和富农构成。他们的特点是具有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并对东正教怀有忠诚的信仰。

其实，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受到批判的不是反对者，而是那些在寻找敌人的问题上做得过分卖力的党务官僚们。叶若夫在他的《关于更换党员证件的进程》的报告中指责了党的地方官僚过于残酷。用这位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话来说，被开除出党的人(人数达到 20 万)不是敌人，但对待他们比对待敌人还要差，不接收他们参加工作，不愿倾听他们的申诉，这样最终把他们变成了敌人。

斯大林插话支持叶若夫说：“在党的领导人中充斥着这种，怎么说呢，对待党员一概而论的态度。”他建议要从政治上启发党员，“从精神上提高他们”，“培养他们的修养”，而不是大量开除。

这是一种新的方法：斯大林通过党的精英向普通共产党员宣传自己的新政策。

在俄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的例子。例如：伊万四世(伊万雷帝)与大贵族们发生冲突后离开莫斯科去了亚历山德罗夫市，并在一个月后给首都发去两份公文。他在一份公文中指责了大贵族和牧师在对待国君和社稷的问题上玩忽职守、压制基督教徒和侵吞国库；而在另一份公文中则向人民宣称，他并没有对人民产生不满和愤恨。很快，普通民众就把自己的满腔愤怒发泄到了上层统治集团身上。

那么这位沙皇最终得到了什么呢？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双方既不能和睦共处，又不能脱离对方”。这种矛盾最后是通过把国家划分为大贵族管辖区和沙皇直辖区，以及对一部分大贵族进行屠杀解决的。但这也导致了“混乱时期”的开始，即国家的瓦解。

这种类比恰当吗？十分恰当。因为不管是斯大林还是伊万雷帝都决定用自己人来替换掉原有的上层统治集团(同时他们的反对者也想撤掉他们)。一切都是按照用反精英(即第二梯队的人)代替政治精英的帕累托法则在进行。斯大林在精神上也属于这个第二梯队的人。(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早在十月革命前向列宁提出的关于把党的活动中心从国外移到国内的建议。)

现在，政治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几万人涉及其中。他们是否有罪，不是在公平的原则下来衡量的，而是按照“是不是自己人”的原则来确定的。

## 第三章

# 作为主宰者的斯大林

---

作为主宰者的斯大林、整个文化的总导演、苏联国内反对派的境况、国内不应有“影子领袖”

---

那一年发生在斯大林身上的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能够证明我们将其与伊万雷帝作类比是不无道理的。1935年4月22日晚，斯大林前妻的亲戚到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住所来诉苦。这一天正好是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的保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贝奇科娃的生日。斯维特兰娜特别依恋贝奇科娃，并留下了许多关于这位保姆的美好诚挚的回忆。其实质在于，在斯大林前妻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去世后，这位保姆便成了“不可动摇的、永久的家庭支柱”。

因此在这位保姆过生日这天有许多人前来祝寿便不足为奇，到场的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

4月22日也是斯大林集团完成新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日子。这也是晚会热情洋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玛丽娅·斯瓦尼泽证实：“开饭了，我们聚在一起，非常热烈地交谈着。约瑟夫情绪很好，给斯维特兰娜弄了点吃的，接着就打开了‘阿布劳酒’，并开始祝酒。我们谈到了地铁，斯维特兰娜想去地铁兜兜风，我们，我、热尼亚、斯维特兰娜、保姆就说好要一起去。Л. М. (卡冈诺维奇)为我们订好了10张地铁票，并指派自己的下属官员护送我们，好让大家放心。半小时后，我们去穿衣服，但突然间忙乱了起来——约瑟夫



也决定要去逛一逛，于是就叫来了莫洛托夫同志，当我们坐上汽车时，莫洛托夫赶来了。所有的人都异常激动，并小声谈论着这次地铁之行毫无准备，可能有危险。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比任何人都担心，脸色煞白，并小声告诉我们，如果他知道会是这样，他是不愿意为我们组织这次出行的。”（《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第173—174页）

地铁之行的危险何在？问题就在于，一方面，“克里姆林宫案”和“线团案”正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地下活动交织在一起，卡冈诺维奇的脸色煞白恰恰说明了此事的严重性；另一方面，这是斯大林对这些恐惧的挑战，以及他要参加爱女生日庆祝的愿望。这样他就有机会在出行中直接显示，他是正确的，并证实人民在发生变化。

卡冈诺维奇试图将出行时间推迟到午夜，那时地铁就对公众关闭了，但斯大林坚持立刻出发。他们从克里姆林宫驱车来到克里米亚广场（“文化公园”地铁站），然后乘电梯到了下面，并在站台上等候。他们等了有20分钟，因为列车还处在试运行阶段，中间间隔时间较长。斯大林的出现引起了地铁管理人员的极大震惊，警卫人员也赶了过来，试图清空隔壁站台上的人群。公众已经认出了领袖，并开始大声欢呼致意。

M. 斯瓦尼泽写道：“约瑟夫开始表现出有些不安。”他明白，他企图不被人关注地乘地铁逛一逛的想法破灭了。这时开来了一列满载乘客的列车，就在警卫人员清空第一节车厢的同时，人们高呼着“乌拉”，并挥手致意。列车终于开动了，他们在第二站“猎围站”下了车，参观了类似古希腊神庙的奢华的大理石车站，也参观了电梯。人群的欢呼声更加激昂了。M. 斯瓦尼泽写道：“我们大家被人群冲开了，我差点被憋死在一个圆柱旁。喜悦和欢呼的程度超过了所有人为组织的程度。正在此时警察和警卫已经赶了过来。”从她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的确很危险：“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渴望着能平安到家就行。而瓦夏比任何人都着急。”这个14岁的少年比成年人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在人流面前的无能为力。

而斯大林如何呢？“约瑟夫显得很愉快，向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位地铁建设的负责人询问着各种情况，并不时地就地铁延误发车和未完全掌握运行技术这两个问题开些玩笑。”不仅如此，在下一站他再次下了车，然后一直坐到索科利尼基地地铁站后又坐了回来，虽然索科利尼基地地铁站上面已经安排好车辆在等着大家。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广场那一站上到地面，汽车还没有来得及赶到那里，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大家成群结队地一起沿着阿尔巴特街步行。这时从专门车库调来的第一辆车开到了这里（准确地说，这辆车是从空旷的马路上拦下来的）。斯大林让妇女和孩子们先上了车。

如果不算瓦西里回家后的号啕大哭的话，一切算是顺利结束。女人们为了压惊，

喝了点缣草酊。她们谈论着所看到的一切，久久不能入睡。

M. 斯瓦尼泽兴奋地结束了记述：“地铁，准确地说是地铁站令人惊叹的装饰和美丽，让你不禁会对创造出这一切的青年们的毅力和热忱，对能够激起大众如此振奋的领导人产生敬佩。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建成的，却有着这样精美的装潢和外观。”（《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第 175 页）

斯大林小姨子的日记给历史留下了独一无二又极其私密的证明，这可以视为斯大林宪法改革的背景。

在看到偶遇的莫斯科民众的反应之后，斯大林坚定了一种日后再也不会放弃的思想：人民需要沙皇。但“需要沙皇”是一回事，而斯大林是否感觉到自己就是沙皇则是另一回事儿。

在对军校毕业生发表过讲话之后，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回答了这一问题。那次谈论新干部问题的讲话是在乘过地铁后不久的 5 月 4 日发表的，它在意义上可与新宪法工作、相信群众和地铁开通庆典相提并论。

在这之后，斯大林在家里承认，讲话时他忘了补充一点：“我们的领袖在掌权之前是没有田地的平民，最终还将是这样的人；推动他们的只是理想，而不是贪婪。”M. 斯瓦尼泽在引用斯大林的这些话时补充道：“当然，正是这种纯洁思想的魅力，使我们的领袖们成为广大群众爱戴和敬重的人；况且，和从前不一样，现在没有阶级的差异了，这也使他们自己‘与人民骨肉相连’。”

法国大革命的领袖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被人称为是“不可腐蚀者”。他说过的一番话也适用于我们的主人公：“他们称我是暴君。如果我真是暴君，那么他们会对我卑躬屈膝，我会把金子撒给他们，我会保证他们享有从事各种犯罪的权力，他们会对我感恩戴德！”（曼弗雷德 A.，《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幅肖像画》，莫斯科，1978 年，第 402 页）

想必斯大林是会认同这些话的。

但为什么那时的罗伯斯庇尔在今天会成为悲剧英雄，而斯大林却成了暴君？这已经不是历史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了。

也许，对于当代俄罗斯和世界政治来说，斯大林太过极权、伟大和恐怖，所以当他的经验被载入史册时，就不可能不令某些人心神不宁。正是斯大林，随后是罗斯福和毛泽东确定了 20 世纪的面貌。没有斯大林的实践，也就没有罗斯福的成就和毛泽东的胜利。但这是另外的话题，我们以后还会讨论这一话题。

1935 年 7 月，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举行了运动员检阅式，此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苏维埃国家朝气蓬勃、精神振奋的形象。当然，这是激情澎湃的，就像那时所有的群众性宣传那样。但是，自从 1934 年 4 月，当飞机把被困在楚科奇海岸附近冰冻海域中的“切柳斯金号”船员救出来之后，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了一种苏联这个国家是无所不能



的感觉。这可以被称之为“时代精神”，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无所不能首先体现在斯大林身上。

总的来说，1935年夏天取得了许多成就：建起了粮食储备（因此当一年后遇到歉收时，人们得以避免了饥荒这一俄国农村常有的灾难）、发展了轻工业、增加了经济投资，新企业也开始了运转。

结果，斯大林的方针不仅在与克里姆林宫反对派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也在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日常生活中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和依靠广大群众的做法使斯大林成了真正的苏维埃“沙皇”。

斯大林感到自己是统治者的意识是逐步形成的。这首先表现在对民众处世之道的总体认知上，其次是在时局的影响下逐步完全接受了这一重负（这里值得提一下，最终这种意识压垮了斯大林本人及他的子女）。不管怎么说，他曾专门向政治局提出了反对大规模庆祝自己55岁生日的意见。他还把自己的名字从在革命题材的话剧和电影剧本的评选中必须宣传的十月革命英雄的名单中删掉了。

米高扬在斯大林去世后所著的竭力为自己辩护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除了卡冈诺维奇，谁都没有刻意歌颂斯大林。有一天，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抱怨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您对我尽是溢美之词，就像所有这一切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习气，社会革命党人才会过分强调领袖的作用。”

米高扬认为，当时斯大林言不由衷。但他解释了为什么自己也加入到颂扬的队伍中：如果不称颂斯大林，就会被认为好像你反对他，甚至是在反对党。

实际上，斯大林集团是在有意识地巩固自己领袖的权威，这也符合集团每一位成员的利益。当然，心理上的一些细微差别是存在的，如同加强自己威望的斗争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有理由担心斯大林会做出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决定，要知道斯大林政策的任何改变都有可能触及每个人。

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接受美国记者罗易·霍华德的采访时说：“苏联实行的全民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度将成为居民手中用来反对不好好工作的权力机关的马鞭。”

很难说米高扬及其同僚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的是什麼，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的确，斯大林不会如此头脑简单地接受所有的荣耀。例如，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他坚决拒绝接受苏联英雄勋章。他说，英雄称号应授予那些有个人英勇行为的人，“而自己并没有做出这种英勇行为”。斯大林还后悔自己听从了劝告，同意接受了大元帅的称号。

莫洛托夫的解释说明，这些事情与谦虚无关：“全党，全体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仅仅是个大元帅。这是在贬低，而非抬高！他远比这要高得多！大元帅只是军事领域的专家。而他却是军事领域、党的领域和国际领域的专家。曾两次试图



授予他这一称号。第一次尝试被他驳回了，第二次同意了，却因此感到后悔。”（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 253 页）

莫洛托夫的另一个评价有助于我们对局势的判断：“斯大林有很大的作用，非同寻常的作用。他领导着一切，是领袖。起初，他还与对自己的崇拜作过斗争，而后来有些喜欢上了……”换言之，斯大林逐渐接受了符合他地位的游戏规则。他的同僚们很高兴让他挂满勋章，从而拉近与自己的距离，但对他来说，真正的价值却在另一个层面。奖章是由他来颁发的，而能够给他授勋的也许只有上帝了。

1936 年 6 月 1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新宪法草案。一天后，草案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并开始了广泛的讨论。

尤里·茹科夫注意到，普通公民的反响被登载了出来，但却几乎没有见到任何出自党的领导人的建议。而第一份见诸报端的这样的材料是斯大林格勒州委书记 И. М. 瓦列伊基斯写的。他说出了党内精英的忧虑：“毫无疑问，苏联政权的所有仇敌都将尝试利用新宪法达到自己的反革命目的；首先会这样做的就是被粉碎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的成员。”（引自：茹科夫 Ю.，《另一个斯大林》，第 237 页）

只有新宪法不能通过，才能说明瓦列伊基斯的几乎所有的同僚们保持一致沉默的原因。往好处说，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往坏处说，他们在抵制讨论。

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集团决定继续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镇压。

6 月 19 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可以被指控犯有筹划恐怖活动罪的 82 人的名单，并建议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件进行审理。

老一代党的领导层所代表的圣彼得堡政治传统，理应带有象征意义地从苏维埃的精神世界中消除掉。这种矛盾可以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教会分裂相提并论。当时的教会分裂虽然巩固了国家，却对民众心理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很明显，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领导层——一个合法的和一个非法的。

斯大林集团认为，两个中心是现实存在的。

毫无疑问，两个中心的现象在上千年的俄国历史中一直存在，这个历史不久前还不知道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是何许人。而斯大林本人也具有两重性：他既想依靠帝国的国家传统，同时又将人们从彼得一世前的文化之中拉了出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体现高层情绪的文化氛围是敌视斯大林的。

这一情况突出表现在因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而引起的斯大林与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冲突上。

这部根据尼古拉·列斯科夫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情节是这样的：商人之妻叶卡捷琳娜·伊斯梅洛娃在自己不爱的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爱上了工人谢尔盖。公公跟



踪了这对情人,但被叶卡捷琳娜用老鼠药毒死了。这对情人还杀死了返回来的叶卡捷琳娜的丈夫,并将尸体藏在地窖里。尸体偶然被人发现了,于是叶卡捷琳娜和谢尔盖的婚宴变成了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谢尔盖对叶卡捷琳娜逐渐冷淡,爱上了新情人——快乐的女苦役犯索涅特卡。激动的叶卡捷琳娜拉着情敌一起从悬崖跳入湖中,并双双身亡。

正如“肖斯塔科维奇与斯大林”课题的研究者所罗门·沃尔科夫所说,歌剧配乐中散发出“炽热的情欲”。“(俄罗斯由来已久的固有文化在表现爱情的性方面向来比较拘谨,在这一背景之下,这种炽热的情欲就显得尤为突出。”——沃尔科夫 C.，《肖斯塔科维奇与斯大林:艺术家与沙皇》，莫斯科,2004年,第237页)

斯大林甚至不能忍受在艺术中对赤裸裸性交的隐射描写。况且,按谢尔盖·爱森斯坦的话来说,“在音乐中‘动物性的’爱情线条表现得极为突出”。而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甚至从中听到了“性欲的高潮”。

但是,该剧1934年1月在列宁格勒的小歌剧院和莫斯科的音乐剧院同时上演,并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一年的时间里,该剧在列宁格勒公演50多场,还在英国、美国、瑞士和瑞典演出过。

1936年1月26日,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日丹诺夫到大剧院的分院来听《麦克白夫人》这部歌剧。

斯大林喜爱戏剧和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提高从农村招募而来的人们的文化素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过对文化和语言问题的思考,斯大林提出了“简易性和人民性”的公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教育大臣C.乌瓦罗夫伯爵的理念(东正教、君主专制和人民性)。

毫无争议,肖斯塔科维奇是接近左派艺术的先锋派艺术家。这在革命后的国家中很自然,因为革命传统在艺术中得到了延续。但这种艺术能够给千百万大众带来什么呢?

在说到斯大林去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时,需要提到一个重要的情况,这就是政府制定了巩固家庭的方针。在20世纪20年代,家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机构”,是父权社会和奴役妇女的象征,也几乎是反革命的象征。那个时候人们可以不进行婚姻登记,男女倘若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便被认为组成了一个家庭。而在这种结合中生下的孩子享有一切法定子女所拥有的法律权利。离婚只需要一方发出口头通知即可,堕胎也是被允许的。

但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斯大林明白,“自由恋爱”破坏了国家的社会稳定:沦为孤儿的孩子在吃苦受罪、出生率在下降、人们的责任感在下降。当局采用了新的婚姻法并禁止堕胎,期望传统家庭观念的回归。

忠于祖国的英雄、和睦的家庭、自我牺牲的爱和义务,这些形象在文学和艺术中

得到了提倡,并很快成为文艺创作的主题。

斯大林作为这些普通人的领袖和正在快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领导者,不能不掌控教育的进程,因为他明白,发展的资源就蕴藏于这种教育之中。

这部激情四射、但“资产阶级”的歌剧,让苏联的总导演深感失望。这不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失败,而是斯大林所审定的苏维埃文化大教科书中令人不愉快、甚至是有害的一页。

来自克里姆林宫的观众没有鼓掌就离开了剧院。1936年1月28日,《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社论《混乱代替了音乐》。确实无人知道这是谁执笔的,多半有两个作者:斯大林和日丹诺夫。

以下就是该社论的主要结论:

“从一开始,歌剧中那种故意的杂乱无章的声音就让听众愣住了。旋律的片断、乐句的开端时隐时现,然后消失在轰隆声、吱呀声和尖叫声中。欣赏这样的‘音乐’很难,要记住它是不可能的……音乐或发出咯吱声,或发出轰隆声,或发出扑哧声,或气喘吁吁,以便尽量自然地营造出色情场面。‘爱情’在整部歌剧中都是以一种最粗俗的形式来勾画的……一个女强盗、商人之妻,通过谋杀攫取了财富和权力,却被描写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某种‘牺牲品’。列斯科夫取材于日常生活的这篇小说,被强加了一种它本身并没有的含义……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音乐与经典音乐毫无相似之处,也与交响乐、普通大众音乐语言毫无共同之处……这是用左倾的混乱来代替自然的人性的音乐。”(沃尔科夫 C,《肖斯塔科维奇与斯大林:艺术家与沙皇》,第 254—256 页)

很快,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反对形式主义的文章。谁是幕后主使自然一清二楚。

但这与政治进程有什么关系?斯大林主张的是“人民的文化”,而这里也就反映出了他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政治路线。

不过,如果在权力斗争中粉碎和消灭主要的反对者是有序进行的,那么尽管在作家协会之后又成立了许多文艺创作协会,但要使文化领域里的反对者俯首称臣依旧困难重重。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秘密政工局关于对《混乱代替了音乐》一文反响情况的调查文件中谈到,大多数文化界人士是“正面”对待这篇文章的,但同时也援引了“个别作家和作曲家的反面的和反苏的言论”。

尤里·奥廖沙这样发表了意见:“如果这是新的方针,那么它不会产生任何结果,除了会使这篇文章的作者们自毁声誉之外。”

伊萨克·巴别尔说:“不要为一点小事而弄得沸沸扬扬。要知道谁都没把这当回事。人们不吭声,但心里却在窃笑。”

阿布拉姆·列日涅夫说:“任何独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独裁者会为所欲为。我们



就像堂·吉河德一样，一直在憧憬，而现实却向我们揭示了真相。我认为，肖斯塔科维奇的遭遇与德国的焚书事件是同一性质的事件。”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说：“我们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构建都具有偶然性，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比如《真理报》上发表的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麦克白夫人》的评论文章，要知道该剧已经上演了一年多，所有人都在盛赞它，但突然间出现了这种匿名的斥责。很清楚，某个位高权重的人偶然走进了剧院，听了一下，没能理解音乐中的任何东西，便开始大骂一通。”

还有其他一些含有大量对斯大林不点名批评的评论。这些反应表明，创作群体对我们主人公想要达到的“为人民谱曲”的宗旨并不热衷。真的，指责他对文化一窍不通是不公平的。但作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指责斯大林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格格不入。

的确，在驳斥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反对者时，斯大林采用了更加细致的方法。他明白，要是不这样的话，就可能剩不下什么文化活动家了。由此采取了大范围的奖励和惩罚，因此有许多作者塑造了无所不能、坦率对话的领袖形象。所以，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等众多作家都想与斯大林进行对话，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当局向作者们提示了政府需要的艺术方向。艺术委员会主席 И. М. 克尔任采夫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1936年5月19日)谈到，计划把俄罗斯博物馆和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展品中“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取下来。克尔任采夫写道：“许多似乎是描绘苏维埃人民的作品水平之低让人不能容忍，尤其是在与 И. 列宾的卓越展品放在一起就更加突出。这种‘绘画’自然会引起工人参观者的强烈反应。”(《政权和文艺界知识分子》，第309页)

这样，“俄罗斯先锋派”就进了储藏室，而“俄罗斯现实主义”则得到了大力的支持。

克尔任采夫援引了工人们的意见，这是当时政治语言的一个要素。而实际上，由此成立了有伟大的“苏维埃好莱坞”之称的国家文化艺术管理局，而它确实成了一个对居民特别是对青年非常有效的教育者。

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出席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归来后所写的日记(1936年4月22日)就很有代表性，它说明了很多问题：

在昨天的代表大会上，我坐在第六或是第七排。我一回头，看到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便走上去，拉他坐到了前排(我座位旁边还有一个空位子)。突然，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和斯大林出现了！大厅里像是发生了巨变！他站着，有些疲劳，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很庄严。可以感受到一种对权力的强烈依附，这是一种力量，同时也是某种女性的、温柔的东西。我

环顾四周，所有人都带着迷恋、温柔、崇拜和微笑的神情。能见到他，只是看一眼，对我们大家就是一种幸福。杰姆琴科不时跟他说上几句话。而我们大家都在嫉妒和羡慕她，她是多幸运呀！他的每个手势都受到景仰。我甚至从不认为自己会产生这种感觉。当人们向他鼓掌时，他掏出怀表（银质的），并向观众报以迷人的微笑。我们就开始窃窃私语。散场后，已走到存衣室旁边时，人们再次想起了那块表：“表，表，他掏出了表。”

帕斯捷尔纳克一直用兴高采烈的言辞向我低声谈论着他，而我也对他说着，这时我们异口同声说道：“哎，这个杰姆琴科挡住了他！”（有一分钟时间）。

我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走回了家，两人陶醉在喜悦之中……（丘科夫斯基 K.，《1930 年至 1969 年的日记》，莫斯科，1994 年，第 141 页）

但那些不想或是不能在这个“美好的森林”（英文“好莱坞”一词的翻译）中工作的人大概只能责备自己了。

后来，当党的控制放松了，再到后来，在领袖去世后甚至取消了这种控制的时候，正是这些不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者与变节分子一起组成了破坏斯大林体系的突击队。也许，当我们的主人公从冥冥中看到他们的时候，会后悔没有能够改造好他们。不过，客观地说，甚至连他也不具备完全控制创作个体的手段。

不过，斯大林还是“改造”了肖斯塔科维奇。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迎宾计划》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歌曲《清晨用凉爽问候我们》，并为电影《攻克柏林》配了乐，还因此获得了斯大林奖。他还为苏联国歌谱了曲，虽然曲子得到了领袖的赏识，但领袖还是选择了另一位作曲家亚历山德罗夫的作品。

即便如此，肖斯塔科维奇从内心深处还是憎恨斯大林的，这一点有他的回忆录可以作证。

有时候，斯大林感觉有必要对神秘的创作过程进行干预，便指示应该怎么修改电影剧本和剧本。可能，那时候他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写过诗歌的情景吧。

各种不同事件交织在一起，如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执行新的文化政策、通过新的家庭法和与法国签订互助条约等，构成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建设的全景图。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启动的对新的反苏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案件的调查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独立的画面。

1936 年 6 月 29 日，斯大林集团以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批准了给地方党组织的一封信。信中宣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高尔基市、巴库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恐怖集团被揭发了出来。而领导这个恐怖联盟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И. Н. 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И. П. 巴卡耶夫、Г. Е. 叶夫多基莫夫、



B. A. 捷尔-瓦加尼扬。这个联盟的主要目标被确定为“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同时对一系列党的领导人进行谋杀，在乌克兰瓦解联共(布)的队伍，从而引发全国的恐慌，并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得以掌权”。

这个联盟的所有领导人早被抓起来了，因此信中说，托洛茨基亲自掌握着实施恐怖活动的领导权。中央委员会呼吁所有共产党员与党“最凶恶的敌人”作斗争，并要提高警惕性。

尤里·茹科夫认为，这样一来，斯大林集团获得了恐吓所有地方党的领导人的口实，一旦他们偏离了斯大林集团制订的方针，他们就可能被划入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帮凶之列。

当我们回顾一下上一阶段以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为结局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就能更准确地理解茹科夫做出的结论。去影响摇摆不定的地方干部和民族干部未必是新一轮审查的主要目的。茹科夫所说的威吓多半发生在 1936 年的枪决之后，反对恐怖联盟的诉讼程序本身首先向全世界表明，苏联没有也不可能有反对派、“影子政府”和“影子领袖”。

斯大林只是把从基洛夫遇害和“克里姆林宫案”之后开始的行动进行到底。正因为如此，才通过了最大限度地公开诉讼程序和邀请外国记者的决定。欧洲理应成为这个过程的主要观众，并得出斯大林的敌人一无是处的结论。

只能从第二梯队中去考察谁是“自己人”。考察他们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1936 年 6 月 18 日，高尔基去世了。他就像当时所写的那样，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为布尔什维克党做了很多事情。但在他心灵深处始终保持着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站立起来的平民罗斯吓住了他，但他并不认同无产阶级革命。1918 年 3 月 22 日，在其主编的《新生活报》上他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是民族的灾难，因为它有在其激起的粗暴冲突的混乱中摧毁俄国文化幼芽的危险。”1921 年至 1933 年，高尔基侨居国外，但经常回苏联来，并希望保持自己的斯大林贤明顾问的角色。有关斯大林他写道：“组织有素的支配力、伟大理论家的敏锐的智慧、才华横溢的主宰者的勇敢、对人们复杂品格明察秋毫的真正革命家的直觉，在具备了以上这些优秀的品质之后，斯大林毫不留情地与那些妨碍他第一个发展到极限高度的人进行着斗争……”但斯大林需要的是作为一个象征的高尔基，而不是精神导师。所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只能被迫妥协。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高尔基只好满足于自己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况且，国家现代化符合他觉得有必要对他不喜欢的传统俄罗斯进行彻底改造的认知。

高尔基去世后，斯大林失去了与十月革命前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丝精神联系。十月革命前，斯大林还只是第二梯队的一名党务工作者。从此以后，那批人中只剩下我



们主人公一个人了。

可以说,高尔基的离去不仅是因为他身患疾病,还因为他确信,俄罗斯的自发力量最终将屈服于领袖的钢铁意志和强力手腕。

但这并不是我们要讲的关于高尔基的所有内容。他的命运对理解俄罗斯历史具有典型意义,他代表着一种类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在自身的发展中(“对国家的非宗教叛逆”)经历了下列几个阶段:自我完善、从自由主义立场批评国家秩序、支持革命党和在道义上认同恐怖活动、不愿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方式、在现代化和文化建设方面与斯大林体制进行合作(有保留的)。这是“高尔基”型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以自己的突变让人感到惊讶无比。但以后这类知识分子还将发生更为急剧的蜕变,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孙辈和曾孙辈将拒绝同苏维埃国家合作,并与俄罗斯本土的反国家自发力量的继承者们一起摧毁这个国家。斯托雷平没等到“二十年的稳定”,苏联后期的领导人同样也没有等到这样的二三十年以便平息社会内部的矛盾。

高尔基受到了国葬的礼仪。他变成了宣传机器没有生命的尊神,他的悲剧超出了人们的日常认知。

## 第四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场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场会战、奥尔忠尼启则的问题、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失势、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斯大林与普希金、布哈林被捕、必选其一的选举

在欧洲所发生的事件让人不得不去寻找摆脱新威胁的出路。斯大林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巩固经济，武装好军队，就被迫寻找通向新的盟友和重新调整共产国际的政策。显然，战争在欧洲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整个世界也危机四伏。

1936年1月15日，日本因自己的要求未得到满足而退出由美英法共同参加的海军代表会议。

2月16日，在共产国际活跃的西班牙，共产党和亲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等左翼党派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

3月7日，德国军队未经宣告就进入了莱茵河地区。而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莱茵河地区属于非军事地带，且处于同盟国的军事控制之下。利益第一个受到损害的法国并未下定决心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宣布支持法国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两个国家，英国则保持了沉默。众所周知，德国军事领导层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力求说服希特勒不要迈出这极为冒险的一步，但希特勒强迫他们把35000人的集团军开入这个工业区，并占领那里所有的主要城市。希特勒在德国的威信随之顷刻间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年前，即1935年5月21日，德国国防军更名为德国武装

力量,开始直属于元首指挥;从此时开始,军人不是向国家宣誓效忠,而是向希特勒宣誓。德国的军事工业也开始公开生产作战装备)。

5月2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注)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从国内出逃,意大利军队借机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

6月3日,人民阵线在法国议会选举中获胜。

7月12日,西班牙右翼(君主主义者)领袖卡尔沃·索特罗遇害身亡。7月17日,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起义。7月19日,由佛朗哥将军指挥的军队被从北非(西班牙属地摩洛哥)调回加的斯。

到1936年年中,欧洲很少有人还会怀疑,凡尔赛体系已经无法阻止世界即将被重新瓜分。西方政治家的时钟开始倒计时了:德国刚在与法国的边境上建立好防线,保障了自己“正门”的防守(温斯顿·丘吉尔语),就开始通过自己其他的“门”向南部和东部推进。

斯大林最难的一盘棋开始了,他的对手几乎是所有的世界强国。但为了联合起来一起反对苏联,这些国家就需要互相协调自己的利益,并结成一个防御联盟。斯大林正是寄希望从这一点上去离间他们,使之削弱,然后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条件。这看上去与关注着欧洲和太平洋冲突并打算从中获利的美国如出一辙。因此,如果有谁急于指责斯大林厚颜无耻和居心险恶,那么他们应该环顾一下其他各国的领袖:他们所有的人都一样。

还在阿比西尼亚冲突爆发初期,斯大林在写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信中(1935年9月2日)强调了欧洲各国之间“打架”的意义:打得越厉害,“就越有利于苏联”。他进一步说明:“我们可以出售粮食给这一方,也给另一方,好让他们能够打起来。假使他们中的一方打败了另一方,那对我们完全没什么好处。对我们有利的是,他们之间打斗的时间尽量长一些,且无法很快分出胜负。”(《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年—1936年)》,第545页)

您回想一下布利特写给罗斯福的信,实质是一样的。

很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4月,斯大林争取与法国签订互助条约时,就警告过苏联的谈判代表不要对法国做出让步:“我们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么弱。”(《俄共(布)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欧洲:“特别卷宗”中的决议(1923—1939年)》,第325页)

《特别卷宗》中的机密材料证明,斯大林对欧洲采取了深思熟虑的步骤。现在与1923年时完全不一样了,当年托洛茨基曾力主武装入侵德国。

佛朗哥将军的叛乱和西班牙爆发的国内战争突然扭转了棋局的态势:稳扎稳打的步骤变成了一组险棋。

正是西班牙的国内战争很快影响了斯大林对苏联元帅们的态度。此时的西班牙



如同 1917 年的俄国那样,80%的人口都是农民,而军队已经有过几次立宪政变的经验。这个有着辉煌过去的国家在其他方面也与俄罗斯极为相似: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上的财政工业圈子对跨国公司持抵触情绪、发达的沿海省份比斯开省和加泰罗尼亚省等与内陆省份卡斯蒂利亚之间民族矛盾重重。

1931 年,西班牙反对派共和党和社会党在市政选举中获胜,自发游行示威和混乱无序就此开始,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离开西班牙。西班牙宣布成为共和国。在议会的紧急选举中,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在通过的宪法中具有明显的魏玛共和国思想和 1918 年苏俄宪法的影子。土地改革、普选权、政教分离,以及劳动、受教育、社会救助、尊严生活、罢工、自由离婚的权利等,所有这些都写在宪法之中。尽管西班牙的这部基本法有其诸多的先进性,但它完全负面地评价了民族的过去、传统的道德和教会。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同样像发生在俄国的那样:军队和军官饱受侮辱、地主庄园被破坏、土地改革被匆匆推出、教堂遭到摧毁、修女变成“革命的新娘”(被强奸)。

结果在 1936 年春天,也就是在后来取得了议会选举胜利的人民阵线尚未成立之前,西班牙国内经历了几场有军人参加的血腥的大动荡(3 个月后人民阵线在法国议会选举中也获得了胜利)。

从 1923 年起,西班牙进入共产国际的视线之内。那时在西班牙势力比较强大的是高度推崇巴枯宁和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工会组织、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共产党员人数很少,但他们很有组织性。1936 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莫斯科来到西班牙,他们分别是阿根廷人维托里奥·科多维拉,意大利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匈牙利人乔治·格列。得益于他们的工作,共产党在西班牙活跃了起来,并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斯大林并不希望社会主义革命在西班牙发生,因为这将立即使整个西方转而对付苏联。总体上,我们的主人公把西班牙的事情看成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扰,它使欧洲的整体局势严峻起来。

这种预感没有欺骗他。在进行了充满英雄主义的顽强斗争、敏锐的特别行动和浪漫主义的自我牺牲之后,苏联于 1939 年从西班牙撤出,这引起了潜在的反德盟友英法的极大不满。

另一方面,斯大林是否能撤下共和政体的西班牙不管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无法在苏联共产党人面前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样,斯大林集团会落入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中而成为少数派。

但是,即使是从没有共同的边界和海路遥远这个角度来说,要直接去干涉比利牛斯半岛上这个国家的国内战争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红色工会国际于 1936 年 7 月 26 日在布拉格的决定,开始成立国际志愿者纵队。

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站在叛乱者一边的是几乎整个军队（陆军占80%），民防队、空军和海军，一共有20多万人；而站在共和党人一边的只有2.5万人。

此外，战斗双方依靠的是自己政党的拥护者。

战斗一开始就极其残酷，不留俘虏，伤员也被用刺刀和枪托打死。这就是7月19日在共和党人强攻下拉蒙塔尼亚的叛乱者的兵营之后，整个马德里所看到的情景。

也许，斯大林能做的只局限于派遣国际纵队了，但交战的双方都在求援。共和党人向法国莱昂·勃鲁姆新政府求援（人民阵线），而佛朗哥分子则是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援。从7月28日到8月1日，为了向宗主国运送叛乱分子，共有20架“容克-52”运输机降落到了位于得土安的摩洛哥机场。7月30日，12架意大利“萨伏亚-81”轰炸机从撒丁岛飞往西班牙的殖民地摩洛哥，但其中一架因发动机故障迫降于阿尔及利亚。这样全世界都获悉西班牙国内事务遭到了干涉。

法国立即做出了反应。8月2日，法国政府向欧洲有关国家和美国提出了签订不干涉西班牙内务协议的建议。苏联接受了这项建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充分体现了当时斯大林对此的态度：“不要抢先跑在前面，不要脱离民主制度的立场，不要超出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框架。”（《共产国际与西班牙内战文献汇编》，编者：С. П. 波扎尔斯卡娅、А. И. 萨普林，莫斯科，2001年，第113页）

8月18日，斯大林发电报给卡冈诺维奇和丘巴尔，指示他们立刻“以最优惠的条件”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出售石油和食品。此时斯大林已经获悉，托洛茨基预测法国将发生革命事件，工人阶级将遭到挫败，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归托洛茨基分子所有。如果托洛茨基的预言得以实现，那么斯大林的整个对欧政策将是一个不体面的结局。届时全欧洲将被迫同意与德国一起反对苏联，而斯大林将与西方联合战线发生冲突。

托洛茨基这个人物很危险，因为他身上凝聚了许多欧洲和苏联共产党人在法国和西班牙继续发展世界革命的希望。

那么斯大林还能做什么呢？

他还能做的就是，像在中国某个时期一样，在战术上的盟友、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屋檐下”开展非常巧妙的工作。此外，德国和意大利逐渐加强的武装干涉出乎意料地给了斯大林将这些国家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机会，苏联可以借助西班牙人的手进行作战。

此时，苏联国内反对派的处境变得不妙了。公开的诉讼程序证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是对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苏联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的支持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就是“盖世太保的间谍”。

斯大林不断收到有关莫斯科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的消息。他对此非常关注，以



至于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就坐在工会大厦里的屏风后面，并监视着对被告人的审讯。当然，他是在监视着，不过人却在索契。

8月19日，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通报说，所有的被告人承认自己犯下了恐怖活动的罪行和得到过托洛茨基的指示。这些供词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震惊”。

8月20日，斯大林收到一封信。信中说，被告人称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是自己的同谋者，而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是他们“预备中心”的组织者。

8月21日，中央的报纸上刊登前反对派分子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文章。文章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要求对他们进行枪决。

就在这一天，托姆斯基开枪自杀。而在前一天，在国家联合出版社召开的会议上，托姆斯基承认他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见过几次面，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向斯大林通报其自杀事件时，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明确指出：“我们毫不怀疑，托姆斯基如同洛米纳泽一样，知道现在已经无法掩盖自己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就决定通过自杀来销赃灭迹。”

8月22日，斯大林拿到了判决书的草稿，并对此进行了修改。他特别强调，判决书里一定要提到，托洛茨基和谢多夫（托洛茨基的儿子）必将受到审判。他还指出，不需要写上“此乃最终判决，不得上诉”。斯大林解释说：“这些话是多余的，会让人产生不好的印象。上诉是不允许的，但把这一点写在判决书上是不明智的。”

为什么是“不明智的”？这里好像有什么没有说完。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不想让这些被判有罪的人受到枪决，因为他们还可以充当其他案件的证人；而亚戈达却立即对他们执行了判决，因为除掉自己过去的战友符合亚戈达的利益（让我们回想一下布哈林和加米涅夫那场有争议的会面）。

但是，从往来的公文来看，夜间执行枪决的决定是政治局做出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关亚戈达的事情了。

也许，斯大林直到最后一刻仍在犹豫不决，但在收到即将执行死刑的密电后，还是保持了沉默。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打击比其他的更为重要。

从斯大林发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中（1936年9月6日）多少能够看出一些情况。在电报中，他对《真理报》上有关法庭诉讼的文章作了评价：

文章中应该说明，反对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柯秀尔和其他人的斗争就是反对苏维埃的斗争、反对集体化的斗争，就是反对工业化的斗争，也是想在苏联的城市和农村恢复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的所有胜利的体现者，是苏联集体化、工业化和文化繁荣的体现者，也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为毁灭资本主



义并取得社会主义最高成就而努力奉献的体现者。

应该说一说，谁在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谁就是在主张毁灭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664—665页）

最近的这些事件表明，斯大林的棋路没有走错。实际上西方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把在西班牙进行的斗争视为一场反法西斯主义的总决战，而从苏联及其领导人身上看到，不管怎样，苏联是有组织的反法西斯力量。诸如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画家亨利·马蒂斯、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等等许多名人，都主张要保卫共和政体的西班牙。

9月6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发去电报，要求他经由墨西哥向西班牙输送50架快速轰炸机和射击武器。

9月14日，在卢比扬卡召开了会议，会上做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动要“配合”西班牙共产党活动的决议，也就是说，苏联特工部门成为武器供应和秘密行动的主要玩家。欧洲在短时间内就组织好了购买并向西班牙发送军事装备和武器的工作。其背景是，也有武器经葡萄牙运给了叛军。

第一艘苏联的船只“共青团员号”于10月12日抵达卡塔赫纳，船上载有50辆BT-6型坦克，还有炮弹、子弹、轻重机枪和药品。到1936年12月份，苏联向西班牙运送了136架飞机、106辆T-26型坦克、30辆装甲车、174门大炮及弹药和零部件等。在西班牙3年内战期间，苏联一共提供了648架飞机、347辆坦克、1186门大炮，而且超过70%的武器都是最新式的。西班牙成了武器的试验场。苏联的技术人员定期通过外交邮件向莫斯科提出自己对各类武器实战运用情况的意见。

与此同时，斯大林精打细算并关心开支。有时历史学家会为此抱怨甚至责怪斯大林，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第一，斯大林没有多余资金；第二，处于偏远地区的西班牙只是斯大林战略上的一个小插曲。

为了购买军事装备，根据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决议，使用了西班牙国家银行的部分“黄金储备”。西班牙人选择苏联为交存国。11月5日，510080公斤黄金运到莫斯科。苏联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以通过出售托管黄金偿还的贷款。该批托管的黄金需有西班牙财政部的允许方可出售（至1938年3月，经西班牙认可共出售了450吨黄金，但在这之后苏联继续在供货，直至1939年）。

共和派一看到苏联的飞机和坦克，苏联的威信就迅速上升，与其他党派的代表相比，西班牙共产党人获得了实际领导人的地位。

确实，变化了的内部力量的平衡很快就导致了共和派内部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在共和派内部，社会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开始反对共产党人，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开始



反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联共(布)不久以前的情形。后来许多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与对抗各方共事的苏联顾问，回国后都遭到了惩罚。但这是后话。

而目前斯大林继续着自己多步骤的游戏，一方面为新宪法的通过做准备，同时又在清洗所有持不同政见者。

这样一来，万能的亚戈达成为新的牺牲品就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事了。

在“反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审判结束后，摆在斯大林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内务人民委员部。亚戈达已经不能留在内务人民委员的领导岗位上了，因为若是没有了叶若夫的紧抓不放，他已经不能进行必要的侦查工作了。

亚戈达的副手阿格拉诺夫在这位人民委员被撤职一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叶若夫向他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称在审查托洛茨基中心案中出现了错误，需要揭露“明显未被揭开的恐怖集团和托洛茨基个人在这起案件中的作用”。

阿格拉诺夫经验丰富，曾主持审理过“彼得格勒武装组织案”。此案使法学家 B. 塔甘采夫教授、诗人 H. 古米廖夫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遭到枪决，当时在古米廖夫那里找到了几把为密谋者准备的左轮手枪。阿格拉诺夫还主持审理过劳动农民党案和工业党案，这两个案件成了 1937—1938 年许多案件的序幕。

阿格拉诺夫最重要的发明是编造案件的场景、摧垮受审人的意志、使他们相互争斗并向公众展示受审人一串完整的“密谋”。这些方法很快被推广，用于许许多多其他案件的审判中。

阿格拉诺夫领导了对“俄罗斯法西斯分子秘密团体案”的审理，并搞出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俄罗斯地下法西斯组织的画面。正是从这件牵涉到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案件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开始执行了与民族知识分子展开斗争的路线。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尼古拉·克柳耶夫、帕维尔·瓦西里耶夫、列昂尼德·马丁诺夫等都是他的“教子”。阿格拉诺夫深深地影响着国家的文化环境，与许多作家和演员(巴别尔、科利佐夫、梅耶霍利德、马雅可夫斯基)相交甚笃。

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在阿格拉诺夫指使下，莉莉娅·布里克给斯大林写了信。在信上，领袖做出了使马雅可夫斯基成了伟大诗人的批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等等)。

这名契卡人员(其残忍可与“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相比)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向斯大林表明必须换掉亚戈达。目前情况下，斯大林是相信阿格拉诺夫的：他的报信人和志愿帮手的网络甚至涵盖了党内的上层精英，因此谁都不会相信，自己不处于监视之中。

这样，阿格拉诺夫向斯大林告发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助手皮达可夫的言论：“我无

法否认斯大林是一个平庸的人，他不是一个人能够担任党的首脑的人。但目前的情势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继续坚决反对斯大林，那么最终我们将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地位：也许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服从卡冈诺维奇之类的人。而我个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意屈从于卡冈诺维奇！”（马卡列维奇 Д.，《政治侦查：历史、命运及不同的版本》，莫斯科，2001年，第145—146页）

1936年9月11日，皮达可夫被党的中央委员会除名并遭到逮捕。由此很快开始了对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案的立案调查（也就是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

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致信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亚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上已经延误了4年时间。所有党务工作者和大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区代表都这么说。可以让阿格拉诺夫留下担任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第682—683页）

亚戈达被提议任命为由李可夫空出来的邮电人民委员一职。很有可能，那时斯大林还没有料到亚戈达将遭到镇压。从他写给亚戈达的便条中可以看出，他对亚戈达并没有什么敌意：“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属于国防性质的人民委员部。我不怀疑，您一定能整顿好这个人民委员部。恳请您同意承担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没有运转良好的邮电人民委员部，我们感觉如同失去了双手。不能让邮电人民委员部停留在它现在的状态。必须立即对它进行整顿。”（同上，第683页）

叶若夫保留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表明党务机关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当然，谁也没有料到，在此之后开始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清洗。数千名昨天还在监控着全国的契卡人员成了这次清洗的受害者。也没有料到，随着契卡干部更换，审讯的方式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后来事情发展到了严刑拷打的地步。如果说在以前的许多年里，反对派分子和党员还被认为是自己人，从未遭到拷打和枪决的话，那么在基洛夫去世后，特别是在1936年8月的审讯之后，这一切就发生了骤变。

如果不去考虑“希特勒的因素”，即不去考虑正在迫近战争因素，那么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这种残酷的不可调和性开始扩散。斯大林的一位战友在耄耋之年把这种情况称为主要的原因：“1937年时我们必须这么做，以便在战争来临时我们这里不会出现第五纵队。要知道，甚至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过并且还存在着这样的人：当一切都好，国家和党没有受到危险威胁的时候，他们是优秀和忠诚的。但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动摇，就会变节。”（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390页）

让我们回到欧洲。1936年10月24日，已在西班牙作战中联合起来的希特勒和



墨索里尼宣布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1月15日,德国外长纽赖特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柏林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一个月时间内,威力不容低估的军事同盟便得以成形。希特勒宣布,现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仅可以战胜俄国,还可以战胜大不列颠王国。

现在可以预测德国今后的行动了:占领奥地利以便与意大利结成共同战线,打通进入地中海的出口,然后围歼被半包围的法国,突破东普鲁士,转向英国……再后呢?

德国空军已经强于英国空军,并且其优势还在不断地加强。1936年秋天,柏林通过了改造国民经济的四年计划,以便在发生战争时能够自给自足。

面对毫无疑问的威胁,巴黎和伦敦怎么也不能确定战略的优先方向,西班牙革命的明显迫近吓坏了他们的政治精英。斯大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希特勒更危险的人物。

11月18日,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承认了佛朗哥政府,这是对他们签订的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议的破坏。对此他们解释这是因为苏联提供了援助,并向共和党人派去了国际纵队。

很快,一支代号为“秃鹰军团”的志愿者航空中队(约300架飞机),以及一支坦克军团从汉堡抵达加的斯。而意大利则派出了5万人的远征军团(德国和意大利提供的总的军事援助大大超过苏联提供的援助)。

斯大林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无论他怎样努力向西方表明自己的计划是有限度的,局势还是骤然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并且已经难以控制了。马德里的人事更换也说明了革命力量在加强。一下子就有4名国家劳动联盟的代表进入了共和政府,而国家劳动联盟是人数最多、最具有战斗力的信奉无政府工团主义路线的组织。整个西班牙都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信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劳动联盟的战斗情绪占了主导地位。

结果,巴黎和伦敦并不认可斯大林集团关于莫斯科无意发动世界革命和不搞共产主义阴谋的表白。这是斯大林的失败。欧洲的敌对态度是无法遏制的。

斯大林能做什么呢?他被迫支援西班牙,放弃西班牙将更加危险。应当打仗了。

而国内则应当将干部调整进行到底,并且将惹是生非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清理干净,这些支持者甚至在西班牙也要破坏他的计划。但清理干净这只是事情的一半,还需要在苏维埃的实践中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机制——自我发展机制。这种机制将如同利益对资产阶级的诱惑那样推动社会前进,这比从克里姆林宫或卢比扬卡发出的威胁要强得多。

但在这个方面,斯大林永远也不会取得成功。

新宪法?反对者似乎捂住了耳朵,甚至同意了自由和不记名的选举。

1936年9月29日,政治局通过了可能与皮达可夫被捕直接相关的决议:

批准下列《关于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的态度》的指令：

a) 直到最后一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仍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坏蛋们视为国际资产阶级的有政治性和组织性的先遣队伍。但最近的事实说明，这些先生堕落得更深，现在不得不把他们视为是欧洲法西斯资产阶级的侦察员、间谍、阴谋破坏者和危害分子。

b) 有鉴于此，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坏蛋们，不仅包括那些根据此案已经结束了审讯的被捕者，也包括像穆拉诺夫、皮达可夫、别洛博罗多夫等案件尚未了结、正在受审的人，还包括那些以前遭到流放的人。（引自：茹科夫 IO.，《另一个斯大林》，第 273 页）

换句话说，左派应该彻底被“清洗干净”。IO. 茹科夫对此解释说，这只是因为执政党渴望除掉本党内“有独立和批评意向的那一部分人”，除掉过去几年在全国的威信有所提高的各种反对派联盟的支持者。

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应该考虑到还有由另一个社会文化核心代表构成的党内大多数对斯大林集团施加的巨大压力。也许，今天已经无法完全体会到当时的这种压力，就像眼光不可能环视火山喷发或风暴突袭一样。

苏联社会的深层状态极不稳定。在薄薄的表层下岩浆还在沸腾。社会变迁颠覆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他们被迫偏离了熟悉和坚固的生存基础，只要国家秩序稍有松动就准备采取剧烈的破坏活动。在“西班牙的镜子”中照出来的就是不久前的俄国的往事，那种“毫无意义和毫不留情的俄国暴乱”。

这种不满，毫无疑问，也存在于许多普通共产党员的队伍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其他居民的生活差别很小。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今天无法分析的那种类似宗教狂热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视持不同政见者为自己的敌人，并准备采取非常措施与他们进行斗争。

也就是说，工农党（平民党）不接受看待未来与自己不一样的异己阶层。时代发生了变化，但这一阶层还是不想要稳定。

国家同样再也不能容忍破坏它稳定的温床的存在。它甚至不需要那种原生态的和具有独立精神的党了。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国家需要的仅是党的那套管理机制。因此新宪法应该授予国家，也就是代表它的集团一整套必要的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党的领导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们感到不安，一些人还感到愤怒。他们有着固定关系（其中形成了小集团）的已习惯了的生活即将结束。这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涉及中央委员会、地方组织和包括国防人民委员部在内的各人民委员部的大部分成员。

从历史层面上，这可以和赫鲁晓夫与上层统治集团的斗争相提并论：由于站在他



身后的其他领导人串通一气，在遵循所有民主程序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被免去了苏联领导人的职务。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斯大林身上，但他多半不会像赫鲁晓夫一样被打发去退休，而是会落得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的下场。

斯大林集团与新反对派开展的无形的斗争，一个惊人征兆就是政治局 10 月 28 日作出的确定十月革命 19 周年庆祝活动口号的决议。这个决议取消了两个口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苏联宪法万岁！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

就如同两股力量迎面相撞，谁也没有获胜。

1936 年 11 月 25 日，讨论和通过新宪法的苏联第八次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在大克里姆林宫殿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开幕了。

通常在这一类活动前会先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并提出相应建议。但是这次政治局决定只在斯大林作过报告之后，即在开幕式的第二天，也就是 11 月 26 日，在主要的事件发生之后再召开中央全会。

事实上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重复了大家熟知的关于国家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观点：剥削不再存在，生产资料、地下资源和土地的全民所有制，建立比无产阶级专政更灵活更有力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接下来所说的内容则涉及了許多人：他坚决否定了禁止居民举行宗教仪式，以及保留“被褫夺公民权者”制度的建议。在解释自己对“被褫夺公民权者”的态度时，斯大林强调说，不劳动的剥削分子被褫夺选举权是一种暂时性的行为，该是重新审视他们地位的时候了。他也不同意对“某些过去的白匪、富农和牧师”钻进高层政权机关持担忧态度。斯大林说，首先，不是他们所有的人都仇视苏维埃政权；其次，如果推选了敌对分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好，因而我们完全应该受到这种羞辱”。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斯大林没有谈及被判有罪或是被逮捕的反对派分子，他明显不愿展开对与该集团进行斗争话题的讨论。

第二天本应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斯大林的报告，但会议并未召开。

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就上演了很独特的戏剧性表演，各种观点毫不掩饰地发生了碰撞。

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党组织的书记们似乎并未理解斯大林的意思，纷纷大声疾呼，要对他提到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孟什维克和白卫军分子进行报复。可以说，他们猛烈抨击并要求肃清在未来的差额选举中哪怕能表现出一丁点危险的所有的人。

但是斯大林集团并没有偏离方向，继续着宪法的讨论。尤其是莫洛托夫的讲话特别有分量。想必在他发言之后，某些人一定感到了手枪对着太阳穴的寒意。

莫洛托夫公布了两个原则性的规定：第一，进入苏维埃的候选人不仅可以由党组



织来推荐,还可以由其他非党组织来推荐;第二,新的体系应该打击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并简化“从先进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挑选出能够取代落后分子和官僚分子的新生力量”的推荐手续。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里的人群是富有经验的。他们明白厄运已经降临,需要赶快考虑如何自卫了。

潜在的论战在继续,不清楚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斯大林集团决定暂停讨论,通过公开表决做出了把宪法草案的讨论交给宪法审定委员会的决定。推荐不经表决地确定了该委员会的名单。其中包括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等。当然,与党政机关的代表相比,他们仍占少数。

此外,斯大林竭力避免在力量对比对他不利的全体会议上展开对宪法的讨论。

在审定委员会会议召开的前夕,即1936年12月2日,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会见了审定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并与他们进行了4小时(!)的交谈。此外,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政治局的所有委员和三位候补委员,以及维辛斯基、李维诺夫、斯捷茨基、塔尔、雅科夫列夫和阿库洛夫。会议没有进行速记记录,但可以想象得到这么长时间谈话的紧张程度。

12月3日宣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于第二天举行。12月4日,全体会议得以召开。会上并未对宪法草案进行宣读,实际上也没有进行讨论。总共只讲了三条空泛的意见。仅有三条!而大厅里却坐了123人。

在这种不痛不痒的讨论之后,担任会议主席的莫洛托夫建议对草案进行表决。于是大家一致举手通过了草案。

12月5日,在全体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代表们通过了新的宪法。隶属斯大林集团的中央委员会书记A. A. 安德烈耶夫担任会议主席。他宣读了草案的整个文本,逐条进行了公开的表决。在主席团的严格监督下,代表们146次友好地举起了自己的红色代表证。

斯大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此后的选举将是普遍、直接、秘密的了,而且所有的人都享有选举权。现在紧接着需要进行其复杂程度不亚于此的行动了:更新地方上党的领导层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只有了解了克里姆林宫领导核心面对这项任务,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12月4日全体会议的日程表上突然加入了叶若夫的《关于托洛茨基派和右倾反苏组织的报告》。似乎,这一题目顺应了提出进一步加强镇压要求的地方领导人的情绪。但这只是浮光掠影的见解。叶若夫演讲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宣布的揭发敌对集团的方法。过去的反对派都曾各个部门和地区工作过,现在他将他们与他们直接在一起的同事及其上下级领导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制造出了一批“特务组织和危害分子组织”。



叶若夫的方法原始却万能,可以到处采用。接着,这位内务人民委员通报了对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索斯诺夫斯基等人的审讯情况,并根据与索柯里尼柯夫对质的情况谴责了出席全体会议的布哈林和李可夫。

谈到此前政治局呼吁镇压“坏蛋们”的夏季决议,叶若夫说出了这么一句威胁性的话:“我觉得这个指令与所有的党组织和所有的党员都有直接关系。”

大家马上就理解了他的言外之意。几乎所有在其之后的发言者都呼吁要毫不留情地镇压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就连布哈林也说要彻底“消灭恶棍们”。

艾赫谈了托洛茨基分子们的“狰狞面目”,并呼吁:“他们应该被枪毙!斯大林同志,我们做得太温和了!”

很有代表性的是,过去的反对派分子、顿涅茨克州委书记 C. A. 萨尔基索夫(萨尔基斯)的转变:“我一直不断地在驱赶有反对派前科的人,尤其是在党的工作方面更是如此。”

这种立场很快就被应用到了对待萨尔基索夫和许多号召不要饶恕“敌人”的人自己身上。但要知道在萨尔基索夫建议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时,谁也没有强迫他这么说。他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

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讲话与这些发言不同,没有那么激进(这里需要提醒一下,新宪法理应在第二天得到批准)。况且,看得出,斯大林还不清楚斗争将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于是他提议把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决议推迟到下次的全体会议上作出,而且完全无需对外公布本次讨论的内容。

有一种情况并不排除,这时的布哈林虽然已经实际上被撤销了在《消息报》的领导工作,其编辑部的工作也已由克里姆林宫的思想家塔尔所控制,但他还没有成为斯大林个人的敌人。布哈林是新宪法的起草者之一,因此斯大林不想把他交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去受折磨。对于这些委员渴望看到流血这一点,斯大林并不怀疑。

现在,至少有三股强大的力量交汇到了一起:通过新宪法引入社会自我发展竞争原则的必要性,更换地方干部的必要性,各地区领导加强对竞争对手进行镇压的企图。

与此同时,还应该增加一个“奥尔忠尼启则的问题”。这位苏联事实上的经济独裁者并不理解斯大林的政策。在他的概念中几乎不存在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变节分子,也不存在什么危害分子和特务间谍。他生活在由自己人管理的建筑和工厂的世界里,即使这些人不是纯洁无邪的,但对他、对党和国家都忠心耿耿。

叶若夫把奥尔忠尼启则众多部下归入阴谋者网络的做法首先触动了谢尔戈本人。被捕的皮达可夫是他的第一副职,得力助手。奥尔忠尼启则不可能不反抗就交出皮达可夫和人民委员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他尽可能地保护他们,就像前不久保护洛米纳泽那样。奥尔忠尼启则未必会因为洛米纳泽是自杀而原谅斯大林。但不管怎

样,他为洛米纳泽(被认定为敌人!)的遗孀争取到了特殊退休金。

奥尔忠尼启则的威望很高。所有人都记得,正是他代替了不能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古比雪夫,从而挽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所有人也都记得,他是如何反对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拆分为3个人民委员部的(重工业、轻工业和林业),他是怎样反对莫洛托夫的,而斯大林又是如何制止他的。

1936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严重打击奥尔忠尼启则的事件:他担任格鲁吉亚铁路部门领导的哥哥帕普利亚(帕维尔)被捕了。帕普利亚是一个有名的酒鬼,喜欢打猎和过浪荡的生活。他口无遮拦,甚至称自己的弟弟是“狗屎”。他也没有放过斯大林,当众称他是“留着小胡子的猪”。(普鲁德尼科娃 E. A.,《贝利亚:未曾发生过的罪行》,圣彼得堡,2005年,第130页)

尽管奥尔忠尼启则了解自己这位亲属的秉性,甚至到第比利斯的时候都不在他那里逗留,但他仍把兄长被捕视为对自己的侮辱,甚至比侮辱更严重,简直是对自己大家族的又一次蓄意侵害。他知道,帕普利亚是一个头脑不清、什么都不是的党员,那为什么要抓他呢?难道他是敌人?

谢尔戈还未料到,他已经命在旦夕,问题并不在他可怜的游手好闲的兄长身上。

1937年来临了。这一年在苏联历史上是斯大林镇压无辜受害者的标志性的一年。

谢尔戈可能在想,只不过发生了一件类似供应了不成套联合收割机的事件,当时他在保护自己的生产者不受来自政治局的同志的责难时,的确做过了头。

在调查“克里姆林宫案”的同时,作为此事的一种独特延续,乌克兰军区被拆分为基辅和哈尔科夫两个军区。这发生在1935年的5月,削弱了乌克兰军人的团结一致。

军人这时候已处于斯大林的特别关注之下,因为在欧洲开始的重新部署加剧了苏联一直面对的威胁。如果在1934年德国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苏联在西线的军事战略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击溃波兰的话,那么从此时开始,按照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出现了“需要与波兰和德国军队同时作战”的新任务。

1935年2月25日,图哈切夫斯基在给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见解。在信中,他像个预言家,可怕地预见到了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与日本)的作战,这让高层领导感到了不安,但高层并没有看到改变既定战略的理由。

尽管如此,1935年3月8日,斯大林还是把伏罗希洛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工农红军政治处主任加马尔尼克召集到自己这里来。

会面之后的3月31日,《真理报》上刊出了图哈切夫斯基的文章《当今德国的军事计划》。



事实上,这篇文章的共同作者是斯大林。他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原文进行了彻底修改,完全改变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思想,也包括文章的标题。图哈切夫斯基的原题是《希特勒的军事计划》。两个标题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拿掉了针对个人的攻击,将分析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对未来战争的进程,图哈切夫斯基作了如下预测:希特勒的第一击将打向苏联,然后是打击法国,占领比利时,拿下法国的北部港口,再后是进攻英国。他还援引了《我的奋斗》中的内容。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特别危险的是法国和英国在德国进攻苏联时会保持中立。

斯大林则把话题转向了另一面:德国的反苏政策是其“掩盖在西线(比利时和法国)和南线(波兹南、捷克斯洛伐克、合并奥地利)进行复仇计划的幌子”。斯大林想通过这篇“红色波拿巴”写的文章把有必要与莫斯科结盟的想法传到巴黎和伦敦去,单纯的军事见解在这里不占主导地位。要阐述军事战略的见解,有诸多其他的讲台。

当然,图哈切夫斯基是同意对他文章的修改的,但在其他的讲台上,在较小的场合下,他依然断言,德国是潜在敌人、战争即将爆发,而且很可能是在1937年爆发。

1935年12月,为了制定积极反击德国侵略的措施和方法,图哈切夫斯基提议在总参谋部举行大规模的战略演习。

这场演习是在1936年4月19日至25日举行的。在此之前,图哈切夫斯基到伦敦参加了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也访问了巴黎和柏林。在柏林时,他试图与希特勒会面,但希特勒坚决拒绝与他进行接触(我们要注意的,图哈切夫斯基在巴黎和柏林时,与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的白军分子进行了几次未经莫斯科批准的长时间的会谈,试图通过他们把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转达给法国和德国的高层)。本次出访显示,所有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想结成联盟关系。谁也不准备捆住自己的双手,都希望智胜自己的邻国。

所以,由图哈切夫斯基提议的参谋部的演习就不能不举行了。按照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元帅确定的任务,“作战”各方分别由下列人员指挥:苏联的西方面军由乌博列维奇指挥,亚基尔指挥波兰军队,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德国军队。

演习一开始,图哈切夫斯基就严厉批评了总参谋部的战略部署。他表示,德国人的主要兵力将经过乌克兰发动进攻,因为他们计划要侵占这个地区,但总参谋部却未考虑到这一点,只计划了与波兰的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德国人将派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当时是92个师)多一倍的师团。只有拥有这种优势,他们才会发动战争,对他们来说,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场有着两个战场的战争,而且战争是突然发动的。由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方案对苏联军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德国人的突然袭击可使他们在战争初期向前推进100至250公里,前8至12个月工农红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御战,然后在弥补了损失并在完全完成军事动员之后,转为攻

坚战。

这种观点与叶戈罗夫的部署是矛盾的。总参谋长认为，苏联军队要比德国人先完成集结，他不会允许敌人占任何优势。

叶戈罗夫的观点胜利了，而且斯大林直接向图哈切夫斯基表示不满：“您怎么了，是想恐吓苏维埃政权吗？”

这些话语里明显存在着政治威胁。但图哈切夫斯基没有理解斯大林的言外之意。他们之间是难以沟通的：一位是作为军人的判断，而另一位则是作为比自己的对手有着多得多的不确定因素的地缘政治家来审视一切的。

例如，图哈切夫斯基建议“重演比利时的做法”，也就是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土，从而对进攻白俄罗斯的德国军队形成侧翼威胁。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1914年，俄国司令部在发动对东普鲁士的进攻时正是这么做的。当时虽然牺牲了A. B. 萨姆索诺夫将军的第二军，但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德国人从注定败北的巴黎败退下来（“马恩河畔的奇迹”）。

斯大林看到苏联在西方与几个主要国家的关系一片混乱，就根本不可能去考虑对独立国家采取十字军远征的行动（只有在1939年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斯大林才批准这种穿越于斯库拉巨岩和卡律布狄斯大漩涡之间的行动）。

从整体上来说，参谋部的演习以平局结束。由于进攻的突然性因素被排除，于是展开了一场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前线边境战。参谋部的演习证实了“红色波拿巴”的正确性：乌博列维奇沉迷于进攻立陶宛，遭到了图哈切夫斯基（“德国人和波兰人”）从明斯克方向实施的打击。

但斯大林并没有否定图哈切夫斯基的所有建议。比如，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增加军队人数、将师的数量从现有的150个增加到250个，同时需要紧急发展坦克部队和航空兵，并大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这个新阶段再次重演了图哈切夫斯基与国防人民委员1928年发生的那场冲突。但这次斯大林没有去迁就伏罗希洛夫。4月7日，政治局下达决议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从总参谋部划分出来的工农红军军训部主任。

这样图哈切夫斯基超过了叶戈罗夫和加马尔尼克，成为军中的第二把手。这间接地承认了图哈切夫斯基在与叶戈罗夫关于兵团军事训练不足的争论中是正确的。

很难说斯大林对于自己的这个决定有多么自愿，虽然1935年秋天在基辅和白俄罗斯军区的军事演习的确暴露出了战斗训练不足的问题。应邀前来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有些失望，虽然他们也注意到了工农红军的军事装备良好。

确实，伏罗希洛夫不喜欢青云直上的图哈切夫斯基。他凭什么喜欢这位来自另一种文化核心的人，一个强硬的专家，一个打击了许多同事乐观主义豪气的人？图哈切夫斯基的上升实际上意味着受到总参谋长叶戈罗夫支持的富有竞争力的亚基尔-



加马尔尼克-乌博列维奇军事集团的失败。与此同时，“胜利者”图哈切夫斯基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因为有许多很强的势力在联合起来反对他。

在1936年8月和9月又一次暴露出军队训练水平低下的军事演习之后，伏罗希洛夫在10月19日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把图哈切夫斯基当成罪魁祸首作了一番严厉批评，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只有很少的时间对此进行彻底改善。这表明图哈切夫斯基的地位在下降。

在谈及对图哈切夫斯基态度的急剧变化时，需要注意一份苏联情报机关关于他在巴黎和柏林与白卫军的将军们进行未经批准的会面的报告。很可能正是这一情报成了斯大林对这位军队领导人产生怀疑的前提，并使他回想起卡库林和托洛茨基指责图哈切夫斯基在筹划密谋的证词。

此时，在西班牙爆发了整个欧洲都参与其中的国内战争之后，图哈切夫斯基有了一个恢复失去的地位的破天荒的好机会：他急于奔向西班牙。在具有世界革命意义的这场战争中，他的才华是极其需要的。在这方面他无意中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了。托洛茨基作为一个不被任何经济问题所累的“世界革命家”，正准备千方百计地支持西班牙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斯大林不可能把图哈切夫斯基派到比利牛斯。被派往那里的是一些小有名气的年轻军官和没有政治野心的专家。

这样一来，1936年既吸引了图哈切夫斯基，又什么都没给他。不过有可能在这一年，用来枪毙他的子弹已经造好了。

但并非只有图哈切夫斯基一个人脚下的大地在摇晃。白俄罗斯军区和基辅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和亚基尔同样面临这一情况。他们军事政治活动家的角色已经到头了，伴随他们的还有他们众多的战友。

远处大清洗的轰隆声已经传了过来。

在参谋部的演习之后，有人提议让乌博列维奇离开白俄罗斯军区去担任副航空人民委员和工农红军空军主任，这不是什么偶然。乌博列维奇拒绝了该建议，并请求奥尔忠尼启则给予支持。

很快，亚基尔也被提议担任这些名头很响，但无实权的职务。

从中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集团不愿再容忍军中最显要的指挥官对伏罗希洛夫存有敌意。

奥尔忠尼启则也不合时宜地落入到了不属于自己的事务中。难道他认为，他比斯大林更清楚国防人民委员部人事安排上的微妙之处吗？

1936年7月6日，亚基尔的战友И. 施密特师长因被指控图谋刺杀伏罗希洛夫在基辅被捕。随后被捕的还有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B. 普里马科夫军长(8月14日)、M. 久克旅长(8月15日)、驻英国武官B. 普特纳(8月20日)、哈尔科夫军区副司令员C. 图罗夫斯基师长(9月2日)、基辅军区列基切夫斯基防御区长官Ю. 萨布林师



长等。

他们都是亚基尔的亲信，离开他们，亚基尔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安全性。

1936年9月，巴黎俄侨报纸《复兴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来作为“散布”消息的一个渠道)刊登了一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很快将遭到逮捕的文章，这就见证了图哈切夫斯基已身处险境。从这时起，图哈切夫斯基就大难临头了。1936年12月26日，斯大林的桌子上出现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从德国获取的文件。其中透露说，图哈切夫斯基被俘时接受了德国情报机关的招募。那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一度与他的联系中断了，直到1925年他参加在德国的军演时才得以恢复联系。

这篇报告的指控如下：“按照德国情报机关的资料，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的阴谋集团。其目的就是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并把苏联变为资本主义西方的原料附庸国。这个阴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是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鲁祖塔克、亚戈达、叶努基泽。而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德曼和加马尔尼克则是领导着军队的密谋者。他们都是过去托洛茨基安插的人。图哈切夫斯基向德国情报机关转交了苏联的行动计划复印件。把刺探到的苏联重要军事机密通报出去的还有亚基尔。注：已报伊万诺夫同志(И. 斯大林的化名)。对于报告中提到的所有人员，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机关正在积极核查。A. 拉夫罗夫。”(米纳科夫 C.，《斯大林和他的元帅》，莫斯科，2004年，第571页)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材料都是虚假的，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伪造的。为此先将材料交给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秘密间谍(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的妻子)，然后再由她作为可靠线人提供的可信情报交给莫斯科。

但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在研究图哈切夫斯基的历史文献中，有证据表明有人试图把元帅拉入到反斯大林的阴谋集团中。图哈切夫斯基的密友、工农红军干部部部长 B. 费尔德曼军长对他说：“难道你没有看出来，事情在向哪个方向发展？他将像对小鸡一样把我们所有人都掐死。必须采取行动。”(拉波波特 B.、黑勒 Ю.，《背叛祖国》，莫斯科，1995年，第295页)

但是，图哈切夫斯基拒绝参与军事政变。

在调查亚戈达案件和“红色将军案”时查明，确实有人与图哈切夫斯基进行过试探性的谈话，但最多也仅是如此而已。在许多人眼中，他是潜在阴谋集团的潜在领导人，就像在1923年至1924年、1928年和1930年时那样。因此在斯大林眼中，他有明显的危险性，只不过程度大小要取决于政局。

皮达可夫当然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列宁在“遗嘱”中称他是党的领袖之一。他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1910年入党。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指挥过军队，是乌克兰临时



革命政府的首任主席，领导了顿巴斯的重建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租让总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他的政治观点已经几次与党的路线发生冲突。他反对列宁的“四月纲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去世后，皮达可夫成为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1927年，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皮达可夫被开除出党，但在发表与托洛茨基决裂的声明之后，他又拿回了党证。

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件调查过程中，皮达可夫被称为“反苏的托洛茨基平行中心”领导人之一。1936年7月28日，他的妻子被捕，并供认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

人在索契的皮达可夫赶紧回到了莫斯科。叶若夫把他叫去，并向他出示了对他不利的供词，以及他妻子的证词。

叶若夫宣布：撤去皮达可夫副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他为位于中亚地区的奇尔奇克建筑工程局局长。

皮达可夫情绪失控，并向叶若夫担保自己是无辜的，表示由于他没能察觉妻子的反革命活动，理应受到严厉惩罚，他准备亲手枪决妻子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的所有参与者。

但他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8月22日，当诉讼程序结束后，维辛斯基宣布，决定开始对一系列人员展开新的调查，其中也包括皮达可夫。随后就逮捕了他。

皮达可夫是一名勇敢的有思想的共产党员。在33天的审讯中，他驳斥了所有的指控，并没有屈服，但后来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过错。A. 奥尔洛夫对此解释说，奥尔忠尼启则劝说皮达可夫“顺从斯大林的要求，以被告人的身份参与到骗人的诉讼程序中”。人民委员向他保证，不会被判以死刑的（奥尔洛夫 A.，《斯大林的罪行秘史》，莫斯科，1991年，第180页）。当然，像奥尔洛夫书中的许多内容一样，这个说法不足为信。

事实上，在审讯中，对皮达可夫采用了所谓的“连续作战”和“立正”的办法（两三天不让受审人睡觉，也不允许改变身体的姿势），皮达可夫经受了长时间连续不断的折磨。

至于奥尔忠尼启则，他此时正在基斯洛沃茨克，皮达可夫的审讯记录是发到他那里去的。

皮达可夫承认犯有过失罪。而他所承认的过失罪（在制订计划时出现失误、提前使用尚未完工的工程项目、在住宅建设中滞后、长期不能完成工程等等），其实都是日常存在的普遍现象。

这里要提醒一下，案件调查是在新宪法的制订工作接近尾声和国际形势激化的

情况下进行的。

直到1937年1月布哈林与皮达可夫对质前，奥尔忠尼启则都不相信自己的这位副职有罪。当时也在场的布哈林的妻子是这样转述布哈林的叙述的：

“皮达可夫的外表比他荒谬的妄自菲薄更让 Н. И. (指布哈林——译注)感到震惊。这是一具活着的干尸，按 Н. И. 所说，‘这不是皮达可夫，而是他的皮囊，只剩下一把骨头和打歪了的牙齿’……皮达可夫说话时耷拉着脑袋，努力用手掌捂住眼睛。Н. И. 认为，从他的声音中能够听出一种他对听他说话的那些不断荒谬表演和不停武断专行的人的愤怒。

“布哈林问：‘尤里·列昂尼多维奇，请解释一下，是什么迫使您诬陷自己的？’

“此时出现了一个停顿。而一直吃惊地凝视着皮达可夫，并对自己工作积极的副手的痛苦神情和供词深感震惊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用手掌贴近耳朵问道：‘您的供词真是自愿作出来的吗？’

“皮达可夫回答说：‘我的供词是自愿的。’

“奥尔忠尼启则十分惊奇地又问道：‘完全出于自愿？’但他没能得到皮达可夫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拉林娜-布哈林娜 A.，《无法忘却的岁月》，莫斯科，2003年，第381页)

这次会面之后，皮达可夫的命运已定，奥尔忠尼启则已经不能保护他了。但是这位人民委员并没有放弃让自己的部门免受内务人民委员部过度注意的努力。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作为政治局“不可侵犯”的委员的个人权力正在减少，并且他与斯大林已经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了。

很可能是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影响下，1937年2月13日，一则指示发到了州委、边疆区委、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分局、州分局的局长手中。指示明确规定，不能逮捕“工业、运输和其他领域的厂长、工程师、技术员和设计师”，即便是地方上党的委员会的书记们出于自保而同意也不行。只有得到了“相应的人民委员”的同意，方可执行逮捕。如果该人民委员不同意，应该交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解决争议。

这里一切都很清楚。政治局抑制了地方政权的热情，把控制权保留在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奥尔忠尼启则不是反对派分子，他的斯大林主义在对待自己的战友方面要比卡冈诺维奇或者莫洛托夫的斯大林主义更加温和，更有人性。

谢尔戈在1937年中央委员会的二月、三月全体会议上本应作一个关于工业领域破坏行为的报告，然而他却在会议前夕派出几个委员会去工厂核实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控的真实性，这并非偶然。

可以说，奥尔忠尼启则坚持了列宁的党内民主的立场，其原则是不允许把思想上的对手当作敌人。不管怎样，20世纪20年代末的政治实践更符合他的心意。那时候



反对派分子没有被关进监狱,而仅是被处以流放(从1936年9月起,开始把受到镇压的反对派分子投入监狱和拘留营)。

到1936年,在消灭反对者的终结行动完成之后,斯大林已经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他的有关“清除坏蛋”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所有公开审判的基础,在审判中,被告人顺从地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行,而按照“清除坏蛋”的精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可以不费周折地收集到证据。

有时候,被告人的供词反而有力地证明了相反的一面——供词是假的。比如,皮达可夫说,1935年12月他在柏林时曾飞到奥斯陆去见托洛茨基,当时飞机是降在海勒机场的。但根据挪威人登在自己报刊上的资料,“没有任何民航班机在那里起降”。

托洛茨基在国外立刻展开了揭露斯大林的宣传工作,他表示准备出席公审。莫斯科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因为任何欧洲法庭在审查引渡托洛茨基的事宜时,都要出示有说服力的证据。而斯大林能够出示什么呢?

实际上,斯大林已经被逼到了战争的墙角,而苏联还没有对这场临近的战争做好准备。他需要清除潜在的敌人,但却找不到合法的、经得起司法检验的手段。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机关只是完成斯大林交代的任务而已。

因此,1936年至1938年间的镇压,并不是一场精心策划和中世纪性质的下层民众核心反对高层核心的行动,而是两种文化的碰撞。

斯大林越是想更文明地展现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在欧洲看来就越是可怕。欧洲甚至无法想象,难道他就只能进行无审判的镇压,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不过,这种不经审判的镇压,的确也是存在的(托洛茨基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

这种做法(也是哲学)有悖于斯大林的宪法程序和差额选举的路线。它们是势不两立的。

当斯大林的众多传记作者及斯大林时代的研究者根据出逃的契卡分子A.奥尔洛夫的不足凭信的记述,写下斯大林亲自向自己的敌人做出保证以换取他们的公开认罪时,这些作者和研究者没有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需要这些认罪?

初看起来,这是为了向西方的公众展示托洛茨基分子的“邪恶”勾当。

但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是一种类似于大司祭阿瓦库姆时期的心理和宗教的冲撞。当时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残酷镇压了不愿臣服于世俗政权和接受新一轮教会改革的牧首尼康的支持者。

这些人不想提到第二种情况,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了充满血腥的伪文献上。

斯大林本应该向自己的主要支柱“红色百人团”解释清楚,为什么他要发动内部战争。理由是这是宪法改革的延续。他发动他们反对异己(托洛茨基分子、两面派和危害分子)。开始了一场消灭“革命代”狭小阶层、被粉碎的“彼得堡核心”残余分子的

行动,尽管镇压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大,但却引起了在苏联整个历史上留下烙印的全球性的恐慌。这可以解释为,斯大林开展了一场与否定民族国家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并以左倾激进主义世界观为支撑的文化阶层之间的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重蹈了伊万雷帝的覆辙。尽管蒙难的大贵族为数不多,但伊万雷帝在历史上仍被看作是一个残酷的暴君(虽然正是那时,西欧的君主国家为了保障秩序而绞死了很多平民)。差别只在于牺牲者的地位:伊万四世处决的是精英的代表,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

所以,难怪斯大林集团会号召几万人上街支持法院的判决。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零下 27 度的天气里,在红场上组织了有 20 万人参加的大规模集会。集会群众一致表示拥护对“平行中心”参与者处以死刑的判决。在 1937 年 1 月份至 2 月份的报纸上,天天都会登载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电报和群众集会作出的决议。1 月 26 日,《消息报》上刊登了著名工人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和马卡尔·马扎伊的见解:“彻底消灭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和他们所有卑鄙的同党!对任何人都不留情!”作家 A. 托尔斯泰、A. 考涅楚克、伊万诺夫,院士 H. 瓦维洛夫、B. 科马罗夫、A. 巴赫、И. 古布金、Г.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此外还有一些画家、作曲家、演员都对“中心”参与者进行了谴责。

诗人佩列茨·马尔基什的诗作就很有代表性:

真想把颈套绳索的你们赶进屠宰场,  
让那充满鄙视的雄鹰的目光为你们送行,  
谁在战壕中拯救了心爱的祖国,  
谁就成为人民心中的祖国。

其他诗人也写过类似的诗篇。但不见得是谁特意强迫他们这么做的。那些不想写出押韵咒语的人,只要保持沉默就行了。

不应当认为,所有这些人要么是老奸巨猾的无耻之徒,要么就是很容易向暴力屈服的人。大多数人是相信阴谋的存在的,而信任一般说来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

通常认为,斯大林知道被镇压的人是无罪的,他所有的行动无非是马基雅弗利主义(指 16 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推行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策——译注)的表现。

是这样吗?

斯大林是另类思维,这是毫无争议的。所有政治家思考问题的时候,都会在自己的天平上掂量一下国家命运和部分人命运的分量。在政治家的眼中,命运的天平总是很少有机会向个人倾斜。



让我们提前看一段我们的主人公令人惊讶的言论。1937年11月7日,苏联领导人聚集在伏罗希洛夫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寓所里一起庆祝十月革命20周年。在场的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斯大林的祝酒词:

我想讲几句话,可能,并不适合这个节日……俄国的沙皇做过许多坏事。他们掠夺和奴役了人民。他们发动了战争,为了地主的利益而抢占土地。但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建立起了一个直至堪察加的广阔国家。我们继承了个国家……首先,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团结和巩固了这个国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一个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伟大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国家。我们要这样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它的每一个部分要是脱离了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会给后者带来损失,而且还不能独立存在,并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奴役的地位……

因此,每一个试图破坏这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每一个竭力把某个部分或民族从这个国家分离出去的人,他就是敌人,是苏联人民和国家的不可戴天之敌。而我们将消灭每个这样的敌人,即使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们将消灭所有他的家族、他的家庭,以及每一个其行为和思想有害于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人,我们将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让我们为彻底消灭所有敌人而干杯,消灭他们本身和他们的家族!(引自:弗多温 Л. И.,《俄罗斯民族》,莫斯科,1996年,第202—203页)

在小圈子里斯大林是坦诚的,并为自己最主要的价值观而举杯祝酒。但他威胁中含有的中世纪式的残酷性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却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威胁谁呢?自己的战友们。而这些人正以赞许的高呼在回应他。

此外还有一个可称之为“西班牙镜子”的情况。他们从其中看到了比领袖上面谈到的更可怕的威胁。

在比利牛斯进行的国内战争催生了新的政治现实,即“第五纵队”。1936年10月1日,佛朗哥手下的将军埃米利奥·莫拉(不久后死于空难)在广播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称谓。他说,有四个纵队将进攻马德里,而政府的中心将遭到已经在首都的“第五纵队”的袭击。

美国作家和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那时就在西班牙。他后来写道:“进攻马德里的四个纵队枪毙了自己的俘虏。在战争初期,当在城内捉到第五纵队的人时,他们同样遭到了枪毙……按照战争时期的法则,他们应该受到这种对待,他们也对此做好了准备。”(海明威 Э.,《海明威文集》,莫斯科,1968年,第3卷,第22页)



除了“第五纵队”之外，在西班牙，站在共和党人这一边的还有由在莫斯科知名度较高的安德鲁·宁领导的强有力的战斗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宁 1921 年来到莫斯科，是托洛茨基的战友，曾是红色国际工会的主席，当选过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进入了共产国际领导层。1930 年，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之后，宁回到了西班牙。在 1936 年选举中获胜后，他成为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正是宁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将企业转归工人所有和成立工人农民政府而摇旗呐喊；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纲领不可避免地使大多数居民团结起来去共同反对共和党人，并导致了他们的垮台。

1936 年 12 月，潜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苏联间谍通报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准备在巴塞罗那发动武装暴乱（该暴乱于 1937 年 5 月发生）。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巴塔利亚报》对斯大林和苏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巴塔利亚报》每天都在报道，说莫斯科爆发了起义，说共产国际被取缔，说季米特洛夫被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说苏联的报刊反对人民阵线，说列宁格勒发生了饥荒等……”（科利佐夫 M.，《西班牙日记》，莫斯科，2005 年，第 305 页）

1937 年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驻柏林的间谍机关传来消息称，德国间谍渗入了托洛茨基分子在巴塞罗那的队伍中，并准备在近期发动叛乱。同样从西班牙也有消息传到莫斯科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正在策划针对共和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恐怖活动。

把所有的情报综合起来，可以得出托洛茨基分子在与德国特工结盟、出现了新的“第五纵队”和政变危险的结论。难道在这面“镜子”中没有反映出莫斯科的局势吗？况且，斯大林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他没有忘记俄国革命的经验。经验表明共产党人队伍中存在着残酷的内部派系斗争。他知道，甚至最正派的战友（比如在辩论工会问题时的捷尔任斯基）也会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现在他不得不依靠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材料和自己的直觉了。

同时，斯大林并不觉得契卡调查机制中存在的系统缺陷有什么大不了的，如调查工作与执行工作相脱节，用被拘留者自己承认的罪行代替对实际证据的收集工作。不但如此，他还像中世纪的僧侣那样相信这些坦白，因为对于僧侣来说，坦白具有一种宗教仪式的意义。

他的记忆还提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的国防工厂里发生过令人费解的火灾和爆炸，其原因只可能解释为是敌人的破坏活动。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业务综合报告表明，外国特工部门制定了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事故、爆炸和有人员伤亡的不幸事件在工厂里和铁路上时有发生（1936 年前 10 个月，铁路系统发生了 300 起事故，导致 50 人死亡）。



可以想象得到,斯大林每天读到关于火车失事、矿井爆炸、工厂失火和人们吃劣质罐头食品中毒的综合报告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由此斯大林得出了一个结论,并在1937年6月2日召开的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了出来:“他们想把苏联搞成第二个西班牙……”(《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1938年)》,编者:B. H. 豪斯托夫、B. П. 瑙莫夫、H. C. 普洛特尼科娃,莫斯科,2004年,第206页)

“第二个西班牙”,这意味着他找到了一个使他相信镇压是有道理的必要说法。也就是意味着:你们想把你们变成“第二个西班牙”,那我们就用消灭你们的“第五纵队”来回敬你们。

9年后,当在政治局委员的小范围内对伟大的卫国战争进行总结时,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承认:“战争表明,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多内部的敌人,不像向我们汇报和我们认为的那样。很多人是白白蒙冤。人民本应为此让我们卷铺盖滚蛋。我们应该忏悔。”(尤里·日丹诺夫,《回首往事:一个目击者的回忆录》,顿河畔罗斯托夫,2004年,第227页)

这个坦白完全推翻了1937年是精心策划的、残酷无情的政治迫害的标志的传统看法。斯大林明白他犯了错误。有可能,在他的梦中,那些被枪毙的人的幽灵来找过他,并用我们所不知的对话折磨着他。

但要知道,“西班牙镜子”其实是客观存在的!

Ф. Д. 博布科夫在与有关作者的谈话中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确实存在一个托洛茨基支持者的网络。其网络成员经常交换信息,并把有关消息放在看似没有问题的包裹中(如布娃娃)寄给托洛茨基,甚至还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进行监视。领导这一秘密工作的是И. H. 斯米尔诺夫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萨普罗诺娃。50年代,在斯大林去世后,Ф. Д. 博布科夫与她会过面,她证实了这一切。

因此,当我们把1937年作为一个本国的历史现象谈论时,我们应该知道当时的整个世界是一个什么状况,而且斯大林的反对者同样也是铁打的,并不是用什么发酵面团揉成的。

甚至连完全独立的见证人、出席了“平行中心案”开庭的美国大使Д. 戴维斯也对外国记者们说道:“他们是有罪的。我曾经担任州检察官,我有敏锐的眼力。”戴维斯在信中告诉罗斯福说:“诉讼程序显示确实存在一个旨在推翻现政府的政治阴谋集团。”(塔克尔P.,《执政中的斯大林》,莫斯科,1997年,第371页)

但是,英国大使切尔斯顿和德国大使舒伦堡都不相信有阴谋集团的存在。

换句话说,苏联政治的现实远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光明。

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从华盛顿发给斯大林的情报,用于对当时的局势作出一个全面的评判:“1937年1月2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穆尔表示,

根据掌握的所有资料来看,1937年想保住和平是不可能的。”(《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年—1938年)》,第81页)

从这一时期截获的英国驻美大使林德赛与穆尔的交谈中表明,这位英国人称目前的国际形势与“1914年6、7月份”非常相似(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1914年8月1日)。

世界处于新一轮世界大战的前夕,斯大林集团似乎猝不及防地遇上了突然来临的风暴。

从各方面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主人公把这种可怕的前景视为个人的失败,因为他在战争来临日期的预计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斯大林试图通过苏联在柏林的大使就经济合作问题与希特勒进行接触,但这位德国总理拒绝与苏联大使会晤。

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对军人的审判”。这正好赶上分裂了共和党人阵线并且让克里姆林宫极为头疼的巴塞罗那暴乱。

1937年2月18日夜,奥尔忠尼启则在家中自杀身亡。

而他本应该在原定于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报告的。

政治局在2月5日批准的会议日程包括:

——叶若夫做《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报告;

——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卡冈诺维奇(交通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做《日、德和托洛茨基代理人从事破坏、暗害和特务活动的教训》的报告;

——斯大林做《对党的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在党组织中同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进行斗争的方法》的报告。

如果按那时的文风,可以说:党做好了战斗准备。

2月7日,政治局作出决议,对一系列大型发电站启动特别安保制度,这也说明了局势的严重性。

1月份进行的“平行中心”审判是建立在发生的生产事故和灾难的事实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其锋芒直指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和奥尔忠尼启则。苏联检察院在1936年11月和12月对所有关于大型火灾、事故和供应次品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客观地说,整个情势不容乐观。1935年至1936年间,在人民委员部工作的823人中,有56人被开除,其中34人遭到逮捕。

奥尔忠尼启则大概至死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因此他试图向斯大林解释惩罚政策和赋予事故等案件政治意义是错误的。

从奥尔忠尼启则的角度,他的确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去思考一下不久前发生的亚



戈达被解职一事。亚戈达同样是因为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的小圈子所困而未能纵观全局。

通过对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人员构成的分析,可以对镇压的社会文化根源得出一个结论。在该部的工作人员中,有 71 人曾是白卫军的军官,287 人曾是沙俄军队的军官,94 人有过反革命活动罪的前科,41 人有过职务犯罪;出身于商人和工业主家庭的有 131 人,还有 131 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的有 73 人。(赫列夫纽克 O. B.《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30 年代政治局里的冲突》,第 89 页)

奥尔忠尼启则觉得,存在着某种斯大林也不会逾越的界限,而这给了他辩论的力量。于是,他在公开讲演时说,在最近这 10 年里苏联高校培养了大约 10 万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他们“和我们血肉相连,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志”。

但是,我们在接受这种观点的时候必须承认,斯大林也正是这么想的。斯大林的干部已经登上经济舞台的前台:B. A. 马雷舍夫 1932 年毕业于莫斯科学技术学院,1937 年成为科洛姆纳机车制造厂的厂长,1939 年在他 37 岁时开始主持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的工作;A. H. 柯西金 193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纺织学院,两年后成为纺织厂的厂长,1939 年 35 岁时成为纺织工业人民委员;Л. Ф. 乌斯季诺夫 193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1940 年成为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军工厂的厂长,1941 年 33 岁时成为军事工业人民委员。包括 Л. И. 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许多其他苏联活动家也属于这一代人。在斯大林临终前的 1952 年,正是他们这些苏联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受到提拔的干部,占据了苏联政府中所有正副部长中的大约一半职位。他们的职务升迁当然是因为“大清洗”而造成的,但他们的命运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取决于他们的职业技能、责任心和忘我的精神。

从我们的认识高度来看一代人代替另一代人的悲剧过程,我们应该考虑到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年轻工程师所具有的良好素养,这也在整体上见证了当时教育领域政策的正确性。

(在这 10 万工程师中,有一个叫尼古拉·安东诺维奇·基克列维奇的人。他曾是敖德萨孤儿院的孩子,也曾斯大林市(如今的顿涅茨克市)的机电车间当过铸件清理工,后毕业于工业学院,并在矿场担任副总机械师。他学会了英语和德语,博览群书,经常去看戏,听音乐会,收藏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技术类丛书。矿山机械工程师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在经常渗水的地底下、有易燃易爆的沼气,且矿山压力可能会将支柱压平,还必须保障所有设备的正常运转。尼古拉·安东诺维奇记得 1936 年发生的一件事。一部“艾柯夫”割矿机突然损坏了,没有一位老师傅能够把它修理好,于是把他叫了过去。他拆开了盖子,阅读了上面的德文说明。如果他不能完成这项需要他做的工作,那么就是他的错。类似这样的需要那一代的年轻工程师们运用

知识的情况非常多。他们的肩上也承载着完成工业化、建立军工经济和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的任务。)

因此,奥尔忠尼启则称他们“和我们血肉相连”是正确的。但他却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与厌倦了不断竞赛的英雄们留在了一起。对于他们来说,来自斯大林的不间断压力已经越来越让人不能忍受。

换言之,经济权力掌握在分布于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地区的大小集团的手中。在这些地方,党的领导人和工厂的厂长经理成立了自己的联盟,并暗中对抗莫斯科。党内管理经济的“黑手党”支配着巨大的资源,他们尽量不把任何地方上的冲突和问题汇报给中央,以免遭受到“清洗”的威胁或是因被指控怠工、破坏活动或特务活动而陷入调查。他们排斥以建立无所不包的大一统国家为主要表象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希望更温和的斯大林主义,那种对他们搞的适度资本主义和“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九九”视而不见的斯大林主义。

可以说,按照精英更替的帕累托法则,完成了十月革命的一代人开始了缓慢的学习工作。此外,这一代人也开始感觉到了干部情况的变化: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专家奇缺的局面得到控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有 36.99 万人从高校毕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 17 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苏联成为世界上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学员人数最多、专家培养速度和规模最快最大的国家。

波斯特舍夫在 1935 年时称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对所有反革命分子来说最具毁灭性的力量”,并将其视为是与军队和契卡人员一个系列的权力要素,他是正确的。“基层”的压力成为了一种体制因素。

哲学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下了这样的定义:“斯大林主义促使了新的权力网的形成,并在它的基础上得以成长,但与此同时他也要对抗这个权力网,与其作斗争,努力遏制它的蔓延及其力量的加强。上百万的豺狼都瞄着这个权力网。如果不是斯大林的无上权力,他们会完完全全地吞掉这个社会,输光一切,摧毁一切……”(季诺维也夫 A. A.,《斯大林——我们少年时期的飞人》,莫斯科,2002 年,第 256 页)

但这个定义(“豺狼”)指不指老党员呢?从领袖的动作来看,是指的。“封疆大吏”的官官相护、派别活动、裙带关系成了社会不公的新形式,并堵塞了指令性的管理渠道。

当奥尔忠尼启则在斯大林面前捍卫“工业领袖”而不是正常人民委员的权利时,他便站到了街垒的另一边了。

这里应该补充一段托洛茨基在 1936 年年底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对斯大林政策作出的一针见血的评价:“有两种对立的趋势正从苏联体制内部发展起来。与腐朽的资本主义相反,苏联体制正在发展生产力,从这方面来说它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准备。从另一方面看,为了迎合上层,它把资产阶级的分配原则推到了极致,它又在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这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原则之间的矛盾不可能



无止境地发展下去。或者是资产阶级的原则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向生产资料这边扩展,或者正好相反,让分配原则去适应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托洛茨基 JI.《被背叛的革命》,莫斯科,1991年,第202—203页)

“革命的魔鬼”是正确的。在斯大林去世38年之后,一个伟大的强国就沿着这条崩溃之路最终垮台了。

1937年时,我们的主人公同样知道这种危险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社会主义工程中无法容忍奥尔忠尼启则的原因。

在筹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奥尔忠尼启则制定了全体会议决议的草案。该草案强调,敌人基本上已经被揭穿,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工程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上。草案还建议委托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在10天之内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克麦罗沃化工联合厂、乌拉尔车辆制造厂、中乌拉尔制药厂的情况,并拟定消除那里破坏活动和事故影响的措施“以保障这些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得以开工”。这一条文对这位人民委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想得到亲自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材料的权力。正是该部“发现了”在这些建设工地上的“破坏组织”。

1937年2月5日,斯大林将批注了严肃批评意见的决议草案还给自己的战友。斯大林要求给草案文件补充下列资料:“1)破坏活动损害到了哪些部门,且是如何损害的(列举事实);2)失误的原因(以不问政治和事务主义的态度来挑选干部)。”(赫列夫纽克 O. B.《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30年代政治局里的冲突》,第97页)

就在2月5日这一天,奥尔忠尼启则开始执行指示,但却完全是朝另一个方向。他向克麦罗沃、顿巴斯和乌拉尔派出了三个委员会,交付给他们“要区分有意破坏和无意过失”的任务。很快委员会就报告了失误的性质,但没有找到最主要的东西——破坏活动。奥尔忠尼启则将这些结论告诉了斯大林。2月17日,政治局召开了讨论全会决议草案的会议。根据一些证明材料,奥尔忠尼启则在会上再度重申,重工业领域不存在任何破坏活动,但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什么也不懂,或者装作不懂。从这里走开。”

但这只是传闻。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与波斯克列贝舍夫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修正了决议草案,把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都加了进去。此后,这位人民委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会见了一系列的工作人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其中包括他派去克麦罗沃和顿巴斯的几个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加利佩林教授和副人民委员奥西波夫-施密特。午夜过后,已经是2月18日了,奥尔忠尼启则回到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家中。在这里他与斯大林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原来,就在奥尔忠尼启则回到家里之前,他的住所遭到搜查。对于他愤怒的慷慨陈词,斯大林平静地回答道:不需要这样激动,要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也可以搜查我的住



处。当然，这话里暗含着嘲笑。斯大林请奥尔忠尼启则马上就来自己这里谈话。他们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聊了约一个半小时。奥尔忠尼启则回去时极为不安。

第二天早晨，他没有出来吃早饭，留在卧室中写着什么。天黑时，他妻子季娜伊达·加夫里洛夫娜听到了枪声。这位人民委员像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一样，向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

他的自杀给了斯大林沉重一击，并因此一时无法恢复元气。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是这样讲述那几天的情况的：

“我记得，奥尔忠尼启则在与我谈话时说，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同志们报告说，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活动。而现在正在逮捕他非常了解的大型企业的工作人员。他将怎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这个关于破坏活动的报告呢，他收集到的都是完全相反的材料。

“在准备报告时，奥尔忠尼启则理应提前几天与斯大林初步商量好报告的提纲，然后把提纲提交给政治局批准。

“在他自杀前的三四天，我和他两个人夜里睡觉前曾绕着克里姆林宫边走边聊。我们不理解，斯大林怎么了，怎么可以打着破坏活动的旗号把老实人关进监狱和枪毙？谢尔戈说，他已经无力再继续这样工作了。他说：‘斯大林开始干坏事了。我一直是斯大林的亲密朋友，我信任他，他也信任我。但现在我无法与他共事了，我要自杀。’”（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1999 年，第 329 页）

不过，斯大林表面上立刻从打击中恢复了常态。1937 年 2 月 19 日，报纸上发布消息称这位人民委员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莫洛托夫甚至在弥留之际，在承认奥尔忠尼启则是自杀这一事实的禁忌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仍然气愤地评论了奥尔忠尼启则之死：“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不过我认为，知识界人士过分地夸奖了他。他用自己最后的一步表明，他还是不坚定的。这当然是反斯大林的，但也是反路线的，是的，是反路线的。这一步非常恶劣。要不然对他就不应该有什么争议了。”（丘耶夫 Ф. И.，《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 191—192 页）

毫无疑问，在这些话里也表达了对斯大林的评价。难怪不久后，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们就遭到镇压。1937 年 9 月 9 日，帕维尔（帕普利亚）遭到枪决，随后，伊万（瓦诺）和康斯坦丁（科泰）兄弟也遭到逮捕。

隆重的国葬仪式，以其名字来命名城市和工厂等形式作为对这位人民委员的永久纪念，并不能反映我们的主人公真实的感受。在东正教的文化中，自杀被视为是一种可怕的罪孽。现在这个罪孽间接地落到了整个斯大林集团的身上。

但是，在后苏联时期出现了一条严肃的消息，说这位人民委员患了一种不治之症，为了免受痛苦，他自愿结束了生命，只是选择了对他来说非常艰难的一天。

随着奥尔忠尼启则的去世，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过去了。与这个人的名字联系



在一起的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巩固国防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农用拖拉机生产(年产已达几十万台),到制造第一台喷气式发动机,不管在哪里,到处可以看到他的工作成就。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生产绝对值已在欧洲领先,仅次于美国。而1913年时,俄国仅是第5位。30年代时,全球能够制造出达到当时科学和技术世界水平的任何一种工业产品的只有三四个国家,而苏联就是其中一个。确实,那时没有莫斯科攻不下的堡垒。

如今这个人不在了。在与他告别的时候,斯大林想必回忆起了许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事情:流放到沃洛格达、谢尔戈到了那里、逃跑、共同反对格鲁吉亚分离主义者……他能回忆起的事还有,奥尔忠尼启则是如何挽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随着谢尔戈的去世,昔日同志般的友谊成了过去。而这种友谊把人们甚至比亲兄弟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奥尔忠尼启则明白,斯大林已经不需要与自己平等的战友了。

而斯大林可能在重复普希金的思想:“你是沙皇。要独自活着。”斯大林已经陷入了自己的非人的孤独之中了。

普希金出现于这位人民委员之死时绝不是偶然的。2月10日,斯大林出席了在大剧院举行的纪念诗人逝世100周年的盛大晚会。

普希金是帝俄时代的一位天才,精神上他是一个欧洲人和欧洲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却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人。这一大规模宣传运动的倡导者正是领袖本人。宣传运动中暗含一句政治潜台词:祖国的伟大及其文化的世界性。

当时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人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有两股力量在为普希金而斗争:以白卫军侨民为代表的沙俄的继承人和苏联文化政策的领导人。这种斗争在2月10日达到高峰,这一天在莫斯科和在巴黎都举行了盛大晚会。

普希金中央(巴黎)委员会的成员是一些杰出的人士:伊万·布宁、费奥多尔·夏里亚宾、伊万·什梅廖夫、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谢尔盖·利法尔、马琳娜·茨维塔耶娃、康斯坦丁·巴利蒙特、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以及其他文化活动家。此外,参与其中的还有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П. Н. 米留可夫、B. A. 马克拉科夫、H. Д. 阿夫克先季耶夫等。其中石油大王亨利·德特丁的妻子利季娅·德特丁占有特殊地位。

莫斯科试图对法国人民阵线的政府加以影响,以便使纪念普希金的庆祝活动由苏联驻法大使波将金来领导,法国人同意了这一点。但普希金委员会领导人、著名舞蹈家和芭蕾舞导演谢尔盖·利法尔持坚决反对的立场,虽然教育部长让·泽伊威胁他要注销他的法国护照。

居住在国外的俄罗斯人在各大洲42个国家的231个城市中展示了令人惊奇的俄罗斯文化。

全球的和苏联的纪念普希金庆祝会归根结底是一场辩论的延续:俄国(用的是

“苏联”这一称谓)与自由的二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共和国进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巴黎方面试图把这位诗人说成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好为自己的历史性失败作辩护),而莫斯科把普希金说成是当权者和爱国者。

Д. С.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讲话既调和又好斗,这是令人惊讶的:“普希金,这是统一的俄国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他是一个和解者,一个联结者,是一个使两者合一和摧毁中间障碍物的人……而这在那个被奴役的地方,人们已经了解,已经有所感觉。在那里能够听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我们和他们都爱着同一个俄罗斯、同一份自由。”(《巴黎普希金中央委员会(1935—1937)》,2卷本,编者:М. Д. 菲林,莫斯科,2000年,第462页)

很难说当时是谁胜利了。莫斯科在2月10日完成了苏维埃国家“国际主义”的发展阶段,这是普希金委员会活动的研究者米哈伊尔·菲林对这次争论的评价。

在巴黎举行的庆祝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在西班牙的战争息息相关。在西班牙,俄国侨民同样是站在佛朗哥一边作战的。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勇敢的战士,自认为有义务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此外,1937年1月4日,5万名意大利远征军在萨拉曼卡登陆。可以说,刚开始的这一年给苏联领导层带来了新的不安。在这一背景下,普希金成了克里姆林宫一个新的秘密武器。

斯大林终于向俄罗斯文化的主要人物呼吁了,似乎是要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为社会主义祖国效力。这也就揭开了我们主人公的谜底。在与圣彼得堡社会文化核心进行这场真正的战争的时候,斯大林也成了这个核心的一个部分,但在任何时刻他都可以站到另一边去。从这个意义上,他同样也是一个联结者。

因此,在与作家会面时,斯大林能够吸引住他们,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的影响。

这里不能不提到他与后来出版了《莫斯科1937年》一书的德国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的会晤。当然,普希金与这次会晤没有任何关系。重点在于,会谈时斯大林的自我感觉相当好,因为他理解艺术创作的本质,并以欧洲文化的传统为依据侃侃而谈。

这本被忘却的书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斯大林的心理肖像。

第一,尽管我们的主人公刚刚倡导通过了最民主的宪法,但他远非民主派人士。

“我再次提到,在对季诺维也夫审判程序中过于简单的方法在国外引起了甚至是对苏联有好感的人们的反感。斯大林对那些要看到大量的文字材料才能相信季诺维也夫是在搞阴谋的人稍稍嘲笑了一番;他指出,有经验的阴谋家极少会有把自己的材料放在明处的习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审判中令人信服的证据就不必苛求了,是这样吗?当然,福伊希特万格马上作了进一步说明。

“当你向苏联人讲述这些假设的时候,他们只会耸耸肩笑笑。他们说,如果我们想歪曲事实,我们为何需要采用屈打成招的认罪这样困难和危险的方法呢?难道伪



造文件不是更简单吗?”

第二,“这个聪慧审慎的人永远不可能犯下如此可怕的愚蠢错误——在无数共同参与者帮助下上演一出如此拙劣的荒诞剧,其唯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大张旗鼓地举行一场欢庆自己战胜对手的盛典”。

福伊希特万格的结论是:苏联有两张面孔。在斗争中是毫不留情的,而在建设中则是“苏联在宪法中宣布为自己终极目标”的民主。(福伊希特万格 Л.И.,《莫斯科 1937 年:给我朋友们的旅行报告》,塔林,1991 年)

福伊希特万格用心理和艺术的分析法解释了斯大林的政策。当然,这种解释对战前时期来说还是过于微妙了。所以他的书在莫斯科很快就被查禁,这绝不是偶然的:看来这位西方作家的纯理性立场与斯大林集团的心理状态并不相符(顺便说一下,除了正常的稿费,还支付给作家约 10 万美元的外汇,作为对他在苏联出版的所有书籍的报酬)。

可以说,福伊希特万格在感情上,即在心里并不理解斯大林。

类似事件也发生在法国左派作家安德烈·纪德身上,他也到过苏联,并于 1936 年出版了《从苏联归来》一书。书中没有敌意,但有着失望:他看到了贫穷、精英阶层的蜕变、妥协取代了革命的解决办法。

虽然与纪德相比,福伊希特万格对苏联的理解要深得多,但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偏离社会民主党人纯理性的立场,而在这个框架内就不可能描写出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胜利和失败。

因此,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就越发显得极为需要。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传统文化的精神财富被与这一文化决裂的社会所需要。

结果,斯大林时期的主要成就正是在教育和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通过这些成果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宏大规模。

1936 年年初,《消息报》上刊载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按布哈林的要求创作的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在那些日子里,  
在古老的石墙的后面,  
活着的不是人,而是事业,  
他的举止日益令世界称奇。  
命运赋予他宿命,  
要把以往的空缺充填。  
他,就是最大胆的梦也不曾梦见,  
而在他之前谁也不敢如此……

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下，帕斯捷尔纳克从来都不是“党的喉舌”，也不会按照指定来写作。如果他这样写了，那么就应该认为，他是发自内心的。

与他相反，纪德在自己的书再版时写的随笔《对〈我从苏联归来〉的增补》(1937年6月)中写道：“嘴被布堵住的被压迫者来自四面八方，人民几乎失去了反抗的可能。哎，一场游戏……斯大林已经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热烈掌声中获得了胜利。全世界共产党人还在相信，并将继续长期相信下去，他们至少在苏联胜利了，而且还将把那些不鼓掌的人都视为敌人和叛徒。没有人会为斯大林体制的受害者辩护，这些人不会也不想如要求他们的那样低下自己的头……难道那些正义的报刊还会记起要辱骂他们原本痛恨的体制吗。而那些珍视自由和公正思想的人，那些为台尔曼而斗争的人——巴比塞们和罗曼·罗兰们一声不吭，他们保持缄默。围绕他们的则是受到迷惑的无产阶级大众。”(引自：罗戈温 B.，《斯大林的新新经济政策》，莫斯科，1994年，第317页)

我们将帕斯捷尔纳克与纪德作比较，是要强调这个时期的整体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建立在西方民主与法西斯德国即将展开搏斗的感觉上的，而在这场搏斗中，苏联的参加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1937年2月23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全会持续了11天，成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殉难地。

布哈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正如列宁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从来都未能完全理解辩证法的“党的宠儿”；他是“右倾”领袖，认为在资本的逐渐积累中存在逐渐工业化的基础；他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一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他把谢尔盖·叶赛宁的诗歌称为“富农反革命的思想大旗”；是一个一生都在收集蝴蝶的收藏爱好者；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他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中给予了斯大林极大的支持，但在1928年激辩时曾称斯大林是“渺小的东方暴君”。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表示：“每一个党员的职责就是要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他是党的智慧和意志的化身。”他结过三次婚。关于布哈林还能说些什么呢？“布哈林，个子不高，是一个长着棕黄色胡子和狂热者般眼睛的人。人们常说，他比列宁本人还要左。”(李德 ДЖ.，《起义后的墨西哥：震撼世界的10天》，美国、莫斯科，1968年，第480页)

布哈林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去世后，他领导着《真理报》，掌控着党和共产国际的宣传“垄断权”。1928年，在他与斯大林的斗争中，曾请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给予支持。1935年基洛夫被杀后，布哈林写过他们是“法西斯堕落分子”。布哈林是新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在1936年8月的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供认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前“右倾分子”有“罪恶的联系”。11月在与布哈林对质时，被捕者坚



持说,存在一个由布哈林领导的反革命的恐怖中心。布哈林以前的一个学生叶菲姆·蔡特林供认,布哈林把自己的左轮手枪给了他用于刺杀斯大林。1936年12月7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期间,叶若夫要求逮捕布哈林,并组织了一次新的对质。参加这次对质的有 IO. 皮达可夫、K. 拉狄克和其他被捕者,以及布哈林、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和日丹诺夫。

布哈林驳斥了所有指控。斯大林倾听了布哈林的反驳,并建议把此事放到下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解决。

“斯大林就像一只吃饱了的猫玩弄半死的老鼠那样戏弄着布哈林和李可夫。”(梅德韦杰夫 Ж.、梅德韦杰夫 P.，《不为人知的斯大林》，莫斯科，2002年，第368页)

类似这样的见解未必就是这一悲剧结局的原因。苏联和斯大林的状况决定了他们没有时间来作这种消遣。如果斯大林推迟作出这致命的决定,并不意味着他还在犹豫。

1937年2月20日,布哈林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拒绝出席全体会议,宣布绝食,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交了一封长达100页的声明,并请求把此声明发给与会者。斯大林将此视为最后通牒。布哈林的声明被散发,并引起了负面的反应。政治局谴责了他绝食和拒绝参加全会的行为。斯大林亲自给布哈林打了电话。“我能做什么呢,如果您打算把我开除出党?”布哈林问。“谁也没有打算把你开除出党。”斯大林说。

2月23日,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叶若夫第一个作报告,他指责布哈林和李可夫组织了一个旨在谋杀斯大林的恐怖集团,并要求将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此后,米高扬也发表了指责他们的演讲。第三个上台的是布哈林。但现在很难理解的是,他只讲了一些小事,驳斥了米高扬,几乎没有涉及主要的指控。

2月24日,布哈林在晚间会议上再一次发言。他“因自己轻率的且政治上有害的”绝食行动向中央委员会道歉。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些后高声说:“不够,不够!”

斯大林想要听到什么呢?

这应该是他们对抗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有一切理由把布哈林交给法院或交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手中,但他倾向于在党内进行审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皮达可夫和拉狄克也一样。不,这不是与“半死老鼠”的游戏,斯大林明显希望听到点什么。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沒有人知道了。

接着轮到了李可夫。他竭力回避布哈林的话题,抓住一些发言人的个别说法不放,同样给人造成了他并不理解所发生事件的决定性意义的印象。

2月25日,继续进行讨论。所有的发言人一致抨击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布哈林不时忍不住地大叫:“谎言!”“诬蔑!”“完全是胡说八道!”



可能,他后悔自己没有留在法国。1936年初他曾出差到法国,就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一事进行了谈判。当时,他怀孕的妻子也去了他那里。应该抓住机会成为不归者!但没有,他没能下定决心。

B. 尼科利斯基是一个侨居在外的孟什维克,他参与了文献的谈判工作,与布哈林有过长谈。尼科利斯基以此为基础写过一篇名为《莫斯科审判是如何准备的(一封老布尔什维克的来信)》的文章。这篇文章于1936年12月发表,当然,其中并没有注明消息的来源。

如果考虑到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成效,他们甚至窃取到了保存在尼古拉耶夫斯基那里的托洛茨基档案,那么可以认为,布哈林在法国的动向一定被报告给了莫斯科。包括布哈林要求弄到最近几期《反对派通报》,并说苏联“反人道主义的力量在增强”。

可能斯大林想从布哈林那里听到他对自己在巴黎的令人生疑的谈话和表达了想去拜访托洛茨基的愿望而表示忏悔?

全体会议成立了一个布哈林、李可夫案件决议起草委员会。政治局的所有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进入了该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有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布琼尼元帅、莫斯科州委书记赫鲁晓夫等36人。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莫洛托夫。

委员会审议了3个提案:叶若夫的提议是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并交军事法庭执行枪决;波斯特舍夫的提议是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党,交给法庭,但“不予枪毙”;而斯大林的提议是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党,并将案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实,他起初想到的只是流放。在斯大林发言后,只有马努伊尔斯基、科萨列夫、什维尔尼克和亚基尔表示赞成枪决,其他人都支持斯大林的意见。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决议把案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来处理。

在2月27日的全会会议上,斯大林通报了委员会的决议,并强调说:“不能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混为一谈,因为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是有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

被开除的布哈林和李可夫离开了会场,而在前厅入口处他们遭到了逮捕。

布哈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中一直呆到1938年的3月。为他提供了相当舒适的条件,他家中的藏书和打字机也被运去。在这里他完成了大部头著作《哲学短篇集》(310页)、一本诗集和自传体小说的前7章。有几首诗还是献给斯大林的。

如我们所见,布哈林的状况与其他同样受到影响的同事的状况是有很大差别的。从被捕到开庭有整整一年,这说明斯大林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也说明了他的犹豫不决。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把弥漫在莫斯科上空的密谋串通的阴魂都给挤压了出来,提交了上千页犯人(半有罪的、罪行不多的、稍微有罪的和



可能有罪的人)的供词。这是些掺杂了谎言和夸大了未来战争的大实话。

1937年2月3日,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Г. А. 莫尔恰诺夫被捕。至1936年11月,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政工局局长,然后被波斯特舍夫提拔到了这个位子。正是莫尔恰诺夫阻碍了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调查行动(用叶若夫的话就是“弹回了调查”)。现在是他应该陈述内务人民委员部存在阴谋集团的供词了。很快他陈述了这些供词,并以这些供词为依据开始了逮捕工作(亚戈达、保克尔、普罗科菲耶夫、沙宁、奥斯特洛夫斯基等)。阴谋的迷雾也笼罩了他们这些人。

与此同时,党的全体会议也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作出了决定。其中包括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程序问题。差额选举,这比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阴谋还要可怕得多,这直接牵涉到党的所有精英,并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日丹诺夫一开始的发言就震惊了所有的与会者。按照日丹诺夫的想法(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也是斯大林的想法),将取消对政治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所有限制、撤销“官僚机关”、消除各苏维埃组织在工作中的反常行为,而最重要的是,党的机关“应准备好投入到反对敌对候选人和敌对宣传的选举斗争中去”。

可以想象这些听到日丹诺夫发言的领导们的心情。他们有可能认为,又重新回到了“克伦斯基执政”的日子,或是被解散的立宪会议又回来了。这可是一名与斯大林特别亲近的政治局委员说的!那么如何将这些契卡人员的行动、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刚刚发生的对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布哈林和李可夫审判的事件,与这种不记名差额选举联系在一起呢?

不仅如此,日丹诺夫提醒道,“我们国家有200万名共产党员”,而无党派人士要“多得多”。也就是说,他并不怀疑,在选举中谁将依靠谁。

接着,报告人将话题转入了各级党的领导人的职责范围,并严厉批评了普遍存在的用增补领导人心仪的人员来代替选举的实际做法。日丹诺夫提议确立党的民主原则、消除不经选举的增补和“按名单”表决的情况、从公开投票转向秘密投票、确保否决候选人和对他们进行批评的“无限权力”。

严格地说,这里面没有任何革命性的东西,所有这些规则在党章里都有。但这在与宪法规定的选举创新的此呼彼应中,就勾勒出了总的民主化的明确方向。

日丹诺夫建议到4月1日前在所有的党组织中进行重新选举,但全会投票通过了柯秀尔和哈塔耶维奇的建议,将章程规则的重新确定工作推迟到5月20日。

与此同时,日丹诺夫(然后是加里宁)未能清晰地回答出有关选举法草案内容的问题,他们承诺在以后讨论草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出回答。

在对日丹诺夫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之后,一切变得清楚了:所有16位发言人都把自己的主要任务看作是“与‘敌对分子’加强斗争,而不是贯彻民主原则。也就是说,斯大林集团感到了来自党的领导层的出乎意料的团结,自己原来成了少数。

你们想要民主？而我们要求确保自己的权力！

斯大林集团当然不打算离开克里姆林宫，他们竭力用其他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如果差额选举的想法成了现实，暂时是不会非常成功的。现行体制将获得广大民众的自发支持呢，还是在外部猛攻和内部溃乱下轰然倒塌？

这就形成了一种印象，斯大林如同他在布哈林的问题上一样，持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立场。他应该是赞同奥尔忠尼启则关于近年来培养了“10万”苏联工程师的观点的。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够解释为什么莫洛托夫报告中突然出现了呼吁停止“寻找敌人”的盲目运动的调解热情。他提醒道，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数量在增加，而其中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三分之二的工人上过各种技术培训班。

莫洛托夫呼吁刹住对前托洛茨基分子进行镇压的加速运转的飞轮，制止这种带有破坏性的“迫害异端”。他举了发生在彼尔姆和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事件作为例子，那里党的领导人强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去逮捕大型工厂的厂长们。这些例子使听众们再次回到日丹诺夫报告的立场上来，并思考自己是否顺应了新的潮流。

在谈到工作方法时，莫洛托夫把事情转到了生产组织问题、工艺流程和执行技术规章的问题上。这是一个党务工作者束手无策，而得由专家承担主要角色的领域。

然而，在对他的报告进行辩论时，对待日丹诺夫的那一幕再次重演：发言人一致讨论了与破坏分子作斗争的问题。他们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部长会议主席在呼吁他们不要妨碍经济工作。

这样就出现了关于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彻底调整其活动的问题。在起“鞭策”作用的组织中，州委和人民委员部理应变为监督自己代表和培养干部的纯政治机关。

在全会的有关决定中，重点放在了各人民委员部（而非内务人民委员部）消除“使法西斯代理人得以进行破坏活动的原因”的工作上，也就是放在劳动纪律、遵守工艺流程、设备及时检查和维修、劳动保护和干部培养上。结果是，报告、决议和与会者的情绪毫不相符。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莫洛托夫发言之后，叶若夫做了第二次报告，讲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内与“破坏活动”作斗争的事情。他认为，莫尔恰诺夫是罪魁祸首，这几乎自然而然地把亚戈达置于了艰难的处境。按叶若夫的说法，到此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已经逮捕了238人。

参加辩论的有水运人民委员亚戈达、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局长Л. М. 扎科夫斯基、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内务人民委员巴利茨基、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局局长列坚斯、反间谍处处长Л. Г. 米罗诺夫。他们同意叶若夫所说的在亚戈达时期明显放松了与“敌对的地下组织”作斗争的观点，并在这方面指责了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本人自然不会指责自己，而是指责了莫尔恰诺夫）。

此外，对亚戈达提出指责的还有苏联卫生人民委员、1930年至1932年间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的Г. Н. 卡缅斯基，亚速海—黑海区委第一书记、1919年至1934年间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担任领导职务的 E. Г. 叶夫多基莫夫, 苏共中央执行委员、曾担任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和苏联检察长的 И. А. 阿库洛夫。

只有李维诺夫和维辛斯基两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评价不高。而且这位苏联检察长还强调了存在侦查员缺乏专业技能、令人无法容忍的无知和罪恶地歪曲事实的现象。

最后登上讲坛的是斯大林。他的报告明显说明了我们主人公内心的矛盾, 且远非在所有方面都支持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所讲的方针。

以下是斯大林报告的提纲:

外国间谍, 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和间谍活动涉及了几乎所有的经济、行政和党的组织, 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托洛茨基分子窃取了重要的岗位; 一些“我们的同志”由于粗心大意和宽宏大量导致了间谍分子的节节提升; 在发生了基洛夫遇刺、“列宁格勒案件”、对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集团案件的审判和中央委员会下达了关于提高警惕性的指令之后, “我们党内的同志”在政治上仍然是“近视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下所述: 他们陶醉于经济运动和“经济建设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 忘记了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互相进行间谍活动, 为什么他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对待苏联呢? 托洛茨基分子经历了政治的蜕变, 成了为外国情报机关卖命的“狂妄的无原则的危害分子、阴谋分子、特务分子和杀人犯的团伙”; “我们党内的同志”的错误在于, 他们没有觉察到托洛茨基主义的蜕变; 由于我们取得了成就, 而对“我们敌人的实力”估计不足。

“十分自然, 在这种自高自大、刚愎自用、迷迷糊糊的氛围中, 在盛大示威游行和喧嚣的自我吹嘘的气氛中, 人们忘记了某些对我国的命运具有头等意义的重要事实, 人们开始不去注意这些不愉快的事实, 如资本主义的包围圈、新的破坏活动形式、与我们的成就有关的危险等等。资本主义的包围圈? 这是胡说八道! 如果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包围圈又有什么意义呢? 新的破坏活动形式, 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 这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 所有的小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党的章程、党机关的选举制、党领导对党员群众的报告制? 这一切有必要吗? 值不值得忙于这些小事, 如果我们的经济在增长, 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越来越得到改善, 那么所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计划被超额完成, 我们的党就是不错的党, 党中央委员会也是不错的中央委员会, 那我们还要什么? 一群怪人坐在莫斯科和党的中央委员会里: 虚构出一些问题, 谈论什么破坏活动, 自己不睡觉, 也不让别人睡觉……必须打破和抛弃所有这些陈腐的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随着我们的每一步进展, 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就会日益停息, 随着我们成就的扩大, 阶级敌人就会逐渐臣服。这不仅是陈腐的观念, 也是

一种危险的观念，因为它将麻痹我们的人们，使他们被捕鼠夹子夹住，而给了阶级敌人恢复元气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可能性。

“相反，我们越是向前，取得的成就越大，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就越加凶狠，他们越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越要更多地危害苏维埃国家，越要更多地采取最极端的方式作垂死挣扎。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了苏联境外来自我们敌人的直接支持。认为阶级斗争的范围仅限于苏联境内是错误的。如果说阶级斗争的一头在苏联境内余波未断，那么它的另一头就延伸到了包围着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境内。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也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将继续进行拼死的袭击。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列宁主义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必须牢记这一切，并且保持警惕。”（《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1938年）》，第102、104、105页）

破坏分子通常在战争行动前和战争中从事自己的破坏活动。建成一个第聂伯河水电站需要几万人的劳动，但炸掉它只需几十个人。为赢得战役的胜利需要几个军团的兵力，而只要军队参谋部中有几个间谍就会导致战役的失败，等等。

如果“我们能够从下到上，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培养我们党的干部，在政治上锤炼他们，使得他们能够在任何国内和国际形势中清醒地判定方位……能够在解决领导国家的问题上不犯大错，那么我们就解决了我们十分之九的任务”。

党的领导层中，有3千至4千名高级领导，3万至4万名中层领导，10万至15万名基层领导。需要提高这些干部的思想和政治修养，“为这些干部注入新鲜力量，并以此扩大领导干部的队伍”。

为此，所有党组织的领导人应该挑选两个能够代替他的人，“寻找并培养他们”。

为了培养干部，必须开办各种课程；需要摆脱心软的“糊涂病”和政治上的近视，届时“任何敌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可怕了”。

如我们所见，无论是差额选举，还是生产纪律，斯大林几乎都没有谈到。与此同时，他报告中关于改组党的官僚机构的部分与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观点是相符的。这是给地方领导的一个信号，但有点不清楚，过于理论化。

共有24个人在这份报告的讨论中发了言，其中有15个人谈了要与“敌人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似乎他们并不明白，党的领导层想要他们做什么。

为开导他们，就有必要让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Я. А. 雅科夫列夫和中央委员会党组织机关部部长Г. М. 马林科夫上场发言了。两人都谈到，党内盛行的开除党籍的惩罚措施有些过分，也不太妥当，因为被开除出党的人数比“敌人”的数量还要多得多。马林科夫甚至引用了数据，说明托洛茨基分子在被开除党籍的总人数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一。例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将“敌人”开



除出党，仅仅是为了“要达到所需要的比例而已”。

此外，这位党组织机关部部长表示，许多第一书记在亲信中建起了一个围绕着自己的圈子，这是真正的个人小集团。

出乎意料的是，在属于斯大林集团的雅科夫列夫和马林科夫发言之后，与会者开始相互较起劲来。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П. П. 柳布琴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С. Е. 库德里亚夫采夫把在乌克兰共和国的所有失误和问题都归罪于波斯特舍夫，А. А. 安德烈耶夫攻击了舍博尔达耶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В. И. 波隆斯基指责了 Н. М. 什维尔尼克，而赫鲁晓夫则抨击了雅科夫列夫。

“我们党的干部”忽然间着急起来了。而斯大林的结束语又给他们添了一把火。

他提出了几点旨在缩小党的官僚权力的建议：把党组织从经济工作中解放出来；停止大规模“清洗”运动；提高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政治水平；用州委和边区委员会书记兼任的方法减少区委和市委书记的人数；对包括州委和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在内的所有书记进行强制培训和再教育；提拔储备干部以便作为他们的替代者。

很明显，大家原本指望斯大林说的是另一种论调。他要求党内有权有势的人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甚至做好被受过更好教育的干部取代的准备。换言之，他打算像伊万雷帝那样，用年轻“贵族”除掉老的“大贵族”。

按照斯大林报告所作的决议中，这种思想体现得极为明显：“我们党的领导”不再注意“我们的缺点”；偏离了对普通共产党员的“直接责任感”；抛弃了领导人的选举制原则；“缺乏对人们应有的关注”；“人为制造不满和愤恨”。

听到这些，任何一位中央委员都有可能在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宣布为‘破坏分子’！”

以这份决议为基础的差额选举，可能会彻底改变国家的政治局势。任何一位中央委员无疑都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担忧，从此以后他们的前途绝不是光明的了。

但拿什么来反驳斯大林呢？

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胜利地走完了工业化的道路，而其他国家为此往往需要100年的时间。斯大林粉碎了反对派。他与在中国和西班牙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斗争。他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

还能拿什么反驳他呢？

说需要喘口气，让自己享受一下无忧无虑的生活？这种话你说不出来。但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大多数中央委员只剩下了一种办法，即对创新予以消极抵抗，并试着运用自己的人数优势去对抗。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没有出席本次全体会议。而其他所有军事将领都出席了此次全会。



## 第五章

# 军事“领袖们”的覆灭

---

军事“领袖们”的覆灭、“军事政治阴谋”、地方党委实施反革命行动、全国各地的恐怖活动、“破坏性的”人口普查

---

在二、三月的中央全会之后，斯大林集团拥有了把已经开始的改革进行到底的一切可能性。这种改革以宪法和全会的决议为依据，同时还拥有战术上的武器（即与托洛茨基分子和“破坏分子”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但历史没有给斯大林这个机会。简单地说，他既没有足够的干部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以建立一种民主的管理体制。为了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转而实行两党选举制度，还至少需要国际的和平局势和受过教育的社会群体的奉公守法。而目前不具备的正是这些条件。

历史学家 Ю. H. 茹可夫第一个注意到了斯大林的这些想法与以恐怖为结局的现实之间存有巨大的脱节。他论证说，自下而上发动镇压“人民公敌”运动的正是党内的实权人物，他们竭力把政治对手从其所控制的区域清除出去。

各地党的领导人是一个支撑着国家的干部体系的构架，对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惊厥”。与此同时，苏联欲建立一个对抗德、意联盟的东方集团的想法也落空了。

1936年10月16日，斯大林在发给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狄亚斯的电报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苏联劳动人民提供给西班牙革命群众的力所能及的援助，仅仅



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们告诉自己,使西班牙摆脱法西斯反动派的压迫不是西班牙人自己的事情,而是整个先进和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璠莫夫 A.，《法西斯国际：征服欧洲》，莫斯科，2005 年，第 136 页)

西方,首先是英国,在两种威胁之间作出战略性决定时摇摆不定:是让苏联控制地中海,还是让德国和意大利在该地区得到类似的控制地位?西方选择“绥靖政策”是指望能够恢复原状,但这已是不可能的了。最后,唐宁街认为寻求与柏林达成共识更能令人接受,相应地,将不与莫斯科结成任何联盟。这意味着,苏联再度处于孤立状态。

我们要注意的希特勒对西班牙战争的立场。希特勒认为,佛朗哥将军的彻底胜利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战争应该继续下去,把英国、法国,甚至是意大利从中欧引开。

斯大林也不想陷在西班牙。西班牙的分量在他的头脑中要比“东方公约”轻得多。

但现在要改变什么已为时过晚。欧洲各国的相互安全体系未能建立起来。

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下,一颗小石子就足以打破平衡。那些认为我们的主人公只在忙于臆造出各种阴谋集团的人是错误的。历史不是这么简单造就的。

这里我们来研究一下破坏了所有刚刚开始民主化进程的“军事阴谋”。

时至今日,在历史研究中占上风看法认为,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阴谋,只存在某种“准阴谋”,也就是说,一些高级军方领导人见了面,表达了对斯大林集团政策的不满,以及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基尔与斯大林集团成员之一的伏罗希洛夫的冲突。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立足于所掌握的调查材料和间接罪证,认为阴谋还是存在的。

但无论如何,统治精英在惊恐不安地等待着,特工部门也有着相应的工作方向,这是明显的。这是完全可与“二战”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反对日裔美国人、“冷战”期间参议员麦卡锡委员会的活动和 1945 至 1948 年英国羁押持不同政见者的可怕条款相提并论的。那些时期嫌疑很容易演变成证据,而对政府的批评言论就等于背叛行为。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斯大林说了一句话,从中可以得知军队将面临一场震荡:“红军部队中有特务和国家的敌人。”他这么说是有理的。

1937 年 2 月 11 日,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的教父叶努基泽在哈尔科夫被捕。就在同一天,领袖的这位干亲家供认参与了反斯大林阴谋集团,并称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和普特纳是自己的同谋。

3 月 11 日,乌拉尔军区司令员 И. И. 加里卡维(亚基尔的连襟)及其副手 М. И.

瓦西连科被捕。

3月29日，亚戈达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务管理局前局长 П. П. 布拉诺夫、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和内务部队总局局长 H. K. 克鲁钦金被捕。

4月15日，工农红军装甲坦克局副局长 M. M. 奥利尚斯基被捕。

4月17日，政府保卫处处长 K. B. 保克尔被捕。

4月19日，莫斯科军区第九步兵军团军长 Г. H. 库塔捷拉泽被捕。

4月22日至2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前处长 M. И. 加伊和副内务人民委员 Г. E. 普罗科菲耶夫被捕。他们交代了与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科尔克、沙波什尼科夫、艾德曼和其他军事将领有关的供词，也供出了他们与亚戈达的联系。

4月27日，分管物资和技术设备补给的亚基尔的助手、前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 P. A. 彼得松被捕。在对他进行搜查时，他马上给叶若夫写了信，自愿供认参与了密谋，并称其同伙是叶努基泽、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和普特纳。

4月28日，保克尔的前副手 З. И. 沃洛维奇供认，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阴谋集团是存在的。

这张名单上的关键人物是亚戈达。如果我们回忆一下那个无可辩驳的证据，那个不能说是通过严刑拷打才获得的证据——其中谈到亚戈达“和我们在一起”的布哈林与加米涅夫在1928年的谈话记录，那么就很清楚为什么对准备谋杀斯大林的“线团案”的调查受到了阻挠。现在，当元帅和司令员们卷入了这场阴谋时，可以想象得到克里姆林宫领袖们处境的艰难。亚戈达在接受审讯中供认：“在右派的组织中，进行宫廷政变的想法已经成熟了。”

在当时递交给斯大林的一篇报告中说到，布哈林在个别谈话中承认已经准备好政变，并指出亚戈达出乎意料地胆怯。然而，亚戈达的敌对立场并没有引起怀疑。

接下来，事件如狂风巨浪般滚滚向前。随着调查工作的进展，事件开始变得清楚了：准备好反对斯大林集团的有军人、契卡人员和党内实权人物。他们并没有被一个统一的领导层合并在一起，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迫使斯大林迅速对军区司令员和高级指挥官进行换防，把他们从已经形成的关系网中抽调开来，然后再消除他们的危害性。显然，在被捕者交代出供词之后，军事阴谋集团的客观存在已经毋庸置疑。

斯大林知道，1937年3月中旬，乌博列维奇和费尔德曼来到位于索契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波浪”疗养院，拜访了正在那里度假的图哈切夫斯基。此外，费尔德曼还去基辅找过亚基尔。随后在4月初，图哈切夫斯基在莫斯科与克列斯廷斯基和罗森戈尔茨会了面。4月9日，图哈切夫斯基在自己的住处会见了亚基尔和科尔克（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图哈切夫斯基与亚基尔关系还比较好的话，那么他与科尔克的关系则相当紧张。而且，科尔克与负责斯大林个人警卫工作的保克尔相交甚笃）。



军方领导人的这种频繁往来是可疑的。按照斯大林的逻辑可以说,留给他采取措施防止灾难发生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就像后来莫洛托夫说的那样,当局知道政变的开始日期,因此能够抢在阴谋者之前采取行动。

莫洛托夫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作为一个进入迟暮之年的退休者,他大概已经忘记,在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整个 10 年中,斯大林集团一直面临着两大固定的威胁——外部入侵和内部反对派夺权。只因为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了“亚戈达和我们在一起”的话,或者叶努基泽和彼得松交待了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军方领导人参加了阴谋集团的供词,一段历史就发生改变? 无论你觉得多么奇怪,其实这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改变。的确,克里姆林宫的任何一名哨兵或契卡人员都可以一枪结束我们主人公无比艰险的一生。斯大林也知道这一点。

到 1937 年,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可以允许执政精英考虑领导人更换的问题了。紧绷了 10 年的发条可能要崩断了。

因此,在基洛夫被杀后展开了清洗党的领导层的斯大林,早晚都会与军方的政治小集团发生冲突。

继消灭了“半神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的小集团之后,他已经削弱了奥尔忠尼启则和亚戈达的小集团。按照这个逻辑,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认为自己是一股坚不可摧力量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将不可避免地或是不再成为这种力量,或是向克里姆林宫证明自己的优势。不幸的是,军人的意见表现在反对他们想换掉的国防人民委员和讨论当下的政治局势上了。将军们也涉及了反对斯大林的问题,但所有人都胆怯地停滞不前。只有图哈切夫斯基的老朋友费尔德曼试图让职位比自己高的同志们睁开眼睛正视临近的危机。费尔德曼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时任该军区参谋长,时任国防人民委员部指挥人员管理局局长。

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中有着一“德国的蛛丝马迹”。按照有关资料,德国的情报机关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转交了有图哈切夫斯基卷宗的“红色文件夹”,其中有证据表明图哈切夫斯基就是反斯大林阴谋集团的领导人。这件事在德国情报机关领导人瓦尔特·舒伦堡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按照舒伦堡的观点,德国领导层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定位:是指望西欧还是俄罗斯。与苏联合作的最大拥护者是总参谋部的代表们。

舒伦堡写道:“海德里希从白卫军侨民斯科布林将军那里获悉,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总参谋部共同参与了一场目的在于推翻斯大林体制的密谋。”(舒伦堡 B.，《迷宫》，莫斯科，1991 年，第 37 页)

德国帝国安全局领导人 P. 海德里希决定利用这条信息,使这些德国的将军们在

希特勒面前出丑,同时还能削弱苏联工农红军。行动的选择权交给了元首。

“这一时刻,希特勒必须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是站在西方大国一边,还是反对它们。在作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如何利用海德里希上报给他的材料。有了图哈切夫斯基的支持就意味着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可能要终结了。但一旦失败了,德国就会卷入战争。而且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揭发可能会有助于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力量,或者促使其摧毁自己总参谋部的绝大部分人。最终,希特勒决定供出图哈切夫斯基,站在斯大林一边介入苏联的内部事务。

“支持斯大林而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和将军们的这一决定,确定了德国直至1941年前的总的方针,完全可以被视为当代最不幸的决定之一。这个决定最终导致德国与苏联结成临时的同盟,并使得希特勒在对付苏联前,先在西方发起了军事行动。但既然希特勒作出了决定,海德里希当然会支持他。”(舒伦堡 B,《迷宫》,莫斯科,1991年,第38页)

在利用原有的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总参谋部通信的真真假假的手稿仿造好假文件之后,行动开始了。这一消息先被透露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信任的人。贝奈斯又把这一消息通知了苏联驻捷大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结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得到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卷宗,并为此支付了300万大面额的卢布。不过这些大面额卢布却无法在苏联使用,因为它们的编号都被登记了下来。据舒伦堡说,他亲手销毁了大部分的钞票,因为那时一名德国间谍试图在苏联境内用其结账,“但在极短时间内他就遭到了逮捕”。

按照舒伦堡的说法,卷宗是5月中旬转交的。而图哈切夫斯基5月22日就被逮捕。乍看上去,转交卷宗和逮捕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但事实上,图哈切夫斯基从4月开始就处于被加紧调查的状况之中了,而且他原定于5月4日去英国访问并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行程也因似乎有人要谋杀元帅而被取消了。因此可以确凿地断言,图哈切夫斯基的卷宗对于斯大林来说无非是多了一些文件来证明“阴谋”的存在。

但舒伦堡回忆录的可信度有多高呢?众所周知,他于1952年3月21日在都灵死于肝癌。他并没有留下所谓的回忆录。这个著作的内容来自他写给英国军情六处的报告和其被俘期间按英国情报机关要求所写的一个类似于自传的东西。

名为《舒伦堡回忆录》的书于1956年在英国首次出版。我们来注意一下这本书中的这样一个论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案件“导致德国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并且,正如英国的这本出版物所认为的,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希特勒做出了决定:在为进攻西方国家做准备时,通过与苏联结盟来保障自己的东部战线”。在这段文字中,可以读到那种为了“冷战”而对斯大林1939年签订苏德条约进行的传统指责,虽然这一条约签订的时间比1938年签订的德英(慕尼黑)条约要迟。

《迷宫》中记录的怪事暴露了英国编辑们的生搬硬套,让你简直想为他们的精细



工作而对他们脱帽致敬(只差一点点,他们就把1939年放到1938年前面去了)。

舒伦堡的另一个说法也值得怀疑:销毁了苏联现款。300万是个大数目,是合法所得,不一定非要用在间谍身上。

在俄罗斯文献中有一种推测,认为元帅案中的“德国的蛛丝马迹”实际上是想竭力削弱苏联和德国的英国军情六处的蛛丝马迹(A. B. 马尔季罗相语)。

但同时也证实了,“阴谋”是客观存在的。

投敌分子克里维茨基的笔记对弄清这个问题可能是相当有益的,但这些笔记也在军情六处的赞助下经过了文学加工。克里维茨基写道,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图谋不轨的消息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捏造的,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通过白卫军将军H. 斯科布林传给了西方。

的确,不管是舒伦堡还是克里维茨基都没有谈到斯大林是如何利用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卷宗的,因为我们的主人公没有从“红色文件夹”中找到什么可以拿到法庭上的证据,仿佛“红色文件夹”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一点就已经能够说明,斯大林手中握有足够的证据(而且在苏联档案中根本就找不到这个“红色文件夹”)。

让我们来注意一下苏联情报机关领导人之一的П. А. 苏多普拉托夫的观点。他断定,德国情报机关并未参与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方领导人的镇压行动。所谓参与的说法仅仅建立在“舒伦堡的谣言和狂妄自负上”。

其实,撇开特种部门不总是合理的逻辑不谈,让我们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掌握着令其信服的情报的权威领导人,为何要编出一幕莎士比亚笔下恶棍式的剧情呢?我们实际上完全重复了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交甚笃的约瑟夫·戴维斯的思想:“可以认为……人类的本性在任何地方大约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还是为从证人供词中获得的大量可靠的征兆而感到吃惊。假设这个法院的审理是编排出来的艺术性的政治悲剧的话,这意味着可以认为,这里面有像莎士比亚或贝拉斯科一样的戏剧创作天才。历史背景和周围环境同样增加了证人证词的可靠性。”(邓恩П.,《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们》,莫斯科,2004年,第130页)

总体上,这位大使认为苏联正重复着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只是规模要更大”。他写信给罗斯福,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的指挥官是具有“科西嘉式威胁”的“波拿巴主义者”。

但美国国务院和戴维斯的政治顾问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清洗是“斯大林的偏执狂”的表现。如果这种论点对于政治家还算能说过去的,那么对于研究者就未必如此了。

从1936年12月27日起至1937年4月初,即有3个多月的时间,图哈切夫斯基



按照政治局的决定一直在休假,也可以认为是半退休。斯大林在 1936 年 12 月 31 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存在一些有损元帅名誉的材料,他并没有对图哈切夫斯基隐瞒自己的怀疑。

1937 年 1 月 30 日,图哈切夫斯基的副官雅科夫·斯穆特内和 200 名指挥官(“托洛茨基分子”)被捕。

接着一批军方领导、叶努基泽、亚戈达和另一些契卡人员也遭到逮捕。

4 月 20 日,经斯大林批准的图哈切夫斯基去伦敦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出访被取消,也就是说元帅被限制离境。

从 4 月 22 日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就“图哈切夫斯基案”启动了严酷的审讯。

5 月 2 日,刚被任命为乌拉尔军区司令员的前莫斯科军区副司令员 B. C. 戈尔巴乔夫被捕,是亚戈达和其他契卡人员供出了他。

被捕的前旅长 E. 梅德韦杰夫是“克里姆林宫案”的主要嫌疑人之一,他早在 1934 年就已经从军队中退了役,退役前的职务是工农红军防空局局长。1937 年 5 月 5 日按照叶若夫的命令,梅德韦杰夫遭到了毒打,供认了存在一个由弗尔德曼组织的军事阴谋集团。

5 月 8 日,A. 科尔克被捕。

5 月 10 日,梅德韦杰夫供认,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不是科尔克,而是图哈切夫斯基,其领导层中还包括亚基尔、科尔克、普里马科夫、普特纳等人。

最后,由于采取了这些搞不好会掉脑袋的大胆而冒险的行动,叶若夫得以把“克里姆林宫案”扩大成可怕的“军事阴谋集团”。

5 月 15 日,B. 费尔德曼被捕,从他那里搞到了证实图哈切夫斯基罪行的主要证词。

当代历史学家复原了进行调查时当事人的心理动态:“非常明确的是,5 月 8 日他(即亚基尔)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参加了免去图哈切夫斯基第一副人民委员一职的讨论……他没有表示出对斯大林的坚决支持,但也没有维护图哈切夫斯基的利益。斯大林明白,如果图哈切夫斯基采取某种形式的反抗(这一点并不能排除),亚基尔是不会支持他的。但是斯大林也明白,亚基尔不是无条件忠于他的人,他并不可靠,如果命运‘垂青’于图哈切夫斯基,那么亚基尔就会‘背叛’他斯大林,而站到元帅的一边。因此 1937 年 5 月 8 日决定,从 E. 梅德韦杰夫口中不仅要拿到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还要拿到针对亚基尔的‘供词’,虽然斯大林和叶若夫的原计划中并不包含这一点。”(米纳科夫 C.，《斯大林和他的元帅》，第 620—621 页)

这可能是事实。而且在元帅被枪毙之后,继续进行的镇压扩大到了庞大的指挥官圈子,他们显然与“阴谋集团”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受到了那些刽子手般的侦查员的诬



陷。既然斯大林允许施加肉体折磨,那他实际上就给了叶若夫判断谁是罪犯的权力。

许多研究著作中说,斯大林并不知道被捕者受到了折磨。是这样吗?

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有根有据的答案。1934年9月份,主管中央委员会申诉局的M. И. 乌里扬诺夫把被捕的“拖拉机中心”工作人员A. Г. 列维斯写的谈到采用了非法审讯手段的信递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责成查清情况,并给亲近的同事下了指示:

致古比雪夫、日丹诺夫两同志:

我要请你们注意看一下所附的文件,特别是列维斯的便函。有可能,这两份文件的内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建议:

a) 责成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和阿库洛夫三人委员会去核实文件中所述的内容;

b) 释放无辜的受害者,如果确有其事的话;

c) 肃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采用特殊“调查方法”的人并惩罚他们,“要不留情面”。在我看来,事态很严重,需要彻底查处。И. 斯大林。(列斯科夫B.,《斯大林与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莫斯科,2003年,第166页)

委员会(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阿库洛夫、日丹诺夫)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但起草了一份文件,其中建议:

1. 需要根除非法的审讯方式。
2. 惩罚肇事者。
3. 重新审理列维斯和马尔克维奇的案件。

但这是在基洛夫遇刺之前的事情了。1934年12月1日后,斯大林对自己的敌人已经是另一种态度了。

对于这一大转弯最有说服力的文件,不久前才为大家所熟知。

密电。致各州委、边疆区委、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各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分局局长:

联共中央委员会获悉,各州委和边疆区委的书记们在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分局工作人员时,指出他们对被捕人员采取的肉体折磨是某种犯罪行为。联共中央委员会声明,从1937年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实践中采用的肉体折磨是得到联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同时指出,肉体折磨只能在例外情况下使用,并只适用于明显的人民之敌——在利用人道的审讯方法时,这些人卑鄙地拒绝供出同谋者,几个月都不招供,尽量拖延对仍逍遥法外的阴谋者的揭发,就是说,即使进

了监狱还继续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经验表明,这一指令取得了应有的效果,大大加速了对人民之敌的揭发工作。当然,后来这种肉体折磨方式被恶棍扎科夫斯基、利特文、乌斯宾斯基等人滥用,因为他们把肉体折磨从例外变成了常规,对碰巧被捕的诚实人也采用这种方法,为此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方法本身的执行,只要它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运用。众所周知,所有的资产阶级情报机关都会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实施肉体折磨,而且采用了最残忍的形式。那么试问,为何社会主义情报机关对资产阶级的资深间谍和工人阶级与集体农庄庄员的不共戴天之敌就应该更人道一些?联共中央委员会认为,肉体折磨的方法作为一种例外,今后在对付拒不投降的人民之敌时,理应作为一种正确和合理的方法继续采用。联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各州委、边疆区委、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在他们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时遵照本说明执行。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И. 斯大林。《《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锄奸局”(1938年—1946年)》,莫斯科,2006年,第14—15页)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明确一下:“肉体折磨”是从1937年4月起开始采用的。在有关档案中保存了斯大林亲笔批示,例如他在1937年9月13日作的批示:“痛打温施利希特,因为他没有供出州里的(奥伦堡,新西伯利亚等)波兰间谍。”(《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年—1938年)》,第352页)

毫无疑问,在“阴谋集团”被揭发之后,斯大林大为震怒,并开始失控。想必可以认为,他记忆中充满残酷和狡诈的哥萨克内战的场景被唤醒了。

但阴谋集团存在过吗?

斯大林是认为存在过的。这意味着,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现实中,阴谋集团确实是有存在空间的。从其波及的范围和对军方领导人的打击力度表明,其镇压心态是1934年12月1日(即基洛夫遇害后)震荡的重演。

图哈切夫斯基被捕后,叶若夫成为斯大林集团的显要人物,一个令人畏惧的宠臣。这个宠臣可以在任何时候向斯大林圈子里的任何人提出要求,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向领袖本人提出要求。

叶若夫启动的将被怀疑人的整个社交圈置于审讯的桎梏中并打出必要供词的机制,就像森林大火一样向四周蔓延开来。

在奇迹般从这种机制齿轮下逃出来的契卡人员米哈伊尔·施魏策尔的笔记中(《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自内部的报告》,莫斯科,1995年),就举了一个为了自救而反常利用“叶若夫习气”的极端的例子。在落入伊万诺沃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魔掌后,



施魏策尔谎称自己犯下了国家级罪行(必须在莫斯科审理),才得以从那里脱身,他被转到了首都。在首都,施魏策尔揭发了地方上侦查员的野蛮和个人名利主义思想,他们为了名利和在莫斯科谋得一份领导职务不惜逼供造假。施魏策尔是幸运的:他挺到了1938年底,直到叶若夫开始失宠,随后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为副内务人民委员,并以政治局的名义授予他特权(我们将很快来谈一谈这段历史)。

1937年5月10日,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在军队中恢复政委建制,也就是说,一长制被取代。各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为直属伏罗希洛夫管辖的军事委员会。这马上意味着三件事情:在指挥官之上设立了政治监察员(如同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军事专家之上那样);军队整体上不再受中央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督;此后只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两人能够调动军队。

这一切都是在梅德韦杰夫供出存在一个由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阴谋集团”之后发生的。斯大林集团开始迅速自卫。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些指责斯大林设计了这个阴谋集团的历史学家是否正确呢?

恢复政委这一制度给了一个彻底的回答:对斯大林来说,阴谋集团是存在的。

在5月10日当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也遭到改组。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第一副人民委员职务,被任命为普里沃尔日斯基军区司令员、任命叶戈罗夫元帅(免去总参谋长一职)为第一副人民委员、集团军司令员沙波什尼科夫成为总参谋长、亚基尔被调任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

5月11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召开了宣布这些调动的会议。梅赫利斯指责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科尔克、费尔德曼企图互相串通和谋反。被指控者(除了被捕的费尔德曼)表示要向中央委员会全会对诽谤他们的叶若夫提出控告。

11日深夜,斯大林出人意料地给图哈切夫斯基打去电话,并用平和的语气通知他,调他去普里沃尔日斯基军区的时间不会长,不应该把这看作是贬黜,另外应平静地对待梅赫利斯的指责。

图哈切夫斯基请求会见。5月13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这意味着,领袖还不想与他一刀两断。斯大林向他解释了调任原因:在元帅最亲近的圈子中有一些人指责他从事间谍活动(包括他的前妻尼娜·库兹明娜)。

5月13日,斯大林的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去世,享年73岁。因局势非常紧张,斯大林无法前去参加母亲的葬礼。

13日深夜,科尔克被捕。

5月14日,普里马科夫在审讯中报告,“托洛茨基的组织”认为亚基尔是取代伏罗

希洛夫担任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当之无愧的人选。

14日深夜,被从布特卡医院转往条件恶劣的列福尔托沃监狱的普特纳在夜间的审讯中供认图哈切夫斯基是阴谋集团的参与者。

5月16日,科尔克供认进入军事政变总部的有图哈切夫斯基、普特纳和科尔克。

5月19日(然后是5月21日和23日),费尔德曼继续供出了参与阴谋集团的40位著名军事将领的名字。

5月20日,斯大林从叶若夫处拿到了审讯费尔德曼的记录。叶若夫请求批准进行逮捕。

斯大林批准了。

5月22日,图哈切夫斯基在古比雪夫市被捕,并被押解到莫斯科。

5月24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出人意料地向记者们声称,斯大林的“政治生命”屈指可数了。

5月24日,政治局就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鲁祖塔克、图哈切夫斯基开除出党的问题进行了表决,并把他们的案件移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

5月26日,在与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和费尔德曼对质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否认自己参与了阴谋。但同一天,他在致叶若夫的声明中承认有一个阴谋集团,并且自己也参与其中。

5月28日,亚基尔被捕;5月29日,乌博列维奇被捕。

5月30日,以前坚决否认自己罪行的乌博列维奇在遭到毒打后,承认筹划了密谋,并说出了参与者的名字。

5月30日,根据由斯大林签字的政治局决议,对把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开除出党一事开始(画圈)签名。

当日上午,布柳赫尔来到加马尔尼克那里,并转达了斯大林提出的让他进入审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事将领的特别法庭的建议。加马尔尼克拒绝了这一建议。傍晚时分,加马尔尼克和另一位军事政委、也是亚基尔连襟的红旗勋章远东特别集团军政治部部长JI.阿伦施塔姆被解除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从军事委员会除名。

5月31日,布柳赫尔又来到加马尔尼克处。

国防人民委员部那时已经被契卡人员所控制。叶若夫已在伏罗希洛夫的办公室安顿下来。

在加马尔尼克的住所里,一个放有文件的保险柜被查封,而加马尔尼克本人被命令留在家中。他的副手包林和奥谢皮扬也被逮捕。契卡人员刚离开他的住所,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

所有的调查材料只有4位政治局委员可以查看,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



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这表明，他们已经不太信任其他人了。从笔录中可以得出结论，工农红军处于混乱之中。

不难想象，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对此有何感想，他们对受审者的供词又有什么反应。况且，他们之间是有比较的：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被捕者都在交待上签了名。为什么同时被捕的 A. B. 戈尔巴乔夫旅长和 K. K. 罗科索夫斯基师长并没有签字？为什么国内战争时得过殊荣的英雄们，没有能够找到精神和肉体的力量来挺过严酷的审讯？

6月1日至4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叶若夫、布琼尼和布柳赫尔），国防人民委员部各区、局 116 名指挥官应邀出席了扩大会议。

6月1日，伏罗希洛夫做了关于发现阴谋集团的报告。

6月2日，斯大林发言。他是这样开头的：“同志们，至于存在着一个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集团，我希望现在已经谁也不再怀疑了。犯罪分子的供词和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们的观察结果是如此之多，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这些都是事实，这里无疑存在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分子推动和资助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集团。”（《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1938年）》，第 202 页）

这份报告以其未说透彻的话给人造成了奇怪的印象。在谈到阴谋集团时，斯大林马上指向间谍活动，并一直抓住这一点不放。的确，他也批评了在这种政治语境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和人，给人一种徒劳无益的感觉。但是研究者注意到了报告人的狡猾，他有意识地把话题从反国家的阴谋往间谍活动，也就是背叛行为方面引导。这样一来，斯大林向指挥官们发出了一个信号，以使他们保持镇静。他特别强调了年轻指挥官们在西班牙所取得的成绩，并表示在“元帅们”纷纷变节的背景下理应大力提拔青年人。

但斯大林的发言使在座者陷入了惊恐之中。想必每个人此时都在自问，在自己的履历中是否有令人怀疑的事件，自己是否也会被打入被怀疑的行列。

在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期间，斯大林表现得很自信，看不到任何手忙脚乱的征兆。初看上去，这很自然：他刚刚在与敌人的对抗中再次获胜。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和加里宁忧郁地看着军人们，显示出的不是胜利者的喜悦，而是沉重的关切。他们应该预感到随着阴谋集团的被揭发，局势将越来越激化，拟定的民主选举也永远无法实现了。而这意味着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战争将长期紧张下去，类似的阴谋也将继续重演。

6月4日，从著名的军事将领中任命了 8 位审判员：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工农红



军空军部主任、二级集团军司令员 Я. И. 阿尔克斯尼斯；莫斯科军区司令员 С. М. 布琼尼元帅；红旗勋章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 В. К. 布柳赫尔元帅；总参谋长、一级集团军司令员 Б. М. 沙波什尼科夫；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一级集团军司令员 И. П. 别洛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二级集团军司令员 П. Е. 德边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二级集团军司令员 Н. Д. 卡希林；第六哥萨克骑兵军军长 В. И. 戈里亚切夫。

有一种顽固的观点认为，这是斯大林想让刚刚被任命的审判员们“沾上鲜血”，并以此获得他们额外的忠诚保证。但这种保证未必可以当真。实际上，在决定进行公开的审讯之后，克里姆林宫集团在努力向社会显示，工农红军的领导层保持着对国家的忠诚。

6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作出决议，成立最高法院专门法庭以审理军事阴谋集团的案件。6月11日开始了法庭审讯。当受审者被问及是否承认自己有罪的问题时，他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法庭辩论一直进行到15点休息。接着叶若夫和担任审判长的 В. В. 乌尔里希出乎意料地去了克里姆林宫进行汇报，虽然此时审判日刚过了一半。很明显，发生了什么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В. 列斯科夫说，叶若夫和法庭审判员之间发生了冲突：别洛夫指责叶若夫歪曲事实。列斯科夫写道，结果布柳赫尔、德边科和“另外三人”都支持别洛夫。这三个人就是阿尔克斯尼斯、戈里亚切夫和卡希林。

“就连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也动摇了。但他们还是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因为狡猾机智的叶若夫已经预料到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他提前为他们中的每一位审判员准备了20份被捕者揭发他们本人参与了秘密反对派的供词。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了乌尔里希，让他自己决定应该如何处理。审判长作出了最佳选择。结果是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在可怕的困惑中退却了。而这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列斯科夫 В.，《斯大林与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莫斯科，2003年，第411页）

与此同时，在通过了要营救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的决议后，两个步兵团在基辅、一个轻骑兵团在哈尔科夫分别起义，要求追究伪造者的责任。结果造反者被解除了武装，18名下级军官自杀身亡。

不难推测，长时间的法庭审讯可能会成为引起更大骚动的导火索。

因此，叶若夫和乌尔里希在克里姆林宫得到了指示：结束审判。斯大林的这一决定获得了在场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支持。

也就在同一天作出了枪决的判决。听到这一结果后，亚基尔歇斯底里地要求给他一纸张，并给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写去信函。他仍希望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清白。

特别法庭的警卫长伊万·谢罗夫（后来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了克格勃主席）大声



命令：“从大厅带到街上去！”

被判决有罪的人们在加强了警卫的押送下被一辆带篷的卡车运到了列福尔托沃监狱，并在那里被押进了地下室。

按照斯大林的建议，下达枪决口令的应该是布柳赫尔，但他断然拒绝。

被押到墙边的亚基尔高叫道：“斯大林同志万岁！”伏罗希洛夫开枪射中了他的后脑勺。

下一个被拉出来的是图哈切夫斯基，他喊道：“你们枪毙的不是我们，而是红军！”布琼尼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枪毙乌博列维奇的是叶若夫。其他人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弗里诺夫斯基、列普列夫斯基、卡尔佩斯基、尼古拉耶夫-茹里德和乌沙科夫执行枪决的。

他们的尸体被运往霍登田野，扔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撒上生石灰，并被快速夯实填平。

这些曾以世界革命来威胁世界并与白卫军官、喀琅施塔得的水手以及坦波夫的农民英勇作战的人们，就长眠在这无名坟墓里了。

1937年6月12日，《真理报》报道，“社会主义司法机关的利剑砍在了卑鄙的军事间谍团伙的脑袋上了”。随即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对“人民之敌”的声势浩大的斗争运动。

该谈谈最高苏维埃的民主选举了。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说明这个问题更合适的了。此外，斯大林集团与地区帮派领导人的相互关系也有待改善。

1937年6月27日，斯大林从叶若夫处收到了被捕的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务工作者马利诺夫写的申明。马利诺夫说，远东边疆区委书记И. М. 瓦列伊斯基“在评价И. В. 斯大林的出众品质的同时，也认为他是一个难以共事、让人产生压迫感的人”，并且“甚至几个政治局委员”也感觉自己不自由，“似乎在某些方面有罪一样”。马利诺夫还说，瓦列伊斯基经常随身带着自己的亲信，而这些人从党的角度看是“不合时宜的”。

显然这触犯了斯大林。他把这份呈报分发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甚至加上了一句写给瓦列伊斯基的话：“瓦列伊斯基同志！您想不想了解一下并非无名之辈的马利诺夫的供词？敬礼！И. 斯大林。”

瓦列伊斯基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党务工作者。1918年7月，在镇压东方面军司令员穆拉维约夫暴乱时，他就与图哈切夫斯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自1928年出任中央黑土区委第一书记以来，瓦列伊斯基一直在积极推行集体化运动。

瓦列伊斯基给斯大林的回答很有个性。其中显示出来的如果不说是敌意的话，那么至少是公然的粗暴无礼：“至于我一直以来和现在是如何与形形色色的破坏分子

作斗争,或是如何书写自己的政治路线的,我并不缺少布尔什维克的良心。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敬礼!”(《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1938年)》,第231页)

瓦列伊基斯好像在说:“我看不到自我证明的必要,甚至很惊讶,您竟然如此一派胡言。”从这里可以听出一位严格军人和组织者的声音,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人。

对于重建政权体系的斯大林来说,这些仍保留着国内战争指挥员心态的领导者已经不再需要了。

但他们是否需要斯大林呢?

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出发——正是斯大林预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认为备战是主要的任务,那么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是需要的。所以,这一状况是精英内部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苏联的军事经济在战争年代超过了‘整个欧洲军事工业’的经济”(霍赫洛夫 E. B.,《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苏联军事经济》,圣彼得堡,2005年,第131页)。虽然苏联经济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在很大程度上要比德国的经济逊色,但由于整合了所有的资源以满足国防需要,苏联达到了其他参战国无法达到的集中程度。E. B. 霍赫洛夫强调,“国家计划不应该将互相敌对的各大集团的‘利益套在一起’”,我们补充一句,因为斯大林清除了哪怕可能会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削弱统一管理体系统一切东西。除此之外,他实际上就是国家首要的预测和执行者。苏联巨大的潜力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但同样这也是悲剧性崩溃之所在。

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地方领导者们是需要斯大林的,虽然他们不时地试图削弱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控制。这种对抗是苏联政治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要依靠地方上的党的机关人员,并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的严格监督对他们加以严格控制,而地方上的“诸侯们”一方面需要中央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时常渴望摆脱这种监督。

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教养、缺乏经验,通常又是非常年轻的新精英代表们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但他们毕竟在尊重传统与合法性上还有欠缺。”(霍斯金 Дж.,《苏联历史》,斯摩棱斯克,2000年,第214页)

在这一时期,只有斯大林这位“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和现代化的领袖具有这种合法性,虽然也还远不是囊括一切的。

霍斯金注意到,只有战争才最终赋予了苏维埃的精英们这种真正的合法性,但他没有说明这是为什么。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人民的爱国主义成了这一体制的真正基础。但这里要补充一点,即后来斯大林本人所说的:前3个五年计划为战争做了准备,也就是说,这一合法性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已经成熟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甚至斯大林的敌人托洛茨基在这一主要问题上也是与之相一致的:在斯大林统



治时期,需要防止任何敌人,以保卫劳动人民的国家,并为苏维埃联盟战斗到底。连托洛茨基都这么认为,那么党的工作人员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里让我们回到对斯大林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上面:政治体制的基础以及克里姆林宫与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

5月底,各地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同时马上就出现了地方领导层不允许新生力量参与管理的情况。不管是自由讨论还是无记名投票,几乎所有的市委、州委、边疆区委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们都得到了压倒多数的选票。Ю. H. 茹科夫认为,接下来对地方领导人的镇压,可以解释为是斯大林集团为实行差额选举而进行的斗争。

1937年6月2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会。根据政治局的提议,全会上一下子把26人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其中有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H. K. 安季波夫、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副部长B. Г. 克诺林、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B. A. 巴利茨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地方工业人民委员И. П. 茹科夫、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Л. H. 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地方工业人民委员C. C. 洛博夫、东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И. П. 鲁缅采夫、库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Б. П. 舍博尔达耶夫、敖德萨州委第一书记E. И. 韦格尔、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H. M. 戈洛杰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共事业人民委员H. П. 科马罗夫。

加上又以书面咨询方式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13个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一共有39人被开除。而在1937年5月1日,中央委员会一共也只有120人。

Ю. H. 茹科夫写道,差额选举的反对者得到了直接的教训。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既不属于“右派”反对派,也不属于“左派”反对派,而且正是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支持者的斗争中获得了升迁。几乎他们所有的人受教育的程度都较低,而且对自己从事的职业环境知之甚少。

根据全会的进展情况,可以得出结论,主要的议题就是干部的更换。在关于最高苏维埃即将面临的选举之程序的报告中,雅科夫列夫警告说:“用这一个或那一个官僚集团的裁夺来代替法律的实践是反苏联的行为。”他还建议取消党章中关于在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组成党小组的条款,以避免共产党员对已通过的决定施加压力。“新型干部”的主题如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之中,先后得到了A. И. 斯捷茨基和莫洛托夫的响应。

这位部长会议主席使具有革命前党龄和有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经验的老党员与“在新的地方能够按照现行的基本要求,坚定、渐进、合理并熟练地执行党的政策”的新的工作人员对立了起来。

Ю. H. 茹科夫认为这是“对党内权势分子的公开挑战”,而党内的权势分子则用

在当地对一部分积极的民众，即对竞争者进行镇压以作回应。结果是，斯大林集团非但没有替换掉这些“废物”（按莫洛托夫的定义），反而受制于这些“废物”的意志。

但一切未必这么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的是：找到危险的交叉点，在此基础上勾画出阴谋集团各种各样的架构，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出评定，对这些角色的履历和关系做出分析。

因此在枪毙图哈切夫斯基和六月全会之后，契卡人员积极活动的浪潮与各个地区领袖寻求保护以免受到克里姆林宫新制度影响的行为是相符的。

1937年6月28日，政治局出台了关于“在西西伯利亚被流放的富农中发现有起义组织”的决议。决议有两项：一是对起义组织领导人采用极刑；二是“为加快”调查，成立一个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西西伯利亚分局局长米罗诺夫同志、西西伯利亚检察院检察长巴尔科夫同志和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艾赫同志”组成的三人小组。

艾赫是革命暴力思想的化身。他参加过图拉州征粮队的组织工作，领导过围剿队，并在西伯利亚粮食危机时期（当时斯大林去了那里）表现突出。从1935年2月1日起，艾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治局关于西伯利亚叛乱分子的决议原本可以视为一个插曲，但7月2日又出台了下达到所有州委、边疆区委和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关于反苏分子”的决议。其中谈到，从流放地回来的大部分前富农和前刑事犯是“各种反苏联和破坏行为的主要罪魁祸首”，建议对所有的返回人员进行登记，逮捕其中特别敌对的分子，并由“由三人小组按案件管理条例”来枪决他们。决议同时建议在5天内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各地“三人小组”的人员名单以及“应被枪决和再流放的人数”。

从7月5日起，中央委员会开始逐一确认“三人小组”的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分局局长被任命为小组主席。如果由州委书记们担任主席的话，还可以说他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在契卡人员的监督下工作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叶若夫方法的实施本来就应该掌握在契卡人员的手中。

这样，党的领导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就在审判中相向而立，彼此都把对方视为竞争者。这种情况无疑使双方都扩大了受害者的数量。（结果，在赫鲁晓夫为这些人恢复名誉之后，未曾经历过这些风浪的人们开始觉得，所有遭到镇压的人都是无辜的牺牲品，且觉得镇压的缘故只是领袖有“偏执症”。）

但事实却是：把审判权交给“三人小组”之后，克里姆林宫集团却失去了支柱。叶若夫变得越来越强势，而地方上的书记们则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琢磨。

很快，一个叫库利亚金的共产党员致信中央委员会，揭露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M. M. 哈塔耶维奇犯有敌对活动罪。哈塔耶维奇在上任后“带去”众多“原来是人民之敌”的老同事。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中。他下令“最严格地审查名单中列出的所有人”，并在某些姓氏旁标上了“逮捕”二字。



人们可能会问,难道斯大林能远程确定敌人吗?未必如此。这表明他缺乏信心。就与精英层的关系而言,主要的证据要么是因为恐怖手段,要么是因为差额选举。

不过,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样的选择应当束之高阁。

斯大林对 1937 年 8 月 27 日通报的在坎斯克面粉联合加工厂发生火灾消息的反应就很可能说明问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份通报中说,“敌人把该联合厂搞得混乱不堪”。斯大林在密电上批示:“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索博列夫。面粉联合加工厂的纵火行为应该是敌人组织的。请采取一切措施找到纵火犯。对罪犯进行快速审判。判以枪决,并把枪决结果公布在当地的报刊上。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1938 年)》,第 329 页)

对于克里姆林宫的高层和统治集团来说,困难的日子来临了。斯大林的桌子上,除了一叠叠告密信和有关增加了枪毙和流放配额的报告之外,还摆满了外交通报。

世界局势同样未见光明。

还是在 1936 年 5 月 29 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就记下了希特勒对外政策的计划:形成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联合国家”。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先是侵占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依次是波兰、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也就是说该计划实现了。

至 1937 年夏,西班牙继续上演着世界大战的前奏曲,英国和法国在寻找逃离正在逼近的灾难的出路,而日本则在为进攻中国做准备。

1935 年 3 月 29 日,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根据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的回忆录所述,“艾登极其不安”,而斯大林“沉着而冷静”。我们的主人公根据情报机关提供的资料说道,现在爆发战争的危险要比 1914 年更大;那时候只有一个危险策源地——德国,而现在有两个——德国和日本。艾登对此表示同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伦敦将成为苏联的盟国。

原因在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国债从 1914 年的 6.5 亿英镑攀升到了 1919 年的 7.82 亿英镑。而到 1938 年,其国债并没有能大幅减少。

这样一来,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伦敦只好将第一把交椅让给了纽约。英国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也影响到了整个帝国的稳定性:对外贸易赤字增加、受到美国投资的自治领地越来越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兄弟”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真正的贸易战。为了阻止美国人的扩张,英国人在所有的英联邦国家中确立了贸易关税优惠的政策。但美国资本还是流进了英联邦的成员国内,而英国的经济从外债上可以看出也越来越依赖于美国。

正是这种情况迫使英国领导人为赢得时间和掩盖自己的虚弱开始竭力赞同进行裁军。而此时距离慕尼黑只有半步之遥。



纽约已经把伦敦从拉丁美洲排挤出去，现在正竭力把它从太平洋地区赶出去，而在太平洋地区美国与日本的利益也发生了冲突。美国在全世界投资，甚至包括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加固并未使美国感到有多少不安。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通过集体安全体系来防御德国的斯大林集团显然就不太走运了。伦敦作为巴黎的老伙伴，并不想与柏林发生冲突。正如丘吉尔尖刻地指出的那样，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是想“骑老虎”。

恐怕全世界只有苏联、德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对即将到来的劫难有清楚的认识。

7月29日，张伯伦告诉苏联大使迈斯基，他想“与希特勒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并逐条过一遍他所有的意见和要求”。也就是试着与之达成协议。

这未必是错误的想法。当时所有的人，也包括斯大林在内，还都指望着能够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斯大林并不怀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除了害怕花费额外便士用于装备的张伯伦之外，英国的统治集团里也还有不同的人。

丘吉尔以战斗性的文风描述了自己与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的一次会晤。“此次会晤是在1937年举行的。里宾特洛甫说，德国需要为增加的人口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为此它不得不‘吞并波兰’，而且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是德国所必不可少的’。他请求英国人不要进行干涉。丘吉尔对此予以了坚决反对：‘即使法国是完全安全的，英国也永远不会失去对欧洲大陆命运的兴趣，去允许德国来建立自己对中欧和东欧的统治。’当我讲这句话时，我们是站在地图前面的。里宾特洛甫突然转过身背对地图，然后说道：‘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元首对此已经作了决定。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91年，第1卷，第102页）

193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柏林与希特勒会晤时建议在“四项公约”和“授权希特勒在中欧和东欧自行其是”的基础上建立同盟（迈斯基 II.，《一个苏联外交官的回忆录》，莫斯科，1987年，第337页）。哈利法克斯甚至具体说，“不应该排除改变欧洲现存状态的任何可能性”，并指出了方向：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英国人多半觉得自己是机智的外交家，以为可以用最小的损失避免巨大的支出。尽管他们当时已经能够预计到下面这样的结果了：弗朗哥将军会由于他们的绥靖政策而获得胜利，并将用对德国友好的方式来掌控通向地中海的入海口；在占领奥地利后，德国离巴尔干半岛和作为英国主要能源基地的油田只有半步之遥了；在拿下“但泽走廊”之后，德国将同东普鲁士统一，并开始波罗的海上占据支配地位；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工业潜力将大大加强德国的国力。

那么张伯伦到底在指望什么呢？



当然,英国人是很容易推算出这些结果的,但他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接下去希特勒一定会与斯大林打起来。否则就难以理解他们的逻辑了。

但如果像我们过去那样去指责英国人要两面派(当然,别人也指责我们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类似的评价只会模糊战前关系的特点。

对英国来说,有利的是,让希特勒尽可能深地进入到东方和苏联,因为这样一来,希特勒就会在西方显得软弱无力。苏联确实是在为签订反希特勒的东方公约上做了很大努力。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指责斯大林。

如果纵观全局,那么这其实是一场残酷的竞技,在这场竞技中每个人都希望骗过对手。

应该认为,伦敦采取的新方针(慕尼黑路线)本应该马上使斯大林从闹得越来越凶的被称为“叶若夫习气”的对内恐怖活动中清醒过来。(有时候也使用“斯大林习气”这一同义词,而这从历史的角度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现象的本性:惩罚机器与地方官僚机关的相互结合。)

手中握着变了形的东方公约的斯大林应该作出选择:或者与党内权势分子继续进行那场他们已经从中增强了力量的不公开战争;或者放弃对非共产主义民主精英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恐怕他甚至连作这样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从1937年秋至1938年春,斯大林收缩“叶若夫习气”的决定逐渐成熟。很难说,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事情有点不妙的。可能,有关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资料是他产生怀疑的原因:1936年的工业增长率为28.8%,而到1937年这一指标降至11.1%。

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呈报的文件中,斯大林看到了存在大量敌对行动的令人恐慌的画面。根据他的批示可以判断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他的指示有:检查、逮捕、转为公开审判、枪决、从边境地区迁出等。要是不知道民主选举的建议是他提出的,那么简直就可以认为这个人是恐怖大王或者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但是,丘吉尔也突然产生了类似的情绪:“众所周知,当时在英国有2万名有组织的德国纳粹分子。作为战争前奏的破坏和暗杀活动的狂潮,与他们以前在其他友好国家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官方的警卫,我也无意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我认为自己相当引人注目,应当采取预防措施。我掌握有足够的信息,可以确信希特勒认为我是他的敌人。我过去在苏格兰场当侦探的朋友汤普森监察员此时已经退休,我建议他带上手枪来我这里住。我也找出了自己的还挺好的武器。于是我们就一个人睡觉,另一个守夜。这样就没有人能够突然袭击我们了。在那些日子里,我知道一旦战争爆发(谁会怀疑这一点呢?),重担将落在我的肩上。”(丘吉尔 V.,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83页)

这是一段对1939年9月1日前的记录,也就是说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这位勇

敢的英国人也开始紧张起来了！请您注意，甚至“破坏活动”这个词也出现在了他的话里。

至于那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就更不用说了，他知道大多数居民都不同程度地对当局心怀不满。

况且，莫斯科对战争的紧迫感，比伦敦要真切得多。

1937年7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爆发了：日本进攻中国。

但令人吃惊的是：7月19日，苏联边防军占领了布拉戈维申斯克以东阿穆尔的两个岛屿，向日本控制之下的中国东北展示了威力。这是一种虚张声势。

8月8日，日本人占领了北平。

10月17日，在捷克的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区制造了混乱。

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议。

战争简直就是在这座大厦的窗户下进行。

但是，以《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身份作掩护，在东京工作的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传来了一个令人颇感安慰的消息。由于德国在中国展开了非常积极的活动（德国在蒋介石军队中派有顾问并供应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日本人开始放慢了侵略苏联的计划。日本人是无力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

苏联时常既担心来自西方的，也担心来自东方的袭击。苏联领导人未必已经忘了国内战争期间日本人是如何计划占领整个东西伯利亚的，只是因为有了认为日本此举将危及其自身利益的美国人的参与，才阻止住了东京。现在莫斯科同样不得不既要指望由布柳赫尔元帅指挥的独立红旗军，还要指望在东南亚地区不断争抢控制权的英、美两国。

英国素来都是利用地缘政治进行制衡的世界冠军，善于建立联盟以对抗自己的竞争者。伦敦在整个历史长河中都善于应对世界性的冲突（在日俄战争和在俄国二月革命中都有英国人的参与），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国军事作家约翰·富勒是这样给战前哲学下定义的：“从都铎王朝起至1914年，英国都在力争保持力量的均衡，也就是说通过角逐去分化大陆上的各个强国，保持它们之间的力量平衡。从力量均衡的角度看，很明显就能看出谁是潜在的敌手。敌人不一定是最恶劣的国家，而是那些比其他国家更能威胁到不列颠或是其整个帝国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通常都是大陆上最强的国家，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在和平时期总是站在次强国家或是其联盟也稍弱于最强国家的国家集团一边。本着这一原则，英国人从来不求消灭对手，因为这将永远打破力量均衡。他们的战争目标是削弱最强的国家，以恢复力量均衡。一旦最强的国家被削弱到了所需要的程度，那么和平谈判也就开始了。”（富勒 Д.Ж.，《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战略和战术综述》，莫斯



科,2006年,第20页)

富勒写道,由于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法国成为欧洲大陆最强的国家,而在法国占领鲁尔之后,“英国回归了自己的传统政策,开始维护德国的利益,为的就是与法国抗衡”。与此同时,我们要重复一下,英国恢复了金本位的金融体系,并在1931年前与美国展开了贸易战。而正是“这场贸易战耗费了英国有限的财源,以至于能留给英国武装力量的资金实在是太少了”。

从英格兰的传统战略来看,是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在西班牙采取“绥靖政策”的。英国人不希望共和党人以及相应的法国的力量得以加强。因为一旦共和党人获胜,那么法国将得到最主要的战利品:对比利牛斯和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再加上东方集团的因素,法国将在整个欧洲占据优势地位。

希特勒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需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赞成与英国结盟。“但是这种结盟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奉行的易货贸易协议和出口补贴政策对英国和美国商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富勒 Д.Ж.,《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战略和战术综述》,第26页)

也就是说,德国把西方民主从自己的市场挤了出去。

一句话,在决定性事件发生之前,英国的政治领导人处境非常糟糕。唯一的出路就是想方设法避免与希特勒发生战争,并直接把希特勒引向他的所谓“生存空间”,即其在《我的奋斗》中视为主要战略点的俄罗斯这一边。但这现实吗?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战略教训,就是使德国意识到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是不可能取胜的。因此,在西线没有得到保障之前,希特勒不可能指望在东线取得战役的胜利。不管怎样,英国都处于已恢复元气的德国这个巨人的瞄准之下,波兰和法国也是一样。富勒进一步指出:这些国家(我们来补充一下,实际上就是新协约国)背后站着的是美国。德国需要在大洋彼岸的“可怕力量”反对它之前,不管以任何代价先摧毁其在欧洲舞台上的敌手。由此产生了闪电战的战略,或者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德尔布吕克下的定义就是“毁灭战略”。

在苏联,图哈切夫斯基曾是这种战略的支持者,虽然整个俄罗斯军事历史显示出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采取长期的军事行动,并利用巨大的地理空间,以耗尽敌人的进攻热情,也就是说消耗战略。1812年抵抗法国拿破仑的战争(对这场战争最感兴趣的就是英国),以及造成俄国在战略上不可战胜这一结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表明,地理空间是无法逾越的。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脚本早就刻写在历史的模板上了,主要的政治竞技者们应该仔细加以阅读。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达拉第、希特勒,还有墨索里尼是不同的人,但他们所有人都植根于同一种欧洲基督教的传统。运用黑格尔的思想可以说,他们的行动完全

不是由他们本身的优劣所决定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斯大林的处境之艰难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美国参战时，局势对于罗斯福来说却是只赚不赔的。毛泽东提出要从总体上去评价斯大林，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日本和德国经常打破世界的力量均衡，苏联成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对抗阵营布局中决定性的因素。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斯大林站在哪一边。

斯大林不能相信任何人，但其他人也同样不相信别人。尽管彼此互不信任，但无论如何，防御联盟还是要成立的。但与谁联盟？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

1937年11月8日，在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之际，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非官方的聚会上，斯大林提议为新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们干杯。此外，他还阐述了几个重要的思想。

第一，苏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其内部经济和政治紧密相联（这有别于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能使敌人处于恐惧之中。

第二，苏联是一个为人民的国家，在国内各个平等的民族中，“最苏维埃化和最革命的”民族就是俄罗斯族。

第三，任何想削弱苏联力量、“哪怕是梦想”从这个国家切下即使是一小块领土并且“把这一小块送给某个保护国”的人，将被“满门抄斩”。

最后一段话我们已经从季米特洛夫的笔记中得到了认证，但这时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已经做好了不惜以任何代价来夺权的准备，并商定把乌克兰让给德国人，把列宁格勒、巴库、外高加索和高加索、中亚让给英国人，把远东和滨海地区给日本人，而顿巴斯、克里米亚和黑海则交给法国人。他们的目标只是在国家的中心地区保留一块土地狭小、经济衰弱的地盘。这也是为什么要消灭任何企图破坏苏联完整的人的原因，即使他曾经是领袖。

这些话让人想起了“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托洛茨基在1927年的慷慨辞职。托洛茨基说，如果战争爆发，那么首先需要推翻斯大林体制，然后才是自卫。

为了理解我们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他对国家所受威胁的态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对儿子瓦西里说的话：“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但它传达的意思却很准确。但是苏联很大，在它之内有很多社会群体，远不是所有群体对斯大林都惟命是从的。

就在11月8日，斯大林承认，在列宁去世后，与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相比，他在党内的认知度要低一些（“我同伊里奇有什么可比的？我是一个粗人”；“同他们的演说才能相比，我是一个不好的演讲者”）。那为什么党却选择了斯大林呢？按照他的想法，个人在历史上会出现和消失，而人民是永存的，人民永远也不会犯错；反对派从不考虑“中农大众”，而斯大林则善于就事论人。



很明显,斯大林忘了,在列宁去世后出现的旨在反对托洛茨基的“三驾马车”中,他斯大林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此时,在斯大林说这些话时,其实另有深意。斯大林想表达的是,他是与人民在一起的,他斯大林就是“中农大众”,而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是不可战胜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段即兴式的祝酒词,它热情洋溢、乐观向上,带有某种对往事的注解和对敌人的诅咒,但节日的气氛并不浓郁。

1937年12月10日,斯大林从叶若夫那里得到了一份前日本驻莫斯科武官助理和谷大尉的名为《苏联内部状况(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分析)》的综合报告。

其中的某些观点如下:

“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斯大林想达到国内的政治稳定并保证他有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的自由”,这是进行清洗的依据。

看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是在担心会发生国家政变。

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

镇压就其总规模而言强烈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现在,斯大林的独裁得到了加强。红军仍然拥有足够多的高层指挥官。

在1935年前,国防体系是建立在只与一个敌手进行战争的思想上的,并没有考虑在西方和东方同时受敌的情况。从1935年起,采用了在东、西战线同时作战的战略。现在实施了为期两年的扩军计划,并将于1939年年初完成。军队人数将达到180万人,步兵师将达100个,轻骑师将达37个,航空兵旅将达60个,机械化军团将达10个。苏联拥有生产大批飞机的能力,现在已生产了6000架。航空俱乐部的数量在半年内从30家增加到了167家。

这位日本间谍还进行了一些自己的观察研究: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航空队的补给和航空技术的进步取决于新工厂的建设和科研机构的专心致志,但在平时,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最重要的问题是培养和补充飞行人员。俄罗斯如今当然是军队在训练飞行员,不过还有一个民用航空队在培养民用飞行员,尽管其人数并不多。但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所进行的航空普及和教学工作值得引起我们最大的注意。在去年11月份的苏维埃会议上,空军参谋长赫里平表示:“德国宣布拥有7万名飞行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拥有10万名。”会场对此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就在第二天,列宁格勒一家工厂的工人们紧跟着呼吁:“10万名飞行员太少了,我们要培养15万人。”这被落到了实处,现在俄国正在培养15万名飞行员。这种大规模培训大概是从去年年初开始的,是在空军参谋部的领导下通过国防和航空化学



建设促进会的民用航空俱乐部系统来进行的。这种俱乐部遍布各地。早在前年末,航空俱乐部就已经有137个了。每个航空俱乐部大约有10架教练机,学员通常在20人左右。参加训练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通过这种形式,到前年年底,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一共培养了2850名相当于三级飞行水平的飞行员。(《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1938年)》,第453页)

和谷大尉从这一观察研究中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我敬佩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这个问题上。”换言之,他向极有可能成为自己国家对手的一方垂首致意。

文件上标注有:“我的档案。斯大林。”这意味着,这份资料非常有价值。

但这里面有什么是斯大林所不知道的呢?难道就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作者在警告日本政府,对苏联力量估计不足会有危险?

在胜利号角和工业化建设真实成就的轰鸣声中,传出了一个刺激和不安的信号。这个信号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扩大居民再生产”的想法破产了。这个想法是建立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方预测上的:“1937年全国人口数量将达到1.8亿人,而1939年将为1.83亿。”根据这个预测,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在1933年底,苏联人口数量已达1.68亿。(日罗姆斯卡娅B.Б.,《俄罗斯1930年间的人口历史:放眼未知之事》,莫斯科,2001年,第36页)

而实际上,由于1932年至1933年间,人口死亡率上升,甚至超过了出生率,人口数量大幅减少。看到这一点,制订计划的机关明白,他们的预测是不现实的,需要采取点什么措施,以掩盖人口的减少。因此1936年开始禁止堕胎,这一措施起初使出生率得到了一些增加,但随后却导致了因非法堕胎而使得妇女死亡率上升的情况。

1937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出苏联人口总数为1.62亿人(这次普查被宣布为是“有害的”)。

禁止堕胎的历史让人想起了突击集体化和向农村供应拖拉机乐观计划破产的历史。期望的是一种结果,而得到的却是另一种结果。

## 第六章

# 斯大林的政治改革遭失败

---

斯大林政治改革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亚洲、莫斯科和伦敦都想利用希特勒、日本情报机关对苏联国防能力的认知、布哈林之死

---

不管怎样令人惊讶,苏联实际上是沿着古老的历史道路在前进。在这条道路上,俄国的命运总是三年中一年和平,两年战争,而国家首先是一个防御机构。外部威胁的总和促使斯大林作出了违背他实行民主选举的本意和将自动调节机制纳入管理过程的决定。屈服意味着承认地方领导人的胜利,而不屈服意味着要遭受到更多的失败,如果不说是遭受灾难的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图哈切夫斯基的密谋、巴塞罗那托洛茨基分子的暴动、东方集团的瓦解、地方势力对克里姆林宫集团力量的削弱、变本加厉的镇压运动、生产下降,这就是 1937 年的粗略而明显的特征。

当然,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是显著的。其中一些成就甚至是轰动性的,例如北极探险和瓦列里·契卡洛夫乘安特-25 型苏式飞机经北极不着陆飞行到达美国。

早在 1934 年 6 月 19 日,莫斯科迎回了获救的“切柳斯金号”船员(用飞机从冰川上运出来的)。在克里姆林宫为切柳斯金号船员和飞行员举办的招待会上,斯大林说:“苏联英雄表现出了值得歌颂的勇者的奋不顾身。但仅仅有勇气是不够的。勇气

和组织性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战无不胜。”(引自:雅科夫列夫 A. C.，《生活的目标:一个飞机设计师的笔记》，莫斯科，1987年，第88页)

3年之后，斯大林也许可以重复“勇气和组织性”这句话。现在勇气是有了，是被鼓励和激发出来的，也是进行紧急动员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苏联的年轻一代专家已经成长起来了，但却严重缺乏“组织性”。飞机设计师 A. C. 雅科夫列夫在自己的笔记中描述了这样一幅斯大林“手动控制”整个航空工业(在其他一些领域中也是如此)的令人吃惊的画面。

其中有一个情况就很有说服力:斯大林决定开始成批生产由设计师伊柳辛设计的 DB-3 重型双引擎轰炸机，这款轰炸机比已在生产的由图波列夫设计的同类 DB-2 型轰炸机速度更快。但是“为了不对已经投入成批生产的 DB-2 型轰炸机造成影响”，飞机制造人员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新飞机的生产。最后，两名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以及空军部主任阿尔克斯尼斯来到了工厂(事情发生在 1936 年)，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斥责，并开除了厂长。

雅科夫列夫没有说，厂长是被宣布为“人民之敌”，还是只丢掉了官职。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甚至在领袖严密控制的部门，起作用的是对普通人有着更密切关系的利益，是与“组织性”要求的抗衡。

1937 年下半年，在苏联党的领导层之间，即在克里姆林宫集团和大多数地方领导之间发生了旁观者不易察觉的激烈冲突。大多数地方领导由于担心在最高苏维埃的不记名选举中失败，而发动了对竞争对手的镇压。尤里·茹科夫认为，“对几万甚至几十万农民的大规模镇压首先是对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们有利”。

1937 年 7 月 2 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对“富农和刑事犯”进行统计，并把他们分成将被枪毙或流放两个组别。

7 月 7 日开幕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一致批准了含有差额选举条款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条例”。

显然，两份文件是相互矛盾的，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图。由于第一书记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分局局长手中握有“三人小组”和确定“黑名单”的惩罚机制，自由选举将是一种怎样的结局就很清楚了:这将变成一种虚假的选举。

尤里·茹科夫点出了那些特别索要不极为残酷的枪决名额的“热心”书记们的名字:“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A. 伊克拉莫夫,5441 人;奥尔忠尼启则(前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 K. M. 谢尔盖耶夫,6133 人;古比雪夫州的 П. П. 波斯特舍夫,6140 人;高尔基州的 Ю. М. 卡诺诺维奇,6580 人;远东边疆区的 И. М. 瓦列伊基斯,6698 人;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Л. И. 米尔佐扬,6749 人;车里雅宾斯克州的 K. B. 伦金,7953 人。‘三人小组’的受害者,数量超过 1 万人的地区有 3 处:



A. Я. 斯托利亚尔所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1.2 万人; B. Ф. 沙朗戈维奇所在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2 万人; E. Г. 叶夫多基莫夫所在的亚速海-黑海边疆区, 13606 人。最残忍的有 2 人: 一个是 P. И. 艾赫, 他宣布光是要枪毙的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居民就有 10800 人, 这还不包括他尚未确定具体人数的准备流放的人; 另一个是 H. C. 赫鲁晓夫, 他以令人生疑的极快速度完成了在莫斯科州的寻找和“统计”工作, 然后坚决主张将 41305 名“前富农”和“前刑事犯”或判以枪决或判以流放。”(茹科夫 Ю., 《另一个斯大林》, 第 446—447 页)

1937 年 7 月 30 日, 叶若夫签署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其他反苏分子行动》的命令。该命令初步计划枪毙 25 万人。显然, 其中包括那些政治上最积极的人。镇压运动与选举活动理应同时结束, 即在 1937 年 12 月 5 日至 15 日期间结束。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警觉的双眼”和“惩罚之剑”极易落到一系列潜在的候选人身上。这条命令也把批准“三人小组”人员组成的权力从政治局转到了叶若夫手中。此外, 叶若夫还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凶恶卫士。

实际上开始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行动: 斯大林集团镇压了地方官僚, 而地方官僚清理出了有利于己的本地的政治空间。

这样, 7、8 两个月有 16 名第一书记被捕: E. И. 伦金(沃罗涅日州委)、П. Д. 阿库利努什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A. Д. 克里尼茨基(萨拉托夫州委)、И. П. 诺索夫(伊万诺沃州委)、Г. В. 毛列尔(北奥塞梯州委)、B. M. 普特宁(摩尔多瓦共和国中央委员会)、B. Ф. 沙朗戈维奇(白俄罗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B. И. 切尔尼亚夫斯基(温尼察州委)、A. K. 列帕(鞑靼斯坦共和国中央委员会)、П. Ф. 马尔基京(切尔尼戈夫州委)、M. M. 哈塔耶维奇(哈尔科夫州委)、B. A. 谢苗诺夫(斯大林格勒边疆区委)、Я. Б. 贝金(巴什基尔州委)、B. З. 托德列斯(摩尔达维亚州委)、Д. 里扎耶夫(卡拉卡尔巴克州委)、M. K. 波利亚科娃(也是摩尔多瓦州委)。

同时被撤职的还有远东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B. B. 普图哈(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 И. A. 泽连斯基(中央委员会委员)。

而保留了原职的地方领导人则发动了一场针对下一级地方负责人的疯狂运动。

1937 年 10 月 9 日, 政治局召开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柯秀尔、米高扬、莫洛托夫、丘巴尔、日丹诺夫和叶若夫。会议批准了莫洛托夫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提纲表明, 斯大林输了。

提纲中说, “并行”推荐, 即提供差额候选人供选择不是必需的!

茹科夫认为, 反对差额选举的有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柯秀尔、米高扬、丘巴尔和叶若夫。

10月11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切都结束了。地方上党组织的领导层被责成“核查”选举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斯大林关于社会团体也可以自由推举候选人的建议被取消。出现了“共产党员集团和党外集团”的概念，分给了党外人士20%的名额。而且所有的候选人都要预先经过党组织的“审查”（实际上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来审查）。

在全会的辩论会上可以发现，所有的发言者在限制选举人机会的问题上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辩论中对“传教士”的活动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企图还原和恢复‘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的口号”（Д. А. 孔托林，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的弟弟、高尔基州委第一书记 Ю. М. 卡冈诺维奇表示：“敌人，特别是传教士，正在开展猖狂的可称之为蛮横的选举斗争。”（正是在这一时期逮捕了几千名传教士。）

结果，斯大林看到了横在自己面前的这股团结一致的力量，这是一股通过直接对抗无法战胜的力量。

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了沙俄历史的老情节：彼得一世的侄女安娜·约安诺夫娜被贵族集团推上俄国的帝位，并与他们签订了“条约”，但她在贵族的支持下撕毁了这些“条约”，使国家背离了已初具雏形的更加民主的管理形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件错失了良机的事情。但这看似是安娜·约安诺夫娜个人的偶然行为，其实是现实环境造成的。18世纪中叶，由于经济疲软、人才匮乏，俄国还不可能不经阵痛而转向君主立宪制的雏形。

而斯大林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也同样被扭转了方向。

全会进行了人事调整。叶若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斯大林集团失利的间接结果是新选举体系的主要制订者 Я. А. 雅科夫列夫先是被捕，随后被枪毙。Б. М. 塔尔和 А. И. 斯捷茨基也同样掉了脑袋。

“斯大林宪法”的核心——差额选举被取消了。

这些事件造成了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后果，因为很快就爆发了战争，这样斯大林只有在其生命的终点，也就是当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时，才回到了改变苏联政治体系的思路。

我们就不去谈论造成诸如工业化落后于世界技术发展进程这样的因素了。苏联所建立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成为工业生产的落后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但它却没有能使大众消费产品的生产技术得到发展，而西方民主国家正在进行这种转换。

在毁掉了斯大林的政治改革之后，党内权势分子也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因为分配各集团利益的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启动。苏联1991年的解体其实始于悲剧性的1937年。正如我们所见，从一方面来说，苏联的极权主义是使国家完整的最有效形式；从另一方面来说，苏联的极权主义也要求并促进了自我发展。



1938年带来的是平静,尽管不是一蹴而就的。

镇压还在继续,展开了对布哈林、李可夫及另19名“老近卫军”代表的审判,众多军官遭到逮捕、流放或是枪毙。告发狂潮席卷了整个社会,告发成为表现忠诚,甚至铲除对手的方法。在反对派没有合法地位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中,总能找到那些对体制不满的人,尤其是在精英之中。

通常,人们把完成了对过去政治时期代表人物审理的布哈林-李可夫案件的审判称为是该年度的主要大事。实际上,3月2日至13日发生在工会大厦十月大厅中的公开审判已经起不到以前所起的那种作用了。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关于工业化进度和“斯托雷平式”农业发展道路的宣传战早已成为过去。布哈林与莫斯科党组织领导H.乌格拉诺夫和M.柳京的亲密关系,布哈林说了“亚戈达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次与加米涅夫的秘密会晤,已经可以置诸脑后了。布哈林那篇反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同样也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了。“布哈林学派”的信徒被击溃,他同他们脱离开来。1936年布哈林在写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称刚被枪毙的加米涅夫是“厚颜无耻的凶手”、“所有人中最令人厌恶的人”、“一条狗被枪毙了,让人非常高兴”。

但命运还是把他推向了终点。布哈林得为自己在七大上承认的自己客观上推动了无产阶级地位的削弱和资本主义的恢复而受到处罚。

当然,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人并不带有以前的那种威胁,但是还有外部世界的威胁,还有日益逼近的战争,而且“革命的魔鬼”和地区实力还存在。在某些条件下,布哈林有可能被推举为党的领袖,而李可夫则有可能被推举为政府主席。

因此他们注定要灭亡。在俄国和世界的历史上,消灭政治对手的情况不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这多么令人吃惊,但就连布哈林本人也理解事件的逻辑。他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写道: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一开始就要告诉你,对于世界(社会):1)我不准备收回任何我所写过的东西;2)从这个意义上讲(且与此相关的是),我既不打算向你请求什么,也不想向你恳求什么,以便事情不偏离既定的轨道。而作为给你个人的信件,我要说,我不能不留下这几句话就离开人世,因为痛苦正在折磨着我,而这种痛苦你应该是知道的……大清洗有着某种重大和创新的政治背景和思想:a)由于现在处于战前时期,b)由于要向民主过渡。这种清洗波及了:a)有罪的人,b)有嫌疑的人,c)有潜在嫌疑的人。这里要绕过我也是不可能的。通过这种方式排除了一部分人的危害性,另一部分人要用另一种方式,而对第三种人则要用第三种方式。当人们不可避免地相互议论和永远相互怀疑的时候,也就到了保险的时刻(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当拉狄克中伤我时,我非常生他的气!而随



后自己也走上了这一条路……)。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失去我，你就失去了真正忠实于你的最有才能的干将之一……想起这些就让人痛苦不已……

……而现在，尽管我头痛难忍、眼含热泪，我还是要奋笔疾书。柯巴，现在在你面前的我是心地纯洁的。请求你最后的宽恕(内心的，而不是别的)。所以，在想象中拥抱你。永别了，请原谅我过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吧。H. 布哈林。(引自：切鲁舍夫 H.，《无罪者是不存在的……》，莫斯科，2004年，第238—239页)

判决称布哈林和李可夫是瓦解苏联这一阴谋的领导人。他们准备让苏联在战争中战败，指使同谋者进行破坏和捣乱，还对几次刺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的失败尝试负有责任。

3月13日宣布了判决：处以枪决。

看来，可以把戴维斯大使或是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的想法解释为他们并不完全理解俄国布尔什维主义那种甚至对自己人都冷酷无情的本性。但如何解释白卫军侨民的中流砥柱之一 И. H. 米留可夫的评价呢？米留可夫在读了关于对“反苏托洛茨基右倾集团”审判(1938年)的速记报告后，写信给 C. B. 波兹涅尔说：“我以前就写过，说那里不是只有捏造，也有很多真相，而我现在就在寻找全部的真相，尽管存在着官僚组织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刑讯室。”(《移民：新的材料》，第7卷，巴黎、圣彼得堡，2005年)

在布哈林和李可夫死后，只剩下最后一个竞争对手了。他处于苏联情报机关的长期监视之下，并且他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

1938年夏天，比利时外交官之子扎克·莫尔纳在巴黎结识了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西尔维娅·阿格洛芙。西尔维娅是一个不好看的单身女子，是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代表，而扎克是一个年轻英俊的人。于是她成了他的情妇。

实际上，这位青年男子叫拉蒙·麦卡德。他的母亲是西班牙女贵族卡丽达·麦卡德，是一位共产党人，参加过西班牙的内战，是苏联间谍列昂尼德(瑙姆)·艾廷根的情妇和代理人。

“在巴塞罗那期间，我与拉蒙·麦卡德初次相遇。他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刚刚从佛朗哥分子的后勤部门执行完游击任务回来。这位充满魅力的年轻人当时刚满20岁。有人告诉我，他的哥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浑身捆满手榴弹，扑到了冲向共和党人阵地的德国坦克底下。他们的母亲卡丽达在武装行动中也表现得异常勇敢，在共和党地下游击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我当时就不曾怀疑，等待麦卡德的是怎样一个未来：命运注定了他要去清除掉托洛茨基，而领导这一行动的理应就是我。”(苏多普拉托夫 И.，《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莫斯科，2001



年,第 55 页)

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强调,在西班牙进行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两场战争”,而且两场战争都不是为生而战,而是为死而战。

“第二场完全独立的战争是在共和阵营内部进行的。一方是身在苏联的斯大林,另一方则是托洛茨基。”

安插在托洛茨基身边的拉蒙·麦卡德在西班牙国内战争结束后,即在 1940 年被“唤醒”了。此时斯大林明白,在战争日益逼近的情况下,两个共产主义领袖并存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注意到,几乎就在拉蒙·麦卡德被安插在托洛茨基身边的同时,一场清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叶夫根尼·科诺瓦利茨的行动也开始实施了。科诺瓦利茨声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宗旨是为乌克兰的独立而斗争,其斗争方式就是进行恐怖暗杀活动。被这个组织杀害的约有 60 人左右,其中包括苏联驻利沃夫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和波兰内务部长。在科诺瓦利茨开始与德国军事情报机关合作后,他变得尤其危险。

在送苏多普拉托夫动身实施行动时,斯大林说:“我们的目标是让乌克兰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在战争前夕就失去首领,以使这些匪徒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

1938 年 5 月 23 日,在鹿特丹,科诺瓦利茨被安装在巧克力糖果包装盒里的爆炸装置炸死。

1938 年 8 月,回到苏联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受到了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的 Л. П. 贝利亚的接见。苏多普拉托夫回忆说,贝利亚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在谍报和诱杀问题上“很在行的”人。

在接受新的任命之后,贝利亚立刻转向与最有价值的间谍进行接触,并成为向斯大林提供特别情报的主要来源。

至于叶若夫,他的幸运之星在迅速降落。贝利亚在他领导部门的出现就表明了这一点。

贝利亚是马林科夫建议提拔的。新一代政治人物登上了舞台。正如在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变革中,起推动作用的往往是一些在其他情况下不被人注意的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

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分局局长 B. 茹拉夫廖夫给斯大林写信,信中指责叶若夫包庇了许多人民公敌。茹拉夫廖夫是一个野心家,为了向上爬曾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与托洛茨基平行的新的右倾反苏中心案”。

茹拉夫廖夫的告发材料出现在对叶若夫持负面看法的马林科夫的桌子上。这是“压断”这个内务人民委员脊柱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就产生了一封中央委员会致所有州委、边疆区委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信。其中说,共产党员、内务

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分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揭露了叶若夫犯有背离党和其他舞弊等不端行为的重要事实。

很快,茹拉夫廖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分局局长,并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当然,这一提拔使他成了贝利亚的竞争对手,因此可以推测,是贝利亚在马林科夫的支持下,又把茹拉夫廖夫远调到哈萨克斯坦去,担任那里集中营的长官。

叶若夫的垮台正是他本人一手造成的,总体上也有助于系统地了解镇压的内幕。在叶若夫时期,成立了依靠在审问中通过肉体折磨得到的“证据”来办案的专门的侦查部门。落入这种齿轮的叶若夫注定难逃厄运了。

其实,到1938年12月叶若夫才被捕,而这实际上是在历史中有着难以忘却称谓的“1937年”的结束。

在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活中,“文学沙龙”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与沙俄帝国时期的沙龙非常类似,但两者有一个重大区别:这一时期的“文学沙龙”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一种看不见的线联系着。最著名的当属谢尔盖·叶赛宁的前妻及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利德之妻季娜伊达·赖赫的沙龙、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莉莉娅·布里克的沙龙以及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之妻叶夫根尼·费根贝格-哈尤京娜的沙龙。这些女人非常突出,并以自身的性感吸引着男人们。被叶夫根尼·叶若夫娜这位类似“鲁本斯画笔下美女”诱惑住的有伊萨克·巴别尔、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1938年5月,这位人民委员之妻与肖洛霍夫在“民族”饭店客房中的一次幽会被专业设备录了下来。此事报告给了叶若夫。他狂怒起来,痛打了妻子,并命令妻子“揭发和消灭人民之敌肖洛霍夫”。要不是发生了意外,作家肖洛霍夫就会像叶若夫的其他情敌如巴别尔那样被抓起来。

从罗斯托夫契卡人员那里接受了任务的И. С. 波戈列洛夫向肖洛霍夫承认,他应该“获得作家的信任”,然后向当局报告,肖洛霍夫准备发动哥萨克人起义。接下去就应该遭到逮捕并“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在获悉了这些情况之后,肖洛霍夫秘密地来到莫斯科,争取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斯大林责成进行认真的调查,并确信肖洛霍夫向他讲述的事情是真实的。他对叶若夫说:“应该为杰出的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按照登记簿上的记载,1938年10月31日,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叶若夫、波戈列洛夫、内务人民委员部罗斯托夫州分局副局长科甘、维奥申斯卡亚区委第一书记卢戈沃伊,另外还有几名罗斯托夫州人。

文学、政治和情欲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

但这种“花絮”只是一出名为《权力和文化》大型剧目中的一个小短剧。我们要强



调一点,对肖洛霍夫的创作评价很高且帮助了他的斯大林,从来也没有相信过肖洛霍夫会是百分之百的忠诚。这基本上反映出了我们的主人公与那种主要基于传统精神财富之上的文化的相互关系的进程。这和斯大林与教会、科学院院士、专家和前沙皇军官的相互关系非常相似。

斯大林的文化立场可以用爱德华·巴格里茨基的诗歌来阐述:

他从血泊中挺身而出,  
有着吞吃世俗的饕餮胃口。  
你用拖拉机碾压他,用歌声杀伐他。  
用铁锹惩治他,用十字镐砍他!  
而他依然在你的头顶挺立——  
你又得举起长矛,你又会瘫倒在地

传统的俄罗斯对这种压力作出了让步,但斯大林不相信,俄罗斯会很快屈服。

## 第七章

# 希特勒计划好了自己的目的

希特勒制定了目标、德国将军们在策划政变、慕尼黑协定、苏联预见到对德日之战、与日本的哈桑湖军事冲突、斯大林的私生活：孩子们

让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的 1937 年来吧。

1937 年 11 月 5 日，希特勒决定向高级将领们阐明自己的计划。他出人意料地召集了海陆空三军的司令们、武装力量总司令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希特勒告诉他们，国家的难题只能用武力来解决，并提出了三种战略方案供思考。第一，在 1943 年前完成装备更新，并采取攻势；第二，考虑到法国因国内危机而无法予以助防，可以展开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第三个方案，如果法国忙于与意大利打仗，那么它就不可能与德国开战。在这之后，希特勒宣布，首先必须同时“推倒”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在西方行动的侧面威胁；而在东方，日本将与苏联相对抗。

希特勒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为震惊。布洛姆贝格和陆军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与苏联保持和平的拥护者）一致反对发动可能导致与英国和法国开战的草率军事行动。

希特勒清楚地记得，正是布洛姆贝格反对把军队开进莱茵河地区，并且反对对西班牙的内战进行干涉。但在 11 月 5 日，希特勒对此保持了沉默。



11月9日,纽赖特、贝克和弗里奇进行了秘密会晤,以便制定行动计划。他们决定,应由弗里奇和纽赖特去希特勒那里向他解释,军队尚未准备好开战,而一旦发生战争,等待德国人的将是灾难。

希特勒拒绝接见他们。

很快,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的名誉便遭到了败坏。

丧妻的布洛姆贝格在1938年1月初与速记员爱娃·格鲁恩结了婚,然而在刑警局中却找到了一些有关她过去的有损名誉的资料(她是色情明信片的模特和在册妓女)。尽管希特勒是他们的证婚人,但布洛姆贝格将军还是被勒令退伍。

弗里奇被诽谤是同性恋者,被处以无限期休假。

同时,德国驻英国大使H.里宾特洛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不过,免职并没有改变将军们的观点。在解除了弗里奇的职位后,希特勒本人担任了总司令,并开始改组军队的管理系统。

丘吉尔指出,此时希特勒获得了类似拿破仑在取得了奥斯特里茨战役和耶拿战役大捷之后的那种权力。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大厦演讲时说,德国再也不受任何国际义务的约束,并将着手把所有德国人联合到一个国家中来,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包括700万奥地利人和苏台德区的300万德国人。

3月11日,希特勒命令占领奥地利。此前的2月12日,他在与奥地利总理舒尼格交谈时表示:“英国?英国人不会为奥地利动一根手指头……法国?两年前当我们不多几个营进入莱茵河地区时——当时我的确是非常地冒险——如果法国出兵,我们就只得撤退……但现在对法国来说已经太晚了。”(引自:丘吉尔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21页)

希特勒看来做对了。德国把捷克斯洛伐克与西欧切断了,并获得了与东南大陆所有联系的控制权。

对此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斯大林。3月18日,苏联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转达了莫斯科的建议:乘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协议之机商讨当前出现的局势。这意味着在组织集体的反击。

但斯大林的建议没有获得支持,而且罗斯福总统同样倾向于接受德国对奥地利的合并。

不过法国还是表现得非常清醒。4月28日在法国的压力下,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伦敦举行了紧急会晤。

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外交部长博内试图让英国人作出明确保证——如果法国对德国展开军事行动,英国将站在法国这一边。

苏联大使迈斯基写道,张伯伦“表现得如此模棱两可和无法确定”,以至于法国人

终于明白了，他们将与希特勒进行一对一的决战了。这也迫使法国在5个月之后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

5月19日，当对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处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之后，德国向这个注定要遭殃国家的边界派出了几个师。希特勒决定再一次铤而走险。现在轮到与捷克斯洛伐克签有互助协议的苏联和法国出牌了。我们要提醒一下，一旦局势向负面发展，柏林将在两条战线作战，而这种情况是德国总参谋部极不希望看到的。

苏联在4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曾作出决定，要转告布拉格，如果法国提出相应的请求，那么苏联准备与法国一起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捷克斯洛伐克。

5月7日，法国和英国驻布拉格的大使们要求贝奈斯政府对德国作出最大程度的让步。据迈斯基的回忆，“但是在10至12天后，张伯伦和达拉第总算感觉到自己不得不向希特勒表达对他侵略企图的强烈抗议”。捷克斯洛伐克也对自己有着40个师团的军队进行了局部动员，把一部分军队调到了边境。

德国人暂时撤退了。5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公使保证，德国没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计划。其实希特勒已经作好了准备，接下来他将采取威胁恫吓、虚张声势和外交游戏并施的手段，来击溃“腐朽的”西方民主。

德国武装力量其实比英国、法国和波兰的武装力量弱很多，但却出现了这种强者怕弱者的反常现象。这些强国力主进行调解，倾向于向胜负不明的战争让步。他们先是在西班牙执行了这一路线，然后是在奥地利，而现在轮到捷克斯洛伐克了。

尽管新的军事装备已经提供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阵地战不同的可能性，但英国在欧洲大陆保持势力均衡的传统战略仍在运转。

此外，需要着重指出历史学家极少提到的一个情况：德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含有对法国和英国给予历史性报复的成分。因为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违反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战条款并且更具侮辱性和残酷性。德国被肢解，其财政来源被破坏，国家体系几近崩溃。

自然，与俄国情况类似的德国，在凡尔赛陷入完全孤立无助的境地。但到了1938年，德国人打算对惊慌失措且不明白发生了何事的西方进行报复。

况且，此时美国没有任何干涉欧洲冲突的意愿。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执行着保持中立的原则，而且罗斯福总统也支持张伯伦的政策（虽然，我们很快就将看到，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改变了观点，将竭力卷入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战争）。

最终，在1938年，全球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势。最主要的在于几大力量中心之间矛盾重重。这里面德国和日本因自然资源不足，致力于扩张；而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首先关心的是保持稳定。当然，这种倾向也不是绝对的。

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重又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





回顾,当时俄国并没有直接利益驱使它去参战,俄国之所以被卷入一战,首先是因为遵循了通过相应的联盟组织来保持势力均衡的伦敦战略。

但在这一次,作为俄国继承者的苏联也准备插手欧洲事务了,当然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

我们可以试着再现一下斯大林的思路,它有可能是这样的:“西班牙战争妨碍了我们订立集体安全条约。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吓唬我们,想让我们退出比利牛斯。我们大概将不得不退出。但这样德国会得到加强,而张伯伦、达拉第和我将被分开。现在希特勒想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甚至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所有这一切将使我们联合起来。而如果联合不起来呢?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同盟者。”

1938年5月25日,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建议召开苏联、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总参谋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讨论为布拉格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也就是在5月25日,希特勒按照英国人的建议作出声明,说德国没有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

(这里让我们简要回忆一下发生在7月29日至8月11日期间苏联与日本在哈桑湖地区那场以苏方胜利告终的局部武装冲突吧。)

尽管斯大林及其集团作了一切努力,局势却变得越来越恶化,这种情况被记录在8月17日迈斯基致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声明中。声明强调,苏联对英国和法国的政策感到失望,这种政策软弱且短视,鼓励了侵略者向下一步的“跳跃”。斯大林把“一场新战争逼近或化解”的责任推到了西方的身上。

不过,斯大林并不知道,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早在8月6日,英国驻德国大使便通知德国外交部,称英国不会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拿任何一名船员或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所有的问题不使用武力就“可以谈妥”。

因此,当李维诺夫宣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而斯大林还寄希望于西方采取明智之举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已注定是悲惨的了。

丘吉尔写道,德国的军事状况并不占优势。为击溃150万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突破或绕过波希米亚防线,德国需要动用35个师。此时与法国交界的西部防御工事(齐格非防线)尚未建成,而法国可以派出100个师去攻打德国。因此在法国和苏联出兵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德国军队只能调出5个正规师和8个后备师来对抗法国。

“虽然从盟国在德国征兵以及在莱茵河地区和奥地利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绥靖主义和软弱无能中,可以证明希特勒政治估算的正确性,但德国最高统帅部还是不能相信希特勒的铤而走险能够第四次取得成功。理智的人们难以置信,拥有明显军事优势的伟大民族胜利者会再一次偏离不仅是职责和荣誉,而且是健全理智和小心谨慎为其指明的道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与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斯拉夫种族纽带且

此时对德国具有威胁作用的俄国。”(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1 卷，第 131 页)

但此时法国领导层却极为不安，试图影响英国的立场，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9 月 10 日，法国外长博内向英国大使直接问道：如果法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希特勒进攻后宣布军事动员，他的政府将如何支持法国？

得到的答复是：前 6 个月英国将为盟国派遣 2 个非机械化师和 150 架飞机作为援助。丘吉尔尖刻地指出：“需要承认，如果博内不过是为让捷克人听天由命找个借口的话，那天他的寻找不是没有成功。”(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1 卷，第 136 页)

9 月 12 日，H. 张伯伦与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之前，做了这样的预测：“我能够让他相信，他有通过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来达到英德相互理想的完全可能性。我要从德国与英国是欧洲和平的两大砥柱和反共产主义的主要支柱的角度向他勾勒未来，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和平途径克服我们目前的难关……也许我们能够找到除了俄国之外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危机之年：文件与资料(1938—1939 年)》，莫斯科，1990 年，第 1 卷，第 6 页)

还是在 8 月中旬，苏共政治局就决定向与波兰和罗马尼亚交界处调集 30 个步兵师和 10 个骑兵师，以此展示苏联作好了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估计波兰是不会让苏联军队过境的，但罗马尼亚在国际联盟的相应要求下是允许苏联军队通过的。

斯大林尽了一切努力来维持局势。但 9 月 15 日英国首相与德国元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会晤之后，在 9 月 18 日英国和法国部长会议上，却拟定出了一个“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计划。其基本点是：把苏台德区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由国际委员会来确定，废除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和苏联的条约，而作为交换，捷克斯洛伐克将得到英、法参与其中的国际保障。西方大国想这样打发希特勒。

9 月 19 日，这一计划转交给了贝奈斯。捷克人愤怒了。

9 月 20 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公使 3. 费林格询问：“如果法国遵守条约，莫斯科是否准备立即提供有效的援助？”答案是肯定的。斯大林还满怀希望。

于是，布拉格驳回了英法提出的计划。

9 月 20 日深夜，张伯伦与达拉第进行了联系，并给贝奈斯发去了最后通牒：或是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该计划，或是在德国攻击时得不到任何保护。

9 月 21 日凌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开始动摇了。

接下来张伯伦还要与希特勒举行会晤，还会有争论和妥协，但从实质上此事已经宣告结束了。正如迈斯基写的那样：西方“用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为自己换来了和平。

为了明确国家战略是如何影响 1938 年的局势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给我们提供的证据。迈斯基向苏联外交部发回电报：“前首相鲍德温拜会了



张伯伦,并告诉他说:“您应该以不管付出任何屈辱为代价来避免战争。””(《危机之年:文件与资料(1938—1939年)》,第1卷,第41页)

至于这个屈辱,就是张伯伦承认了“德国殖民要求的合理性”。

与此同时,德国的将军们还是决定要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将以德国的悲剧收场。参与密谋的有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副总参谋长和第一总作战官弗朗茨·哈尔德(军事政变计划制定者)、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还有奥托·冯·斯图普纳格尔、哈梅尔施泰因-埃克沃德、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埃里希·冯·布洛克多夫-阿勒菲尔德等将军、第一师师长霍普纳少将和国家银行总裁耶马尔·沙赫特,以及情报机关和警察部门的军官。

德国的社会情绪达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在经济得到了集约发展的当时,德国人是支持希特勒的,但他们并不想再经历战争之苦。他们不理解,为什么需要为北波希米亚而流血牺牲。

军方计划在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实施代号为“绿色方案”的进攻行动时发动政变。

9月22日,在柏林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炮兵部队进入作战状态。

9月24日,德国关闭了与法国的边界。

9月27日,哈尔德收到关于军队已在捷克边境上进入作战状态的电报。

就在当天,按照希特勒的命令,第三军区司令维茨勒本将军(密谋的参与者)的军队全副武装地行走在柏林的各条街道上。公众对此没有欣喜若狂,而是黯然沉默。

9月28日,哈尔德下达了发动政变的命令。但就在此时获悉,张伯伦和达拉第正在赶到慕尼黑来签订协议。战争被推迟了。原定的把希特勒作为战犯抓起来的计划落空了。现在他不是罪犯,而是一个凯旋者。

9月29日,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慕尼黑签订了《关于割让苏台德领土的协定》,签署该协定的是希特勒、达拉第、墨索里尼和张伯伦。

9月30日,英国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和相互协商条约。而此时波兰和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领土调整”的权利也得到了承认。所有这些条约的签署者都没有想到,他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从此包括他们本国在内的国家间的边界都可能被重新划分。虚伪的凡尔赛诞生了荒谬的慕尼黑。

(很快,12月6日,法国和德国之间也签订了互不侵犯宣言。)

作为欧洲唯一石油供应国的罗马尼亚也与柏林签订了有利于它的新协议,协议使其在德国石油进口的比重中达到了很高的份额,占了45%。需要说明的是,注意到伦敦和巴黎外交策略变化的罗马尼亚在大国之间寻求着平衡,并对苏联怀有敌意,因为莫斯科没有承认其在1918年对比萨拉比亚的占领。

英德条约中说,所通过的协议象征着两国人民“永不互相作战”的愿望,而消除“可能的分歧根源”的基础则是采用“协商的方法”。实际上,这等于签订了一个新的“慕尼黑条约”。

这一协议的坚决反对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们现在掌握了凯特尔元帅对具体问题的答案,这—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纽伦堡审判中向他提出的: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埃格尔上校问凯特尔元帅:“如果西方大国支持布拉格,德国还会不会在 1938 年进攻捷克斯洛伐克?”

凯特尔元帅回答道:“当然不会。从军事的角度我们还不够强大。慕尼黑的目的(即在慕尼黑达成协议)是为了把俄国挤出欧洲,并赢得时间使德国完成军备的准备工作。”(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1 卷,第 145 页)

而苏联和斯大林呢?他们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结果似乎是所有的人都渴望着和平,只有斯大林想与整个欧洲作战。

更何况,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的第二天,波兰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把西里西亚地区的切欣区和弗里什塔特区割让给自己。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表 C. C. 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写道:“波兰的声明是希特勒的挑衅。”

丘吉尔更是系统地评价了波兰人的这种行动:“这个具有各种英雄主义的民族,就其某些代表人物而言是有天赋,且英勇和有魅力的。但这个民族在自己国家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却常常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缺陷。其光荣的一面产生在暴乱和灾难时期,而在凯旋时往往表现为卑鄙和下流。”(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1 卷,第 147 页)

但波兰人能够依靠谁呢?他们脱离了自己的守护神、虽然没有流血却在 20 世纪最重要的战役中败北的法国,站到了胜利者的一边。

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苏联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提高了在基辅和白俄罗斯特别军区的军队的战斗警报级别。

其实,尽管遭到明显的挫败,斯大林在慕尼黑事件之后仍认为现状虽然更加复杂,但远非灾难性的,苏联武装力量的实力让他对此深信不疑。

1937 年 11 月,国防委员会批准了 1938 年至 1939 年的动员计划,并将 1938 年 5 月定为完成全部动员的期限。

计划到那时把军队扩编为:



“陆军：步兵师 170 个，骑兵师 29 个，轻型坦克旅 27 个，重型坦克旅 4 个，装甲旅 3 个，机械化步兵旅 4 个，炮兵团 57 个，总司令部预备队炮兵团 43 个，大功率独立炮兵营 8 个，化学旅 3 个。

“空军：达到拥有 11000 架战斗机的各种空军旅(包括海军航空兵)155 个。”(扎哈罗夫 B. M.，《战前的总参谋部》，莫斯科，2005 年，第 265 页)

同时还对人员和技术装备的数量作了规定：

现役军人：650.35 万人；

坦克：15613 辆，其中 T-38 型坦克 3200 辆；

飞机：11000 架，其中重型(TB-3 型和 DB-3 型)飞机 2200 架；

炮：15218 门。

1938 年 3 月 24 日，由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亲手草拟的报告送到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手中。伏罗希洛夫随即向斯大林递交了这份报告。

报告中历数了可能的敌人：在西方是德国、意大利和它们的附庸国，在东方则是日本，而直接对手是德国和波兰。它们的军力评估分别是：德国有 96 个步兵师、5 个骑兵师、5 个机械化师、30 个坦克营、3000 架飞机，波兰有 65 个步兵师、16 个骑兵旅、1450 辆坦克和轻型坦克、1650 架飞机。

忙于与中国打仗的日本有 43 个步兵师、4 个警卫旅、4 个机械旅、6 个骑兵旅、1553 辆坦克、1420 架飞机。

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建议苏联要作好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准备。

总参谋长的报告得到了包括斯大林和最高指挥官们在内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认可。

1938 年 8 月 31 日，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对哈桑湖冲突的分析就很能说明问题。斯大林对红旗勋章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的行为大为愤怒，并对此毫不隐瞒。今天我们不难解释这种愤怒的原因：布柳赫尔表现得独断专行，实际上是对斯大林的命令提出了异议。

有关日俄冲突的官方版本是：日本人企图占领国境线所经过的扎奥泽尔纳亚高地和一个无名高地。6 月中旬，苏联边防军人占领了两个高地的山顶，并开始在上面修建石头的防御工事。但日本人却认为，国境是沿着哈桑湖岸划定的，因此两个高地应是他们的领土。

1938 年 7 月 15 日，日本的国家机器开始干预此事：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重光葵向苏联递交照会，要求苏联人撤出哈桑湖旁的这两个高地。此时摆在斯大林面前的问题是让步还是接受挑战？他决定不作让步。于是日本人被告知，上述领土属于苏联。

这样，在 7 月 28 日深夜，一个连的日本士兵占领了无名高地。接着残酷的战斗开始了，双方都投入了各自的军队。日本人投入了第 19 步兵师的两个团，苏联指挥

部投入了第 40 步兵师,随后(在攻击失败后)又投入了第 32 步兵师和属于第 39 步兵师的第 2 机械旅。至 8 月 9 日傍晚时分,侵入苏联领土的日军才被清理干净了。8 月 11 日,双方商定停止军事行动。

苏方损失是:408 人阵亡,2807 人受伤,而日方的伤亡要高出苏方 2 倍多。

这场小型的战争向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反映出,军队的战备情况不佳。

正如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所说,前线领导层的水平之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目睹了这一现实之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极为震惊。从斯大林修改过的会议记录来看,这种震惊是相当明显的。这里每一句话简直就是怒斥。

按战斗警报开往边境的军队是毫无准备的。武器和其他战斗物资的应急储备,未能事先作好分发到部队手中的登记和准备,这造成了在整个军事行动过程中一系列令人愤慨的杂乱无章。前线行政长官和部队指挥官不知道,有哪些武器、弹药和其他战斗供给品,以及它们在哪里和处于什么一个状态。在诸多情况下,前线上整连整连的炮兵都没有炮弹,机关枪的备用枪管也未事先进行磨合,发放的步枪未进行过试射。而许多战士,甚至第 32 师的一个步兵分队,都是在完全未配发步枪和防毒面具的情况下就来到了前线。尽管衣物储备充足,但许多战士还是穿着已磨损的鞋子、半赤着脚被派去作战,大量红军都没有配发军大衣,且各指挥员和各指挥部也缺少作战行动地区的地图。

所有军种,尤其是步兵,显露出不会在战场上作战、不会迂回、不会把移动和开火结合起来、不会结合地形。而在这种环境下,也就是在多山多丘的远东地区的条件下,这些本领其实是军队作战和战术技能的常识。

不善于运用坦克部队,以致造成技术装备严重受损。

对这些严重的缺陷和让我们在这场相对不大的战役中遭受了巨大损失负有罪责的是红旗勋章远东方面军的各级指挥员、政委和军官,首先是红旗勋章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1938 年 3 月 13 日—1941 年 6 月 20 日):文件与资料》,莫斯科,2004 年,第 137 页)

布柳赫尔的行为被视为“蓄意的失败主义”。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布柳赫尔“对我们边防军人行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并派出了自己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发现“我们侵犯了中国东北 3 米的国界”,并“确定”我们“在冲突中犯有错误”。布柳赫尔给伏罗希洛夫发去电报,要求立即逮捕边防部队的领导人,因为他挑起了与日本人的冲突。

布柳赫尔元帅显然不明白,莫斯科想要他做什么。



记录中有一段斯大林与布柳赫尔通过直线电话交谈的奇特片断：“布柳赫尔同志，请您诚实说，您是否真有与日本人作战的意愿。如果您没有这种意愿，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直说；如果有这种意愿，我认为您应该立刻到位。”（《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13日—1941年6月20日）：文件与资料》，第139页）

斯大林感到他正在失去控制权。那位要谈话得找上三天、不是酩酊大醉就是不知在忙什么的司令员变成了一个危险人物。因此布柳赫尔被解除了职务，而远东方面军被改编成了直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两个独立的集团军。显然，斯大林的担忧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在最重要和完全独立的战区内错误地破坏了前线的管理方式（1年之后又回到了原先的组织方式）。

尽管这是一次负面的尝试，但斯大林认为自己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日本人得到了惩戒，而西方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果断性。

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足以说明斯大林与军方领导层是怎样一种相互关系。

在哈桑湖冲突之初，第一红旗勋章集团军司令员 K. П. 波德拉斯在作战中被解职，由 Г. М. 施特恩接替了他。在会议的报告中施特恩激烈且带有偏见地批评了波德拉斯。

斯大林打断报告人的发言，向基辅军区司令员 C. K. 铁木辛哥说：“铁木辛哥同志，您是在请求这个人当您的第一副职吗？”铁木辛哥理解领袖在讽刺，就回答说：“我现在还是请求任命波德拉斯同志担任我的第一副职。”

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感意外。但不久后在 1938 年 11 月 26 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在哈桑湖冲突中指挥空军的 27 岁的苏联英雄（在西班牙内战中立有战功）П. В. 雷恰戈夫建议逮捕波德拉斯，因为他“暗中搞破坏”，这得到了伏罗希洛夫的支持。波德拉斯被判以 5 年监禁，但在 1940 年他还是成了基辅军区的副司令员，因为国防人民委员 C. K. 铁木辛哥坚决主张要释放他。

从整体上来说，1938 年值得注意的不仅有慕尼黑事件和哈桑湖事件。像雷恰戈夫这类无畏、果敢、带有专业行家眼界并准备建功立业的新人也越来越受到注目。然而，有时他们却使斯大林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

此时呈现在斯大林眼前的自己的儿子是一个 17 岁的淘气包。关于儿子，斯大林在给 B. B. 马尔特申老师的信中这样写道：“瓦西里是一个资质中等的任性青年，一个小野人（斯基泰人类型的），他不总是诚实，喜欢讹诈有些软弱的‘领导者’，常常要无赖，他毅力薄弱，或者准确地说是没有组织性。”

斯大林的前任警卫 A. 雷宾称瓦西里是一个“豪放的人”，他除了父亲之外，谁也不怕。

1938 年，瓦西里成为塞瓦斯托波尔近郊卡恰航空学校的学员（就是著名的“卡



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开始培养军事飞行员)。斯大林的养子阿尔乔姆是炮兵学校的学员，而长子雅科夫是炮兵学院的学员。

斯大林培养他们去作战，这就意味着让他们去牺牲。和他的孩子们一起，成千上万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开始在中学的炮兵班和医疗班中接受军事培训。

在1939年5月16日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无组织性的斯基泰人”的问题以总结的形式摆在了斯大林面前。在当天的议事日程中列出了谈论与飞行事故和灾难作斗争的措施问题。

在空军部主任 A. Д. 洛克季奥诺夫作报告期间，大家的即兴插话给出了关于空军人才素质的明确概念：

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同志，大家不是在复杂任务中，而是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作战……

洛克季奥诺夫：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指挥员三次要求技术员修理机器上的故障，技术员每次都报告机器修好了，而实际上机器并未修好。

斯大林：这是什么人呀，他在哪里，他可能是个败类，是在蒙骗人。这样的技术员完全有可能造成不幸事件，而飞行员却信任地把飞机交给他们。当飞行员坐进飞机时，他是需要自己来检测飞机呢，还是去指望技术员的良心？

……

梅赫利斯：在超过100人的地方，需要安排一名脱产的政治工作人员。

斯大林：让他去帮助政委吗？

梅赫利斯：让他帮助去做党的工作。

斯大林：这和党的工作有什么关系？飞行员违背了物理和气象规律。布良金斯基事件就是这样：他驾驶着一架大飞机去寻找“祖国号”飞机，只看着地面，却不去看两侧，结果两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掌握物理规律。还有就是飞行员不能克服疑难气象条件的情况也常常发生。请你们先查一下天气状况，然后再起飞，而不要糊里糊涂地就起飞。这和党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再说契卡洛夫事件。其中无纪律性是原因之一。他承担着试飞高速飞机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接到报告，说飞机尚未准备好，就通过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出警告不要同意试飞，于是就没有批准起飞。尽管有了这样的警告，飞机没有通过测试，发动机也是，但契卡洛夫还是起飞了，开始是环绕着机场上空飞行，然后，显然他作出决定，难道他契卡洛夫只能在机场上空飞行吗，于是向远处飞去，这时发动机和飞机开始出问题了，他降落到了一个院子里，碰到了柴堆上，失事身亡。请问，这里与党和政治工作有什么关系？”（《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13日—1941年6月20日）：文件与资料》，第204、206页）



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 1939 年 6 月 4 日颁布的《关于工农红军空军部队事故率》的指令中,援引了一些因不守纪律和争强好胜而导致优秀飞行员丧生的触目惊心的例子:“从 1939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共发生 34 起空难,其中有 76 人失事身亡。其间共发生了 125 起事故,导致 31 架飞机损坏。仅在 1938 年底和 1939 年初前几个月,我们已经失去了 5 名杰出的飞行员、苏联英雄、我们国家的优秀人才:布良金斯基同志、契卡洛夫同志、古边科同志、谢罗夫同志和波林娜·奥西片科同志。”(《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1938 年 3 月 13 日—1941 年 6 月 20 日):文件与资料》,第 237 页)

同时还举出了一些“近乎犯罪行为的不守纪律”的例子。

无疑,斯大林明白,这些现象背后是什么。他本人曾宣布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他实施了加速工业化的政策,这激发了那些认为自己比死亡更强大的英雄们的激情。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这份命令中,无论让人如何感到奇怪,还是可以看到斯大林政策的胜利。是的,正是如此:牺牲和胜利。

在思考青年人的问题时,斯大林加快完成了起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工作。1938 年 8 月,斯大林在 14 天的时间里一直亲自埋头于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

大多数飞行员,斯大林并不认识,所以可以认为,在谈及飞行员时,斯大林心里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瓦西里。

瓦西里这个青年人常常让他感到惊讶。例如,瓦西里非常直爽,像个野人,他能在妹妹在场的情况下或当着女士的面骂粗话。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在去卡恰航空学校后,瓦西里狡猾地对学校政委说:“爸爸要来克里米亚休假”,可能会“顺道来卡恰”。

但是,在学校里,即使不说斯大林这位威严的视察员要来学校的事情,大家也是知道他的身份的。从 1939 年 2 月 17 日学校给他的鉴定来看,学校领导对他还是很客观的:

有政治主见。忠于列宁-斯大林党的事业,忠于祖国。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的问题极感兴趣,并能很好地作出分析。是一个好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社会和共青团活动的中队组织者。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学员相处稍微有些生硬。总体上来说还是容易与学员们相处的,享有一定的威信。

理论成绩较好。可以学得更优秀,但是对课程的系统研究不感兴趣。喜欢“一口气”马上学完,坐不住。对航空感兴趣,喜欢飞行。这方面掌握得很优秀,巩固得也好,但对驾驶技术的“细节”重视不足,结果是在飞行中出现了偏差,但在严肃果断的批评之后,他纠正了这些偏差,并且在随后的飞行中不再重犯。

军事纪律良好,不过在开学之初却有诸多违章行动:去教学飞行班迟到、不刮胡子就去飞行、与班长争吵,并竭力找客观原因为这些不足开脱。最近一段时间,其纪律性快速提高,坦率承认并自愿改正了这些不足。

驾驶技术的总评价是优秀。……喜欢特技飞行,并自我感觉良好。飞行中非常谨慎,驾驶飞机时精力旺盛、应付自如。在飞行中主动且果断,但在考试飞行中有些紧张。

对飞行中的挫折反应过分敏感,内心里对自己感到沮丧,尤其是自己已经掌握得不错的基础飞行。

我认为,学员瓦西里同志已经做好了独立飞行的准备。(《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第60—61页)

其实像瓦西里这样的人是很多的。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托米克)在回忆瓦西里时,谈了对于这一代人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瓦西里在物质上完全是无私的。他总是想着要赠送给同志们点什么东西,尽管这些东西也是他自己需要的。他准备‘为朋友两肋插刀’。在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時候,瓦西里就常常与高年级同学在争吵中或是他们欺负弱小同学时出手相助,但他从来不与那些比自己弱小的或低年级的同学打架。有时他挨了一顿打,但他从不抱怨,并且认为抱怨是可耻的。瓦西里与同志们的关系是温和的。他是个顽皮的人:会出鬼点子、搞恶作剧……瓦西里从小时候起就喜欢动物。他从德国带回一匹受伤的马,甚至还养了流浪狗。他还养过仓鼠和兔子。有一次我去别墅找他,他正和一只脏兮兮的狗坐在一起,抚摸着它,亲吻着它的鼻子,并从自己的碟子中给它喂食。当他注意到我疑惑的目光时,是这么回答我的困惑的:‘它不会欺骗,也不会背叛。’

“他总是很慷慨和无私。当读到关于他的财产和皮大衣等文章时,我很难过。他什么都没有!部队每月15号发军饷,所有人都聚到他那里,他已经为朋友们准备好了一桌酒菜,但过10至15天再去他那里就得自带东西了,因为此时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他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者。他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时,就建立了出色的通讯中心站。当时,空军司令部所在地与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在一起,都在奥西片科街上。瓦西里把空军司令部搬到了飞机场:当中央机场不再承担中央机场的功能时,他就把空军司令部迁了过去。‘要不然,司令部有一半的人都听不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坐在奥西片科街上的那些司令部的人是不懂地理的,他们必须到各边远驻防军去,以获得这些知识’。他把他们派到全国各地去服役,而把伤残飞行员招到自己这里来工作。有人对他说:‘他们说,这是什么司令部?!’他回答道:‘他们暂时还不是一切都清楚,但他们懂得如何作战,工作起来效率会很高且充满热情。’”(《明天》,莫斯科,2006年,第12期)

在瓦西里去了航空学校之后,斯大林有时会感到孤独难熬。他非常喜爱孩子们,尤其是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我小时候对我的爱抚、溺爱



和温柔。他很少对人能像我这样温柔,原因应该是那个时期他非常爱着妈妈。”)

小女孩长大了,她已经不想再给他写些开玩笑的命令,而他总是乐意对这些命令作出回应,并这样署名:“谢坦卡女主人的小秘书,可怜人约·斯大林”。他称她为“我的小麻雀”。

仅仅这个“女主人”和“可怜人”关系的例子就表达出了斯大林孤独的苦楚来:“夏天在学校的功课结束后,有时他会把我带到他在孔策沃的别墅住上两三天。他想让我经常待在他的身旁。但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要适应他的日常习惯是不可能的:他下午2点才吃早餐,晚上8点吃午饭,然后伏案工作到深夜。这对于我是无法适应、无法习惯的。让人愉快的只有和他一起在森林和花园中散步,他会问我森林里花草的名称(我从保姆那里掌握了这些知识),问我是什么鸟儿在歌唱……然后他就会在某个阴凉处阅读自己的文件和报纸,这时他也就不需要我了。而我就开始感到苦闷和无聊,想着尽快回到我们在祖巴洛沃的住处,在那里有很多我已经习惯了的娱乐活动,而且还可以约女友去那里玩。父亲感到,我觉得在他身边很无聊,这让他有些生气。有一次,甚至与我吵得很长时间不理我。当时我问他:‘我现在可以走了吗?’‘走吧!’他生硬地回答,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与我说话,也不打电话来。只是在保姆机智的撮合下,我向父亲‘请求原谅’,父亲才与我和解。他埋怨道:‘她走了!留下我一个老人!她觉得无聊!’但这时他已经亲吻过我并原谅我了,因为没有我他会更寂寞。”(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15页)

很快,连女儿也该飞走了。

总的说来,亲戚圈里很少有人能够让他开心。1938年11月2日,斯大林的大舅子、国防人民委员部装甲坦克局政治委员帕维尔·阿利卢耶夫在休假回来后的第二天突然死亡。其死因不明,亲戚们怀疑,他是被自己的妻子叶夫根尼娅毒死的。帕维尔·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与整个阿利卢耶夫家族的主要联系人。

关于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死因,有一个说法是,他是被贝利亚下令除掉的。这一说法有两种解释。第一,新上任的副人民委员在清除领袖身边的人。第二,在1938年夏天召开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当着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面,帕维尔·阿利卢耶夫和工农红军装甲坦克局局长Ф.Г.帕夫洛夫一起支持了工农红军炮兵局军事委员Г.К.萨夫琴科的发言。萨夫琴科把军队纪律低下和秩序下降归结为对各级指挥人员无休止的逮捕所致。当然,这两种说法都令人生疑。

11月20日,即在帕维尔·阿利卢耶夫去世后第18天,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夫的姐姐安娜的丈夫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被捕。列坚斯是斯大林的连襟,担任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列坚斯的儿子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说,斯大林的岳母奥莉加·叶夫根尼耶夫娜与领袖见了面,而斯大林则建议请来莫洛托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岳父),还有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列坚斯,一起把所有

问题弄清楚。斯大林是尊敬岳父的。

但在最后时刻，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不知为何却断然拒绝来见斯大林。（外公的缺席让斯大林非常懊丧，并深深地刺痛了他，他“与我的妈妈和外婆大吵了一架，也没有进行任何探讨，这样父亲的命运就被定了下来。”这是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说的话。）

列坚斯的儿子推测，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有可能受到了贝利亚要迫害他全家人的“直接而明确的威胁”。

的确，贝利亚和列坚斯的关系很早就开始恶化了。

这里必须作一个注解。1938年10月8日，政治局出台了《关于逮捕、检察机关和进行审讯》的内部决议，还成立了一个成员有叶若夫（主席）、贝利亚、维辛斯基、雷奇科夫（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和马林科夫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在10天内起草出一份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逮捕、检察机关和进行审讯问题的新指示》的决议草案。这里说的是要加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督，并计划在4个月里结束始于1937年的清洗和镇压。

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出台了《关于统计和核查党的机关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的指示。这意味着将在契卡队伍里进行一次清洗。

11月15日，“严格责令”停止在“三人小组”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中审理之前以简化程序送交给“三人小组”和军事法庭的各类案件。

11月17日，完成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新一届领导层的任命工作。

同一天，中央委员会出台了《关于逮捕、检察机关和进行审讯》的决议。决议中谈到要继续与“苏联所有敌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还谈到隐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人民公敌和间谍“曲解了苏联法律并实施了大规模无根据的逮捕”：从今以后禁止大规模逮捕和驱逐（“限额”），撤销“三人小组”，加强检察院的监督功能。

11月23日，叶若夫被叫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与他进行了4个小时的严肃谈话。叶若夫写下了辞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声明。

1938年11月，“叶若夫习气”终告结束。因此，在此期间发生的逮捕列坚斯的事件不能解释为贝利亚的阴谋诡计，而只是整个事件总体进程的一部分。斯大林的这位连襟属于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一代人。在这里，亲属和心理的关系是第二位的。

玛丽娅·斯瓦尼泽于1937年3月5日写的关于自己亲戚们的日记就很有代表性：“约瑟夫真可怜。想想吧，O. E.（斯大林的岳母——作者注）神经错乱，费奥多尔（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哥哥——作者注）是个白痴，帕维尔和纽拉弱智，斯塔赫（列坚斯——作者注）智力有限，瓦夏懒惰，雅沙性格软弱。”（《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第192页）



作出雅沙性格软弱这一判断的原因是，雅科夫·朱加施维里娶了尤利娅·梅尔策为妻。（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比雅沙大，雅沙是她的第5任丈夫，她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只不过是一个离过婚的人而已。她不聪明，文化不高，却抓住了雅沙的心，当然这一切都是事先有意安排好的。）顺便说一句，尤利娅的前夫 O. П. 别萨拉布是一个契卡人员，是列坚斯的副手。当然，这位缠上斯大林长子的敖德萨犹太商人之女在斯瓦尼泽-阿利卢耶夫家族中是格格不入的，但斯大林还是下令给这对新人分配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1938年，尤利娅生下女儿加林娜，斯大林的孙女诞生了。其实即使是对尤利娅本人，斯大林还是满意的。

至于家族试图对斯大林施加影响，那是很少有成功的。甚至在列坚斯的事件上也是如此。

瓦西里·斯大林在1959年1月19日写给 H. C. 赫鲁晓夫的信中对此勾勒了一个梗概，那就是在控制领袖获得信息的渠道上是如何斗争的，以及机关是如何战胜家族的：“总的来说，如果探寻一下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发迹过程，那么就很容易发现，他们是如何相互提携和帮助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还在战前他们开始飞黄腾达初期的一次合作。事情说的是 C. Ф. 列坚斯，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契卡人员，一个捷尔任斯基分子。我很了解他，因为他是我母亲 A. C. 阿利卢耶娃姐姐的丈夫。当贝利亚被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时，列坚斯就成了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局局长的一块绊脚石，因为列坚斯在外高加索工作时就知道了贝利亚的不良一面，而且列坚斯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斯大林同志。贝利亚决定把列坚斯从前进的道路上铲除掉。当贝利亚劝说斯大林同志有必要逮捕列坚斯时（谈话时我正好在场），斯大林同志生硬地驳斥了贝利亚，似乎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再提出过。但不管这让我感到有多么奇怪，贝利亚确实得到了马林科夫的支持。马林科夫说，他在莫斯科工作时就对列坚斯有所了解，并支持贝利亚关于逮捕列坚斯的意见。现在我记不得了，马林科夫当时担任的是什么职务，但好像是与党的干部相关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同志的话：‘请与同志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把这些干部的问题仔细调查清楚，我不相信列坚斯是敌人。’马林科夫是如何在中央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我并不清楚，但事实是列坚斯遭到了逮捕。在列坚斯因贝利亚搬弄是非而被捕之后，我们家就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关上了大门，但按照她的请求，我请斯大林同志接见她。我因为这一撮合而挨了批，并被告知：‘我不相信贝利亚说的列坚斯是敌人，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说。我不会见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因为我在列坚斯的事情上犯了错。以后不要再提出这样的请求了。’”（《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第130—131页）

斯大林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孤独之中。但这种孤独是非常独特的：他似乎融入了国家事务之中，他的个人生活也国家化了。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是怎么对儿子瓦西里说的：“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这是一个称得上是不幸的人的异

乎寻常的悲剧式自白。但问题是：他的自我感觉是否是这样的？想必，有时斯大林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且还特别强烈。也就是为什么他常常用集体进餐、集体看电影和戏剧来填补自己的生活空间。

在斯大林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位浅褐色头发、面颊红润的名叫瓦莲京娜·伊斯托明娜的姑娘。她是医学院毕业生。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是这样描述她的：“年轻的瓦列奇卡（瓦莲京娜的昵称——译注）鼻子翘翘的，嘴巴整天都合不上，不时发出快活响亮的笑声。”她是祖巴洛沃别墅的服务员，从1938年起就到了孔策沃，在这里她成了女主管，也就是女管家。

这个女人一直陪伴斯大林直到他离开人世，也从来没有想去影响他的决定。她默默无闻地与他在一起，甚至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国际会议上都是这样。

近几年有传闻说，歌手薇拉·达维多娃和纳塔利娅·施皮勒、芭蕾舞演员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都是斯大林的情妇，这是无稽之谈。他确实在戏剧和音乐会结束之后向她们献过殷勤，似乎从她们身上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男人与生俱来的吸引力，但事情仅此而已。清教徒不需要爱情上的胜利。

1938年5月，斯大林在孔策沃的别墅重新修缮，这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某些改观。5年前建造的只有一层的木结构的别墅（“位于花园、森林和花丛之中”——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话）变成砖砌的了。稍早之前这里已经修建过发电站、有台球桌的澡堂、办公小屋、带有地窖的储藏室、带有锅炉房的温室以及池塘。

“父亲一直是住在下面，实际上就住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为他提供了所有需要。他睡在沙发上（在沙发上为他铺了床），旁边的小桌上有工作所必需的电话，一张大餐桌上堆满了文件、报纸和书籍。如果没有别人，他就在这张桌子的边角吃饭。这里还有一个带有餐具、一层放有药品的餐具柜。父亲总是自己给自己选择药品，对他来说唯一的医学权威就是每年来为他检查一到两次身体的B. H.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房间里铺着一条柔软的大地毯，还有壁炉，这是房间里仅有的奢侈品和享受品，父亲承认这一点，并且非常喜欢这两样东西。以前按梅尔扎诺夫的设计是书房、卧室和饭厅的其他所有房间，都被改造成了这间房的样子。有时候父亲会搬到其中一间，并把自己的日常习惯也一起带过去。”（阿利卢耶娃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0页）

唯一使他钟情的是花园和公园。在他居住在沃伦别墅的日子里，共往那里移植了6至7万株植物：苹果树、樱桃树、葡萄、杜鹃、椴树、白桦树、槭树、松树、云杉、茉莉花、莨菪、醋栗和野蔷薇。他喜欢铃兰、紫罗兰、康乃馨、马鞭草、矮牵牛、天芥菜、石竹、美人蕉和丁香。

这个59岁的人的空间就是这样被填满的。他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他的个人需求并不多。也许，在用剪刀剪掉枯萎的树枝时，他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浩瀚及其与自己内心世界的交融。在这里，一个独裁者和一个普通人的双重身份融合在了一起。



## 第八章

# 斯大林创作自己的主要著作

---

斯大林编撰其主要著作、除掉托洛茨基的命令、马德里沦陷、布拉格被占领、在哈勒欣河与日本的小型战争

---

其实，只要一走出别墅花园，斯大林便同和谐告别了。1939年成了他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争取盟友而进行世界性角逐的关键年份。但首先必须整顿“叶若夫习气”之后的国内秩序，这一习气吞没了包括各地区领导在内的很多人。

现在返回到民主化为时已晚，民主化被推迟到未来合适时实施。不过，某些制度还是得到了整顿。

1937年退役的4661名军人和1938年退役的6333名军人都重新回到了部队。

1939年全年有22.36万人被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而从劳教院释放出来的有10.38万人。按照E. A. 普鲁德尼科娃的统计，到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近一半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人都获得了释放。在1937年和1938年共有68.1692万人被判处了死刑，而在1939至1940年间，被判死刑的只有4201人。“雅各宾式”的恐怖时期结束了。

这就意味着，间接承认了当局在清洗“军人阴谋集团案”中犯了大错。契卡人员被正式指责犯有过失，但没有人打算追究真正的原因。德国历史学家C. 哈夫纳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从1937年6月到1938年2月的9个月间，不管是在柏林，还是在莫斯科，几乎所有拉帕洛条约时期承载着德俄军事友谊的传统人士

都从指挥人员的队伍中消失了,而且在莫斯科他们的肉体也消失了。如果以前存在有推翻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联合军事政变的可能性,那么在这9个月里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引自:季亚科夫 Ю. Л.、布舒耶娃 Т. С.,《法西斯之剑在苏联打造》,第363—364页)

丘吉尔同样指出:“苏联对军队和政治机关的清洗是毫不留情的,但可能并非不是有益的。”(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32页)

而现在这股浪退潮了。

但是,我们要说明,1939年1月10日,中央向各地发去了一封由斯大林签署的密电。该密电作出说明,“在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时,不应追究他们“作为例外”而“采用肉体折磨”的过失。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用这一方式向外界表明,他们无意削弱与体制反对者的斗争,并正在这一领域整顿秩序。

刚刚形成的温和善良的主人形象一晃即逝,现在斯大林已经再度成了一个独裁者。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清洗时,他使自己的权力集团摆脱了来自这一侧翼的日益临近的危险。奇迹般逃避了指控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指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列宁指示的斯大林不仅打击了自己的现实对手,也打击了潜在对手。当然,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渴求防患于未然。而在任何国家,其特种机关的业务性质本身都带有某种违法的因素,因为机密部门的工作都是瞒着社会及议会机构进行的。不过,斯大林总是以战时思维来思考问题的。”(苏多普拉托夫 П.,《秘密战争和外交的不同岁月(1941年)》,莫斯科,2001年,第175页)

在另一个地方,苏多普拉托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像过去一样认为叶若夫对许多重大罪行负有责任,而且他还是一个专业能力不强的领导人。我相信,斯大林的罪行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原因之一就是叶若夫完全不适合从事侦查和反侦查工作。

“为了理解叶若夫习气的本质,必须考虑我国特有的政治传统。在独裁条件下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具有规模庞大的特性,而斯大林不仅在按其指示犯下的罪行中负有罪责,还在他允许其下属以他的名义消灭在区和州一级不合当地领导心意的人中负有罪责。通过消灭自己的反对者,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获得了甚至掌控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最普通的争论的可能性。”(苏多普拉托夫 П.,《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莫斯科,2001年,第100、101页)

斯大林认为,军队或国家安全系统中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应该获得政治上的潜势。而叶若夫越过了这条看不见的界线。

1938年8月,马林科夫在交给斯大林的《关于冒进》的报告中写道:“叶若夫及其部门在消灭上千名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问题上犯有过错。”斯大林马上作出了反应,



要求找出接替叶若夫的人选,并从7名候选人中选择了贝利亚。

与马林科夫捆在一起的贝利亚成了斯大林团队的支柱,进入了机关部门第一梯队。由于他的到来,人民委员部行动人员的构成得以大幅调整。领导层的人事变更达到了62%。绝大部分重新被录用的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党和共青团的系统招募来的。这意味着,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为早在列宁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以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为依托的体系还将长期存在。但在其机关中不再有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犹太人的数量也从40%减至5%。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在最令人生畏的特种机关中进行了一场革新。

还有一个情况也应该是斯大林需要考虑的。西班牙战争迎来了它的转折点,这是与对共和党人产生了沉重心理影响的慕尼黑协定相关联的。共和党人希望英国和法国与德国进行军事对抗,这将立刻导致佛朗哥分子的垮台。在1938年9月30日之后,西班牙共和党人越来越感到无望和悲观。10月,共和党总理胡安·内格林与苏联和在伦敦的不干涉委员会达成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国际纵队的协议。此时,斯大林已对国际纵队产生了怀疑,觉得他们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广泛影响。这种对国际纵队人员的态度悲剧性地影响了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命运。西班牙国际纵队第一政委安德烈·马尔蒂致信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此前我已经不得不提醒您注意科利佐夫的活动范围,这些根本不是一个通讯员的权力范围,但他自作主张地夺取了这些权力……现在我想提醒您注意更为严重的情况,并希望斯大林同志您能把这些情况视为近乎于犯罪。第一,科利佐夫与其忠实的伙伴马尔罗一起同当地的托洛茨基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了接触。如果考虑到科利佐夫对托洛茨基由来已久的好感,这些接触并不是偶然的。第二,我个人毫不怀疑,科利佐夫所谓的‘妻子’玛丽娅·奥斯汀是德国情报机关的秘密间谍。”(引自:格罗莫夫E,《斯大林:艺术与权力》,莫斯科,2003年,第319页)

(马尔蒂在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是托洛茨基的坚定反对者。他的得力助手是领导着反间谍部门的共产国际人员、民主德国的未来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

1939年2至3月,西班牙共和国濒临绝境。而在3月发生于马德里的卡萨多团长领导的暴动之后,这个政权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联合在卡萨多旗帜下的并不是人们认为的潜藏的佛朗哥分子,而是共和党人——右翼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军官。西班牙人厌倦了战争。只有共产党人不打算投降,准备战斗到底。原则上,这非常令人信服地反映了当时整个欧洲的心理状态。

还在1935年,巴黎就出版了《褐衫队员之网:备战中的希特勒间谍分子是如何在国外开展活动的》一书。该书中描写了4.8万名德国间谍的工作,并称德国纳粹党在海外有400个分部。

纳粹分子认真筹备着“第五纵队”,但民众的情绪完全是另一种:他们不想牺牲,

不想打仗。

1939年1月初,斯大林收到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报告,称希特勒1月5日在接见波兰外长Ю. 贝克时表示,“波兰和德国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1月26日,贝克在与里宾特洛甫会见时承诺,如果德国人支持波兰对乌克兰和黑海出海口的要求,那么波兰“将认真考虑华沙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可能性”。

由此产生了对苏联致命的后果。

3月10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他从国际形势开篇,直接说道:“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了,涉及从上海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广阔区域,涉及5亿多人口。强制性地改写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版图。建立世界秩序的整个体系从根本上受到了震动。”(斯大林И. В.,《斯大林选集》,3卷本,第3卷,第6页)

接下去,斯大林拿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与苏联进行分析比较,并屡次抨击了英国和法国:“可以想一想,德国人得到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地区的代价是必须与苏联开战,而现在德国人拒绝履行诺言,并让英、法滚远一些。”

斯大林明显向两个方面发出信号,而且主要是针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由绥靖政策拥护者始作俑的这场大型且危险的政治游戏可能将以他们的惨重失败而告终。”

他还谈到了工农红军已经强大,谈到了全球的外交政策,谈到了绝不能屈从于挑衅。整个报告的热点在于:我们是强大的,但并不准备打仗。

在谈到对“间谍、杀人犯和破坏分子”的政治审判时,斯大林没有做出这是“冒进”的任何暗示,相反,他说:“一旦爆发战争,我们军队的后方和前线由于编制均衡和内部统一,将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后方和前线都要牢固。”

在斯大林之后发言的代表,尤其是军方代表纷纷证实:军队是强大的,侵略者将遭到反击。

在1939年3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当选候补委员的是:贝利亚、什维尔尼克。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当选组织局委员的是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梅赫利斯、H. C. 米哈伊洛夫、斯大林、什维尔尼克、A. C. 谢尔巴科夫。

这次大会巩固了在统治精英中进行的急剧转变。在这里已经闻不到任何反对派的气息了。在中央委员会的新委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升为领导的年轻生产者:И. А. 贝内迪克托夫、Б. Л. 万尼科夫、H. А. 沃兹涅先斯基、A. H. 柯西金、A. A. 库兹涅佐夫、B. A. 马雷舍夫、П. К. 波诺马连科、И. Ф. 捷沃相、A. И. 沙胡林、C. B. 卡夫塔诺夫、H. C. 帕托利切夫、M. Г. 别尔乌辛。

委员名单中相当多的人员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领导层:В. H. 梅尔库洛夫、



C. A. 戈格利泽、M. M. 格维希阿尼、B. Г. 杰卡诺佐夫、Б. З. 科布洛夫、С. Н. 科鲁格洛夫、И. И. 马斯连尼科夫、И. Ф. 尼基绍夫。

新的军方领导人选自“西班牙人”：苏联英雄、坦克手 Д. Г. 帕夫洛夫和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 Я. В. 斯穆什科维奇。

上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委员得以留任的只有近五分之一。

“统一的前线和后方”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巩固,很快将得到检验。

在这份报告后附上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符合逻辑的。斯大林在 1938 年 8 月亲自投入到该教程的编写工作之中,他撰写了几个章节,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和修订。实际上,这本发行于 1938 年 10 月、首印达 600 万册的教科书,表达了斯大林对整个苏联历史,很显然也包括对党史的观点。斯大林催促大家尽快出版这本书。他在政治局向同僚们抱怨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拖延了整整一年了。”

为什么是“一年”呢?

因为新的时期开始了,那时新人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而《简明教程》正是针对他们的。

1938 年 9 月 22 日,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当大家开始夸奖《简明教程》的发表时(在《真理报》上),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激动起来,并生硬地说:需要的不是赞扬,而是工作人员来自实践的帮助和意见。接着斯大林阐明了自己全新的思想:“需要用思想和理论来教育干部……如果具备这些知识,那么就有干部,而如果缺乏这些知识,也就没有干部了,而只有一个空洞的职位。”他指出这本教程首先是针对正在学习中的青年人的,其次是针对管理人员、军队指挥员、中小学教师、工业和集体农庄的领导人的。他提出了一个“控制指标”,即这本教程的读者要达到 800 万名,“在这些人中,我们应该再次开展布尔什维克化的教育”。

10 月 1 日,在本次会议的最后,斯大林再次发言,阐述了一些理论问题,并对 Ф. 恩格斯的某些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有关国家将在革命胜利后消亡的观点)。马克思和列宁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但斯大林没有提及他们。斯大林说,社会主义需要巩固和强大的国家。正如为该书新版作跋的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的那样:“只有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以前的那三位经典作家及奠基人提出修正。”

不过,新的经典作家在教程中保留了对自己参加国内战争作出的极度谦虚的评价,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那些从事红军政治教育工作的”人们的名单中。他已经不是“第一支骑兵集团军的组织者”了,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太小了。

如今已经很难说,斯大林想通过这一教程去解决的问题最后完成得怎样。但他心中的那幅景象是完整、乐观和胜利的。至于其过于简便,这不是缺点,而是必要的

条件。实际任务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搞了这个共产主义手册,千百万人在按照它来学习,从中得到了他们对自己国家和其历史的必要认识。

在这本教科书中有对已开始的战争准确的地缘政治评价,虽然看起来这些评价是顺带出现在文章中的。例如: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占领在教科书中是这样表述的:“这不仅是对阿比西尼亚的打击,也是对英国的打击,对英国从欧洲到印度和亚洲海路的打击。”而关于“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的干涉”的阐述是:“实际上他们打击了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截断了英国和法国通往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广阔殖民地的海上通道。”

而在东方,“目前掌控着上海和天津的日本,可以随时把在中国中部拥有巨大投入的英国和美国赶出去”。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军事政治论述呢?这些论述明显不是为这本教科书而写的,也不是为教师、共青团和农艺师而写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是热衷于地缘政治分析的斯大林,也不可能脱离既定任务的框架。他未必是想通过《简明教程》去启发英国人;在地缘政治和对自己贸易交通的威胁方面,英国人是高手。

想必,斯大林这里是写给军人看的。军人们应该看到已是战火弥漫的整个大千世界。

斯大林喜欢自己的这一著作,并以此为荣,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人能确立和解决向人民解释新时期哲学这一任务。虽然他也谈到了《简明教程》中不完善的地方,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他也不可能使之更全面了。如今,当他的批评者们指出该教程对待复杂的历史和政治问题过于简单时,他们却不愿去想,该教程是为谁而写的。该教程是为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人家的子女们写的,而不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

所以,在会议最后,斯大林要求党的机关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需要结束对本国知识分子的无赖态度!”这并非偶然。

当然,知识分子已经不是旧制度时期的,而是自己的、苏联的、年轻的分子了。

而在《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斯大林对联共(布)的长久性作出了预言,且不管多么令人惊奇,这个预言应验了。教科书中写道,如果党能够与最广泛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那么“党是不可战胜的”,相反,“如果党被官僚主义习气所掩盖,那么它就会消亡”。他明显指的是他痛恨且被其清洗的集团势力,作为平行政权的原生质再度出现了。

这位承担着解决国家生活所有问题的人,其认知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军人们指出,斯大林阅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飞机设计师、军械设计师和经济学家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斯大林的确在尽力了解一切知识,以便自己亲自解决一切问题。在这方面体现出了他的力量,但同时也潜藏着对整个国家的巨大威胁。他变成不可替代的人



了。他的所知范围总归还是有限的。历史的波涛迟早会冲垮这个坚不可摧的峭壁。

斯大林的极权政治实际上完成了“需 10 年走完”的预定任务，现在需要在整个世界这盘棋上战胜那些强得多的对手。

当斯大林说德国和日本威胁着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时，他并没有搞错。在这一冲突中，俄国是单独行动的，而且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尽管希特勒并不拒绝“东方生存空间”的思想，但在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之后，他理应选择更为精密的招数。他没有可能同时与各方开战：铁血首相俾斯麦警告德国不能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遗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都应该帮助他作出正确的选择。（有意思的是，1939 年莫斯科出版了三卷本的“铁血首相”回忆录，而这种类型的文献，没有斯大林的同意是不可能出版的。）

斯大林对结成联盟的必然性是十分清楚的，所有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人也都作出了这一结论。例如，在苏联情报机关的通报中有一段罗斯福就 9 月 29 日与英国首相鲍德温的特派代表朗西曼勋爵会谈一事向部长们发表的报告记录，其中讲述了美国对未来战争所持的立场：“如果民主体制和法西斯主义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是由德国或是苏联引发的战争问题，那么美国将持另一种立场。按照罗斯福的主张，美国将保持中立。但如果苏联处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即德国领土要求的威胁之下，那么届时欧洲国家应对此进行干涉，而美国将站在欧洲国家的一边。在亚洲战争中，在美国利益没有受到直接触犯之前，美国将保持中立。”（《俄罗斯对外情报机关史概述》，6 卷本，第 3 卷，莫斯科 1997 年，第 468 页）

换言之，罗斯福只是在作战的大国受到严重削弱时才准备出面干涉，并坐收渔利。

但要知道，斯大林也是抱着几乎同样的打算。

罗斯福不能允许德国在摧毁苏联之后与日本一起把整个欧亚大陆连接起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英国将被征服。合乎美国心意的是它的所有欧洲竞争者都受到削弱，届时美国将会像一战结束后那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袖，而且还将成为政治的领袖。

斯大林没有幻想成为世界领袖。他的任务要艰难得多。这个任务可这样来阐述：在被外部敌对势力包围且国内经济不足以支撑与德国的战争之前，英国和法国将先开始与德国的战争。但愿上帝保佑，千万不能发生苏联与德国一对一的冲突！那样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援助苏联。

在这个时候没有谁能够帮助斯大林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甚至是那些院士和情报人员。

1939 年 3 月，斯大林会见了人民委员贝利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工作人员



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斯大林是在一次下达除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科诺瓦利茨命令的会见中记住苏多普拉托夫的。

贝利亚建议斯大林任命苏多普拉托夫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副处长，“以便帮助被动员来本机关工作的年轻党员干部完成政府的任务”。斯大林没有对此建议作出任何回复，只是请这位人民委员介绍一下国外侦察行动的主要方向。

贝利亚主张改变优先方向：不要与白俄侨民作斗争，而是要让驻外间谍机构为欧洲和远东的战争做好准备。他提议把注意力放在间谍对西方和日本的实业和政府人士的影响上，“这些人有通向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渠道，可以利用他们达到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目标”。同时，贝利亚还提醒要注意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影响，这些人企图让西方的左派运动服从于自己，并“要让苏联丧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托洛茨基。其实，提拔苏多普拉托夫就是为了开展针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动。

下面是苏多普拉托夫记录的斯大林的话：“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在托洛茨基运动中并没有其他显要的人物。如果托洛茨基完蛋了，那么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消除了……托洛茨基，或是在你们的业务中所说的‘老人’，应该在一年内除掉，要赶在不可避免战争爆发之前。不除掉托洛茨基，就像西班牙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就不能确信，在帝国主义者侵犯苏联时，我们能得到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盟友们的支持。他们将难以履行自己破坏敌人后方稳定的国际义务，难以开展游击战……党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参与这次行动的人，而且不仅会照顾他们本人，也会照顾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苏多普拉托夫 П.，《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年—1950年）》，第105页）

斯大林的依据是不断传来的有关以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温和派政权为目标的托洛茨基活动的情报。托洛茨基把日益临近的战争看成是“纯洁社会主义”的机会，这样一来，他的目的就与那些想把苏联卷入对德战争的西方人士的目的相吻合了。

为了直接实施“行动”，苏多普拉托夫推荐了刚从法国回来的瑙姆·艾廷根。艾廷根建议把此次行动称为“鸭子”行动（掩护暗语）。贝利亚批准可利用艾廷根个人的关系和其在西班牙的间谍。这样，在这一行动中就出现了拉蒙·麦卡德。

1939年10月，艾廷根来到纽约，在欧洲社团和其哥哥的帮助下开办了一家进出口公司。艾廷根的哥哥是美国公民，从事毛皮贸易，在苏联享有关税优惠。这家公司就成了联络中心，也成了拉蒙·麦卡德的“隐身之所”。拉蒙·麦卡德是一个美男子，按苏多普拉托夫的话说，长相酷似法国演员阿兰·德龙。艾廷根筹建了3个用于实施行动的非法移民小组。

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开进布拉格，这是“对慕尼黑协定的补充”（此时，斯



洛伐克宣布独立；而受到波兰支持的匈牙利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和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地区)。英国首相在国会谴责希特勒，但并未提出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的建议。英国报刊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愤怒声讨。3月17日，张伯伦表示，其政府将抵制德国确立自己世界霸权的任何企图。迈斯基写道，欧洲传出流言，说德国下一步要占领罗马尼亚及其在普洛耶什蒂的油田，而这正是英国人非常担心的。

紧接着在3月18日，英国驻苏联大使Y. 西兹便向李维诺夫询问：一旦德国进攻罗马尼亚，莫斯科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当天傍晚，李维诺夫在克里姆林宫经过商讨之后答复说，对该威胁最好的反应就是立即召集英国、苏联、土耳其、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代表举行会议。这样，斯大林迫使西方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3月19日，英国人拒绝了这一建议。

3月21日，德国政府向波兰提出了对格但斯克(但泽)的领土要求。

3月22日，德国人占领了梅梅尔(克莱佩达)。

3月23日，德国强迫罗马尼亚签署了保证德国能够获得石油的协议。想必，在这一协议签订之后，伦敦想起了一战时的惨状，以及英国人同德国人为争夺普洛耶什蒂石油而进行的残酷斗争。

也是在3月23日，苏联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向各军区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因国际形势紧张而对军队进行加强和扩充的指示。

3月29日，佛朗哥分子控制了整个西班牙。

4月7日，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并建立了针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军事基地。

在世界已伤痕累累的情况下，斯大林在西方仍旧没有一个盟国。

英国政府的行动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最后的幻想破灭了”；波兰、希腊和罗马尼亚都得到了在它们受到德国侵略的情况下将获得英国保护的承诺。英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

4月14日，罗易·霍华德发表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的文章译文被呈报给了斯大林。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极大地激怒了领袖：

按照总的估计，在最近两年中，有几千名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领导被枪毙、流放或者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被清洗了。其结果造成了军事领域和工业领域的混乱，并且在那些刚刚进行过清洗的领域里，充满了恐慌、封闭和与外国人接触时的畏惧。

在莫斯科充斥着间谍、告密者和内奸，以至于到了每个人都有嫌疑的程度。外国大使馆雇用了有专门编制的本国国籍的电工技术员。这些电工技术员的唯一责任就是定期检查所有的房间，以寻找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安装的窃听器。

这些窃听器被大量找到。不信任、保密和怀疑的态度像没完没了的迷雾一样笼罩着所有的地方。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状况显然是最近十年中最糟糕的。

按照外国军事情报机关的资料,飞机生产在数量上大规模持续增加,但飞机的质量则非常低劣。迄今为止,就如同对那些刚掌握了技术的人们的预期那样,苏联飞机设计师很少表现出或根本没有表现出创造才能,而这是保持高效的空军作战力量所必需的。就像人们所宣称的那样,大量的苏联飞机不是仿制的,就是对目前已被欧、美更现代化的歼击机和轰炸机淘汰了的机型进行稍加改进的飞机。

在采取措施甩掉外国工程师和领导人之后,重工业领域开始滑坡。如果从纺织品、服装和鞋子这些最重要物品明显短缺的情况来判断,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甚至达不到最基本的水平。百货商店的货架几乎是空的,就像几年前采取措施执行各种业已公布的强化生产计划时一样。(《大检查:苏维埃国家中的作家和记者(1917年—1956年)》,莫斯科,2005年,第506—507页)

P. 霍华德还写道,在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不再存在了,有的只是“东方的军事独裁”;从官僚中产生了新的“像所有具有东方思维方式的那种对权力充满贪欲、对极刑极其冷漠的”政党。斯大林把这些句子勾了出来。但更触痛他的还是下面这段话:“苏联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尽管它拥有庞大的陆军和数量众多的空军,但根据外国军事观察家,以及法、英国务活动家的观点,当今的苏联已经无望,在任何一种即将结成的反法西斯的力量组合中,已经不再考虑苏联的因素。”(《大检查:在苏维埃国家中的作家和记者(1917年—1956年)》,莫斯科,2005年,第509页)

在五一阅兵时,斯大林向西方发出了独特的答复:在西方领导人画像中没有了张伯伦的肖像画,在红场的上空则飞过81架全金属制造的双引擎轰炸机。而在1936年11月7日举行的上一次阅兵时,这种轰炸机不到此时的五分之一。

到二战在欧洲爆发,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了。

此时,英国和法国开始了与苏联的外交磋商,并最终签署了互助条约。但两国磨磨蹭蹭地将条约的签订拖到了8月底。

与欧洲事件发生的同时,苏联东部边境的军事局势也在恶化。侵占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日本获得了经济发展的资源。“日本选择了战争,而不是经济崩溃”(Я. 莫里逊的话)。像柏林一样,东京渴望通过开辟“大东亚共荣圈”来获取“生存空间”。日本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成为从中国东北到澳大利亚、从斐济岛到孟加拉湾的经济帝国的中心。这一地区所有大玩家(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苏联)都成了日本的竞争者和



敌手。对莫斯科而言,问题是:要最大限度地使日本人在中国陷入困境,使之深陷其中以至于无力进一步向北方进行侵略。

东部边境上的状况纷繁复杂,这要求克里姆林宫不仅仅要加强战备水平,还要展开针对日本的先发制人的秘密行动。当然,也没有任何人想要去实施任何公开的军事行动。相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量不给日本的侵略制造口舌,但在日军进入满洲里之后,少数苏联领土就处在了实际威胁之下。在边界上双方开始发生武装冲突。从1937年至1939年,日本人试图占领位于阿穆尔地区的几个小岛。日本的宣传机构要求苏联把与其滨海边疆区接壤的一些“有争议的领土”还给中国。1938年7月中旬,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重光葵要求把“有争议领土”交给日本。

但苏联有一个强有力的受到它或明或暗支持的盟国——中国,莫斯科在建立平衡。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1937年10月起,苏联开始用贷款向中国供应武器。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9月,苏联一共向中国提供了985架飞机、82辆坦克、1500多门炮、超过1.4万挺机枪,以及弹药、仪器和设备等(希罗科拉德A.，《俄罗斯和中国:冲突与合作》,莫斯科,2004年,第310页)。苏联提供的军事志愿飞行员和伊-15、伊-16歼击机的援助尤其有效。很快SB和TB-3轰炸机也被运到了中国。这种支持遏制了日本向武汉方向的进攻。苏联飞行员甚至轰炸了日本在台湾的机场。

这样一来,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斯大林一下子就达到了两个目的:把日本从苏联边界引开,并巩固了当时正与蒋介石合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位。

斯大林的敏锐及其善于利用他人矛盾,对毛泽东来说是很好的一课。几年后,即在1941年11月,当德军逼近莫斯科并且存在日本进攻苏联的实实在在的危险时,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最大可能地加强抗日的军事行动。

(10年后在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承认,民族利益对他来说高于我们主人公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总是存有某种戒心,怀疑他有转向铁托路线的倾向,这绝非偶然,并且中国领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我们注意到,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东京是它们倾销商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因此他们继续向日本帝国供应石油、金属加工机床和其他战略物资。这样,1938年日本帝国90%的需求是由美国提供的。

实际上,只有苏联是中国无条件的盟国。在帮助再次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的同时,莫斯科实际上是在借助国民党的双手战斗。莫斯科有意在拖延这场战争,又向中国运去了新的援助,目的是为了不让蒋介石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由于苏联精心巧妙的政策,日本的“闪电战”计划泡汤了。

我们需要强调,斯大林掌握了关于日本计划的完整情报,因为苏联在东京的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拉姆扎伊”)在日本政府和德国使馆中拥有第一流的线人。

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争斗就在于，所有的竞争者考虑到日本不可能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都竭力把日本从自己身上推到对手的那一边。

1938年6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分局局长、三级国家安全政治委员亨里希·柳什科夫逃到了日本，并立刻开始与日本军事情报机关合作。他向日方提供了在哈桑湖边界冲突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情报。佐尔格告诉工农红军情报局，称柳什科夫表示，由于红军中存在广泛不满情绪，而且西伯利亚还存在强有力的反对派，一旦日本进攻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力将在顷刻间溃败。此外，柳什科夫还供出了军队的数量和部署情况，以及它们的组织和装备情况。

日本人在制定哈勒欣河（哈拉哈河）地区行动计划时参考了柳什科夫提供的情报。而佐尔格也对此作出了警告。

1939年5月11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附近发生了武装冲突。一部分日本关东军闯入蒙古领土，并击退了通往哈勒欣河的蒙古边防哨兵分队。日本人计划占领蒙古，把中国与苏联隔开，并控制军事战略基地，以期进一步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然后再在这里修建通往外贝加尔的铁路和防御区域。顺便提一下，7月中旬，英国驻东京大使克莱琪告知日本外相有田：“英国在远东地区不会与日本发生对抗。”（引自：扎哈罗夫 M.，《战前的总参谋部》，莫斯科，2005年，第133页）

5月26日，2500名日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开始了进攻，但在两天的战斗之后，蒙古和苏联军队击退了他们。

7月2日，日本军队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占领了哈勒欣河右岸弗伊高地以北的地盘。日本人的兵力包括3.8万人、310门大炮、135辆坦克和225架飞机。局势变得有些麻烦，因为苏军距离最近的博尔贾火车站远在700多公里之外，而日本人可以说火车站就在身边，离他们100公里的地方就是海拉尔铁路枢纽站，在30公里处还有一个正在建设中的霍伦-阿尔尚铁路线上的终点小火车站。

采取决定性的作战行动之前，斯大林在与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П. К. 波诺马连科一起讨论局势时说，需要向那里派遣一个具有开拓能力的人，“他不仅能够改善情况，还能够在有机会时教训一下日本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格奥尔吉·朱可夫被挑选上了，从这一刻起，他的命运开始一路上升。朱可夫到莫斯科找过伏罗希洛夫之后立刻被派去蒙古，到了驻扎在离事件发生地120公里的第57独立军的司令部。在这里，朱可夫显现出了自己的性格，在其开始指挥工作的第一阶段就不得不与两位上级长官发生了冲突——副国防人民委员 Г. И. 库利克和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 Г. М. 施特恩。

两个人都想迫使他接受自己的意见，虽然他们知道，朱可夫可以独立行事，并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库利克建议，当日本军队接近占领地时，把炮兵部队从军事基地调到哈勒欣河东岸，以此来消灭敌人的步兵。施特恩则建议推迟进攻，先聚集力量。朱



可夫对两种建议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要求书面命令，并说不管怎样都会向莫斯科报告。朱可夫所说的莫斯科，指的就是斯大林，这使施特恩清醒过来。

朱可夫对享誉西班牙的苏联英雄施特恩的答复需要逐字逐句地转述：“我拒绝您的建议。部队信任我，而且这里的指挥是我。您受命要支持我，保障我的后勤。请您不要超越您的权限。”（西蒙诺夫 K.，《历史的重水》，莫斯科，2005 年，第 85 页）

库利克的干涉产生了严重后果。朱可夫应该执行命令，尽管他立即就向伏罗希洛夫作了报告，说明库利克的命令与战局相悖。结果是苏联军队的调动很快变成了穿越哈勒欣河渡口的逃跑。于是，朱可夫把独立军团司令部的所有军官都派到了那里。

他们成功地制止了恐慌，但仍然失去了诺若高地和三角标高地，后来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得以收复。

伏罗希洛夫撤销了库利克的命令，并宣布因其独断专行而给予处分。

但除了库利克和施特恩之外，朱可夫还面临其他难题。从 1939 年 7 月 16 日呈报给工农红军政治部部长梅赫利斯的报告就可以看出，一些军队中的道德水准是何等低下：“在已经到达的第 82 步兵师中发现了极端不守纪律和犯罪的事件。没有头盔和挖掘战壕的工具，没有手榴弹，发放的步枪枪弹没有子弹夹，而左手枪没有手枪皮套……人员构成极为混杂，没有任何人经过训练，由斯捷潘诺夫少校和团军事委员穆辛率领的先头部队尤其混杂。现在这两个人都被打死了。这个团在第一天就遇到了对方的挑衅行动，并可耻地放弃了火力阵地，而在这一变节行为之前，该团过去的两名战士奥舒尔科夫和沃龙科夫曾企图枪杀该团的所有政工人员。为了杀一儆百，7 月 12 日，逮捕了机枪连连长波塔波夫并当着战士们的面枪毙了他。这个团的一个营长格尔曼还唆使自己的营后退，也被枪毙了。为了终止这种恐慌，此时正在军团的所有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被调派了过去……在这个团中还有几百例为逃避军役而故意自伤的情况。”（引自：《苏联元帅 Г. К. 朱可夫（生平研究）》，2 卷本，第 1 卷，莫斯科，2005 年，第 64 页）

这份报告无疑被上报给了斯大林。从文中可以看出，军队训练无方，再加上库利克和施特恩的干扰，情况糟糕透顶。因此有着惊人意志和体能的朱可夫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斯大林来说，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于是朱可夫很快取代了骑兵第一集团军出身的将领（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库利克等），成了整个苏联军事将领的领军人物。

接下去，朱可夫自担风险让坦克部队直接投入了战斗，虽然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

员和装备,但却打破了日本人的设防固守。可以说,朱可夫不太珍惜士兵的生命,但就像朱可夫正确预计的那样,如果事态按照敌人的设想,向另一种情况发展,损失将会多出 10 倍。

哈勒欣河的边境冲突迅速升级成了局部战争。日本方面参战的有 7.5 万人,苏蒙方面则有 5.7 万人。日本的损失达 2.5 万人,而苏联只损失了 9000 人。

1939 年 8 月 23 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9 月 9 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茂德走访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并转达了本国政府希望缔结和约的建议。

后来,当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时,朱可夫应该想起了这个他将危险从苏联边界移开的酷热的蒙古夏季。

顺便说一下,1939 年夏季的事件表明,美国领导人对世界局势的估计与英国政府的估计完全不同。美国人不打算耐心等到日本将其完全从东南亚排挤出去。

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两件勾勒出在这一地区战争与和平前景的外交大事。1939 年 7 月 24 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按照这一协定,伦敦“完全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现有地位”。7 月 26 日,美国国务院通知日本驻美国大使,美国将不再续签 1911 年 2 月 21 日签订的美日贸易协定,而该条约 6 个月后即将到期。美国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可能是禁运,这将完全削弱日本的工业、航空和海军。

需要注意到英美间这种原则性的分歧:英国看不到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前景,而美国则在争取重新划分亚洲。



## 第九章

# 张伯伦、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想 战胜对方

张伯伦、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想玩弄  
对方、勾心斗角时期的结束、“静坐战争”

与日苏军事冲突(顺便说一下,按照苏联驻美全权代表乌曼斯基的意见,这一冲突之所以发生是为了对正在进行的英法苏谈判施加压力)并行的是,苏联外交部和斯大林本人也采取了一些外交行动。这些外交行动旨在加快平等条约的签订。

从1939年春天开始,欧洲展开了一场秘密的博弈。其中英国人作为善于搞联盟的大师试图智胜德国,为了对德国施加额外的压力,英国人还利用将取得苏联的支持作为威胁。因此,7月底,伦敦转交给柏林的一份情报称,英国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仅仅是与德国真正和解的后备手段”,这是完全正常的。

苏联领导人也猜到自己将成为孤家寡人,英国外交官们的微笑总是飘忽不定,就像是JL.卡罗尔童话中柴郡猫的那种微笑。苏联没有获得在反苏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欧洲支持的任何希望。

1939年6月29日,《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A. A. 日丹诺夫撰写的题为《英法政府不想与苏联签订平等条约》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英国、法国和苏联关于签订一份有效的反侵略互助条约的谈判进入了僵局。”

接下去，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话锋指向了斯大林。他说：我认为，他们不想与苏联签订平等条约，而“我的朋友们依旧认为，他们是怀有诚意的”。

谁是日丹诺夫的“朋友”，大家都很清楚。

作者举出了一些对方在拖延的事实，甚至还采用了斯大林关于有人喜欢借刀杀人的著名语句，并得出结论：谈判只是空洞的闲聊，“是他们为与侵略者达成交易铺平道路”。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A. 日丹诺夫”。也就是说，用斯大林领导层中的一员这一谨慎的称呼，向伦敦和巴黎表明其严肃警告的平缓基调。

这里就体现出了斯大林的高明之处。

与此同时，巴黎也对谈判拖延敲响了警钟。1939年7月19日，法国外长 Ж. 博内通知法国驻伦敦大使 III. 科尔班说，中断谈判将破坏“我们在欧洲的整个安全机制”，并损害“我们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援助承诺的有效性”，并且最终将对“和平或是战争”产生影响。

1939年7月24日，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概述了有关情报”：张伯伦“拼命想逃避履行自己承担的保障波兰的义务，同时还恢复了本国以前的‘绥靖’政策；张伯伦还实行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建议波兰人在回应德国要求归还但泽时表现出‘节制’，并宣布对英国海军进行动员，还建议‘只要希特勒让西方保持安静，而转向东方’将为德国提供高达10亿英镑的巨额贷款。”（《危机之年：文件与资料（1938年—1939年）》，第2卷，第119页）

7月24日，英国和日本政府在东京发表了联合声明（《有田-克莱琪协定》）。伦敦承认，“日本在华武装力量是其确保自身安全目的的特殊需要”，能够“压制或消除妨碍他们或有利其对手的因素”。在这里，除了暴露无遗的失败主义之外，英国似乎未能有所表现。当然，慕尼黑不在其内。

7月26日，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 Г. A. 阿斯塔霍夫与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局东欧处处长 К. Ю. 什努列在柏林会晤，面谈了德国人关于两国本着“拉帕洛条约”的精神开始接近的建议。莫洛托夫（5月4日取代李维诺夫成为外交人民委员）答复阿斯塔霍夫说：“此事完全取决于德国人。”也就是说在等待德国人的具体建议。

此时，在法国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同意了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三方会谈。

苏联大使 И. 迈斯基告知英国政府，莫斯科希望看到英国代表团团长是身居要职的军人，最佳人选就是现任英国总参谋部参谋长的戈特将军。但英方却任命了接近张伯伦圈子的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德拉克斯为团长。在苏联驻英国大使馆的早餐会上，对于迈斯基提出的代表团是否乘飞机前往莫斯科的问题，这位海军上将回答说，代表团将乘船前往莫斯科。迈斯基指出，“这种异常的迟缓”是“暗中破坏谈判这一心



结”的体现。

如果斯大林把自己放在张伯伦的位置上,那么他多半会明白,在过去几年一直执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除了对德宣战之外,如今并没有其他方式能够为波兰提供保障。但宣战意味着张伯伦自身的垮台。所以英国没有与莫斯科结成军事同盟的任何可能性。

而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并不希望得到苏联的任何保障。何况,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还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种背景下,若想结成英法苏军事同盟,还必须克服来自这些国家的阻力。离开这些国家,条约的军事(交通)内容就等于零。

苏联情报机关通报莫斯科,法国政府仍像过去一样并未失去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希望。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提醒说,英法苏谈判始于罗斯福的提议。罗斯福曾派自己的代表去伦敦提出警告:德国在西欧取得统治地位对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将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来自苏联的消息表明,英国人明显不愿意遵从罗斯福的强硬主张。

不过,德国对如何选择同样犹豫不决:德国将军们反对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1939年整个8月,德国人都在试探莫斯科和伦敦的想法。8月21日,德国人建议英国人接受戈林8月23日前去谈判,同时建议莫斯科接受里宾特洛甫去谈判。苏联和英国对此都表示了同意。而这时希特勒则作出了选择:8月23日他取消了戈林的出访,对希特勒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阻止英法苏联盟的建立,并防止这些盟国可能从东方对其进行的经济封锁。

德国警觉地追踪着整个谈判过程,但在获悉英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之后便安心下来了。8月1日,德国驻伦敦大使Γ.迪克森告知柏林:“尽管派出了军事代表团,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由于派出了军事代表团,这里对与俄国就签订条约而进行谈判的建议仍是持怀疑态度的。英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足以证明这一点:海军上将、如今的朴次茅斯要塞司令实际上已经退役,并从未在海军总部的参谋部供过职;陆军将军,其实也就是一位普通的队列军官;而空军将军则是一名优秀的军事飞行员和教练,但绝不是一个战略家。这表明,军事代表团的任务与其说是签订军事行动的协定,不如说是去确定苏联军队的战斗力。”(《危机之年:文件与资料(1938年—1939年)》,第2卷,第151页)

我们要补充一点,抵达莫斯科的海军上将德拉克斯随身并未携带任何政府的授权书。在获悉这一点后,莫斯科的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8月1日,迪克森大使还向柏林发了另一封信。信中报告了其大使馆参赞寇特与英国工党政治家查尔斯·罗丹·布克斯顿的一次会谈。谈话中,布克斯顿建议英国和德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引证了1898年至1904年英国与法国在北非的类似实践,以

及1907年英国与俄国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类似做法。英国人关于英国可以影响法国,使之废除与苏联的条约并终止在莫斯科谈判的想法,引起了大使的特别兴趣。

迪克森指出,划分势力范围是张伯伦固有的想法。

这里要提醒一下,1907年签署的俄英协定的确使伦敦在亚洲放开了双手,这完全来自于张伯伦的学说,并促进了反德军事同盟的建立。而现在,伦敦向柏林建议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问题,希望德国转向东方。

1939年8月7日,对外情报总局收到了情报人员关于与德国驻波兰空军武官A.盖尔斯滕贝格的谈话记录,其中有两条重要的消息:第一,希特勒确信,一旦发生冲突,英国将保持中立;第二,8月25日后将与波兰开战。《《危机之年:文件与资料(1938年—1939年)》,第2卷,第178页)

但是德国仍然对英法苏谈判怀着强烈的不安。8月12日,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阿斯塔霍夫告诉莫洛托夫:为了使协议无法达成,德国人“不惜找出各种理由和作出各种承诺”。“放弃波罗的海地区、比萨拉比亚和波兰东部(更别说乌克兰了),这是目前我们的最低要求,不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德国人就会同意这一要求,只要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不干涉其与波兰冲突的承诺就行。”《《危机之年:文件与资料(1938年—1939年)》,第2卷,第185页)

他还指出德国有为进行军事行动做准备的迹象:军队被调到了波兰边境、汽车被征用、加油站的汽油严重不足和居民焦虑不安等。

8月12日,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开始谈判。苏联代表团以伏罗希洛夫元帅为首,英国代表团由海军上将德拉克斯率领,法国代表团则由杜芒克将军率领。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22日,并带着一种悲剧的色彩。整个会议期间,伏罗希洛夫一个劲地向自己的谈判伙伴建议转入具体协议的起草工作,并回答在德国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下,苏联军队走哪一个通道去与侵略者进行交战的问题。伙伴们对此未给出答复,并且日复一日敷衍了事:一旦开战,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伏罗希洛夫仍然坚持要求对此给予明确的答复,还中断谈判与斯大林(或是莫洛托夫)进行了磋商,并在暂停后继续提出了这一问题。

法国人杜芒克知道英国人不想让苏联军队获得在西方的行动自由,于是就通过法国大使请求本国政府紧急对华沙施加压力,以便让波兰同意让苏联工农红军的部队通行。波兰人对巴黎的强大压力给予了坚决的拒绝。华沙认为,有了伦敦的保障就足够了。(我们不要忘记,波兰外长IO.贝克在柏林会谈之后于1939年1月5日宣称“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波兰和德国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1月26日,贝克在与里宾特洛甫会晤时表示:如果德国支持波兰吞并乌克兰和打通黑海出海口的计划,那么波兰将考虑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可能性。《《俄罗斯对外情报机关史概述》,6卷



本,第3卷,第289—290页)

与此同时,德国积极展开了与苏联签订经贸条约的准备工作,并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进行了试探。在德国大使Ф.舒伦堡8月15日递交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写道:德国没有任何针对苏联的侵略计划,“也不存在任何两国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为了阐述德国的立场,里宾特洛甫可以马上到莫斯科来。

从这一刻起,斯大林就已经同时进行着两场谈判。

在一个谈判桌上,总参谋长С.И.沙波什尼科夫、工农红军空军部主任А.Д.洛克季奥诺夫和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正向英国和法国代表团介绍苏联武装力量的潜力。而在另一个谈判桌上,则讨论着与德国的条约。

8月17日,莫洛托夫和舒伦堡交换了备忘录。莫洛托夫表示,签订条约一事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

法国政府不知道该如何向伦敦和华沙施加压力。法国总理达拉第对美国驻法国大使У.布利特激烈谴责了华沙的立场。布利特也向国务卿К.赫尔汇报了此事。但众所周知,美国对欧洲事务的立场是保持中立。

8月19日,苏德贸易协定得以签订。

8月21日,伏罗希洛夫在没有得到波兰人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再次提出了关于向波兰调遣军队可能性的问题,并表示“有一切理由来怀疑他们是否有与苏联开展实际和严肃军事合作的意向”。

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与波兰并不接壤,并且它们只能通过罗马尼亚向波兰军队提供补给,那么苏联在波兰国防,以及在维护欧洲和平中的基本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伦敦和巴黎不至于不懂这一点。

8月21日,舒伦堡向莫洛托夫转交了希特勒写给斯大林的信。信中写道:“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我而言就是使德国的政策得以长期巩固。这样一来,德国将回归到几百年来一直有利于两国的政治路线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从这种根本转变中果断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危机之年:文件与资料(1938—1939年)》,第2卷,第302页)

这些话里直接指出了俄国和德国在19世纪的联系。

8月21日,法国领导人为使苏联代表团不停止谈判作出了无望的一搏,但杜芒克将军却不可能提出任何实际的建议。法国外长博内发电报给法国驻华沙大使Л.诺埃尔说:“不管是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波兰都不能拒绝尝试这一拯救世界的最后机会”,要求大使“强硬提醒”波兰政府想一想法国为其提供的贷款、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并要“考虑如拒绝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这类似于最后通牒,但波兰人却装做没有听见。

8月22日,在军事代表团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伏罗希洛夫请杜芒克将军让他看一

看关于波兰政府允许苏联军队通行的官方文件(巴黎断言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杜芒克将军回答：“我没有这个文件，但我得到政府的通知说，对基本的、重要的问题的答复是积极的。”

伏罗希洛夫继续紧逼：“我不怀疑将军您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正面答复。但波兰、罗马尼亚和英国的立场并不清楚。”

杜芒克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这些国家的立场。他又说，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谈判毫无结果，而这时“有人该来了”(暗示将从德国来一位身居要职的客人)。

伏罗希洛夫表示同意：“这是事实，但这错在法国和英国方面。”他提醒道，军事合作问题已经提出来几年了，没有任何进展。很明显，这位向来平和的人民委员发怒了：“去年，当捷克斯洛伐克遭殃时，我们等着法国发出信号，我们的军队整装待发，但到底还是没有等到。”

双方又谈了谈有关波兰的事情，伏罗希洛夫激动地说：“难道我们需要乞求给予我们与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的权利吗！”

谈判就此结束。

8月22日，迈斯基大使从伦敦传回一则消息称，里宾特洛甫即将访问莫斯科。并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事，这“在这里引起了近乎恐慌的极大不安”。

英国人明白了，德国没有像期待的那样向东方开辟战线，反而对准了他们的方向。勾心斗角的时期结束了。

苏联与德国的条约签订了。双方都明白，这一条约简直就是在“枪口”下签订的，因为正如丘吉尔所说：“这两个帝国及其体制之间的对立是不共戴天的……”这份绝密的议定书确定了两国的利益范围。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波兰和比萨拉比亚都被划归为苏联的利益范围。

斯大林对《慕尼黑协定》和绥靖政策(带有向东方扩张因素)作出的反应是符合沙俄最高文官大臣戈尔恰科夫的精神的。在俄国败北的克里米亚战争(东方战争,1852年—1854年)之后,英国、法国在奥匈、普鲁士和撒丁王国支持下,实际上已把俄国从黑海排挤了出去,只有俄国与普鲁士之后签订的协议才恢复了俄国失去的地位。柏林同意废除巴黎和会的苛刻条件,以换取俄国对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实现德国统一的支持。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就报了仇。

接下去,俄国和德国的这种“亲属”关系又在拉帕洛条约中表现了出来。现在的莫斯科条约也具有这种意识。

人们说条约不道德,秘密议定书不可接受,这不过是一种不高明的宣传。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比这更不道德。还不至于被称为苏联代理人的丘吉尔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斯大林认为,在战争之后与西方列强的抗衡中,对于俄国来说,希特勒将是危险性较小的敌人……这种协定的存在是有可能的,这一事实标志着英国和法



国最近几年的政策和外交的彻底失败。”(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1 卷，第 180 页)

不过斯大林的政策可以被称为是出色的，战术上他打败了所有的人。在东方存在日本侵略威胁时，他顷刻间就使这种威胁降到最低，因为他使东京的主要盟国中立化了。

但事实上，据推测，在把德国侵略推迟到 1941 年的同时，斯大林也成了自己战术胜利的俘虏，并使苏联在 1941 年和 1942 年遭遇了可怕的危险。

而且在西方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带有谴责语气的评价中，总是透露着对为国家安全而跨越了意识形态禁忌的斯大林的胆大妄为的暗暗惊讶。丘吉尔称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冷静估算出来的，并具有高度的现实性”。未来联盟中的斯大林的盟友是可以理解的：大不列颠外交失败之处，即是苏联外交的制高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的情况。5 月底，总参谋部就开始制定入侵波兰的计划(白色方案)。方案准备用机械化师和坦克师对波兰实施闪电打击。但是布劳希奇将军提醒希特勒，他认为战胜波兰、甚至法国和英国都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苏联参战，那么一切都将落空。到 1939 年夏，德国在西部边境上只部署有 6 个师。而且，军队也并未做好进行长期军事行动的准备。

力量对比如下：苏联、英国、法国有 311 个师、1.17 万架飞机、1.54 万辆坦克和 9600 门大炮。德国和意大利有 168 个师、7700 架飞机、8400 辆坦克和 4350 门大炮。

但德国还是决定于 7 月 26 日 4 点 30 分对波兰发动攻击。前一年差点发动政变的理智的德国军官对此充满怀疑。世界大战的前景令他们焦虑不安。

8 月 25 日，让希特勒没有料到的是，英国重申本国对波兰的保障义务，并签订了相应的协定。希特勒命令已经完成调动的军队停止行动。他试图通过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强迫波兰接受德国的条件。

对波兰的新一轮进攻定于 8 月 30 日，但随后又被取消了。而波兰则宣布进行战时动员。

8 月 31 日，希特勒签署了“第 1 号战争令”。进攻时间定为 9 月 1 日 4 点 45 分。

对和平解决争端抱有希望的总参谋部的将军们极为震惊，必须作出最后的选择了。而不信任他们当中的多数人的希特勒则采取了空前的保险措施：他把纳粹党的政委派到军队的司令员身边工作，由此确保控制，并防止自己遭到政变。此外，党卫军还没有自己的指挥部。这样一来，军队领导权就处于了监督之下。希特勒还核查了直至团一级的所有分队的作战部署。

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性质显示出了德国人极大的优势：他们在装备和战略上要比波兰人高出整整一个世纪。在一定程度上，7 月的这场战役对斯大林和工农红军的领导来说就是一面镜子。



德国的计划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包围和消灭在维斯瓦河转弯处的波兰军队；第二阶段——对从东普鲁士向南、从斯洛伐克向北围住东部直至寇松线的广阔疆域进行正面打击。波兰人的处境之所以困难之极，还因为他们所有的领土对于入侵者来说都是开放式的，而且其主要的工业区都位于距边境相对较近的地区（在这方面，苏联辽阔的疆域则是一种额外的“武器”，乌拉尔-西伯利亚工业基地也是难以攻占的）。

4点40分，战争以密集空中打击开场，波兰人对这种开场毫无准备，他们以为会像1914年那样，是一场不慌不忙的战役。德国轰炸机摧毁了波兰人停在机场的飞机，超低空飞行的歼击机则扫射了车辆和士兵。在波兰军队的后方，空投了专门从事爆破作业的破坏小组。波兰军队的整个指挥系统遭到破坏，动员也失败了，而主要力量还没有到达集中区域。最初几个昼夜获得的制空权得到了坦克师围攻的支持。坦克师不顾被切断退路的风险，采用了快速深入腹地的战术。与法国人沿前线突破进而扩展的战略不同，德国人企图以行动的快速震慑对手。德国人绕过了对方的阻击点，把它们留给步兵来处理。在8天时间内，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向前推进了240公里，逼近了华沙。

波兰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甚至连但泽邮局的工作人员也在9月1日的14个小时内一次次击退了德国人的进攻，只是在遭到反坦克炮和火焰喷射器的扫射之后才投降。第18骑兵团团长马斯捷勒日上校和沃伦斯基旅旅长菲利波维奇上校都投入了自己的骑兵，用马刀阵去攻击敌人的坦克。但他们的勇敢只导致了无谓的牺牲。协调一致、纪律严明、充满优越感的德国军队并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战役的参加者、德国骑兵军团上士戈特利布·里赫特在战争爆发65年之后说道：“我们对此是有所准备的，我们有学校、希特勒青年团支队、劳动支队和军队。这是一场所有人都在期待和有意义的战争，而波兰成了第一道战线。”

我们要强调的是：战争几乎是德国所有人都盼望并明了其意义的。这是一名老战士的话，1939年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人。这句话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德国拥有世界上备战做得最好的一代人。不可能想象，这些小伙子会允许自己像在哈勒欣河作战的苏联军团那样陷入恐慌之中，并开枪打死自己的军官。

但为了不失公正，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在没有经过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的士兵中间，确实有不少人是不愿意去冒险的。

9月中旬，当华沙的命运已经注定之时，希特勒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两位将军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希特勒下令对华沙进行射击和轰炸，将军们则坚持向西部战线调派重炮，因为波兰首都的陷落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秘密议定书的存在，按照该议定书，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是沿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划分的。希特勒担心华沙会被苏联军队占领，因此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力



量应该更快速地行动。

我们要补充一点,8月3日对德宣战的英国和法国实际上并未开展军事行动,而是放任波兰被吞食。德国人称之为“静坐的战争”。

9月17日,苏联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0月6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向列宁格勒、白俄罗斯、基辅、莫斯科、加里宁格勒、奥尔洛夫和哈尔科夫区军事委员会下令,对所有部队进行大规模的集训。同时,后备部队也行动起来了。组成了两个方面军,即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10月17日,两个方面军跨越了波兰边界,开始所谓的解放远征。在个别情况下,苏联军队在利沃夫、斯特雷、布列斯特、比亚韦斯托克等地还与波兰军队发生了冲突。在12天内,苏联军队向前推进了250至350公里。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署了针对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秘密议定书的补充文件。文件规定,一旦波兰在领土和政治上发生变化,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将大约按照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划定”。立陶宛此时也划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斯大林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解放远征”一事,因此苏联军队出动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此时双方的军队短兵相接了。

就在此时,希特勒下达了一道彻底改变了这场战争性质的命令:党卫军的3个师要消灭掉波兰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这也进一步加深了军队领导层和纳粹分子之间的分裂。出现过军事法庭因杀人、纵火和抢劫判决枪毙党卫军成员的情况。

这场与普通民众的战争表明,全新的、野蛮的原则被引入了战争之中。

## 第十章

# 斯大林认为，一切都有可能

---

斯大林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列宁反教会的指示被取消、工业转向战争轨道、苏联的底比斯、与芬兰的战争、英法准备轰炸巴库、对军事行动的分析：斯大林对阵“大块头”

---

苏联占领了在 1920 年苏波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之后，斯大林感到十分满足。只损失了不到 1000 人，他几乎像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废除巴黎条约之后的亚历山大二世，大大巩固了国家的地位。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做出了空前的决定：他废除了列宁在 1919 年 5 月 1 日下达的指示。该指示称：“按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必须尽快清除牧师和教会。牧师应该与对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一样被逮捕和枪毙，要毫不留情和大范围地枪毙，且越多越好。应该关闭教会，查封教堂并改建为仓库。”（阿列克谢耶夫 B. A.，《通往积极对话的荆棘之路——苏联 20 世纪 30—50 年代国家与教会的关系简史》，莫斯科，1999 年，第 10 页）

1939 年 11 月 11 日，政治局就“宗教问题”做出了秘密决定：“中央委员会对教会、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和信徒做出如下决议：认为继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逮捕教会神职人员和迫害信徒方面的实践不再是适宜的。”接下来的条款废除了列宁在国内战争期间做出的上述指示，神职人员也被解除了监禁。



为什么在波兰战役后马上做出了这一决议呢？对这一情况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是为了在西部地区支持信仰东正教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与在波兰被视为上等人的天主教徒抗衡。

国内战争和世界革命拥护者的好战的无神论已成为历史。欧洲并未发生世界革命，相反，民族利益在这里开始成为主流。因此，明白波兰天主教力量的斯大林摒弃了列宁的遗教。很快，斯大林就证实了自己的正确性：俄罗斯东正教会参与到保卫祖国的事业中来了。

只是不应当这样想，他回忆起了母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牧师的愿望而向上帝微微敞开了胸怀。我们并不清楚他与上帝的关系。

但在这种宽容的背景下，经济政策却变得更加严厉（甚至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开始实行全盘集体化运动，这遭到了农民的反抗）。

整体上来说，军费开支有了大幅增加。1938年，在预算总额为1240亿卢布的情况下，军费开支达到232亿卢布；1940年，预算总额是1744亿，军费开支达到568亿；1941年，国家预算为2161亿，国防支出为709亿，即几乎占总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

德国在1937年至1938年间的军费开支为预算总额的67%，而英国、美国和法国分别是32.2%、17.7%和37.7%。（资料引自：普洛特尼科夫 K. H.，《苏联国家预算史概述》，莫斯科，1954年，第260—261页）

随着苏联经济的增长，对居民的税收也在增加：1936年，开始向个体农户征收马匹税；1939年，开始征收农业税，该税使农民失去了众多宽松和优惠的待遇；1940年，提高了对手工业者的税收，并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和文居税（用于住房与文化设施建设的税收）。在此基础上，居民还需要购买国债，例如1940年，居民认购的国债为财政预算增加了90亿卢布的进账。

此外，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的规定也发生了变化。在1940年3月前，集体农庄是按播种面积来计算谷物、大米、向日葵的数量的，肉类、牛奶和羊毛是按牲口的现有头数来计算的，从此时起则是按应予开垦的土地的比例来计算的。

按公顷数上缴农产品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产品种类。

1940年，农业所获得的技术装备少了两倍。工业部门转向生产军工产品。商店货架上的照相机、钟表、缝纫机和自行车都少了很多。汽车厂开始生产航空发动机、坦克、歼击机、轰炸机和驱逐舰——这些东西其时成了生产计划中的主要产品。

不过，除了对经济进行改造之外，斯大林还找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手段。他在研究了德波战争的经验之后，发现飞机和坦克可以立刻使工业区陷入瘫痪状态。

如果苏联以在沙俄时期形成的工业生产布局来参战的话，那么它未必能够坚持得住。彼得格勒、莫斯科、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乌拉尔这四个老的工业区已经得到了

巩固,还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之间的“第二个巴库”、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增设了新的生产部门。当代经济学家们强调指出:“私营公司是没有实力靠自己的资金来建设如此昂贵的工程项目的。”(霍赫洛夫 E. B.,《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苏联军事经济》,圣彼得堡,2005年)

1937年至1940年间,在开设新工厂和旧工厂转产时都考虑到了在机械制造业、石油加工业和化工工业方面需要建立备用企业的任务。从1939年起,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高尔基市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停止开建新工厂。

预见到战争期间会出现问题,这就迫使在每一地区都加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肉类、牛奶、面粉、土豆、蔬菜、糖果制品、各类小食品、服装、鞋子、家具、砖头、石灰等)。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利润降低了,产品质量也下降了。但正如斯大林后来表述的那样:他认为发展经济的任务不是为了提高利润率,而是为了满足必不可少的需求。经济必须完全服从于巩固国防的需要。主要的经济区和各个地区都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需要。军人所说的“在居民随时会遭受敌人空袭的条件下来分配力量和技术装备”的情况时有发生。(霍赫洛夫 E. B.,同上)

1940年10月,城市居民分配到了菜园用地。战争期间,几百万城市居民的生命之所以得到拯救,靠的就是大城市周边的这些土豆、蔬菜和畜牧业基地,而建立这些基地的决定是在战前做出的。

但还有一种通常称为“古拉格”的经济。“古拉格”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劳改营管理总局。截至1939年1月1日,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共有35万名,而关押在劳改营中的有130万人,关押在劳动教养所中的有36.5万人,劳改所中有99万人(泽姆斯科夫 B. И.,《三十年代的犯人:社会人口问题》,《祖国史》,1995年,第4期,第55—56页)。多数犯人都从事工业、工地、交通、采矿这些领域的劳动。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去深究,那么由这些犯人所修建的运河、铁路、水电站、港口、工厂、矿场、矿井、油田可以比作俄国北极开垦拓荒的新阶段。这种开拓类似于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创建“北方的底比斯”时那样:修道院的拓荒扩大了北罗斯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空间,因为不具备完成既定任务所必要的资源,其过程是极为艰辛的。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体系中就反映出了俄国几世纪以来“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传统。

1940年,在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份额达到了14%。在斯大林经济的特殊“修道院”中,有数量众多的被称为“棍棒局”的特别技术局,它们是在贝利亚取代叶若夫之后开始组建的。特别技术局中汇集了研制军事装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得益于特别技术局的集约功能,军队更新装备的速度急剧加快。例如,卫国战争中苏联各种轰炸机的绝大多数发动机都是由特别技术局研制出来的。

到1937年,全国23.7万个集体农庄涵盖了1亿人口,占全体农户的97%。他们



按低于市场 10 至 12 倍的“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

整体上,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管理可以看作是金字塔式的:底层是“古拉格”的犯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往上是工业企业的工作者,再往上是军官、工程师、医生等,在他们之上的是人民委员部和各主管机关的行政人员,再高一层是人民委员、政府要员,然后是政治局委员,而在政治局委员之上的就是斯大林。

下面一个例子说明斯大林认识到了苏联拥有的巨大潜力。“古拉格”领导人之一的 C. I. 菲林-普普科介绍说,正是斯大林本人在 1937 年“下达了修建莫斯科-海参崴运河的任务”。(《社会与权力:用文献来叙事(20 世纪 30 年代)》,莫斯科,1998 年,第 163—164 页)

众所周知,所有河流都是按子午线的方向流动的。而要逆流开凿出一条可通航的运河,需要花费只有地球的创造者才拥有的巨大资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实俄国就已经讨论了开凿这样一条运河的想法,但只是理论上的)。当然,这条运河甚至一直都没有设计出来。但是,从它能够出现在领袖的想象中这一点上,足以说明斯大林雄心勃勃。而这种雄心被相当一部分居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在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就有一位少校提议开凿一条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的运河,以便让暖流转向而使欧洲和美洲受冻。

“二战”之前,在刺激劳动和控制社会情绪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37 年制定了最高劳动报酬的金额,而且在战前的 3 年间,工业领域中各个部门的工资都得到了大幅提高(从事黑色冶金业的工人工资上调了 11.4%,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上涨了 27.6%)。工人和职员享有定期休假,医疗和卫生保健机构网络也得到扩大。1938 年,已经有 1838 个疗养院和 1270 个休养所和 1.2 万个少先队夏令营投入使用。此外,体育场、操场、俱乐部和图书馆的数量也快速增长。从 1936 年开始,还举行定期的全国足球锦标赛。

政府还宣布自己有义务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套单独的住房。

为了表彰特别优秀者,1938 年设立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39 年,斯大林在 60 岁生日时被授予这一称号,并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奖励)。

1940 年夏天,最高苏维埃通过几项指令,要求加强生产纪律、对旷工者、游手好闲的人、经常跳槽的人和流氓判以直至关进劳改营的惩处。在一系列通俗的出版物上,该命令被评论为“极其残酷的命令”,虽然这条命令的大多数受害者(迟到者)只是判以在原工作单位进行劳动改造,并被扣除 20% 的工资上缴国库。他们没有被流放到“古拉格”的集中营,但还是被算入了罪犯的统计数字中。

1939 年 10 月 9 日,希特勒在备忘录中表达了对苏德条约的看法:“任何协定或条约都不能完全确保苏俄保持中立。”他认为免受“俄国袭击”最重要的保障是快速展示

德国的实力。

1939年10月10日，希特勒向将军们宣读了第6号战争令。他计划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快速进攻，并“尽可能多地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领土，以作为向英国发动空中和海上打击的基地”。

希特勒对现代战争的见解符合德国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状况。他明白，若是打一场持久的阵地战，德国将必败无疑，德国的机会在于“最大限度地待机而动”，也就是说实施坦克突破和空中打击。

希特勒的计划包括击溃德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英国，并巩固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北非、从法国大西洋沿岸到乌拉尔的领土。英国是头号目标，作为“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长剑”，法国也在此列。而击溃苏联是最终战胜英国的必要条件，但在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况下，莫斯科获得了在其西部边界和在波罗的海地区完成自己实际任务的机会——英国正忙于战争。

与此同时，因为德国从苏联或通过苏联得到了原料，所以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换取德国高技术的设备和武器，苏联向德国运去了木材、谷物、石油、磷酸盐等物资。如果注意到仅从罗马尼亚一国通过海运向德国供应的石油数量就达74.5%，那么可以得知德国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当与德国的战争变成现实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准备对巴库的油田进行轰炸，但因为德国人对丹麦和挪威的入侵迫使他们没有采取这一步骤。

如果苏联不得不在地缘政治市场上销售它的“辣菜”，那德国就会向苏联提供相应的服务。莫斯科逼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与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获得了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德国支持这一点，这是根据秘密议定书而作出的反应，虽然对于德国工业极其重要的来自瑞典的矿石供应有了遭到空中打击的可能性。

但是早在《慕尼黑协定》和《秘密议定书》签订之前，斯大林就批准可以与芬兰领导人进行谈判。谈判任务交给了苏联驻赫尔辛基大使馆的二等秘书B. A. 雷布金。雷布金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情报机关的负责人。1938年4月7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同这位情报员会了面。一周后，雷布金向芬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转交了一封信，并建议为防止德国对芬兰有可能发动的侵略而结成军事同盟。芬兰人拒绝了。1939年10月份，莫斯科展开了更果断的行动。

在放出这些诱饵之后，苏联又对芬兰提出了进行领土交换的建议。苏芬边界离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苏联建议将苏芬边界向北移，以排除列宁格勒遭到重炮轰炸的可能性，而苏联则打算拿出其位于卡累利阿共和国两倍的土地作为交换。苏联还提出了将哥得兰岛租借给自己使用的建议。

1939年10月10日，德国驻芬兰大使布吕歇尔向德国外交部报告：“一切表明，如果俄国不节制自己对芬兰湾诸岛的野心，芬兰将给予武装抵抗。这对我们的军事经





济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届时,芬兰不仅将停止向德国出口木材和粮食,而且还有不可缺少的铜和铝。有鉴于此,我建议对俄国政府提出要求,让它不要觊觎‘岛屿之外’的东西。”(编者:费尔什京斯基 Ю.,《苏联与德国(1939—1941年)》,纽约,1989年,第17页)

这位大使是正确的。这3个月以来,斯大林与军方的会见次数更加频繁了。

但是芬兰同样是在《秘密议定书》中被纳入苏联的利益范围的,所以德国不得不忍耐一下。

1939年10月21日,芬兰军队完成了征召工作,年龄从22岁到40岁的人应征入伍,而自卫队员年龄可放宽至50岁。总应征人数为26万。工业转为战时状态,在各个城市中建筑了防空洞,居住在边境的民众被疏散到内地。

苏芬边境的紧张局势迅速升级。双方的边防军开始发生冲突。按照苏方的说法,11月26日,芬兰方面从迈尼拉村地区向苏联领土发射了7枚炮弹。这成了苏联宣战的借口。11月29日,苏联方面下令从30日凌晨起“制止芬兰军队的挑衅行为,确保我们国界的安全”。

军事行动是由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实施的一场局部战役,克里姆林宫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对哈勒欣河的作战经验记忆犹新,所以并没有对这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做好准备:在严冬的状况下突破对方的防线。这里,似乎可以把苏联指挥部的战术同德国的闪电战术相比较,只是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

苏联的进攻起初不顺利。就像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说的那样,在这场“不出名”的战争的叙述中,经常出现对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未能进行绕过“曼纳海姆防线”之尝试的指责。事实上,为了朝维德利察方向进行迂回包抄,苏联方面曾抽调了7个步兵师、3个军团和1个炮兵团(总指挥部的后备部队),以及坦克营、化学营、歼击机团和轰炸机团各1个。这个集团军的任务就是占领亚尼斯湖和拉多加湖之间的防御地带,然后转向西南方向并对位于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军队后方进行打击。(扎哈罗夫 M. B.,《战前的总参谋部》,莫斯科,2005年,第496页)

但是,正如当代研究者 A. 伊萨耶夫强调的那样,正是这一迂回调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之间的道路系统不发达,部队因而被拉得很长,并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被敌军的阻击部队歼灭。接下去,苏军不得不把第10坦克军团调往武奥克萨湖和基维涅米市的方向,但未能成功越过敌人防线,便被转调到了战线左翼。

于是,在斯大林干预之下成立了由基辅军区司令员 C. K. 铁木辛哥指挥的西北方面军。A. A. 日丹诺夫成为其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主攻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指向了维堡方向。

下列事实说明,苏联对苏芬战争的准备水平是很低的:一上来竟然没有设立为进

攻部队提供物资技术补给和组织伤病员撤离、治疗的后勤机关(此时才刚刚成立)。而且突破防御地区的指令也没有下达,因为早先这些指令被认为是“破坏性的文件”而被烧毁。只有在列宁图书馆的专门书库中才能找到幸存下来的该指令的文稿。

苏联针对芬兰的军事行动在西方引起了负面的效应。12月4日,大不列颠决定向赫尔辛基派遣20架格罗斯特角斗士歼击机,而法国派出30架最新的莫拉纳·索尔尼埃歼击机。这些盟国认为,最大程度地绷紧冲突之弦符合它们的利益,因为这样能够阻挠苏联和德国向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进一步推进。法国人站在芬兰人一边,主张参战,而英国人则在拖延。引起了英法战略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有着向德国供应矿石的瑞典矿场。法国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达尔朗建议展开联合登陆作战:英法联军(1.2万—1.7万人)在已经被红军占领的佩察莫北部地区登陆,并对苏联的部队实施打击。然后还应该用几个师的部队去增援登陆部队、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线并包围在芬兰北部的苏联集团军。

1940年1月至2月间,法国人开始计划派遣空军中队到黑海,并计划对巴统和巴库进行轰炸。法国总参谋部得出结论:在黑海的行动“可以决定性地削弱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甚至导致整个苏联体系的崩溃”。[雅各布森 M.,《冬季战争中的外交官》,剑桥(马萨诸塞州),1961年,第202—203页;引自:《祖国》,1995年,第12期]

鉴于英国和法国的参战,苏联理应尽快结束这场战役。

新成立的方面军司令部几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朝维堡方向的进攻。指挥部调集了巨大的兵力:70万名士兵和军官、5.7万门大炮和迫击炮、1800架飞机、2300多辆坦克。而且还在后方修建了演练场,不分昼夜地训练部队。2月11日凌晨5点,苏联发起了进攻。

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司令部采用了非常手段使部队进入了状态:军事法庭判决枪毙了第44步兵师的师长 A. И. 维诺格拉多夫、参谋长 O. И. 沃尔科夫、政治处主任 И. 帕霍缅科和其他一些军官。他们是被拉到队列前被枪毙的。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梅赫利斯表现得坚决而无情。

2月13日,第一道防线被攻克;2月13日至15日,第二道防线也被攻克;3月1日至12日,第三道防线被攻克,并占领了维堡。

正如铁木辛哥在写给最高军事委员会统帅部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用极短的时间(1个月)就把这么一个永久性的防御系统摧毁了,这在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3月13日,军事行动结束了。

按照新签署的和平条约,新的苏芬边境得以确定,基本上回到了俄罗斯与瑞典战争之后、芬兰尚未并入俄罗斯帝国的1809年时所划分的边界。苏联还得到了芬兰汉科岛的30年租借权,并在那里部署了海军基地。这个海军基地守在芬兰湾的入口,卫国战争期间坚守了155天。



红军的损失:战死、失踪和因伤死亡共计 13. 1476 万人。(引自:《祖国》,1995 年,第 12 期,第 98 页)

这场战争的结果也迫使斯大林重新审视军队的状况。卡累利阿地峡作战的残酷血腥,与波兰的“游击战”以及哈桑湖和哈勒欣河的战斗,是无法比较的。这次的尝试要求进行反思,并在经受更为艰难的考验之前得出结论。

斯大林没有拖延太久。1940 年 4 月 14 日至 17 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召开了指挥员会议,总结了与芬兰作战的战斗经验。4 月 16 日和 17 日两天,斯大林都出席了会议。他表现得非常积极,经常打断发言者的讲话,提出各种问题并进行了评论。但主要的精神体现在他 4 月 17 日的发言中。

像往常一样,他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有系统的整理。

第一,对芬兰宣战是否正确?是正确的。该地区集中了全国 30%至 35%的国防工业,“列宁格勒的完整无缺牵涉到我们国家的命运”。

第二,是否可以推迟发动战争和把备战进行得更好一点?不,不可能,因为需要利用国际形势:“时值西方最大的三个强国正相互掐着对方的咽喉”,“当时他们的双手正忙着”。不利用这一点“是极为愚蠢和短视的”。而且,西方的战事“疲弱”,可能很快就以言和而告终。

为证明这场战争目的的正确性,斯大林回顾了由彼得一世、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发动的俄国所有为夺取芬兰而进行的战争。他看起来就像是斯拉夫传统的继承者。

但最重要的还是对此次军事冲突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管理作出了直接评价。在由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领导下制定的最初计划中,曾有对芬兰防御工事进行猛烈攻击,以使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不及向芬兰人提供支援的方案。但是伏罗希洛夫劝说斯大林不要采用这一计划,这样他们仅给列宁格勒军区(司令是 K. A. 梅列茨科夫)的部队下达了执行此次作战的任务。在 12 月进攻不力、几个师团陷入包围之中时才明白,必须紧急调整计划。于是进行了上述的调整和重新部署,并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取得了战争指挥权,成立了总统帅部大本营。

此外,斯大林在备战过程中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批准成立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O. B. 库西宁为领导的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苏联还在已占领的芬兰领土上成立了“人民阵线”委员会。但这些都未取得多大的效果。苏联对赫尔辛基的轰炸也促进了芬兰人的团结,并因此被开除出国际联盟。

对战争进行总结时,斯大林需要回答那些一直盘旋在人们心头的问题。同时,他还必须针对他过去所有政策的直接指责作出反应。苏联英雄“西班牙人”、在苏芬战役中指挥独立坦克大队的 П. Г. 帕夫洛夫在发言时谴责道:“我们有如此多的人民之敌,以至于让我产生怀疑,他们是否全都是敌人。这里应该指出,在贝利亚上台之前

的1937年至1938年的行动，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认为，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对付像芬兰人这样的对手的。”（引自：《祖国》，1995年，第12期，第115页）

在会议的非正式场合，人们对是“斯大林的人”的梅赫利斯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他残酷，并经常骚扰指挥人员。

一位发言者表示，1937年伏罗希洛夫下令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给军队造成了负面影响（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是对“图哈切夫斯基阴谋”作出的反应）。

不管是不是这样，斯大林都应该采取某种措施，既要承认明显的事实，又不能损害到自己的威信。

于是，斯大林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他说：迄今为止“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打过一场真正的、严肃的战争”；在满洲里、哈桑湖和哈勒欣河的“小插曲”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不是战争”，因为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都不想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时至今日，红军还遵循着国内战争时的传统，这妨碍了“我们指挥人员一下子转到新的模式和现代战争的轨道上来”。

斯大林承认，军队里几乎没有“有文化、有技能和受过教育的指挥人员”，“或者只占少数”。

斯大林对战士们主动性不高和政治工作者在文化、军事和政治教育上的水平不高表示了不满。政治工作者们不能像吟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词那样总是反复念叨“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却不去创新。斯大林还对补给的状况和情报机关上报材料的质量给予了批评。

这番话表明他对军队事务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并相信自己的力量。

事实上，在经历了悲剧性的失败（这使西方对苏联的实力作出了不正确的评价）之后，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芬兰人原打算坚持上半年，并得到体面的和平。结果他们犯下的错误比其战胜者在战争初期所犯的错误更大。

所以战胜者斯大林以高昂的口吻结束了自己对工农红军指挥员的讲话。他称这场刚结束的战争是“第一次洗礼”，并指出军队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才“不是从德国空军那里，而是在芬兰”获得了必要的经验。显然，这里指的是德国人在波兰使用了新的战术。

下面就是斯大林所做的结论：“我们打败的不仅是芬兰人，这个任务不大。我们的主要胜利在于，我们打败了作为芬兰人老师的欧洲先进国家的装备、战术和战略。这才是我们主要的胜利。”（《1939年至1940年冬季战争的秘密和教训》，圣彼得堡，2000年，第516页）

此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喊“乌拉！”。

斯大林夸大了西方在战争中的参与程度。西方的参与其实是不多的。瑞典、英



国、法国和白卫军的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一共派出了 1.2 万名志愿兵,并供应了武器。还有是从后来投到芬兰人一方的被俘的红军战士中,组建了一支 200 人的分队。这就是所有的支援了。实际上芬兰应该是独自抵抗苏军,并且抵抗大半年之久。但当斯大林一明白拖延将导致西方的重新部署,于是就切断了“曼纳海姆防线”。

芬兰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英法军方领导没有能完成既定目标。而且,芬兰人错误地认为,苏联四分之三的居民都是敌视苏联政权的,并由此对工农红军的战斗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这场短暂而残酷的战争,其实就像任何一场战争那样,并没有在签订和约那一天就结束。在其基础之上,马上就展开了一场预测和计划之战。

工农红军在机动行动中的失利和依旧采用了类似于 1914 年至 1917 年间战役中使用过的阵地战战术这两点,让希特勒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军队完全落后于现代化的要求。在他的脑海中无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俄国人无力与我们抗衡!”

而斯大林的结论则是乐观的。很快,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斯大林建议免去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并任命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铁木辛哥担任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警告说:“时不我待。”

伏罗希洛夫的辞职(他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国防委员会的主席,主抓国防方面的后勤保障)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军队和政治领导人之间争夺军权的潜在斗争结束了。在大清洗之后,已经无人能够与伏罗希洛夫抗衡了,而现在他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苏芬战争只不过加快了他的辞职。军事专家的时代到来了。

此时,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 45 岁了。他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勇士。他从 1915 年开始参加战斗,毕业于机枪学校,曾任骑兵机枪手。1917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那些年间所有的主要战役:反对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的战役。在 1918 年 8 月的察里津保卫战中,就已经担任骑兵团团长了。他的升迁道路是按部就班的那种:他担任过从排长到连长再到团长的所有指挥职务。从 1919 年 10 月起担任骑兵第 1 集团军第 6 骑兵师的师长,从 1925 年开始担任第 3 骑兵军的军长。指挥过北高加索、哈尔科夫和基辅等军区。1939 年在苏波战役期间,指挥了乌克兰方面军。斯大林早在察里津时就与铁木辛哥结识了。

后来朱可夫评价说,斯大林对新国防人民委员的选择是成功的,并称铁木辛哥无论在战术方面还是在战役方面都是一个经验丰富、意志坚强、富有学识的人。按朱可夫的话就是“作为国防人民委员,他比伏罗希洛夫要强得多”,并抢在德国入侵前做了许多事情(装备更新、人事调整、组建坦克军团)。

1937 年,铁木辛哥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 年至 1940 年间,担任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尽管铁木辛哥获得了所有勋章,他的政治分量仍然是不能与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相比的,但斯大林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名一天都没有与军队脱离过的战士。在铁木辛哥的身后,站着一大群像朱可夫这样的旅长、师长和军长。

苏芬战役未能给斯大林带来荣誉,却使他在西方社会舆论中备受指责,但同时也带给了他实实在在的战争经验。

很快,大约 4000 名遭到迫害的指挥员又回到了工农红军的干部队伍中来。同时还制定了新的纪律条令。按该条令规定,指挥员拥有惩罚自己士兵的充分权利,而士兵则被剥夺了上诉指挥员的权利,明确划定了权力和责任的界限。十月革命前的“将军”、“海军上将”等军衔也得以恢复。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库利克当上了元帅,朱可夫和梅列茨科夫成为将军。

开始实行一长制的原则,指挥员可以在政治委员不参与的情况下独立作出决定。军事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结果就是向俄国经典军事遗产的回归,受国内战争经验影响形成的机动战战术被取代,阵地战的战术成了主要的思想(苏联广阔的空间及其大部分地势的易守难攻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成因)。

当时有一个人事调整从表面上看是不公正和无理由的,即由梅列茨科夫取代了沙波什尼科夫。向来忠于斯大林的沙波什尼科夫与苏芬战争第一阶段的失利无关,但斯大林认为,沙波什尼科夫还是负有道义责任的。在斯大林与之私人会谈时,领袖向这位集团军司令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未发生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或僵化。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负责在西部边境地区修筑防御区。

还有涉及经济管理的人事变动。1940 年 3 月 28 日,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经济委员会主席,米高扬从主席降为副主席。还成立了各种经济管理委员会:机械制造(主席是重工业人民委员 B. A. 马雷舍夫)、国防工业(主席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H. A. 沃兹涅先斯基)、燃料和动力设施(主席是电站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 M. Г. 别尔乌辛)、日用消费品(主席是纺织工业人民委员 A. H. 柯西金)。他们都是苏联的专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和之后都有卓著的表现。

斯大林把日丹诺夫、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梅赫利斯等“纯粹的政治家”和军人布琼尼、夏坚科从经济委员会中调了出来,这很能说明问题。

在一场大战的前夕,斯大林寻找着最佳的干部队伍。而这个干部队伍应该与总的干部情况相符合:1937 年时,80%至 93%的党内领导职务是由 1924 年后加入联共(布)的人担任的,即“莫斯科人”和广义的“俄罗斯人”早就取代了“圣彼得堡人”。

从 1939 年起,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开始为备战建立起了战略储备。斯大林会经常性地检查战略储备的补充情况。

1940 年 9 月 18 日,铁木辛哥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报告,题为《关于 1940 年和



1941年苏联武装力量在西部和东部进行战略扩编的原则》。(扎哈罗夫 M. B.，《战前的总参谋部》，第325页)

在有两条战线同时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苏联可以派出280—290个师、1.175万辆坦克、3万门野战炮、1.8万架飞机。预计德国的主要攻击线路是从东普鲁士经立陶宛到里加、科夫诺、德文斯克、波洛茨克或者是到科夫诺、维尔诺，再到明斯克。

同时预计德国还将从波兰袭击苏联利沃夫集团军的后方，并抢占乌克兰西部。

后来表明，希特勒起初正是这样计划进攻苏联的。

在西班牙战争之后显现出来的德国空军超出苏联空军的优势(梅塞施密特-109E歼击机比伊-16歼击机先进，容克-87轰炸机比苏联CB轰炸机先进)让斯大林非常不安。他多次与军事装备设计师会面，鼓励他们，显示出对他们的关注和厚意，以达到使他们快速解决问题的目的。在设计师和飞行员的记忆中，斯大林是全能的，学识渊博。他确实了解许多细节，他的专业知识让人惊叹。他的知识水平当然比不上专家，但足以使他可以合理地布置任务和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

除了少数不可能的情况之外，斯大林希望和要求自己身边的人也具有类似的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当然，斯大林的缩小了的克隆体是在他的专制权力体系中存在的，但“小斯大林们”是很少能够领悟到事物本质的。

有时，因为最密切的工作人员的不合格，斯大林会感到非常苦恼，并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来。例如，1940年11月7日在庆祝节日的招待会上，他突然谈起了运用不久前军事行动经验的必要性。

他说：“我们在哈勒欣河战胜了日本人。但我们的飞机在飞行速度和高度上都不如日本的飞机。

“我们还没有为打一场像德、英两国之间这样的战争做好准备。

“现在发现，我们的飞机在空中只能坚持不到35分钟，而德国和英国的飞机却能飞行数小时！

“如果我们的空中力量、运输工具等等不能达到与我们的敌人(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敌人，包括那些打着朋友旗号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水平，那么他们将把我们吃掉。”(斯大林 И. B.，《斯大林选集》，第18卷，特维尔，2006年，第207—208页)

加里宁试图辩解，说“我们时间有点不够”。斯大林怒斥道：

“实际上军事部门没有谁就飞机的问题提出过警告。你们中谁也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我找来我们的设计师，问他们：能不能让我们的飞机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一些？他们答道：可以呀，但没有人给我们下达过这样的任务！现在就得消除这个不足。

“目前我们的步兵在改组，而骑兵一直都很好，需要认真地抓一抓空军和对空



防御。

“现在我每天都在研究这些,会见设计师和其他专家。

“但只是我一个人在研究所有这些问题。你们中谁也没有考虑这些。我就一个人坚持着。

“要知道我每天都在学习、阅读和观察,为什么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不喜欢学习,自满。你们在挥霍列宁的遗产。”(斯大林 И. В.,《斯大林选集》,第 18 卷,第 208 页)

在这个小场景中,斯大林自己透露了统治集团内的相互关系。

而且斯大林不仅讲了统治集团内的关系,其结束语还揭示了他的思想路线。

除了敲打这些“大块头”之外,斯大林还需要寻求领导层之外的支点。

他对加里宁的申辩作了尖锐的回应:“不,问题不在这里!人们漫不经心,不想学习和提高。一边听着我的讲话,一边一切依旧我行我素。如果我失去耐心,我会给你们颜色看的(你们知道我是能做到的)。我将这样敲打这些大块头,让大家大叫起来。”(斯大林 И. В.,《斯大林选集》,第 18 卷,第 208 页)

很快,这种想法在 1941 年 2 月 15 日召开的第 18 次党代会上以指令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马林科夫的报告中直接指出,需要提拔“善于办实事”的工作人员,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这里讲的提拔指的不仅是那些党员,也包括那些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看到了政府机关里党内帮派主义的危险性,又一次开始试图去削弱它。

## 第十一章

# 战争双方的战略观点

---

交战各方的战略观点、经济服从于巩固国防的任务、“古拉格”、苏联向西方推进、斯大林证实了与英美结盟不可避免

---

如果仅从德军向波兰发动了闪击战和红军向芬兰展开了冲击的角度去看,那么就会觉得发生在西方的这场战争显得有些反常。实际上,英国人在其有 15 万人的远征军登陆法国之后,就与法国人一起抓紧加固“马其诺防线”,并建造了新的防御工事。与此同时,英国舰队展开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保障了对敌人的封锁。铁矿石和石油这些德国的主要战略物资处于英国人不间断的关注之下。似乎 26 年前的历史在重新上演:当时德国从巴伦支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海域受到了英国的包围。只是苏联、罗马尼亚和瑞典的供货才使德国人有了保障。

因此,伦敦和巴黎都视莫斯科为尚未开战的敌人,并计划支持芬兰。1940 年 3 月 2 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决定向芬兰派遣 5 万名志愿者和 100 架轰炸机。英国人决定派出 50 架轰炸机。但是正在他们着手准备的时候,战斗结束了,斯大林抢先获胜了。

芬兰在盟国的战略视线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英法实际上还挺满意,因为莫斯科仅提出了确保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铁路线安全的最低领土要求,而不是占领整个芬兰,以保证从与柏林友善中立的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后方向德国提供援助。

从苏联租借了能够封锁住通往芬兰湾入口的汉科岛可以看出，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是苏联的安全。

此时英国瞄准了挪威。1940年4月7日，英国人在挪威领海铺设了水雷，以制止德国船只在挪威西海岸的来往。

4月9日，向斯堪的纳维亚挺进的德军占领了丹麦。

后来英国人断言，德国人侵占挪威是犯了一个大错。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错误。按照约翰·富勒的说法，希特勒有着如下的战略目标：

从北部突破英国海上封锁，获取在挪威西海岸的军事基地；

为德国船只打开驶入北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切断英国与俄国北海岸之间的海上交通线；

确保途经西部海路进口来的瑞典铁矿石的运输安全。

挪威是“横亘”在瑞典面前的盾牌，其在地缘政治层面的重要性可与地中海的北非海岸和巴尔干相提并论。

1940年4月9日深夜，德国军舰逼近奥斯陆。在短暂战斗之后，奥斯陆港口被德国空降兵从陆地上攻下，而德国的“布吕歇尔”号重型巡洋舰则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沉。丘吉尔是这样描述德国人的挪威之战的：“出其不意、残酷无情、精密准确。”

英国人和法国人惊慌失措。他们企图抵抗，派出了两支陆战队，但遭到了猛烈的轰炸。由于缺乏合乎要求的空中掩护，盟国确信自己的行动是徒然的，于是在克服了巨大困难、蒙受了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得以从海路撤离了陆战队。

德国人对丹麦和挪威的占领，以及德国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明显优势导致了张伯伦政府的辞职，丘吉尔成了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认为与莫斯科结盟是战胜德国的必备条件。

现在德国将要做的就是获得对英吉利海峡和法国大西洋海岸的控制权，并以此封锁英国，迫使英国接受媾和的条件。只要再用一下力，欧洲就垮了。

但由曼施坦因制定的重复了施里芬方案（通过荷兰和比利时攻击法国）的计划，早在1939年11月就引起了布劳希奇、哈尔德和瓦利蒙特等将军的极度不安。他们担心与整个西方世界发生战争。针对希特勒的密谋再一次被激活了，但将军们下不了付诸行动的决心。

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发动了进攻，它的110个师要去对付的是135个师。法国人认为，这场军事行动将是阵地战，但他们的作战情绪并不高。5月21日，德国的坦克已经开进了英吉利海峡，但在敦刻尔克前面停了下来。而英国远征军正是从敦刻尔克得以撤离的：33.7131万人乘坐887条船在法国后卫舰队和英国歼击机的掩护下撤了出去。按希特勒命令停下来的伦德施泰特元帅的5个坦克师此时位于离城市10公里远的地方，只能以中等口径火炮向城市进行轰击。



军人们认为让敌人得以撤离是元首犯下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希特勒似乎担心坦克陷入沿岸的沼泽地中,并受到还未被消灭的法国部队从南边的打击。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希特勒并不想全歼英国部队,而是寄希望于和英国签订和平条约,并迫使英国人把自己的殖民地让给德国。

6月10日,意大利向英国和法国宣战。

6月14日,德国人来到巴黎议和。6月22日,两国在贡比涅森林,在1918年福煦元帅接受德国投降的那一节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议。德国人报了仇。

法国军队被认为是欧洲最强的军队,而它的崩溃使德国进入到了地中海,现在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德国的包围之中了。

希特勒本应认真考虑如何完成战略计划,如何占领英国人石油开采业所在的北非和近东。但他倾向于尽早迫使英国人同意议和(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于是发起“海狮计划”战役,以便征服英国。Дж. 富勒认为没有占领北非“是二战期间德国人所犯错误中最致命的战略错误”。(富勒 Дж.:《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战略和战术综述》,第106页)

此外,对非洲海岸和近东的占领还能置苏联于极端艰难的境地,这将对苏联在高加索的主要石油产区造成威胁。

我们要指出,德国本身石油和汽油的供给状况还没有达到危急的程度。德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煤炭储备,而用煤炭生产出合成汽油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法本化学工业康采恩早在1927年就开始这方面的试验生产。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该康采恩得以证明自己可以从工业生产中提炼出航空汽油,于是获得了德国空军的大力支持。到1940年,合成燃料的生产数量急剧增加,达到每天7.2万桶(占德国石油供应量的46%),而且德国近95%的航空汽油都是从煤炭中提炼出来的。(耶金 Д.:《战利品:争夺石油、金钱和权力斗争的世界史》,第352页)

众所周知,在经济战略方面,希特勒“对石油情有独钟”。正如1945年5月德国军事工业和装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在受审中供认的:“对石油的需求是作出入侵俄国决定的主要动机之一。”

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下令总参谋长凯特尔和直属自己管辖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做好空降战役的准备,以“消灭作为实施反德战役基地的宗主国英国”。

3天后,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他向议员们保证,德国能够经受得住长期的战争,并再次向英国人提出议和。

在英国人成功击退德国空军的空中进攻,并且没有发现任何士气低落的迹象后,就有了与苏联开战的想法。

英国人的歼击机数量比德国少一半,但由于采用了雷达这一本国的技术新发明,

所以他们能够集中优势兵力以应对前来袭击的德国人。加之,英国的“喷火”歼击机比德国的“梅塞施密特”歼击机升高要快,这在单机作战中具有重要的优势。从1940年7月10日至10月31日,英国人共击落了1733架德国飞机。

英国人在空中的坚守让希特勒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与俄国之间存在着秘密协议。于是他开始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首先应该消灭苏联,并侵占其油田。

而此时,苏联打了两场闪电战:6月17日占领了立陶宛,6月27日占领了比萨拉比亚。7月21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虽然这些区域都属于苏德条约所确认的苏联利益区,但希特勒还是非常不安,尤其是苏联军队已逼近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油田,而德国58%的石油进口都是由这里供应的。俄国明显在向其传统上拥有强势地位的巴尔干推进。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11月20日,匈牙利加入该条约。11月23日,罗马尼亚也加入了该条约,而德国的军队则开进了罗马尼亚。

这样一来,从北海到黑海,苏、德这两个最强的大陆国家开始直接交锋了。与1939年8月相比,此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40年11月12日,美国开始了另一种计时: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将军向罗斯福总统上报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警告说,英国极有可能会败北,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不得不与臣服于德国的全世界作战。斯塔克认为,美国应该保护英国,甚至不惜付出美国军队参与到欧洲战役中去的代价。就其实质而言,这份备忘录的思想就是我们所说的罗斯福主义。这样一来,华盛顿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清楚地意识到,需要违背民众的孤立主义情绪而采取行动了(1941年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88%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参与欧洲战争)。

而斯大林关于未来反希特勒联盟组成成员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也是在这一时期作出的。

1940年夏,瓦尔加院士致函斯大林说,英美之间的矛盾将因法国陷落和英美终将一起反对“轴心国”而终止。实际上,瓦尔加与斯塔克所说的如出一辙。

斯大林是这样回复瓦尔加院士的:

瓦尔加同志!

您的见解完全正确。英美矛盾是国际关系领域主要矛盾的思想是属于上个时期的,当时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后深陷困囿和一蹶不振的德国,不可能被视为是一股能够对抗英国或者美国的实际力量。在这个时期的竞技场上,只剩下美国和英国这两股主要的力量,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则是影响国际局势的主要因素。



但是,在德国击败法国和把欧洲大陆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且英国失去盟友法国之后,事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联盟威胁到的不仅是英国,还有美国。有鉴于此,英美之间的联盟就是国际事务这种转换的自然结果。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И. 斯大林

1940年9月12日

(切尔卡索夫 JI.,《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时代背景下的人物肖像》,莫斯科,2004年,第33页)

从中可以看出,战争已经波及整个世界。当然,还是可能出现偶然事件,但历史的车头已经驶过了具有决定性的转弯处。

## 第十二章

# 英国想把苏联与德国分开

---

英国想把苏联与德国分开、德国想利用苏联来反对英国、斯大林想使英德相互削弱、罗斯福决定帮助英国、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莫洛托夫—希特勒柏林谈判破裂

---

谁也不清楚,军事行动最快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斯大林同样不知道。但是他应该考虑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由于沉重的半封锁所造成的国家经济中的供给出现的巨大困难: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处于德意志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西方的供给只能通过从罗曼诺夫(摩尔曼斯克)港口和海参崴港口始发的两条铁路线来运输。

因此,巴尔干半岛、土耳其、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成了苏联世界地图上的特别地带。

在占领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东部,以及前移了与芬兰的边界并控制了芬兰湾之后,斯大林必须转向南方、转向巴尔干半岛。

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交织着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四大玩家的利益。

意大利绝不是德国默不作声的附庸国。墨索里尼看到苏德条约对本国利益产生了威胁,因为他担心苏联向本地区推进。与此同时,罗马竭力向柏林表明,在地中海意大利才是主角。

但是法国的崩溃和英国在该地区影响的削弱使得瓜分“遗产”的问题被提上了议





事日程。一股势力撤出了,其他势力便冲着它空出的位置接踵而至。

在这方面,希特勒应该考虑到了苏联和意大利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日益加深,因为莫斯科和罗马都不想看到德国在地中海的势力过分强大。可以说,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等待着英国被战胜,届时他们好参与欧洲新规则的制定。

也正是此时,苏联军队占领了比萨拉比亚,而苏联和意大利的外交官们续签了1933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紧接着,1940年6月24日,苏联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时,莫斯科想让罗马承认黑海只能由苏联一家来控制,并想重新修订现有的海峡管理规则。这时俄罗斯帝国传统政治的轮廓清晰地浮现出来,需要附加的一条就是,所有这些领土的扩张对于斯大林来说都是必要的,且首先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其中包括,在占领比萨拉比亚后,斯大林保证了南翼的安全,并沿着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河口修筑了一条防线。

但是在进入比萨拉比亚之后,红军距普洛耶什蒂就仅是一步之遥了,已经可以在合适时对其油田实施空中打击了。由于英国人也有类似的意图,希特勒把这两种威胁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斯大林和丘吉尔密谋的结果。关于罗马尼亚石油的情况,希特勒不是出于偶然才这样向墨索里尼讲述的:“我们联盟存在的本身取决于这些油田。”希特勒认为,从其时起只有进攻苏联才能够保障普洛耶什蒂的安全。

丘吉尔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的广播讲话中说:有一把开启俄国展开军事行动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俄国的民族利益”。他像是在想象中扫视了一下地图,明确指出:“如果让德国在黑海沿岸站稳脚跟,或者占领巴尔干半岛诸国和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将不符合俄国的安全利益。这与生命攸关的俄国历史性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205页)

这位新上任的英国首相没有谈到另一个重要的情况:地中海及其海峡一直是英国的利益范围,而为了争夺这一地区至少引发过3次世界性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即使算不上世界性的,至少也是一场欧洲战争)、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场战争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其实质就是英国和俄国在这个区域的争夺战。

这样一来,东南欧局势(反映在高加索和近东的石油工业上)可以比作一个雷区。每一个国家都对用一切手段去削弱对手感兴趣。

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完全合乎逻辑地寄希望于当时的苏德条约有助于消除不断增长的矛盾。

斯大林似乎是十分清晰地重复了希特勒在欧洲外围的所作所为。保加利亚被建议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这样它将有得到色雷斯(当意大利在希腊获胜的情况下),并获得进入爱琴海的通道。

当然,类似行动绝不能称之为是为备战作出的决策,因为各国的总参谋部都在实施这种计划。

但苏联对巴尔干诸国的渗透,不管多么地小心谨慎,还是在苏德关系之间结下了梁子。于是,在所有国家的每一个动作都将触及英国人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宁愿暂时忽略来自苏联方面的竞争,寄希望于苏联同德国之间矛盾的激化。

因此,苏联情报机关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米连·加弗里洛维奇的联络出人意料地为斯大林与丘吉尔的初期合作铺平了道路,而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弗里洛维奇还与英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卢比扬卡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双面人”。

据 II. 苏多普拉托夫证实,英国大使馆和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楼房均处于苏联的监听之下。大家开始获悉,加弗里洛维奇在得到南斯拉夫军界的同意后,提出了“关于变更南斯拉夫领导层必要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推翻现政府。而在这个问题上,莫斯科和伦敦成了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丘吉尔通过克里普斯向斯大林转达了他的建议:希望斯大林放弃与德国签订的条约,并与英国缔结军事同盟。作为交换,这位英国首相表示愿意承认苏联对其占领的波罗的海地区、比萨拉比亚、波兰东部和布科维纳北部的所属权。在这些建议中再次流露出了这个岛国自古以来对在欧洲大陆建立均衡的渴望。英国昨天还在计划破坏苏联的燃料工业,而今天却完全转变了。

在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期间,英国外交部在公开刊物上刊登了丘吉尔的这封秘密书信,这引起了希特勒新的猜疑。其实,这正是丘吉尔想要的。斯大林则非常愤怒:他不想为了英国而与希特勒发生争执。

但斯大林仍然决定利用南斯拉夫人的倡议在巴尔干半岛制造紧张空气,让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役捆住希特勒的手脚。这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战略家的一个强有力的举措。(应该说,丘吉尔总认为自己很有才能。但在自己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书中,在讲述法国沦陷那一章节里,丘吉尔却写道:“能够经受住这种考验的只有奥列弗·克伦威尔、克列孟梭、斯大林或是希特勒。”)(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2 卷,第 394 页)

后来克里普斯大使承认,英国人就巴尔干半岛提出的建议是基于“企图迫使他们(俄罗斯人——作者注)帮助我们摆脱困境,在这之后,我们可以抛开他们,甚至与现在正包围着他们的敌人联合起来。”(引自:戈罗杰茨基 Г.,《致命的自欺欺人:斯大林与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莫斯科,2000 年,第 50 页)

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去冒险并陷入军事行动,他仍然不想惹人关注。

如此一来,欧洲形成了这样的紧张局势:德国对英国实行封锁(同时进行空袭),英国仍有在大陆上进行反击的最后机会的巴尔干之争。伦敦的处境谈不上轻松,但是丘吉尔寄希望于美国和苏联以及英国人的坚韧,因而回绝了希特勒的议和建议。



丘吉的战斗决心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当时德国要求战败的法国政府把海军舰队交出来。如果这些船只并入德国的舰队(再加上意大利的舰队),那么英国将受到又一个可怕的威胁。英国人建议贝当政府把舰队交给他们。法国人拒绝了,他们不相信英国人拥有有效防御的能力。于是,丘吉尔下令用武力夺取这些船舰或者击沉它们,并且做到了这一点。结果大部分船舰被英军夺取,一艘战列舰被炸毁,另一艘在海岸搁浅,一艘被毁坏,还有一艘逃走了。“大家开始明白,英国的战时内阁不惧怕任何事情,也不会任何事情前面停滞不前。”(丘吉尔 Y.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2 卷,第 394 页)

其实,若是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英国人就该准备后事了。谢天谢地,罗斯福明白过来了,美国的未来也标在这幅图上。罗斯福开始向英国人提供武器援助。1940 年 9 月 2 日,美国总统作出决定,命令向英国移交 50 艘驱逐舰来交换其在纽芬兰岛和加勒比海的海军基地。

从这一刻起,美国实际上已经参与到了欧洲战争之中,并逐渐拥有了英国正在失去的政治影响力。正如我们所见,最终罗斯福使自己的国家成了世界的主宰者。

关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 9 月 27 日签订了《经济和军事政治同盟条约》(即“三国同盟条约”)一事,尽管德国政府转告莫洛托夫称,该条约旨在针对“民主战争贩子”,并未触犯与苏联签订的现行条约的实质,但这还是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忧虑。莫斯科表示希望“了解该条约的文本和附加秘密条款的内容,如果这样的条款存在的话”。苏联在德国与芬兰签订条约时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愿望。

9 月 30 日,《真理报》刊登了题为《柏林公约:关于三国同盟》的社论。文中谈到两个战争集团已经形成,一方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另一方是英国和美国,而且战争还将进一步扩大。文章中还重申了苏联将保持中立,并将忠于苏德条约和苏意条约。文章作者是莫洛托夫,理应认为斯大林是该社论的合著者和审校者。

1940 年 10 月 10 日,发生了一件决定未来走向的大事:柏林通知莫斯科,其向罗马尼亚派遣了一个“有训练部队随行的德国军事代表团”。实际上,这表明罗马尼亚受到了德国人的军事管制。在稍早前的 9 月 23 日,作为向芬兰提供武器的交换,德国人获得了把军队开进芬兰的权力。

只需在南部咔嚓一声扣上锁,英国人就被锁在里面了。

由于已经清楚针对英国的空战未能取得胜利,而登陆战役又不能确保成功,于是希特勒在 1941 年春天开始向岛屿发起了进攻,并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到了需要建立反英联盟的地中海地区。进入这一联盟的国家应该是西班牙、法国、巴尔干半岛诸国和苏联。这样,希特勒暂时还离不开斯大林。

但是元首不愿意听到有关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得到巩固的消息。莫斯科企图参与多瑙河会议的尝试也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激化。斯大林不想承认德国在罗马尼

亚的控制权。苏联代表团坚决主张把对苏利纳支流的实际控制权交给苏军、允许苏联军舰自由通行和在加拉茨和布勒伊拉拥有锚地。如果这样，黑海入海口的实际控制权就转到了莫斯科的手中。但希特勒不让斯大林参加多瑙河会议。会议以失败告终。

于是，在把军队开进罗马尼亚后，德国人把欧洲运输动脉变成了“德国内河”，此时他们离取得对海峡的控制权和造成对苏联在黑海的存在及在高加索的石油的威胁更近了。

在这一局势下，苏联与希特勒的谈判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在莫洛托夫启程前往柏林的前两天，军事情报机关向斯大林报告：德国人在多瑙河沿岸地区部署了15至17个师，准备夺取萨洛尼卡。情报人员得出结论：不排除德国（同意大利一起）进攻希腊、占领巴尔干半岛和利用巴尔干半岛作为反对土耳其和英国殖民地基地的可能性。此外，在柏林的间谍还发来一份情报说，德国在克拉科夫和罗兹地区部署了10个步兵师和2个坦克师，并正在招募乌克兰后备兵。

莫洛托夫临行前，斯大林向他下达了指示：要提出要求以确定苏联对多瑙河河口的控制权、对决定“土耳其命运”的参与权，以及对制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未来规划的协商权。此外，芬兰和多瑙河河口也应该归属于苏联的利益范围。该指示的重点是：保加利亚应该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苏联有权派兵进入保加利亚。指示中没有提及有关英国的话题，也就是说斯大林是这样推断的：你们占领了罗马尼亚，那我们就应该以占领保加利亚来与之保持平衡。

已经是在去柏林的火车车厢里了，莫洛托夫又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不要讨论大英帝国的情况。这一文件意味着，领袖清楚，希特勒是无法战胜英国人的。

11月9日，苏联代表团从白俄罗斯火车站出发，12日抵达了用鲜花和国旗节日般装饰起来的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元帅迎接了莫洛托夫。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英国空军正是在11月12日炸毁了停泊在奥特朗托海峡锚地的3艘意大利战列舰和2艘巡洋舰。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不良的征兆。

在与希特勒两次会晤时，这位苏联的总理坚定地站在了与斯大林约定好的立场上，称“如果没有我们对保加利亚的保障，不允许我们的军队进入保加利亚作为向土耳其施压的方式”，那么乱局的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

作为答复，希特勒建议把印度和伊朗划入苏联的新利益范围，而这分明是让莫斯科和伦敦产生公开的冲突。

莫洛托夫回忆说：“他对苏联政策的理解没有什么深度，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却想让我们一起去冒险，而如果在那里，在南方陷入窘境，他就会轻松一些；当英国与我们作战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将依赖于他。只有非常幼稚的人，才看不懂这一点。”（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23页）



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在涉及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并不一致。

谈判无果而终，但也未破裂。在正式场合还是表现得很友好，而斯大林被告知：希特勒是满意的，并认为与莫斯科达成协议是完全现实的。

11月17日，苏联通过外交渠道告知伦敦：苏联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将不与德国进行相互协作。

11月25日，在斯大林处讨论了谈判结果，随后通知柏林，苏联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四国经济和政治合作条约方案，但这些条件必须写进秘密议定书中。苏联再次重申了关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博斯普鲁斯海峡四地的众所周知的提案；而且重申，从巴库-巴统一线向波斯湾方向的南部区域应被认为是“苏联领土诉求”的核心。

正如我们所见，斯大林决定利用德国忙于和英国的战争，最大限度地达到自己有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果他成功了，苏联就有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和高加索的国防保障线。

有人经常谈到斯大林的侵略性。当然，他像所有当时世界大事的参与者一样，非常重视国家利益，根本不会去牺牲民族利益。但我们注意到斯大林提案中的一个情况：他在努力获得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而不是对达达尼尔海峡的，也就是说，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保障黑海的安全，而不是有利侵略的地中海出海口。

总之，在拒绝为希特勒“火中取栗”和捍卫自己的立场时，斯大林竭力让希特勒相信，没有苏联的配合，德国不能取得对地中海、近东和中东的完全控制，且钥匙就在斯大林的口袋里，另外，只要苏联不崩溃，德国就别想完成夺取世界霸权的总目标。

12月18日，希特勒批准了第21号战争令（“巴巴罗萨计划”）：预定于1941年5月16日进攻苏联。他认为，在闪电式打击下，苏联理应被征服。

从这时起，斯大林开始收到几十条关于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的情报，不过开战日期却各不相同。

斯大林明白，这些情报是有现实依据的。不过他也清楚，英国迫切需要苏联尽快展开对德军事行动，因此伦敦将竭力让他相信：战争已经到了孔策沃别墅的门口，需要放弃一切去战斗，尽管尚未准备好。

但斯大林希望像罗斯福一样行事，即准备和等待。他不可怜英国，就像英国也不可怜苏联一样，为争夺世界资源而斗争的残酷性一览无余。

当希特勒在北非和巴尔干地区进行后来我们所知的徒劳的军事行动之时，他的那位互不侵犯条约的伙伴正忙于处理国内事务。

## 第十三章

# 斯大林的管理方法

---

斯大林的管理方法：要么达到目的  
要么死亡、H. JI. 沃兹涅先斯基和 A. C.  
谢尔巴科夫、斯大林与军事技术装备的  
研制、文化向军事的转轨、刺杀托洛茨基

---

在 1941 年 2 月 15 日召开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在报告中谈到了目前经济的困难处境：众多人民委员部（包括中型和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弹药人民委员部）均未能完成去年的计划。

不过，会议决议也指出：“由于成功掌握了新技术和国防工业的进步，红军和海军舰队的技术装备程度有了大幅提高，增加了最新种类和型号的现代武器。”

马林科夫要求给予生产管理人员更多的独立性，清除拿着党员证但不学无术的人，总之要提拔专业人士。

正是那个时候，在斯大林的身边人中间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是与斯大林提拔上来的新一代干部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不断巩固息息相关的。为了理解这批人的重要性，只要列出这支队伍中几个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的姓名就足够了：B. A. 沃兹涅先斯基、A. C. 谢尔巴科夫、A. H. 柯西金、A. A. 库兹涅佐夫、Д. Ф. 乌斯季诺夫。他们所有人都是日丹诺夫一手提拔的。而这支队伍中与第一梯队竞争的第二梯队的人，则是由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提拔上来的。

正是沃兹涅先斯基为苏联经济的协调一致和各部门及各地区的平衡发展作出了



决定性贡献。在他出色参与下建立起来的系统的基础之上，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编制国民经济平衡表，作为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季度计划和月度计划中的一个独立的部分来完成。可以说，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在成百上千零散生产的基础上开始创建国家未来的。在十八次党代会上，沃兹涅先斯基公布了世界历史上尚无先例的经济发展十五年宏观计划。

“其中预定：建设新的大型冶金企业；完成对铁路交通线的改建和铺设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建设古比雪夫、索利卡姆斯克和安加尔斯克水利枢纽；在国家欧洲部分的北部建立大规模的燃料和冶金基地；加快发展一系列具体的经济区。同时，这一总体计划还规定了要解决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重大社会任务，这些任务可与战后时期写入党的新纲领草案中的任务相媲美。这样，‘计划’不仅‘生铁、钢材、燃料、电能、机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人均生产水平要赶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日用必需品’方面也要这样。按照初步的设想，只要总体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人民富裕程度的主要指标应该增长一倍以上。”（沃兹涅先斯基 H.，《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莫斯科，2005 年，第 17—20 页）

在 2 月 21 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按照斯大林的提议，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和谢尔巴科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时年 38 岁的沃兹涅先斯基一路青云直上，他得到了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赏识。沃兹涅先斯基是图拉州林业局一名职员的孩子，他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任共青团的县委书记。此后，他到顿巴斯工作，担任叶纳基耶沃冶金厂的党委书记，后来先后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其后到苏联监察委员会当了几年高级监察员，任计划和统计组组长。基洛夫遇刺后被调到列宁格勒，任市计划委员会主席，并成为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41 年沃兹涅先斯基担任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如果在贝利亚-马林科夫派与日丹诺夫派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不是以后者的溃败而告终的话，说不定，斯大林之后是沃兹涅先斯基来领导国家。

时年 40 岁的 A. C. 谢尔巴科夫也是日丹诺夫团队的人，还是日丹诺夫的小舅子（日丹诺夫妻子的弟弟）。国内战争时期，他像沃兹涅先斯基一样，在雷宾斯克（1982 年至 1984 年的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同样是从这里开始飞黄腾达的）也是从事共青团的工作。谢尔巴科夫是担任了在斯大林直接参与下成立的苏联作家协会的第一书记才开始出名的。后来他历任联共（布）中央文化教育工作部部长、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东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斯大林州（现顿涅茨克州）州委第一书记。从 1938 年起，担任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很快（1941 年 5 月 4 日），谢尔巴科夫成了中央委员会书记。



毫无疑问,各个派别为能向斯大林施加更多影响而展开的这种斗争一直在进行。“二战”之前,斯大林越来越多地承担了管理国家的工作,最终导致他做出决定,自己来担任政府首脑。他的专横、果断、对任何一个派别都不偏不倚、猜疑、想了解一切细节的渴望和残酷,都给战前时期留下鲜明的烙印。按照事物的逻辑,他理所当然地极大关注国防工业和军人,从而引起党内老同志可以理解的妒忌。与此同时,不久前处于权势中心、此时已今非昔比的契卡人员,在当时尚未觊觎政治大权的贝利亚的领导下,成了斯大林政权的支柱之一。

“二战”前夕,斯大林作出了研制军事技术装备的若干重要决定。其中一些决定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则是错误的,并导致了损失和牺牲。这些事件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相互矛盾的画面。

第一件事与坦克的装甲钢板有关。1935年,伊若尔斯克工厂中心实验室主任、30岁的工程师亚历山大·扎维亚洛夫对当时已过时的T-18和T-26型坦克的装甲钢板进行了强度试验。最小口径的37毫米火炮的炮弹把这种装甲钢板炸成了碎片。这一结果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装甲钢板是用来防子弹的。但是,扎维亚洛夫把这种坦克称为“会走路的棺材”,决定要改变这种概念。工农红军装甲坦克局的领导层和坦克制造厂的厂长对这位工程师的批评感到尴尬。的确,坦克是“棺材”的说法很快在西班牙战场上得到了应验,但当时欧洲所有的军队使用的都是这种坦克。扎维亚洛夫预感到,坦克制造业将在近期内得到发展,并将对军事战略产生影响。他提出在装甲钢板的生产中采用新技术,但不管是订货人还是领导层对此都不理解。在当时的权力体系之下,这意味着他的命运面临着悲剧性的选择:或者成为被抛弃者,或者向上层求助。扎维亚洛夫被解职了,于是他给列宁格勒州委的日丹诺夫写了信。很快这位工程师的信件到了斯大林那里。1936年5月,契卡人员把扎维亚洛夫带到了在领袖的办公室举行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果工程师的准备工作要比他的反对者们做得好:他以自己作为冶金工作者的专业经验和出差德国时了解到的克虏伯工厂的情况证实道:苏联冶金业目前尚不能生产坦克、潜艇和水上舰艇用的钢板(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在国防人民委员部推行了技术政策,而时任工农红军装甲坦克局政委的是帕维尔·阿利卢耶夫)。

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成立了新的“特种钢”管理局,伊若拉冶金厂和马里乌波尔冶金厂归属该局,在这些工厂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装甲钢实验室(1939年更名为装甲钢研究所)。由于扎维亚洛夫的大胆举动,军队很快获得了创建完整的军事技术装备体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T-34型、KV型、IC型中型和重型坦克、伊尔-2强击机、战列舰、驱逐舰和潜艇,它们在战争年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掌握了整铸坦克塔座生产工艺的扎维亚洛夫装甲研究所研制出来的装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斯大林的成果。



在此事发生之后，斯大林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这些主管部门呢？

实际上，这样提问题并不对。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周围的人都不是专家，所以在作出最终决定时常常是斯大林一个人。而且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像扎维亚洛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事件那样能有圆满结局。扎维亚洛夫曾是无家可归的孩子，毕业于列宁格勒矿业学院。

在苏联武装部队人民委员 Б. Л. 万尼科夫的回忆录中，讲述了斯大林作出错误决定的几个事件。其中一件涉及设计师 В. Г. 格拉宾的 76 毫米口径火炮，德国人认为这种炮是该口径炮的标本。用它装备起来的 Т-34 型坦克在距离 1.5 至 2 公里远处打穿了德国坦克上的装甲板，而当时敌军的坦克只能在不超过 500 米的距离内摧毁苏联的坦克（而且只能是从侧面或尾部）。

这种火炮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用来装备军队。但是，发生了冲突：

“用此炮装备军队的倡议是红军炮兵总局局长 Г. И. 库利克元帅提出来的。按照情报机关的资料，他在向武装部队人民委员做报告时，说德国军队正在加速装备一种新的坦克炮，此炮的口径据说在 100 毫米口径以上，坦克的装甲钢板加厚了，质量也提高了，随后，库利克声称，我们所有的口径为 45—76 毫米的火炮都没有办法对付这种坦克。因此，库利克元帅建议停止生产 45—76 毫米口径的火炮，取而代之的是开始生产 107 毫米口径的火炮，而且首先是生产该种型号的坦克炮。

“该建议没有得到武装部队人民委员部的支持。我们知道，就在不久前，在 1940 年，大部分德国坦克装备的都是口径为 37 毫米和 50 毫米的火炮，其余的装备的是 75 毫米口径的。因为坦克炮和反坦克炮的口径通常是与坦克的装甲防护板相匹配的，那么很明显，我们坦克上口径 45 毫米和 75 毫米的反坦克炮在作战时是具有优势的。我们认为，Г. И. 库利克所说的纳粹分子能够在一年之内在坦克技术设备的强化上取得这样大的飞跃是不大可信的。”（万尼科夫 Б. Л.，《一个人民委员的日记》，载于《旗帜》杂志，1988 年，第 1 期，第 139 页）

此时，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支持库利克的。而在万尼科夫的反对中，斯大林看到的是他缺乏生产新产品的意愿。

斯大林下达了停止生产 45 毫米口径火炮，以便腾出车间和设备生产 107 毫米口径火炮的指令。

斯大林的指令得到了落实。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战争刚开始，斯大林就明白，“战争最需要的”火炮因自己的责任而停产了。库利克和日丹诺夫估计错误了：德国人并没有装备大强度装甲钢板的坦克，那些“被取缔”的火炮是能够有效打击德国人的军事装备的。

结果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重新恢复了对这种火炮的生产。

当万尼科夫（已蹲过侦讯室，是斯大林下令才释放出来的）请求撤销对他类似“怠

工”行为(停止了步枪的生产)作出的判决时,被斯大林拒绝了。斯大林的理由很简单:万尼科夫确实没有急于执行指令,因此由于违反管理条例受到惩罚是公正的。

不过,万尼科夫得到了礼遇,当上了劳动英雄和弹药人民委员。战争拯救了他。

还有一些事情是,斯大林没有听从自己战友的意见,而作出了政府的决议。但他对随之而来的冲突的评价方法总是一成不变的。他从不道歉,而是用下属玩忽职守(或是破坏活动)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他甚至会指责那些之前企图证明领袖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人说,你们怎么没能说服我。

有一次,斯大林建议航空工业人民委员 A. И. 沙胡林和他的副职们签署一份把日产飞机数量提高到 50 架的保证书。这是发生在 1941 年 6 月战争即将爆发之前的事情。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数字。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间,飞机的日产量不到 20 架。

为什么斯大林需要这样一份保证书呢?难道他掌握的权力还少吗?大概他认为,在他们违反保证的情况下,他将握有一个额外的证据?或者写给他本人的这份字据将产生额外的动力?

情况应该是,他在有意识地把国家关系转化为私人关系。这就是他的方法。

斯大林要求每一天都要向他提供飞机日产量的报表并非偶然。如果他觉察到哪一家工厂的产量少了,他的秘书处主任 A. H. 波斯克列贝舍夫就会打电话去询问原因。

如果查明是需要物资或者组织方面的帮助,那么就会给他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而如果是玩忽职守,那么就会进行调查,其结果可能是最严酷的处罚。

但整体上来说,当执行者被赋予了巨大的职权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之时,就在专制和专业的管理方法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一平衡使得苏联的成就达到了一种神奇的高度,在苏联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就表现了出来。

如果斯大林认定受到他信任的专家在搞欺骗或在耍滑头,那么这个人的命运将是可悲的。研制出了 23 毫米口径航空火炮、才华横溢的设计师陶宾就是这么死的。他的研究成果具有众多良好的技术性能,的确能够保证苏联飞机占有火力的优势。但陶宾想确保自己在其他设计师面前的优势地位,公布了一些自己设计的火炮其实并不具备的优点:缩小了火炮的外形尺寸、重量和后坐力。飞机生产者选择了生产陶宾设计的火炮,但很快在试验中发现了该火炮的缺陷。陶宾紧张起来,试图迅速排除不足之处,并指责试飞员不够客观。他还企图对飞机设计师施加压力,想使他们接受他所设计的这种火炮,但被顶住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陶宾再次向斯大林保证他将排除掉火炮的缺陷。斯大林相信了他的承诺,甚至建议“预支一点费用”来奖励这位火炮设计师。

接下去,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陶宾背着人民委员部与发动机制造者商量好增



厚发动机的用来固定火炮的侧壁。虽然这并不影响发动机的性能,但这显而易见是一种不能被容忍的对纪律的破坏。当斯大林获悉此事的时候,他愤怒了。大家向他解释了原因,但这并未能使他信服。人民委员沙胡林受到了警告处分,而陶宾很快被逮捕并处决。

经设计师努德尔曼最终完善了陶宾火炮还是被用于了军备,并被认为是二战时期最优秀的航空炮。斯大林明白,“努德尔曼火炮”是陶宾的劳动结晶,但这并不能改变陶宾本人的命运。

还有一件事是更具灾难性后果的,这就是国防人民委员部 1941 年初关于停止生产 1831 年至 1930 年一直使用的龙骑兵式步枪而生产自动步枪的决定。自动步枪射击时无需每一次都拉动枪栓,只需扣动扳机即可。但这种步枪维护更复杂也更重了,而主要的是军械厂尚未做好生产出几百万支这种自动步枪的准备。

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该委员会决定不再生产“过时的”步枪,而主抓国防工业的沃兹涅先斯基实际上并不了解情况,支持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

有可能最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开战后,当临近边境地区的工农红军武器库在撤退时被遗弃并丢失了大量步枪,那么军事工业就无法保证为军队提供足够的射击武器。

武装部队人民委员部的领导 Б. Л. 万尼科夫、B. M. 里亚比科夫、И. А. 巴尔苏科夫向沃兹涅先斯基提出了意见。沃兹涅先斯基粗暴地(他一向喜欢用生硬的表达方式)要求停止“怠工和拖延”,并立即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于是,万尼科夫克服了恐惧,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他知道,如果不打这个电话,很快他就会受到只考虑本部门一己之私和不愿调整生产的指责。

斯大林是同意委员会的决定的,但他还是听完了这位人民委员的解释,并说道:

您的理由很充分,我们将在中央委员会予以讨论,过 4 个小时我们会做出回复。

我们守着电话寸步不离,等候电话。4 小时后,斯大林准时打来了电话。他说:武装部队人民委员部的理由是正确的,莫洛托夫同志领导的委员会的决定被取消了。(万尼科夫 Б. Л.,《一个人民委员的日记》,第 159 页)

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但其中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充满自我牺牲和残酷无情的整体精神。

沃兹涅先斯基从万尼科夫那里获知了斯大林的决定,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万尼科夫不与自己商量而直接去找领袖呢?

作为一个有才能和成效的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在“二战”后失势了,因为他本人

违反了斯大林的秘密约定:任何时候都不能隐瞒真相。关于这一点,我们到时再谈。

到1941年,苏联的国防工业生产出了能够保证夺取战争胜利的所有种类的武器。在“二战”时期,苏联没有能够制造出新的技术装备,但其在20世纪30年代制造出来的装备已经足够用了。

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有描写“二战”前开始研制核武器的章节。其中表明,这位英国首相相对苏联当时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不知道的。

1938年3月,众多学者写信给莫洛托夫说:“苏联核物理工作的发展获得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在全国一些大规模的研究所里成立了一系列的核实验室: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里都成立了核实验室,而镭研究所的实验室也得到了加强。”(古巴列夫B.,《斯大林的白色群岛》,莫斯科,2004年,第12页)

包括A.约费、И.库尔恰托夫、A.阿利汗诺夫、И.斯科别利岑和Л.阿尔齐莫维奇在内的院士和教授联名写信,请求加快核方面的研究工作。

1938年11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在科学院组织开展原子核研究工作》的决议。

1940年秋,乌克兰科学院物理技术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B.马斯洛夫和B.施皮涅利向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发明局致函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建议。他们有些超前了,但他们提出的技术方案是正确的。

接下来,核问题便处于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和情报机关的高度关注之下。所以,当原子弹的问题必须得以解决时,斯大林对此已有了准备。

到1941年初,苏联已制造出了11辆火箭发射装置,取名为BM-13(配有132毫米火箭弹的战车)。这种火箭炮俗称“喀秋莎”,源自诗人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作词的那首讲述喀秋莎姑娘的著名歌曲。姑娘是这样向心上人表达的:

让他把这普通的姑娘记在心上,  
让她的歌声在他耳边回响。  
让他去保卫自己亲爱的祖国,  
把喀秋莎的爱在心中珍藏。

1941年6月15日,进行了红军新技术装备演习。在政府要员和军事长官在场的情况下,4辆BM-13的火箭炮齐射。斯大林批准立即开始成批生产“喀秋莎”火箭炮。6月21日,在苏德战争打响前一天,苏联军方通过了关于尽一切可能扩编野战炮兵部队的决定。1941年7月14日,由И.А.弗廖罗夫大尉指挥的世界上第一支野战炮兵



连对在白俄罗斯奥尔沙火车站的德国部队实施了强有力的打击。(秋林 И. В.,《“喀秋莎”火箭炮是怎样造成的》,载于《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第106页)

但是不应该因此而产生错觉。“二战”前夕对工农红军新技术装备的供应不仅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是灾难性的。

按照1941年的计划,打算生产1200辆KV型和KV-2型坦克和2500辆T-34型坦克。红军则从3月1日起组建了29个机械化军团。但按这样的坦克生产计划,新组建的机械化军团就不可能在1945年前配齐KV型和T-34型坦克。(扎哈罗夫 М.,《战前的总参谋部》,第391页)

扎哈罗夫元帅认为,总参谋部犯了大错:应该从实际的工业生产能力出发来组建机械化军团。

尽管1941年新飞机产量得到了增加,但苏联空军也只是才开始获得新型飞机(佩-2、苏-2、伊尔-2、米格-3、拉格-3、雅克-1)。在348个空军军团中,有106个空军军团均处于组建阶段。

1941年上半年,工农红军处于大变革的阶段。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正是因为工农红军的这一状况,使得斯大林只能奉行极端谨慎的政策。

这也涉及了沿着1939年老国境线建立起来的那条老的防线(“斯大林防线”)。这条防线由21个设防地区组成,被视为是牢不可破的,并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在调整了国境线后,设防地区遭到了破坏,而新的防区还没有来得及建成,似乎德国军队因此才轻而易举攻克了边境地区。

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破坏“斯大林防线”。截至1939年,国防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过后得出结论:实际上所有的永备火力点、永备发射工事和火炮射击掩体都没有战斗力。于是,贝利亚在1939年1月5日、1月17日和2月13日分三次向伏罗希洛夫通报了防御工事建筑中不可容忍的缺陷。贝利亚举了一个使人吃惊的例子:

“尽管对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设防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建设并补充了设备,但现在该地区仍然不能认为是具有战斗力的。由于不合格的设计和不恰当的内部构造,大多数永备火力点都不能驻扎军队……因为对地下水深度的不正确估算,接近一半的防御工事积水达20至40厘米。与此同时,排水设备也不能工作……设防地区还缺乏电力设备……设防地区的住房湿度很高且空气混浊……没有通风装置,要安装通风装置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设防地区没有修建供给中心……也没有食品仓库……

“由于设防地区的规划不合理,它们的火力工事不能向超过50至100米以外的地方开火,因为当地有山丘、峡谷和未砍伐的森林。”(斯维林 М.,《为什么斯大林摧毁了“斯大林防线”》;扎哈罗夫 М.,《战前的总参谋部》,第509页)

从这些文件中可见，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也得到了证实：设防地区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一些设防地区还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卡累利阿防区在 1944 年之前一直是列宁格勒北部的防御中心）。

所谓斯大林下令摧毁了设防地区完全是杜撰的。

总的说来，苏联的备战水平还是很低的。德国人知道这一点，但由此却做出了并不正确的结论。

德国人对许多东西都估计不足。这样的巨人之战，世界上还未曾见过。我们承认，德国人同样也很英勇。他们的英雄主义表现在去完成希特勒提出的毫无人性的任务——征服世界中。希特勒为此利用的思想武器就是民族优越论，而这导致了德国人对自身能力估计过高。妄自尊大的纳粹主义不可能成为征服世界的坐标。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1940 年 8 月 10 日，戈培尔在观看了关于苏芬战争的苏联影片后在日记中写道：“悲惨的景象。非常肤浅。一个低等人的群落。”但是他在 8 月 16 日看过有关莫斯科红色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电影之后突然承认：“这部电影展示了充满活力和乐观的俄罗斯。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张面孔。他们具有巨大的组织才能。对我们来说，布尔什维主义将永远是一个谜。”（勒热夫斯卡娅 E.，《戈培尔：日记里的画像》，第 233 页）

“低等人的群落”击溃了自以为是的超人，这就是谜底。

德国情报机关是这么评价苏联空军的备战情况的。按照西班牙国内战争的结果，苏联飞行员被认为是这样的：在自己的领地特别勇敢和具有攻击性，而在敌方的领地上空，则胆怯和犹豫不决；在单打独斗时表现良好，而对机群作战则训练不够。在地勤和供给的组织上，俄国人表现得相当敏锐、灵活，善于掩蔽军事目标。“他们天生残酷和自信，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德国在进攻苏联前夕，对苏联空军的评价是很低的：苏联空军在技术装备上落后于德国空军，只有一小部分现代歼击机可以与德国飞机打个平手。苏联空军的设备更新过程需要很长时间。德国空军对其机场、工厂和供给中心集中火力的攻击应该能从整体上使苏联武装力量处于瘫痪状态。

后来德国人承认，他们对苏联在工业向东转移的能力、人才的训练、武器和装备的制造、整个工业，以及运输系统的能力方面估计不足。（施瓦贝迪森 B.，《斯大林的雄鹰：1941 年至 1945 年苏联空军的行动分析》，明斯克，2002 年，第 36—40 页）

换言之，德国人遇到的完全不是阿勃韦尔（德国军事情报局——译注）所描述的那种徒有勇敢但缺乏组织性的“斯基泰人”（这里提醒一下，斯大林不久前还称自己的儿子瓦西里是“斯基泰人类型的小野人”）。

已经开始的对世界的重新划分也反映在文化和宣传攻势之中。斯大林拥有在这个领域进行指令性管理的能力。他明白这方面的重大意义，因此在战争前夕的电影





屏幕上、戏剧舞台上和歌曲中,出现了一大批表现战争和爱国者的形象。

1938年在大剧院上演了米哈伊尔·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献身》。现在这部歌剧称为《伊万·苏萨宁》。保卫祖国和自我牺牲的激情一直贯穿着全剧。据斯大林警卫队工作人员 A. T. 雷宾回忆,参加歌剧编排的有总导演 C. 萨莫苏德、导演 B. 莫尔德维诺夫、诗人 C. 戈罗杰茨基、作家 M. 布尔加科夫、艺术家 H. 威廉斯和芭蕾舞编导 P. 扎哈罗夫。在排练过程中,剧团与艺术事务委员会之间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委员会领导反对歌剧结尾所有主人公齐声向沙皇高唱“光荣颂”的一幕。

“白热化的争论传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在看了排练后惊奇地问道:‘怎么能没有光荣颂呢?要知道,在罗斯,那时是有大公、贵族、商人、僧侣和世俗之人的。他们一起联合起来与波兰人作斗争。为什么要破坏历史真相呢?不应当。’

“在结尾的第一个方案中,斯帕斯大门边矗立着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的模型,民众在雕像前庆祝胜利。而在第二个方案中,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则是与民众一起从斯帕斯大门中走了出来。看到这儿,斯大林提议,为了完全与历史相符,胜利者应该是骑着马从大门中出来,与之相对应,战败的波兰小贵族则应跪倒在地,把自己的旗帜扔到胜利者的脚下。斯大林还建议缩短苏萨宁的女儿安东妮达及其养子瓦尼亚在广场上为父亲死去而痛哭的场景。斯大林承认,这是一种沉重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个人的。总之,是全体俄罗斯人民取得了胜利。所以,就让人民像胜利者一样欢呼吧!”(雷宾 A. T.《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第 16—17 页)

后来,这一向胜利者脚下扔出旗帜的场景真实地出现在 1945 年 6 月 24 日的阅兵仪式上,并被写入了历史。

在对未来的预见方面,斯大林显然超过了自己身边的人。所以,毫不奇怪,他经常干预创作,有时候甚至对忠于其体制的作者的创作也横加干涉。杰米扬·别德内伊就受到了特别的批评,与他有关的这起事件反映出了文化政策上的转变。

1936 年 10 月 29 日,莫斯科室内剧院上演了杰米扬·别德内的滑稽剧《勇士》。在剧中他嘲笑了俄罗斯的勇士、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以及弗拉基米尔大公让罗斯接受的洗礼。

1936 年 11 月 14 日,政治局出台了《把与苏联艺术格格不入的〈勇士〉剧本从剧目中删除》的决议。此外,该决议指出,该剧本“笼统地抹黑了俄罗斯英雄赞歌中的勇士,而在当时这些勇士就是人民群众心目中俄罗斯民族英雄气概的承载者”。

罗斯受洗被视为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个值得肯定的阶段,“因为它促进了斯拉夫民族与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的接近”。

在契卡人员搜集的对此的反映中,有一些说法很引人注目。诗人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这样评论:“决议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更可贵的是其提出的论据。在此之后,那些胆敢嘲笑俄罗斯人民及其历史的各种各样庸俗之人的狂妄行为将被终止。”

有人时至今日都认为,以我们的历史为耻是一种良好的风尚。”(《政权和文艺界知识分子(1917年—1953年)》,第337页)。不过与之相反,电影导演И.特劳贝格却认为:“苏维埃国家变得越来越民族化,甚至是越来越民族主义化。”

不难看出,斯大林会认为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斯大林在宣传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之路上的下一步,就是批准了讲述诺夫哥罗德大公战败条顿骑士团的历史题材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上映。影片结束时,亚历山大说道:“谁持剑来犯,必在剑下亡。”这也是斯大林的宣言。

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开始取消了反法西斯题材电影的放映,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却被保留了下来。斯大林对艺术的水平和使命之间的差别甚为了解。

1941年3月15日,首次颁发了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斯大林奖。可以说,获得一等奖的长篇小说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情绪。它们是M.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A.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磨难》。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同样获得了斯大林奖一等奖。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关于1940年5月出版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集《选自六本书》的事。这本诗集被肖洛霍夫提名参加了斯大林奖的评选,并得到了A.托尔斯泰和B.И.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的支持。但斯大林奖的其他竞争者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申诉和告发。这样一来,安娜·阿赫玛托娃不是得到了斯大林奖,而是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建议将此书从书店和图书馆下架的决定。

在所谓“意识形态有害、充满宗教神秘主义”的阿赫玛托娃的诗作中没有任何反对苏维埃的内容。她的诗中表达的是另外一种传统,即对上帝和人性中宗教因素的呼唤。因此,在斯大林文化模式的框架下,否认这类文学作品的存在权是完全正常的。不过,女诗人并没有遭到迫害,她摆脱了对文艺界人士的审判。

然而,甚至是那些当之无愧的思想斗士,也不可能生活在对自己一贯正确的坚信中。现在轮到伊利亚·爱伦堡了。他是一名作家和新闻记者,曾长期居住在巴黎,并在那里与法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过接触,象征着苏联文化政策的开放性。

法国战败后,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写下了反法西斯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但很快遭到了苏联书刊检查。甚至小说里“打倒法西斯分子”的口号也被建议用没有针对性的“打倒反动分子”来代替。

但在1941年4月24日,斯大林的秘书处致电爱伦堡,请他给领袖打个电话。斯大林说,他读了该小说已发表的部分,并问作家,是否准备描写德国法西斯分子。爱伦堡作了肯定回答,但说自己怀疑是否会允许出版。

爱伦堡回忆说:“斯大林开玩笑道,‘那您就写吧,我们将和您一起努力推动该书的第三部分问世……’”(爱伦堡И.,《人·岁月·生活》,莫斯科,2005年,第277页)



但作家所听到的话并未让他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知道,战争即将爆发。爱伦堡认为,斯大林知道这将使“很多人去谈论这次通话”,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警告社会。

其实,斯大林未必会奢望这种信息传播渠道的效果。很明显,在他的世界构图中出现了令人痛苦的重新评估,这与一件结局让斯大林十分为难的事件有关。这件事就是南斯拉夫发生了政变,政权过渡给了反法西斯的政府,但整个南斯拉夫几乎顷刻间就被德国军队占领了。

对于批准了支持政变,并认为德国人将被困在巴尔干的斯大林来说,这种令人惊讶的结局说明他的估算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斯大林支持爱伦堡的小说继续在《旗帜》杂志上发表。杂志、报纸上的评论、广播里的回应和电影,所有这些宣传工具都应该随之对这部小说的反法西斯主旋律进行炒作。

在战争爆发前,文化在苏联已经完成了让公众直面战争的准备工作。

谈到斯大林对文化的领导,就不能不回想一下另一位文学家的创作。他痛恨我们的主人公,甚至还写过他的政治传记,他就是列夫·托洛茨基。

虽然他并不直接是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但他对文学发展的进程和对领袖的声誉都产生过影响,而且是很大的影响。

1939年9月底,美国《生活》杂志的编辑到科伊奥坎找了托洛茨基,向他约了一篇关于斯大林的特写和一篇关于列宁之死的文章。结果是托洛茨基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坚称是斯大林毒死了列宁。

《生活》杂志社领导考虑到托洛茨基的理由并无说服力,拒绝予以刊登。但这篇文章还是在不起眼的《自由》杂志上发表了。

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 H. 多伊彻证实,托洛茨基“会捕捉任何传闻和任何谣言”,只要它们能显露出斯大林性格中的某种阴险的特征就行。

但托洛茨基已经厄运难逃了。

在苏联文学史上,1940年8月2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托洛茨基的可耻死亡》一文的最后一段是斯大林最富表现力的文笔之一。

8月22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去世。拉蒙·麦卡德在8月20日完成了苏多普拉托夫和艾廷根的任务:用登山杖击打托洛茨基的头部,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这位世界革命的领袖和第四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再也没能站起来。

斯大林仔细地校订了文章,并补写道:“托洛茨基成了自己的阴谋、背叛和不忠的牺牲品。这个卑鄙的人前额上打着国际间谍的印章走向坟墓,就这样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检查:苏维埃国家中的作家和记者(1917—1956年)》,第523页)

在斯大林校订之后,文章改名为《国际间谍之死》。

从依靠美国左派圈子并与他们进行合作,而且首先是与大型金融公司进行合作

这个层面来说,托洛茨基可以称为他们的代理人,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间谍”。的确,1917年,托洛茨基公布了俄国和盟国的秘密条约,为美国效了大力。当时,美国经济开始变得比英国经济强大很多,英国在战争期间成了美国的大债务人。华盛顿利用“托洛茨基议定书”,在签署凡尔赛和约时抢占了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排挤了英国盟友。

但到了1940年,对于美国来说,托洛茨基已经是早已过时的人了。

对于斯大林来说,1917年和国家的崩溃是其亲身经历,也从未停止过对现实的影响。

虽然,斯大林校订的这篇文章并不能称之为文化的审判,但其中反映出的无情斗争的精神却充斥在苏联生活的所有领域之中。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没有上帝的巨大空间里,却洋溢着精神的崛起、乐观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美好未来的信心。

就像朱可夫元帅谈到的战前时期,其特点是“充满某种崇高的精神,同时又干练、俭朴甚至简单”。

想必,不是苏联所有的居民都同意元帅的这个结论。处于赤贫边缘的简朴的日常生活对许多家庭都是很现实的。对他们来说,接受教育、政治忠诚和做好应对强压的准备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机会。斯大林所说的不分党籍的“布尔什维克”,指的正是这些人。而这样的人有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一直在关注着日渐向资产阶级标准靠近的统治阶层的日常生活条件。

例如,1938年2月1日,应斯大林的坚决要求,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领导人的别墅》的决议。在莫洛托夫起草的手稿中写道:前“达官贵人”(鲁祖塔克、罗森戈尔茨、阿格拉诺夫、梅日劳克、卡拉罕、亚戈达等)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别墅,拥有15至20个甚至更多房间的宫殿,他们在那里挥霍和浪费人民的钱财,透露出其日常生活的完全腐败和堕落。有鉴于此,而且还由于在领导层的某些圈子中企图拥有这种宫殿式别墅的向往仍然存在,甚至还有所发展,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为苏联领导人规定别墅的最高标准,有家室的为7至8间中等大小的房间,无家室的则是4至5间。(《大检查:苏维埃国家中的作家和记者(1917—1956年)》,第371页)

这里说得很直接了:精英们在追求奢华。即斯大林看到了统治集团有腐化的危险,并与之进行了斗争。

在1937年至1938年的清洗之后,当一批新的年轻干部进入了政治和管理的高层时,对“宫殿式别墅”的向往才有所降低。朱可夫所指的应该就是这种社会情绪。

“二战”前夕,需要为“圣剑骑士勋章”而战的勇士,而不是爱奢侈享受之人。

## 第十四章

# 战略的戏剧化行动

---

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幕戏剧、情报机关警告德国即将进攻、南斯拉夫政变、德军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与日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关于斯大林没有准备好打仗的过失问题

---

苏联领导层很快(10天之后)就获悉希特勒将实施“巴巴罗萨计划”。1940年12月29日,苏联间谍H.斯科尔尼亚科夫上校(代号“流星”)向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报告称,“希特勒下达了准备与苏联开战的命令”,并将于1941年3月宣战。

该文件被分送到斯大林、莫洛托夫、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手中。

1941年1月4日,“流星”在更详细的补充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可能与贝克访问德国情况一样”。(波兰外长贝克在德国人进攻波兰前几个月访问了德国。)

此外,报告说:“希特勒认为红军目前的状况很差,到春天他无疑就会获胜。”

苏联情报机关以前也获得过有关德国军队在与苏联交界处聚集的消息,但现在有了具体的事实。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1941年6月的上半个月,工农红军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对外情报局已经编写了两份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情报汇总的秘密报告:《1941年1至6军事情报机关获取的关于德国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情报目录》和《苏联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部驻柏林间谍“科西嘉人”和“班长”在1940年9月至1941年6月16日期间上报的关于德国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消息日志》(在《消息日志》上的落款日期是1941年6月20日,离德国开始军事行动只有48小时)。

研究军事情报的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洛塔认为,这两份文件是按照同一个领导人的部署编写的,而这两个情报机关同时隶属于斯大林。这一点也得到了苏多普拉托夫的证实。如果考虑到领袖办公桌上出现了两份分量相等的情报,其中一份说德国人的进攻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份则否定了德国人在1941年发动进攻的可能性,那么斯大林就有必要作出决定性的选择。

1941年上半年,军事情报机关平均每个月要向克里姆林宫递交6份关于来自德国方面的军事威胁在增长的报告。

在这些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代号为“首领”的间谍的断言:德国军界不支持希特勒的计划,“因为这将导致一场结局难料的流血战争”。

《情报目录》最后有20条消息是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人员克利盖尔处得到的,从这些消息可以分析出,悲惨时刻已经逼近了。1941年6月21日19点得到的最后消息中标出了进攻的日期:“立刻!”这一消息的内容是:“大使馆早上收到了销毁所有秘密文件的指示。命令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在6月22日早上之前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并交给大使馆。住在馆外的人员要搬回大使馆。大家认为,今晚将作出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战争。”

在此前的情报中都是一些战略和军事信息,而这一条却是从日常生活中获取的消息。命运已定。

在战前半年的时间里,战争就已经从巴尔干方向朝苏联逼近了。1月23日,保加利亚表示同意加入三国联盟。这个被斯大林公开称之为苏联利益区域、且是通往海峡桥梁的国家,现在离开了他的势力范围。

德国人采取了措施,以防止康斯坦察受到“无关的敌人从海上的轰炸”,即指苏联空军的轰炸。2月26日,克里姆林宫获悉德军进入了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但除了发表外交声明之外,斯大林什么也做不了。况且,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继续推行的战争使他对英国产生了孤立主义和怀疑的态度,因为他非常清楚,英国在海峡地区对俄罗斯的利益是持反对政策的。

苏联的处境迅速恶化。1941年3月26日深夜,贝尔格莱德发生了军事政变。3月25日签署了加入三国公约条约的德拉吉沙·茨韦特科维奇的亲德政府被杜尚·西莫维奇将军的亲英政府所替代。苏联情报机关和共产国际也参与了政变,并像苏多普拉托夫证实的那样,“有点过于卖力了”。在斯大林批准此次政变之后,季米特洛夫就接到了消息。而在军人夺取政权后,仅过了几个小时,在贝尔格莱德就举行了一场打着“独立的南斯拉夫万岁”和“斯大林万岁”口号的游行。



4月5日,苏联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互助条约。在柏林看来,这是苏联企图进行干涉的信号,因为南斯拉夫对莫斯科的隶属关系破坏了希特勒的军事计划。

但是,这也产生了积极的后续效果。按苏多普拉托夫的观点,没有苏联与英国在南斯拉夫事务上的一致反德,“也就没有后来与丘吉尔建立的相应的微妙关系”。

4月6日,德军进入希腊和南斯拉夫,而此时,由李斯特元帅指挥的德国第12集团军已经驻扎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境上,并准备在占领巴尔干之后发起对苏联的进攻。由于已成为盟友的南斯拉夫突然倒戈转向了英国和俄罗斯一边,德国人不得不重新确定方针。

正是南斯拉夫战役把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拖后了1个多月,到10月至11月时才明白,这是闪电战失利的原因之一。在德国坦克师和匈牙利军队在多瑙河战线发动了短促突袭之后,南斯拉夫的部队受到了两翼夹击。在北方,意大利人从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方向发动了进攻。还有一个打击是从保加利亚的领土上发起的。结果,南斯拉夫的28个师在混乱中后退到了萨拉热窝,并于4月17日投降。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德国人在希腊也展开了进攻,英国的军队2月中旬已在此登陆。富勒认为,英国人不应该履行自己保卫希腊的义务,因为英国人在那里没有坚守住的现实可能。

李斯特的部队在轰炸机的掩护下开始以四路坦克纵队发动进攻。在翻过山后,德国人一路急速向前挺进。4月8日,他们占领了萨洛尼卡。4月21日希腊军队投降。

英国军队完成了极为困难的撤退工作,在5.766万名士兵中,约有4.3万人是乘船撤离的。

4月27日,德国人来到了雅典。

在南斯拉夫发生灾难性变化之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斯大林打电话给作家爱伦堡,驳斥了自己的那些御用宣传员的说法。实际上,就主要的政治意义而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莫斯科条约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德国军队开进南斯拉夫前,希特勒不愿意进行任何协商,所以斯大林才允许这位作家去揭露敌对制度。

但是,任何一个爱伦堡都不可能做到不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希望破灭,他们曾寄希望于南斯拉夫人把德国人拖入漫长的战争之中。

1941年4月18日,苏联外情局副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签署了专门的指令:所有驻欧洲的情报机关需尽一切可能积极开展间谍网和联络线的建立工作,使之与战时的需要相适应。

斯大林端详着欧洲地图,地图上除了处于中间地带的瑞士和正在作战的英国,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已被德国征服或正在与之合作,此时他理应感觉到威胁已经达到了



怎样一个程度。但感觉是一回事，了解又是另一回事。他并不了解威胁将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他有理由认为，他能够用某种高招消除威胁。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因为这为苏联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提供了保证。顺便提一下，在苏联的历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仿佛是苏联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的胜利使日本军阀相信，与红军作战是没有前途的。

实际上，苏日条约背后站着的是德国，其政治领导层认为，必须让日本军队瞄准新加坡这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中心。这样，日本就能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移开。这种战略中有许多合理之处：引开英国和美国之后，希特勒就能够确保毫无障碍地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在国际象棋中这种方法叫做“引离”。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正如我们所知，美国资本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英国资本的排挤。在华盛顿和伦敦的鼻子底下砰的一声把中国大门给关上了的日本，迫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团结起来。7月，美国在西半球之外的地方开始对航空汽油的供应实行禁运。1940年10月，美国人禁止向日本供应废铁和废钢，并开始从日本撤出本国的资本。

1941年2月，英、美向中国提供了巨额贷款：美国提供了5亿美元，而英国则提供了5000万英镑。西方民主国家并不打算撤出这一地区。尤其是他们在这里没有大规模的陆军部队，而中国国民党却拥有300万人的军队。

与此同时，华盛顿明白已经开始的斗争具有多种可能性。其中最可怕的威胁之一就是形成针对英美的日苏德联盟。因此美国人在对待东京的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他们担心对日本的完全经济封锁会把其推向莫斯科一边。

例如，在实行汽油禁运后，日本要求印度尼西亚把石油供应量提高6倍，于是美国国务院建议荷兰政府去满足日本60%的石油需求。因为此时美国还未做好战争准备。

英美对日本进攻苏联怀有兴趣，以图一劳永逸地消除欧亚联盟建立的威胁。但在欧洲的大舞台上，美国和英国认为苏联是唯一能与德国抗衡的伙伴。由此不难得出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一个可悲的结论：西方对苏联尽快陷入战争倍感兴趣。

斯大林应该做什么呢？他只能随机应变。

但是，此时日本政府预见到西方封锁的威胁会日渐加剧，于是决定弄清楚柏林的计划。这样，日本外相松冈就去了德国。

1941年2月23日，里宾特洛甫在与日本大使会面时说：德国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打赢了这场战争。现在为了日本的利益应该对新加坡予以决定性的打击，“以消灭英国在东亚的主要阵地”。里宾特洛甫作出结论：“这一切将快速使得战争的结果有利于我们，并阻止美国参战。”



对于日本来说,南方比北方在经济上更加有利可图,于是日本接受了德国外长的建议。

会谈时里宾特洛甫几乎公开承认:“在与俄国发生迫不得已的冲突时”,德国将迅速取胜。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希特勒对闪电般快速击败苏联是如此地自信,以至于不想告诉日本盟友准备进攻苏联一事,因为他不愿与日本人分享胜利果实。

1941年3月23日,日本外相在去德国途中顺路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在火车站迎接了他。第二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日本外相进行了初步的谈判,然后外相就离开了。3月25日,外情局收到了苏联驻日武官 IO. 格卢申科发来的情报,其中解释了德国人邀请松冈访问的主要目的:说服日本政府引开美国。

按照里宾特洛甫和松冈会谈的纪要,一旦苏联向日本发动进攻,德国将保证站在日本一方。同时,德国人并不愿意看到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因此,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日本和苏联都对签订条约感兴趣(虽然原因各有不同),而德国人却又在用行动推动双方朝这方面走。

此外,希特勒向松冈承诺,在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德国将站在日本这一边。

4月6日,松冈回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开始了艰难的谈判。一直到4月12日,在这位外相与斯大林会面前,条约都没能签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到,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南斯拉夫。在苏联期间,松冈参观了列宁格勒,游览了莫斯科,访问了技术学院和汽车学院,并与总参谋长朱可夫会了面,还在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观看了根据 A. II. 契诃夫剧本改编的话剧《三姐妹》。

这里需要强调,苏联领导人了解,对于日本人来说,排除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表现得很坚定。斯大林想清除 1905 年朴次茅斯和约的沉重后果,使得日本人放弃在北萨哈林岛的租赁合同和捕鱼权。舒伦堡告诉柏林,他与松冈见过几次,但后者并未向他透露谈判的内容。

一切都应该在松冈与我们的主人公会面时解决。

在松冈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出现了争论。争论是关于北萨哈林岛的,日本想得到这个地方。

斯大林直率地说:现在日本控制着苏联滨海地区所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如果日本再得到北萨哈林岛,那么苏联将“完全被封锁住了”。

松冈回答说:日本不反对苏联通过印度进入太平洋。也就是说他重复了希特勒想让苏联在印度半岛与英国开战的主意。

斯大林对此回答说:苏联不需要在印度的战争。

松冈提出了日本可在印度尼西亚供应的橡胶和其他物资方面给予苏联帮助的

建议。

斯大林的回答是坚决的：“占领北萨哈林岛，这将影响到苏联的存在。”

从已公布的谈判记录来看，松冈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了。

4月13日(是星期日)，苏联和日本的中立条约签订了。

这份文件的特殊性在于：日本人走得比德国所希望的更远。很明显，日本人记住了在哈勒欣河战斗期间里宾特洛甫与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给他们带来的震撼，所以要尽力确保自身的安全。

斯大林前往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欢送松冈。据莫洛托夫回忆说：“我和斯大林一起把松冈灌得大醉，差点没能把他拖进车厢。”(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30页)

他们甚至还一起唱了歌曲《芦苇沙沙响》。所有的人都很满意。在舒伦堡1941年4月13日上呈的报告中就讲到了送别时的友好场面(《苏联和德国(1939—1941年)》，第157页)。

斯大林也刻意表现出了对来到站台上的德国外交官的友好态度，虽然他刚刚在建立一条牢固的对德防线之路上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其结果是什么呢？整个世界把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的消息看作是斯大林政策成功的一个证明。苏联再次摆脱了繁重的义务。英国和美国明白，莫斯科将不会参与到它们与日本的摊牌中去。中国的国民党领导人对此也不满意。

是的，斯大林在建造一个堡垒，并希望在其中苟且偷安上一年半载的时间，直至完成重新武装部队的工作。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强化了他的这一希望，既能继续与希特勒做交易，又能捞取不与敌对各方结盟的好处。斯大林知道，所有各方都认为与苏联结盟有利，于是就为此利用一切手段，直至挑衅、以假乱真和虚张声势。

南斯拉夫没能给予应有的抵抗，没有拖住德国人，那又怎么样？现在苏联东部不是得到保障了吗，虽然是暂时性的，但也可苟安一时。对德国人也能进一步讨价还价了。

关键是不采取激烈的行动。

斯大林读着几十份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时，大概就是这样推断的。

1941年6月22日，即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之日，一般认为这一天是斯大林遭到挫败的一个标志：做着击退侵略准备而把国家经济和居民置于可怕高压之下的领袖突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从1945年的经济状况和人员损失的规模来看，苏联如同一个战败国。对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不去指责他所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吗？

然而，不管这多么令人奇怪，人们并没有指责他。

在俄罗斯人的历史意识中，6月22日根本不是斯大林失败的象征，而是与蒙古人



侵一样的民族大悲剧的标志。就像没能防止国家受到更强大敌人侵略的古俄罗斯大公们一样，斯大林也没有被看成 1941 年所发生之事的唯一罪人。

一般说来，那些想在斯大林一人身上寻找失败根源的人，并不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进程。

在对苏联军用机场实施空中突袭和坦克突破的后面，应该看到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的影子，而这份和约签订的时候，斯大林对世界性的大事尚不具备影响力。正是凡尔赛和约催生了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引发了基督教出现以前远古时期的那种氏族部落式对复仇的渴望。这样一来，斯大林就应该成为对抗这一可怕力量的主要战士了。尽管他不完美，甚至有些可怕，但当时在欧洲没有其他战士了。难道会是在自己岛国上的丘吉尔吗？受到罗斯福的支持，丘吉尔此时正与一部分支持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政治精英作着斗争。

斯大林也曾竭尽全力想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就像莫斯科大公们与金帐汗国的大汗们所做的那样，但没有成功。

其实，斯大林预见到了进攻，也做了能做的一切，以便赢得时间，并整合资源。

除了按照他的倡议建立了战略储备之外，重炮也被运到了大后方。这样一来，重炮得以保存下来，并在 1942 年派上了用场。

据米高扬回忆，二战前，德国人提议为德国未能（或不想）按 1940 年签订的经济条约的条款提供设备而支付赔偿费，米高扬不同意抵偿，但令人吃惊的是，斯大林同意了。原因很简单：应该拿到黄金，否则一旦战争爆发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斯大林在德国进攻前夕的行为表明，他处在一个怎样的困境中。

1941 年 5 月 4 日，在保持所有原职的同时，斯大林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日丹诺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

尽管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敢违背任何一种逻辑而剑指东方发动另一场战争，但他还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5 月 5 日，在工农红军外情局的特别报告中说：“在两个月内，德国驻扎在苏联边境地区师的数量增加了 37 个（从 70 个到了 107 个）。加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军队，这个数字增加到 130 个；作战地区的准备工作正在加强：正在修建第二条铁路线、弹药库、机场和防空洞等。”

还需要什么证据吗？

就在 5 月 5 日当天的 18 点，斯大林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耶夫厅对青年军官、16 所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发表了讲话。他们被分配到了各个军区服役。斯大林应该告诉他们真相，他可能不会有其他机会这样做了。

他对他们所说的，是他对未来的预见，不带任何外交辞令。

什么是政府招待会？这是一种有着自己礼仪规定的特别庄严的活动，似乎，招待会不是开诚布公的地方。

政治局委员们、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陆海军将军们纷纷出现在大厅的主席台上。自然，最主要的就是斯大林的讲话。那么下面的尉官们听到了什么呢？

斯大林承认“目前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是他也重温了入侵俄国的拿破仑“大军”的命运，谈到了已经在向军队配置最新的优于德国的军事技术装备。

他的乐观中也含有警告。他承认：芬兰战役表明，红军没有准备好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消除军队在军事装备和作战训练方面的不足。其实，军官们并没有听到全部的真相，甚至连斯大林也不知道。（我们要补充一点：采取的“紧急措施”中不包括赋予兵团指挥官像德国军队那样的必要的自主权。）

斯大林讲完话后，大家被请进格奥尔吉耶夫厅参加宴会。在那里，我们的主人公致了几句祝酒词：“为步兵干杯”、“为炮兵干杯”和“为赢得战争干杯”。最后一句祝酒词有些出人意料。乍看上去，这句祝酒词是被炮兵学院院长西夫科夫中将挑起的。西夫科夫提议“为和平，为斯大林的和平政策，为这个政策的创造者，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而干杯”。

听到这些话后，斯大林挥了挥手，请求发言。

目击者是这么描述这一场景的：

他非常气愤，停顿了一下，他的话中出现了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

“这位将军什么都没明白。他什么也没明白。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反战主义者。我们一直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反对瓜分世界、奴役和剥削劳动者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一直赞成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摆脱殖民主义桎梏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赞成把劳动者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战争，赞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进行的最正义的战争。德国想毁灭我们这个由劳动人民在列宁缔造的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想毁灭我们伟大的祖国、经过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列宁的祖国，想消灭千百万苏联人民，并把幸存者变为奴隶。只能通过与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才能拯救我们的祖国。我建议为战争，为战争中的进攻，为我们在战争中的胜利而干杯。”

斯大林喝干了自己的杯中酒，大厅里的所有人都干了杯，厅内一片寂静。（穆拉托夫 Д.，《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与 И. В. 斯大林在一起的六个小时》，载于《同代人回忆录和同期文献中的斯大林》）

这当然是斯大林对理解能力迟钝的将军的回答，但其实质是反映出了斯大林的



主要想法，这一不知为何在台上 40 分钟的讲话中没找到地方表达的想法。这显示出了我们主人公内心的波动。

不安困扰着斯大林，情报机关的报告已经在大声疾呼了，而西夫科夫将军还在用其“和平政策”来消除他未能彻底挑明的鼓动效果，于是斯大林极端震怒。

是的，现在斯大林向他们发出了警告。

但过了几天后，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5 月 10 日，希特勒的党内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到英国，并在那里展开了谈判。谈什么？谈签订和约吗？如果这样，那么希特勒就可以腾出手来了。同一天，似乎是为了增加此消息的分量，英国对德国的轰炸停下来了（我们注意到，在所有战线上与英国人对抗的德国军队共有 122 至 126 个师）。

斯大林清楚，苏联尚未准备好打仗，但战争已不可避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那么是什么时候？

5 月 8 日，塔斯社驳斥了苏联军队在西部边境集结的传闻。不过，军队实际上在集结。

5 月 9 日，苏联断绝了与德国人占领下的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三国殖民政府的外交关系。

5 月 12 日，在德国代理人领导下通过反英起义而获取了政权的伊拉克的亲德政府得到了承认。

这是怎样一种斯大林为之干杯的“进攻战”呢？

似乎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联总参谋部 5 月 15 日提出了《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战略扩展计划的设想》。这份文件是由 A. M. 华西列夫斯基起草的，但不管是铁木辛哥，还是朱可夫均未在上面签名。该文件建议对波兰方向的德军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斯大林阅读了这一“设想”，但没有做出反应。

在此前一天，即 5 月 14 日，《消息报》刊登了塔斯社的一则消息，其目的是为了探明德国人的意图和把他们拖入延迟至秋天的持久谈判之中，而到那时，秋季泥泞的道路将使得军事行动无法展开。

消息称：德国“一贯遵守苏德条约的规定”，有关德国即将发动侵略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苏联没有进行对德作战的准备工作，工农红军的夏季集训和演习只是常规训练。

但克里姆林宫并没有等到对自己试探的回应。柏林似乎什么都没注意到。于是，杰卡诺佐夫大使 6 月 18 日与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会了面，以了解德国方面的回应。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似乎，不确定性消失了。强大的、有战斗力的，但未完全做好战斗准备的红军大概要遭到可怕的打击了。

在开战前的三天，政治局通过了建立直至第聂伯河的第二战略梯队（“第二防线”）的决议。这表明以前“在敌方领土上打一场牺牲小”的战争观点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做了他认为能做的一切，来加强与这支世界上最强大军队冲突时的应对能力。可以说，他睿智地制订出了两条战略路线。

把波罗的海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和西南军区改组为西北方面军、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此外，还组建了南方面军。

当然，两条战线互有竞争，也使军方领导层失去了自信。但这里需要再重申一下，斯大林别无选择，因为他不可能相信玩弄地缘政治游戏的英国人和德国人，也不可能相信自己的将军们。这些将军竟违背逻辑地声称：“从战略创新的方面来讲，欧洲的经验似乎并未提供什么新意。”（这些话是国防人民委员 C. 铁木辛哥在 1940 年 12 月 21 日至 30 日的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会议上说的。）

然而，在谈论斯大林有无过错时，应当考虑到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他应负的责任，而创造了这种国家管理体制的正是他。怎样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呢？

没有根据的镇压、人事混乱、不愿承认进攻日期的现实性、对第一防御梯队重新调整的延误，这些都是事实。

他的有无罪过和他的凯旋式胜利，与他残酷的且屡犯错误的实践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斯大林模式。他要对一切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可以涵盖所有军人的、情报人员的、外交官的和战友们的错误。

虽然朱可夫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海军上将 H. Г. 库兹涅佐夫后来证实“军界曾犯过严重的失误”，但这无法改变 6 月 22 日的那场悲剧。

6 月 21 日晚，在斯大林那里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莫洛托夫、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和工农红军政治宣传总局副局长 Ф. Ф. 库兹涅佐夫。会上不断传来边境受到威胁的消息，于是会议通过了最后一个“温和的”决定：责成莫洛托夫与舒伦堡会晤，并设法从后者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如同落水的人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舒伦堡推说没有收到来自柏林的消息，什么也没有回答。

在莫洛托夫返回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被责成下令边境军区（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和兵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如果把 1941 年 6 月 22 日前苏联所采取的所有措施综合起来，那么关于斯大林有无罪过的看法就会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认为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日期上的失算是我们失败主要原因的说法伴随着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在 1941 年，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的军队在作战能力和专业化方面不比德国军队差，如果能够及时让我们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那么他们将能成功地击退侵略者的进攻。





与此同时，他们理解的战备状态仅是军队按照警报占据部署地带的的能力，而忽略了战备状态的主要组成部分——胜利完成击退突然袭击战斗任务的能力。军队如果有这种能力，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突然袭击了。

许多人认为，我们的军队没有在遭到突然袭击之前进入战备状态的主要“证据”就是军队失败这一事实本身，虽然这里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应当用不确切的、毫无根据的军队没有进入战备状态作为依据，而是要明确采取了哪些主要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在战前为了达到所必须的准备应当采取的。还要搞清楚，其中的哪些措施在战前已经及时付诸实施，哪些还没有去做以及这对战争的初期结果有什么影响。

1935年至1941年，苏联领导层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苏联武装力量战备水平的重大措施：

- 1) 1935年至1939年间，红军转为基干制；
- 2) 1939年，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
- 3) 战前的1939年至1941年间，创建并扩大了新一代坦克和飞机的成批生产；
- 4) 1939年至1941年间，对武装力量完成了从和平时期转变为战争时期（在战前！）的战略动员扩编，从98个师增加到了303个师；
- 5) 1939年至1941年间，在西部边境成立和集结了掩护部队，加上战前补充到掩护部队的第二战略梯队的16个师，其数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186个师；
- 6) 做好了西部战区的后勤备战工作——机场、防御区和道路。

1941年4月至6月期间，随着战争威胁的增长，采取了提高战备水平的紧急补救措施，包括：

4月至5月，征召了79.3万名后备兵去补充西部军区的部队，使之几乎达到了战争时期的定员；

总参谋长4月14日下令：未记入清单，但安装了野战部队武器的所有防御地区和所有永备发射工事紧急进入战备状态；

从5月13日起，把第二战略梯队的部队从腹地秘密调遣到西部军区，并进入战备状态，他们是7个集团军和66个师（第16、19、20、22、24和28集团军，第41步兵军，第21和23机械化军团）；

西部军区的63个后备师进入战备状态，通过夜间行军秘密向前推进，并从6月12日起编入这些军区的掩护部队（国防人民委员部于1941年6月12日下达的指令）；

掩护部队第二梯队的52个师以训练的形式秘密转移到集结地区，并进入战

备状态(国防人民委员部于1941年6月16日下达的命令);

掩护部队第一梯队的各师按照总参谋长1941年6月10日的电报和国防人民委员部1941年6月11日的命令从6月初进入防御区;

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所有部队在1941年6月18日至21日进入战备状态;

从1941年4月起成立指挥所,从6月18日到21日它们的任务就是紧急组建前线管理局;

1941年6月21日,在第聂伯防线成立由C. M. 布琼尼指挥的集团军群;

按照国防人民委员部5月14日的命令,所有军事院校毕业生提前毕业,并被派往西部边境军区;

1940年12月27日,国防人民委员部下达第0367号令,1941年6月19日再次下令:对飞机等进行疏散和伪装;

1941年6月14日,И. В. 斯大林派副国防人民委员K. A. 梅列茨科夫将军到西部特别军区和波罗的海特别军区检查各军区的空军战备状态;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大本营(第1号)的指令出台:西部各军区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该指令签署于1941年6月21日22点整,因为在得到斯大林对此指令的许可之后,C. K. 铁木辛哥和Г. К. 朱可夫在22点已经从他那里出来了,是让H. Ф. 瓦图京将这一指令送到总参谋部的通信中心站的)。

这样一来,在德国人开始进攻前,红军的237个师中共有225个师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做好了按国防计划与德国及其盟友开战的准备。

在开战前,只有两条重要的措施没有执行:全国总动员和把部队开进防御区的前沿地带。

在战前对红军达到战时水平(540万人)的战略动员部署、掩护部队的大量组建、秘密额外征召了79.3万后备役部队等等,这些使得总动员包含的几乎大部分措施都得以实施,且由于做了这些准备,在战前进行全国总动员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全部用于战争的303个师都是在和平时期组建的。一切主要的工作都已经做了,如果不考虑我军与希特勒军队素质的比较问题,那么国家应该也是能够成功抵抗侵略的。实际上,从1941年3月起,用于侵略的德国武装力量和用于抵抗侵略的红军部队,都在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战略集结和部署。

事实上,现在普遍认为,导致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在德国进攻苏联日期上的失算,而完全是另一个原因——斯大林的决定:尽管德国在1941年6月发动进攻已是明显不可避免的,但斯大林却没有宣布总动员和命令部队在德国人进攻前转入防御区前沿地带,因为他认为1941年春季采取的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186个师规模的掩护部队能够击退德国及其盟友的任何一种突然袭击!



这不是日期上的失算,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有意识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犯了一个错:他过高估计了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按师的数量和战斗装备来看,苏联军队要比德国军队强很多,这是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部也同样)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失算之处。

并不存在对德军主要攻击大致方向的失算,有的是斯大林的决定:考虑到对德国人进行重大打击的可能性是在白俄罗斯,于是决定把我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乌克兰,认为在白俄罗斯的44个师已足够抵御德国人的50个师。而德国人从乌克兰,从克拉科夫对我们发动打击更为有利……正是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对我军战斗力的失算,仅此而已。

有关我军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被击溃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杜撰。实际上,侵略军在6月22日的首次攻击中只使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的掩护部队第一梯队的30个师遭受了打击,而西部边境军区和第二战略梯队在那里共有237个师。3个特别军区主要兵力(118个师)的溃败悲剧不是发生在6月22日,而是在后来,是在1941年6月24日至30日在新老边境之间发生的遭遇战中……

那种认为遭到迫害的高级指挥官是最好的,军队中剩下的都是不好的指挥官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报刊上经常拿遭到迫害的人中最优秀的指挥官(如M. H.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与剩下的中差的指挥官进行比较,但却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国30年代的高级指挥人员(其中包括受到迫害的)获得过什么现代战争(除了国内战争)的经验呢?要知道他们从国内战争结束到1937年,一直在我们当时人数不多的、落后的半民半正规的部队中服役。这支军队中,在20个军区中正规师只占二成(即26%,而在内陆地区中就没有正规部队),从1920年到1939年军队管理局也不存在,从1935年至1937年才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等等。所以,难怪在20世纪20、30年代,我们有120名高级指挥官去了德国学习军事。

而且,与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有关的战略思想并未被抛弃。正如人们所写的那样,这些思想反映在了有关军事条令之中,但是战前在军队中的实施并不都是正确的。这些思想包括:

“反击”的思想取代了更适合我军的战略防御思想,而成了战争计划的核心;进行纵深战斗和战役的理论压倒了我军的防御、机动战和遭遇战等问题;组建掩护部队的思想得以迅速实现,这在1941年拯救了我们。

1937年至1938年对指挥人员进行镇压的不良后果,1941年夏季时得到了部分扭转,因此不能把这列为我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主要原因。

不幸在于,红军无论是在1936年、1939年,还是在1941年6月前,都未及成为正规部队。从1935年起,红军的发展极为粗放,人数增加了5倍,但这削

弱了军队的质量，首先是削弱了指挥官和士官一级军官的质量。

至1941年，苏联军方领导层在准备与德国作战时，大大加强了对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尤其是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但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红军在部队、参谋部和各级指挥人员，特别是下级指挥人员的质量上，要大大落后于德国。

部队没有受到良好的现代战争技巧的教育，凝聚力薄弱，组织性不强。无线电通信、管理、互相配合、侦察和战术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1939年，军队向正规军的转变和数量达5倍的增加，以及1940年至1941年的重组，加剧了指挥人员缺乏和素质下降的问题。

1941年夏天，我军溃败真正的主要原因是，红军未准备好与敌军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机动战，而敌军在这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且对这种闪电战做了极好的准备。我们的武装力量未能发挥出在战争初期优于侵略者的技术和人员的巨大潜力。我军这种差距是1930年至1937年间为在战前数倍增加（扩编）武装力量而对技术环节指挥干部的培养的彻底失败造成的。1939年至1941年间，尤其是1941年春天采取的匆忙的、突击性的措施已不能改善这种状况了。（引自：《祖国历史文选（1914—1945年）》，莫斯科，1996年，第498—504页）

总之，斯大林未来得及完全解决他自己在1931年部署的任务：用10年时间赶上西方国家，“跑完”他们“花100年”才走完的路。斯大林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只剩下一件小事：居民的素质。如何才能在此如此短的时间内改造人们的文化基因密码，在摧毁了彼得大帝文明的人们及其子女的身上培养出新的世界观和新的认同呢？

此时，离伟大的卫国战争仅一步之遥了，而这场战争势必要改变国家居民的构成，势必要把残存的圣彼得堡核心与那些“红色”的、“黑色”的百人团混合成一类几乎同等的居民，所以，我们还要指出一个因素，它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斯大林是如何教育和培养苏联人的。

只要看一下1939年各种职业人员的工资（卢布/月），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其优先顺序：音乐教授兼系主任是1500卢布/月，音乐教授900卢布/月，工程师700卢布/月，国家医院中有经验的医生350卢布/月，教师300卢布/月，普通工人300—350卢布/月，清洁工100—120卢布/月，工农红军排长625卢布/月，连长750卢布/月，营长850卢布/月，团长1200卢布/月，师长1600卢布/月。（索博列夫 B. E.，《俄罗斯民族文化体制：争夺政治权力和精神文化的内部战争》，莫斯科，2007年，第227页）

从这份国家工资等级表中可以看出，苏联人民应是年轻、健康、有文化、懂技术，有战斗力的。

## 第十五章

# 德国进攻苏联

德国进攻苏联、边境战斗、德国将军们相信将速胜、进攻受阻、德国经济把闪击战钉上十字架

1941年6月22日是星期日，凌晨4点，德军对苏联发动了进攻。

这时，舒伦堡紧急要求与莫洛托夫会晤，并在会晤时宣读了德国政府宣战的声明。

凌晨5点45分，在斯大林处召开了新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莫洛托夫、贝利亚、铁木辛哥、伊萨科夫和梅赫利斯。此时还没有得到前线确切的消息。他们批准了第2号命令：“部队要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猛烈攻击敌方部队，在他们越过苏联边境的地区消灭他们。但在未接到特别命令之前，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境。”

从上述文字看来，斯大林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进攻是在希特勒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的，在遭到坚决反击之后可能会停下来。否则如何解释为什么要禁止越境呢？

一个半小时后，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也赶到了。大家开始讨论由谁来发表广播讲话？斯大林断然拒绝，于是此事就落到了莫洛托夫的头上。

大约在12点30分，莫洛托夫激动的声音通过广播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响了起来。他讲了几个因素，从中可以看出，最让苏联领导层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在对苏联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德军对我们国家发动了袭击”；“尽管苏联和德

国之间签有互不侵犯条约，且苏联政府认真地履行了条约的所有条款”。

莫洛托夫的讲话中流露出明显的申辩语气。当然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除此之外，莫洛托夫还为这场战争定了基调：是一场卫国战争（这里要提醒一下，1812年6月22日拿破仑进攻俄国时也是这样的提法）！

讲话的结尾仿佛给敌人敲响了警钟：“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将被粉碎。胜利将属于我们。”根据各方面的评判，这是斯大林的话（莫洛托夫也不否认这一点）。

战争第一天，克里姆林宫通过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动员预备役人员、建立军事法庭和实行战时状态的命令。

下午2点，通过了关于允许部队越过国界进行反攻的第3号命令。

这一天，成立了统帅部大本营，其成员是：铁木辛哥（主席）、朱可夫、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H.库兹涅佐夫。大本营的常务顾问是沙波什尼科夫、库利克、梅列茨科夫、日加列夫、沃罗诺夫、瓦图京、米高扬、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梅赫利斯。

这样一来，统帅部大本营集中了苏联的所有党政军领导人。在这紧张的时刻，谁也没有注意到，斯大林实际上把权力转交给了铁木辛哥，因为按照实行战时状态的命令，在实行战时状态的地区，权力要移交给军人。

6月24日，成立了由卡冈诺维奇（主席）、柯西金和什维尔尼克（副主席）领导的疏散委员会。

在经过早晨的强烈震荡之后，斯大林镇定了下来，开始建立新的管理体制。此时主要的大事发生在前线，但从那里传来的消息却很少。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朱可夫前往西南前线。两天后，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被派到了西部前线。

这种决定未必可以称为是正确的。例如，朱可夫表示出了惊讶，而对此斯大林“有些恼火”地指出：没有总参谋长，“这里也能应付过去”。与领袖去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显然，斯大林需要从自己圈子里的领导者那里得到第一手信息，况且他想起了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经验：当时他就被派到了危险的地区。

6月22日晚，斯大林得到了来自伦敦的意料之外的支持。他从未信任过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广播讲话。丘吉尔在讲话中说：“我们下定决心要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所有烙印。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去这么做，无论什么。我们永远都不会妥协，我们永远都不会与希特勒或是他同伙中的什么人进行谈判。我们将同他在陆上战斗，我们将同他在海里战斗，我们将同他在空中战斗，直至在上帝的帮助下，挽救大地免遭他的阴影，解放人民摆脱他的压迫。任何一个与纳粹主义作斗争的人或是国家，都将获得我们的援助。任何一个与希特勒走在一起的人或是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声明。由此可知，我们将给俄罗斯和俄罗斯



人民提供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援。我们呼吁我们在全球各地区的所有朋友和盟国也奉行这样的方针，并像我们一样坚决一贯地去执行这一方针，直到最后……”(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2 卷，第 171 页)

丘吉尔虽然没有点出罗斯福的名字，但是他让人们明白，他的讲话也代表了美国的态度。

两天之后，罗斯福支持苏联的声明也随之发表。反希特勒同盟开始形成。

而此时，红军看不到有战胜闪击战的迹象之后，就撤退了。

从担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上将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从德国人的角度，事件是如何发展的：

1941 年 6 月 22 日，战争第一天。

可以想象到，由于反应迟缓，俄国指挥人员在近期内完全无法组织对我们进攻的有效反击。俄国人不得不按照在我们进攻开始之前他们的原部署来进行战斗。

我们发动进攻的各师在敌军试图进行反抗的所有地方击退了他们，并在战斗中平均向前推进了 10 至 12 公里！这样一来，机动兵团的通道就被打开了。

1941 年 6 月 23 日，战争第二天。

下列一些事实有助于得出大部分敌军还位于比我们预计更远的后方，且现在在部分军队将撤得更远的结论：我军进攻的第一天在战斗中推进了 20 公里，然而并未抓到大量的俘虏，缴获的敌方火炮的数量也极少，并发现敌军机械化军团在从前线向明斯克方向的后方移动。在靠近南方集团军的战线时，敌军同样从匈牙利边境向东撤走了自己的部队，以使他们摆脱包围。

不过我怀疑，敌军指挥人员手中是否真有统一和有计划的军队行动计划。极有可能，地面部队和空军的局部调动是被迫的，是在我军推进影响下采取的措施，而不是带有某种目的的有组织撤退。迄今为止，好像还谈不上什么有组织的撤退。

1941 年 6 月 24 日，战争第三天。

中午：我军占领了维尔纽斯、考纳斯和凯代尼艾(历史资料：拿破仑同样也是在 6 月 24 日这天占领了维尔纽斯和考纳斯的)。

应当指出，有些俄国兵团在战斗中表现顽强。曾发生过永备火力点的驻防军团不愿投降、被俘而与永备火力点一起引爆身亡的事情。

总之，现在已经清楚，俄国人考虑的不是后退，而是相反，倾其所有，迎面抗击攻入的德国军队。与此同时，敌军最高统帅部似乎完全未参与部队作战的领导工作。敌军这种行为的原因尚不明朗。大规模作战后备队的根本缺乏，完全



剥夺了敌军指挥人员有效影响作战进程的可能性。但是边境地带积累的大量储备说明，俄国人最初是计划在边境区域进行顽强防御的，并为此在这里建立了这些补给基地。

1941年6月25日，战争第四天。

对早晨局势的估计整体上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即俄国人决定在边境地带进行决战，只是在前线的个别地段进行了撤离，在这些地段我军进攻部队的猛攻使他们不得不撤离。

1941年6月29日，战争第八天。

前线传来的消息证实，俄罗斯人在各处都战斗到哪怕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只有一些地方有人投降当了俘虏，首先是那些蒙古族士兵占大多数的部队（靠近前线的第六和第九军）。引人注目的是，在占领炮台等地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投降。部分俄国人一直战斗到死，而另一部分则逃跑了，他们脱掉了军装，试图打扮成农民突出包围。我军在各处的士气都很好，甚至是在那些恶战的地方。但马匹已经疲惫不堪了。（哈尔德 Φ.，《战地日记（1941—1942年）》，莫斯科，2000年）

这是巨幅全景图中的一些片断，其中某些东西已经得到了澄清。俄罗斯人的抵抗并未放松，这与在欧洲的战争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应当谈一谈德国指挥部的计划，以便理解战斗第一阶段的规律。计划由三部分组成：

1. 进攻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在直接进攻中歼灭苏联军队。
2. 进攻基辅，占领包括顿巴斯工业区在内的乌克兰，然后占领高加索的油田。
3. 对前两场战役的补充：芬兰军队向列宁格勒方向发动进攻，罗马尼亚的军队则由上普鲁特地区发动进攻。

苏联军事指挥部认为，德国人的主要攻击将是朝西部方向而来的，斯大林却认为，德国将向乌克兰进攻，他要求基辅军区加强防御。但斯大林只对了一半：乌克兰是德国人两个主要攻击目标中的一个。

德国人在东方战线上一共集结了3个集团军：“北方集团军”（司令是威廉·冯·勒布元帅）、“中央集团军”（司令是费多尔·冯·博克元帅）和“南方集团军”（司令是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

苏联部队的组成如下：北方面军（司令是 M. 波波夫中将）、西北方面军（Φ. 库兹涅佐夫上将）、西方面军（П. 帕夫洛夫大将）、西南方面军（M. 基尔波诺斯上将）和南方面军（И. 秋列涅夫大将）。

按照朱可夫的观点，德军的优势在于其在主攻战场上的兵力要强于我军5至6倍。朱可夫元帅承认：“这种规模的突然进攻，而且是倾巢而出地以预先在重要战略



线部署的一切兵力发动了进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能从总体规模上预计到这场攻击的性质。

“不管是人民委员、我,还是我的前任 B. M. 沙波什尼科夫、K. A. 梅列茨科夫和总参谋部领导成员们都没有想到,敌军集结了这么多的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并在第一天就以强大紧密的集群投入到所有的战略战线,其目的就是要实施毁灭性的切割式打击。”(朱可夫 Г. К.,《回忆与思考》,第 281 页)

正因为这一点,以及工农红军未能完成装备更新,造成了战争初期红军的溃败。按照西方大多数军事专家的观点,苏联可能将在冬季来临前陷落,也就是说,闪击战应该像希特勒计划的那样以德国的速胜而结束。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而是战争持续了整整四年,并以德国的垮台而告终呢?

对此有多种解释。德国军方领导层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元首剥夺了司令员在大的军事指令框架内作出独立决定的军事政策,以及总参谋部与希特勒之间对整个战争的严重分歧。

在德军入侵一个月之后,作战的战略全景图是这样的:

从 7 月中旬开始,在战线中部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冯·博克就认为:趁敌人还没有喘过气来,现在是对莫斯科实施坦克突击的时候了。但冯·勒布却仍然试图攻破列宁格勒,并击退苏军的反攻,而伦德施泰特则陷在了南方。可能是考虑到了新出现的情况,7 月 19 日,希特勒向“中央集团军”下达了第 33 号指令:只用步兵继续向莫斯科进攻。部分德军转向了西北战场,而另一部分则转向了南部战场。莫斯科还不是希特勒的主要目标。7 月 28 日,哈尔德查明,元首的命令导致了兵力的分散,于是向莫斯科推进暂时中止了。

德军不久前在法国战场上取得的经验在新的条件下显得毫无用处。为了不失去主动权,德国人不得不做出巨大的努力。敌人放弃领土,但在后退后旋即发起进攻。苏联的坦克突破了德军的包围,德军在第二战线上坦克师不足的事实使得情况更加复杂起来,而交通工具的不足又导致了步兵不能以必要的速度向前推进。俄国人经常从布下的圈套中逃离。(格尔利茨 B.,《德国总参谋部》,第 328、383 页)

由此可见,未被击溃的苏联军队在德国人采取了向莫斯科突击的新战略的情况下,能够从北部和南部发动强大的侧翼打击。希特勒遵循了完全合理的推测,此外,他记得战争的主要经济目的是得到盛产石油的高加索。

希特勒在 8 月 21 日下达的指令中说:“在发动冬季攻势之前,最重要的不是占领莫斯科,而是占领克里米亚和顿涅茨河畔的采煤工业区,以及不让俄国军队获得来自

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供应。”

对于博克的不同意见，希特勒回答说：“我的将军们一点也不了解战争的经济意义。”他是正确的，因为占领克里米亚能够确保罗马尼亚油田免受驻扎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的空袭，使之可以从海上向“南方集团军”的部队提供燃料，并在高加索沿岸对苏军实施空中打击。除此之外，德国人已经开始感到了燃料的短缺，因为他们对汽油的消耗量预算有失误：在俄罗斯的乡间道路和崎岖不平的地区行驶，卡车、拖拉机和坦克都要消耗比原计划更多的燃料。

在俄罗斯的战斗，要求重新对经济进行审视，而让战争快速结束成为泡影的德国军事经济给希特勒出了难题。

从苏联指挥部的角度来看问题，撤退的部队顽强忘我的防守并转为反攻将使储备物资得以收集和转移，并使众多工厂的设备得以撤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结果，苏联随着每一天、每一周和每个月的激烈战斗慢慢缓过劲来，并恢复了进行持久阵地战的力量，而德国对此却毫无准备。

苏联能在这场战争中从总体上表现得更强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反资产阶级的，做好了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准备。苏联的工厂实行三班倒的作业，而德国只有一班。德国到1939年前共有160万名家仆，战争期间这一数字下降到30万。苏联经济从效率来看要比德国经济强出几倍。尽管苏联四分之三的主要经济中心遭到占领和损失，但在二战期间却超过了被德国占领的欧洲的经济，而这在战前是苏联在自己全境范围内也未能做到的。

现在，当我们总体上了解了二战时期的本质特征之后，让我们再回到德国军队在战争之初获得了胜利的战术上。其坦克军团突破苏军的防御，并切断其交通线，接着由步兵师消灭被包围的部队。起初，苏军没有什么能与之抗衡。苏军的反抗越是顽强，他们背后的包围圈就收得越紧。他们没有权力后退以保存实力和设备。

就像德国著名将军之一赫尔曼·霍特强调的那样：“没有一个指挥官会不利用这种有利的状况。敌军在进行顽强抵抗时，不仅在技术装备方面要承受重大损失并留下俘虏，而且在绝望中试图进行为时已晚的突围时还要失去很多人员。”（霍特 G.，《坦克会战》，莫斯科，2006年，第147页）

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个证明实施包围存在极大风险的重要意见：“……实施包围任务的部队自己有成为包围目标的危险。”

按照哈尔德的观点，1941年夏，在经过14天的进攻后，巴巴罗萨计划的任务已经完成；俄罗斯军队被击溃，只剩下占领工业区了。

如果我们有机会俯视整个战役的全景图，那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大大小小的“锅炉”、坦克、卡车和套在一起的几匹马组成的各个纵队、让车辆爬行的沼泽地和沙



土地、堵住发动机过滤器的尘土、雨水、泥浆、号令混乱和地图错误。Г. 霍特指出：“按照发放的地图很少能够确定哪些道路和桥梁是可以供汽车和坦克通行的。经常需要为部队指路，因为部队不知道哪些道路是可以通行的。”（霍特 Г.，《坦克会战》，第 52 页）

从一开始，德国人就遇到缺少关于苏联及其国体的潜能和稳定程度的准确信息的问题。果戈理所说的俄罗斯“没有道路，只有方向”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但这不能被称之为有用的侦察情报。

此外，在这幅全景图中我们看到，在巨大战线的中部，德军的向前推进能力很强，但在北部和南部则严重滞后，这就对进攻者的侧翼造成了威胁。

7 月 13 日，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施蒙特视察了驻扎在维捷布斯克东北地区、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的第 3 坦克集群参谋部。他获悉，部队人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要比在西方战线作战时低得多。

## 第十六章

# 苏联抵抗的组织

---

苏联抵抗的组织工作、希特勒面临两难的抉择：进攻莫斯科还是基辅、建立战时管理中心——国防委员会、斯大林的讲话重复了谢尔吉都主教的呼吁、铁路运输是决定性因素、希特勒决定消灭莫斯科、保卫基辅是斯大林的战略失误、空袭下的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列宁格勒危机

---

德国军队越是深入苏联的腹地，工农红军的抵抗就越是坚决。

（提前说一下，尽管作战的将军们指责希特勒，认为他的决定让他们失去了夺取莫斯科的机会，但类似的情况还是出现于1945年的2月：在进攻柏林时，敌军在柏林北翼驻扎着强大的波美拉尼亚集团军，而斯大林和朱可夫作出了类似希特勒在1941年作出的决定，先歼灭了波美拉尼亚集团军，然后才攻克柏林。）

7月27日的侦察通报指出，苏联组建了新的军队。其中还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意志还没有被摧毁。尚不清楚是否有对现有制度的反抗事例。”（霍特Г.，《坦克会战》，第149页）

8月4日，希特勒在视察“中央集团军”指挥部时表示：对莫斯科的进攻退居“到列



宁格勒和哈尔科夫之后的第三位”。显然，他认为在冬季攻势之前既可以确保侧翼的进攻，也可以拿下莫斯科。

如果人们把德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一系列与斯大林及其领导层的决策没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因素(如德军抽出了 10 个师前往南斯拉夫作战、中止了对莫斯科的进攻、持续的夏雨、交通堵塞、严寒提前来临)，而没有提及斯大林采取的各种行动，那么战争全景远不是完整的。

从一开始，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袖就寄希望于被派往前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的经验，虽然做得并不是太成功。另外，除了总参谋部和政府，为建立处于监控之下的国防体系，斯大林还拥有国家安全机关。

不过，这个体系不可能在瞬间建成，而是花了大约一个月才组建起来。

最早张罗建立该体系的是莫洛托夫，他从自己担任总理的经验得出，统帅部大本营无权支配经济和国家生活的重要部门。6 月 30 日，他请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立即理解了他的意图：成立一个能够监控所有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国防委员会。

这是一次危险的擅自行动，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他们并未策划阴谋，且一致赞同应该由领袖来领导国防委员会。他们还批准了对伏罗希洛夫的提名，很明显，这是为了给斯大林予以道义上的支持。

随后，这些倡议者来到了斯大林的近郊别墅，这让斯大林有些吃惊，甚至有些恐惧。斯大林没在等候他们，有可能把他们的出现看作是对他免职或逮捕的征兆。的确，当时所有的一切都处在动荡之中。

大家都记得 6 月 29 日德国人占领明斯克之后的沉重场面。那时斯大林和同在克里姆林宫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及米高扬无法通过电话从铁木辛哥那里获得任何消息，于是就一起去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当国家领导人为了得到信息而需要亲自跑一趟的时候，这已经是灾难了。

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迎接他们的是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与西方面军还没有联系上。朱可夫报告说，已派去了通信兵，但并不清楚他们何时可以完成任务。

起初，斯大林克制住了，但后来还是发火了：“这算什么总参谋部，这算什么总参谋长？在战争第一天就慌了神，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谁也代表不了，谁也指挥不了！”

米高扬证实，朱可夫“简直是痛哭起来，跑到了另一个房间”。

这就是朱可夫！可见，神经完全崩断了。

5 到 10 分钟之后，莫洛托夫把已平静下来但“眼睛还湿”的朱可夫劝了回来。大家决定派库利克前往西方面军。

从国防人民委员部出来，斯大林说了一段令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话：“列宁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而我们，他的继承人，却挥霍掉了一切……”（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第 390 页）

这仿佛是在承认失败。

正是在此后的第二天，莫洛托夫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

在去斯大林那里之前，莫洛托夫提醒道：斯大林“最近两天一直非常消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对什么都不主动”。

这些话引起了沃兹涅先斯基的愤怒，他说：“维亚切斯拉夫，你尽管勇往直前，我们跟着你一起走。”

也就是说，斯大林的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此时沃兹涅先斯基的建议得到了支持，那么国家将出现新的领导人。

但实际上，谁也没有打算推翻斯大林。在这种危急时刻推翻领袖无异于自我毁灭。所以，在经历了瞬间的危机之后，斯大林的命运又回到了原位。

这就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出现在“近郊别墅”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不速之客看到了什么？

斯大林坐在小饭厅里，看到来人后把身子缩进椅子上，带着疑问打量了他们一下，然后问道：“你们干什么来了？”

“他的表情很警觉，有点奇怪，他提的问题也很奇怪。要知道，按道理他应该自己召集我们过来。我毫不怀疑，斯大林认为我们是来逮捕他的。”（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第 391 页）

不过，当斯大林听到莫洛托夫关于成立国防委员会和斯大林理应成为该委员会领导的建议之后，他的不安很快就消失了。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大的争论，其实质显示出了力量的对比。斯大林建议在贝利亚提出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加入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贝利亚表示反对，并解释说：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需要留在人民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因为国防委员会是一个位于政府之上的机关。

沃兹涅先斯基明白这一点，他支持斯大林的建议。但贝利亚没有让步。而这时，米高扬同意了贝利亚的意见，并请求任命自己为“拥有与国防委员会委员同样权利的为前线供应食品、武器和燃油的特派全权代表”。

听了米高扬的回答后，斯大林让步了。结果，国防委员会全体委员中绝大部分就是其倡议者。这些倡议者已经达到了自己最主要的目的：建立第二个后备的国家管理框架。（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正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领袖去世后成了他的实际接班人，他们在斯大林健在时就已经在清除自己的竞争对手，首先就是沃兹涅先斯基。）





我们也注意到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 6 月 29 日给“前线附近地区党和苏维埃组织”下达的指令,该指令说得很直白:“一切取决于我们自我组织的能力。”整个国家被宣布为军营。想必,这份指令的倡议者也是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谢尔巴科夫 6 月 28 日起草了该指令的草案,此后斯大林对文字进行了审阅。

(在斯大林的来访者接待登记簿上,从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是空白的。)

米高扬在回忆录中绝非偶然地说道:在国防委员会成立后,斯大林的“状态就完全恢复了过来,再次利用了我们的支持”。这里的关键词是“再次”。这意味着,曾有一段时间,斯大林没有利用这种支持。

7 月 3 日,斯大林完全恢复了自信,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点:他向苏联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

但就在此前的 7 月 1 日,莫洛托夫通过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在战时情况下扩大苏联人民委员权力》的决议。该决议赋予人民委员如下的可能性:在企业和建筑工程之间分配资源、调配工资基金、准许部分取消已批准的方案和预算、“批准正在建设之中的企业及其单独的车间投入生产”。

这样一来,地方领导被赋予了自我组织的法律基础。很快,继伏尔加河沿岸地区之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简直是从轮子开始,安装起了从被占领地区转移过来的工厂设备,并开始在露天生产武器,就是让“正在建设中的企业投入生产”。

7 月 3 日早上 6 点,斯大林走进位于克里姆林宫内人民委员会大楼一个配有特别装置的房间里,并在安上了麦克风的桌前坐下。此时,播音员尤里·列维坦宣布,下面由国防委员会主席发表讲话。斯大林明显有些激动不安,开始了演讲。

斯大林的讲话,大体上是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 6 月 29 日发布的指令为基础的。不过指令只是针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讲话则是面对全体人民的。

“同志们! 公民们! 兄弟姐妹们! 我军和前线的战士们! 对你们发表讲话的是我,我的朋友们!”

在这次简短的讲话中,他忽然触及了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人民群众共性中最深的感情。“兄弟姐妹”,这是对具有东正教信仰的俄罗斯人的称谓。斯大林用这两个词抛弃了党的教条主义,仿佛在说:“俄罗斯人! 我说的是咱们是否还能生存的问题。”

他承认了悲惨的现实:敌人已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部分地区、白俄罗斯的西部和西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实际上情况要糟糕得多)。

斯大林的讲话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德国的王牌师已被打败、德国人想恢复沙皇和地主的权力),但也有着对这场全民族的卫国战争极为明确的阐述(抛掉自满和疏忽、按战时要求进行动员、捍卫每一寸土地、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撤退时采用清野战术、在占领区成立游击队),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斯大林还称英国和美国是这场战争中的盟友，以表明苏联不是孤立的。

他的演讲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听得出，他是如何的激动，喝水时是如何的沉重，大家忽然间感到，这一刻坐在麦克风跟前的这个人与所有民众的想法和感觉是一样的。整个国家松了一口气。有什么办法呢，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我们将誓死卫国。斯大林讲话的主要思想和主要意义正是在这里。

尽管他没有直接请求民众原谅当局的失误，但大多数民众还是根据直觉感到：在这场战争中，除了斯大林之外，没有谁可以来领导，必须跟着斯大林走。卫国战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在斯大林发表讲话之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负责人谢尔吉（斯特拉戈罗茨基）都主教（后来的大牧首）已经在6月22日俄罗斯诸圣节这一天，向全体东正教信徒发出了呼吁：“俄罗斯人民不是第一欠被迫经受这种考验。借上帝之助，这次他也能将法西斯敌对势力化为灰烬。我们的祖先在最恶劣的情况下都没有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的风险和利益，而是自己对祖国和信仰的神圣义务，并最终成了胜利者。我们不能玷污他们光荣的名誉，我们这些东正教徒，与他们的血肉和信仰是相连的……要用武器、全体人民的奋战和每一个人在艰难考验时刻都具有的效忠祖国的共同决心来保卫祖国。”（引自：《教会公报》，莫斯科，2006年，第11期）。谢尔吉都主教唤起了人们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记忆和民族的历史意识。

斯大林也表达了都主教已经表达过的内容，只是形式更加坚定。

第二天，即7月4日，西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和其他一些将军被捕。苏多普拉托夫证实，朱可夫是赞同逮捕帕夫洛夫的。苏联英雄（参加西班牙内战）、“冬季战役”的参与者帕夫洛夫，实际上成了杀一儆百的牺牲品。

7月5日，通过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成立由苏多普拉托夫指挥的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小组的决议，这是组织大规模游击队运动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小组中，在“安东诺夫起义”时遇难的神职人员彼得·科斯莫杰米扬斯基的孙女——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接受了训练。不久后，她在彼得里谢沃村被德国人绞死。

7月10日，敌军开始向斯摩棱斯克和列宁格勒发动进攻。而在斯摩棱斯克后面就是莫斯科。

就在这一天，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统帅部大本营被改组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并任命了各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北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由伏罗希洛夫指挥，西方面军归铁木辛哥，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归布琼尼。大本营的组成保持不变，只有一个例外：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取代了库兹涅佐夫将军。斯大林仍是最高统帅。7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捷尔任斯基特种师师长 И. А. 阿尔捷米耶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这样一来，这个庞大的内地军区就处在了契卡人员的控制之下。



7月16日,军事政委又重新回到军队中。

7月1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第三局(反间谍局)改组为与间谍活动进行斗争的特殊部门管理局(锄奸局),其负责人是B. C. 阿巴库莫夫。

而在7月14日,“喀秋莎”火箭炮在奥尔沙郊区首次得到了使用,25秒钟内发射了320枚火箭。不久,德国士兵就给这种火箭炮起名为“斯大林的奥尔甘炮”。

从这些人事决定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如何对特别权力机关进行充实的。

斯大林的另一个成功的人事决定是任命38岁的И. B. 科瓦廖夫为总参谋部军事交通局局长。据科瓦廖夫回忆,这一任命是7月8日或9日下达的。此前,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历任南乌拉尔铁路局副局长、西部铁路局局长、交通人民委员部军事处处长,1941年5月,被任命为副铁路运输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朱可夫元帅称科瓦廖夫是苏联军事经济最出色的领导人之一。正是科瓦廖夫摆脱了像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和库利克元帅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对前线供给的管理,对铁路工作实施了铁腕控制。科瓦廖夫的部门管理着1.1万条火车行驶路线,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铁路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两股车流在哪里交汇;军队向西运送,后撤的企业则向东。

斯大林马上就明白,科瓦廖夫是一位难得的好手。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同许多其他领导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总是亲自前往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因此也就掌握了分管事务的第一手资料。有一次,他来到刚被轰炸过的斯摩棱斯克,搞明白了德国人的突袭如此有效的原因所在:德国人知道,铁路员工是在18点结束每日统计的,而此时在枢纽站里聚集了许多货车。于是,在他的要求下,货物在18点之前都分散到了各个中间站。敌军继续按原有的进度表进行轰炸,但摧毁不了货物了。

也正是科瓦廖夫使得滞留在路上的卢金将军指挥的第16集团军和科涅夫将军指挥的第19集团军终于被运到了斯摩棱斯克。

1941年11月,在莫斯科郊外刚集结了一些用于反攻的后备部队,便有人向斯大林建议把铁路部队并入步兵部队。科瓦廖夫称这种建议是“失败主义的”建议。他向对他的看法感到惊讶的斯大林阐述了理由:没有铁路部队就完全不可能向西进攻,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修复铁路了。斯大林听取了他的意见。(库马涅夫Г.,《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们如是说》,莫斯科,2005年,第323页)

总之,在德国进攻列宁格勒和斯摩棱斯克之前,苏联的管理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7月初,在北部快速加固了一条从纳尔瓦到卢加、老鲁萨,再到博罗维奇的有着10公里纵深的防线,并在那里成立了卢加行动小组。另一道彼得戈夫-加特契纳-科尔皮诺防线建得更深。还有一道防线位于列宁格勒边缘地带。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瓦图京被任命为西北方面军的参谋长。

7月9日,德国人占领了普斯科夫。斯大林任命伏罗希洛夫前往列宁格勒担任前

线总指挥，寄希望于这位察里津时期的老战友能够稳住局势。

这时，在斯摩棱斯克郊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决定性的会战。在强力向前推进的德军第 2 和第 3 坦克集群的侧翼，驻守着挡住他们前进攻势的红军大部队。此外，德国人遭到了强烈的包括坦克在内的正面阻击。

苏联后备师的数量大大超出了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意料(7 月 23 日，德国情报机关确定有 93 个师)，在 7 月 8 日，德国指挥部认为，俄国人总共只剩下了 40 至 60 个有战斗力的师。

战斗的残酷迫使希特勒做出决定，并于 7 月 4 日在白俄罗斯鲍里索沃市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宣布：要将莫斯科连同其居民一起消灭掉。首都面临灭顶之灾！这一计划与要求消灭被俘的共产党员、政治工作者和犹太人的命令一起，使法西斯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变成了一种恶魔的行径。

斯摩棱斯克郊外的抵抗、没有炮兵和空军掩护的苏军师团的自杀式反攻、Ф. И. 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第 21 集团军的反击，以及其他军队的顽强防守，挡住了德国人的进攻。俄罗斯人的一个永恒的办法——以承受巨大压力、付出巨大牺牲去解决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8 月 12 日，希特勒提醒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位将军，所有行动的下一步，取决于是否能够消灭位于德国部队两翼的俄罗斯人部队，“尤其是‘中央集团军’南翼”的俄国军队。正如我们所知，不久之后，“中央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即向北翼和南翼方向展开，这引起了他们的司令古德里安和霍特的抗议。两位司令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错误。

其实，在德国军方领导层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延误了胜利的”希特勒的这种“一知半解”的决定，是建立在对其他将军信任的基础上的。而且，早在 1940 年 12 月按巴巴罗萨计划进行参谋部推盘演习时，就研究了这一方案：当“中央集团军”的推进速度超过“南方集团军”时，“南方集团军”的司令请求“中央集团军”的司令将部队转向南方。1941 年 7 月，这种情况出现在现实中了。为了保障能够占领莫斯科，希特勒必须拿下基辅。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称“包含了一系列时胜时负残酷战役”的斯摩棱斯克会战，“对苏联指战员，甚至包括最高统帅部”都是“极好的”一课。“挡住敌人主要的，即向莫斯科方向的进攻，对我们来说是重大的战略成就。”(华西列夫斯基 A. M.，《一生的事业》，莫斯科，2002 年，第 122 页)

苏军以斯摩棱斯克失守和第 20、第 16 两个集团军被部分包围的代价赢得了时间。尽管德国坦克集群的推进速度很快，但由于苏联的体制每一昼夜做出的成绩都比德国的要多，这样，苏联就越变越强，而德国则越来越弱。与此同时，至 1941 年 7 月中旬，德军已损失了 44.1 万余人员、半数坦克和约 1300 架飞机。(华西列夫斯基



A. M., 《一生的事业》, 莫斯科, 2002 年, 第 122 页)

当然, 苏军的损失更大: 至 7 月初, 在西方战线地带, 44 个师中有 24 个师全军覆没, 剩余师、团的人员损失也在 30% 至 90% 之间。总体损失如下: 41.8 万人、4799 辆坦克、1777 架飞机、9427 门大炮和火箭炮。此外, 还被德国人截获了 1766 车皮弹药、1.75 万吨燃油等。(《1941 年至 1945 年的伟大卫国战争: 军事历史特写》, 第 1 册, 第 136 页)

但不管如何, 德国人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战略成就。霍特将军承认: 当时“第 3 坦克集群被迫在原地踏步, 无法向莫斯科方向推进, 而第 2 坦克集群则在从斯摩棱斯克直至莫吉廖夫的东南一线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积极的军事行动。俄罗斯人对在叶利尼亚地区的先遣部队的紧逼在继续……这样, 至 7 月 30 日, 与步兵师混合在一起的第 2 坦克集群的主要兵力与敌军的优势兵力进行了战斗……为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来而采取的行动把所有的大部队引向了南方, 而这又给今后事态的恶化埋下了祸根。”(霍特 T., 《坦克会战》, 第 136 页)

换言之, 苏军从南翼紧紧地咬住了“中央集团军”, 并击溃他们, 延缓了他们对莫斯科的进攻。

同时, 苏军在列宁格勒方向上也掌握了主动权。3 个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师(即民兵)与德国人的第 41 坦克军在卢加进行了惨烈的战斗, 把敌军对列宁格勒的进攻拖延了近四周。德国的第 41 坦克军只好撤退, 差一点被全部歼灭。随后, 第 56 军也撤退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的情况。西南方面军的部队撤退了, 但保存了战斗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与 1915 年的情形极为相似。那时, 鲁登道夫将军企图包围和摧毁俄国军队, 但俄国军队撤退了, 使德国人的攻势落了空, 结果保持了战略平衡。

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用刚刚重组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来阻止“中央集团军”对西南方面军北翼的进攻。

此前, 8 月 2 日, 德军在乌曼地区包围了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8 月 4 日, 斯大林在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 M. П. 基尔波诺斯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电话交谈时提醒道: 绝不能让德国军队越过第聂伯河左岸。斯大林要求从赫尔松-卡霍夫卡-克里沃罗格-克列缅丘格一线直到包括第聂伯河右岸基辅在内的第聂伯河北岸设立防线。

与此同时, 南方战线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8 月 4 日, 德国人占领了基洛沃格勒。斯大林允许撤军, 但不能撤到距离他制定的防线以西 100 至 150 公里之内。

8 月 8 日, 德国的第 2 集团军和第 2 坦克集群开始转为进攻在布良斯克、戈梅利

和切尔尼戈夫战场上的苏军。

8月14日,成立了由A. И. 叶廖缅科中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在与叶廖缅科会面时,斯大林当着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面提出了警告:德国人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多半是对准莫斯科的,他们将用两翼的坦克集群经加里宁市(特维尔市)向北部方向发动攻击;而在南部方向上,则是经过布良斯克和奥廖尔。因此,斯大林接着说,敌军在布良斯克战场上(我们的方面军也在那里铺开)集结了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坦克集群,该坦克集群转向南方同样也是有可能的,但可能性较小。因此,为了固守布良斯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古德里安的主要兵力。(斯大林掌握着苏联驻瑞士间谍山多尔·拉多发来的情报:德军计划经布良斯克向莫斯科发动进攻。而当时实际上希特勒和古德里安已改变了计划,转向了南方,计划经过乌克兰进攻莫斯科。)

作为回应,叶廖缅科很有信心地宣称:“当然会在近日歼灭古德里安这个卑鄙的家伙。”斯大林很满意。叶廖缅科善于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总体上,这位将军非常自信,对待属下粗鲁,有动手打人的毛病。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他殴打了前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现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加片科,而且还到处炫耀说,他经斯大林同意殴打了几位指挥员,其中一人还被打破了头。(戈里科夫, Ю.,《克里姆林宫·大本营·总参谋部》,特维尔,1995年,第105页)

不过,卡冈诺维奇同样也会在火头上给下属一记耳光。但这不算什么,这被认为是领导人在努力做事。

然而叶廖缅科的剽悍没能帮上他的忙,“古德里安这个卑鄙的家伙”比他更强。

8月16日,布良斯克方面军投入到了艰难的防御战中。情况变得明显了,西南方面军右翼的威胁在增加。沙波什尼科夫(他在7月29日被再次任命为总参谋长)建议将方面军的右翼部队撤到第聂伯河的后面。斯大林没有同意。

8月19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告,开始向其施加压力。报告中指出:敌人暂时放弃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转为计划歼灭西南方面军。

大本营回复朱可夫说:布良斯克方面军应该粉碎敌军的意图。斯大林要求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给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司令们下达坚守基辅的命令,但把受到包围威胁的第5集团军撤到第聂伯河后面。

总参谋部和斯大林的矛盾是明显的。叶廖缅科的部队英勇地进行自卫反击。这样一直持续到了9月7日,西南方面军的储备耗尽了。德国人从侧翼向西插进了以基辅为中心的被拉长的弧线中,在两个方向上取得了进展。

9月7日晚,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去了斯大林那里,并想努力使斯大林相信危急时刻已经降临了:需要立即将所有部队撤到第聂伯河后面,否则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实质上,他们是在重复前不久朱可夫已提出过的建议。



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在被告知放弃基辅的必要性时，斯大林发起火来，有那么一瞬间甚至失去了自制力。”（华西列夫斯基，A.，《一生的事业》，第133页）

在苏联的战争影片中，斯大林常常被塑造成一个平和、自信的领袖，但实际上，他有着完全不同的一面。当他勃然大怒时，表现得很可怕。所有人都害怕他发怒。

伊万·科瓦廖夫说过：在坦克发动机未通过测试之后，斯大林打电话给坦克制造人民委员B. A. 马雷舍夫，并对着听筒训斥道：“你这个万恶的家伙，祖国的叛徒！”通完电话之后，马雷舍夫就因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

华西列夫斯基简直是咬牙切齿地承认：他“比任何人”都受够了斯大林，“有时候，他对待我和对待别人极其粗暴，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粗暴，且毫无公道可言”。（《A. M. 华西列夫斯基与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对话》，见西蒙诺夫K.，《我这一代人的见证》，莫斯科，1988年，第85页）

海军元帅И. С. 伊萨科夫证实：“斯大林发怒时是可怕的，准确地说，是危险的。”伊萨科夫举了一个说明斯大林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态度的非常重要的证据：“他总是抱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而这种成见在军事上是所有事情中最可怕的。当总指挥，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对敌人将如何行动、事态将如何发展具有难于改变的成见时，这是最可怕的。这是发生最大灾难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И. С. 伊萨科夫与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对话》，同上，第76页）

不过，伊萨科夫进一步说道：通常斯大林还是比较克制的，会把惩办有罪者的决定推迟到第二天，好让自己平静之后再作出决定。

“受够了”领袖的华西列夫斯基也说：“他不是一个军人，但他拥有天才的智慧。他善于洞察事情的本质，以作出军事决策。”（同上，第83页）

结果就是：从一方面讲，他自我感觉极好；从另一方面讲，他也极具才能。

这也与基辅的灾难具有直接关系。他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尼古拉二世的将军们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作为军人的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都预见到了这场灾难，而斯大林却固执己见，结果失败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能看到其才智的闪耀，正相反，看到的是他的严重失误。

可为什么我们只从军事的角度去衡量他的决断呢？谁说过战争只是军事行动？何况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军人，而是一位高于军人的人。他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情况。

例如，与盟友（昨天的帝国主义敌人）的关系。他希望获得他们的帮助，同时也向哈里·霍普金斯承诺：将在列宁格勒西南、斯摩棱斯克以东和基辅以西的一线上牵制住德国人。而基辅的失守，说明他没有能够控制住局势，他不知道如何对此作出交代。对方会想，怎么能够信任和帮助这样的人呢？

再者，他还应该考虑到红军的全面撤退即使不是灾难，也将以付出重大损失为代价。



所以，他才一直拖着。

失去基辅意味着什么？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比一个普通的大城市的失守，损失要严重得多。基辅没有守住，那么莫斯科已经不再是莫斯科了。而这时在列宁格勒，大幕已经落下。

7月8日，斯大林接见了英国大使克里普斯，建议在英苏共同声明中只列出两点：互相援助和双方承诺不单独媾和。

7月10日，丘吉尔致函斯大林，表示同意该共同声明的内容。

就在当天，丘吉尔致函海军部长和海军参谋长：“如果俄国人能够挺住并继续作战到哪怕只是冬季来临之前，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优势……当俄国人继续作战的时候，战线在哪里展开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些人证明了，他们值得获得支持，而我们应该作出牺牲和冒险，哪怕这将给我们带来不便。我完全明白，这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士气……”（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176页）

正如我们所见，丘吉尔对苏联是否能够长期抵抗深感怀疑。但此时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黎明的曙光来到了：已经清楚了，日本瞄准的目标不是苏联，而是荷兰的殖民地。7月底，日军占领了印度支那，对在马来西亚的英国人、在菲律宾的美国人和在荷属印度的荷兰人造成了威胁。于是，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冻结了日本在它们国家的所有存款。日本无暇侵犯苏联的可能性在快速增加。

除此之外，罗斯福的使节哈里·霍普金斯来到了莫斯科，他研究了局势，并承诺将给予援助。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在一起时表现得很有信心，并请美国向苏联提供有色金属和飞机用的高辛烷值汽油。这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人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而斯大林还在展望前景。

晚上，斯大林用自己的专车把霍普金斯从位于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带到了设有总参谋部备用办公室的“基辅”地铁站。这时，德国空军已经开始了空袭。

陪同斯大林的伊万·科瓦廖夫回忆说：在院子里迎接他们的是紧张不安的贝利亚，他抓住斯大林的手臂，并且建议赶快进入也设有最高统帅办公室的地铁站。斯大林制止了他，说道：“让开，胆小鬼！”

尽管贝利亚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应受指责的地方，因为这次空袭是很猛烈的，但斯大林还是当着外国代表的面轻率地羞辱了自己团队的成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下面这个场景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斯大林站在被夜色笼罩的院子中间，仰望着黑色夜空中被探照灯照射到的一架德国飞机。И. 霍普金斯站在他旁边，也在观看。这时出现了一幕在夜间空袭时不常发生的情场。德国‘容克’战机开始摇摇欲坠，也就是说被击中了。而且很快，高射炮击中了第二架敌机。此时，斯大林开口了，翻译向霍普金斯转述了斯大林的话：‘每一个带剑而来者都将是这个下场。而谁带着真诚而来，就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斯大林



拉起美国人的手臂，下了地铁。‘我们做好了回击和反攻的准备，而且我们还要把 30 多万名官兵运往前线。’”(库马涅夫 T.，《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们如是说》，第 328 页)

斯大林明显是想拖着这位美国人，好让他与自己一起体会一下战斗的感受，贝利亚差点坏了事，但结果却很棒。很快，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说：苏联能顶住，应该尽快向俄罗斯运送军用材料和武器。

8 月 9 日到 12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阿金夏湾(纽芬兰的一个岛屿)会了面，讨论了进行战争的原则，还讨论了对苏联实施援助的问题。可以说，在这里，罗斯福赢得了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主要的战斗——他迫使丘吉尔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其中有一条就是所有国家享有“进行贸易和进入世界原料产地”的平等权利。这一条表明，英国承认自己今后已经无力与美国人的全球战略相抗衡了。

罗斯福在小圈子内曾讥讽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丘吉尔还是老一套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还认为战争应该以大英帝国的扩张而结束。而罗斯福本人关心的仅是击溃德国和确保美国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上的优势地位。

但对于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斯大林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伙伴，他在欧洲战场上拥有强大的陆军。

这是发生在乌克兰悲剧性战役之前的事情。

7 月 29 日，也就是在霍普金斯飞抵莫斯科的前一天，朱可夫又一次与斯大林发生了冲撞。总参谋长报告说：从形势判断，德国人在中央地段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已不具备保障两翼的大规模战略储备。朱可夫说：敌军可能调转“中央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来攻打我们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即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他提出了斯大林无法接受的方案：把军队撤到第聂伯河之后，放弃基辅，但同时向西突击，消灭叶利尼亚的先头部队。

对于交出基辅这一点，斯大林连听都不愿意听，并把进行反突击的建议斥之为“胡说八道”。

朱可夫请求斯大林不要以这种口气与自己说话，并表示：如果“总参谋长只会胡言乱语”，那么自己在这里就无事可做了，请求把自己派到前线去。

与斯大林这样说话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朱可夫可不是帕夫洛夫。但朱可夫不可能不记得，斯大林把战争灾难性开端的罪责都推到了将军们身上(从 1941 年 7 月到 1942 年 3 月，共枪毙了 30 名将军)。斯大林远没有深入了解局势，凭着所掌握的情报机关的各种报告，便认为自己是最内行的领导人，在军事上也是如此。而实际上，远非如此。

如果把朱可夫采取的所有独立甚至擅自的行动加在一起：在哈勒欣河战役时拒绝服从施特恩和库利克的命令、在比萨拉比亚战役时把两个坦克旅开进了罗马尼亚

人占领区、力主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前展开动员工作和完成军队部署,以及他捍卫个人立场的不屈不挠,所有这一切就已经足够向斯大林表明他这个人是怎样的性格。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两人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但奇怪的是,斯大林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可以说,斯大林开始了缓慢且痛苦的重新学习。

对于朱可夫要辞去总参谋长一职的请求,斯大林先是请朱可夫不要使性子,但后来还是有些隐隐发怒。

保留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委员职务的朱可夫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员。但这不能认为是废黜。

需要强调一点,虽然斯大林起初强烈反对朱可夫关于进攻叶利尼亚先头部队的主张,但随后他还是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9 月 8 日,叶利尼亚被攻下。

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未必能够减轻乌克兰战场上沉重的苦难。在那里,事情已经发展到了 9 月 10 日大本营把自己最后的后备力量、由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 2 骑兵军从南方战线调往布良斯克战线的地步。听到这一消息,南部战场的总指挥布琼尼试图说服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这样做会让南方面军大大削弱,进而让德国人挣脱出去,并获得作战空间。但布琼尼只有服从的份儿。

与此同时,基尔波诺斯和赫鲁晓夫却在劝说斯大林不要放弃基辅。但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不大。

这时候在西北前线的危机已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在这里,敌军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占领了施吕瑟尔堡。

起初,斯大林派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去列宁格勒,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库兹涅佐夫将军和总炮兵局局长 H. H. 沃罗诺夫、柯西金和日加列夫(空军总司令)。当时局势已经非常困难了。后来,莫洛托夫还回忆过他们是如何到达目的地的:首先是乘飞机到了沃洛格达州的切列波韦茨市,又乘火车来到姆加火车站,最后乘检道车才到达列宁格勒。为何乘检道车呢?因为铁路线已经被切断了。莫洛托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火车不能通行,而检道车则能过去。显然,检道车是沿着森林和沼泽中的某段窄轨才通过的。(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 54 页)

关于列宁格勒当时的情况,从 Г. М. 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马林科夫的日记中可见一斑。“К. Е. 伏罗希洛夫(当时他只平庸地指挥着前线)从列宁格勒发来了一份令人惊慌的信:城市守不住了,不得不放弃……父亲说,他意外遇上了当时领导着列宁格勒党组织的 А. А. 日丹诺夫,在一个华丽的掩体里见到了这位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喝得醉醺醺的人。父亲给了日丹诺夫 3 个小时,让他回过神来,并把他带到由父亲提议在基洛夫工厂召集的一个群众集会上。父亲在列宁格勒停留的那几天里,做了很多加强城市防御方面的事情。列宁格勒的防御由于伏罗希洛夫的过错而处于完全瘫痪之中。”(马林科夫 А.,《我的父亲格奥尔吉·马林科夫》,莫斯科,1992 年,第



44 页)

莫洛托夫证实,日丹诺夫“当时极为惊慌失措”。

马林科夫请求斯大林把朱可夫派到列宁格勒去,并撤掉伏罗希洛夫。

斯大林把朱可夫从赢得胜利的叶利尼亚召了回来,派他带着一封他写给伏罗希洛夫要求其交出前线指挥权的亲笔信,去了列宁格勒。但并未下达委任令,因为斯大林担心,德国人可能会击落朱可夫所乘的飞机。直到查实朱可夫顺利到达之后,斯大林才签署了相应的命令。

莫洛托夫说:伏罗希洛夫“未能胜任”,“总是在战壕中踱步”。也就是说,他的指挥方法和在国内战争时一样。而且,这位前国防人民委员犯了好几个遭到斯大林痛斥的严重错误。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批准了在工人营队中选举指挥员。斯大林在与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直线通话时强调:“立即取消在营队中进行选举的方式,因为这有可能毁掉整个军队。当选的指挥员没有权威,因为在对选举人施压的情况下,指挥员将在瞬间被改选掉。众所周知,我们需要的是有充分权力的指挥员。如果在工人营队中实行选举制,这将像传染病一样立刻殃及全军。”(斯大林 И. В., 《斯大林全集》,第 18 卷,第 243 页)

毫无疑问,斯大林想起了 1917 年俄国军队中那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并且认为,前线的失利可能导致选举的混乱。但斯大林夸大了这种危险性。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对这种“选举制”吹毛求疵,因为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战友明显选败了,他在发泄自己的气愤。

9 月 12 日,为了“消灭恐慌和逃跑的造势者”,大本营下达了关于成立拦阻队(每个师中不多于一个营的兵力和几辆坦克)的指令。这一命令对已存在的第 270 号命令(1941 年 8 月 16 日下达)有什么补充呢? 补充的内容是:所有投降的被俘者均将视为是“故意的逃兵”,他们的家属将遭到逮捕,也就是成为人质。

9 月 21 日,斯大林口授了一份电报给 Г. К. 朱可夫、А. А. 日丹诺夫、А. А. 库兹涅佐夫和 В. Н. 梅尔库洛夫。该电报最大限度地揭示出了那个阶段的残酷性,以及斯大林血战到底的决心。下面我们就引用一下该文件的全文。

“据说,德国鬼子在向列宁格勒前进时,让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以及他们占领区的代表们走在自己军队的前面,让这些人请求布尔什维克放弃列宁格勒并媾和。据说,在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中确实有一些人认为对这些代表使用武器是不可以的。我认为,如果在布尔什维克中有这样的人,那么首先就必须消灭他们,因为他们比德国法西斯还要危险。我的建议是:不要心慈手软,要痛击敌人及其帮凶,不管这些帮凶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战争是残酷的,它将首先击溃那些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如果在我们的队伍中有谁摇摆不定,那么他就是列宁格勒失守的主要罪人。请竭尽全力痛击德国人和他们的代表,不管他们是谁;请消灭敌人,不管他们是自愿还

是被迫成为敌人的。不要对德国鬼子及其代表手下留情,不管他们是谁。我提请将该指示传达给所有师团的指挥员和政委,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军事委员会和各舰艇的指挥员和政委。И. 斯大林”(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8 卷,第 263 页)

没有半句怜悯的话!这份文件出自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之手。只不过,那些具有独特思维的伟大政治家,常常看似如同普通人。因此在战争结束和斯大林去世后,一些被我们的牺牲所吓呆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比如前线战士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认为,最好是把列宁格勒给德国人,以保存众多的生命。但怎么能交出一个注定将被德国人连同其所有居民一起毁灭掉的城市呢?必须保卫住它才行。的确,在这里,斯大林也是有一个底线的,他在危急时刻告知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部:如果守不住列宁格勒,那么军队还是要保住的。

但斯大林这封残酷电文的落款日期是 9 月 21 日。这就是说,我们过于超前了。

## 第十七章

# 莫洛托夫威胁要枪毙朱可夫

莫洛托夫威胁要枪毙朱可夫、斯大林集团不得不分享权力、组织机制：动员和爱国主义、在前线的高层领导的孩子们

朱可夫守住了莫斯科，也夺回了叶利尼亚的突出部。但是不管斯大林如何固执己见，乌克兰的战事却很快有了结果：9月16日，从南北两侧分头挺进的德国坦克部队在洛赫维察合成了包围圈。而到了9月17日晚上，斯大林才允许基尔波诺斯撤退。

此次会战损失惨重：两个军团被围困在乌曼地区，另有五个军团被困在了基辅以东地区。只有少数部队得以突围。南方面军司令员 И. В. 秋列涅夫受伤，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因重伤不治而亡。红军确实不太擅长撤退：连应对这种情况的行动计划都没有，更别提后备部队了。9月19日，德国人占领基辅。

共有 66.5 万人被俘（这是德方的统计数据，其中包括了普通居民），他们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在 1941 年被俘的 340 万苏联士兵中，到 1942 年 1 月底幸存的只有 140 万人。斯米尔诺夫 B. П.,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莫斯科，2005 年，第 141 页）

在击败了基辅的苏军之后，不出所料，德军继续向莫斯科发动了进攻。

8月25日，苏军和英军进入了伊朗，此举是为了防止德国人占领当地的油田，确保沿里海至阿斯特拉罕的军用物资运输走廊的安全。

丘吉尔曾许诺过要给斯大林提供 200 架“战斧”歼击机，不过它们至今尚未运到。

苏联大使迈斯基就此事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抱怨说：英国与其说是“在与希特勒德国进行殊死斗争中的盟友和同志，倒不如说是同情我们的看客”。

8月30日，斯大林给迈斯基写了信。斯大林作了这样的记录：苏联要面对敌人300多个师，其中20个师由芬兰人组成，22个师由罗马尼亚人组成，而德国人又从西线调来了30个师。然后，斯大林反复推敲，经过对自己主要意图的深思熟虑，最终写了实话：“在我们两人之间，我应该坦白告诉您，如果英国人在未来3至4周内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那么我和我的盟友们就有可能要输掉了。这很令人沮丧，但这有可能成为事实。”（斯大林 И. В.，《斯大林全集》，第18卷，第248页）

也就是说，他在9月初就已经预见到了危机。

正如哈尔德所写：10月1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转而向东北方向发动了进攻；10月2日整个“中央集团军”转入了进攻；10月3日奥廖尔沦陷。德国坦克驶进奥廖尔市的时候，有轨电车还如常行驶着。

此时，目标直指莫斯科的“台风”战役开始了。包括14个坦克师和8支摩托化部队（这占到了德国人在东方战线所有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总数的64%）在内的“中央集团军”的2个坦克兵团和3个步兵兵团奉命突破苏军的防线，并从南、北两面包围莫斯科。

而苏联抵抗德军的是总兵力只有其三分之二的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

10月初，苏军有2个军被围困于布良斯克地区，另有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5个军在维亚济马地区遭到了包围。这共有64个师和11个坦克旅的兵力，超过60万的苏军官兵陷于包围之中。

大本营还未从基辅会战的惨败中回过神来，又一次遭受了这样重重的一击。

华西列夫斯基把这次溃败的原因解释为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没有能正确判断出敌人的主攻方向。德国人其实距莫斯科仅一步之遥了，而斯大林手中却没有任何后备部队可以调用。朱可夫后来回忆说：至10月7日晚，“所有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实际上都是畅通的”。

古德里安注意到了一个重要情况：“10月6日夜里下了第一场雪。雪很快就化了，道路变得一片泥泞，我们的坦克在路上只能像乌龟一样爬行，而且很快机械化装备就受到磨损。我们再次请求运来冬季制服，但给我们的回复是：制服会按时拿到，提醒是多余的。此后我不止一次地提醒送来冬季制服的必要性，但这一年，冬季制服最终还是没有运来。”（古德里安 Г.，《士兵回忆录》，斯摩棱斯克，2003年，第316页）他接着补充道：第48坦克兵团的全体指战员“沿着泥泞的道路向德米特里耶夫-利戈夫斯基徒步前行”。

关于这一点，朱可夫在回忆录里指出：此前“断送了自己军队”的拿破仑就曾以俄





国的气候为托辞。“我可以对那些企图用恶劣气候来掩盖德军兵败莫斯科的真正原因的人再补充一点,1941年10月的道路泥泞现象相对来说是较短的。11月最初几天就变冷了,下了雪,地上和道路到处都可以通行。在希特勒军队发起‘总攻’的11月份,气温在零下7到10度左右。众所周知,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是不会有泥泞的。”(朱可夫 Г. К.,《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32页)

当然,古德里安和朱可夫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时节,一个说的是10月的天气,而另一个说的是11月的。不过俄罗斯气候怎么样,德国人其实事先就是知道的。

除了道路泥泞、交通闭塞之外,德军的进攻还因为必须要与围上来的苏军作战而屡屡受阻。苏联军队在作战时的英雄气概成了挫败德国“闪击战”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尽管乍听起来是多么难以置信,但正是从苏军这些大大小小的溃败中,慢慢决定了德军覆灭的命运。

到了该直面现实的时候了。

国防委员会决定严守莫斯科,主要防线应该沿着莫扎伊斯克一线展开。是谁的失误又导致了这次新的不幸呢?要知道在乌克兰失守之后,很明显,下一个目标就是莫斯科。大本营命令各方面军转为坚守,不得在徒劳的小规模的进攻战上消耗兵力。但很快,还是继续倾向于进攻战略的斯大林,便下令在各个部队所在的区域进行局部的进攻以改善作战的态势。结果到10月初,苏军既没做好进攻的准备,也没做好防御的准备。

另外,此时尚未搞清敌人将从哪一方向发动主攻。斯大林认为,主攻很可能是在斯摩棱斯克-维亚泽姆方向,而实际上当时正如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所知道的那样,德国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第30军和第19军的战区,我方的兵力却没有集中在那里。

此外,正如 M. A. 加列耶夫大将所准确指出的:所有的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布琼尼、叶廖缅科)“重复了战争初期犯过的错误,当时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截住敌军,把所有的预备队兵团都投向正面迎击敌军,以此增加第一梯队的兵力,或给敌人以回击,却没有考虑在纵深地带建立新的防线。而对各部队的调动,特别是对那些未受到敌军攻击地区部队的调动,同样也是犹豫不决”。(加列耶夫 M. A.,《朱可夫元帅:伟大而独特的统帅艺术》,莫斯科,1996年,第71页)

我们要指出,在列宁格勒前线,朱可夫把部队从芬兰人未发起进攻的卡累利阿战场调到了十分紧张的卢加战场。

10月5日,斯大林要求朱可夫返回莫斯科。而朱可夫在第二天晚上才回到了莫斯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表露出斯大林的自我评价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已不是不久前把朱可夫赶出总参谋部时的那个无所不知的领袖了。朱可夫元帅回忆道:“斯大林感冒了,面色不好,见我时很是冷淡。”

想必,冷淡的问题不在于感冒。只要他愿意,斯大林是能表现得非常亲和的。如今,在基辅失守之后,他们又见面了,而失守的危险是朱可夫曾警告过的,所以,斯大林自然会感觉到自己的过失。一般说来,伟人们都不喜欢领别人的情,或是不喜欢承认自己的失误。但事实上失误已经不少了。

不过,最高统帅只字未提关于基辅的事件,只是讲述了当下的局势:“我无法从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事实真相的详尽报告。而当我们不了解敌人将在哪里和以怎样的部署来发动进攻,也不了解我军处于一个什么状况时,就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朱可夫 Г. К.,《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8页)

斯大林去世后,朱可夫回忆起一次与最高统帅的通话:“在与我通话时,斯大林情绪激动、异常愤怒。他用最严厉的措辞大骂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但对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布琼尼则只字未提。看来,斯大林认为跟布琼尼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西蒙诺夫 К.,《历史的重水》,莫斯科,2005年,第122页)

斯大林派朱可夫去“详细地了解清楚情况”,并嘱咐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他。

这是多么有趣的一幕呀!斯大林把一个远离莫斯科方面军的司令员召回来,竟是要其前往首都附近,并了解清楚他自己鼻子底下发生了什么。这可不比莫洛托夫的检道车来得快。看来,斯大林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似乎他在朱可夫身上看到了最后的希望。而且,正是在10月6日晚,在维亚济马以西的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部队陷入了包围圈之时。

临别时,斯大林向朱可夫询问:原先从列宁格勒战场撤出的德国坦克和摩托化师团将开往何处?

事实上,斯大林是知道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的。

朱可夫回答说:是朝莫斯科的方向。

斯大林表示同意:是的,他们在那里已经行动起来了。

不过斯大林的这个问题有其潜台词。第一,最高统帅言下之意是:“您看,我多么重视您的意见。忘掉过去的分歧吧。我非常需要您的专业评估。”第二,他是让对方感觉到:“对,您是正确的。局势正是如此。”

换言之,这两位卫国战争主要英雄的相互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并且,斯大林也并不认为自己作了很大的退让。

很有可能,与朱可夫交谈的时候,斯大林脑海中浮现出不久前与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交谈的场景。当时领袖未批准拉成了一条线的方面军部队调转方向及时撤离到莫扎伊斯克防线。根据科涅夫的回忆:没过多久“局势变得极其艰难,几乎是毁灭性的”,而此时斯大林给科涅夫打电话说:“斯大林同志不是背叛者,斯大林同志也不是变节者,斯大林同志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所有的错误在于他太信任骑兵了,斯大林



同志将采取一切措施来改善现有状况。”(科涅夫 И. С.,《方面军司令员笔记》,莫斯科,2003年,第599页)

尽管科涅夫说,他当时觉察到领袖失去了“开始时的那种强势”,但事情也许远非如此简单: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评价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他无需在科涅夫面前证明自己是无罪的。在他所处的那个高位上,裁判员只能是他自己或是老天爷。也就是说,他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背叛者吗,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这瞬间的反省简直就等于是挽救了科涅夫的生命,这并非偶然。(想必,同样并非偶然的是:9月11日,按照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奥廖尔监狱枪毙了170名政治犯,其中包括赫里斯季安·拉柯夫斯基和玛丽娅·斯皮里多诺娃——因为他们进行了失败主义的宣传,并且准备逃跑以继续自己的政治斗争。这样,最后一批指责国家走错了方向的反对者也被清除了。)

10月8日凌晨2点30分,到达西方面军司令部的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说,所有通往莫斯科的道路都是畅通的,并建议尽快把部队调集到莫扎伊斯克防线来。

10月10日,朱可夫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员。但事实上,这时他手上能够调动的只有科涅夫的司令部和2个预备团及布琼尼的司令部和9万名士兵。

这里,朱可夫又一次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这次是因为科涅夫。国防委员会派了一个委员会(莫洛托夫、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到西方面军司令部来,而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定好调子,要将现状归罪于科涅夫,并将他召回莫斯科“追债”。很明显,这个问题是经斯大林同意的。

但朱可夫没有交出科涅夫。他告诉斯大林:应该把离得很远的加里宁战线交给科涅夫来指挥。

斯大林问:“您为什么要保护科涅夫?”朱可夫答道:“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我是在白俄罗斯军区任职时才认识他的,并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份职责。而且,现在我这里也没有其他人选。”

令人吃惊的是,当斯大林说将把科涅夫送上军事法庭时,朱可夫提醒斯大林说,这样的做法将毫无结果(“不是已经枪毙了帕夫洛夫,又怎么样了呢?”)。朱可夫大胆地展开了这一话题:“我们早就深知帕夫洛夫是一个怎样的人,知道他最多可以当一个师长。但是他指挥了一个方面军,他自然不能胜任他无法胜任的事情。”(西蒙诺夫 К.,《历史的重水》,第123页)

朱可夫的话里明显暗示了对高级军官进行大规模镇压是不公平的,帕夫洛夫的上升正是这种镇压的产物。而斯大林忍住了(这一时期,斯大林不得不改正了他能够改正的一切:先前被捕的梅列茨科夫、罗科索夫斯基和戈尔巴托夫几位将军均被释放)。

科涅夫成了朱可夫的副手,并未步帕夫洛夫的后尘。

部队开始了集结,但招募到的并不太多:到10月中旬,主要扼守在通往首都防线上的4个集团军(第16、5、43、49集团军)只有9万人。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调来的3个步兵师和2个坦克师尚未到达。

就在朱可夫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员的第3天,莫洛托夫给朱可夫打来电话,要求朱可夫报告自己已经做了什么,并威胁如果丢掉莫斯科就枪毙他。看来,莫洛托夫已经束手无策了。

朱可夫的回答表明,这个威胁对他并不起什么作用。朱可夫说:两天时间还来不及完全了解清楚各项事务,如果莫洛托夫能够更快更好地搞清楚情况,那就让他来指挥。

这不仅是西方面军司令员对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一个回答,也是军人对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党的领导层的回答。这才是关键所在。

莫洛托夫一定把这前所未有的事件报告给了最高统帅。那又如何?斯大林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经历了历次清洗的以朱可夫为代表的军方领导理应得到作战的自主权,否则就将与整个体制一起灭亡。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其他领域的领导人获得了一些自主权。这一方面使国家更加稳固,另一方面则削弱了斯大林集团的垄断地位(战后,斯大林怎么也无法使他的集团和派系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地位,而军事工业群体和原料部门之间的争斗则把苏联拖入了毁灭性的危机之中)。

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冲突并没有政治因素,这是体制内矛盾和性格冲突的结果。

“斯大林以及在其他各个时期过于自信地投入到军事问题决策中的政治活动家(如K. E. 伏罗希洛夫和Д. Ф. 乌斯季诺夫)的不幸在于,他们不了解军队、不曾有过管理军队的经验,完全不知道在现实中、在做出了决策之后应该如何采取行动,也由此造成了他们在军事上的不胜任并时常给部队下达错误的指令。斯大林觉得,只要他一开口,军队马上就能整装待发、打退敌人,而在战争开始阶段或是战争进行中,只要一个电话就能让军队转入进攻或者实施反攻。他不明白,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多数情况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朱可夫与斯大林产生了冲突。”(加列耶夫M. A.，《朱可夫元帅:伟大而独特的统帅艺术》，第221页)

如果深究下去,这是不同辈的人们和不同时期的一种相撞,而这也正是历史的主要矛盾所在。

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曾好奇地问:为什么尽管政治领导人犯了那么多错误,苏联还是赢得了战争?Г. М. 马林科夫对此给出的回答很简单:“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军人。”想必,在这句话中折射出了“政治局和军队”、“斯大林和朱可夫”之间的冲突。



需要强调一点：在“希特勒与军人和将军”的冲突中，后者曾决定进行谋反，而在苏联，这种冲突却被斯大林化解了。斯大林了解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其他一些杰出将领的专业优势，与他们分享了战争的指挥权（但是同时也不能忘记 30 年代对军界进行大清洗的惨痛教训）。

战争还迫使斯大林在自己的集团内部进行了一番力量的重新配置。需要提起的是，这种情况从国防委员会建立之时就开始了，并在贝利亚与沃兹涅先斯基两人之间和马林科夫、贝利亚与莫洛托夫三人之间的个人对立中得到延续。

正如我们所知，沃兹涅先斯基自己的实践经验无法支撑他的权力欲。他没有管理工业企业、人民委员部或是州一级党委的实际经验。他是在梅日劳克被捕后，由日丹诺夫从列宁格勒计划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提拔上来的。

1941 年夏，沃兹涅先斯基证明了自己的无能，他未能完成自己制定的武器生产计划。此时，对他的飞黄腾达颇有醋意的米高扬将此解释为是因为沃兹涅先斯基的“官僚”作风造成的。

贝利亚使得斯大林相信，沃兹涅先斯基“没有绷紧”。他给最高统帅看了两张图表：一张是计划产量，另一张是实际产量。

斯大林焦急起来，命令贝利亚去领导军事工业。贝利亚拒绝了，推脱说没有经验。

而斯大林对此回答道：“这不需要什么经验，只需要果断的组织者。人手可以从在押犯人中挑选，特别是从那些在押的专家中挑选。内务部也可以用上，在工厂里建立严格的纪律。但您要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请您把工厂的厂长们和人民委员们找来，把这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交给他们，并检查完成的情况。”（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第 424 页）

1942 年 1 月，在斯大林、马林科夫、米高扬、贝利亚四人的小范围内进行过一次谈话。由于贝利亚对此已进行过直接的鼓动，而马林科夫也在场，那么可以认为这次会谈是他们两人精心策划的。（正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借口莫洛托夫缺乏与工厂的有效联系，而把他“从坦克部门拉了下来”，分管坦克生产的工作重新交给了贝利亚。）

依靠特种机关丰富的资源和马林科夫主管的党务机关的支持，贝利亚的确让工作有了好转。

斯大林对此是满意的。

结果，这个幕后小集团成了国家的实际领导者。而且需要补充一点：马林科夫与朱可夫有着良好的关系；8 月初，当克利姆·伏罗希洛夫被撤掉方面军司令员一职时，他们俩一起飞到了列宁格勒，并就此结下了友谊。

与此同时，除了军事行动以外，还必须给这些军事行动提供物资保障、组织所有

后方部门的工作,以及在谋求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与盟国建立关系。前线、后方、盟友,这些就是斯大林每天都要操心的主要问题。

从1941年7月4日颁布的国防委员会第10号决议——关于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建立民兵志愿者师,到动员劳力资源投入生产,构成了一条国家管理民众的路线。

在1941年的7月和10月,先后招募了16个民兵师(近16万人)。

为了消除因把劳动力征召进军队而给后方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当局采取了三种措施来弥补空缺:吸收一些原先的无业者(家庭妇女、残疾人、老人和少年);利用被羁押在拘留所和劳改营里的犯人的劳动力;对那些不适合作战,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劳役代替兵役。生产部门取消了休息日和休假,并采取了加班制。旷工和迟到将承担刑事责任。从1941年秋天起,开始号召老年后备役军人加入“工人纵队”,以投入到建筑和国防企业的工作中去。

在经济方面,国家采取了独特的国有化:企业的所有储备金都被收缴国库,以防止卢布的贬值。

1941年9月初,国防委员会作出将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迁至哈萨克斯坦的决定。伏尔加德意志族自治共和国被撤销,生活在苏联其他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也被迁出。根据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41年9月21日下达的决议,这些迁出者被分散安顿到了各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各地的行政中心(不是集中营)。1942年2月,所有男性的德意志族居民都被征入了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工人纵队”。

这样一来,苏联的后方就绝对不可能产生像在西欧出现的那种亲希特勒的德国人组织了。

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美国,只不过那儿采取了更人道一些的措施:德裔美籍军人只参与对日本的作战,并且还不在欧洲战场。不过,美国对于那些积极拥护德国利益的院外活动分子处理得要比苏联更干脆:他们从此去向不明,官方会通报说,某某先生“去了加拿大”云云。另外,有数万名美籍日本人被软禁在专门的集中营里。

由于契卡人员和国防委员会的迅速行动(而且并不一定是斯大林的提议),苏维埃联盟很快建起了一个以强行控制和爱国宣传为基础的紧急国家管理机制。

坚决抵抗的决心鲜明地体现于莫斯科会战时朱可夫下达的命令之中:“坚守至死!以血还血!没有书面命令不许放弃阵地!挑动者和奸细就地枪决!成立拦阻队与临阵脱逃作斗争。对所有逃离战场的人,就地枪决。”朱可夫再次重复了自己在列宁格勒的经验:下令用机枪对战场上的逃兵进行扫射。

残忍吗?当时并不这样认为。顺便提一句,在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朱加施维里7月被俘后,他的妻子(作为被俘者的妻子)按照第270号命令被逮捕。从一般的政治局委员到普通的红军战士,所有人都应该知道,斯大林的儿子们也在作战,任何



一个公民都不可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参与作战的除了斯大林的两个儿子雅科夫和瓦西里之外，还有他的养子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四次受伤)、伏罗希洛夫的养子铁木尔·伏龙芝(阵亡)、米高扬的儿子弗拉基米尔(阵亡)和斯捷潘，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阵亡)和许多其他高层精英代表人物的儿子。贝利亚的儿子(他是无线电报务员)自愿报名加入潜往敌人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的小分队，但斯大林下令把他派到了无线电侦查机关。

连最高领导层都没有顾惜自己的孩子，这一动力传递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1941年12月20日，在契卡成立的周年庆祝会上，经斯大林同意，贝利亚宣布了国防委员会指派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额外任务。契卡人员又被赋予了下述任务：侦查和监督疏散到东部的所有主要军工企业建设的进程和工期；跟踪铁路运输计划和向前线与后方分配食品计划的执行情况；监控卫生防疫和流行病监测机关的状况，以便提前掌握信息，预防在红军后方爆发大规模伤寒类疾病等等。

在谈论更为人所熟知的管理机关(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时，这个权力的附属机构通常不会被提及。但正是由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职权的扩大，才使斯大林实际上掌握了对国防委员会的控制权。

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很难逃避承担他对祖国的责任。

当时的时代精神就在于，整个国家都在作战。

斯大林明白民众需要精神上的支撑。斯大林的警卫员 A. T. 雷宾回忆：斯大林在德军突袭之后多次“出现在大街上”。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次凌晨4点，斯大林在卡卢日斯卡亚街上下了车。炸碎了的玻璃在脚下咯吱作响，四周的木屋在熊熊燃烧。急救车在清理着死者和伤者。惊讶的人群一下子就把我们给围住了。几位妇女还带着受到惊吓而哭泣的孩子。”(雷宾 A. T.，《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莫斯科，1992年，第21页)

当然，斯大林非常清楚自己出现在夜晚着了火的街道上会产生怎样的一种效果。他对莫斯科市民说的那句“将在我们的街道上欢庆凯旋之日”的话，应该被人们当成了，也将被人民奉为最具权威性的庄严承诺。

据雷宾证实，斯大林曾5次去了前线，并且从未流露出任何胆怯的神情(尽管有一些斯大林的传记上说他不敢前往作战区)。

到10月上半个月，苏联失去了几乎一半的领土。失去了顿巴斯，德国人进入了亚速海和克里米亚半岛。柏林宣称：“从军事意义上，苏维埃俄国已被消灭。”

9月中旬，希特勒下令追加3千万马克，以从瑞典、挪威、芬兰订购更多的花岗岩，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还修建了一批能容下1000只运输船的专用船坞。胜利在望，需要修建雄伟壮丽的纪念性建筑物。但与此同时，从1941年秋季开始，德军就受到了



燃料严重短缺的困扰,只能满足其需求的三分之一。(斯佩尔 A.，《回忆录》，斯摩棱斯克,1997年,第258、260—261页)

10月12日,卡卢加沦陷;10月14日,加里宁市沦陷。10月16日,斯大林把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告诉大家德国人可能在我们的援军到达之前突破防线。斯大林提出“就在今天”急速疏散政府机关,并做好城市被攻占的准备。紧接着开始在工厂、地铁、大桥上布设地雷。莫斯科军区司令员阿尔捷米耶夫被指派在市内准备防御工事,这是指望在预备部队到达之前哪怕守住莫斯科的一小部分。

斯大林建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立刻疏散,而他自己打算到第二天,即10月17日,再视情况而定。

我们要强调一点:负责莫斯科防御和建立地下网络工事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们,正如苏多普拉托夫说的那样:“一刻不停地、镇定、务实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卢比扬卡工作着。”

10月16日,莫斯科市内出现了恐慌,但很快得到了平息。苏多普拉托夫证实:“在这些日子里,高级领导层表现得平静镇定,一切按部就班。”斯大林没有离开莫斯科,关于这一点,10月17日通过广播作了公告。防守莫斯科市的任务交给了朱可夫和阿尔捷米耶夫。

10月24日,莫斯科的最后一道防线——沿花园环线的防线建成了。红场上的条石路基也被伪装起来,如同“绿色的居民区”。

德军继续着进攻。10月18日,德国人拿下了小雅罗斯拉韦茨;22日,拿下了纳罗-福明斯克;27日,攻陷了沃洛科拉姆斯克。

按计划,“台风”战役应该在10月中旬结束。显然,德国人的节拍被打乱了。

苏多普拉托夫证实说:情报部门的资料显示,敌军的处境由于缺少汽油、石油和弹药变得困难起来。

而按山多尔·拉多1941年9月25日发来的情报看,德国军界“越来越确信由于闪击战失败,胜利是不可能的观点……”。

但是,尽管放慢了进程,德意志帝国强大的战争机器仍继续朝着莫斯科挺进。

## 第十八章

# 最后的阅兵式

最后的阅兵、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关系、斯大林高估了红军的实力、罗斯福希望参战、珍珠港、在莫斯科召开的盟国会议

在德国“中央集团军”司令冯·博克的工作日志中越来越多地流露出一种不易觉察的恐慌情绪。10月30日，他写道：“我们的伤亡在增加。在集团军负责的战区里，超过20个营是尉官在指挥。”在11月3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各个兵团的全体官兵都已疲惫至极。”（博克 Ф.，《我曾站在莫斯科城下：战地日记（1941—1945）》，莫斯科，2006年，第219页）

11月6日和7日，斯大林发动了两场强大的宣传攻势：为纪念十月革命24周年举行的莫斯科苏维埃庆祝大会和红场阅兵。11月1日，斯大林召见了朱可夫，弄清了德军近几日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

莫斯科苏维埃的庆祝大会是6日晚上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里的月台上举行的，而和平时期，这种活动一般安排在大剧院里。讲台设在月台的尽头，月台的一边停靠着一辆敞着车门的列车，车厢里的桌子上放着夹肉面包和茶水。从另一边驶进了一辆列车，斯大林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陪同下从里面走了出来。朱可夫也在其中。宣布大会开幕的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B. П. 普罗宁，此后便是斯大林发表演讲。

所有人都还记得他7月3日的讲话，而现在敌人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了。

斯大林承认,局势更加危险了,但他的语气是乐观的:敌人的胜利是暂时的。他谈到了敌人“闪电战”的破产,并确立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把苏联变成一个万众一心的军营,“彻底消灭全部的德国侵略者”。他还对比了双方的伤亡情况,按照他的话说是:德国人的伤亡大约要高出 1.5 倍,而这纯粹是一种想象。实际上,苏联军队的损失比德军多出数倍。当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准备离开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斯大林停了下来,等了一会儿,然后指了指表,又摇了摇头。欢呼声更加热烈了。“大厅里欢呼声此起彼伏,长达 10 分钟”(И. 苏多普拉托夫语)。斯大林强调:苏维埃体制是最坚不可摧的体制,如果是其他国家损失了这么多的领土,很可能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考验”了。

此外,斯大林明确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德国侵略者想要对苏联人民进行一场歼灭战。那好吧,如果德国人想要一场歼灭战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得到它。”大厅里的回应是一致的——“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据目击者证实,斯大林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坚定和对自己力量的自信。讲话简洁明了、热情洋溢。他谈到了德国即将到来的军事破产,谈到了敌军道德的蜕化、后方的薄弱,以及盟国的不可靠。

这次大会通过广播进行了转播。在这之后,如同在和平时期那样,举行了盛大的节日音乐会。收听了这个来自莫斯科的广播节目的全国民众感受到:首都能够守住。

在演讲的结尾,斯大林认为需要把俄国历史上的神秘预备队列入抵抗力量之中:“在这场战争中,就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雄形象来鼓舞你们吧!”

实质上,斯大林这是重复了 1941 年 6 月 22 日都主教谢尔吉发表的告人民书中的思想。他也提到了列宁,但却是单独说的:“让战无不胜的伟大列宁的旗帜护佑你们。”

第二天早上 8 点,红场上举行了阅兵式。这一天,飘起了大雪。预测今天敌人不会进行空袭,但无线电报务员依然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迅速发出警报。参加游行的部队接到命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必须保持队形和纪律。这就意味着:做好即使遭到射击也不能偏移阅兵脚步的准备。

这是最后的检阅。斯大林所喜爱的那首著名歌曲《“瓦良格人”之殇》的歌词道出了这次阅兵的实质:“同志们,起来!各就各位!最后的检阅到来了……”

结果,斯大林的宣传攻势大获全胜。部队从红场直接开向了前线,大雪遮住了他们的脚印,斯大林的声音则通过无线电波刻在了作战民众的心头。

也许,这一显著的成就让斯大林有些飘飘然,以至很快他又与朱可夫发生了新的冲突,并造成了数千名军人的牺牲。

斯大林给朱可夫打了电话,这是一次艰难的对话,并以斯大林下令对正在做进攻准备的敌军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告终。



朱可夫表示反对,认为西方面军缺乏主动进攻的兵力:“我认为,现在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仅有的后备部队投入到胜负不明的反击中去。当敌军用自己的突击集团军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将没有军队来巩固战线的防守。”

但斯大林根本不听。他不断给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H. A. 布尔加宁打电话说:“你和朱可夫在那里太自以为是了。但我们一定会管束住你们的。”(朱可夫 Г. К.,《回忆与思考》,第 2 卷,第 27 页)

骑兵军团指挥官 П. А. 别洛夫的回忆录里写道:11 月 10 日,他和朱可夫到克里姆林宫去见斯大林,朱可夫“说话生硬,语气专横”。由此可见,最高统帅和方面军司令员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紧张的。所以,斯大林的威胁(“管束”)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想对朱可夫又一次施加影响的努力。

在德国人发动进攻(11 月 15 日)之前的 11 月 14 日,朱可夫在谢尔普霍夫以北地区和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施了反攻行动。这场顽强的战斗持续了 6 天,未取得夺取阵地的战绩。结果,虽然德军第 4 集团军右翼部队的进攻被粉碎,但我军的伤亡也是惨重的。有关苏联骑兵冒着德军的炮火如何奋不顾身冲锋的描述,听起来简直让人胆战心惊。

最终,斯大林和朱可夫还是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观点。

11 月 15 日,敌人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从 11 月 16 日早晨起,敌军开始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向克林迅速推进。我们在这个地区没有后备部队,因为后备部队按照大本营的命令已调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去进行反击,并在那里被敌军牵制住了。”(朱可夫 Г. К.,《回忆与思考》,第 2 卷,第 28—29 页)(这里,朱可夫指的是自己不久前与斯大林的那次争执。)

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给朱可夫打过电话,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您确信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吗?我是怀着痛苦的心情向您问这个问题的。请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诚实地告诉我。”从中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的曙光。

这就等于斯大林承认了朱可夫的军事权威!

朱可夫回答说“莫斯科能够守住”,并请求增派 2 个军和 200 辆坦克。

11 月 21 日,朱可夫电告第 16 集团军司令员 K. K. 罗科索夫斯基:“克林和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是两个生死攸关的重要据点。”

11 月 23 日,敌军占领了克林,27 日又占领了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

11 月 28 日,德国人向莫斯科河-伏尔加河运河扑来,并得以从亚赫罗马以南强渡过运河。

11 月 29 日,莫斯科防区的作战部队被整编为第 20 集团军,并归入西方面军。也就是说,整个莫斯科的防护现在都处在朱可夫的管辖之下。

11 月 30 日,属于西方面军的大本营后备部队第 1 突击集团军把莫斯科-伏尔加

运河东岸的德国人击退了。

12月1日至5日，德国人从南面(纳罗-福明斯克方向)继续进攻，但他们在洛布尼亚-克留科沃-杰多夫斯克-兹韦尼哥罗德-纳尔水库一线被拦截住了。

在这些日子里，苏军在图拉进行了英勇的防守，敌军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其攻下。此时，一条北起加里宁、南至图拉，而中心是这场战役的心脏——莫斯科的绵长防线形成了。

而在这时，斯大林和朱可夫之间的争执得以终结。

11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并表达了自己认为有必要开始反攻的主张。这从表面上看起来让人难免会觉得奇怪：两周之前他还认为不应该在反攻上消耗兵力，而现在却来了一个大转弯。

这里要强调一个朱可夫不可能知道的情况。11月29日，冯·博克向陆军指挥部提出了暂停进攻而转为防守的问题。也就是说，朱可夫表现出了他的战略远见。

朱可夫是经过选择的。

第一，可以先集中后备部队以做好发动反攻的准备，但这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会给敌军重新部署、调整战局的机会。

第二，也可以依靠生力军立刻进行反攻，不给德国人以加强已被削弱了的集团军兵力的机会，将他们从相对薄弱的阵地上击退，并乘胜追击。这一方案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但“其长处在于行动的出其不意性和对尚未来得及转入防守的敌军弱势集团军实施了有效打击”(M. A. 加列耶夫语)。

朱可夫抓住了这一关键时刻，斯大林也明白他的意图。斯大林在与沙波什尼科夫商量之后，于11月29日深夜通知朱可夫，大本营作出了进行反攻的决定。

12月4日，这场战役的两位主角再次发生了冲突。在西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正在主持召开各集团军司令员的会议，而此时最高统帅打来了电话。雷宾在回忆录里是这么描写这一小插曲的：

朱可夫一边听着，一边皱起了眉头，脸色逐渐发白，最后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对方：

“在我面前的是敌人的两个集团军和自己的方面军。我更了解，也更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您有时间，您不妨派些不中用的士兵到这里来打打看。”

很明显，斯大林同样也发起怒来，而朱可夫则冒失地回答让他走开！（雷宾 A. T.，《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第27页）

“走开”，这意味着，朱可夫对最高统帅动了粗口。

两天之后，斯大林又主动给朱可夫打去电话，并“谨慎地问”：“朱可夫同志，莫斯



科局势如何?”

这位方面军司令员向领袖保证：“绝不会交出莫斯科!”

这样一来，先前的不愉快就被忘掉了，只在后来颁奖时才又显露了出来：斯大林将朱可夫的名字从莫斯科保卫战的受奖名单中勾掉了。

不过，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说，斯大林确实没有能够配得上朱可夫所立功勋的奖章，当然，最高统帅的确是有点小肚鸡肠了。当时朱可夫赢得了两场胜利：一场是针对“中央集团军”司令冯·博克的胜利，另一场则是针对斯大林本人的胜利。

12月6日凌晨3点，苏军发动了进攻。其战果是惊人的：弱者战胜了强者。到1942年初，敌人已经被击退到距莫斯科100至250公里之外。与此同时，苏军在列宁格勒战线上解放了季赫温，并截断了德军与芬兰军队汇合的可能；在南方战线上则解放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并向克里米亚空降了登陆部队，占领了刻赤半岛。

苏军对北面和南面的攻击都是辅助性的，是为了不让德国人从这两边调集军队进攻莫斯科，苏军得到了一个较好的战果。

总体上，斯大林根据莫斯科会战的战果在某个时刻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希特勒的军队就像拿破仑的军队在1812年那样，是必定会灭亡的，现在只需要加快这一进程。

于是，他有点急于求成了：下令发动大范围进攻，而军队其实已经没有发动这种规模进攻的兵力了。这一做法在现实中会导致若干情况的出现，其中也包括拿破仑式溃逃的重现。但是历史终归只是“未来的草稿”，而这一次，“正稿”却是另一个样子。

希特勒下令军队“抵抗到最后一颗子弹和最后一枚手榴弹”，因为他明白，一旦撤退，部队将必败无疑。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此时德国的军事力量仍高于苏联。而希特勒本人也完全不是他的将军们在回忆录中描写的那样。朱可夫是了解他的，当时就给了他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阴险、狡猾和强有力的军事指挥官。”（西蒙诺夫K.，《历史的重水》，第81页）

1942年1月5日，斯大林强加给大本营一个总攻的计划。按该计划，苏军将不给敌人巩固阵地、积蓄力量以图再攻的机会。斯大林确定的目标是：“为了不给德国人喘息的机会，需要不间断地把他们往西赶，迫使他们在春季到来之前耗尽其储备。”

斯大林想达到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而且还想一下子完成。朱可夫表示反对，并提出建议：只在德国人尚未恢复战斗力的西线发动进攻，因兵力不足，在列宁格勒及南线就不要发动进攻了。

华西列夫斯基支持朱可夫的意见，表示现在不可能在所有的战线转入反攻。

但他们的意见对斯大林并没有产生影响。

朱可夫也认为：“从全局的角度”，斯大林的想法是正确的，只是脱离了现实。因

为,此时前线的弹药供应极其短缺(这可是在进攻阶段!),一门火炮一天只配有1—2枚炮弹。

但大范围的进攻还是按原计划展开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9个预备队集团军在全线发动了进攻,结果只有朱可夫指挥的西方面军向前推进了70—100公里。如果当时把预备部队都集中到这里,那么胜利将是决定性的。

朱可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这样的:

斯大林从战争最初起就开始了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军事战略与他熟悉的那个政治领域是接近的,而且对那些越是能对政治问题产生直接影响的战略问题,斯大林就越是自信。

在战争初期,他对作战谋略方面的问题知之甚少。但他在钻研作战问题,个人的这种感觉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最后阶段开始形成的,而到库尔斯克会战时,已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这些问题上已经相当自信了。

至于战术问题,严格地讲,他自始至终未能搞明白。是的,说实在的,他作为最高统帅并不需要直接去搞清楚战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智慧和能力能够让他在战争进程中非常好地掌握作战谋略,以至于当他把各位方面军司令员召集过来,并与他们讨论有关实施作战的问题时,他在作战谋略方面的表现并不差,有时甚至好于他的下属。而且,他常常能找到和提出很有意思的作战方案。

除此之外,还应该补充一点,他有一套获取即将进行的战役的具体信息的方法。这种方法,我认为,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在准备这一场或那一场战役之初、在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员开会之前,他总是会提前与总参谋部的军官(负责相应作战方向的少校和中校们)会面。他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报告,与他们一起讨论上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以搞清楚每一个情形,弄明白其中的奥秘。这样,在与方面军的司令员们会面时,在给他们下达新的任务时,他就表现出有相当充分的准备,以至于有时他对战事的掌握程度会让司令员们感到惊讶……

斯大林军事专业知识的不足不只表现在战争初期,其实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是这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否定他的智慧、健全的理智和对局势的了解。在分析研究战争史时,应该不带偏见地去搞清楚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的事实是什么。他确实对他的一些不顾反对意见而下达的对战事产生不利或有害影响的命令,以及他自己的固执己见负有责任。不过,他大部分的命令和决定却是正确和公正的……

而且,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斯大林并不急于发号施令。通常他会听完报告,包括那些令人不快的报告,也不会表现出焦躁;他不去打断报告,他会抽着烟,来回走动,再坐下,继续听。





在战争的末期，他的一个缺点，即某种嫉妒心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经常和明显地感觉到，他希望所有的胜利和成就都是与自己相关的，他因为这个或那个司令员的这个或那个军事行动受到高度评价而产生猜忌。拿我来说，在胜利节阅兵式上就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当人们向我致意并欢呼“乌拉”时，他不高兴了；我看见他是怎么站在那儿的，看见他因牙关紧咬而凸起的面颊。”（西蒙诺夫 K.，《历史的重水》，第 129—130, 133, 134 页）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对在瓦胡岛的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袭击，美国直接被卷入了“二战”。其实，美国在对日本施压、支持英国和苏联之时，早就参战了。

罗斯福原本就想让日本政府发动这场袭击，以解开自己的手脚。而日本也企图利用在欧洲的战争迅速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摧毁美国在太平洋的军力，然后在“共荣圈”内建立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日本人发动珍珠港袭击的目的不仅是想立即完成军事任务，还在于想动摇美国人的抵抗意志。

早在 1940 年春天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将军就已开始研究这次行动的计划。这位功勋卓著的水手参加过对马海峽会战，在会战中丢掉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并在这场日俄战争中取得了丰富的战争经验。他认为，这场战争中最出色的战略亮点就是日军出其不意地在夜间偷袭了俄国人控制下的旅顺港。而珍珠港事件其实就是偷袭旅顺港的翻版。

至 1941 年 7 月底，日本已经完全占领了印度支那。8 月初，美国开始停止向日本供应其急需的石油。所以此时，日本除了对美开战之外，也别无他法。既然日本已在中国和印度支那挑起了战争，它就不得不再开辟一个战场以得到保证胜利所需的资源。到袭击珍珠港之前，日本海军舰队已用掉了总战略资源中 4 个月的石油储备，而整个储备只够用一年半的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重复了德国为了获取近东和高加索石油而铤而走险的老路。

日本政府曾试图与美国人达成妥协，但未能产生任何效果，禁运并未解除。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着白宫。不过，罗斯福并不害怕战争的到来，而只是希望能在最有利于本国的情况下去迎接这场战争。坚持将巡洋舰派到日本海域的罗斯福本人就表达出了这种愿望：“我只希望它们能够继续在这里那里四处巡航，让日本人摸不着头脑。若因此损失一两艘巡洋舰，我也不反对……”（马斯洛夫 M. C.、祖布科夫 C. II.，《珍珠港事件：失误还是挑衅？》，莫斯科，2006 年，第 325 页）

战前，美国人拥有情报上的优势，他们在被称之为“魔法”的装置的帮助下，从 1940 年底就开始不停地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电。

但罗斯福并不知道，美国将为他的政治游戏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

苏联的外情局利用自己的间谍对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怀特施加影响，也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苏联外情局美国处处长维塔利·帕夫洛夫是“雪”行动的参与者。他证实,正是由于“雪”行动,美国国务院发出强硬照会,其中称曾向日本建议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出军队,以此换取与美国恢复经济关系。

但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却证实,苏联外情局并未参与过这样的行动。我们无法确定,他们两人到底谁是正确的,但我们要指出,罗斯福的对日政策既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美国不久前才与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在东南亚一带展开了利益争夺,现在并不打算与日本的“帝国主义者”去分享什么。同样还有一种说法,斯大林事先是知道日本海军航空兵要袭击珍珠港的,但他并没有向罗斯福发出警报。这种说法并不是建立在现存文献资料基础上的。斯大林事先是否知道此事,的确无人知道。众所周知的是,对于这次突袭,美国人是有所预料的,只是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会真的袭击他们认为如同坚不可摧的堡垒一样的军事基地,而这种精神上的盲目使他们未能做好从容得体地应对袭击的准备。

在某种意义上,罗斯福犯了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犯的那种错误。在得到美国舰队遭受重大损失的报告之后,罗斯福大惊失色。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总共只剩下两艘有战斗力的战列舰了,而日本则有十艘。但美国人还是幸运的:偷袭珍珠港时,他们的航空母舰在港外演练,因此幸免于难。

12月8日,日本人发动两次突袭,先后击沉了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从这一刻起,正如丘吉尔痛心疾首地感叹的那样:“日本人控制了所有的这些海域。”

12月7日,荷兰和荷属东印度、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巴拿马、南非联盟、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自由法国政府向日本宣战。12月9日,中国、墨西哥和古巴也向日本宣战。

12月11日,德国与意大利则向美国宣战。

苏联并未对日宣战。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斯大林解释道:“这会削弱苏联对希特勒军队的抵抗力,而有利于希特勒德国。”罗斯福赞同他的观点。

正如这位美国总统在与丘吉尔就珍珠港事件通话时表达的那样:“现在我们都串在一根绳子上了。”

实际上,12月7日和6月22日之间有一系列的相似之处:进攻的突然且有效,受袭一方军官团的训练程度不够,最高领导层都预料到了战争,但未能有所准备。

迄今为止,美国有时仍在这一点上责怪罗斯福,不过这并不会降低对他为胜利作出贡献的评价。而对斯大林的批评则要多得多。

但是,日本人取得的成功也仅仅只是战术上的。他们没有能够摧毁美国人的神经,被损坏了的战列舰也很快得到了修复。而且,美国的武装力量在被日本人动了一次外科手术之后,就像苏联的军队被德国人修整过之后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到



了康复。

从这时开始，盟国建立起了一种军事外交的合作机制，罗斯福和斯大林就是其毫无疑问的领导人。

刚开始，罗斯福是以霍普金斯的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的，并对斯大林有着很好的评价。这里要提醒一下，在1941年6月底，当这位美国总统的特使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跟他“以近年来苏联历史上少见的坦诚进行了交谈”（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语）。

斯大林对霍普金斯说：如果能得到美国的援助，苏联就能够坚持得住。在德国空袭莫斯科的这种共同危机感下，这次会谈成了两位领导人合作的第一步。

用霍普金斯的话说，斯大林“是优秀的领导人，是一个自信、果断和头脑清醒的人”。他对斯大林的刻画相当有趣：一个强有力的人，个子不高，一双有力的大手和同样强壮的体格，“如同足球教练理想中的中卫”。（邓恩 兀，《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们》，莫斯科，2004年，第200—201页）

9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勋爵来到了莫斯科。他们与斯大林就向苏联提供无条件援助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中，斯大林显得很坚定，也很友好。他给西方谈判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比弗布鲁克称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如果不去注意其他一些细节，那么此时罗斯福对苏联和英国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在战后重建世界格局和构建共同安全体系方面，斯大林将是他的盟友，而丘吉尔则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斯大林“倾向于民主制”，而丘吉尔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这一认知，以及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的危局正是罗斯福这时愿意提供无私援助的原因所在：在1941年至1942年苏联最困难的阶段，当苏联离溃败仅一步之遥时，罗斯福没有向斯大林提出任何援助条件。还有一点原因在于，苏联的毁灭将使德国和日本获得战胜西方所需的资源。于是，美国向苏联提供了一笔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这样，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牢固的互相理解的关系。有一次，斯大林以自己独有的幽默这样描写了这种关系：“丘吉尔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你不盯着他，他甚至会从你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而罗斯福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也伸手，但只拿大票子。”（引自：邓恩 兀，《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们》，第207页）

显然，罗斯福把所有有关借款和边界的具体争议放到以后再说，而这也是斯大林想要的。

不过，斯大林并不打算因相信自己大洋彼岸伙伴的高尚情操就放任事情发展。如果斯大林在这里不表现出他的坚忍不拔来，那斯大林就不是斯大林了。

1941年1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A. 艾登。会见时当着莫洛托夫的面，斯大林讲述了他对战后欧洲格局的看法。实质上，斯大林是建议瓜分德国：让奥地利、莱茵州和巴伐利亚独立；把东普鲁士划归波兰，把苏台德区交给捷克斯洛伐克；让南斯拉夫恢复完整，并将一部分意大利的领土划分给它；土耳其可

以获得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地区和叙利亚北部，希腊则可以获得爱琴海的若干岛屿。斯大林希望苏联的国境线保持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时的状态，与波兰的边境按寇松线划分，但苏联要在罗马尼亚和芬兰的领土上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

12 月 17 和 18 日，斯大林又两次会见了艾登。会见中，斯大林特别重视英国对苏联国界，包括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和新的苏芬边界的承认，并将这作为签订英苏条约的必要条件。

英国方面以大西洋宪章为借口，拒绝了斯大林的这种想法。

但这个宪章对斯大林来说并不具备重大意义，虽然他也在上面签了字。他和罗斯福一样，对大不列颠王国在近东和海外的势力范围不感兴趣。斯大林直奔主题：让我们明确我们在欧洲的共同目标吧！

会晤之后，艾登参观了被解放了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和被打坏的德军坦克，这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丘吉尔(通过艾登)给出了答复：“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被德国卷入新的战争。是否把普鲁士从南部德国分离出来和对普鲁士本身的实际定界，这是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丘吉尔把这些问题都放到了以后去解决，因为他认为，如果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只会让所有的德国人团结在希特勒的周围”。(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2 卷，第 288 页)

从莫洛托夫的讲话中也可以找到这一争执的影子：

“丘吉尔是所有帝国主义者中最聪明的人。他感觉到，要是我们击溃了德国人，英国也会慢慢没落。他有这个感觉。而罗斯福则在想：他们会来求我们。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工业，没有粮食，会来的，也会哀求的。他们无法回避。

“而我们完全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国人民已经做好了不惜牺牲、勇敢斗争和对任何外部事务进行冷静处置的准备。”(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 67 页)

谈判结束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给西方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又去大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演出的时间是在夜里，大厅里空荡荡的，只有政府包厢里坐着斯大林、哈里曼、比弗布鲁克和一些陪同人员。德军此时正在莫斯科城下。在彼得·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声中，才华卓越的加林娜·乌兰诺娃翩然起舞，这个讲述着光明与黑暗斗争的神奇传说仿佛预言着现实。

如果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斯大林的言行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他是不可缺少的、大权在握的世界三巨头之一。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需要捍卫苏联的利益(并且，我们看到，这基本得到了实现)。按照他自己的话，也可以说，他同样盯着伙伴口袋里的大票子。

他们的确相互需要，并在面对共同目标时表现得无可指责。但他们也知道，随着



每一步的胜利,边界问题会越来越紧迫地提上议事日程,而在这之后,合作的纽带必将破裂。

这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既是友谊,又是冷静的算计。在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里就可以找到说明这一点的令人信服的例子:“英国情报机关早在 1938 年便制造出了模拟德国‘埃尼格玛’密码机的装置,并通过苏联的秘密间谍山多尔·拉多向苏联分批提供了有关德国人计划的情报。经过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相比,卢比扬卡猜出,英国人一直在破译德国人的无线电报。但从苏联间谍‘剑桥小组’那里得到的情报要更加完整,这就证明,英国情报机关将自己得到的信息进行了拆分和修正。‘斯大林不信任英国人,而这是有根据的。’”(苏多普拉托夫 П.,《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第 223 页)

1943 年春,在对整场战争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库尔斯克弧形圈会战的前夕,苏联情报机关获取了包括目标、时间、兵力构成在内的德军“堡垒”行动计划的完整情报。这份情报的价值是巨大的,因为它表明德国进攻的目标是库尔斯克,而不是大卢基,也就是说不从莫斯科的西线,而是从西南线发动进攻——“我们不曾料到德国人会从那儿发动进攻”。

与这些情报相比,从日内瓦发来的情报就不那么完整和准确了。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人希望德国人的进攻受到阻挠,但“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希望我们获胜,不如说希望拉紧战事让两方消耗殆尽”。(苏多普拉托夫 П.,同上,第 224 页)

说到这里,为了公正,必须要强调一点:丘吉尔是非常珍视“埃尼格玛”的机密的,以至于当他获悉考文垂市将遭到轰炸的情报后,他情愿考文垂被炸,也不肯对这一机密有半点泄露。由此可见,伦敦理应对“埃尼格玛”得到的各种情报进行必要的剪裁。自身利益更重要!

此处正好可以看一下斯大林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指的是德国领导人。

在霍普金斯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通过贝利亚和苏多普拉托夫,而后者又通过保加利亚大使斯塔梅诺夫,试图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克里姆林宫似乎准备按布列斯特的那种形式进行和谈的假象。他们的设想是:斯塔梅诺夫把情报报告给鲍里斯国王,而后再将此情报告知柏林。德军进攻的任何一次暂停对苏联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相信俄国会获胜的斯塔梅诺夫并没有向首都索非亚转告什么消息,这一试探未能如愿。(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把这一运作说成是斯大林有意按希特勒开出的条件签订和平协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但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狡猾,那时所有人都在相互试探。问题在于,斯大林准备利用哪怕最不起眼的机会去冒险。

## 第十九章

# 斯大林又一次不听从朱可夫

---

斯大林又一次不听朱可夫的意见、哈尔科夫的悲剧、“杀死德国佬”、第 227 号令：“不得退后一步”、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

---

疏散到古比雪夫市的苏联政府于 12 月 25 日前陆续回到了莫斯科，危机过去了。斯大林进行了一些人事变动，这也对外证明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已经扮演完了他们的特殊角色，只有斯大林才是国家唯一的领袖。斯大林重新启动了处于瘫痪状态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常务局的工作，该局的组成是：沃兹涅先斯基（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别尔乌辛、柯西金和什维尔尼克。他把对各人民委员部的监督权还给了常务局。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未被列入常务局的名单中，这并非偶然。很快，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中也“淡化”掉了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此时已经清楚，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创立的这个国防委员会已经使斯大林穷于应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管理机构。斯大林似乎是给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当时，他被同志们围堵在别墅里，茫然不知所措，因而，暂时没有能把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列进国防委员会之中。此后，直至 1953 年，斯大林一直不停地对自己身边的人进行重组，以达到他个人所需要的某种力量平衡。

在已经来到的 1942 年中，他不得不向军人们作出新的让步，因为他所有的建议



最终大都被证明是败笔。他的全面进攻的想法导致了积蓄起来的后备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由被他提拔起来的库利克和梅赫利斯指挥的刻赤战役也以失败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而告终；朝哈尔科夫方向的反攻也导致部队被包围，近 24 万名官兵阵亡。

围绕哈尔科夫战役的争论是这样发生的。

正如在莫斯科会战时那样，这一次斯大林和朱可夫又发生了冲突。朱可夫建议目前只能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守政策，以便“在初夏时使敌人精疲力竭、一蹶不振”，在这之后再转为进攻，而此时只能在西方战线的地带发动攻势。沙波什尼科夫也持这个观点。

在 1942 年 3 月底召开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会议上，虽然朱可夫很坚定地捍卫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但斯大林还是决定支持由西南战线总指挥铁木辛哥提出的在哈尔科夫一线发起反攻的建议。

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沙波什尼科夫因考虑到这种做法太冒险，建议放弃实施这一计划。作为回答，斯大林作出指示，认为该战役是西南战线的内部事务，总参谋部就不要再进行干预了。

斯大林把总参谋部排除在外，这是有意无意地重复了自己在芬兰战役初期的做法。那时他把沙波什尼科夫挤到一边，直接把实施战役的任务交给了列宁格勒军区的指挥部。

朱可夫回忆说，他马上就为自己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三月会议上的固执而受到了斯大林的惩罚。朱可夫还未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大本营的指令就已经下达到了这里：加里宁方面军不再归属西部战线（即朱可夫的）指挥，西部战线则予以撤销。这样一来，朱可夫的地位就被降低了。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斯大林在 1942 年 5 月 1 日的命令中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努力使 1942 年成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把苏联国土从希特勒恶棍们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年。”

西南战线领导人（铁木辛哥、巴格拉米扬、赫鲁晓夫）的固执已见正好完全符合了斯大林的愿望，他甚至还为他们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接见——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巴格拉米扬回忆说：除了他，参加晚宴的还有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和南方面军的一些将领。在晚宴前夕，斯大林吩咐尽快为巴格拉米扬缝制出一套新制服以换下身上磨破的那套，这同样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朱可夫没有被邀请参加晚宴。

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场晚宴。他对大家说了很多溢美之词和祝愿。他希望大家坦诚相见，并向他们询问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宴结束时，他笑着宣布：现在要宣读“一份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文件”。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的小纸条。这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写给土耳其苏丹的著名书信。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哥萨克人一直与土耳其人进行战斗，并成为一系列史诗的主人公，其中包括伊利亚·列宾的油画《扎波罗热哥萨克写信给土耳其苏丹》。

在苏英谈判(战后)中，斯大林利用过这幅油画，关于此事莫洛托夫有过回忆：“据我们所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颇为喜爱列宾的油画《扎波罗热哥萨克写信给土耳其苏丹》。于是我们在一次大国外长会议前给了他一个惊喜：把这幅画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运来，并挂在会议室门前。贝文停下脚步，对着这幅画端详良久，然后说：‘真奇怪！上面连一个正人君子都没有！’”(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74页)

斯大林非常喜爱列宾画笔下这些强悍、半醉、快乐、狡黠和可笑的人物。向这位英国人展示这幅画时，斯大林仿佛道出了那封“信”中的话：“你是谁呀，如果你都不敢对那些难缠的人掀光屁股的话，你还算个什么骑士！”

哈尔科夫战役前夕，斯大林非常乐观。

哈尔科夫战役开局顺利，但很快遭到了克莱斯特坦克兵团从其南翼、从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发动的打击。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向斯大林汇报了这一险情。斯大林联络了铁木辛哥，而后者使他相信该行动将获得成功，于是不喜欢改变自己决定的最高统帅下令继续展开进攻。但是，到第二天(5月18日)晚上，斯大林开始有点明白过来了。他打电话给铁木辛哥，建议把哈尔科夫附近的军队调向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

情况的复杂性在于，不管是铁木辛哥，还是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都试图让斯大林相信，来自克莱斯特的危险被极度夸大了，并没有理由停止进攻。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里写到了这件事，他强调说：“存在一种说法，似乎南和西南两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曾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提出过警报，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在最高统帅通话时我本人就在现场。”(朱可夫 Г. К.，《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65页)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话推翻了后来赫鲁晓夫试图自我辩解并将失败的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身上的言论。赫鲁晓夫信誓旦旦地说，是他给斯大林打去电话，但斯大林并未接电话，只是通过马林科夫下达继续进攻的命令。

结果，哈尔科夫城下之战的失败使得南部的局势迅速恶化。德国人在进攻，而大本营在前线根本没有预备部队可用。德军突破了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交界处的防御体系，并于6月中旬开始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急速推进。

于是，苏联原本坚固的守势意外地陷入危急之中。德国人占领了整个顿巴斯和罗斯托夫州，并向高加索挺进。7月7日，德军兵临沃涅日城下，而7月17日则到了列宁格勒城下。

现在都已清楚，这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过失造成的。第一，斯大林不顾情报机



关上报的情报,认为1942年夏季德国人会用从南面纵深迂回的方式,再次向莫斯科方向发动进攻。第二,是因为哈尔科夫战役的失败。

事实上,希特勒(与仍然坚持进攻莫斯科的哈尔德的意见正相反)于1942年4月5日下达了第4号令,其中包括把德军的主攻目标定为顿巴斯、高加索并切断苏联的石油供应线。

朱可夫则认为,德军在南线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这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斯大林再次遇上了这种情况,在他的身边,有人比他更有天赋,对战事的理解更深,至少在军事方面是这样的。而没有这样的人,对于他斯大林来说,是不行的,至少这时还不行。

此时,局势在一天天地恶化。在这种情况下,A. A. 弗拉索夫将军的第二突击军的命运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该军按计划在沃尔霍夫战线发动了反攻,但在6月底几乎全军覆没,弗拉索夫将军本人被俘。这是一次痛苦的战术上的失利。在哈尔科夫悲剧之后,南方所发生的情况只是可怕地重蹈了1941年6至7月时的覆辙,也就是说,德国的闪电战复活了,而苏联的消耗战却没有了希望。

约翰·富勒认为,本有机会获得胜利的希特勒在1942年夏天犯了自杀性的错误:当德军在沃罗涅日遇到顽强抵抗时,他下令派出掩护部队并转向斯大林格勒方面。这样一来,原本可以占领四边形区域(罗斯托夫-斯大林格勒-萨拉托夫-沃罗涅日)的德国人,却只占领了一个从沃罗涅日到斯大林格勒至罗斯托夫的三角形地区,而其北边(沃罗涅日至斯大林格勒一线)暴露在俄国人的进攻之下。(但富勒没能说出,由于俄罗斯人的顽强抵抗,德国人企图将苏军围困在顿河上游地区的一整套计谋落空了,所以他们打破自己的最初计划而转攻南方。)除此之外,富勒还表达了一种观点,即不管如何,只要莫斯科这一国家的主要枢纽没有被拿下,德国人就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

所以,从战略角度来看,斯大林是正确的,他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苏联的首都。

在希特勒宣称是不可能的美国参战发生之后,德国的选择就不大了:或是获胜,或者灭亡。但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指出的那样,斯大林格勒战役将决定一个问题:德国人是否能与同盟国再战上10年。

的确,如果德军得以占领高加索、格罗兹尼和巴库的油田,并掌握除了石油之外其他来自波斯的货物运输所依赖的伏尔加河,那么他们就能够转入消耗战的战略。德国人将获得新的经济资源,并能在北方建立防御体系,开发所占领的区域。

1942年春,战线已经延伸到距斯大林格勒500公里、距高加索600多公里的地方。8月,德军突破了这一防线。8月4日,伏罗希洛夫斯克(斯塔夫罗波尔)被德军占领。8月8日,迈科普油田遭到摧毁并放弃。8月20日,克拉斯诺达尔失守。

在这些日子里,工业人民委员、负责前线燃料供应的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尼古拉·巴伊巴科夫被召到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对他说,一滴石油也不应该留给德国人,并委派他前往北高加索,一旦那儿有失守的危险便毁掉所有的油井。

同时,斯大林警告说:“巴伊巴科夫同志,您要明白,要是您给德国人留下哪怕是一吨石油,我们就枪毙您。如果您毁掉了油田,敌人却没能占领这个区域,我们却没了石油,我们同样要枪毙您。”(库马涅夫 T.,《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们如是说》,第 596 页)

时年 31 岁的巴伊巴科夫愣住了,问道:那么他还能有什么选择?是的,他并无选择,不管什么结果等着他的都是被枪毙。

斯大林是这样回答他的。斯大林用两个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说道:“选择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自己想出路,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这番赠言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巴伊巴科夫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摧毁了近 3000 个油井,贪婪的敌人没能得到燃料。结果,德国成立的“高加索德国石油股份公司”在迈科普每天最多只能采到 70 桶石油。

7 月 3 日,希特勒在波尔塔瓦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并在会议上指出了俄国人最有可能进行抵抗的几个地区:“产油区、列宁格勒、莫斯科”。(哈尔德 Φ.,《战地日记(1941—1942 年)》,第 797 页)

从哈尔德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按德国军需官瓦格纳的通报,“为‘蓝色行动’所准备的燃料只够用到 9 月中旬”(“蓝色行动”是德国武装力量在高加索战场实施军事行动计划的代号)。

这样一来,德国人所剩的时间便很有限了,而俄罗斯人的抵抗,只要表现出应有的决心,就可以摧毁德军的一切幻想。

在哈尔德一贯冷静、务实的日记里,7 月 23 日,在向希特勒做过报告之后,突然出现了歇斯底里的语气:“一直以来这种对敌人能力的估计不足已经逐渐达到了荒诞的程度,并且变得危险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超出了人类所拥有的能力。现在已经谈不上从事什么严肃工作了。”(哈尔德 Φ.,同上,第 824 页)

这意味着,对战争的结局,他们已经有预感了。

但为什么是斯大林格勒?它可不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最多不过是次要目标。然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却成了这场战争中转折性和决定性的大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城市的玄妙名称起了一定的作用:希特勒下达了征服这座以苏联领袖名字命名的城市的任务。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使德国指挥部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1942 年夏,苏联领导人对军队的要求已不像 1941 年夏天那样,一年前苏联军队无权迂回和后撤,只能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个人。现在,红军已经摆脱了包围。而希特勒却将苏军的大范围后



退视为软弱和末日临近的标志。

7月23日,希特勒下达了第45号令,提出了如下任务:夺取迈科普、格罗兹尼和巴库,对斯大林格勒实施攻击,消灭这一地区的苏军,占领该城,封锁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地面交通线。德国人之所以必须攻下斯大林格勒,是为了在其进攻高加索时,保护自己北翼的安全。

7月12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成立。

7月19日,全城宣布进入戒严状态。

7月24日,顿河畔罗斯托夫沦陷。

7月28日,斯大林签署了他亲自起草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关于“不得退后一步”的第227号令,这在某些方面与他1941年7月3日的广播讲话非常相似。

而在此之前,在7月19日的《红星报》上,刊登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一首诗《杀死他》,这首诗充满了无比的仇恨。诗中以震撼人心的笔触反映出了“最后的日子”里那种可怕的精神状态:

如果你珍爱你的家园,  
那个把你抚养成俄罗斯人的地方……  
如果你珍爱你的母亲——  
那个用乳汁哺育了你的人,  
尽管乳房里已经没有了乳汁,  
你只能依偎在她的胸前;  
如果你无力忍受,  
法西斯分子去她那里过夜,  
还揪住她的辫子,  
抽打她布满皱纹的面颊;  
让她的那双手,  
那双曾把你抱入摇篮的手,  
去给这畜牲洗涤衣衫  
给他铺床叠被……  
如果你没有忘记父亲,  
那个曾经抱着你摇晃的人,  
那个曾经的优秀战士,  
那个消失在了喀尔巴阡山积雪之中的人,  
他为保卫伏尔加河、保卫顿河,  
保卫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不想，  
    让他在棺材里辗转不安，  
    让法西斯分子砸掉十字架上  
    战士的肖像并扔到地上，  
    还要当着母亲的面，  
    践踏他的面容……  
如果你不想交出  
    那个与你并肩同行的人，  
    那个你挚爱着  
    以至于不敢长吻的人，  
    如果不想让法西斯分子活捉了她  
    对她施暴，把她逼到角落，  
    三人一起扒光她的衣服，  
    在地板上强奸她；  
如果你自己不想把以男人全部爱的力量  
    所神圣珍惜的一切  
    交给这些嚎叫的、充满仇恨的  
    和浑身鲜血的走狗的话……  
如果你不想，  
    把你、妻子和母亲生活的家园，  
    我们称之为故园的一切，  
    永远地交给手执武器的法西斯的话，  
    你要知道，如果你不去拯救她，  
    那就没有人能拯救她；  
    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杀死他，  
    那就没有人能杀死他。  
    而只要他还没有被杀死，  
    就免谈自己的爱，  
    就免谈你成长的故土  
    和你生活的家园。  
    让你的兄弟去杀死法西斯分子，  
    让你的邻居去杀死法西斯分子，  
    这是你的兄弟和邻居在复仇，  
    而你并没有推脱的理由。



不要躲在别人的背后，  
用别人的步枪报不了仇，  
如果是你的兄弟杀死了法西斯分子，  
那他是战士，而不是你。  
你要这样去杀死法西斯分子，  
让他，而不是你，  
在地上一卧不起。  
不能在你的家园中响起嚎啕声，  
而要在他的家中为亡者哀嚎。  
这就是他应得的，他罪责难逃，  
要让他的房子燃烧，而不是你的房子，  
要让他的妻子成为寡妇，而不是你的妻子，  
要让他的亲娘哭泣，而不是你的母亲。  
要让他的家人徒劳地等待，而不是你的家人。  
就这样去杀吧，哪怕只杀死一个！  
就这样去杀吧，快去！  
见他多少次，就杀死他多少回！

7月24日，伊利亚·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杀吧》的短文：“我们明白，德国佬根本不是人。从现在起，‘德国佬’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可怕的咒语……如果你给这个德国佬留下了活口，这个德国佬就会绞死俄罗斯男人，玷污俄罗斯妇女。如果你已经杀死了一个德国佬，那就再杀第二个吧。没有什么比看到德国佬的尸体更让我们快乐的了。不要计算时间的长短，也不要计算路途的远近。只需要算一下，有多少德国佬已经被你杀死了。杀死德国佬，这是老母亲的请求。杀死德国佬，这是你孩子们的祈求。杀死德国佬，这是故土的呼唤。别失手！别放过！杀吧！”

我们注意到，西蒙诺夫讲的是法西斯分子，并未说他们是哪一个民族，而爱伦堡直接点明了敌人：德国鬼子！

对敌人的仇恨到了足以燃尽一切的程度。这种仇恨把所有的民众都团结在了一起。

诗人和领袖，当然，并不是事先商量好的。不过，斯大林一直都在阅读《红星报》这份战争年代国家最主要的报纸，而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情绪增加了他的世界观的悲壮色彩。

华西列夫斯基在自传中写道：“这一命令，从爱国主义的高度、从情感张扬的程度来说，是战争年代里最有力度的文件之一。”相反地，朱可夫却对这一命令评价不高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命令中的民众“失去了对红军的信心……因为他们自顾自地逃向东方,而把我们的人民置于德国侵略者的奴役之下”这些字眼刺痛了他。

在这一非直接的争议中,朱可夫元帅表现出了他与斯大林之间永恒的对抗。“朱可夫认为,斯大林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平息人民的愤怒,以掩盖从大本营至师一级的毫无准备和在指挥军队中所犯下的错误。”(加列耶夫 M. A.，《朱可夫元帅:伟大而独特的统帅艺术》，第 101 页)

不过,朱可夫在自传中却从另一种角度评价了斯大林的心理状态:“总体上应该说,最高统帅明白了,1942 年夏季形成的不利局面是他个人的过失造成的,是他在批准我军当年夏季战役的行动计划时所犯过失的结果。所以,他并没有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中寻找其他的过失者。”(朱可夫 Г. К.，《回忆与思考》，第 2 卷,第 73 页)

第 227 号令是以概述开头的:

敌人不顾惨重损失,向前线增派了新的兵力,向前爬行,并冲进了苏联的腹地。敌人侵占了新的地区,摧毁和破坏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强奸、掠夺和屠杀苏联人民。战斗正在沃罗涅日地区、顿河和临近北高加索的南部地区进行。德国侵略者正向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推进,并妄图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库班和北高加索,掠夺那里的石油和粮食。敌军已经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旧别利斯克、罗索希、库皮扬斯克、瓦卢伊基、新切尔卡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半个沃罗涅日。我军南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也跟在恐慌的人群后面,在没进行认真抵抗和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况下,放弃了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玷污了自己的军旗。

热爱和尊敬红军的我国民众开始对红军感到失望,失去了对红军的信心,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咒骂红军,因为他们自顾自地逃向东方,而把我们的人民置于德国侵略者的奴役之下。

前线一些愚蠢的人在散布谣言自我安慰,说我们还可以继续向东撤退,因为我们还有大片的国土、众多的人口,而且我们的粮食一直都是富余的。他们想借此证明自己在前线的可耻行为是正确的。但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只对我们的敌人有利……

目前,不管是人力储备,还是粮食储备,我们都不比德国人有优势。如果我们再后退,就意味着断送自己,也断送了他的祖国。每一小块被我们新放弃的土地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强敌人,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我们的国防和我们的祖国……

不得退后一步!这就是现在我们应有的主要口号。





必须坚守每一个阵地、每一寸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要抓住每一块苏联的领土不放，并尽一切可能捍卫到底。（斯大林 И. В.，《论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莫斯科，2002，第 51—52 页）

这份命令的主要内容是：

整顿军队的秩序和纪律；

不允许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部队撤离阵地；

恐慌者和胆小鬼应当就地消灭；

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就撤退的指挥官以叛国罪论处。

在各前线成立一些惩戒营（不超过 800 人），将“那些因胆小怯懦或摇摆不定而违反纪律”的中级和高级指挥官集中到那里，并派他们去前线的危险地段，“给他们机会，用鲜血来洗刷自己对祖国犯下的罪行”；

在每个集团军成立 3—5 支阻击部队，把这些部队派到士气不稳定的师团后方，责成他们在出现混乱和逃跑时，“就地枪决那些恐慌者和懦夫”；

在每个集团军成立 5—10 个惩戒连（每连 150 至 200 人），将那些表现不好的普通士兵和下级指挥官集中到那里（类似于惩戒营的方式）。

这个命令并未公开刊登，但作战部队的所有军官都熟知它的内容，据前线战士的说法，它产生了极强大的精神作用。

但需要承认，在列宁格勒战役期间，很多将军都采用过这一命令中的“胆小鬼和恐慌者就地枪决”的部分。当时有成百的“恐慌者和胆小鬼”被枪决。我们之所以给这几个词加上引号，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也被处决了，而目的只不过是给了其他士兵造成应有的震慑作用。

至于阻击部队和对破坏纪律者的严厉措施，这不管是对朱可夫，还是对其他的将领来说，都不是新鲜事。朱可夫本人也远非“温情脉脉”的人。战争就是战争。

随着南部整个局势的日益恶化，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于 1942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3 日期间在西线（勒热夫—瑟乔夫卡）展开了旨在歼灭德国第 9 集团军、清除德国在勒热夫的突出工事的进攻。该行动是由加里宁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和西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实施的。为了行动的顺利进行，按道理两个方面军应由一位司令员统一指挥，既然西方面军扮演着主要角色，那么主将应该是朱可夫。但正如我们记得的那样，在那场失败的哈尔科夫战役的前夕，斯大林撤掉了朱可夫对加里宁方面军的管辖权，而其时，显然斯大林并不想修正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决定。总之，不管怎样，战役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打响了，到了 8 月 5 日，在勒热夫地区作战的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才划归朱可夫指挥。

不过,正如朱可夫所写的那样,由斯大林亲自提出来的打引诱战的想法是富有成效的。其结果是,德军的防线被突破,苏军接近了勒热夫,并摧毁了伏尔加河左岸德军的进攻基地。原本准备派往南方的敌人的3个坦克师和若干个步兵师,结果并未能派到那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德军坦克师按其组织结构和主要武器的配制,其规模相当于苏军的坦克军团;德军的坦克和机械化军团相当于苏军的集团军;而德军的集团军则相当于苏军的方面军)。

因此,由斯大林提出、由朱可夫实施的这次反攻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即使不加上这些未调派至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国部队,那里的局势也是非常困难的,守住这座城池的机会实在太小了。

8月23日,德军以密集空袭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在两天的时间里,德国人集中对工业和民用建筑进行了轰炸,城市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约4万人丧生。但城市依然存在,城市的居民没有离开它,因为斯大林禁止对居民进行疏散。斯大林认为,军队应该保护的不是石头,而是留下来的居民,这样也好让军人们明白,他们无路可退。全城的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激励着保卫者们的朴素信念——“后面是伏尔加河,我们无路可退!”也就是说,我们要么战死在这里,要么坚守住阵地。

对于德军来说,这句话也同样适用。“让俄国人无路可退”,难道这不正是整个“蓝色行动”的目的吗?

在轰炸之后,大部分居民还是被疏散了,但这个城市继续在运转,甚至仍在发电,而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制造厂仍在生产着坦克和武器。

8月23日,由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指挥的德国第6集团军试图以正面进攻夺下城池,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德国人冲向了城市的北郊,但被拦截住了。只是到了9月10日,霍特的第4坦克集团军才开进了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沿岸。

此时,这座位于伏尔加河之滨的宽约6至8公里、长近60公里的狭长城市,有一半被德军紧紧围困住了。它与后方的联系只能通过伏尔加河了。城里只剩下两个集团军——在城中和城北的第62集团军和在城南的第64集团军。而这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看起来,德国人可以不费力气就冲破这一狭长的地带。

斯大林把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和布雷兹涅夫三人派去斯大林格勒。华西列夫斯基此时已代替了生病的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布雷兹涅夫是坦克制造人民委员,而马林科夫是斯大林在党务方面的左右手。

显然,这三人小组向最高统帅汇报了斯大林格勒已接近灾难的边缘。而斯大林只有一位对付灾难的专家,他立刻把这位专家从西方面军召了回来。

8月28日,朱可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很直接地告诉他,德国人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拿下高加索。斯大林向他宣布了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任命朱可夫为副最



高统帅(接替卫国战争的英雄布琼尼,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并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区”。同时还向斯大林格勒派去三个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第66集团军和第24集团军),这些集团军应该从北边实施反击,并与第62集团军汇合。

8月29日,朱可夫飞抵卡梅申市,并从那里驱车去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从司令部军官们的汇报中,朱可夫明白了一点:他们对守住城池没有任何信心。

这时朱可夫与斯大林之间又爆发了新的冲突。最高统帅催促朱可夫尽快发动进攻,但被朱可夫拒绝了,理由是必须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朱可夫不想在9月6日之前发动攻势。“进攻不得晚于5号”——斯大林下了命令,然后便挂了电话。

朱可夫的正确性很快就得到了证实:K. C. 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于9月3日发动的进攻没有带来任何战果。

9月3日,斯大林给朱可夫发去电报,其实质就是一句话:“现在拖延就等于犯罪。”话里隐藏着威胁。

朱可夫立刻给大本营打了电话,说可以下令在明天早上发起进攻,但三个集团军都将在缺少弹药的情况下投入战斗,而弹药运到不会早于9月4日晚间。除此之外,朱可夫还告知,火炮、坦克和飞机的协同作战也只有到9月4日晚才能完成。

也就是说,朱可夫的回答是“不”。

斯大林别无他法,只得同意。

9月5日凌晨3点,斯大林给马林科夫打去电话,询问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完成转入反攻的准备情况。马林科夫的回答让他感到满意,于是他就没有再让朱可夫听电话。

想必,斯大林打电话给马林科夫,并不是因为他更信任马林科夫,而是因为与倔强的、专业素养更高的朱可夫通话,让斯大林心理上有些沉重。难怪不久后斯大林就因马林科夫没有向他汇报斯大林格勒战线的情况而斥责了他(马林科夫签发了朱可夫的电报,是认同电报的内容的)。在责成马林科夫要将特殊情况上报时,最高统帅似乎在说:“您和朱可夫并不是一回事,您应该监督他。”

9月5日和6日,朱可夫发动了反攻。为了击退朱可夫组织的反攻,德国人不得不从斯大林格勒城下调集来新的部队。艰难的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10日,至此,朱可夫终于相信,以现有的兵力无法攻入城内,而继续尝试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于是,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需要新部队的增援,“部队实施的打击无力粉碎敌人”。斯大林建议朱可夫飞回莫斯科来当面汇报。

此时,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局面已经明朗起来。守卫着40公里战线、被逼到河边的苏联第62集团军,在人数、坦克数量和火炮数量上都不及德军(分别是5.4万对10万、110辆对500辆、900门对2000门)。但这种在废墟上的战斗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它使侵略军的步兵、坦克、空军无法再协同作战了。在城里,两军在为一栋房

子、每一层楼、每一个走廊进行着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坦克袭击的速度和空军轰炸的密集度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为了给德国轰炸机飞行员造成困难，苏军把自己的前沿阵地前移至紧挨着德军阵地、仅有一个手榴弹投掷距离的地方。为了不冒误炸自己阵地的危险，德军不敢对苏军前沿阵地进行轰炸了，也不敢用加农炮和迫击炮进行轰击了。敌军现在自己卡住了自己的脖子。

在9月初朱可夫发动的这场未起到效果的反攻之后，德国人也实施了几次有力的袭击，企图突破伏尔加河。德军占领了南区和中心区，并将自己的军旗插到了受到损坏的市委大楼上。现在，德军能对中央码头射击了，但仍未能占领可以控制市中心的制高点马马耶夫山冈。战斗围绕着马马耶夫山冈展开（9月14日被德军攻下），并转移到了北区。在这里，德国人的胜利是巨大的，但并不是完全的。他们未能占领工厂所在区域和苏军运送弹药并从对岸进行增援的狭长沿岸地带。在这之后，德军又发动了两波猛攻。至10月底，德军占领了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制造厂、“堡垒厂”和“红十月厂”。至此，德军距离伏尔加河仅仅只有一公里多的距离了。

“两军为争夺每一栋大楼、每一个车间、每一座水塔、每一段铁路、每一堵围墙、每一处地窖，甚至每一堆废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就算消耗了大量弹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哪一场战役可与之相比。我军与敌人的距离非常接近。尽管德军配有密集的飞机和火炮，但不短兵相接是不可能前进的。俄国人在利用地形和伪装方面要比德国人高明，并且在巷战和房屋争夺战方面也更有经验，他们进行了坚守。

“此后发生的灾难让这几个星期的‘围攻’黯然失色。这段故事不过是一些小分队、突击小组和众多无名战士英勇事迹特殊篇章的一页。这些事迹既包括德国进攻部队士兵的行为，也包括防守一方俄国士兵的行为。这是进攻方的德国士兵、也是防御方的俄国战士的功勋。”（德尔·T.，《进军斯大林格勒：致命的决定》，莫斯科，2003年，第492页）

11月11日，德军进行了最后一次突击，最终得以在一个地段突破至伏尔加河。苏联第62集团军被分割为三个部分。

就在这一时刻，9月14日夜通过伏尔加河调派过来的A. И. 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出其不意地在市中心马马耶夫山冈向德军发动了反攻，扭转了会战的进程。虽然，有1万人的该师，第一天就损失了3000人，第一个星期则损失了8000人，而到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时只留下了320人。

德国人未能取得对伏尔加河西岸的完全控制，也就没能达到其主要目的。1941年12月的景象再次重演，德军的猛攻势头被抑制住了。

这一时期，在高加索战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德国军队被拦截了下来，他们未能到达巴库。

## 第二十章

# 斯大林接见韦尔纳茨基和约费院士

核问题：斯大林接见韦尔纳茨基和约费院士、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胜利、勒热夫、斯大林：将军剧本的编导演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1942年9月，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爆发之前，斯大林在孔策沃的近郊别墅接见了B. И. 韦尔纳茨基院士和A. И. 约费院士，弹药人民委员万尼科夫参加了此次会见。会见讨论的是制造核武器的问题。这次会谈之后，国防委员会于1942年9月28日下达了一条命令：要求当时被疏散到喀山的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恢复对铀的研究工作。为了执行国防委员会的这一命令，还成立了由И. В. 库尔恰托夫领导的第一专门实验室。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斯大林还未掌握外情局提供的关于核武器的资料，他是到了1942年10月，也就是在他下达了此项命令之后，才获得这些资料的。相应地，贝利亚也仅是到了1943年才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引自：西罗季宁E. И.，《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莫斯科，2005年，第11页）

与此同时，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在准备一场对敌人实施致命打击的“天王星”行动。这一行动是由朱可夫提出的，得到了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的支持。行动计划在9月中旬实施，从绥拉菲莫维奇地区，即西北方向发动进攻，同时从察察湖和巴尔

曼察克湖之间的隘路，即斯大林格勒以南，从西线向卡拉奇市方向对敌军的两翼发动强有力的集中打击，并包围和歼灭德军的主要兵力——第6和第4坦克集团军。斯大林任命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为该行动的总指挥。

准备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电话和通信中都禁止谈论这一话题，所有的信息都通过口头来传递。预备部队向斯大林格勒行军只在夜间进行。

在筹备“天王星”行动的同时，苏军在西线的勒热夫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诱敌性的“火星”行动。哈尔德在1942年9月24日的笔记中对此写道：“‘中央集团军’战线前的所有区域里日益加紧的铁路运输表明，敌人正在大规模重新布置……”哈尔德认为，苏军将在第9集团军的整个战线前集中起新的突击部队。（哈尔德Φ，《战地日记》，第884页）

9月25日，哈尔德因提议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军事行动，而被希特勒免去了总参谋长一职。新任总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上将向希特勒报告说：东线最危险的地区是由罗马尼亚、意大利和保加利亚部队组成的“B”集团军群的北翼（不久，苏军正是向这里发动了进攻）。而希特勒称蔡茨勒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11月19日，苏军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发动了攻势。11月20日，步兵和坦克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出发了。德军的防线迅速被突破。需要强调的是，在此次进攻之前，苏联空军已在伏尔加河上空占据了优势。11月23日，苏军在卡拉奇地区对德军的包围圈形成了。

11月25日，由朱可夫指挥的“火星”行动拉开了序幕。如果该行动得以成功，那么便能打开一条直取柏林的道路。苏联方面参加这次行动的有190万士兵、约3500辆坦克、超过1000架飞机和近25000门火炮。

令人惊叹的是，苏联在经历了1942年夏天不可思议的惨败之后，竟然组织发动了这样两场战略性战役！

尽管“火星”行动未获胜利，但它还是给德军造成了沉重的后果，并对1943年的决战起到了影响。此次行动使德军第9集团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因此，德国人把“堡垒”行动（在库尔斯克弧形圈）从5月推迟到了7月。即便如此，德国人7月在库尔斯克弧形圈北部的进攻也很快减弱了。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胜利的氛围下，勒热夫战役就显得不太引人注意了，甚至实际上遭到了苏联历史文献的漠视，似乎它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样。有传闻说，斯大林下令把朱可夫派去了勒热夫，而把华西列夫斯基留在了斯大林格勒，说这是领袖希望借此夺去朱可夫在伏尔加河会战中胜利者的光环。但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正是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及方面军的其他一些将领被授予了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在朱可夫获得的勋章上刻着第1号的标志（而那些资历较老的元帅们：伏罗希洛夫、布琼尼、铁木辛哥，此时尚未获得



任何奖章)。

很难想象,在1942年夏季最困难的局势下,斯大林还能从事一些军事以外的其他事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产生这是不可能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但对我们的主人公来说却不是这样。即使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主人公也认为,他与剧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的两次会面,甚至一起对其剧本《前线》进行修改,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考涅楚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二战前他就已经担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了,从1941年起供职于西南方面军政治部。其实,这个剧本从一方面来说,是反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一部正剧,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不过,在斯大林的导演下,这个虚构的故事很快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也再一次向大家显示出了斯大林的超常天分。

这个剧本的情节讲的是,曾是国内战争时期的勇敢参与者、现今却跟不上形势且不学无术的军事长官、方面军司令员戈尔洛夫中将将与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将奥格涅夫之间的冲突。开战时,奥格涅夫只是一个上校,指挥着一个师,后来才指挥起了集团军。在戈尔洛夫的司令部里,尽是一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自高蛮横之人,他们经常酗酒,可以说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奥格涅夫不仅公开反对戈尔洛夫,还反对这种风气。在剧本的第一稿里,奥格涅夫在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独立制定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并获得了战斗的胜利。也就是说,在他与戈尔洛夫的毛病作斗争的时候,自己也犯下了渎职罪。

而在斯大林修改过的版本里,奥格涅夫将自己的计划上报给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盖达尔,而后者又上报给了莫斯科。计划得以出色地实施,戈尔洛夫被解除了职务,奥格涅夫接替了他的位置。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不是莎士比亚的那种作品。但是斯大林亲自对其进行了校阅,补充了一些独白,突出了该剧本的中心思想。在斯大林的版本中,军事委员会委员盖达尔所说的就是领袖亲自加上说的话:“斯大林说,要更大胆地把年轻的、有才能的将领提拔到与老一代将领一样的领导岗位,需要提拔那些善于打现代化战争,而不是按老一套作战的人;提拔那些善于从现代战争中吸取经验的人;提拔那些不断成长和前进的人……应该敲打那些狂妄自大、不学无术的人……用其他新生的、年轻的、有才能的人替代他们,否则就有可能断送掉我们整个伟大的事业。”(引自:佩琴金 A.,《斯大林行动中的公关艺术》;《独立军事评论》,2002年,第34期)

当斯大林对奥格涅夫这一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活动进行调整的时候,他显然是看到了那些现实中被他授予了众多权力的将领们。他希望将对将军们解释清楚,以便让他们明白当前的事理,以免犯下不可挽救的错误。



但该剧本在《真理报》上刊登(1942年8月24日至27日)之后,将领一方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应。8月28日,铁木辛哥发来电报:

斯大林同志:

刊登在报纸上的考涅楚克同志的剧本《前线》值得特别注意。这个剧本对我们的危害将是整整几个世纪的,需要对它进行取缔,追究作者的责任,并查清与此相关的其他责任人。铁木辛哥。

这位老骑兵当然不知道谁是这一剧本的共同作者。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将军们谈一下自己对该剧本的看法。朱可夫机灵地回避了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说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完该剧本。但科涅夫却坦陈道:“很恶劣。如果司令员不好,您有权撤掉他。但在《真理报》上发表侮辱、点名和嘲笑方面军司令员的作品,这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了,不是专指哪一个人,而是诋毁所有人的名誉。”

说这话的就是那个科涅夫,那个不久前刚让最高统帅向他“承认过错误”(斯大林是一个诚实的人……)的科涅夫。领袖向这位将军喊道:“您什么也不懂。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政治的需要。这个剧本讲的是与过时的、陈腐的、拖我们后腿的人作斗争,这是个好剧本,正确地提出了问题。”

科涅夫本应该表示赞同就算了,但他却提出了争议,指出了考涅楚克的一些失误。为了明确自己的立场,科涅夫进一步说道:“我更像奥格涅夫那类人,但是剧本里所写的一切我都不喜欢。”

这个回答让斯大林火了起来:“是吗,您是奥格涅夫!您不是奥格涅夫,您骄傲自大了。你们也同样骄傲自大了……你们这些军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而我们,非军人就什么都不懂。我们比你们更懂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引自:佩琴金 A.,《斯大林行动中的公关艺术》)

《前线》发表后评论如潮,接着就是科涅夫受到了指责,此后,各级权力机关都应该明白了,是谁提拔、支持着现实中的奥格涅夫,为什么战争初期会遭到如此惨败。不管是好是坏,斯大林给了大众一个解释。

但如果领袖本人就扮演着戈尔洛夫的角色,那又应该怎么办呢?该向谁去求援呢?

很快,就在《前线》问世之后,这样的问题就发生在了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代表协调“天王星”行动)和斯大林本人身上。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调派由 P. Я. 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近卫第 2 集团军:是派该集团军去打退德国人(曼施坦因),从外围突破保卢斯第 6 集团军的包围圈,还是按照原计划去与在高



加索的“A”集团军群作战？风险是巨大的。

A. M. 华西列夫斯基对此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曼施坦因进攻斯大林格勒防线的阶段，我去过撤退下来的沙普金骑兵军团和另外一些撤退下来的部队。形势相当严峻。离曼施坦因的进攻部队与保卢斯的集团军会合只剩下几天时间了。我认为，再过一昼夜，至多两昼夜，再对此进行拦击就已经迟了。

一旦他们会合在一起，保卢斯就会逃离斯大林格勒，这不仅将导致我们建立起来的包围圈的瓦解，导致我们在包围圈里歼灭保卢斯集团军愿望的破灭，而且还将对军事行动的整个进程产生不可估计的后果。

起初，我们计算有误，对被包围的士兵数量估计不足。而实际上，他们在包围圈里有30万人，他们完全可以冲出来，并与曼施坦因会合之后逃离。那么其后果，我要重复一下，将是难以估计的。

我认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以其现有的力量已不足以抵御曼施坦因的进攻。我亲眼观察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来到西南方面军的指挥所，从那里给斯大林打电话，并坚决请求把近卫第2集团军配属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用来反击曼施坦因。按原计划，近卫第2集团军的确是要被派去增援对罗斯托夫的反攻，以期不仅能够切断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敌军，还能切断德国人在高加索的集团军。我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在这危急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要把近卫第2集团军调过来。

斯大林坚决不肯把这支军队交出来，不愿改变原先交给这支部队的任务。在我一再坚持下，斯大林说他要考虑一下再给答复。在等待他的答复时，我自担风险，下令让马利诺夫斯基着手把部队调到新的地区来，使之能够从新的地区去抵挡曼施坦因，同时还命令他去指挥所找托尔布欣，从他那里拿下通讯线路，以便做好新来部队的管理工作。这个命令是当天深夜下达的，当时还未得到斯大林的答复。

后来我知道，斯大林这一夜都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里商量我的请求，而大本营对此的意见是多种多样的。朱可夫认为，军队是不需要调动的，大不了就让保卢斯冲出斯大林格勒与曼施坦因会合，再一起向西推进。总之，就是什么也不需要改变，必须按原计划让近卫第2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向罗斯托夫发动反攻。整个夜里在大本营里都是在为这个争论不休。

而我却走来走去，等待着答复，因为事实上我已经调出了军队。终于，凌晨5点，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气呼呼地就说了一句话：见您的鬼，拿去吧！然后便挂了电话。（西蒙诺夫 K.，《我这一代人的见证》，第87页）

华西列夫斯基承认,自己有些先斩后奏了(就像《前线》第一版里的奥格涅夫将军那样)。很难想象,如果斯大林不顾当时的局势依然决定不动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将会发生什么。

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马林科夫身上,他在没有得到斯大林同意的情况下,就批准生产“雅克”歼击机的飞机制造厂停产,以进行用锻压胶合板替代铝制外壳的调整工作。这将大幅度地提高产量。

斯大林亲自关注着飞机的日产量,正如马林科夫预料的那样,若向他提议暂停生产,只会让领袖发怒。斯大林看到报表上飞机的产量先是下降了,然后又得到显著提高,他要求马林科夫解释原因。马林科夫全都承认了,因为他觉得胜利者是不应受到审判的。据其子安德烈说,后来父亲回忆道:“斯大林只是摇了摇头。”

最高统帅从这个自己最亲密副手的行为里看到了什么呢?难道是他自己已经不被信任了吗?难道是更年轻的一代已经不需要他就可以进行管理,而他已经碍事了吗?

当然,在口头上(和文学作品中)说提携年轻有为的将领要容易得多。但要是这个年轻有为的人突然间告诉你,你已经落后于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了呢?

这里要提醒一下,1942年12月,斯大林已年满63岁了。

## 第二十一章

# 16 岁的斯维特兰娜爱上了 42 岁的阿列克谢·卡普勒

---

16 岁的斯维特兰娜爱上了 42 岁的阿列克谢·卡普勒、瓦西里抛弃了怀孕的妻子、斯大林打压卡普勒

---

1942 年年底，在斯大林的家庭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算大，但使其更为苦涩的事：其女儿，年轻的十年级学生斯维特兰娜爱上了 42 岁的电影剧本作家阿列克谢·卡普勒（是关于列宁的电影剧本作者）。斯维特兰娜称他是“永远毁掉了自己和父亲关系的人”。

当时斯维特兰娜 16 岁，正是温情和危险的年龄。斯大林可顾不上她，两人很少能见到面，而见面之时（甚至是她从古比雪夫市来见父亲），斯大林也无法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与她进行哪怕是一分钟的交谈，无法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与之促膝谈心。

当彻底从疏散地返回来之后，斯维特兰娜、瓦西里和妻子加林娜及他们的孩子、雅科夫的小女儿古利亚、列坚斯的遗孀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两个儿子弗拉基米尔与列昂尼德一起住进了祖巴洛沃别墅。老房子在德国人逼近的时候被炸掉了，不过德国人最终也未能攻到这里。后来在这里建起了一个“带有半截塔楼和缩小的平台”的新别墅。

此时，瓦西里已是少校，任空军监察局局长，时年 22 岁。

“这个冬天，我有了一个可怕的发现。”——斯维特兰娜后来回忆道。在一份美国杂志上，她读到了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文章谈到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于 1932 年 11 月 9 日晚自杀身亡一事。被这个信息惊呆了的小姑娘真正感受到了对她来说记忆模糊的母亲之死给她带来的煎熬。“有什么东西摧毁了我，也摧毁了我对父亲意志、教诲和意见的无条件服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过去从未思考过的问题：难道我的父亲一贯都是正确的吗？”这就是斯维特兰娜当时的心态。

此时，她很孤单，也特别需要父亲的同情和安慰。

斯维特兰娜与卡普勒认识是哥哥瓦西里介绍的。瓦西里周围聚集了一帮风趣快乐、又有点豪放不羁的人，他们中有运动员、飞行员、演员、作家和电影导演（如：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和瓦连京娜·谢罗娃、阿列克谢·卡普勒、罗曼·卡门及其妻子尼娜——瓦西里的同班同学、Л. 采利科夫斯卡娅、А. 梅塞雷尔及其侄女苏拉米菲、М. 斯卢茨基）。卡普勒曾建议瓦西里出任一部讲述飞行员题材影片的顾问。祖巴洛沃别墅出现了一些那里以前未曾见过的面孔，有一些聚会。这也打动了十年级女生的芳心。

瓦西里同样也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赶走了正怀着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加林娜，还顺便赶走了因此而责备他的外公外婆阿利卢耶夫和阿利卢耶娃，并与尼娜·卡门同居了。

加林娜·布尔东斯卡娅对自己前夫的记忆是这样的：“瓦西里天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在追求我的时候，他不止一次驾着不大的飞机越过基洛夫地铁站的上空。因为这种不合规矩的行径他还受到了处分。不过处分很谨慎，也没有向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汇报。”（索科洛夫 Б. В.，《瓦西里·斯大林》，莫斯科，2003 年，第 79 页）

不过罗曼·卡门却把瓦西里的行径告到了领袖本人那里（通过最高统帅的警卫长 H. C. 弗拉西克）。斯大林下令：“把这个蠢女人还给卡门，对瓦西里上校处以 15 天拘留。”在此之前（1942 年 12 月），这位少校一下子被升为上校。

因为自己的放荡不羁，瓦西里如愿去了他一心想去的前线。其实从 1942 年 7 月 13 日开始，他就作为空军监察局的代表指挥了近卫第 32 歼击机航空兵团的行动。这个兵团在 8 月份被部署到了斯大林格勒地区。12 月，团长伊万·克列晓夫少校遇难，于是瓦西里被派到了他的位置上（需要说明一点，克列晓夫并非在战场上遇难，而是在他飞去莫斯科见妻子时坠机身亡）。

据我们所见，瓦西里很快就把“著名的莫斯科美女”、他的老同学尼娜忘在脑后了。而他妹妹的事则要严重得多。

11 月 8 日那天，在热闹的宴会之后，卡普勒（朋友们叫他柳西亚）邀请斯维特兰娜跳狐步舞。斯维特兰娜感到有些胆怯，但卡普勒保证说，她会“跳得很轻松”。于是，



少女孤独的心一下子就融化了。后来，斯维特兰娜回忆道：“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是如此温暖和平静！我对这位厚道友善的人产生了一种异常的信任，我突然很想倚在他的胸前，并闭上眼睛……”（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35 页）

她向他敞开了心扉，告诉他自己在家里是如何寂寞，与哥哥和其他亲属是如何不合拍，而且“今天正是母亲逝世十周年的祭日，但似乎没人记得这件事，也找不到人可以说说这件事”。

从阿利卢耶娃的回忆可见，卡普勒让她爱上了自己。从家庭小圈子里挣脱出来的斯维特兰娜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个见多识广男人的述说（“我们彼此难舍难分”）。卡普勒到她的学校去接她，一起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一起去看各种演出。至于考涅楚克的《前线》，卡普勒则说：“那里面一点艺术味儿都没有。”

可以说，卡普勒带给斯维特兰娜的那种艺术熏陶，给她打开了与苏联大相径庭的西方现代文化的世界。斯维特兰娜的确被震撼了。

在电影委员会空旷的放映厅里，他们一起观看了华特·迪士尼的喜剧片《白雪公主与七个矮人》和艺术片《青年林肯》。斯维特兰娜通读了卡普勒给她拿来的所有的书：Э. 海明威的《有的和没有的》和《丧钟为谁而鸣》、P. 奥尔德顿的《四海之内皆故人》，以及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和霍达谢维奇的诗集。

他用对她来说是陌生的那个世界的光彩填补了她心灵的空虚。

“柳西亚对于我来说是最聪明、最善良和最美好的人。他总是散发着知识的光芒和魅力……我也总能让他感到新奇。对他而言，我能够理解、听从和接受他的话，而且总能对他的话作出回应，这让他觉得有些不简单……”（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36 页）

也许，卡普勒也爱上了斯维特兰娜。不过从阿利卢耶娃的这句“我也总能让他感到新奇”的话来看，也可以看出一个成年男人与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在玩某种游戏的征兆。

还有一个能说明这是一场游戏征兆的事：1942 年 12 月 14 日，卡普勒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Л. 中尉寄自斯大林格勒的信》的通讯。

被这份主要报纸派到斯大林格勒出差的卡普勒决定让斯维特兰娜想起自己：“如今的莫斯科，也许正下着雪。从你的窗口，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宫带有垛口的城墙……思念着亲密的人儿，你现在过得如何？还记得莫斯科河岸，以及我们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约会吗……”

很可能，读了《真理报》上这篇报道的斯大林大发雷霆。正因为如此，就在同一天便出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副局长亚历山德罗夫写给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的题为《关于 A. 卡普勒的作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称其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这封信是写给心爱的姑娘的，但作者却找不到一句话或一种形

式来表达 JI. 中尉对亲密伴侣的这种感情”）。

报告中还提出，要批评报纸的领导所犯的 error。中央书记处的相应决定公布于 12 月 15 日。

这种对一篇完全普通文章的快速反应，明显让人感到是斯大林直接干预的结果。要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事件呀！一个嗓音甜美、在共产主义宣传领域干得不错的犹太胖子，竟敢勾引伟大领袖的唯一女儿，而他却只受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意识形态上的驳斥！

看来，斯大林有些茫然若失、不知所措。当然，他只要动动眉毛就可以除掉这个柳西亚。或是他可以向女儿解释清楚，为什么她不应该与卡普勒交往。但他没有这么做。显然，他有些踌躇不决，也不排除还想到了妻子的自杀。

结果，斯维特兰娜和卡普勒的罗曼史暂时沉寂了下来，这对恋人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惩罚，不过他们却没受到任何惩罚。于是，他们就恢复了约会。

在这之后，斯大林的副警卫长鲁缅采夫上校给卡普勒打去了电话，委婉地建议柳西亚找一个“远一些”的地方去出差，而后者却要他见鬼去。这就太过分了，这样是有可能要掉脑袋的。

1943 年 2 月 28 日，斯维特兰娜满 17 岁了。她把卡普勒带到库尔斯克火车站旁一套属于瓦西里的空房子里，并默默与他相吻。隔壁的房门是开着的，警卫员克利莫夫就坐在里面读报。

两天之后的 3 月 2 日，当卡普勒准备动身去塔什干出差时被逮捕。理由是他与外国人有联系。而他确实认识很多外国记者。

3 月 3 日，斯大林见了女儿。两人间的激烈争吵让他感到完全无能为力。

他大步径直走进了我的房间，他的眼神惊呆了我的保姆，她坐在房间的地板上一动不动……我从未见过父亲这个样子，他通常在言语和情绪上都是有所克制的，而此刻他怒火中烧，勉强才挤出了几个字：“在哪里，那些都在哪里？你的作家的那些信都在哪里？”

很难表达他在说到“作家”这个词时是带着怎样的轻蔑……“我都清楚！你的所有通话，它们都在这里！——他用手拍了一下衣袋——得了！交出来吧！你的卡普勒是英国间谍，他被捕了！”

我从抽屉里把柳西亚给我的所有书信、手稿和他从斯大林格勒带给我的附有他个人签名的照片拿了出来。这里面有他的记事本，有他的书稿，有一部新的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电影剧本，还有柳西亚在我生日那天作为纪念写给我的一封忧伤的告别长信。

“但是我爱他！”我终于开了口。“你爱！”父亲叫了起来，带着无法表达的





愤怒,我也得了两个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耳光。“您看看,阿姨,她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他再也克制不住了:“现在,在打着这样的一场战争,而她却忙着这些!……”接下去他说了一句非常粗野的骂人话,他找不到其他词了……

“不,不,不,”保姆站在角落里喃喃地说道,并挥动胖手好像在驱赶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不,不,不!”

“什么不,不是?!”父亲还没有平静下来,尽管在打过我耳光之后,他已经出了气,说话开始平静了一些:“什么不是,我全都知道了!”他盯着我,说了一句让我极为震惊的话:“你瞧瞧你自己,谁会要你?! 有一群娘儿们围着他,你这个傻瓜!”说完他便去了自己的饭厅,拿走了所有的东西准备亲自看一看。

我彻底心碎了。他的最后几句话命中了要害。他可以在我面前诋毁卡普勒,这种尝试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当他对我说“瞧瞧你自己”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的确,有谁会要我呢。难道柳西亚会真爱我吗?他为什么会要我?而对于那句“你的卡普勒是英国间谍”,我竟然没能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在下意识地准备去学校时,我才终于反应过来了,柳西亚出了什么事了……但一切都像在梦里似的。

我从学校回家时也像在梦里一般。有人告诉我:“去饭厅见你父亲。”我一言不发地走过去。父亲正撕着我的信件和照片,并丢进了纸篓。“作家!”他嘟囔着:“都不会用俄语好好地写!而她居然不能给自己找个俄罗斯人!”似乎,这里最让他气恼的是,卡普勒是一个犹太人……(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38—139 页)

撕信、耳光、辱骂,这些难道不是无能为力的表现吗?他面对的是自己喜欢的孩子、他总爱称为谢坦卡的女儿。女儿与卡普勒的通话录音让他明白,在这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后院,他是无力防范的。外人要闯入他的家庭,只要搞一点轻浮的说爱调情,稍作努力,添一些美国文化的新奇花样,就足够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者。在他的战友和人民委员里就有不少犹太人,而且许多政治局委员的妻子也是犹太人。所以,对斯维特兰娜关于最让父亲气恼的是卡普勒的民族属性这一说法,需要作点补充:不仅应该考虑到卡普勒的民族属性,还应该考虑到卡普勒对苏联宣传工作(《前线》)的否定态度、表面上的忠诚(对列宁生平的创作)和对西方文化的热衷,所有这些给斯大林描绘出了一个脱离了苏联文化的、善于算计的美国化投机分子的形象。斯大林很清楚,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卡普勒被流放到了沃尔库塔,在地方剧院工作了 5 年时间。1948 年,他被允许回到出生地基辅,但他擅自来到了莫斯科(不是去找斯维特兰娜),因此又被关押了

5 年。

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招惹斯大林。想成为他的女婿？真的爱上了斯维特兰娜？没人能找到答案。

有这么一个细节，这是多年以后卡普勒告诉自己的妻子尤利娅·德鲁尼娜的，而妻子又告诉了自己的近亲：1953 年，在卡普勒最终回到莫斯科之后，斯维特兰娜想与他恢复以前的关系，但他拒绝了。即使抛开这个细节不谈，他甚至不喜欢她身上的气味。专业人士都知道，气味在打情骂俏或讨好献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气味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厌恶，还谈什么真情？

斯维特兰娜身边的人也有证据可以证明，卡普勒与这位 16 岁的小姑娘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原来在同一时间，他脚踩着两只船。（阿利卢耶娃 K，《斯大林的侄女》，莫斯科，2006 年，第 256 页）

不，她可不是个丑姑娘。1942 年秋曾见过斯维特兰娜的丘吉尔说她是“红发美人”。也许她确实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像野姑娘贝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人物）一般。而情场老手柳西亚在逢场作戏，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却带给斯维特兰娜不可愈合的创伤。想必卡普勒也意识到了自己是在冒险，但对他来说，赢得这场游戏要比模棱两可的惩罚更重要。

一年之后（1944 年），斯维特兰娜嫁给了格里戈里·莫罗佐夫（莫罗兹）。他是莫斯科警察局（交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犹太人。斯大林同意了女儿的婚事，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莫罗佐夫不要出现在他的家里。父亲对她说：“他太会算计了，你的那个年轻人。你看，前方那么吃紧，那里在厮杀，你看他，却躲在后方……”（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43 页）

但据斯维特兰娜的说法，斯大林从来没有要求他们离婚。虽然到 1947 年他们还是离了婚，但这是斯维特兰娜自己的意愿。斯大林是正确的，女儿的第一任丈夫确实“太会算计”了。

当时，这对新婚夫妇被安排住进了政府大楼（“滨河路大楼”），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为了表示对领袖的敬意，也取名叫约瑟夫。斯大林对这个小家伙很慈爱。

用斯维特兰娜表弟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话说，这个小家庭是这样破裂的：“斯大林关于‘算计’的担心得到了证实。斯维特兰娜的寓所里总是挤满了丈夫的亲戚们，他们总是向她提出给这家或那家的孩子谋个‘肥缺’这一类的请求，并天真地期待着各种从天而降的恩赐，这些让斯维特兰娜烦恼不已。但正如通常所说，在我们家里‘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向斯大林或向他周围的人提出类似的请求都是徒劳的，而且也不是没有风险的。结果，这对夫妇间的关系变得冷淡起来，而我们的这帮新亲戚也开始变得垂头丧气了……”

所以，问题不在于卡普勒，也不在于莫罗佐夫，更不在于什么犹太人，问题在于斯



大林在赢得战争胜利的转折阶段顾不上与孩子们进行心灵交流。

1943年，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被释放出狱。在确信了雅科夫在俘虏营中保持着尊严，而尤利娅在丈夫被俘一事上没有过错之后，斯大林下令释放了这个儿媳，并在首都的市中心分给她一套住房。住房位于离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不远的大共青团胡同里。

谈论斯大林的孩子们时，就应该说一说那个时期整个的青年一代。他们明显与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父母那一辈大不相同。这些孩子的贪图享乐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简直可以与“资产阶级的孩子”相提并论。比如，列昂尼德·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儿子）在晚会上射死了一名军官（在这位军官的头顶上放了一个空瓶子，而小赫鲁晓夫要展示自己打得很准）；瓦西里·斯大林组织了空投炸弹把鱼震昏后捕鱼的活动（导致了一位飞行工程师失事）；人民委员沙胡林的儿子因年少痴情枪杀了外交官乌曼斯基的女儿之后开枪自杀，而这个年轻人的手枪是从米高扬的儿子那里拿的。

“哎，你们呀，该死的阶层！”我们的主人公有可能再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要提及的是，他对古比雪夫市为疏散到那里的莫斯科官员的孩子专门建立一所中学一事，就是作了这样的表态。

## 第二十二章 和丘吉尔单独会见

与丘吉尔的对决、“火炬”行动、斯大林赢得盟友、库尔斯克弧形圈、罗斯福与丘吉尔对世界格局各持己见

丘吉尔在大不列颠的危急时刻成为其首相，这并非偶然，没有谁能够比他更好地维护英国的利益了。他勇敢、睿智，是一位抓住一件事就紧紧不放的具有迷人魅力的贵族。他理应能够在五个世界大国之间的斗争中（要知道盟国之间也在博弈）捍卫大英帝国的利益。

丘吉尔比斯大林大 5 岁，出身于马博罗家族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保守党著名的活动家，甚至曾一度担任大不列颠的财政大臣。丘吉尔受过军事教育，参加过几场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过一个苏格兰步兵团。早在斯大林还是二流人物的时候，丘吉尔已经是一个闻名遐迩的政治家了。他在政府里担任过多个职务。在那个时期，他撰写了众多著作，其中包括四卷本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世界危机》。后来他又写下了六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19 年 1 月，丘吉尔出任英国军事大臣。与我们的主人公相比，他是一位欧洲巨人，一位大英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

丘吉尔明白，在军事上斯大林是最主要的伙伴，因为一旦苏维埃联盟垮了，那么下一个将是英国。我们可以坦率地说，他在明白这一点并希望莫斯科能坚持住的同时，并不想看到苏联赢得胜利和在战后的强大。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援



助从长远来看是不符合英国利益的。同样,与华盛顿的关系也是这种情况,大英帝国不想把头把交椅让给自己这个精力充沛的“女儿国”。

因此,当支援盟友的愿望和让盟国陷得更深的希望等量齐观时,在开辟“第二战场”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便表现出了一系列漫不经心、瞻前顾后的自相矛盾。在这方面,三巨头都是高超的棋手。

1942年5月27日,莫洛托夫飞到美国去谈判,主要议题就是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前后四次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并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从英国向法国沿岸地带派遣大规模的登陆部队只有到1943年才能实施,但他作为总统,正在建议自己的将军们不要惧怕可能会造成10万—12万人的损失,在1942年就以6—10个师的兵力展开行动。

莫洛托夫努力使这位交谈者相信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它将迫使德国人从东线撤走40个师,而这将使德国在1942年或稍迟一些时候就被彻底击溃。

霍普金斯和美国军方认为登陆行动可在1942年实施。但丘吉尔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希望,给苏联提供援助是有种种附加条件的。而这一立场对罗斯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认为,一旦英国在1942年派出陆军的主要兵力登陆,这将迫使华盛顿去配合伦敦。而美国人却准备在没有英国人参与的情况下,从大不列颠的岛屿进入法国。如果此举受挫,美国总统将遭受来自敌手的攻击,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自己的政党在1942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失败。”(法林B,《第二战场——反希特勒联盟:利益冲突》,莫斯科,2000年,第342—343页)

英国人建议在北非实施登陆,这意味着包围德国,以围困之法取胜。在这一战略下,苏联将为这种围困付出血的代价,而这种结果是完全符合英国人长期以来的策略的,并能让大不列颠王国成为欧洲的主要力量。

当然,丘吉尔的安排并不是要给苏联造成什么损失,而是为了有利于英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掌握了决定性的话语权。美国军方倾向于绕过英国,展开针对日本的积极军事行动,而让伦敦处于德国入侵的长期威胁之下。美国的陆军部和参谋总部认为,主要任务是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不是让大英帝国保持原样。

但最终罗斯福还是勉强同意了丘吉尔的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被推延了一年。

原则上,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前夕并不十分相信红军会取得胜利。如果从这一点出发,那么他们在北非的行动(命名为“火炬”)大大地制约了德国人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力量。

1942年5月,隆美尔率领的由德军与意大利军组成的集团军恢复了对北非海岸的攻势,重新发起对近东的攻击,妄图夺取亚历山大海军基地和苏伊士运河。6月,

该集团军到达了距亚历山大海军基地 70 公里处的居民点阿拉曼。致命的危险笼罩着英国的交通和能源动脉,可与斯大林格勒被攻陷的危险相提并论了。

巨大的钳子同时夹住了盟军的阵地。另外,对此还应该补充的是,德国人在海战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42 年,德国潜艇共摧毁了 1020 艘盟军的货轮,这个数字是 1941 年的两倍。“1942 年 6 月,盟军每四个小时就损失一艘轮船,而同时德军潜艇的数量却在增加。1942 年,德国损失了 66 艘潜艇,新建造出来的潜艇则是 238 艘。”(斯米尔诺夫 B. П.,《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第 197 页)

而在太平洋,美国已经完全从珍珠港事件的震荡中恢复过来了。1942 年 5 月和 6 月,美国和日本的舰队打了两场海战,一场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珊瑚海,另一场则在日美之间夏威夷群岛以北的中途岛。不过,与其说这是海战,不如说是空战,因为是舰载飞机之间的对决。在这里,日本的攻势被遏制住了。

1942 年 8 月,又一场海战拉开了序幕,并伴随着美国人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属所罗门群岛,在新几内亚以东)的局部进攻。这场海战持续了几个月,美国抢得了战略主动权。

世界的天平开始晃动,哪一方也不具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决定展开与斯大林的直接会谈,他从直布罗陀、开罗和德黑兰绕了一大圈之后来到莫斯科。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罗斯福的代表哈里曼。英国首相这段艰难危险的行程应向斯大林展现出了英国人的诚意,同时也具有双重的含义:不是从物质上,而是从精神上表达了对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同时也是想确认苏联到底稳固到了什么程度。

在丘吉尔抵达莫斯科的一个月前,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英国首相宣布,鉴于第 17 护航舰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34 艘中仅 11 艘完好),将停止向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供货,但会经伊朗的巴士拉港通过更远的线路运输予以部分补偿。

然而,丘吉尔隐瞒了另一个重要的情况,但斯大林很快便得知了此事:英国人“把为护航舰队领航的行动变成了给停泊于挪威基地的以‘提尔皮茨号’战列舰为主力的德国舰队设置圈套的行动”。(什捷缅科 C. M.,《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解放欧洲》,莫斯科,2005 年,第 24 页)

也就是说,护航舰队只是一个诱饵。结果,不是考虑被护航船队的安全,而是另有目的的英国海军高层,在德国潜艇刚一出现时便下令“巡洋舰队高速向西撤退”,而被护卫的船只则“分散驶进俄罗斯的各个港口”。

虽不清楚事态将如何进一步发展,但苏联驻伦敦军事代表团团长、海军少将 H. M. 哈尔拉莫夫还是向莫斯科作了汇报,认为英国海军部的行为完全是令人愤慨和毫无根据的。事情被报到了斯大林那里。结果,丘吉尔下令与苏联军事代表团的代表举行会谈。会议是 1942 年 7 月 28 日在 A. 艾登位于众议院的办公室里举行的。



哈尔拉莫夫得以向英方证明,第一海军大臣、海军上将 П. 庞德的行动是错误的。海军部长(海军大臣)亚历山大为自己部门犯的过失道了歉。

所以,知晓了内情的斯大林在 1942 年 7 月 23 日给丘吉尔发去了一个语调克制、但内容持批评态度的回信:

我们的海军专家认为,英国海军专家提出的有关必须停止向苏联北方港口运输军事物资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们确信,只要愿意并准备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物资运输是可以定期完成并给德国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对于英国海军部下发的第 17 护航舰队离开运输线并返回英国,运输船则散开并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独自驶进苏联港口的命令,我们的专家也认为是莫名其妙、无法自圆其说的。当然,我并不认为向苏联北方港口定期运输物资会不冒风险、不受损失。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下,没有一件重大的事务是可以不冒风险、不受损失就能完成的。当然,您很清楚,苏联承担着大得多的损失。无论如何,我都无法设想,正当苏德战场特别紧张的此时,正当苏联急需军事物资的时候,大不列颠政府会拒绝向我们运输军事物资。显然,取道伊朗港口的供给,无论如何也不能弥补因停止通过北线运输而造成的损失。

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担心对这个问题并未严肃对待。从苏德战线目前的局势出发,我必须严正声明,苏联政府不能接受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行动拖延到 1943 年。(《1941—1945 年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的通信集》,2 卷本,第 1 卷,莫斯科,1976 年,第 68—69 页)

8 月 12 日,在莫斯科,丘吉尔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

丘吉尔本人是这么描述这次会谈的:“我来到克里姆林宫,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英明的俄国国务活动家和战士。在接下去的三年里,我需要与之保持紧密、严肃的关系,这种关系总是让人感到不安,但有时也会感到亲切。”(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2 卷,第 510 页)

毫无疑问,斯大林手上握有外交人民委员部为此次会谈准备的报告。也许,其中提到了在国内战争时期丘吉尔对苏维埃俄国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但即使没有提到这一事件,斯大林本人也非常清楚他的客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1919 年 7 月,面对英国议会里议员的质询,陆军大臣丘吉尔作了如下解释:

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们要支持高尔察克上将和邓尼金将军……我非常坦率地回答议会,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俄国有些省并未参与到这一



可耻的和约中，他们举行起义反对签署了这一和约的政府。

……在我们的支持下，他们组建了军队，毫无疑问，主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钱。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援助是合理的军事策略，因为如果我们不组建起这些俄国军队，德国人就会攫取俄国的资源，从而削弱我们的封锁。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是在维斯瓦河，而是在德国人寻找粮食的地方建起了东方战线。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布尔什维主义想用武力制服那些受我们支持而起义反抗它的边陲地区。（《泰晤士报》，1919年7月30日）

而现在，代表着在很多地方与苏联利益对立一方的这位人物想使“英明的俄国国务活动家”相信，苏联必须同意再做出一次牺牲。与此同时，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其他什么人，谁都不知道在未来一个月内俄国南部和整个苏联战场将是怎样一个情况。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郁郁寡欢地听着丘吉尔的讲话，他们不得不与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说再见了。

丘吉尔强调：“战争就是战争，但不是鲁莽行事，如果挑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灾难，那是愚蠢的。”

斯大林明白，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英国人与罗斯福达成的协定了。而丘吉尔关于推延至1943年的承诺也只是承诺而已。

双方展开了不愉快的争论，但其结果已经清楚了。对于首相提出的冒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将不可原谅的论点，斯大林的回答是：“我对于战争持有不同的观点。不准备冒险的人是不能赢得战争的。”（丘吉尔 V.，同上，第512页）

但不管如何，最终还得对这次会谈作出一个总结。“会场上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丘吉尔回忆道。最后，斯大林说道，他无权要求，但是还是要申明，他不同意首相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在警告对方，在心理上他不打算让步。

不过，狡诈的丘吉尔如此巧妙地设计了会谈的议题，使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自己是不逊于斯大林的战略家，同时打消了作为与德国作战主要力量领导人的“革命领袖”在心理上的优越感。丘吉尔写道：“现在已经到了把‘火炬’行动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

这有点像战事谋划，突然间提出了对手意想不到的后备方案。

“火炬”行动计划是在北非登陆的计划，是为了保障英国在地中海和埃及的重要地位。

这时，斯大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

“此时，斯大林评估起了‘火炬’行动计划的战略优点。他列举了它的四大主要好处：第一，它能从后方对隆美尔发动打击；第二，它能震慑住西班牙；第三，它将使德国人和法国人在法国境内发生战斗；第四，它会使意大利处在直接的打击之下。



“这些出色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显示出，俄国的独裁者快速和完全地掌握了一个对他来说全新的问题。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搞清楚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在争论不休的方案，但他却能在瞬间了解了全部情况。”(丘吉尔 Y.，同上，第 515 页)

实际上，从这段描述可见，首相还是低估了我们的领袖，因为斯大林所说的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且也只停留在表面上。

多多少少还是从英国人那儿得到了点什么，斯大林对此还是满意的。谈判持续了将近 4 个小时，“在友好的气氛中”道了别。不过丘吉尔预感到，斯大林可能会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第二天，在与莫洛托夫会面时，丘吉尔警告道：“我们不远万里而来，如果斯大林粗鲁地对待我们，那就犯大错了。”莫洛托夫紧张起来，回答道：“斯大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您可以相信，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理由，他是明白这一切的。我将把您所说的转告给他。”

晚 11 点，谈判继续。斯大林交给英国首相一份关于拒绝开辟“第二战场”的备忘录。本来，丘吉尔认为这个令人不快的话题昨天就已经结束了，结果这个“很英明的人”却决定以文件形式确定自己的反对意见。(斯大林写道：“我就不谈由于拒绝在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而给红军带来的困难了，毫无疑问这还将恶化英国和所有其他盟国的战局。”(《1941 年至 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1 卷，第 74 页))

这份备忘录斯大林不仅是写给丘吉尔看的，也是写给他绝非偶然地寄予期望的罗斯福看的。很有可能，斯大林直到最后一刻还对丘吉尔有所期待，因为他知道在这种谈判中，双方都有备用的一手。但丘吉尔只有一个立场，且后来也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取得地中海的控制权，从那里经巴尔干发动进攻，以楔形攻势冲破德军战线，同时阻止苏联在东南欧和东欧地位的巩固。若是没有罗斯福，丘吉尔大概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因此，斯大林在 1942 年 8 月的这场斗争并不是毫无希望和没有实际意义的。

首相写道：在斯大林递交了备忘录后，他们又争论了 2 个小时，直到凌晨 1 点。然后，斯大林说，没有什么好再争论的了，他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意见，接着“生硬地邀请”客人们明晚 8 时出席宴会。

谈话在完全平静的气氛下结束了。

回到自己的寓所，首相向伦敦通报了谈判的情况。其中他分析了备忘录出现的原因，猜测斯大林“记录下自己的立场是为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做准备”。在展望前景时，丘吉尔写道：“这段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点不准备继续作战下去的意思，且我个人认为，斯大林深信将获得胜利。”(丘吉尔 Y.，同上，第 519 页)

想必,在得出俄国人将继续进行苦战的结论之后,首相不无担心,生怕他们会突然再签订一个新的布列斯特和约。在丘吉尔的文字中就流露出了这种担忧的口吻。

到了晚上,为欢迎英国和美国客人安排的招待会开始了。按丘吉尔的说法,政治局委员、将军们、外交官和人民委员等约 40 人参加了招待会,对他“招待得相当不错”。

一个小插曲掀起了过去的阴影,两个不可调和的敌手仿佛又透过步枪的准星瞄准了对方。

斯大林到底还是提起了武装干涉的往事。

“晚宴上,斯大林通过翻译帕夫洛夫与我进行了热烈交谈。他说:‘几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曾访问过我们。’阿斯特夫人建议斯大林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邀请他?是他领导了武装干涉。’阿斯特夫人对此说道:‘不是这样,是丘吉尔使他误入了歧途。’斯大林说:‘不管怎样,劳合·乔治是政府首脑,属于左派,他负有责任。我们宁要一个公开的敌人,也不要一个假装的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哎,这下丘吉尔可完了。’斯大林答道:‘我不相信。英国人民在危急关头可能还是会找到这匹识途老马的。’这时我打断了他,插话道:‘她说的有很多是正确的。我是积极地参与过武装干涉,并且我不希望你们有不同的想法。’斯大林友善地笑了,于是我说:‘您宽恕我了吗?’帕夫洛夫翻译道:‘斯大林总理说,这一切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情归上帝管。’”(丘吉尔 V, 同上,第 521—522 页)

过去的事情不仅只归上帝,而且也归他们自己管,双方也都明白这一点。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包含了几个层面的特殊的友好关系:最基本的是两国之间永恒的对抗,稍高一层是反希特勒的必然的联盟关系,而最上面一层则是两位有责任忘记过去恩怨的强势领袖之间惺惺相惜的好感。

8 月 15 日,他们再次会面。会谈中斯大林说:将守住高加索地区,如果土耳其来犯,也一样摆平它。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该说的都说了。

在一丝慌乱之后,斯大林用一种以前从未对英国人用过的“特别亲切的语调”说道:“您明早才动身,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喝一点呢?”

丘吉尔很有点惊喜。他们沿克里姆林宫的走廊和内广场来到了斯大林的住所(“他带我参观了自己的住所。住所中等大小,布置得简单而舒适,共有四个房间——餐厅、办公室、卧室和一个大浴室”)。

我们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打开房门,怎样把这位外国客人带进自己这个简朴的住所的。如果丘吉尔说安排给他的国宾馆“是一切按照极权国家的奢侈标准布置的”,那么对于这位领袖这间住所的描写则用了另一种形容词。

家宴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举行:主人、客人、莫洛托夫和两名翻译。斯大林自己打开了酒瓶。一开始,斯维特兰娜还露了个面。在回忆录里,她记载了这个片断:“父



亲非常热情。他处于最殷勤好客的情绪之中，迷住了所有的人……看得出来，他对丘吉尔是有好感的。”(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32—133 页)

其实，在这场晚宴友好的气氛中还有隐隐的火苗在闪烁，而且随时都有可能突然迸发，燃成大火。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斯大林“在谈到极地护航舰队在 6 月几乎全军覆没一事时作了一个粗鲁的评价”。不过这位英国人觉得还是最好不要扩展这一尖锐的话题。英国首相有些轻率地称赞起了自己那位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取得了多次卓著胜利的祖先马博罗公爵。据翻译 B. H. 帕夫洛夫证实：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带着一种调侃的微笑说，英国有着以打败了史上最具危险性的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为代表的其他更有才华的统帅。与此同时，斯大林还讲述了威灵顿公爵指挥的几场战役的细节，不仅展示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还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到了一起，因为当时这位英国军事指挥官在西班牙的行动其实就是开辟了“第二战场”。

然后，丘吉尔提起了一个有关苏联集体化的重要问题。按照丘吉尔的印象，是他自己首先提及这一极为敏感的话题的，他问斯大林是否能经受得住战争的重压，如同当年经受集体化的重压。

斯大林的回答证实了我们提出来的有关快速实行集体化与向农村供应拖拉机有着紧密相关的说法。

斯大林平静地答道：“这是有点可怕的事，长达 4 年时间。但为了避免周期性的饥荒，俄国绝对需要用拖拉机来耕地。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农业实现机械化……”(丘吉尔 V.，同上，第 526 页)

话题转变并没有让斯大林感到不安。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正确性。

大约凌晨 2 点左右，斯大林离开餐桌，到办公室收阅前线局势的报告去了。过了 20 分钟，斯大林回来了。两人开始道别。

双方都是满意的。丘吉尔满意，是因为他完成了向盟友解释为何不选择在法国登陆的艰难使命。而对于斯大林来说，尽管不是在法国，但“第二战场”总算是开辟了，而且北方护航舰队也被保留了下来。“英明的领袖”毕竟没有白白向客人施压！

他们就像两只巨兽，在探明对方的实力之后，各自走开了。

尽管互有好感，但他们之间的竞争仍在继续。很快就清楚了，“火炬”行动的利益完全压倒了北方护航一事的重要性。

总之，就连罗斯福也明白了英国首相意指何方。在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之后，是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谁将最快打到柏林，是从东边进军的红军，还是经意大利和巴尔干进发的盟军。

1942 年 10 月 23 日，盟国之间的军事大赛拉开了帷幕。这一天，执行防御隆美尔部队任务的由 B. 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 8 集团军在阿拉曼发起了进攻。英国

人各方面都超过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军队的人数是他们的3倍，坦克是2.6倍，飞机是4倍。英军的进攻势如破竹。

11月8日，“火炬”行动开始了，英美联军在M.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

11月19日，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也开始了。

此时，尚不可能得知战争将持续多久，而且在苏联、美国和英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开始意识到了未来胜利者间的竞争在日渐增长。

显然，斯大林并不信任丘吉尔。他的信件证实了这一点。1942年10月19日，斯大林在发给迈斯基的电报里写道：“我们大家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丘吉尔依然抱着让苏联战败的方针，以便以后用我们国家当筹码与希特勒或布吕宁领导的德国达成协议。”（斯大林И. В.，《斯大林全集》，第18卷，第304页）（也就是说，斯大林预计到了希特勒被替换的可能性。）

发出这样一封电报的原因是英国缩减对苏联的武器供应（由于在筹备“火炬”行动），也没有实现对柏林进行轰炸的承诺（因担心伦敦会遭到类似的轰炸）。

斯大林的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对英国与苏联之间的战略差异是一清二楚的。（1945年6月，在“二战”取得胜利之后，事态甚至发展到了英国计划把德国战俘武装起来去攻打苏联的地步。也就是说，斯大林对英国可能会与德国勾结的担心以另一种形式应验了。）

毫无疑问，英国人在运用计谋方面可是大师。在“火炬”行动计划的实施中，他们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一点。当时盟军就充分利用了投诚到他们这一方的亲德的法国维希政府官员、贝当的副手达尔朗海军上将。由于达尔朗的帮助，盟军避免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驻军的抵抗，这个希特勒的前盟友、通敌叛国分子是法国在北非行政当局的首脑。

对此，斯大林深表理解地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为达到军事目的，军事手段理应不仅仅要对达尔朗们，也要对一切妖魔鬼怪善于利用。”（《1941年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第97页）

而丘吉尔储备的“妖魔鬼怪”可要比我们的主人公多得多。我们所指的不是像倒霉的达尔朗（不久后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被枪杀了）这样的二流活动家，而是强有力的战略计谋。“英国佬”（就像革命前的俄国如此称呼大不列颠）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上发挥着主导作用。

斯大林对相关问题如何应对呢？比如对丘吉尔提出的战后重建欧洲的计划。该计划提议建立若干个联邦国家（巴尔干、多瑙河、斯堪的纳维亚等联邦），它们应该隶属于由大国组成的“受托解除普鲁士武装”的国际委员会。（丘吉尔V.，同上，第547页）



这位大不列颠的领导人想让英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得到保障，他明白，美国感兴趣的，正如 1942 年 10 月 21 日他给 A. 艾登信中所写的那样，是“瓦解大不列颠的海外帝国”。于是，他一方面要对付斯大林，同时还要对付罗斯福。

丘吉尔以极其高超的措辞向罗斯福提出把在法国北部登陆的计划束之高阁。对于这一建议，美国总统直截了当地回答道：美国人准备放弃这一计划。

斯大林现在只能指望自己、红军和美国的帝国利益了。

其实，还有一种超出了所有凡间领袖想象力的永恒力量。它的名字众所周知。在离我们所述事件整整 130 年前，拿破仑就见识了它的威力，后来亚历山大·普希金在自己的诗中对此作了这样的描绘：

1812 年的战争来临了。  
谁能来帮助我们？  
是人民的坚忍不拔？  
是巴克莱将军？  
是冬天？  
还是俄国的上帝？

在 1942 年，谁也不会想到巴克莱了，然而其他的一切却还是存在的：人民的坚忍不拔、冬天、上帝。当然，还要加上斯大林。

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高加索、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和俄罗斯中央区域获得了解放，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也被突破。苏军计划在春天道路泥泞季节到来之前打到第聂伯河。但在 3 月中旬，德国人得以重新部署，并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结果重新占领了他们一个月前丢掉的哈尔科夫与别尔哥罗德。战线僵持住了，近得能够看到对方。

那么他们看到了什么？德国人占据着他们一年前占领过的地区，仿佛未发生过斯大林格勒之围，未曾从高加索脱逃过，仿佛也没有丧失过几十万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士兵。

红军的损失同样惨重，但在战略上占据了优势。

1943 年 1 月，在斯大林未去参加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声明称：战争的目的是让德国及其盟国无条件投降。约翰·富勒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并给了希特勒额外的精神动力以进行全面抵抗。牢记着 1918 年战败重负和耻辱的德国民众势必会更支持现政权，而戈培尔则宣布进入全面战争。（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斯大林并不赞同两人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一要求将拖长战争的时间，且盟国的立场也失去了灵活性。”）（邓恩 瓦，《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第

261 页)

所以,1943年春,柏林已准备好战斗到最后,并拟定在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的突出部发动一场强攻,为此在该地集结了强大的集群,按照希特勒的话说,就是使之能够“从整体上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德国选派出了包括16个坦克和机械化师在内的50个师。德国指挥部在这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兵力,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把战状拖回到1941年。这里集中了德国在俄罗斯战场上飞机总数的63%(2000架)和坦克总数的70%(2700辆)。此外,德国新型的“虎式”和“豹式”坦克要比苏联的同类坦克强大得多。一个德国的坦克师便占据了长达4公里的战线。“无论在何地,德国武装力量从来还没有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集中过如此之多的进攻力量”。(威廉·亚当语)

不过,由于情报机关事先提供了有关情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被预先告知了这一巨大的险情。

在为打退德军的反扑(“堡垒”行动)进行准备的时候,斯大林与朱可夫之间又一次出现了争议,当然,这一次的背景与往日是不同的。起初,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打算采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瓦图京关于发动进攻的建议。朱可夫开始也倾向于这一计划,但在“堡垒”行动计划被曝光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向严阵以待的敌人发起攻击注定会使自己失败(就像1942年5月至6月在哈尔科夫发生的情况那样)。

朱可夫建议采取防御战术,在防御中打掉德军的坦克,然后调出后备的生力军,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华西列夫斯基接受了朱可夫的意见,而斯大林则长时间地,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里犹豫不决,直到最终确定采取防御战术。其实,此时大本营还不断受到来自方面军司令们的压力,朱可夫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保住了自己的计划。

到1943年6月初,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兵力已达130万人,拥有飞机3130架,近36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就在德国人发动进攻之前,即7月5日早晨,苏军抢先对他们的前沿阵地发动了猛烈的炮击。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多亏情报机关(“剑桥五杰”)摸清了“堡垒”行动开始的准确日期和钟点。这次炮击强烈震撼了德国人,关于这一点在许多回忆录里都有叙述,但均未指出是谁做出了炮击的决定。

据马林科夫儿子的回忆,马林科夫本人被斯大林派到了库尔斯克弧形圈。“大本营里异常紧张不安,会不会是给我们的情报机关抛出了‘假情报’,我们的炮火攻击会不会失算?斯大林有些坐立不安,不断打电话,让前线司令部和指挥所本来就紧张的气氛绷得更紧了。于是,马林科夫就尽量不让指挥部接听领袖这种充满可怕威胁的通话,这实际上就把火炮强烈轰击期间的全部责任承担到了自己身上。而当炮击得以实施之后,父亲就像熬过了整场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刻。甚至连飞机制造厂的危险





局势对他来说也变成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德国人是否还会发起进攻？……他们被削弱了，但仍将发动进攻！”（马林科夫 A.，《我的父亲格奥尔吉·马林科夫》，第 43—44 页）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一期间斯大林常常坐立不安，多次打电话到中央方面军的指挥所来。

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向所有人证明，苏联开始粉碎德国的武装力量了，而且或迟或早都会彻底消灭这支武装力量。德国人在坦克方面的损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希特勒的整个防御战略都遭到了挫伤，因为这一防御战略是建立在运用强大的机动力量之上的。”（约翰·富勒）

斯大林直到最后一刻还在为朱可夫的防御计划提心吊胆，并在怀疑苏联能否抵挡住德军火力的集中攻击，现在他可以庆祝一番了。是的，他曾担忧甚至是惧怕德国人的进攻，因为过去的两个夏季对红军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永远地改变了。

格奥尔吉·朱可夫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而马林科夫也表现出了毫不畏惧的坚决果断。

尽管库尔斯克会战在战略上的意义是巨大的，但它并不是斯大林在 1943 年达到的主要峰巅。主要的峰巅是罗斯福作出了惊人的让步。这一让步涉及战后苏联西部国界的划分，如果说得再广泛一点，涉及战后世界重建的问题。可以说，罗斯福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对抗丘吉尔。

罗斯福让步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和伦敦在将来的“海外帝国”问题上相互对抗，美国总统相信苏联会很快走上民主化道路，同时也担心，一旦盟国之间产生大的分歧，斯大林将与希特勒单方媾和，并将坐等英美与德日之间战争的结束。

1941 年 12 月中旬，A. 艾登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盟国应该补偿苏联损失的要求。斯大林的意思是，西方国家应该承认苏联在 1941 年时的西部国境线，其中包括波罗的海诸国，以及芬兰、波兰、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应该考虑到，在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之后，莫斯科废除了 1939 年签署的苏德条约，其中包括《秘密协定书》在内的所有补充约定。）

丘吉尔同样也拒绝了莫斯科盟友的想法，理由是必须遵守大西洋宪章。但到 1942 年 3 月，丘吉尔认为必须支持斯大林，于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此时遭到了罗斯福的坚决反对。似乎，斯大林的希望破灭了。

需要补充的是，英国人将大西洋宪章视为在很多地方不符合自己利益、是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一纸空文。所以如果不是华盛顿的原因，伦敦其实并不反对在势力范围和领土要求问题上与莫斯科达成妥协。

1942 年 4 月 25 日，莫洛托夫飞往西方准备与丘吉尔和罗斯福进行谈判。他与罗

斯福总统的会谈,从内容上来说是人意想不到的。

第一,罗斯福作出了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保证。

第二,罗斯福提议在战后除美、苏、英、中四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应进行裁军,而这四国理应承担起“世界警察”的角色。罗斯福指出,这一想法是间接针对大英帝国的。

莫洛托夫插话问:裁军是否会涉及法国、波兰和土耳其,这一提议是否是总统“经过周密考虑作出的最后决定”?

罗斯福对这两个问题均给予了肯定回答,并解释道:强制性裁军理应代替政治势力均衡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

这是彻头彻尾的对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而罗斯福邀请斯大林加入其中(直接地,不经过丘吉尔),莫洛托夫大喜过望。

第三,总统说,包括大英帝国在内的欧洲所有帝国都应该被拆散,并称帝国主义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要知道,斯大林也同样认为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根源)!

第四,罗斯福承诺将保证苏联战后的安全,并建议与斯大林在阿拉斯加举行私人会晤,以巩固两国的新型关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第二战场”不管是在1942年,还是1943年都未能开辟,但由于罗斯福的立场,丘吉尔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影响被大大削弱了。

在美国,存在与总统不同的立场吗?不仅存在,而且表述得相当明确。

1月29日,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自己做出的关于斯大林政策的报告。为了阻止苏联势力渗入欧洲和亚洲,布利特提出了若干建议:改变军事战略,集中主要力量对日本进行打击;与英国一起对抗斯大林,并组织对巴尔干和黑海进行武装干涉;赶在红军之前占领中欧和东欧;迫使苏联立刻对日出兵;把建立战后民主政府列入计划;缩减对苏联的军事援助,以承诺帮助其进行战后重建来迫使斯大林予以合作。

罗斯福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当然,他并不是斯大林的无条件支持者,只是苏联和美国之间不存在竞争,而这一点非常重要。

1943年3月,罗斯福告知艾登,自己的立场发生了原则性的改变。现在,他认为“寇松线”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波罗的海诸国应该并入苏联,但“要在全民公决之后”。

除此之外,罗斯福还向苏联特使A.葛罗米柯重申了与斯大林会晤的必要性:在会晤时领土问题也将得到讨论。

罗斯福对会晤的渴望甚至没有受到4月中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发现了埋葬着数千名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坟墓一事的影响。这些坟墓是撤退到这里的德国人发现的。他们声称,枪决行动发生在德军占领该地区之前,应归罪于苏联。而莫斯科



则指控德国当局应对此负责。这一事件影响深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事展开独立调查。但在这一地区仍处于沦陷的情况下，展开这样的调查是不可能的。事件最终以莫斯科与波兰政府断交收场，而罗斯福与丘吉尔则指责波兰政府的行动是对盟国的不忠不义。“哈里·霍普金斯厚颜无耻地指责了波兰人，称他们是受到‘波兰大地主’影响的扰乱分子，只不过是生怕自己的广阔领地落到俄国人手里”。（邓恩 兀，《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第 277 页）

今天人们普遍认同，而且以 M. C. 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也承认，对波兰军官的处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莫斯科领导人的指示执行的。

在华沙和莫斯科几个世纪以来的对抗中，波兰人始终都是牺牲品。这些对抗留在俄国人记忆中的是 1612 年的混乱期，是波兰人对莫斯科的占领，是发生在乌克兰的殖民战争，是拿破仑入侵时波兰人的助纣为虐，是苏波战争，是关押苏联战俘的死亡集中营，是毕苏斯基奉行的武装对抗苏联的政策，还有就是 1939 年波兰政府甚至不愿与苏联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卡廷的坟墓，是这一连串悲剧的纪念碑。而这样的悲剧，在西方与俄国交界的领土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不过在 1943 年，美国的政坛精英还是选择了忽略此事。1943 年 5 月，罗斯福派自己的亲信、前美国驻苏大使约翰·戴维斯前往莫斯科访问。戴维斯在临行前着重强调了卡廷事件，指控德国人进行了屠杀。

## 第二十三章

# 斯大林向盟国提出新的世界地图

斯大林向盟国提出新的世界地图、  
德黑兰会议、斯大林以苏联退出战争恫  
吓丘吉尔、在德黑兰取得胜利

5月20日，斯大林接见了戴维斯。戴维斯证实了美国总统想与之亲自会晤的建议。在提到丘吉尔时，这位客人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不同的概念。”

但斯大林对这种会晤是否能够取得成果表示怀疑，因为按他的话来说：“仅有相互谅解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彼此互信和尊重。”

也就是说他在向戴维斯施压，就像那时他向艾登施压，说苏联必须得到补偿那样。

那么斯大林达到目的了吗？

如果将德国的未来、赔款、军事基地这些问题放到一边，斯大林达到了以下目的：在芬兰、波兰和保加利亚成立独立政府，并扩大这些国家的领土；

“让所有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拥有一个在没有外来压力影响下自己选出来的政府”；

苏联需要拥有通往南部海域的入海口，而在它的西部边境，则需要友好的国家。

换言之，斯大林想取得对芬兰、波兰、保加利亚和海峡地区的控制权，即确保整个西部边境的安全。



斯大林还对戴维斯表示：“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并请求美国增加武器供应。

在会谈即将结束时，戴维斯提出两条也许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政治建议：如果能够解散共产国际和表现出对宗教的宽容，那么苏联在西方的形象就可以大大改观。

这位客人触动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原则，仿佛在问斯大林是否为获得未来的利益而有所付出做好了准备。

不管是多么不可思议，很快共产国际就被解散了。又过了3个多月，在斯大林会见了俄罗斯东正教都主教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了最高会议，并选出了大牧首，教会组织得到了国家空前的支持。

斯大林这是怎么了？

其实，他只不过是强化了苏联国家生活中业已成熟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为国家及其安全赢得发展的较好条件。

如果共产国际自己取消了“世界革命”的口号，代之以反希特勒的团结一致，那它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教会已经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为取得胜利而工作，从组织游击队、进行敌后侦察到出资制造飞机坦克和照护伤员，那坚持消极的、受国家操纵的无神论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斯大林知道，民间有一种传说，说他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下令让飞机载着弗拉基米尔的玛丽娅圣母像在首都上空环绕飞行。当然，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但毕竟反映出了对教会态度的转变：早在1941年9月，“无神论斗士联盟”就已经被解散了；1942年，阿列克西都主教和尼古拉都主教被邀请加入了调查德军罪行的委员会；而11月9日，《真理报》甚至刊登了谢尔吉都主教发给斯大林的贺电：“我向您这位上帝选中的领袖致敬……您将带领我们走向胜利，走向世界的繁荣和人民的光辉未来。”（韦尔特H.，《苏维埃国家的历史》，第320页）

不过，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紧盯着民众动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1942年初便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关于希望恢复大牧首制的报告。这一建议与两个情况相关联：德国当局企图在其占领区选出一位大牧首，而教会本身却是持爱国立场的，同时还考虑到了民众不断增长的信教倾向。但因为德国人的企图未获成功，而整个1942年斯大林又异常忙碌，虽然契卡人员的建议得到了赞同，却被推延，等待最佳的时机。而现在，这成了与罗斯福对话中一张附加的王牌。

回到华盛顿的戴维斯马上向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报告了谈判结果。他说：应该对苏维埃联盟予以信任，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思想，他在苏联经济中恢复了追求利润的促进因素，现在他已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了。

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而斯大林准备与之会晤的消息也同样令人愉快的。

原因在于，罗斯福与丘吉尔刚刚结束了会晤，并在会晤中与军方一起制定了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丘吉尔坚持开辟地中海战场，以打垮意大利；而罗斯福则坚持通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在西西里岛登陆，攻打意大利，然后在大约 1944 年 5 月再通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要是英国人还继续固执己见的話，那美国人已经准备好采取果断的步骤，停止自己在欧洲的一切军事行动去集中兵力对付日本。霍普金斯指出：“我们只需打起行囊，把英国人单独留下来，而我们将在太平洋地区的东南区域作战。”（邓恩 D.，《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第 286 页）

在这次会晤中，罗斯福做出了与英国人分享所有核武器资料的決定，这些资料对于包括俄国人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仍是保密的。（苏联从 1942 年起就有针对性地开始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同年 9 月 28 日国防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组织对铀进行研究工作》的决议。1943 年 2 月 11 日，在斯大林接见了物理学家 И. В. 库尔恰托夫之后，国防委员会下令成立了以 И. В. 库尔恰托夫为首的俄罗斯科学院第 2 号实验室，以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登陆法国的行动被推迟到了 1944 年，这一消息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他在 1943 年 6 月 24 日写给丘吉尔的信中声明：“苏联政府不能容忍类似这种对苏联在抗击我们共同敌人战争中根本利益的漠视。”用斯大林的话就是：“这不只是让苏联政府感到失望的问题，而是保持对盟国的正经受着严峻考验的信任的问题。”

简而言之，斯大林在指责丘吉尔的虚伪和狡诈。

丘吉尔的确被刺痛了。在一封写给内阁成员的信中，丘吉尔谈到了斯大林的尖刻，以及他恶劣的脾气和粗鲁做派。而罗斯福对此的反应则要平静得多，他明白，斯大林已经看穿了英国人的把戏。

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最终还是決定把即将与斯大林会晤的消息通报给英国首相。6 月 24 日，哈里曼在伦敦完成了这一工作，不过他把“箭头指向”了斯大林，说这是斯大林提出的建议。丘吉尔感到非常难堪，他有可能失去自己作为独立玩家的重要角色。但他能拿什么去反对呢？如果他可以与“英明的领袖”会晤，那么罗斯福为什么不可以呢？

不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单方面会晤最终未能实现。库尔斯克战役开始了，这拴住了斯大林两个月的时间，而此后则在军事上出现了新的现实情况：这一次苏联明显战胜了德国。

斯大林拒绝了在阿拉斯加的会晤，因为在那里他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于是他提议在德黑兰举行会谈。不过这一次，丘吉尔也将作为第三方出席会晤。

为了给美国驻苏联大使造成一种相应的感觉，1943 年 8 月 1 日，斯大林出乎意料地起程去了前线。斯大林是在贝利亚和加强了警卫的护送之下，乘着一辆不起眼的列车抵达格扎茨克市的，为了伪装，列车还拖着装有木柴的敞车。就在格扎茨克这



个距当时居住着未来的世界第一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此时还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不远的城市里,最高统帅会见了西方面军司令员B. П. 索科洛夫斯基。过了一夜之后,斯大林动身前往勒热夫,这里是叶廖缅科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的所属区。到达目的地后,斯大林在霍罗舍沃村边的一间农舍安顿了下来。据他的警卫A. T. 雷宾说:正是在这里,最高统帅下令起草了一份关于为纪念夺取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而首次在莫斯科鸣放礼炮的命令。在会见过加里宁方面军的司令员叶廖缅科等指挥人员之后,斯大林于第二天乘汽车回到了首都。

很难说斯大林究竟有多大必要需要离开莫斯科。想必,这样做是为了给不愿兑现5月份对戴维斯作出的可以与罗斯福在阿拉斯加会晤的承诺找一个借口。1943年8月8日,斯大林致信罗斯福说:“在目前苏德战场的紧张局势下,我不得不经常亲自到前线的各个地区,而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于前线的需要。”(《1941年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第78页)

结果,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单独会晤到底还是未能举行。

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事虽未果,缘分尚存,因此罗斯福走出了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是极其草率的一步。为了彰显自己的诚意,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同意承认苏联在1941年拥有的包括波罗的海诸国在内的西方边境线。这样一来,苏联与盟国关系中的这一本应针尖对麦芒的主要问题,就在这种友好的基础上解决了。

联盟在一起的三巨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转变。在魁北克会议上,丘吉尔向哈里曼指出:“斯大林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将来会有大麻烦。”(邓恩 П.,《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第310页)

这话其实是说给罗斯福听的。那么罗斯福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妻子似乎表达出了他的看法。在与丘吉尔会晤过后,罗斯福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丘吉尔富有魅力、热情洋溢,本性也非常纯真。不过,最实质的一句却是:“但我不希望由他来制定和约的条款或是在生活中不停地重复它们。”(邓恩 П.,同上,第310页)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是丘吉尔与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艰苦奋斗的产物。在此之前,这两位西方领导人已经与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了会晤。斯大林为了避开蒋介石,并未派莫洛托夫前去参加,生怕因此而得罪日本。

在开罗,丘吉尔试图与罗斯福达成在今后的谈判中共同对付“约大叔”(他们之间是这样称呼斯大林的)的协定,但罗斯福为了不引起自己莫斯科伙伴的猜疑,回避了这一话题。当然,丘吉尔明白,美国总统自有打算,而且并不想摊牌。

在德黑兰,斯大林为罗斯福安排了独一无二的接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国情报机关促成的。德国情报机关准备在这里实施一次旨在刺杀或抓获“三巨头”的行动。领导这一行动的是德国著名的破坏分子奥托·斯科尔兹内,正是他解救出了被废黜



和拘禁的墨索里尼,并将其送到了德国。但在伊朗,斯科尔兹内可没那么走运了,他的行动小组被苏联情报机关粉碎,不过他本人还是得以逃脱。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德国人还动用了强大的情报网络,而且德国间谍甚至企图收买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德黑兰的唯一一位牧师米哈伊尔神甫,要给他 5 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这位神甫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居住在伊朗了,并且对苏联也没有什么好感,但他还是向苏联驻伊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报了德国人的阴谋。

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出示了被抓获的德国间谍,并建议美国总统不要下榻在距苏联和英国大使馆有 1 公里之遥的美国大使馆,而是安顿到有三重步兵和坦克围护、且与英国大使馆毗邻的规模庞大的苏联大使馆内。丘吉尔同样赞成斯大林的提议,于是罗斯福也就同意了。可以这样说,阿拉斯加会晤挪到了德黑兰。

为了使公众视线无法窥探到“三巨头”的行踪,工作人员还在英国使馆和苏联使馆之间用帆布搭建起了一条通道。

美国人被安顿到了事先安装了窃听装置的众多大房间里。此项工作是由贝利亚负责的。他是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什捷缅科一起飞来的,但并未列入官方代表团的名单中,因此没有外人知道他的存在。

这里无需夸大传声器和录音机的作用,因为与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战果不同的是,斯大林在德黑兰取得的主要外交成就仰仗于罗斯福。美国总统和苏联领袖都认为,在地中海这个舞台上,除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霸王”行动)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格格奇科里当时是一个 19 岁的中尉,参加这一行动的技术保障工作。他证实说,斯大林每天要花一到一个半小时研究监听来的材料,甚至还问他这位懂英语的中尉,从罗斯福或丘吉尔的口气中,是否能听出他们有无在所讨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准备?

在丘吉尔的回忆录里对争辩的白热化作了描写。斯大林明确指出:“意大利不是进攻德国的合适战略基地,阿尔卑斯山构成了障碍。”对于进攻,唯一合适的地方是法国北部。这是第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丘吉尔没有拒绝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想法,但开始分析地中海计划的前景,并提议成立一个技术分委会,让该委员会负责研究路线和方式、情况和数据,并向会议提出报告。

于是,斯大林提议发动一场经法国南部的配合性战役。英国人的提议被斯大林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了。

罗斯福则表示:在地中海东部的任何战役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将推迟“霸王”行动的实施。也就是说,丘吉尔落了单。

午饭后,丘吉尔提议讨论一下“波兰的问题”,其中说道:对于欧洲这个交响乐队



来说,“强大的波兰”是必不可少的。丘吉尔的提议体现了英国一贯的在欧洲大陆构建平衡的政策。既然德国必然要被分割,而法国在维希政府成立之后已跌出了势力中心,那么也只剩下波兰了(就像 1920 年法国建立大波兰国以对付德国与苏维埃俄国一样)。

与会者时而活跃时而尖刻地交换着意见。英国人提出沿奥得河来划分波兰的西部边境,也就是说将攫取德国的部分领土。斯大林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明白,这样一来,苏联将可以按“寇松线”得到领土补偿了。

很快,波兰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斯大林表示他不愿和与德国政府勾结在一起的波兰流亡政府共事,并坚持要遵守 1939 年时的边界线,因为“这条边界线从种族的观点来看是公正的”。

这时,艾登问道:“这是否就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线?”

斯大林明白对方是想挑起事端,平静地回答道:“您想怎么叫都行!”

莫洛托夫将这条边境线称为“寇松线”,而艾登再次反驳说“这有着本质的区别”。

丘吉尔拿起地图,并在上面指出了“寇松线”和 1939 年时的实际边界线。

艾登在一旁解释说:“寇松线”的南端从来就没有明确过。也就是说,他要从苏联手上夺走利沃夫!

美国人同样也拿出了自己的地图,大家都站起身来盯着地图看。

艾登进一步说道:“寇松线”应该在利沃夫以东经过。

此时,从任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时起就“爱上”波兰话题的斯大林平静地指出:英国地图上的“寇松线”标得不对,利沃夫理应在俄国一边,边境线应向西朝佩列梅什利方向延伸下去。

正是在这里展开了那段著名的争辩。

“利沃夫从来都不曾是俄国的城市。”丘吉尔说道。他指的是从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上看,这座城市的确曾属于奥匈帝国。

“但华沙曾经是。”斯大林回答道。所有人都明白他在暗示什么。

莫洛托夫拿出了自己的地图和 1920 年寇松电文的复印件。复印件上写有按种族原则划分俄国和波兰边界线的建议,并列出了各个居民点的名称。

丘吉尔说他无意“因为利沃夫的问题而挑起争论”,并在斯大林拿出了按奥得河确定波兰边境的新证据之后,安静了下来。

对于芬兰边界问题的讨论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不很激烈。丘吉尔生怕俄国人会吞并整个芬兰,但斯大林向他保证不会这样做,“只要芬兰人不逼他这样做”。英国人建议斯大林放弃要求“割地和赔款”的政策,对此斯大林回答道,他已经成为保守分子了。言下之意,这些革命口号对他已经不起作用了。

斯大林不打算放弃对战争损失的赔偿要求,而丘吉尔却千方百计地劝说他放弃

这一要求。

此时会谈涉及了领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主人公丝毫不打算作出让步，但同意用佩察莫(今佩琴加)来替换波罗的海的汉科岛。

“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罗斯福说。他明显站到了斯大林一边，因为忠诚于自己反帝国主义、反大英帝国战略的他，首先考虑的是不让丘吉尔取得欧洲的领袖地位。

这里还有一段火药味很浓的对话。丘吉尔说：“我们不愿对俄国施加任何压力。”

斯大林捕捉住了这微妙的弦外之音，回答说：“如果到了那一步，盟国要是想干的话，那就可能会相互进逼。”

最后，斯大林终于厌烦了丘吉尔对他的计划进行干涉的显而易见的意图，警告道：如果芬兰人不能支付约定的赔款，那么他将占领该国的一个地区，直到他们支付赔款为止。

这时，丘吉尔表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他指的是5月份的“霸王”行动。难道英国人还能破坏这一行动不成？

丘吉尔多半只是想摆脱眼下的窘境。不久前他与斯大林在苏联驻德黑兰的大使馆举行了私人会晤(罗斯福不在场)，正是在那次会晤时，斯大林把他置于了这一窘境。看来，斯大林在准备这次会晤时，已决定利用一下盟国一直以来的顾虑，即害怕他有可能与希特勒签订某种折射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影子的单方协议。没有任何情报显示斯大林和希特勒有可能会达成这样的协议，但伦敦和华盛顿却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因为在他们自己的政策里也含有柏林发生反希特勒政变和与德国新领导人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应该可以推测到，在丘吉尔(或罗斯福)在苏联大使馆房间里的谈话录音中，记录下了英国首相有着这样的担心：斯大林在保障边界线保持在1941年状态的情况下，突然作出停战的决定。在1812年的战争中，在库图佐夫的司令部里就有过类似的讨论。所以说这是有先例的。

当斯大林注意到，丘吉尔又一次强调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行动的困难时，就提醒丘吉尔考虑一下红军因此可能产生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将很难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军队已经疲倦了，会产生一种“孤独感”。

这是一记重拳。

丘吉尔急忙向对话者保证，“霸王”行动将如期举行。

但如果认为斯大林知道盟友们对其单方媾和的担忧，那么他也应该知道另外一个情况：罗斯福已下定决心在1944年5月实施“霸王”行动。也就是说，他对丘吉尔的威胁，不过是给自己这位常常脱逃的伙伴施加一点额外的压力。

德黑兰会议的结果对苏联来说简直是理想极了：

“霸王”行动预定不迟于1944年5月实施；



确认了与波兰、罗马尼亚的西部边界和波罗的海诸国并入苏联；

承认了苏联和芬兰在 1940 年的边界线；

承认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并入苏联。

与此同时,苏联也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的 3 个月后将开始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

斯大林满怀热情地接受了罗斯福的这一建议,同时要求作为交换条件至少应废除 1905 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这意味着将萨哈林岛的南部、千岛群岛和在中国的特权这些俄国在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所有东西都要了回去。

(这样一来,罗斯福在东方确保了美国对原英、法、荷殖民地地区的完全控制,至少他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如果算上亲美的蒋介石,那么在战后,全世界就理应由美国和他的两个小伙伴苏联和英国一起来统治了。)

当然,斯大林不知道的是,这位在对付“英国斗犬”的立场上与他团结一致的罗斯福也做出计划,决定由美国军队来攻占柏林,到那时,和约的条款就由美国来主导了。

1943 年行将结束。在我们的主人公的命运中,这一年可称得上伟大的一年。这一年,他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号人物,就连美国《时代周刊》杂志都把他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苏联也与美国结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同盟。

从德黑兰回来的路上,斯大林来到斯大林格勒。在这座城市里,他看到了废墟和损坏的德军武器装备,还去了保卢斯的司令部。大街上堆积成山的德军头盔引起了他的注意。看着这些头盔,斯大林说道:“哎,无能的征服者……头上还戴着头盔呢!我们将建起一座比以前更漂亮的城市。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我们什么都干得成!”(雷宾 A. T. ,《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第 37 页)

在德黑兰,盟国建议把这座已成废墟的城市作为会战的纪念碑保存下来。而斯大林却要把它搞成一个更具乐观主义性质的纪念碑。

## 第二十四章

# 斯大林回归伙伴关系

斯大林恢复大牧首制、克里姆林宫的  
内部斗争、马林科夫的高升、限制党的  
机关的权力、民族主义在各共和国抬头、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

1943年9月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谢尔吉都主教（莫斯科）、阿列克西都主教（列宁格勒）和尼古拉都主教（乌克兰），表示政府希望恢复大牧首制。对于宗教界提出的所有建议，斯大林均表示了同意。9月5日，《消息报》刊登了斯大林会见三位都主教和教会即将召开宗教会议选举大牧首的消息。两天之后，教会召开高级僧侣会议，莫斯科和科洛姆纳都主教谢尔吉（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戈罗茨基，1867年生）被选为牧首。

乍看上去，这件事所涉及的只是苏联的内政（顺便说一句，1943年10月，在塔什干成立了穆斯林中央管理局）。

的确，事件确实是这样的：“二战”时期的苏联社会在爱国主义和捍卫祖国独立自由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政治和思想上的监督控制有所减弱。从1941年8月开始，“所有在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的人”都被吸收入党（战争时期共有400万人入党，多数为前线战士）。爱国主义显得比阶级立场更重要。正是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国内战争带来的分裂被遗忘，结果是，斯大林作为人民公认领袖的地位得到了合法化，成了俄罗斯民族复兴的象征。



不过，在恢复大牧首制时，这位过去梯弗利斯神学院的学生将视线投向了国境线之外。红军已逼近欧洲，信仰东正教的民众理应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强烈信号：第三罗马的历来传统并未成为过去。

社会基层的变革要求管理构架同样发生改变。在军队里，“近卫军官们”让位给了经过专业训练的将领们；在经济领域，受到政治提拔的人悄悄地把领导权交给了工程师们；而在各级党委，像马林科夫这样的管理者被提拔了上来。斯大林先后把马林科夫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到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这并不是偶然的（1942年夏，斯大林还把贝利亚派到了重要性不亚于斯大林格勒的高加索前线）。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甚至不以我们主人公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事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阶层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些“属于上帝”的东西理应成为历史，而某些新的东西将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在一些决议中可窥一斑。

1943年4月14日，一个独立的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分离出来了。其实在1941年，就已经成立过一个类似的人民委员部，但此后又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了，而现在新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则不具备监控军队、调查军人的重要功能。

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从这时起，特别处室管理局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撤销，改组成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军事反间谍总局（“锄奸局”）。“锄奸局”的局长B. C. 阿巴库莫夫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并只听命于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

隐藏在这一决议之后的，不仅是我们主人公想让军队摆脱政治影响的愿望，还有军方将领威信提高的因素。斯大林通过这一举措使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摆脱了贝利亚的监视。

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令人奇怪，但战争并未让克里姆林宫萌生出新的趋势，只不过是激化了原有的东西，并使之浮到了表面。甚至就连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只是因为世界革命思想的枯竭造成的，而相应地，克里姆林宫需要以一种新的参与方式来捍卫自己在国外的利益。全球的国际斗争向苏联内部和激烈交锋的苏德前线的转移，使得斯大林无需再紧抱着实质上是十月革命成果的共产国际不放了。现在，他已经可以直接对国外的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关系施加影响，所以斯大林很轻松地与这个全世界共产主义的组织作了告别，他在其中只不过排在这些平起平坐领导人的最前面罢了。

这一趋势还在更早之前便对国内事务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1942年10月9日（斯大林格勒会战最激烈的时刻！），斯大林通过政治局做出了在军队中废除政委制的决定；1943年3月24日，又通过国防委员会作出了在步兵连、炮兵连和航空大队取消从事政治工作的副指挥员的决定。与此同时则建立了新的制

度,在旅、师、军和军事学院设立了政治部主任。一大批军队政治工作人员(12万人)转为指挥员,有3000人转到了“锄奸局”。

这种整顿和缩减党政干部(通常是不称职的)在专业管理问题上进行干涉的路线,很快就被马林科夫运用到了人民委员部一级:铁路、河运和海运、农机站和军事工程建设管理。早在1939年3月,就已经计划要取消这些已经脱离了当地党组织监督的临时机构。

马林科夫走出的第二步是,政治局在1943年8月6日(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做出了对地方党组织进行整顿的决议。这一决议的实质就是削减书记的数量,把监督工业、农业和交通的行业书记降至副书记和部门负责人的地位。从这时开始,这些书记就不再监管企业的日常工作,而只是这些企业里负责从事宣传和党组织工作的党的机关的领导。这样一来,就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经济工作受到不合理干预的可能性。

8月6日,政治局做出决议,马林科夫被正式确认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责成他负责“处理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及检查他们的工作”,直至可以采取“实际措施纠正所发现的不足和改善地方党组织工作”。从此,就应该由马林科夫来主持书记处和组织局的会议。在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去参加德黑兰会议时,他被留下来“看家”。1943年9月,马林科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他的高升意味着沃兹涅先斯基地位的再次下降。

在马林科夫的经历中,发生过一件能够说明这位政治家的思路和性格的意味深长的事情。那已是1957年,他已失势,被赫鲁晓夫发配到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当站长。1958年冬,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燃料告罄,不过还有一条出路——在站坝的上段还留有未用的15米高的水源储备,这足够使水电站脱离目前的危机。但这样会冒极大的风险:如果来年的春汛迟来或较小,水电站就要停止运转了。决定将由马林科夫做出。在下决心之前,马林科夫让人找出了在革命前就流放到此服役的另一名波兰族政治失势者所登记下来的每年的气象观测记录。马林科夫在研究了这位不为人知的同僚在流放时所写的日志后,发现了春汛强弱轮换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判断,来年春天将是一个大汛期。于是他泰然地下令打开闸门,危机渡过去了。春天到了,正如期待的那样,大量的流水如期而至。

在我们已知的飞机制造厂中断生产的那个事件中,就已经表现出了马林科夫这种敢作敢为和深思熟虑的作风。他那种工程师的头脑总是能够让他作出正确的决定。

马林科夫按父系是一个贵族,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参加了在土耳其斯坦的国内战争,并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瓦列里娅·戈卢布佐娃,而她的姨妈就是列宁的战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领导人Г. М.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妻子。





此后马林科夫就读于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并当选党组织的书记。尚未完成学业，马林科夫就被中央委员会录用。凭着自己完好的履历，他快速得到了提升，并开始负责挑选有工程师教育背景的人参加工作。他在党的领导机构局的基础上建立了人事局。这个局管理的不仅是领导干部，还有所有普通干部。他建立了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帝国，把技术型的人安排在各个岗位上以取代知识不足、不能胜任的党的老一代干部。1941年2月15日，在联共(布)十八大的报告中，马林科夫号召与那些摆着无产阶级架子的“不学无术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用“新人、行家里手”来代替他们。

1944年初，在预先得到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的支持之后，马林科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地方上的国家机关加以改善”的决议草案。该决议旨在巩固已经出现的国家管理中去党化的成果。

马林科夫对局势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们地方上的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经济部门的业务管理工作，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党和国家机关职能的模糊不清，造成了国家机构的越俎代庖和无人负责，造成了他们责任心的动摇，并助长了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由于党和国家机关职能的模糊不清，党外人士经常不知道他们该找谁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苏维埃机关执委会的领导人员不是自己解决问题，而是看州委和党机关的脸色行事，等待他们就每一件事作出专门的指示。党和苏维埃机关关系中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也造成了地方党的领导某些不负责任的现象，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对共产党员和党组织负责，而对党外人士却并不负有责任。

“在组织方面，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在工作中的这些不足导致了它们之间领导人员的不合理配置。在党组织里集中了更有权威和经验的领导人员，而相应地在苏维埃机构里领导干部力量也就比较薄弱，这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上述不足。这种领导力量的不合理配置也就导致了在现阶段，如果不治理这一严重的组织缺陷，就无法把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提升到完成苏联国家当代使命的高度上来。”(茹科夫 Ю.，《斯大林：政权之谜》，第206页)

马林科夫提议：党的机构只负责党的事务而不要干涉国家和经济事务；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州委、市委和区委的第一书记成为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相应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委会的领导人(这样一来，党的机关一部分就成了国家的机关，而另一部分就只从事政治教育和宣传等工作)；废除党内一些分管行业的部门。

马林科夫还建议，被称为“引导者和组织者”的党的宣传员理应转入人民委员会的政治部。很难说这一举动将会导致什么结果。但多年之后，苏共中央最后一位总书记 M. C. 戈尔巴乔夫决定实施类似的措施，而他这种将党从国家政治体系中撤离出来的做法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但在1944年，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安德烈耶夫支持的马林科夫的

这一草案，却遭到了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可能还有贝利亚的反对。按照历史学家尤里·茹科夫的观点，改革造成了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这样的人脱离权力机构的危险，“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若在党外，只在国家机关里，不可能让他们这些人长期占据高位”。

这份决议的草案最终还是从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消失了。而且，1944年1月29日，政治局还否决了马林科夫的另一提议——将乌克兰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白俄罗斯党的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分别调任至相应的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

国家这两大权力机构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苏联和苏共存在的最后一刻，这种对抗时而激烈，时而缓和。战争年代势力得以扩大的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加剧了这一矛盾，尽管斯大林竭力想把这个跑出来的妖魔塞回瓶子里，但这种矛盾却变得越来越尖锐。

如果再加上在各共和国里民族主义的抬头，那么，苏联社会的全景画就一目了然了。

尽管苏联宣传的各民族团结的理念在战争时期得到了巩固，但实际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也不可能很快就得到完全改善。德国人也像一战时那样，利用了民族的因素来对苏联进行破坏活动。

随着德军的步步侵入，苏联一些地区掀起了武装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在车臣-印古什，这种斗争早在1941年夏天就已经爆发）。从1942年起，德国占领者便开始把苏联公民整编成军队，成立了党卫军第14乌克兰师（“加利西亚师”）、第15立陶宛师、第19拉脱维亚师、第20爱沙尼亚师、第29俄罗斯师（弗拉索夫将军的“俄罗斯解放军”），还有由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和中亚（“穆斯林地区”）的突厥居民组成的第162步兵师，以及第1和第2哥萨克骑兵师。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军专程来到了顿河地区，并把哥萨克人组织了起来。原来，这个国内战争的积极参与者，从那时起就认定了要与德国合作的克拉斯诺夫在召唤内战的亡灵。

看到这些，斯大林无疑回想起他在苏联民族制度问题上与列宁的争论，因此解决的方式是非常激进的。1943年5月5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M. A. 苏斯洛夫向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И. И. 马斯连尼科夫提出了“以行政手段迁出”投德叛变分子的家庭成员的建议。于是，从1943年9月开始了对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的驱逐。在解放了克里米亚之后，又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进行了驱逐。驱逐行动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来完成的，执行得快速果断。这些被迁出者被运到了哈萨克斯坦，在那里他们被安置在农村地区，给予了落户和从事农活的条件。与此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撤销了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和克里米亚三个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



治共和国改名为卡巴尔达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自治州更名为切尔克斯自治州。

这些决定是受战时情况的制约而作出的，并迟早会结出苦果。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在重建世界的总的进程中，任何与希特勒分子的合作都将被视为与毁灭和邪恶力量的勾结，并将激起残酷的反击（要提醒一下，美国就把数以万计的日裔公民拘禁到了集中营里）。

与此同时，斯大林再一次面临着要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实质上是单一制国家的联邦构架问题。他理应考虑到返回自己曾经有过的想法上：建立一个人民有着广泛文化自治权的统一国家。也许，他还真能回到这样的国家构架上，如果不是这时成立了联合国的话，苏联就会处于反对西方各国及其盟国的孤立之中。

赋予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地位，并以此在联合国里获得额外的发言权的想法是属于莫洛托夫的。这一想法似乎是很正确的，谁也没有注意到其中隐藏着危险，连斯大林也没有注意到。反正“自治化”的想法刚在撤销和改造几个共和国中冒出苗头便石沉海底了。但从这一时刻起，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便深陷其中，再也不能以各种手段打击民族主义，而且还不得不向西方证明各加盟共和国具有自己的主权。如果从1944年2月起，各共和国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成为国际法主体的权力已经得到了法律承认的话，怎么还能去与这种趋势作斗争呢？

1944年1月1日，代替了《国际歌》的苏联新国歌就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伟大的罗斯永远团结成了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

不过，由莫斯科提出的在各民族共和国加快科学院、电影制片厂、歌剧和芭蕾舞剧团等建设的倡议也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因为这人为地、过早地培养出了并不具有统一国家思想的民族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同意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作出的结论：“一个教育程度不够、没有应有的专业阅历、不拥有任何现实成就的民族要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就只能严格遵守一个必备的条件：为自己创立并采用一个特殊的、与普通尺度相比显然要低的评判标准。而这一切只有在各加盟共和国里，在损害全国性俄语的地位而承认其民族语言具有实际优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无疑就排除了进行公平、客观比较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不可避免，甚至顺理成章地成了滋长民族主义的萌芽，助长了离心力，暗中削弱了苏联统一和稳固的温床。”（茹科夫 IO.，《斯大林：政权之谜》，第219—220页）

这样一来，“伟大的罗斯”就繁殖出了自己创立的国家的反对者，把自己赶进了民族主义的胡同里。需要强调的是，她也在怂恿俄罗斯民族主义。

还有一个民族问题，这就是犹太问题，此时被斯大林作为“秘密武器”利用了。众所周知，在苏联的精英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托洛茨基失势和1937年的一系列政治审判之后失去了自己的影响，但有很多人还是满怀信仰和真

心实意地在为现行体制效劳。在其时的部队中，他们占据的位置远非最后一名：有 270 位将军是犹太人，而在 1943 年 1 月 15 日，被授予勋章和奖章的犹太人数也排在了第四位，仅次于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战争初期，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对犹太知识分子中提出的利用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影响的犹太人士来帮助苏联的想法持肯定态度。当时，从苏联所有民族中单独挑出一个民族，并授予这个民族的代表们以特殊的职能，并没有让人感到其源自民族主义的做法。1941 年 8 月，召开了“犹太人代表广播大会”，在美国和其他盟国进行了转播。参加广播大会的有 C. 米霍埃尔斯、П. 马尔基什、И. 爱伦堡、С. 马尔夏克、С. 爱森斯坦等。这次大会的成绩是巨大的：在西方陆续成立了各种为红军筹措资金的犹太组织。于是，克里姆林宫也就更加坚定了必须在苏联建立一个常设的犹太人委员会的想法。

这一想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建立了犹太自治州，“这是通过建立这种独特的屏障来加强在远东地区的边防军管制，而绝非建立犹太国家的一步措施”。（苏多普拉托夫 П.，《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 年）》，第 462 页）

这一想法是属于斯大林的，它包括在中国和白卫恐怖分子的通道上设立“以居民点为形式的屏障，而这些居民应是那些敌视白俄，特别是敌视哥萨克人的民众”。

以反犹太主义作为国家意志的希特勒德国的侵略，促使苏联回到了再建一座“比罗比詹城”的策略。

1939 年的 9 月至 10 月，犹太社会主义崩得的两位领导人亨里希·埃利希和维克多·阿尔特在东波兰被捕。他们的被捕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重新合并到一起的领土上对包括崩得地下活动在内的民族主义活动进行打击的背景下发生的。两人被指控与波兰反间谍机关有联系，并参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地下活动和对包括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在内的苏联对外政策横加指责。但由于德国对苏联发动了侵略，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本被判了 10 年监禁的两个崩得分子于 1941 年 9 月被释放了。贝利亚会见了他们，并建议由他们成立和领导一个反希特勒的委员会：埃利希担任主席，演员 C. 米霍埃尔斯担任副主席，而阿尔特任责任书记。按照贝利亚的建议，他们就此问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建议信。

然而，埃利希和阿尔特过于着急地想促成此事了，以至于对于他们来说最后是以悲剧收场。

1941 年 10 月，他们与其他外交官和苏联官员一起被疏散到古比雪夫市。在那里，他们开始与西方的外交官们讨论起实施自己新任务的计划来了，其中包括在美国成立犹太军团，并派往俄国开赴苏德前线。他们与英国大使克里斯普斯和波兰大使 C. 科特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这个波兰人还委托他们寻找被拘禁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军



人。他们进行这些令人生疑的积极活动的目的,是想到国外去成立和领导崩得在那里的代办处:埃利希想去美国,而阿尔特则想去设在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同时,他们还公开宣称能够让苏维埃制度实现自由化——“凿出第一个缺口”(这是他们的原话)。

这样的“战友”自然受到了贝利亚和斯大林的排斥。1941年12月3日,两位崩得人士再次被捕,并再也不可能自由了,埃利希在囚室自缢身亡,阿尔特则被枪决。

1941年12月15日,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推荐,国立犹太剧院的总导演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前崩得分子、共产国际的秘密工作者、文学家沙赫诺·爱泼斯坦被任命为副主席和责任书记。很快,一些著名的科学界和文化界人士也加入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中,并开始出版发行一份在苏联境内有着庞大记者网络的依地语报纸《艾尼凯特报》(《团结报》)。这份报纸的记者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犹太人悲惨遭遇和英勇献身的各种各样的通讯,其中大部分刊登在西方左翼自由派的刊物上。

我们注意到,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的第一阶段,斯大林便已经预见到,该会将在国内引发犹太民族主义,所以他规定该会的工作方向只是面对西方,以期利用该会获取额外的经济援助和进行舆论宣传。

在对外情报这条线上,米霍埃尔斯和他的一位副手、诗人费费尔被委以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联系的任务,他们也做到了。他们受托试探一下美国人对在克里米亚建立可包容全世界犹太人的犹太共和国这一想法的反应。

1943年3月初,莫洛托夫的副手、分管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洛佐夫斯基收到了一份来自纽约的犹太人对俄军事援助基金委员会发来的电报。对方在电报里强烈建议苏联政府派遣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前来将为红军筹集到巨额款项的美国。通过共产国际的关系他们取得了官方的邀请函。6月中旬,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抵达美国。在他们启程之前,贝利亚与米霍埃尔斯会了面。这位导演得到了贝利亚关于如何建立广泛联系和获得重建冶金和煤炭工业的贷款(斯大林计划获得100亿美元)的指示。

此行大获成功。苏联使者受到了美国各界知名人士的欢迎,其中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查理·卓别林、耶胡迪·梅纽因、托马斯·曼、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西奥多·德莱塞、保罗·罗伯逊和厄普顿·辛克莱。有数万人参加了声援苏联的群众集会。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与世界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以及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举行了数次会谈。其中一次与米霍埃尔斯的会谈发生在深夜里:车子到宾馆来接走了他,一直到清晨才回来,而负责监视他的费费尔对此竟一无所知。后来,这件事还是被报告给了贝利亚和斯大林。

苏多普拉托夫认为,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想法是斯大林为试探西方而

抛出的政治诱饵，以搞清楚到底能够得到多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有其他资料表明，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想法既不是克里姆林宫想出来的，也不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想出来的，而是米霍埃尔斯在美国与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进行过会谈回到莫斯科之后，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的。这封信是经过热姆丘任娜和莫洛托夫转交的。）

按照苏多普拉托夫的说法，美国人对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发生了兴趣，在 1944 年 6 月与斯大林的会谈中，美国商会会长埃里克·约翰斯顿和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提出了在白俄罗斯重建犹太人聚居区的问题，并展望了把犹太人迁居到克里米亚的前景。约翰斯顿并且承诺在战后为苏联提供长期贷款。

除此之外，按苏多普拉托夫的说法，斯大林提出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也是在向伦敦施加压力：至 1948 年受国际联盟之托，巴勒斯坦委任托管地一直由英国在管辖，英国人担心，在那里建立了犹太国家之后，阿拉伯人将把他们从那里赶走。克里米亚是巴勒斯坦的替代物，而打开这一难题的钥匙就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

不过，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共产国际”的同时，斯大林想必很清楚，要想长期影响美国的金融界，他那克里米亚的诱饵明显是不够的，美国人随时都可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大体上说，事情也确实是这样发生了。与此同时，被苏联犹太人视为在全苏负责他们事务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开始插手国家的内政，常常为改善犹太人的生活条件充当说客。斯大林从中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牺牲其他民族的权益而突出一个民族的利益。所以，1945 年战争胜利后，苏美关系刚一冷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马上就遭到了厄运。

然而，在 1948 年 5 月，苏联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承认了新成立的国家以色列，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它供应武器，千方百计支援它去反对阿拉伯人以及其身后的英国人。

以色列也觉得，在它这一边有苏联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的资助，所以它可以战胜任何人。

## 第二十五章

# 斯大林和将军们

---

斯大林和将军们、只有他才是凯旋统帅、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第二战场开辟——与盟军竞相进军柏林和维也纳、华沙起义

---

与此同时，前线的战事进展顺利。1944年1月24日至2月17日，在科尔逊-舍甫琴柯夫斯基地区的德军遭到包围并歼灭；1月24日，开始解放乌克兰右岸地区和克里米亚；4月8日，苏军进入到了战前的苏联国境地区（在苏联和罗马尼亚交界处）。

这时，斯大林与朱可夫再起冲突，而这一次，过错全在朱可夫。

早在1942年初，斯大林便已下令要求制定出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为此，总参谋部先拟定了一个草案，此后总参谋部的工作小组带着草案来到了前线，并在那些专门选拔出来的富有经验的连长、营长和团长的协助下，完成了对条令草案的修改。再后来，一个专业委员会对该草案进行了讨论，又做出了一些修订。接下去，该草案又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里研究了两天时间，并召集来了从连到师的各级前线指挥员代表。直到1942年11月9日，作为国防人民委员的斯大林才签署了这一条令。

在此背景下，由副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批准的红军高射炮兵战斗条令和炮兵战斗条令的出台却只是走了一下形式，这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满。

原来，在斯大林未知情的情况下，炮兵主帅 H. H. 沃罗诺夫编写出了这两份条令，而朱可夫则随即予以批准。



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于是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了政治局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口授了一个决议，其中说道：“朱可夫元帅未经充分审议，未召集和征询前线人员的意见，也未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报告就批准和实施了上述两份条令。”在指出两份文件“未考虑到一系列新的武器装备系统”的同时，斯大林提出了自己在制定步兵战斗条令时的实践经验，撤销了这两份条令，对沃罗诺夫“对条令问题的不严肃态度”提出了警告，并责成朱可夫“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不要草率从事”。（什捷缅科 C. M.，《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 2 卷，第 21 页）

朱可夫得到了一个沉重的教训，自尊心也受到了打击。

斯大林是否可以不让自己的这位副手当众受到责难？显然，是可以的，但他打定主意，鉴于两人之间微妙的关系，要认真教育一下这位元帅，好让他别忘了，谁才是主人。

但在 1944 年，斯大林的地位已经高到没有谁能够与之并驾齐驱了。不过他一直未曾忘记，有一次朱可夫是怎么让他“走开”的。这样的事是忘不掉的。

我们的主人公与军方将领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层次：他和他们都变得更加坚强，出现了一种平等的关系，将领们甚至可以在斯大林反对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决定。

第一次这样的争执发生在 1942 年 9 月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时期，斯大林召见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建议他们把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后备部队转交给伏尔加方面军。但按科涅夫所说，在西线和加里宁战线，德国人未减少哪怕一个师的兵力，随时都有可能突击莫斯科。所以，朱可夫和科涅夫未同意最高统帅的建议。这时，最高统帅开始了论证和争辩，并“用了尖锐的话”，但将军们还是继续固执己见，于是斯大林把他们赶出了办公室。

他们去了接待室，并在那里等待斯大林的决定。大约过了 10 到 15 分钟，国防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可能是马林科夫）来到他们那里问他们是否改变了主意？而他们答道：不，没有改变。

这个委员就走了。一段间歇之后，从斯大林办公室又来了另一位国防委员会委员（可能是贝利亚），问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要汇报给斯大林。

新建议也没有。

第三个出场的是莫洛托夫，他问了同样的问题。

1 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又让他们去见最高统帅。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责备他们顽固不化，但还是未能下决心做出独立的决定。他送了两位将领这么一句话：“那就这样吧，就按你们的意思。回自己的前线去吧。”（科涅夫 И. С.，《方面军司令员笔记》，第 585 页）

两年以后，在制定解放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计划时，这一幕又重演了。



这一次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固执地坚持自己准备实施两场主要打击,而不是一场的想法。这一想法是与已形成的观点格格不入的,在广阔的波列斯克沼泽的地理条件下不允许在一个地方展开大量兵力,这就必须拿出一个新方案来。

罗科索夫斯基回忆道:“最高统帅和他的副手们(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坚持从第聂伯河的进攻基地发动一场主要的打击。我被两次请到隔壁房间去思考大本营的建议,但每次‘思考’之后我都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决定。在确信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之后,斯大林就按我们呈交给他的文本批准了作战计划。”(罗科索夫斯基 K. K.,《军人的天职》,莫斯科,1988年,第251页)

苏军的进攻成果辉煌:白俄罗斯全境,以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并开始解放波兰。此时芬兰退出了希特勒的集团,并于1944年9月15日对德宣战。至1944年秋,苏联境内几乎所有的地区都肃清了侵略者。红军已经在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挪威各地作战。

已经可以考虑在德国土地上作战的计划了,欢庆胜利的伏特加酒已经酿好了。但是离期待的这一刻越近,斯大林对军人,特别是对他的第一副手朱可夫赢得的巨大权力和声望明显地就越不能容忍。

这种未来暴风雨的第一次轰鸣声在1944年秋天响了起来。朱可夫对此记忆深刻。

1944年秋,在白俄罗斯夏季战役结束之后,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与斯大林就此次战役的结果进行交谈时,他对我说:

“您看,您开始时提出方面军以另一种顺序发动进攻,当时我没有同意您的观点,我是正确的。在我们制定的这种顺序下,一切结果都更好。”

我清楚地记得在制定这场我协调两个方面军行动的作战计划时发生的事情,于是反驳说,的确一切进行顺利,不过我并没有提出过其他的前线行动顺序。

“您怎么没有提出过?”——斯大林责问。

“我是没有提出过。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指令吧。”

他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取出指令,开始自己先读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说:

“您来读。”

我开始读了起来,很快就读到一个能说明他讲得不对的地方,我的确没有提出过调整方面军事务或实施作战的其他顺序。

他打断了我,拿走我手中的指令交给了马林科夫:

“您来读。”

马林科夫从头开始读起,当又读到这个地方时停了下来,显然他不知道下面

应该怎么办，因为其后的内容与斯大林的话是矛盾的。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读了下去。还能怎么办呢！

斯大林拿过他手中的指令并递给了贝利亚：

“你来读！”

贝利亚又读了起来，可不管他怎么想也不可能读出其他内容。

斯大林拿回指令放回了抽屉，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过能感觉到他十分不满。也不知为何偏偏在这件事上，他希望将做了正确计划的这次战役的所有成就归功于自己。

当天的谈话总体来说是沉重的。很快斯大林又与我谈起了在即将面临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中，各方面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根本无需专门的协调，大本营可以直接从莫斯科进行一般的协调。说到这里，斯大林建议我担任将直接进攻柏林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指挥工作。

我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该方面军现任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的任命是如何考虑的。他反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想的？您将去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该把罗科索夫斯基安排到哪里呢？”

我回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派他去指挥在攻打柏林时将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协同作战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并不是像最近几年有些人描绘的那样。这一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发生在更早的时候，是在总结白俄罗斯战役和其间出现的纠纷的时候。我想，正是由于这一纠纷造成了斯大林不愿意让我去协调方面军的行动，并打算派我去指挥一个关键性的方面军。（西蒙诺夫 K.，《历史的重水》，第127—128页）

朱可夫一生都记住了斯大林这一在他看来是不公正的，剥夺了他作为粉碎强敌的独一无二的胜利者桂冠的决定。在把朱可夫从各方面军调协员的岗位上拿下，并将这一角色留给自己的同时，最高统帅也就剥夺了这位元帅的最高负责人的岗位，将它只留给自己，从而也剥夺了这位元帅辉煌的政治成就。胜利的唯一的全面的（或是总的）领导人和激励者理应是斯大林。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们要补充的是，斯大林在朱可夫身上看到了再次冒出来的新势力中心领袖的形象，这一次不是那些参加了国内战争并得以保全的将领们——已完全退居二线的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库利克，而是现任的不可替代的军事将领。

1944年6月6日，在能够保证军事行动突然性的极其恶劣的天气下，盟军开始了在法国北部的登陆。这一行动称之为“霸王”行动，即“主宰者”的意思，这个俄文译名



遭到了斯大林的讥笑。辅助性的“恩维尔”行动(“铁砧”行动)则应该在早些时候在法国南部实施登陆(8月15日开始实施),这一行动是罗斯福和指挥所有行动部队的艾森豪威尔所坚持的。而丘吉尔则坚持要在更靠近巴尔干的意大利登陆,以期能够巩固对近东油田的控制,并能够抢在红军之前进驻巴尔干诸国。英国首相想用这样的方式抢先于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但罗斯福自有对付英国人的办法。6月6日,包括10个坦克师在内的3个集团军乘坐6000艘舰艇,在11000架飞机的掩护之下在诺曼底登陆。

德军指挥部被打得措手不及。他们在诺曼底沿岸附近总共只有12个师和160架能作战的飞机。

在占领了大面积的滩头阵地之后,6月25日,盟军发动了攻势。

登陆后,在马赛偏东的法国南部,开始了向巴黎方向的钳形攻势。8月25日,巴黎解放。

这样,期盼已久的“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了。它拖住了德军三分之一的兵力,毫无疑问,这使得德国人在东方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与此同时,“第二战场”也暴露出了斯大林与盟军之间以前处于隐蔽状态的矛盾,因为离胜利日越近,谁将是战后欧洲“霸王”的争夺就越尖锐。

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参加了英吉利海峡登陆行动的还有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军队、加拿大的军队和听命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

尽管快速占领东欧的想法落空了,但丘吉尔并未放弃赶在斯大林之前占领德国的意图。在法国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这一意图。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坚决主张集中所有的力量,并相应地“减少在其他进攻地段的活动”,组成重拳从北方向德国发动进攻。美国的布雷德利将军建议将所有的资源都调拨给第12集团军群,并且在东部方向朝法兰克福发起进攻。

英国军事史学家对蒙哥马利的计划这样评论:“这个方案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最合理的,因为如果西方盟国能够早于俄国人占领柏林,那么在军事行动结束以后,他们的政治地位会大大增强。”(富勒 Д.Ж.,《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战略和战术综述》,第453页)

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全线进攻,将部队“沿莱茵河一线”一字排开,并建立了一条从瑞士到北海的连成一片的战线。这样会更可靠一些。

而此时,在苏德战场上发生了一件事,直到现在都被西方当成证据来说明斯大林的阴险狡诈。这说的是1944年8月1日爆发的华沙起义。

如同数百年前一样,华沙又一次沦为西方与俄国争斗的舞台。

7月24日,苏联军队解放了卢布林,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抗衡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众所周知,苏联政府在“卡廷事件”之后便与流亡政

府断绝了外交关系。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身后有一股军事力量在支持它，这就是由苏联境内的波兰第1集团军和波兰本土的人民军组成的波兰人民军。

波兰流亡政府同样也有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曾随同盟军参与了诺曼底的登陆，另外就是在波兰领土上的克拉约瓦军的部队。

7月23日，斯大林致信丘吉尔表示：不想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这应该由波兰人民自己来解决”。斯大林还告知，认为有必要与“以后将成为由民主力量组成的波兰临时政府的核心”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联系。

丘吉尔明白了他的两层意思：与波兰流亡政府进行谈判是可行的；未来的波兰政府将不会是共产主义的政府。

7月29日，“伦敦人”中的三位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总理C.米科拉伊奇克、民族委员会主席C.格拉布斯基和外交部长T.罗默尔来到了莫斯科。他们希望就给“卢布林人”提供的内阁席位的底数达成协议。

这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罗科索夫斯基的指挥下逼近了华沙，但遭到来自东普鲁士和拉脱维亚的猛烈反击。苏联军队被迫退出了图库姆斯和米塔瓦。为了稳住局势，罗科索夫斯基从中部抽调出兵力派去增援。于是，在快速通过白俄罗斯之后，方面军在9月停顿了下来。

与此同时，波兰的塔德乌什·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号召华沙市民举行起义。

8月3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了那几位过于乐观的“伦敦人”。这几位波兰人认为，他们马上就要取得对首都的控制权了，并将成为局势的主宰者。

斯大林并未与他们谈论有关将来的临时政府的问题，而是让他们找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商讨此事。不过，斯大林表示愿意下令，给起义者提供武器和弹药的支援。

“伦敦人”会见了“卢布林人”，提出只能给“卢布林人”五分之一的席位。而“卢布林人”则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自己对未来国家宪法提出的条件上：他们想回到更加民主的1921年的宪法文本，而不是1935年出台的那份专制的（“半法西斯的”）文本。“伦敦人”尽量拖延时间，想等到从华沙传来胜利的消息。

8月9日，“伦敦人”再次来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里。他们被建议承认在德黑兰约定的新的波兰边界线：包括工业城市弗罗茨瓦夫和什切青在内的西部土地归波兰所有，而东部边界则按“寇松线”来划分。波兰人又一次既不说是，也不说不。

然而，从8月8日起，德国党卫军分队长、与游击队作战的专家巴赫-齐列夫斯基就已经到了华沙。党卫军还调遣了配有重型武器和坦克的2个旅（在丘吉尔笔下是5个师）到这里来。德国人并不打算交出这座城市。

早在1943年，莫斯科就已经清楚了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的政治立场。那是在1943年10月14日，在作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前身的波兰国会的会议上，“科莫



罗夫斯基声称：‘我们不能容许在德国人还控制着东线，且从东边保护着我们的时候发动起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的衰退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除此之外，我在俄国身上看到了威胁……对我们来说，俄国军队离得越远越好。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只要德国人还守着俄国前线，并使俄国人远离我们，我们就不能激起针对德国的起义。’资产阶级波兰的领导人准备继续让自己的人民处于法西斯的占领之下，无论多久都行，只要不牺牲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就行。”（加列耶夫 M. A.，《朱可夫元帅：伟大而独特的统帅艺术》，第 159 页）

M. 加列耶夫将军从自己亲身的战斗实践中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他曾在最有才能的军团指挥官之一、波兰族的 C. Γ. 波普拉夫斯基麾下的涅曼第 45 步兵军服役。在解放维尔纽斯时，他曾试图与波兰地下组织（克拉约瓦军）取得联络，并请求波兰人在步兵接近维尔纽斯时，从德军后方发动突袭。不过克拉约瓦军并没有接受此建议，而是企图独自攻下维尔纽斯。7 月 7 日，他们 5000 人的队伍被击溃，而 7 月 13 日，在没有得到波兰爱国者应有协助的情况下，波普拉夫斯基的军团攻下了维尔纽斯。

在攻占利沃夫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在华沙，“伦敦人”引起的牺牲达到了顶峰。

应当关注下述悲惨的事实：罗科索夫斯基在起义的最初阶段为了便于联络，向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派去了两名伞兵军官，但科莫罗夫斯基没有接待他们，两名军官也就下落不明了。（朱可夫 Γ. K.，《回忆与思考》，第 2 卷，第 251 页）

想必，“伦敦人”的动机是明确的。不过他们指望在夺取华沙之后就可以指使斯大林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想，也未免太天真了。不管怎么说，攻进华沙的是苏联军队和波兰第 1 集团军。所以，那些说是斯大林故意停下了胜利的进攻，以便让德国人镇压起义的论点，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相信。

如果看一下苏联的军事史就能明白，进攻停下来是有客观原因的：“红军当时遭到了德国军队的强烈抵抗，而苏联军队的补给线拉得过长，这样一来，进攻集群的两翼就极易受到敌人的攻击。我们从苏联军队到了 1945 年 1 月才得以占领华沙，也就是说在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战士在 1944 年 9 月遭到彻底失败的 3 个多月之后才占领了华沙这一点上，就可以证明红军在华沙起义期间的消极行为，首先是军事原因造成的。”（罗伯茨 Д.ж.，《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莫斯科，2003 年，第 114 页）

从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可知，正好相反，斯大林坚持要对华沙进行正面突击，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他相信，必须从西南方向包抄该城。而且在行动之前，参谋部还使了一个计谋。这些都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当时前线局势的严峻性。

所以，起义注定要失败。斯大林称这次起义的组织者为“投机家”。1944 年 10 月 2 日，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向德国人认输，签字投降。

不过，波兰人的花样远未就此结束。10 月 12 日，C. 米科拉伊奇克再次来到莫斯

科,重申了对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和维尔纽斯城的领土要求。10月13日,他与斯大林和当时也在莫斯科的丘吉尔会了面。第二天,这位波兰总理还单独与丘吉尔和艾登会了面。

对于米科拉伊奇克的要求,丘吉尔气忿地回答道:“我洗手不干了……至于我,我拒绝做这件事。我们不会只因为波兰人自己的不和而去破坏欧洲的和平。你们的固执己见使你们看不到,事件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如果不能达成共识,我们就分道扬镳。我们会告诉全世界,你们是多么不理智。你们还想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再死上2500万人。但你们什么都做不成……乌克兰人不是你们的人民。请拯救你们的人民,并给我们开展有效行动创造条件吧。”(引自:茹科夫 Ю.,《斯大林:政权之谜》,第258—259页)

丘吉尔明白,是“伦敦人”妨碍了他为他们争得在未来政府里的主要职位。的确,他为他们做了能做的一切:他全力向斯大林施压,要求斯大林不计伤亡地向华沙发动强攻。

1945年1月初,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非“伦敦人”)开始组建临时政府。丘吉尔称他们“不过是俄国的走卒而已”。但不管是不是这样,1944年10月他来莫斯科,不是为了帮自己的这群“伦敦人”,而是为了与斯大林就战后欧洲的划分达成协议。



## 第二十六章

# 丘吉尔背着罗斯福同斯大林瓜分欧洲

丘吉尔背着罗斯福同斯大林瓜分欧洲、苏联在战后将主宰欧洲、斯大林不打算将东欧各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盟国雅尔塔会议是斯大林的胜利

丘吉尔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罗斯福没说错。这位英国人明白，俄国人已经在东欧放开了手脚，于是竟无视大西洋宪章的“崇高”宗旨，建议斯大林来跟他做一笔真正的交易。

根据 1944 年 10 月 12 日丘吉尔写给罗斯福的信来看，斯大林希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组成一个亲俄国家的……势力范围”。此外，为了迎合丘吉尔，斯大林“一反过去的观点”，同意建立由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等南德意志国家组成的联邦。丘吉尔想让匈牙利也加入其中，斯大林坚决反对。

此时，斯大林对于德国其他地区的打算是这样的：将鲁尔和萨尔交给国际监管，在莱茵河地区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基尔运河也同样交付国际监管。同时，斯大林还希望对苏联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条件进行修改。

当听见斯大林谈到这两个海峡时，丘吉尔该是蜷缩起了身子。早从克里米亚战争时起，大不列颠的东方政策之一就是阻挠俄国人向近东和巴尔干地区推进。他没

有对斯大林作出任何回答,但大概暗自在想:“好啊,我们走着瞧!”

作为大英帝国的代表,丘吉尔建议这位俄罗斯土著居民的领袖来达成协议。

出现了一种可以谈谈的氛围,于是我提议说:“我们来协调一下我们在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驻扎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而我们在那里也有自己的利益,有大使馆和代表处。我们不要为了一点小事而争吵。至于英国和俄国,您是否同意你们在罗马尼亚占据 90% 的优势地位,我们在希腊也占据 90% 的优势地位,而在南斯拉夫则平分秋色呢?”趁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我拿出半页纸,并写道: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大不列颠(和美国一起)——90%;

俄国——10%。

匈牙利:——各占 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纸条递给了斯大林,此时他已经听完了翻译。稍停了片刻,他拿起蓝色铅笔在纸条上打了一个大勾号,并把纸条还给了我。协调这样一个大的问题,花了比写下它还要快的时间……铅笔勾过的纸条就放在桌子中间。最后,我说道:“我们即兴就决定了这涉及千百万人性命的问题,是否有点厚颜无耻?我们还是把这纸条烧掉吧。”“不,就保留在您那里。”斯大林说道。(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3 卷,第 448—449 页)

事实上,丘吉尔只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问题上作出了无条件的退让,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问题上留下了不确定因素,而对希腊的态度则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注意到,正是在这里,丘吉尔以波兰为代价争得了在希腊的利益;并且,在他与斯大林的私人会谈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苏联对不列颠在希腊和地中海控制权的承认”。(邓恩 D,《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第 353 页)

的确,红军没有占领希腊,而“伦敦人”也没有得到在波兰临时政府中的席位。

丘吉尔没有把此事告知美国大使哈里曼,这并不难理解。对于美国来说,欧洲事务是排在第二位的。对于他们来说,斯大林是否履行自己参与对日作战的承诺要重



要得多。丘吉尔只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斯大林并没有在这张纸条上签字,这张纸条对他并没有约束力。如果莫斯科在海峡地区拥有了克里姆林宫早就梦想的军事基地,那么在希腊“画到”多少百分比其实并不重要。归根结底,这些事件将由各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决定。

当然,丘吉尔也明白这一点。就此问题,他写信给艾登说道:“尽管我竭尽全力试图迫使自己去同情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我还是完全不信任他们。他们只承认实力和现实。”(邓恩 丑,《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第 338 页)

其实,斯大林同样也不信任他。巨人们依靠的正是“实力和现实”,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他们不是以自己的个人品质在行事,而是以历史环境的变化来行事。

所以,随着胜利的临近,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关注战后的世界格局和自己国家的地位。

从 1944 年末至 1945 年初,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丘吉尔的“百分比纸条”、斯大林与盟国就波兰临时政府人员构成问题的针锋相对的来往信件,以及斯大林对于美国情报人员背着他与党卫军将军 K. 沃尔夫在伯尔尼秘密会谈一事的愤慨,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旧岁月正在让位给新时期。

在红军进入已准备好投降的保加利亚前夕,苏联向其宣了战。这样一来,斯大林便抢在盟国的前面:盟国想与保加利亚签订停战协定,如果那样,苏联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便不会像现在这样无可争议了。但只要一宣战(其实根本就没有流血),苏军就可以果断和迅速地继续向巴尔干地区推进。

1944 年 10 月 20 日,苏联红军进入了贝尔格莱德,并与保加利亚订立了停战协议。11 月 29 日,阿尔巴尼亚也得到解放。12 月 22 日,在被解放的匈牙利的领土上成立了临时政府;12 月 28 日,临时政府对德宣战。12 月 31 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成立波兰临时政府。

红军离维也纳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了。

1945 年 1 月 17 日,红军占领了华沙。

除了将面临与盟国不可避免的矛盾之外,胜利者们还会有其他的未来吗?

1943 年,外交人民委员部下面设立了 3 个委员会来研究未来将签订的和约的条款,它们分别是由 И. М. 迈斯基、M. M. 李维诺夫和 K. E. 伏罗希洛夫来领导的。1944 年 1 月 11 日,他们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报告,称苏联主要的政治任务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维护和平”。报告认为,美国和英国之间将展开一场“根本利益的冲突”(这正如我们所知,并未发生)。报告把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土耳其都称为苏联的“最大利益范围”区。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的。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一切都好:罗斯福总统不打算积极干涉东欧的事务,有1200万人兵力的红军在欧洲也是没有对手的,而从德军占领下被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公众情绪绝大多数是同情苏联的。

不过也有不好的情况。

美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战争年间,美国的经济在各方面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曾为罗斯福的改革提供了社会基础的“大危机”早已成为往事。现在保守主义又占了上风,其身后是获得了成功的大财团。

1944年11月,在总统选举中,罗斯福再次获胜,副总统是哈里·杜鲁门。不过此时警报已经拉响了:罗斯福领导的民主党失去了在国会中的部分席位,而落选的大部分国会议员是对苏联抱有好感的自由派人士。

如果再考虑到美国即将研制出原子弹,那么可以说,在那孕育着未来的历史地层深处,20世纪下半叶的模块已经编制出来了。

在丘吉尔对莫斯科的十月访问期间(1944年),斯大林同意了三位领导人“在黑海沿岸”再次举行会晤的建议。罗斯福提议在地中海会晤,但斯大林不同意,最后定在了雅尔塔。

莫斯科开始积极准备起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雅尔塔会议前夕,国防人民委员部、海军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四大部门,由戈利科夫和贝利亚先后担任会议主席,召开了一次在整个战争期间时间最长的情报机关负责人会议。主要议题是对德国武装力量在此后对盟军的抵抗中所拥有的潜在实力进行评估。大家花了两天时间来研究这一议题。我们的关于由于德国人燃料和弹药不足,欧洲战争不会超过3个月的预测,被后来的结果证明是正确的。最后一天,即第3天,会议的内容是对大家所掌握的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将提出的有其政治目的和意图的材料进行比较。大家一致认为,不管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阻碍不了我们的代表团巩固苏联在东欧地位的路线。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将采取灵活的立场,并且由于希望苏联能够尽快对日本宣战,还将作出一些让步。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军情局关于日本人对我们机动兵团绕过日军沿苏联边境修建的防御地区进行猛烈打击的抵抗能力薄弱的预测,也在1945年8月得到了证实。不过尽管有详尽的资料证明美国人已经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我们并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会用核武器对付日本。”(苏多普拉托夫 II.，《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第268页)

据苏多普拉托夫证实,军情局的领导人没有能预见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存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而是认为这种前景只在 M. 铁托和共产



党拥有“现实的军事力量”的南斯拉夫才有可能。在前面几个国家里，卢比扬卡的情报分析员只寄希望于能够出现亲苏的政府，仅此而已。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已经完全掌握了盟国对东欧的立场。他们并没有一致和清晰的立场，只想让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回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对于把能否确保苏联安全视为未来波兰政府人选最主要标准的斯大林来说，这些毫不妥协的“伦敦人”的回归是无法接受的。不过，他还是准备为他们在新的联合政府中提供上几个重要的职位。

“军事情报机关和我们自己掌握的材料均表明，美国人有意作出妥协。这样，我们的灵活立场就能够确保出台一个苏方可接受的对东欧和远东势力范围的划分方案……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的一段时间，红军对德国展开了积极的军事行动，解放了波兰的大部分领土。已经很容易预测到在所有的东欧国家将发生有利于我们的政治形势的转折，特别是在那些共产党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就是受我们影响或部分受我们控制的过去事实上的临时政府里——起着积极作用的国家。

“既然流亡政府怎么也无法对抗我们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表现出灵活性来，并同意进行民主选举。”(苏多普拉托夫 II, 《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第367页)

需要强调的是，克里姆林宫立场的变化和筹建东欧联合政府的计划被撤销，都是因为以下这些事件引起的，而在1945年初，斯大林还未能预料到会发生这些事件：

1945年1月，另一株冲突的萌芽破土而出：盟国阻止了苏联从伊朗沙赫政府处获得北部几个省份油田勘探权和开采权的尝试。当然，仅从这一拒绝还不能得出很快盟国就会利用经济杠杆对莫斯科施加影响的结论。不过，信号已经出现了。

2月4日至11日，在克里米亚疗养地雅尔塔市，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宫殿群中，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人举行了会晤。该对战后生活进行商定了。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再过两个月罗斯福就去世了，并且他们的时代也将结束。他们是19世纪的产儿，而这个世纪孕育了生产的飞速发展、对世界格局公平性的社会主义憧憬，甚至还有两次世界大战。

胜利将至，但他们明白，胜利的幸福将是短暂的。以后将发生的事情就隐匿在这个转折之中。

罗斯福希望，按他的意志创立起来的联合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将成为对这个充满冲突的世界进行公正管理的中心。罗斯福认为，他与斯大林友善的私人关系能够影响苏联的政策，使之变得温和一些。

1月，当德军出其不意地对阿登地区发动重创盟军的攻势时，斯大林应罗斯福的请求，加快了红军的进攻，所以在雅尔塔，他期待的是感激。在第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就直截了当地表示：苏联的进攻是在履行对盟国的道义责任。

然而，雅尔塔还是成了盟国的告别之地。

他们讨论了所有认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并宣布了他们的目的：“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建立德国永远没有能力破坏世界和平的保障机制。”会议决定解除所有德国武装力量的武装，遣散其所有士兵，撤销德军总参谋部，废除或接管德国的军事工业，战犯必须交付审判。等待德国的将是长期被占领，柏林将被分成几个占领区。

不过，在将德国分成几个地区的问题上，斯大林有不同的想法，他并不想这么做。（很快斯大林便断定，一个类似于魏玛共和国的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最符合苏联的利益。）“1945年3月，Φ.古谢夫收到了事实上让他把瓜分德国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掉的指示，斯大林认定，考虑到莫斯科已掌握的美国在战后的计划，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带有魏玛共和国式社会经济制度的德意志国家是最符合苏联利益的。在苏联外交部的档案室里保存有斯大林会见李维诺夫委员会成员的资料，其中对此就有相应的表述。”（法林 B.，《第二战线：反希特勒联盟中的利益冲突》，第 539 页）

斯大林建议，赔款总额应为 200 亿美元，而其中一半应由苏联获得。他称德国的人侵使苏联遭受了 6790 亿卢布（1280 亿美元）的损失。美国人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赔款数额，但英国人表示反对。丘吉尔已经预感到了“冷战”将至。

会议通过了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各盟国承诺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协助获得解放的各族人民“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残余，并按自己的选择建立起民主的制度”。

在雅尔塔，斯大林有相当大的优势。第一，罗斯福采取调和的立场；第二，情报机关获取的消息表明，美国领导人并没有制订出插手东欧行动的明确计划。

关于波兰的未来的争论，便证明了这一点。最终，两个盟国同意了按“寇松线”划分，作为补偿把德国的部分土地划给波兰；盟国还认同，在盟国与波兰的政治活动家进行过磋商之后，改组现有的临时政府（“卢布林人”），“让波兰国内的民主人士和国外的波兰人参加政府”。

这里我们要指出，因波兰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很快就激化起来。在被解放了的波兰领土上发生了冲突，克拉约瓦军展开了地下活动，开始实施恐怖活动。让波兰重新回到国内战争的状态，这是斯大林不能容许的。这会把他的计划一笔勾销，也让英国人有机会对波兰新政权的组建进行积极干涉。所以在 3 月底，趁以利奥波德·奥库利茨基陆军准将为首的克拉约瓦军的领导人被邀至莫斯科参加谈判之机，就把他们抓起来了。对于丘吉尔提出的释放奥库利茨基及其战友的要求，斯大林回答道：

“我必须要特别说一说您信中的第 11 条。在这一条中，您谈到了在逮捕了 15 名波兰人的传言出现后产生的麻烦，谈到了驱逐出境等等。

“关于这件事，我可以告诉您，您所说到的这批波兰人，不是 15 人而是 16 人，为首的就是那位著名的波兰将军奥库利茨基。关于这位与其他 15 名‘失踪了’的波兰



人一样‘失踪’的波兰将军，英国媒体故意避而不谈，因为他极其令人反感。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对此保持沉默。以奥库利茨基将军为首的 16 个人是被苏联前线的军事机关拘捕的，现在正在莫斯科受审。奥库利茨基将军这伙人，首先是奥库利茨基将军本人，被指控在红军后方准备并实施了破坏活动，造成了 100 多名红军官兵牺牲；他们还被指控在我军后方设立非法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而这也是法律所禁止的。根据审讯的结果，他们全部或其中一些人将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是红军保护其军队和后方免受破坏分子和扰乱分子破坏而采取的的必要措施。”（《1941 年至 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1 卷，第 411—412 页）这伙波兰人几乎都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监禁。奥库利茨基被判了 10 年，并在 1946 年死于监狱的医院。

在结束这些争论的最后，斯大林向丘吉尔直言，盟国的立场“排除了协商解决波兰问题的可能性”。该信签注的日期是 1945 年 5 月 4 日，也就是说雅尔塔会议刚过去 2 个多月。

当然，苏联情报机关先对奥库利茨基承诺保证其安全后又逮捕他的这个特别行动称不上是君子所为。但在波兰，暗中对苏联官兵的杀害同样也谈不上是战争中的光彩行为。总而言之，对外的解释就像美国政治家们所说的那样：奥库利茨基“去了加拿大”。

直到 1945 年 6 月下旬，在罗斯福去世之后，波茨坦会议前夕，各方对波兰联合政府的人员组成才达成一致。以 C. 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三位“伦敦人”进入了联合政府，米科拉伊奇克得到第一副总理的职务，而“国内反对派”有两人进入。在这之后，波兰政府得到了华盛顿和伦敦的承认。

让我们回到雅尔塔。在这里，三位老人（最年轻的罗斯福也已 63 岁了）试图构建起世界格局的地基（顺便提一句，我们还记得，凡尔赛和约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是如何调整了世界格局的）。

斯大林未能修改对船舶进出海峡的条件作出规定的蒙特勒公约，不过总的来说他应该还是满意的。苏联保住了战前的边境线，成了欧洲的一个大玩家，达到了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加盟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目的，自己还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这使它能够阻止任何不合意的决议。

而且，斯大林与罗斯福还达成了一项协议，它使斯大林得到了苏联可以恢复到俄国在 1904 年时曾在远东拥有的地位的保证，即重新租用中国旅顺港的海军基地，恢复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益，收回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

斯大林则确认了在战胜德国后 2—3 个月之内开始对日作战的义务。

会议的气氛是友善的。在总结性的秘密协议中，盟国的特勤部门被授命在搜查和引渡纳粹战犯时为外国伙伴提供协助。苏联同意引渡弗拉索夫部队的所有指挥



人员。

此外，丘吉尔与斯大林还相互给予对方很高的评价，虽然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斗争并未停止过。

丘吉尔回忆道：

“那天晚上，我们和斯大林一起在尤苏波夫宫用了晚餐。晚餐期间所说的话都被记录了下来，可以附在这里。反正，我是这样说的：

“我既不是夸张，也不是恭维，我要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于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的心灵都是极为可贵的。历史上有过许多的征服者，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国务活动家，且大多数人在一遇到紧随战争而来的困难时，就丢失了到手的胜利果实。我诚挚地希望，元帅的生命将为苏联人民而保存下来，并帮助我们大家进入一个比我们刚刚经受的痛苦要小得多的时期。

“当我意识到自己处于与这位伟大人物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时，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和希望奔走于这个世界上，他的荣誉不仅传遍了整个俄国，也传遍了整个世界。”

“斯大林也用称赞的口气作了回答。他说：

“我提议为大英帝国的领袖干杯，为全世界把政治经验和军事领导合二为一的最勇敢的首相干杯，为一个在全欧洲准备向希特勒俯首帖耳时宣布即使没有盟国，英国也不会动摇，将独自与德国作战的人干杯。他说，即便是现在的和潜在的盟国弃英国而去，英国也将继续战斗下去。为这位百年一遇和勇敢高举大不列颠旗帜的人的健康干杯！我所说的，是我的感受，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所坚信的。”（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3 卷，第 520—521 页）

斯大林还说了下面这些话：

“我像一个老人在讲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得很多的原因。不过，我想为我们的同盟而干杯，为了它继续保持亲密无间和自由表达的特点而干杯。我还不知道在外交史上曾有过像我们这个同盟一样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三个大国之间的同盟，而且盟国有机会可以如此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知道，某些人士会认为这种评论有些幼稚。

“在一个同盟之中，盟国不应该相互欺骗。也许，这就是幼稚？老练的外交家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不能欺骗我的盟友？”但我，作为一个幼稚的人，我认为，最好不要去欺骗自己的盟友，哪怕他是一个笨蛋。也许，我们的同盟之所以这样牢固，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互欺骗；或者也许是因为要相互欺骗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我提议为我们三大国同盟的坚不可摧干杯！祝它牢固而稳定，祝我们更加坦诚相待。

“……为我们这群战争年代受到承认，而在战后，功绩将被很快忘掉的活动家干杯。目前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这些人不仅受到和他们同性的人的敬爱，也受到了女士



们的敬爱。不过,战争一结束,他们的声望就会下降,女士们就会背对着他们了。

“‘我要为军事将领而举杯祝酒。’

“对于我们面临的困难,他不抱任何幻想。”(丘吉尔 V.,《第二次世界大战》,第 3 卷,第 522 页)

对丘吉尔来说,斯大林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他很直接地表达了这一点。

会议结束了,上了年纪的绅士们各自散开,去继续履行各自对自己国家那份并不轻松的职责。

等待他们的是辉煌的胜利,是不朽的荣誉,以及和平时期无法解决的矛盾。留在雅尔塔的,只有对曾在此住过的作家安东·契诃夫,这位 19 世纪的精神和喉舌的记忆。

## 第二十七章

# 胜利是新的战前时期的开始

---

胜利是新的战前时期的开始、刺杀希特勒、“我们与美国人谈不到一处”、英国人为何除掉西科尔斯基将军、斯大林的新想法：建立斯拉夫国家联盟

---

雅尔塔会议之后，历史加快了步伐。大事一件接一件接踵而来。德军节节败退，而红军势不可挡，先后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和布达佩斯。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了新政府。4月5日，苏联声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

与此同时，I. 希姆莱跟美国代表们及有关中间人频繁接触。其中一些接触，莫斯科是知道的，而另一些则是不知道的。不过这并不能改变什么。

单方面的谈判在4月25日，即在罗斯福去世(4月12日)两周之后达到了高峰。

4月23日，希姆莱对瑞典红十字会领导人贝纳多特伯爵声称：“我们，德国人，必须声明，我们认为自己是被西方大国打败的。我请您通过瑞典政府把这一点转告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以阻止进一步流血。但是，向俄国人投降，对于我们，对于德国人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更是这样。在西方大国的防线未接替德国的防线之前，我们将继续与他们作战。”(法林 B.，《第二战线——反希特勒联盟：利益冲突》，第557页)

第二天，瑞典人便将这次谈话的内容通报给了盟国。丘吉尔随即联络上了艾森豪威尔，劝说他接受希姆莱的提议。



艾森豪威尔明白这样做将导致与莫斯科决裂，就反驳道：德国政府“只有一条出路，即向所有盟国无条件投降”。

4月25日，丘吉尔与杜鲁门取得了联系，强烈主张接受德国人的提议。新一任美国总统拒绝了对雅尔塔约定的破坏。在这之后，丘吉尔才把希姆莱的提议和盟国对此的否决通报给了莫斯科。

此后施佩尔、博尔曼、海军元帅邓尼茨等人相继做了一系列类似的尝试，但已经迟了。

当然，这也改变不了什么。历史的转折点即将到来，眼看着就要走过历史拐点，未来的格局已经设定好了。

德国军事力量的毁灭使共产主义俄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战争差不多是维系他们同盟的唯一纽带。从此以后，俄国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都不会给自己对终极霸权的向往和渴望设置一个界限，或者干脆就无视界限的存在。

这一部分要讲述的有关战略和政策的具有决定性的现实问题综合如下：

第一，苏俄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

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的战线阻止它的快速推进；

第三，欧洲这条战线应该尽可能地向东延伸；

第四，英美军队主要和真正的目标是柏林；

第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军队进入布拉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六，维也纳，其实也就是整个奥地利必须由西方大国来管制，或至少应该拥有与苏联对等的基础；

第七，铁托元帅对意大利的侵略野心必须加以抑制；

最后一点，也是主要的，东西方之间就涉及欧洲所有主要问题的协商，必须达成一种共识，就是民主国家的军队如何撤离，或是西方盟国如何让出一部分被他们占领的（或是像很快将在报道中所写的，从极权暴政中解放出来的）领土。（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74—575页）

若说这不是对将来军事行动的部署，那又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美国和苏联的一些小组正在欧洲四处搜寻生产核武器组件的工厂和实验室。

根据1945年3月苏联国防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开始把德国的工业设备、原料、粮食和牲畜运回苏联。国防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些被运回的货物被视为德国战争赔款的预付款（1945年全年共拆卸了逾4000家企业，并接管了在图林根的

火箭制造中心和在萨克森的铀矿山)。

德国尚未投降,而盟国已经开始谋求新的地位。

在对美国人不愿听从丘吉尔的主张一事进行评价时,英国军事历史学家不无讽刺地说:

“看来,真实的情况在于,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人只是一些对军事一知半解的人,他们竟然不明白,战争只是政治的一个工具,击溃敌人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们把战争看成了体育比赛,他们以为既然已经赢得了战争,双方就可以各走各的路,像憨第德(伏尔泰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注)一样回家种田去了。

“如果在战争末期政治上的考量还比不上军事因素重要的话,就完全有理由问一下,那么什么时候它们会更重要?”(富勒 Дж.,《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1945年):战略和战术综述》,第480页)

这一评述,当然代表的是英国人的观点。与美国不同的是,战争使英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战争结束时国力已经衰退,已经不可以再与美国一决高下了。所以,丘吉尔渴望在欧洲找到一个能够制约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靠山。他的目光一会儿投向法国,一会儿投向波兰,一会儿又投向德国。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让他高兴起来!而且,已故的罗斯福在雅尔塔就说过:美国人不会让占领军在德国驻扎超过两年。应该明白,这意味着,此后就留下英国和苏联一对一地抗衡了。

这位英国首相在内心深处对于罗斯福的离世应该是感到高兴的。

相反,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未遂后,斯大林想必是希望希特勒能够康复的,因为如果这位元首被清除掉,就意味着为别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与德国进行单方面谈判打开了通道。

罗斯福的去世和对希特勒的暗杀震动了交战双方,但并未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乍听起来,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除掉希特勒会给柏林与华盛顿和伦敦进行谈判打开半扇大门。而事实上,莫斯科的这种担心未必是有根据的。不过斯大林的确“保护了”希特勒,甚至取消了苏联间谍谋划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他所遵循的正是上述的这一逻辑。

不过西方对于7月20日事件的反应还是非常谨慎的。阴谋者的动机受到了质疑。伦敦的《泰晤士报》写道:“难道不就是这帮人试图利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以夺取世界的统治权?难道不就是这帮人在事件一帆风顺时死心塌地地为希特勒效忠吗?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为了反对战争,而只是为了避免战争的失败……”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此事件仅说了几句话,称对这个“老混蛋”的刺杀证明,德国军事指挥人员确信希特勒将在这场战争中败北。媒体上还出现了这样的话:“未成功的刺杀比成功更好。”英国情报部声称:“希特勒的战略给了盟国最大的优势,我们对在战争结束前他和整个权力机关的保全很感庆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日



夜夜》，莫斯科，2005年，第359页）

想必，连罗斯福也不会允许出现第二个“慕尼黑协定”，否则他肯定会输掉1944年11月的总统选举。

所以，问题不在丘吉尔和罗斯福身上。就算这位总统4月12日没去世，又活了好多年，但这个在战争年代奇迹般壮大起来的、手握着核武器的美国迟早都不会对莫斯科太客气的。

克里姆林宫一清二楚，只要盟国还需要苏联的军事力量，他们就会对苏联保持彬彬有礼的态度。

苏联与美国在日常事务中时常会发生摩擦。在莫斯科的美国人时刻处在被监视之下，他们的谈话被监听；不允许他们使用大使馆的美国四引擎飞机将美国军事代表团快速送往德黑兰；不允许他们前往波兰的德国集中营与被营救出来的美国军人接触；不允许将修建在波尔塔瓦附近的美国飞机场迁移至离向西推进的战线更近的地方。除此之外，米高扬和对外经济部门的人员还竭力在租借法案框架下订购了一些不是战时必备的，而是用于战后发展的仪器设备。

围绕着波尔塔瓦表现出来的双边关系就是明证。事情起源于德黑兰，当时罗斯福与斯大林约定为驻扎于意大利的美国空军在苏联境内设立几个辅助性的机场。波尔塔瓦、米尔哥罗德和皮里亚京三处的机场被选中。斯大林亲自参与了此项工作，正如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所说：“他想准确地知道参与行动的飞机的数量和型号、航空汽油的必要数量、起降跑道的必要长度和其他一些细节……”

当筹备工作上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时候，结果却由于两国文化差异造成的苏联指挥人员的猜疑，也由于美国人把一位苏联司务长和一个来自波兰的波兰人送到了意大利的独断专行，使形势发生了骤变。而且此时，又碰上在波尔塔瓦的两名美国人驾车轧死了当地的一位妇女。所有这些集中到了一起，“锄奸局”局长阿巴库莫夫发电报上报给了斯大林。这份电报报告了在波尔塔瓦空军基地服役的科瓦廖夫少将的行动。科瓦廖夫声称：“我们与美国人谈不到一处。不排除在这里，在波尔塔瓦，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科瓦廖夫还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

斯大林在电报上写道：

致法拉列耶夫同志（空军）。

请管住科瓦廖夫同志，并禁止他擅自行动。И. 斯大林。（沃尔科戈诺夫И.，《胜利与悲剧》，2卷本，第1部分，第373页）

这位科瓦廖夫少将究竟是谁？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这位神奇的人物就是果戈理

笔下那位丢了自己鼻子的科瓦廖夫少校的后代。真了不得，这位少将想到哪里去了！但他却说出了克里姆林宫内心的想法（和担忧）：随着胜利一天天来临，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敌意的征兆。

1944年底，美军作战部部长史汀生在与罗斯福面谈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机地将俄国引到基督文明的怀抱中……为此可以使用‘C-1’。”（雅科夫列夫 H.，《富兰克林·罗斯福：人与政治家》，第 383 页）。“C-1”是原子弹的秘密代称。

可想而知，不是鼻子，而是科瓦廖夫少将的耳朵偷听了罗斯福与作战部长的谈话。

这里正好可以回忆一下，1942年4月，罗斯福命令史汀生开始实施研制以腊肠毒菌和炭疽为主的细菌武器来对付德国人的方案。“当我们知道德国人已经制造出了麻痹神经毒气——塔崩、沙林和扎曼时，这个方案就停下来了。因为一旦美国试图对德国平民使用细菌武器，德国人势必会使用这些毒气。”（杜格拉斯 T.，《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招募谈话录》，莫斯科，2000年，第 55 页）

从炭疽病毒到原子弹，是触手可及的事。问题的焦点在于，这一次斯大林尚未掌握可用于回击的武器。

所以，无需夸大罗斯福个人对我们主人公的好感。这是一个“各有所图的联姻”，双方都明白，这是不会长久的。

有趣的是，斯大林在规划未来时，也曾考虑到各种方案，包括撇开罗斯福的方案。

总之，一些著名活动家成为或是有可能成为政治暗杀和谋害的牺牲品。苏联情报机关就研究过刺杀克伦斯基的可能性，因为在某些组合之下，他可能被西方利用，成为俄国民主政府的领导人，不过最终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初步计划罢了。但对被莫斯科认为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继承人（在希特勒被除掉的情况下）的德国驻土耳其大使、前首相弗朗茨·冯·帕彭，确实组织了暗杀，不过帕彭并未受到伤害。

英国情报机关除掉了在盟国占领北非时曾给予他们协助的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和苏波战争的积极参与者、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西科尔斯基拒不接受德黑兰会议对波兰新边境线的约定，这妨碍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妥协。

在被德国人截获的罗斯福和丘吉尔 1943 年 7 月 29 日的电话交谈中，这位美国人断言，达尔朗和西科尔斯基被暗杀的事件是英国人干的，并指责丘吉尔在行动时间的选择上没有考虑罗斯福在即将举行的竞选活动中的利益。简单地说，也就是应该迟一些再除掉西科尔斯基（西科尔斯基将军在从伦敦飞往直布罗陀的途中死于空难）。

罗斯福是这么说的：“我从未说过需要收拾掉西科尔斯基这样的话。我只是赞同您和约大叔所说的，西科尔斯基的执拗造成了大量麻烦和他企图浑水摸鱼。当然，我也想到了，您不得不把他搞掉。归根结蒂，他的存在靠的是我们的慷慨施舍。但是，





这一事变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超出了我的预想。波兰人的选票在芝加哥有着很大的分量。而我需要所有我能够得到的选票。”(杜格拉斯 T.，《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招募谈话录》，莫斯科，2000年，第65页)

稍后，罗斯福补充道：西科尔斯基的末日是“命中注定的”。

这不是一部侦探小说，又是什么呢？

斯大林其实并未组织过对盟友的暗杀行动，尽管讨论过这种可能性。经过在德黑兰与罗斯福的相识和对他的评定，斯大林对他是满意的。让斯大林感兴趣的还有，谁将是下届总统班子里的副总统，即在罗斯福发生意外时的继任者。其时担任这一职位的是斯大林也较满意的亲社会主义的华莱士。而从美国政治风向的转变中冒出来的杜鲁门却打乱了斯大林的预期。

另外，除了我们的主人公之外，丘吉尔也同样在考虑着美国总统的更迭。

我们要提醒一下，在战争之初，美国人“在财政问题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英国人(Γ. 缪勒语)，“罗斯福打断了大英帝国的脊梁骨”。但这样的暗杀行动，谁也没有去谋划过，一些初步的安排只不过是说明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同盟者看到这样做有意义的话，他们会随心所欲地彼此杀个你死我活的。

实际上，大家都在想着等到最佳时刻再最后摊牌。

1945年3月28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厅设宴欢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Э. 贝奈斯一行。贝奈斯不承认慕尼黑协定对自己国家的划分和占据，战时在英国领导了流亡政府的他，现在理应去领导被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与莫斯科有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苏联驻布拉格的间谍头子祖博夫甚至给了他1万美元用于组织逃亡(贝奈斯对这笔款子的收条就保存于卢比扬卡的有关他的卷宗里)。

在招待会上，斯大林曾两次讲话。在两份相互补充的记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两次讲话的内容。一份记录是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马雷舍夫做的，另一份则出自莫洛托夫的秘书Б. Д. 波采罗布之手。

在第一次讲话中，在一长串为红军祝酒干杯之后，斯大林出人意料地给客人们泼了一盆冷水。他说：

“大家都称赞我们的红军，他们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这些着迷于红军的客人们，后面不要感到失望。

“问题在于，现在红军有近1200万人。这些人远不是天使。这些人在战争中变得粗俗了。他们中有很多人跨越了2000公里在作战：从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他们一路上目睹了诸多苦难和暴行。因此，如果我们有些人在贵国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请不要奇怪。我们知道，一些觉悟较低的士兵会纠缠和侮辱姑娘和妇女，会胡作非为。让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朋友现在就明白这一点，以免让我们的红军从

令人向往变成令人失望。”(斯大林 И. В.，《斯大林全集》，第 18 卷，第 361 页)

不过，另一种版本更符合斯大林的心理状态。根据这一版本，斯大林还说，他“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人能将心比心，明白普通红军战士的内心；并希望他们能明白红军战士的感受，他们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在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上一路走过来的感受”。斯大林举杯“为让捷克斯洛伐克人能够理解和宽恕红军战士”而干了杯。

这可是一件新鲜事。斯大林很少道歉，在这种国际性的招待会上，就更加出人意料了。但这样做并不是他感情的自然流露，在他的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着某种实用主义的念头。

很快谜底便揭开了。斯大林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联盟形式。他提议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盟。

在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和反希特勒联盟之后，还要成立一个新斯拉夫联盟。这是为什么？斯大林开始了第二次讲话，以回答这个问题，随后还深化了这一话题：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斯拉夫派和斯拉夫主义者。我们经常被拿来与沙皇时期的老斯拉夫主义者作比较。这是不正确的。

“老斯拉夫主义者，例如阿克萨科夫等人，他们要求在俄国沙皇旗帜下把所有斯拉夫人统一起来。他们不懂，这是有害的观点，也是无法实现的。斯拉夫各族人民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和民族的积淀，有着不同的文明程度和不一样的社会政治制度。斯拉夫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有碍于他们的统一。

“而我们这些新型的斯拉夫列宁主义者、斯拉夫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不是主张统一，而是主张斯拉夫民族的联盟。我们认为，不管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什么差异，也不管生活习惯和民族构成有什么不同，所有斯拉夫人应该相互结盟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德国人。

“斯拉夫人的整部生存史教导我们，要保护斯拉夫民族，这样一个联盟对我们是必需的。

“就拿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为例吧。它们因何而起？是因为斯拉夫人。德国人想奴役斯拉夫人。谁在这两场战争中最受伤害？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受伤害的都是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

“这场战争难道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法国受到的伤害最大吗？不。法国人向德国人敞开了防线。德国人很轻松地就占领了法国北部，而南部甚至都没有碰过。比利时和荷兰一开始就巴结开了德国人。英国只受到了不大的损害。而你再看看，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损害是多么惨重。只有一个保加利亚想避开战争，想要滑头，但也陷了进去。可见，遭受德国人苦难最深的是斯拉夫人。现在我们痛打德国人，很多人都觉得德国人再也不可能威胁我们了。不，不是



这样。

“我憎恨德国人。但憎恨之情不该妨碍我们客观地评判德国人。德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有着很好的技术专家和组织人员，是天生勇敢的好士兵。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会生存下来。”（斯大林 И. В.，《斯大林全集》，第 18 卷，第 361—362 页）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呢？

斯大林已经预料到将与德国打一场新的战争和与西方的对抗。

“我们在打击德国人，事情即将结束。但必须注意到，盟国正在卖力地拯救德国人，与他们达成谅解。对于德国人，我们将毫不留情，但盟国竭力客气地对待他们。因此，我们，斯拉夫人，必须做好德国人东山再起及再次反对斯拉夫人的准备。因此，我们，新型的斯拉夫列宁主义者，坚定地号召结成斯拉夫民族的联盟。

“有传言说，我们想把苏维埃制度强加给斯拉夫人民。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我们并不想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苏维埃制度不是凭愿望就能够输出到国外的，这需要相应的条件。

“我们可以在保加利亚建立苏维埃制度，那里希望这样，但我们也没有这样去做。我们希望在与我们友善的斯拉夫国家里，能够有完全民主的政府。

.....

“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将想办法最快在 15 年内得到恢复。

“加里宁同志高呼：‘复仇！’

“斯大林同志说：是的，德国人会设法复仇。斯大林同志说：若有人认为德国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打错了算盘。一些英国人又重新开始谈论势力的均衡。如果英国人成为德国的半个朋友，那么他们将会失算，将会为此受损。我们现在打击德国人，倘若将来他们还妄想重新崛起并发动新的战争，我们还会打击他们。不过，为了不让德国人复苏并挑起新的战争，就需要一个斯拉夫国家的联盟。”（斯大林 И. В.，同上，第 360、362 页）

所以，英国人将会支持为了欧洲均势的恢复而对德国进行的战争。斯大林提出要保持对抗。当然，为了消除对苏联扩张的顾虑，斯大林强调无意到处推广苏维埃制度。

在招待会结束时，斯大林建议“为独立的、大大小小的斯拉夫民族的联盟和友谊”干杯。

也许，这一天所有在叶卡捷琳娜厅的人都感到特别振奋。是的，胜利已近在咫尺，而同源民族的真正兄弟般的联盟成了即将到来的战后模糊不清的前景的一线光亮。

虽然斯大林也谈到了差异，但此刻，未必有人会想起，其实波兰与俄国从未有过

友善关系；而 1878 年被俄国从土耳其手中解放出来的保加利亚，到头来只让俄国得到了一个亲德的政府。至于南斯拉夫，它同样处于西方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范围之内，至少它的大部分地区是这样的。还有，当时谁也不可能想到，俄国自己也常常把德国看成是对抗英国的国家。此外，所建议的斯拉夫联盟的经济关系总的来说也是难以确定的。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只是在摸索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并在思考如何把在东欧的红军运用起来。

其实，战时建立起来的这个主要由斯拉夫国家共产党人侨民构成的斯拉夫委员会只是一个威信不高的组织。“全斯拉夫大团结的理念对他们来说还是完全格格不入的”（M. 吉拉斯语）。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1944 年 6 月，斯大林在接见斯拉夫代表团时，一边看着用红色标出苏联领土的世界地图，一边指出：“他们永远不会听任这一地区是红色的，永远不会，永远！”（吉拉斯 M.，《极权主义人物》，莫斯科，1992 年，第 59 页）

1945 年 4 月初，斯拉夫的话题得到进一步延伸，当时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重申了自己的论点，甚至还加以强化：

“现在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革命。前不久，英国工党代表团才到过我这里，我们就谈到了这一点。是的，有很多新的东西。是的，甚至在有英国国王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

他突然站了起来，提了提裤子，仿佛在为一场摔跤或拳击做准备，几乎是兴高采烈地喊了起来：

——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过 15—20 年我们就能恢复元气，然后再重新开始！

他的话里含有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可怕的战争毕竟还在进行。但他在选择该朝哪一个方向前进中表现出来的自信，以及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和他领导的这一运动要面对的无法回避的未来的认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拉斯 M.，同上，第 84—85 页）

但与此同时，斯大林是以完全现实的态度看待在共产党员担任着所有要职的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态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吉拉斯说，按实质他们是苏维埃政权，但斯大林反驳道：你们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介于戴高乐的法国和苏维埃联盟之间的某种东西”。

似乎他应该进一步阐述在南斯拉夫强化苏维埃原则的思想，但他没有谈论这一点，反而强调了差别。同时，领袖还说“今天即使在英国的君主专制下，社会主义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显示出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新观点。这就意味着，没有共产党的专政也可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主人公到底怎么了？

他做了进一步说明：“‘如果斯拉夫人能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那么在将来谁的手都不会发抖了。’‘手就不会发抖了！’——他重复了一下，并伸出食指凌空一挥。”（吉拉斯 M.，同上，第 84 页）

是的，世界在变化。在美国罗斯福的“半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社团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之后，是应该出现一种建立在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公正意识基础上的新东西了。列宁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口号不是万能的。“苏维埃政权”，即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和对民众予以社会支持，这些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来实现。

如果将斯大林的这个理念加以发展，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与比如“英国国王的社会主义”，是存在发生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的；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所有民族的泛斯拉夫主义联盟。

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由英国人设置的意想不到的障碍：正是他们（与莫斯科一起）支援南斯拉夫游击队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因此，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支撑的铁托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并可以在东西方之间起到平衡的作用。

这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死胡同。但领袖敏锐的头脑里已经酝酿出一个空前的对苏维埃联盟进行改革的组合方案。即“把苏联与‘人民民主制国家’合并在一起：乌克兰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也将把巴尔干诸国与俄罗斯合并在一起！”（吉拉斯 M.，同上，第 127 页）

我们甚至一眼就能看出，每一次的“合并”都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同样明显的是，莫斯科对这些矛盾的处理，赋予了斯大林不可替代的主持人和协调人的作用。同时，俄罗斯终将可以取得通往地中海和近东的无可争议的出口。整个世界将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这一构想即使作为一个笼统而大胆的想法也够称得上是宏伟的了。没有谁的头脑中会出现这样的组合，哪怕是才智过人、思维独特的丘吉尔也不会。斯大林的气魄之大超出了想象。

## 第二十八章

# 谁攻占了柏林——红军还是盟军？

谁先攻占柏林——红军还是盟军？  
俄罗斯人攻克柏林、德国投降、莫斯科胜利阅兵、斯大林为俄罗斯人民干杯

但是，首先应当赶在盟军之前攻占柏林，正如斯大林所了解的，盟军也在竭力这样做。

4月1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被召回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这一场景仿佛是1941年局势的重演。不过，最高统帅大概已经不可能记得，他自己曾对科涅夫说过的“斯大林是一个诚实的人”这句话了。

出席会议的有国防委员会委员，还有新任总参谋长 A. И. 安东诺夫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C. M. 什捷缅科。

什捷缅科按斯大林的指示宣读了一份侦察电报，上面说到，盟军正在准备攻占柏林的行动，以期在红军之前拿下它！

斯大林没有去深究这个计划一旦得以实现而产生的政治后果，而是问朱可夫和科涅夫：“究竟是谁将先拿下柏林？我们还是盟军？”

从这一问话的语调中可以听出挑战的味道：不能让他们进入我们的柏林！

为什么柏林已经成了我们的？因为在雅尔塔会议上已就德国占领区的划分达成了协议。如果盟国想破坏约定，那么结论只有一个：他们已经开始把苏联排挤出欧洲了。这一点斯大林无需作过多的解释。



两位方面军的司令员立刻就明白了，他们伟大的军功和主要的战利品有可能被抢走。于是，朱可夫和科涅夫都表示，柏林将由他们攻占。

此后，两位元帅连续几天都在总参谋部里制定作战计划。斯大林批准了他们的计划。有趣的是，当斯大林用铅笔在地图上划两个方面军间的分界线时，在距柏林约80公里处停了下来。科涅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在暗示两个方面军要进行一场竞赛”。

朱可夫的回忆录里有一段重要的补充：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说道：一旦德国人在东线对科涅夫进行顽强的抵抗，“要做好用坦克部队从南面向柏林发动攻击的准备”。这是什么样的协商？竞争者就对着朱可夫的后脑勺吹气呢。

科涅夫的解释是，这将使两支部队混杂在一起，并失去控制。不过，他的这个理由没有起到作用，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接到了掉转坦克部队进攻方向的命令。这一细节表明，斯大林还是想让朱可夫获得占领柏林的荣誉的。

虽然对于世界来说，哪一位俄罗斯的元帅攻下了德国首都并不重要，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二战的这场最后决战中斯大林作为指挥者的心态。

德国人进行了英勇的防御，那些未经历过像正规军在俄国经受的那种内心崩溃的“民兵部队”中的少年和老年预备军人尤为拼命。德国的柏林集团军共有150万人，几乎每一个德国士兵的内心深处都被一种恐惧折磨着，生怕他们在东方所犯的罪行受到清算。

苏联的宣传并没让这种对正义复仇的渴望平息下来。几乎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因为父母、孩子、妻子、姐妹和兄弟被杀，心头对德国人有笔私仇要报。正像伊利亚·爱伦堡在文章《清算》里所写的：“谁能阻止我们？莫德尔将军？奥得河？还是民兵部队？不，都晚了。逃窜吧，尖叫吧，垂死挣扎吧，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爱伦堡《战争》，第712页）

苏军的印刷厂印出了这样的标语——“红军战士，你现在站在德国的土地上，是清算的时候了！”在朱可夫给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命令中写道：“给杀人犯的土地以痛苦。我们将为一切进行可怕的报复。”

1945年4月，在离胜利仅半步之遥的时刻，进攻的士兵中难道有谁会有其他的想法！（苏联平民的伤亡不少于1370万人，其中740万是被侵略者蓄意杀害的，210万在德国死于劳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结》，莫斯科，1957年，第330页）

4月20日晚，科涅夫签署了新的命令：“朱可夫元帅的部队距柏林东郊仅10公里了。我命令必须在今夜最先攻入柏林。”

2个小时之后，朱可夫元帅下达了同样的任务：“授予近卫第2坦克集团军如下历史性任务：第一个攻入柏林并升起胜利的旗帜……不惜任何代价，不晚于4月21日晨突破柏林郊区，并立即通报，以便向斯大林同志报告和报纸上刊登。”（斯米尔诺



夫 B. П.,《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第 280—281 页)

两位元帅的竞赛达到了高潮。朱可夫表达得更加明确,“不惜任何代价”这句话直接喊出了这一点。“不惜任何代价”,这意味着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4 月 25 日,柏林陷入包围。同一天,未遇到抵抗的美国部队渡过易北河,并在托尔高市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部队会合。按希特勒指挥部的想法,同盟国军队的会合势必会造成冲突,但事实上,两军却显示出了友好的感情。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德军战线的统一通讯已经被分割并摧毁,可以说,它的核心已被切掉了。

4 月 28 日,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虏的墨索里尼被枪毙,这在有意无意中与罗斯福的心愿吻合。他在一次交谈中对丘吉尔说过:“如果墨索里尼死于该发生的这种情况之前,那么从各方面来看,对我们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杜格拉斯 T.,《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招募谈话录》,第 60 页)

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身亡。

同一天,德国国会大厦顶上飘起了胜利的旗帜。

5 月 1 日清晨,朱可夫得到报告,被带至苏军近卫第 8 集团军指挥所的克雷布斯将军声称,希特勒已自杀,他代表新任内阁总理戈培尔提议进行和平谈判。

克雷布斯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参谋长,战前曾任德国驻莫斯科的武官。现在,1941 年被动挨打的红军的将军们已经站在柏林,德国指挥部军事上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

朱可夫随即给斯大林打去电话。斯大林才躺下睡觉,但朱可夫要求把他叫醒。

斯大林迅速拿起听筒,在听完朱可夫的报告后说道:“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捉他。”

此时,斯大林是否想到了,1941 年 12 月,就是这个朱可夫曾粗鲁地要他走开?……

5 月 1 日,斯大林命令科涅夫从柏林撤出自己的部队,将这个城市“交给”了朱可夫。

5 月 1 日清早,他们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联盟,领袖与元帅的联盟已经接近尾声。几小时之后,莫斯科将举行盛大的五一庆祝活动,斯大林将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接受喜庆的敬礼。而现在,莫斯科仍在睡梦之中。

斯大林让朱可夫早上之前别再叫醒他,因为想在庆祝活动之前睡个够。

领袖是否能很快入睡,就不得而知了。

夜终于结束了。这夜曾是那么漫长。

现在,德国投降在即,胜利者们也将很快举行会晤来确定未来世界的种种规则,这一页历史即将翻过。



德国的投降从4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几次把德国人的提议通告给苏方时就已经开始了。德国人提出在荷兰休战以便把粮食运给平民,希姆莱还通过瑞典大使馆提出接受在西部战线的所有德国部队投降的建议。美国人予以了拒绝。杜鲁门总统通过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转达了他的回复:唯一可以接受的是,德国在所有战线向所有盟国无条件投降。

5月5日,德国新任总理邓尼茨元帅的代表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投降进行谈判。

艾森豪威尔向莫斯科征询,邓尼茨的建议是否可以接受?这里所说的是单纯的军事投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条件不在其中。

总参谋长安东诺夫迅速地作了回复: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苏联在美军指挥部的代表И. А. 苏斯洛巴罗夫转达了这一回复。

但5月5日晚,邓尼茨的代表海军上将弗雷德堡提出,德军只在西线投降。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一提议。于是弗雷德堡请求暂停谈判,以便与邓尼茨进行协商。

5月6日,艾森豪威尔发给安东诺夫两份文件的草案。艾森豪威尔计划,只要斯大林表示同意便签署这两份文件。对于最终决定得由最高统帅来做出,谁也没有疑义。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德国人准备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签署西线和东线无条件投降书的协议。

5月7日晨,安东诺夫以书信形式向美国军事代表迪恩将军提出几点随后得到采纳的非原则性的意见,还建议在柏林举行有朱可夫元帅出席的受降仪式。

与此同时,中欧时间1点41分,艾森豪威尔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约德尔将军在兰斯签署了德国所有武装力量向盟军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协议书。苏斯洛巴罗夫将军代表苏方签署了这一协议书,并在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下补充了一句:不排除以后可签署更完善的文件。

斯大林对此非常不满,尽管他对苏斯洛巴罗夫并没有意见:他毕竟留了一条后路。

5月7日,斯大林给朱可夫打电话说:“今天德国人在兰斯市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肩负了战争的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应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部签署,而不能只在联军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朱可夫Г. К.,《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330页)

5月8日,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尔斯特,举行了新的签字仪式。艾森豪威尔原打算出席仪式,但后来他的计划发生了变化。签署投降书的有英国空军司令、空军主帅亚瑟·泰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巴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拉特·德·塔西尼将军。当然,还有朱可夫。德国方面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

仪式极为庄严隆重,此后还举行了宴会。“英美苏的友谊达到了顶峰”,迪恩将军

是如此评述这件盛事的。

人们喝着、唱着、跳着，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朱可夫跳起了“俄罗斯舞”，这是一种复杂、快速，需要较强耐力的舞蹈。

清晨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到来了，这是自发地在鸣放礼炮。

5月9日凌晨2点，苏联宣告：德国投降了。而盟国在13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宣布了这个消息，所以在这场信息赛中莫斯科输了一局。不过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按照莫斯科的意志进行的。

当然，战争实际上并不是在8日，而是在5月9日这一天结束的。正是在这一天，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解放了爆发了起义的布拉格（德国将军舍纳尔的百万人集群仍在进行军事行动）。5月5日爆发的起义原本就要被德国人镇压下去了，但由布尼亚琴科将军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师突然加入了进来，并在从德累斯顿急行军过来的科涅夫的部队到达之前守住了这座城池。

这就是事件的经过。

5月9日，斯大林通过报纸向人民宣告：“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被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打得跪下的法西斯德国承认了自己被打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接下来他谈到了在兰斯的“预先”投降和在柏林的“最终”投降，并解释了为什么没有立即公布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希特勒分子的话。但今天，在履行投降书条款的德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地放下武器，并向我军投降。”

他提起了“巨大的牺牲”、艰辛、苦难和那些“在后方和前线，为祖国而奉献的紧张劳动”，并且强调了自己新的“斯拉夫”思想：“斯拉夫各族人民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以对德国侵略者及其暴政的胜利而告终了。”

必须强调的是，这正是战后政治的战略方向。除此之外，也暗示了另一个方向：“苏联……既不打算消灭，也不打算分割德国。”

美国人和英国人有意瓜分德国，而刚刚对贝奈斯说再过15年还会与德国发生一场新的不可避免战争的斯大林，现在却希望保全这个国家。这是为什么？看来，他已经考虑到，战后的德国将成为他与伦敦和华盛顿抗衡的盟友。

（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人感到吃惊，但早在柏林会战前夕的4月14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真理报》刊登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局长Г. Ф. 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爱伦堡同志简单化了》，文章否定了那位政论家的反德激情。“杀死德国佬”的口号被封存了起来。现在，德国人应该成为盟友了。）

从情报机关的通报中斯大林得知，他的朋友丘吉尔已着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难以置信吗？“但硬币还有着另一面。日本还没有被征服。原子弹还没有制成。



世界仍处在慌乱之中。共同威胁这一把伟大的盟国团结在一起的关系基础已在瞬间消失。在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敌人。”(丘吉尔 Y.,《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631页)

5月9日,丘吉尔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不应该销毁德国飞机,它们可能还有用。更早一些时候,他电告英军元帅蒙哥马利,让他把德国武器收集起来,并存入仓库。

5月12日,这位英国首相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写道:

1. 我对欧洲的局势深感不安。我获悉美国在欧洲的空军已有一半开始调往太平洋战区。报纸上全是美军从欧洲大规模调走的消息。根据之前的决定,我们的军队看来也要大量削减。加拿大军队肯定要被召回。法国人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共事。谁都明白,不久之后,除了必须留下来管制德国的少量兵力之外,我们在大陆架的武装力量将销声匿迹。

2. 而与此同时,俄国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始终在为与俄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努力,但是,像您一样,使我深感忧虑的是:俄国人对雅尔塔决定的曲解,他们对波兰的态度,他们在除希腊以外的巴尔干诸国拥有的绝对影响,他们在维也纳捅出的麻烦,俄国的实力和在他们控制或占领之下的土地与在其他众多国家里的共产主义方式的结合,而最主要的是其可长期在前线维持庞大部队的能力。再过一到两年,那时英美军队已经解散和撤离,法国军队还未能大规模地组建起来,我们可能只有寥寥几个师,而且大部分是法国师,而俄国有可能保持着200—300个现役师,试问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3. 在他们的前线上方正垂下一道铁幕。我们并不知道在这铁幕后面发生了什么。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一线以东的整个地区很快将完全落入他们的手中。同时,还得加上相连的由美军打下来的在艾森纳赫和易北河之间的一大片地区,因为据我所料,只要美军一撤走,这一地区在几周之后,又将被俄军占领。当俄国人大举向欧洲中心推进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以防止大批德国居民再次向西方逃跑。到那时,又将垂下众多铁幕,如果不是全方位的话,也是大范围的。这样一来,由俄国人占领的好几百英里宽的广阔地带就把我们与波兰隔开了。

4. 同时,我们人民的注意力将被吸引到对已被击垮和征服的德国的严厉态度上,这样一来,如果俄罗斯人愿意,这将很快给他们打开一条通往北海和大西洋水域的通道。

5. 当然,现在最重要的是,在我们锐减我们的军队或是离开占领区之前,应与俄国达成协议或是澄清我们与它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私人的会晤。我将对您的意见和建议表示万分的感谢。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另一种

观点,即俄国的表现将是无可非议的,这当然是一条最好的出路。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力量还未消失之前,与俄国进行协调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丘吉尔 Y., 同上,第 632—633 页)

丘吉尔反对把已深入德国的美军撤走,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在 300—400 英里战线上的控制又延伸了 120 英里。

1945 年 5 月 12 日,“不可思议”计划的最终方案确定。该计划分析了在欧洲对苏联展开军事行动的前景(德国出动 10 个师,英美出动 47 个师)。结论是消极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对英军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步兵兵力是英国的 4 倍,装甲部队是 2 倍。除此之外,计划还指出,这将引发一场后果难料的“与俄国的全面战争”。

美国人也分析了如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的后果,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下属的战略问题委员会得出了一个结论: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谁都不能打败对方。

还必须考虑到当时弥漫在各战胜国里的特殊气氛。

于是,进行战争的压力在消减。需要坐下来磋商了。

但是,丘吉尔还是给英国武装力量下令:禁止空军复员,暂停陆军复员。

尽管丘吉尔现在必须交出战时一直由他领导的英军“作战部”的大权,并进行议会选举,但这位首相还是准备冒一下险。不过工党的领导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否定了丘吉尔提出的把联合政府保持到对日战争胜利之时的建议,决定举行选举。选举定于 7 月 5 日进行,7 月 26 日公布结果。

丘吉尔对自己获胜充满信心。

与此同时,“三巨头”会晤的准备工作也已开始,对于英国首相提出的在会晤前暂不把美军撤出苏占区的建议,杜鲁门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损害“我们与苏联的关系”。

按照斯大林的建议,胜利阅兵式定于 6 月 24 日在红场举行。朱可夫回忆道:“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胜利阅兵将由最高统帅来检阅。”斯大林本人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很快他又表示拒绝。

6 月 18 日或是 19 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叫到自己的别墅,在确认后者的骑术并未生疏后说道,阅兵将由朱可夫检阅,罗科索夫斯基来指挥。朱可夫元帅是这样转述这次谈话的:

我回答说:“谢谢您给我这样的荣誉,但由您来检阅不是更好吗?您是最高统帅,按权利和义务也应该是由您来检阅。”

И. В. 斯大林说:“我来检阅显得老了。您来检阅吧,您年轻一些。”



告别时,我觉得,他明显暗示地说:“我建议检阅时骑白马,布琼尼会指给您看是哪一匹的……”(朱可夫 Г. К.,《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354页)

但是,66岁的斯大林不顾自己的年龄和完全没有骑马的实际经验,曾为亲自检阅作了准备,结果遭到了难堪,甚至是痛苦的失败。

在举行阅兵排练的中央机场与朱可夫相遇的瓦西里·斯大林将元帅拉到一边,说道:

告诉您一个大秘密。父亲为自己检阅进行了准备。但是发生了意外。骑马的第三天,因不会使用马刺,马载着父亲在马场里狂奔。父亲抓着马鬃竭力想在马鞍上坐稳,但没能成功,摔了下来。掉下马时,父亲的肩膀和头都被碰伤了,父亲站起来后,啐了一口,说道:“就让朱可夫来检阅吧,他是个老骑手。”

“你父亲是用哪匹马训练的?”我问瓦西里。

“用的是阿拉伯白马,就是他建议您骑着阅兵的那匹。只是我请您对任何人别说这事。”瓦西里又说了句。(朱可夫 Г. К.,同上,第354页)

这也就是说,斯大林在建议朱可夫元帅去参加一场他自己未能通过的考试。不过对于朱可夫来说,这个任务是轻松愉快的。

6月24日,天空中飘起了毛毛细雨。欢腾喜悦的人群漫步在红场上。10点,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列宁墓上的观礼台。朱可夫与罗科索夫斯基骑着马,乐队高奏起了M.格林卡歌剧《伊万·苏萨宁》中的《光荣颂》,这一旋律唤起了人们对1612年战胜波兰武装入侵者的回忆。接着,罗科索夫斯基报告准备完毕,朱可夫下令开始阅兵。

这是盛典最隆重的时刻!由所有方面军和海军组成的混合编队迈步走过。所有那些活着的和牺牲的英雄们都走来了,在这一刻他们凝成了一个整体。从1941年11月7日那次肃杀而庄严的阅兵式到今天这个充满生机的胜利阅兵式,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时代。

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着的,不是《国际歌》,不是苏联国歌,而是俄罗斯的《光荣颂》。

晚间,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出人意料的祝酒词让许多人都大吃了一惊:

“同志们,请允许我再举最后一杯酒。

“我想为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的健康而干杯。(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乌拉”声。)

“我首先要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

“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因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是公认的苏联各族人民的中坚力量。

“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民族，而且还因为他们拥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的性格和耐力。

“我们的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 1941—1942 年也曾经历过万分危急的关头，那时我们的军队在后退，扔下了我们至亲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地区、卡累利阿-荷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我们之所以扔下，那是因为别无选择。换成其他民族也许会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请走开，我们要另立一个能与德国媾和并保障我们安宁的政府。但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甘愿承受牺牲以保障把德国击溃。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保障。

“感谢他们，俄罗斯人民，感谢这种信任！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长时间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斯大林 И. В.，《论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第 151 页）

这实在令人震惊！他的坦诚博得许多人的好感。一个年轻的“老兵”、19 岁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回忆道，当时感觉斯大林差一点就要承认 20 世纪 30 年代的镇压是一个错误了。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没有发生。谈到错误，斯大林只局限于讲了战争年代所犯的错误，并且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只要他开始重新审视以前的历史，那就如同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也见证了我们的主人公的新的思想动向。

在一个政治局委员分析过去战争结果的小圈子内，斯大林出人意料地说道：“战争表明，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多内部的敌人，不像向我们汇报和我们认为的那样。很多人是白白蒙冤。人民本应为此让我们卷铺盖滚蛋。我们应该忏悔。”

我的父亲打破了沉默：“我们，与规章相反，很久没有召开党的代会大会了。这件事应该办了，也应该讨论一下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历史的问题了。”

H. A. 沃兹涅先斯基表示支持父亲的意见，其他人则沉默不语。斯大林挥了挥手，说道：“党……党怎么了……它已经变成了诵经士的合唱团，一群只会唱哈利路亚的人……有必要先做一个深刻的分析。”（日丹诺夫 Ю. А.，《回首往事》，第 227 页）

6 月 27 日，根据全体元帅的呈请，斯大林被授予大元帅称号。领袖本人对这一称





号表现得非常平静,并且拒绝穿上仿照 1812 年卫国战争时期礼服的特制的服装。

是的,斯大林明白,随着战争的结束,另一个时期开始了。看来,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通过非对抗方式摆脱战争的方法。我们有间接的证明可以说明这一点:苏联签署了布雷顿森林金融会议的文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章程),这是罗斯福的心血结晶,他试图通过该组织和银行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美国倡导的这一吸引苏联共建战后金融和经济秩序的措施完全有可能实现与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和解。在这个方面,两位领导人完全可以达成协议。不管怎样,罗斯福认为,苏联沿着“民主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前进是完全现实的。而正规划着东欧国家未来的斯大林,认为它们的政府不一定要是共产主义的,而是联合的、多党的政府。因此,在谈论胜利阅兵式后斯大林的那段著名的祝酒词时,必须考虑到对于世界和俄罗斯来说,的确存在着另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而且,在谈到胜利后最初的那几周和那几个月时,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所有的苏联民众原来都期盼着,在 5 月 9 日之后马上就可以松一口气,生活可以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他们突然发现,生活不仅一点点都没有轻松起来,反而更加艰难了。现在,工作日又恢复到了 8 小时工作制,而非 11 小时——废除了义务加班,但工资却急剧地减少了。军工企业转产民用产品也很不顺利,经常因为原料不足而造成停工,这又影响到了本来就微薄的工资。在战争中消耗巨大的农村同样没有迎来任何曙光。1942 年发布的那些提高劳动日义务工作量和对未完成者处以刑事处罚的命令还在继续执行。他们可被迫在自己的集体农庄里进行长达 6 个月的劳动改造,并扣除个人工资的 25% 上交给国家。政府也没有要减轻每户农家都需上缴的农业税的打算。

实际上,胜利之后,除了情绪高涨之外,非战时的生活并未到来。

战争给国家造成的这种创伤,也许需要 100 年才能恢复,也许永远也无法恢复。红军的人员损耗达 866.84 万人(所有阵亡、伤亡、被俘后未能再回来的实际人数)。再加上平民的伤亡,共达 2660 万人,其中包括 1370 万德军占领下的平民受害者。

在总共 456 万苏联俘虏之中,有 183.6552 万人回到了祖国,其中近 100 万人重新回到红军部队中服役,60 万人转到了工矿企业的劳动大队工作,而 23.34 万因为被俘而声名狼藉的人被发配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劳改营。

“二战”中,德国武装力量的伤亡总计有 1184.4 万人。(《20 世纪战争中的俄罗斯和苏联:研究中的统计》,莫斯科,2001 年,第 229、236、483、509 页)

在宣告胜利的那一时刻,在这个寂静下来的国家的上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诗歌中刻画的那位哀伤的安琪儿一闪而过。告别的时刻到了。

就在此刻，在这特别的瞬间，  
满怀着庄严和悲哀之情，  
我们永远与他们分开了：  
祝捷的排炮声将我们分离。

咆哮着的炮身钢管提示我们，  
我们不在伤亡者之列。  
他们在硝烟中远去，  
去了那站满同志的彼岸……

## 第二十九章

# 盟国波茨坦会议

盟国的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得知美国有了原子弹、在伊朗巩固地位的失败尝试

斯大林是乘火车去柏林出席会议的。考虑到有遭到无识别标志的歼击机袭击的危险，走空中路线的方案未被接受。

1945年7月17日，盟国政府首脑会议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开幕。这个日期看起来似乎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它已经偏向了另一边，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就在前一天，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原子弹爆炸试验。

丘吉尔对筹备这一爆炸试验是知道的，“这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许多事情提供了可能”。早在7月4日，丘吉尔便对在日本使用这种新型武器表示了赞同。现在他很清楚，从今以后，在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西方已不再受制于斯大林了。如果说在原子弹试验之前，统计数字表明，为了获得胜利，需要付出100万美国士兵和50万英国士兵的生命，或是需寻求红军的帮助的话，那么现在用原子弹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此，斯大林失去了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占据优势的王牌。当然，美国人一共也只有两枚原子弹，而日军占据着广大的区域，不可能全用这个可怕的铁家伙来消灭，但所有人都明白，既然有了两枚，那么很快就会有3枚、4枚、5枚……

不过，此刻身处战败国首都的胜利者们依旧还是盟友。他们要解决相当简单又

相当复杂、通常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每个人也都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德国的命运。我们要提醒一下，根据雅尔塔协议，德国应该被瓜分。但是现在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于是德国没有被正式地分割，但被划分为几个占领区。借助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法国人也分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包括在柏林市内。

斯大林明白，时代变了，不应该抱有幻想。早在希特勒自杀 1 周前的 4 月底，身在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莫洛托夫与杜鲁门总统就有过一次极不愉快的会面。这位美国总统直截了当地说道：“斯大林应该信守承诺。”美国以后不会“在单行道上行驶了”。他要求苏联遵守雅尔塔协议，包括在波兰的问题上，并说波兰是未来美苏合作的一个象征。杜鲁门尖锐的口气令莫洛托夫很厌烦。后来哈里曼把这称之为“冷战的开端”。顺便说一下，当时，恰恰是哈里曼在圣弗朗西斯科声称：苏联正在东欧构建自己的帝国，而美国应该制止这种“多米诺效应”。

不过，了解这一切的斯大林明白，要在刹那间改变历史进程的惯性、改变各种意愿和利益的全面斗争是不可能的。他的口袋里装满了王牌，最主要的是，他的身后有 1200 万人之众的胜利之师。

当然，这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人都希望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可以争论不休，可以讨价还价，若是谈不拢，可以把问题交给外交部长们去讨论。

被斯大林提到会议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有：战争赔款的问题、分割德国舰队的问题、恢复与以前的德国盟国，但在解放后与之断绝了关系的各个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罗马尼亚）外交关系的问题、鉴于波兰民族统一政府的成立而取缔波兰流亡政府的问题、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问题、托管地和前殖民地命运的问题、把柯尼斯堡移交给苏联的问题，以及有关海峡的问题。

斯大林表现得极为自信，时不时开点玩笑，很机智。正如丘吉尔所写的，“他轻松友好的举止让人感到非常愉快”。但是，在与杜鲁门、丘吉尔和艾德礼（工党在选举中获胜之后代替了丘吉尔）的论战中，斯大林却表现得咄咄逼人。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感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

只要一看到盟友露出破绽，他就能马上抓住它们的矛盾，并加以讽刺。他成功地使起初表示反对的盟国承认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四国的政府，因为他把这一问题与盟国提出的承认意大利政府并接受其加入联合国的建议“绑”在了一起。对于盟国提出的四国尚未举行民主选举、尚未与他们签订和平条约的反对理由，斯大林回应说：难道意大利不是这样吗？你们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就不承认“你们的”。

有时候，斯大林会把丘吉尔搞得很可笑。例如在 7 月 22 日的会议上，当谈论到



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殖民地时，斯大林、丘吉尔和杜鲁门之间竟彼此有趣地挖苦起来。

斯大林：比如说，从报纸上我们得知，艾登先生在英国国会发言时宣称意大利永久地丢掉了自己的殖民地。这是谁决定的？如果说意大利丢掉了它们，那么又是谁找到了它们（笑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丘吉尔：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英国军队以长期努力、巨大损失和非凡胜利征服了这些殖民地。

杜鲁门：就这些？

斯大林：可柏林是红军攻克的（笑声）。（《在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国际会议上的苏联》，第 6 卷，《苏美英三大同盟国领导人的柏林（波茨坦）会议（1945 年 7 月 17 日—8 月 2 日）》，第 141 页）

意大利战败后，盟国商定均分它的舰队，并且夺取它的殖民地。美国并不反对的黎波里塔尼亚成为苏联的托管地。这一点在苏联大使葛罗米柯与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在 1945 年 6 月，即在会议前夕的书信中被确定了下来。

除此之外，苏联还强调了自己在土耳其的利益（海峡问题和收回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市），并提出要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和熊岛）和丹麦（此刻正驻扎着苏联军队的伯恩霍尔姆岛）建立军事基地。

其实斯大林是清楚的，盟国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向他作出让步，但这样一来至少可以讨价还价一番。

而对于战后赔款、波兰西部的边界线、获得三分之一的德国舰队和纳粹主要战犯必须受到惩罚这些问题上，斯大林的表态则直率而强硬。

但并不能认为，斯大林感觉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其实远非如此。例如，他不得不在获得 30% 的已被盟国占有的德国黄金储备一事上做出让步。的确，因这一让步他获得了更多的战争赔款，但这种交易明显是不平等的。他也未能使限定了黑海海峡航行制度的蒙特勒公约得到修订，也没能使盟国同意其在黑海海峡附近建立军事基地。虽然丘吉尔向斯大林承诺会在建立军事基地这一问题上给予支持，但盟国实际上是糊弄了他：把与土耳其政府就此事达成一致作为必要条件写进了备忘录。

还有一个事件能够证明斯大林是多么的不易：他因为身体不适，竟然有一整天（7 月 29 日）缺席了谈判，临时代替他的是莫洛托夫。

总之，我们的主人公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毫无疑问，当杜鲁门告诉他美国已拥有了一种“威力非凡”的新型炸弹的时候，斯大林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的确感到了震惊。这意味着，又要面对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竞赛了。苏联才刚刚极其艰难地积蓄

了一点力量,新的打击又紧随而来! 再一次必须忘掉所有的安宁,并鼓足干劲,“否则我们会被压垮”。

在波茨坦,还有一个重要的议案遭到了斯大林的否决。这一议案涉及建立一个理应有苏联全权参与的新的世界金融体系。

看来,正是这时斯大林意识到罗斯福的理念不会有任何结果:西方在遏制苏联。当然,最终的决定是后来做出的,是在斯大林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时候。这是一个美国对受到破坏的欧洲给予经济援助的计划,这将给华盛顿控制欧洲创造机会。

在波茨坦,杜鲁门把自己前任的想法(建立一个苏联在其中也拥有实际权力的类似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货币体系)变成了建立一个纯粹由美国来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国人宣布,这些从苏联索赔中强行夺走的德国黄金是属于被占领的国家的,而不是属于德国的,应该用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美元”得到巩固。

为实现这一计划而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似乎就应该获得全世界所有“无主”的黄金:“纳粹的”、“犹太的”、被推翻了的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君主们的,还有被尼古拉二世运至美国、英国和法国用于购买武器的“沙皇的黄金”(超过 3000 吨)。至 1917 年秋,俄国只获得了所运出黄金价值四分之一的订货。

已经到来的这个世界完全不是苏联的胜利者们所期盼的。历史的镜子折射出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最艰难的时期:西方对莫斯科越来越敌视了。斯大林不得不灵活应对以保全颜面,并且作出让步。他的在西部边界有友好政府执政的国家,以及能够自由出入南部海域的主要想法常常受到非议。

早在 1945 年 1 月(雅尔塔会议前),苏联就试图与伊朗政府签约,以获得对伊朗北部省份油田和伊朗阿塞拜疆油田的勘探权和开采权。得知这一消息的丘吉尔表示坚决反对:莫斯科的意图是恢复世纪初沙俄帝国和大不列颠帝国在这一地区进行的那场以两国分享在波斯利益告终的争斗。而现在,英国不打算再让俄国人染指“自己的”石油了。美国国务院同样反对苏联在这一地区进行经济渗透。不过,罗斯福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件就这样被耽搁下来了,以待更合适的机会。

在这一事件上,斯大林只需要与英国人作斗争,美国人对伊朗并不感兴趣。早在 1944 年 2 月,罗斯福便对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指出了划分近东的线路图:“波斯的石油是你们的。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由我们共享。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它是我们的。”(耶金 兀,《战利品:争夺石油、金钱和权力斗争的世界史》,第 423 页)

这一情况发生在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 年 11 月 9 日是苏联和英国的军队本应从伊朗撤出的日子。但莫斯科却没有急于这样做,因为它设想的经济方案还未得到



认可。对于美国说要将撤军问题递交至联合国讨论的威胁,用 J. 凯南的话说就是,斯大林指出:“我们不会因惭愧而死的。”

1945年9月,刚成立不久的阿塞拜疆民主党要求赋予南阿塞拜疆民族文化的自治权,此后又宣布了自治区的成立。

同一时期,伊朗的库尔德斯坦也出现了一个民族政府。

在伊朗这个棋盘上放下这两颗新棋子之后,就像克里姆林宫感觉的那样,斯大林明显地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而且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然,目前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状态。1946年5月,苏联-伊朗石油公司成立,沙赫签署了一个带有附加条件的成立证书:必须征得下议院的同意。结果苏联的军队撤走了,而下议院的议员们却投了反对票。

斯大林通常表现出来的风格是坚毅、稳定,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作出让步。

为了威慑敌人,美国分别在8月6日和9日向日本的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了原子弹,与此同时的8月8日,苏联也对日宣了战。这样一来,日本高层对还有可能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抵抗所抱的希望就落空了。8月10日,东京宣布同意投降;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在法律上意味着废除所有原先的国家法规、终止所有原先的国际条约等等。因此,日本企图用战前的协议来重新修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决定,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8月15日,日本与美国、英国和中国签订了停战协议。而此时,苏联红军仍继续着军事行动,以确保能够占领旅顺港和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美合作的一个片段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8月11日凌晨2点,英国驻苏大使克尔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被请到了莫洛托夫那里。苏联的这位部长告诉他们,他同意美国提出的关于战后对日本实行民主化的建议,并且还表达了认为盟军应该有两位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此,哈里曼强硬地回答道:美国与日本打了4年了,而苏联只打了2天,最高统帅只能是美国人。

美国人打算让盟国插手日本事务。早先与美国人商定的苏军登陆北海道的计划在最后一刻被美国人取消了,虽然莫斯科已经预定把这个岛纳入自己的占领区了。哈里曼反对像对德国那样共同把战败的日本分成几个管理区,这让斯大林觉得,杜鲁门开始实施在对德战争中未能实现的意图:最大限度地让苏联远离胜利成果。

8月11日,也就是在莫洛托夫与哈里曼进行会谈的这一天,杜鲁门下令,在日本投降后立刻占领大连。不过,当美国海军陆战队赶到大连的时候,他们看到已经有苏联士兵在那里了。

不久,杜鲁门便坚决要求斯大林授权美国空军在千岛群岛设立基地。我们的主人公被激怒了。他回答道:只有和战败国才这样说话,苏联可不是战败国。



我们要强调一下,尽管世界正向新的对抗迈进,但此前结盟的往事还深深地留在几位领导人的意识中,这一政治因素和越来越近的“冷战”苗头是现实地并存着的。与此同时,斯大林从情报机关的报告中了解到,美英的军方领导人已对苏联的陆军实力进行了评估。

很快,斯大林收到了华盛顿提出的进行财政援助的条件。苏联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对援助也是抱有渴望的。

看来,斯大林一时还没有完全从战时的概念中解脱出来,把与盟国的合作当成是战时独特的租借法案的延续。但实际上,不可能再出现任何租借法案了。

对于租借法案,我们必须特别指出,它是资源互利互惠的一种交换。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派出了最多的军队,而盟国给予了武器和物资的援助,以苏联士兵的生命保全了盟国人民的性命。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向苏联提供了各种武器、弹药、汽车、生产设备、原料、金属、航空汽油、鞋子、布匹和价值 112.60344 亿美元的粮食。这个数目大约是苏联工业生产总值的 4%。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某些种类的技术装备(登陆艇、非接触式扫雷器、某些类型的雷达和水纹声呐设备)当时在苏联并无生产。(《北方护卫队(1941—1945 年):俄罗斯联邦档案馆文献资料》,莫斯科,1993 年,第 4—6 页)

## 第三十章

# “秘密战争”的开始

“秘密战争”的开端、斯大林的疾病、莫洛托夫同意制度自由化并被西方誉为“继承人”、斯大林狂怒、对战友加强监控

8月20日,即在美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的两周之后,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研制原子弹的专门委员会(贝利亚为主席,成员有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别尔乌辛、万尼科夫、扎韦尼亚金、库尔恰托夫、贾皮才)。同时,还设立了委员会的下属工作机构——第一总局,万尼科夫任主任,副主任有扎韦尼亚金(副内务人民委员)、H. A. 鲍里索夫(苏联计委弹药局局长)、П. Я. 梅希克(副内务人民委员)、П. Я. 安特罗波夫(副有色冶金人民委员)和 A. Г. 卡萨特金(副化学工业人民委员)。

制造新武器的紧张工作以一种新的力量继续进行下去。

此后,在经常用于非官方试探的《新时代》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有关美国原子弹的故作姿态的文章。它的主要结论其实是说给华盛顿听:美国利用核武器来统治世界只是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看法,并非杜鲁门总统本人的观点。这样一来,白宫的主人便可在这个话题上发表意见了。

很快,杜鲁门表了态。这是在 M. 科尔默已经离开莫斯科以后。总统的回答没有给莫斯科留下一线希望。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新的机密、它不承认东欧亲苏的各国政府、苏联将得不到海峡的控制权,还有就是对原子弹的拥有的确将影响到美国的政策。

必须要谈到的是,在《新时代》发表那篇文章之后和杜鲁门在伦敦讲话之前,召开了盟国外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旨在讨论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在会上,莫洛托夫提出的欲享有对黎波里塔尼亚的监管权和参与对日监察委员会工作的要求被直接驳回。美国也无意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缔结和平条约。总之,美国就是不愿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莫洛托夫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同意法国和中国的外长也来参加会议,尽管波茨坦会议已决定不邀请他们参与讨论欧洲事务。他们是反对苏联的。遭到斯大林责备之后,莫洛托夫要求改变会议程序,并暗示这是斯大林的意思。他暴露了领袖的立场,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

总的说来,这次会议没能取得什么成果。这可以从英国外交大臣 Θ. 贝文发表的意见中看出来:“苏英关系正朝着以前我们与希特勒的那种关系方向偏移。”(乌特金 A.，《全球性冷战》，莫斯科，2005 年，第 342—343 页)

得到杜鲁门这个致命的回答后,斯大林没有惊慌。从这段时期他给在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米高扬的信中判断,他只是单纯地对这个地区的经济问题感兴趣:是否有便利的港口,出口西方的红鱼子酱的生产情况如何。

10 月 8 日,斯大林乘火车前往索契(加格拉)休假。为了保密,报纸上公布的启程日期为 9 号。据当时还是列宁格勒军事反间谍学校学员的 Φ. 兀. 博布科夫证实:在此前夜所有学员都被送至莫斯科,他们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其他军人一起承担了铁路沿线的护卫工作,每公里站有一人。由于要保证斯大林专列的运行,其他火车只能停在谢尔宾卡火车站,满腹牢骚的乘客们被迫从这里步行到莫斯科。知道这件事以后,斯大林处分了贝利亚。

但问题不在于哪一天出发,而在于发生了更严重的情况:斯大林生了重病。关于这个情况,斯维特兰娜有个概括:“父亲病了,时间拖得很长,病情也很重。”(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44 页)而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直接说出是中风。从斯大林的休假记录表上可以看出,1945 年 10 月 9 日到 12 月 27 日之间,他不在莫斯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 年)》，莫斯科，2002 年，第 398 页)

中风就是脑溢血,其后果不是死亡就是瘫痪,完全或部分地丧失工作能力。斯大林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得以痊愈,这不禁让人有理由怀疑,他其实只是患了高血压。

10 月 24 日,斯大林在加格拉的别墅里接见了哈里曼,后者带来了杜鲁门 10 月 14 日写的有关召开和平代表会议的亲笔信。很明显,美国大使想核实一下我们主人公是否还能够自行活动。稍后他就得到了证实。斯大林在门口迎接了大使,在欢迎之后告诉哈里曼,美国人发来的所有通报都会立即呈报给他。这里,斯大林是在暗示,哈里曼完全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他们走进办公室,开始了一段拘谨的谈话。斯大



林谈到了日本的局势,他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来控制日本,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在麦克阿瑟将军直接指挥下由美国人单独操纵。斯大林表示他不同意眼下这种处理方式,他口气坚决:“苏联作为主权国家,是有自尊的。但麦克阿瑟做出的决定没有一个曾向这个国家的政府通报过。苏联实际上成了美利坚合众国在太平洋的附庸国。苏联不能接受这种角色。美国没有把苏联作为盟国来对待。但是,苏联无论在远东,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附庸国。”(乌特金 A.，《全球性冷战》，第 361 页)

哈里曼回忆道,斯大林说:“长期以来,美国人生活在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下。也许,俄罗斯最好也走上孤立主义这条路?”(乌特金 A.，同上,第 362 页)大使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孤立主义政策意味着“维护苏联对整个东欧的控制”。

斯大林受到严重刺激。20 年来,日本一直是俄国的威胁根源,而现在他希望终止这一切。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他从情感上始终对 1905 年那场以俄国失败而告终的俄日战争耿耿于怀,所以充满悲壮情怀的《瓦良格人》和《在满洲里的小山岗上》都成为他喜爱的歌曲(况且,正是由于华盛顿对东京的支持才导致了俄国领土的丧失)。

一个月后,哈里曼致信美国国务院汇报说,对于斯大林来讲,“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与“日本问题”密不可分。如果不考虑苏联在日本的立场,他是不会在前一个问题上作出让步的。“第二天,哈里曼明白了,莫斯科的观点是,不赞成战后与美国结盟”。(邓恩 D.，《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第 384 页)

他们对两国合作有着不同的理解。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准备削弱苏联的安全和主权,并认为在外交对话中使用核威胁是不可接受的。他的逻辑简单明了,符合人民的想法:“他们想窃取我们的胜利成果!”若没有了这场胜利,这个工业化时代的主要成果,苏联的存在就失去了其神圣的意义,就像斯大林统治本身将失去意义一样。

然而,在国家和它的领导人面前还有一个新的宏伟任务: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8 月 19 日,报纸上刊登了新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意味着苏联人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振被战争摧毁的经济。不可能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在这部各国争夺全球资源、交通枢纽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史中,有这么数页特别醒目地描述了这种斗争的不妥协性。也许,用“不妥协性”这个词是过于中性了。

通常,对一些“专门行动”,公众要在它过去多年之后才会有所耳闻,而更多的时候是永远无法得知。那些隐藏在外交官谈判和国家元首们冲突背后的、他们同时代的人所看不见的东西,可以称作是持续进行的不同强度的军事行动。

“二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的相互关系本可以朝同盟者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果斯大林接受了条件苛刻的美国贷款的话。但这现实吗?

1945年9月14日,在日本投降后两周,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在M.科尔默率领下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美国人提出一系列作为苏联换取美国经济援助的条件:从东欧撤走苏联军队;对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予政治支持;公布与这些国家贸易协定的内容;公布军备占整个苏联生产的比重;公布经济的重要数据,并提供可能条件让美国检查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保障美国人财产的安全;给予美国电影、报纸和杂志在苏联境内自由发行传播的权利。

如果在这之前苏联领导人还希望得到美国援助的话,那么在美国人提出这些条件之后,这种希望便破灭了。斯大林明白,他们与他谈话,说得好听点像在与一个弱者谈话;说得难听点,不如说像在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谈话。

美国手里握有原子弹,这让他们的立场出奇地强硬。

在谈判之前,9月4日,美国空军接到命令:“在苏联及受其控制的地方挑选出大约20个适合原子弹战略轰炸的最重要的目标。”

被列入计划轰炸名单的城市有:莫斯科市、高尔基市、古比雪夫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新西伯利亚市、鄂木斯克市、萨拉托夫市、喀山市、列宁格勒市、巴库市、塔什干市、车里雅宾斯克市、下塔吉尔市、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市、彼尔姆市、第比利斯市、新库兹涅茨克市、格罗兹尼市、伊尔库茨克市、雅罗斯拉夫尔市。

对于局势的分析可知,即使在遭到核打击之后,苏联也有能力夺取西欧,并且不排除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美国继续着它的核攻击计划,并且这种认为自己的安全不会受到危害的完全自信一直保持到1949年9月25日。这一天,苏联宣布,它同样拥有了原子弹。

不过,看不见的战争不仅存在于核攻击的准备工作中,还有其他更加独特的手段。由美国情报人员制定的最宏伟的计划之一,是由艾伦·杜勒斯来具体实施的。如果用神秘主义的术语来形容他,此人可称得上是魔鬼。

杜勒斯首次与斯大林交锋是在1945年2月,当时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正与来到瑞士的德国党卫军驻意大利分队领导卡尔·沃尔夫将军举行谈判。苏联情报机关得知了由凯赛林指挥的德国驻意大利军队投降的条件和这次谈判的消息,于是斯大林下了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即一旦投降,德国的“意大利”军队将很快出现在东线。

1945年3月23日,斯大林给罗斯福写信道:

向您通报:我必须告知您,德国人已经在和盟军司令部谈判,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有可能将三个师从意大利调到苏联战场。

我必须对您说,如果在东线的奥得河的某个地方有可能让德国人在某种条件下投降并且对苏联军队开辟战场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将此告知英美军事指



挥部,要求指挥部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谈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国彼此之间不应有什么秘密。(《1941年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莫斯科,1976年,第214—215页)

结果,罗斯福下令暂停谈判,杜勒斯被迫中止了自己原本可以取胜的计谋。

但不久之后(总统已是T.杜鲁门),杜勒斯递交了一份关于国家安全的报告,这份报告彻底改变了情报机关的业务方向。报告的主要思想是:如果美国表现得消极被动,他们将输给苏联,所以应该针对苏联及其盟友进行持续、秘密的破坏活动。杜勒斯的构想是:常规侦察占10%,秘密战争占90%。

这就意味着干涉苏联的内政,促使它的领导人做出错误的行动,并制造出迫使他们做出这种行动的局势。虽然有了这种意图,但杜勒斯应该明白,他将与曾经赢过他一次、有着从事此类行动丰富经验的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关交手。

就拿“特列斯特”行动来说,这是契卡针对亚历山大·库捷波夫领导的白俄组织——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的一个大动作。在几年的时间里,“特列斯特人”牵着白军分子的鼻子,最后使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名誉扫地,而库捷波夫本人则在巴黎市中心被苏联情报人员绑架。

不过,杜勒斯的策略并不只局限于一个乃至几个行动,而是破坏敌对国家的源源不断的行动。使之成为对敢于领导全球对抗西方的苏联的惩罚。

杜勒斯是否明白地缘政治的一个真相:控制东欧是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基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谁主宰了欧亚大陆,谁就将主宰世界”。如果不明白,那么他的理念还是基于地缘政治对抗的基本思路:想将自己的影响从德国进一步扩大到中国的苏联应该被粉碎。所以,斯大林其实别无选择。斯大林明白,与杜鲁门达成协议就意味着将苏联置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意味着引进多党制、新闻自由和其他民主自由,其结果,苏联作为一个伟大强国将消失;而他,斯大林,运气好一点是大权旁落,运气不好则是性命难保。

1945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28周年纪念大会上,莫洛托夫发表了演讲。他语气自信地说,在国际关系中把原子弹作为施压的手段是错误的,并承诺,苏联也将拥有“核能和许多其他东西”。这里他指的是由航天计划领导人谢尔盖·科罗廖夫主持的正在研发中的导弹。

战争动员事实上已经开始,很难说它将耗费多少代价。但有一点,必须与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同,这已经说明了任务的宏伟。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实行了“古拉格”经济,呼吁爱国主义,在“古拉格”体制下建起了“棍棒研究室”、封闭的科研中心和实验室,强化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与世界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强化了对民众的经济压力。

11月15日,杜鲁门、K.艾德礼和加拿大总理M.金格在会晤时表示,核武器的制造方法应对所有人保密,并建议在联合国成立一个旨在“彻底消除”将核能用于战争的委员会。这样,他们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了:不容许苏联掌握核武器。

没人能够想象,如果这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苏联将会发生什么。他的继承者会向西方让步吗?斯大林应该被这样一个念头困扰着:自己身后能留下什么?战争岁月中,国内成长起众多新人,军队、工业、贸易和商品分配等部门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集团。在党的领导层也存在这种现象:只要看一下核武器专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就能注意到,里面全都是斯大林提拔的人。在党委、经济部门、安全部门里,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在军队中,朱可夫觊觎着领袖地位。地方上,第一书记们的小团体巩固着自己的势力。在最基层的日常生活中,复员军人近乎无政府的情绪正在蔓延。在负荷沉重的农村,越来越多的人要么期待着解散集体农庄,要么盼望着允许自由贸易。

1945年11月至12月期间,苏联的最高领导层爆发了一场真正的大动荡。这场动荡的起因是《真理报》上刊登了丘吉尔对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在战争年代所发挥的作用作出高度评价的一段引文。此时斯大林正在休假,代替他行使职权的是批准发表该文的莫洛托夫。11月10日,平地一声惊雷,斯大林给“四人小组”发出电报:“我认为发表丘吉尔对俄罗斯和斯大林的赞词是个错误。丘吉尔才需要这些赞词,好让其不洁之心过得去并掩饰他对苏联的敌意……发表这类文章,我们是帮了这位先生的忙。现在,我们有不少负责人,受到丘吉尔、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们的称赞就高兴得撒起欢来,反之,受到这些先生的批评时就垂头丧气。我认为,这样的情绪是危险的,因为这滋长了我们巴结讨好外国人的习气。需要与这种巴结外国人的现象作无情斗争……苏联人不需要来自外国领导人的称赞。至于我个人,这种称赞只会让我觉得厌恶。”(引自:丹尼洛夫A.,《1945年至1952年的苏联最高权力机关(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人物、思想、政力》,莫斯科,2002年,第22页)

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回信里承认发表丘吉尔的讲话是自己的错误。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12月3日,英国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对外国记者的检查有所放松。的确,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书刊审查制度变得比较开明了。还在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的招待会上,莫洛托夫就对美国记者说:“我知道,你们这些记者希望废除俄罗斯的书刊审查制度。如果我同意在有回报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你们会说些什么呢?”(《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197页)

12月1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其驻莫斯科记者写的关于苏联政治局内部就伦敦外长会议的评价出现分歧和斯大林不满美英顽固立场的文章。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事情累积激怒了斯大林。他得出结论,别人想在他休假(或生病)时架空他,实现制度自由化,允许外国报刊(西方监督的第一标志)讨论苏联的政治机密。

12月2日,斯大林收到了《每日先驱报》报道的情报,他给莫洛托夫打电话加以指责。此后,斯大林阅读了《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并给中央委员会的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和马林科夫发去密码电报,他的结论是:“应该追究莫洛托夫的责任。”

对此,这四个人马上作出了回应。四人小组集体汇报说,他们“下达了进行严格审查的指令”,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出版局向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汇报外国记者的电文,同时撤销了戈罗霍夫出版局副局长职务。总之,都是些官样文章。

12月6日,斯大林发出了一份新电报:

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收。

你们的密码电报已收到。我认为这份电报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结果,一方面是由于你们三个人的天真幼稚,另一方面,是由于第四位委员,即莫洛托夫的手段灵活。不管你们在那上面写了什么,你们都无法否认,莫洛托夫是看过塔斯社的电报、《每日先驱报》的通讯、《纽约时报》和路透社的报告的。莫洛托夫早于我看到这些消息,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报道里对苏联政府的诽谤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威望和利益。然而,在我介入此事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种丑恶现象。为什么他没有采取措施呢?难道不是因为莫洛托夫认为出现这样的诽谤相当正常,特别是在他对外国记者作出对他们的通讯报道采取纵容态度的承诺之后?我们谁也无权单独更改我们的政策方针,但莫洛托夫给了自己这个权力。这是为什么?有什么根据?难道不是因为他工作计划中就包含了这些诽谤吗!

你们将密码电报发过来,认为这样便可以掩盖问题了;打了做具体工作的戈罗霍夫一记耳光,就认为事情到此结束了。但你们错了,就像历史上试图掩盖问题而最终得到相反结果的人们那样犯了错误。收到你们的密码电报之前,我本想只处分莫洛托夫就够了。现在看来这还不够。我确信,莫洛托夫并不十分珍视我们国家的利益和我们政府的威望,他只求在几个外国小圈子里获得声誉。我不可能再把这样的同志视为自己的第一副手了。

这份密码电报我只发给了你们三位。我没有发给莫洛托夫,因为我不信任他周围一些人的忠诚。我请你们将莫洛托夫找过去,把我这份电报完整地读给他听,但不要给他副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197—198页)

“不十分珍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个指责已经是相当严厉了。

但“我不信任他周围一些人的忠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斯大林是指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吗？

此刻，在莫斯科的人们明白了，事情变得严重起来。

我们收到了您的密码电报。我们把莫洛托夫叫了过来，完整地给他读了电报。莫洛托夫沉思片刻，说他犯了许多错误，但认为不信任他是不公平的，还落泪了。

我们从自己的方面向莫洛托夫指出了他的错误：

1. 我们提到莫洛托夫在伦敦犯下的大错：他在外长理事会上交还了苏联在波茨坦会议上争得的地位，并屈从于英美的压力，同意由五位外长共同讨论所有的和平条约。当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责成莫洛托夫改正这个错误时，他毫无必要地向大会声称这是政府的指示。其表现在外国记者看来就是莫洛托夫是赞成妥协政策的，但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固执己见。

.....

5. 最后，我们告诉莫洛托夫，他在最近这段时间犯下的所有错误，包括在书刊审查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都是在奉行对英美妥协的政策，并且在外国人眼里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莫洛托夫有一套自己的与政府和斯大林不同的政策，他们和他，即和莫洛托夫可以达成一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198—199页）

在电报结尾，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保证，“根本谈不上我们在掩盖问题”。

莫洛托夫单独发来一份悔过书：“我认识到，我犯下了草率的机会主义错误，给国家造成了损害……我将努力用行动来赢得你的信任。这种信任对每一个诚实的布尔什维克来说不只是个人的信任，而是党的信任，对我来说这种信任重于生命。”（同上，第200页）

看起来，大家都认为这个话题结束了。接下来，要么惩罚，要么宽恕。但不知为何，斯大林并不罢休。12月8日，他给“三人小组”写道：“这份密码电报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因为其中存在着一系列明显虚假的立场。此外，我不赞同你们对实质问题的解释。”

12月9日斯大林再次发来电报，但这次，根据收件人来判断，他已经平静下来，只是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在分析了从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到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外交事件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因为我们立场坚定,从而赢得了在伦敦讨论的那些问题上斗争的胜利。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意味着美国和英国在自己伦敦会议的立场上作出了让步,因为这将是一场没有吸收中国参与讨论欧洲问题和没有吸收法国参与讨论巴尔干半岛问题的会议。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的坚定立场,我们现在取得了伦敦会议上所未能取得的成果。

2. 我们赢得了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斗争胜利。这些国家的大选结果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当时我们在这些国家的问题上犹豫了,没有表现出坚毅的精神,我们无疑会输掉这场战争。

3. 你们一度曾向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恐吓屈服,开始动摇,对外国记者采取自由主义的方针并让自己的政府受到这些记者的侮辱,指望以此来讨好美国和英国。你们的这些打算,当然是幼稚的。我担心,你们受这些自由主义影响将中断我们的强硬政策,并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困境。正是这段时间,所有的外国报刊都在叫嚣,说俄罗斯坚持不住了,他们让了步并将继续作出让步。但发生的事件帮了你们,你们及时转回到强硬的政策上。显然,与美国和英国这样的伙伴共事,如果我们屈服于他们的恐吓,如果我们表现得犹豫不决,那么我们是不可能达到任何严肃的目标的。想从这些伙伴那里获得什么,必须用坚定不移、坚忍不拔的政策武装自己。

4. 我们必须把这种坚定不移、坚忍不拔的政策贯彻在即将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的工作中去。斯大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201—202页)

## 第三十一章

# 罗斯福不再归来

罗斯福永远回不来了、苏联情报机关在加拿大失手、苏联的“新十二月党”、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更迭、“空军领导人案”、美国人拒绝提供贷款

这段斯大林集团内部斗争的小插曲，一下子折射出了领袖和“继承人们”之间此后的对立。从今以后，斯大林有了猜疑。

预定在 12 月召开的外长理事会会议已经在斯大林监控下进行了。会议取得了成功。莫洛托夫与美国国务卿 Ⅱ. 贝尔纳斯和英国外交大臣 Ⅲ. 贝文达成了共识。

12 月 15 日，会议在白雪皑皑的莫斯科召开了。事实上这是东西方企图达成妥协的最后一次尝试。斯大林的与会给会议的成功带来了希望。

的确，对于雅尔塔的回忆感染了谈判者们，仿佛罗斯福又回来了。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贝尔纳斯奉行着从前的政治路线，他认为非对抗性地讨论问题更加有效，更有前途。斯大林虽然很强硬，但也是善于妥协的。继在伦敦的正面冲突之后，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心理氛围就完全两样了。

不过，顽强斗争总还是有的。首先是在东欧的问题上。贝尔纳斯强硬地说：要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政府进行改组，要让相当数量的民主党派人士进入其中。他还提议，责成布加勒斯特当局实施大赦，释放自 1944 年 8 月 23 日爆发反安东内斯库政变以来被捕的所有政治犯。



这时,莫洛托夫给了贝尔纳斯一个重击。莫洛托夫提醒自己的这位同行,在罗马尼亚受到镇压的只是那些与纳粹、与被定为战犯的安东内斯库政权合作的人,以及法西斯组织“铁卫军”的成员。

这样一来,就变成贝尔纳斯在为战犯辩护了。

至于保加利亚政府中的民主党派问题,其实他们本身在政府中就是存在的,因为在执政的祖国阵线联盟中,不仅有共产党,还有农业劳动人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

在指出贝尔纳斯的要求毫无道理的同时,莫洛托夫还提醒道:意大利和法国根本就没有进行过选举。

英国外交大臣 Э. 贝文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吃惊。他明白,美国人放在第一位的是尽可能与莫斯科达成一致,而不是大英帝国的利益。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在日记中写道:贝尔纳斯对与俄国人达成协议的内容“不太感兴趣”,“因为其中涉及了他一点也不了解的罗马尼亚人、朝鲜人和伊朗人。他只对这一协议将在我们国内造成的政治影响感兴趣,俄国人对此也是清楚的。为自己代表团表面上的那点成绩,贝尔纳斯已做好了做出实际让步的准备”。(凯南 Дж.,《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眼中的二战外交》,莫斯科,2002年,第189页)

伊利亚·列宾的油画《扎波罗热哥萨克写信给土耳其苏丹》正是在这个时候拿给贝文看的,因为斯大林从这幅历史画卷中感受到了尖锐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潜台词。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有时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纸,就像扎波罗热头领那样对战友们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给英国!”(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75页)

实际上,如果盟国想要继续施加毫不妥协的压力的话,那么伦敦外长理事会会议的完全失败和斯大林要“打发走”盟国的明显意图,就会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是否准备放弃战后和平协调事务的机制问题。所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强硬立场还是带来了成果。最终,不是美国人不关心英国的利益(虽然这的确也没他们什么事),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盟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上的让步,条件是现政府中要各加进两名反对派的代表。

这样也就达成了一种妥协。各方同意在苏联的参与之下,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委员会,这使莫斯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给对日占领政策施加影响;确定了下一届参加和平会议的组成名单,并同意成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

这显然是斯大林的成就。休假归来的他向战友们显示了实力和成效。他似乎觉得,在世界政治方面,可以回到过去的“罗斯福式”的那种关系上。他甚至与贝文重新谈起了黎波里塔尼亚的问题,说“英国有印度”,“美国有日本和中国,可苏联却什么都没有”。

这位英国人当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屈从。贝文说:苏联的势力“从吕贝克一直延

伸到了旅顺港”，这已经很不错了。

对会议结果感到沮丧的贝文私下向美国人抱怨道：苏联在希腊、土耳其和伊朗这些战略要地“紧贴着大英帝国”。

这种巨人“紧贴”英国堡垒的描述，正是伦敦情绪的一种反应。

与此同时，这个巨人及其领导人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国家在西方和东方的安全，并建立一个完全和谐的利益平衡。所以希望莫斯科外长会议能为此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斯大林就有关美国向苏联提供金融贷款的可能性与哈里曼重启了对话。这种转变的潜台词不难读懂：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为何不也回到罗斯福留下的遗产上去呢？言下之意就是，科尔默关于贷款及严格控制其用途的建议简直就是胡扯。

但事态并没有像克里姆林宫设想的那样发展。早在1945年9月5日，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侦察情报处的一名密码译员伊戈尔·古琴科叛逃，并向美国人供出了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从事核问题工作的苏联间谍的名单。从这一刻起，斯大林的西方伙伴们开始明白了，他们低估了“约大叔”。也许，他们这才第一次认真考虑，如果核垄断的大棒从他们手中滑落了，将会发生什么。

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苏联社会焕然一新。这种重获解放的感觉让人们变成了巨人，也被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团结在了一起。但与在战时国家财富翻了一倍的美国不同，苏联看起来却像是一个战败国。尽管当局也努力哪怕是能最低程度地去改善人们的处境，但他们的力量还是太微薄了。

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些随身带有自由精神这一重磅炸弹的过去的前线战士，完全有可能结成一股政治力量。说句超前的话，我们要强调一点：从长远来看，当苏联政坛的高层停止更新换代时，当局对前线战士的态度成了出现所谓“勃列日涅夫停滞”的因素之一。

胜利是战争的结束，胜利也是新一场战争的开端，这种情况把日常的政治生活变成了对于众民来说不可理解的压力来源。可以说，人民的忍耐力已经耗尽了。

例如，喀山、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的军工厂在1945年7月至9月陆续爆发了骚动，工人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还有很多人要求返回（当初从那里）被疏散和被征召过来的故里。

民众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他们常将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涂黑之后再加以理解。例如，现实中犯罪率比战前其实是大大降低了，可人们却觉得是上升了，外出更危险了。1940年，莫斯科市登记在案的刑事犯罪有65997起，而1945年则为16418起，1946年是20785起，并且随后几年的犯罪率都在下降。1940年登记在案的杀人案有291起，1946年则是110起；盗窃案分别是44763起和13296起，诈骗案分别为994起



和 208 起。只有武装抢劫案的数量有较大增长：1940 年是 26 起，1946 年是 103 起，1947 年和 1948 年都是 175 起。（祖布科娃 E.，《战后的苏联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1945—1953 年）》，莫斯科，1999 年，第 91 页）

1945 年 7 月 7 日，当局宣布大赦，释放了那些判罚不重，刑期在 3 年以下的犯人，但刑事惯犯不在此列。

不过，人们对那些可以放肆地用收缴来的武器乱开枪和可以打警察的“自由自在的”前线战士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整体印象：好像这 800 万复员军人准备要干出些反社会的事情来似的。

当然，经历了生死磨难的 800 万复员官兵是一股空前的力量。难怪在给他们下定义时用了“新十二月党人”一词，尽管这个“十二月党人运动”从来也没有组织起来过。

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同伴间对现实不满的言语，以及对作为最高执政者斯大林的批评，这些确实是有的，但也仅此而已。对于国家领导层来说，这些现象暂时并无危险，但随着外部压力的逐渐增大，就有可能从中产生出反对派。

1945 年 12 月 29 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此时，国防委员会已有 4 个月如同被撤销了那样，所以党的最高机关的这次会议意味着向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的过渡。斯大林提出了几种方案：

第一，组建新的人民委员部——农业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和建筑与筑路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这就意味着军工企业转为生产民用产品的深化。同时，对几个人民委员部进行拆分。

第二，解除 A. И. 沙胡林航空工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他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他的过失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生产出来的飞机事故频发。关于这一点，领袖的儿子瓦西里在波茨坦就向领袖汇报过。

第三，国防人民委员部与海军人民委员部合并，斯大林继续担任该部人民委员，而布尔加宁则担任他的主管常务的副手。如此一来，斯大林就通过政治上的任命加强了对军事部门的领导。

第四，决定派遣年轻一代领导团队到苏联驻外大使馆工作，以此解决在外交代表机构扩大了一倍之后产生的外交官匮乏的问题，同时也“稀释”了那些老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对外政策部。

此外，组建了外交事务委员会，其成员为：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

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是由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 C. H. 科鲁格洛夫替代贝利亚接管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这并不是贝利亚失宠了，而只是反映出他的确忙于研制原子弹方面的事务。科鲁格洛夫是马林科夫提拔上来的人。不过这次变动使得贝利亚失



去了直接领导安全机关的可能性。他从一个多方位地统管一切的领导人变成了一个“部门专家”。类似的这些人事调动，譬如后来把卡冈诺维奇从中央委员会调到工业建设部，使得他们远离了决策中心。

结果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中，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军方的势力被削弱了，而斯大林、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影响则加强了。

不过，涉及沙胡林被黜和此后空军主帅 A. A. 诺维科夫被捕的情况，在斯大林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人知道内情，一直到审问了瓦西里·斯大林之后，才得以澄清。有一种说法是，瓦西里抱怨飞机质量低劣的私下动机是他想要把诺维科夫在河岸边的那栋宽敞的别墅占为己有。直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但在与军事反间谍局“锄奸局”局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的交谈中，瓦西里证实了确实掌握有能证明飞机质量低劣的大量材料。此后，斯大林本人也确认了这一情况。不过，即使瓦西里觊觎诺维科夫别墅这一动机是存在的，那也是潜在的因素。这是在侦查员审问斯大林这个儿子的时候（在领袖去世之后）找出来的动机，虽然也得到了瓦西里的承认。（克沃尔科夫 B.，《处决前的忏悔——苏联国家全部特大案件侦查员的回忆录》，莫斯科，2006 年，第 230 页）

尽管我们对“别墅动机”的真实性倍感怀疑，但这一事件却也包含了其他发人深省的东西。战后的苏联形成了一个小的享受着很高物质水平的权贵阶层，他们是将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学者、党的领导人和商业人士。这些人获得了对于苏联来说空前的财富（在普遍仍处于贫穷的背景下），他们理应明白，这些财富并不牢靠，并有可能随时失去。

在战争年代，军事装备生产的工艺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大偏差，为此在前线付出了血的代价。在战争取得胜利后是应该进行整改了。但哪一个是容易调整的呢？只要固定下来的那一套生产流程、工艺操作依然在实施，只要军队还同意接收这样的产品，而厂长们仍如战争年代那样自行其是，就很难说这些权贵们的态度会发生变化。

“空军领导人案”里包含着若干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斯大林渴望驯服那些获得了很大自主权的军工生产者。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改变了歼击机生产工艺的马林科夫的专横。当得知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和航空工业部长沙胡林两人私自作出了去除一种飞机的“多余的”翼梁时，斯大林终于失去了忍耐力。（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 457 页）

战争结束了，但战时的秩序依旧在继续运转着。

的确，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斯大林和儿子瓦西里在波茨坦见面之后，弗拉西克打电话给诺维科夫，让他给小斯大林授予少将军衔。

诺维科夫对此无动于衷。

1945 年 12 月 31 日，就在元旦前夜，斯大林打电话到诺维科夫家问道：“您怎么



样,诺维科夫同志,您如何看待给瓦西里授予少将军衔一事?”诺维科夫表示反对,说瓦西里还太年轻,所受教育也还不够,还必须再学一点东西,哪怕到空军学院再学一学。斯大林听完这位元帅、两次苏联英雄奖章获得者的话后说道:“不用写授予军衔的事了。请提供一个总的名单吧。”(诺维科娃 C.，《父亲的时空肖像:空军主帅 A. A. 诺维科夫》，莫斯科,2000 年,第 91 页)

1946 年 3 月 2 日,报纸上刊登了授衔决定,其中就包括瓦西里·斯大林。3 月 4 日,诺维科夫被撤职,不久之后便受到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审判:“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罪恶勾结,生产出有瑕疵的或有严重设计和生产缺陷的飞机和发动机,并装备给苏联空军,结果使空军战斗部队出现大量事故和灾难,包括飞行员的失事身亡,而在机场上停放着大量的飞机在等待修理,其中一部分已不能再用,势必报废。”(诺维科娃 C.,同上,第 96—97 页)

这位空军主帅不喜欢斯大林,这一点在他女儿的回忆录中清晰可见。就像所有的杰出军事领导人那样,他会去冒擅自做主的风险。他与“锄奸局”的关系异常紧张。早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时期,诺维科夫就下令不要将在前线被击落,而后返回部队的飞行员通报给反间谍侦查员。

诺维科夫在被免职后曾向朱可夫寻求建议和帮助,但后者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断言道:“他们想找一个替罪羊。”朱可夫尚不知道,自己也将成为这样的替罪羊。

对自己周围的人进行了新一轮调整之后,斯大林希望此刻的国际形势能让他或多或少安静地去从事经济的恢复工作。美国情报机关认为,在 15—20 年内苏联将一直忙于恢复受到破坏的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但莫斯科并未花费这样长的时间,包括制造出原子弹也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事实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 1949 年 8 月就已成功爆炸,这成了一个杰出的成就,成了斯大林的新胜利。

1945 年底,斯大林认为苏联该喘口气了。古琴科叛逃的事件原则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情报工作所有的国家都在搞。加拿大方面对此保持了几个月的沉默,这表明他们并不愿意弄出动静。

这一时期主要的事情不是在莫斯科,也不是在渥太华,而是发生在华盛顿。1946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见了贝尔纳斯,并向他说明无需对莫斯科进行妥协。这是杜鲁门对贝尔纳斯从俄罗斯参加完外长理事会会议回来后在 12 月 30 日发表的声明的回应。贝尔纳斯相信在公正和智慧基础上实现和平是完全有可能的。杜鲁门则看到了另一种未来——“美国主导的世界”:“我毫不怀疑俄国有意入侵土耳其和占领通向地中海的黑海海峡……如果不以铁拳和强硬的语言对抗俄罗斯的话,我们就将处于另一场战争的边缘……”(乌特金 A.，《全球性冷战》，第 377 页)

这样一来,保持非冲突关系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美国控制了世界的三分之

二，而苏联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地区。两大巨人互相对视着，并不知道将会等来什么。

1946年1月30日，杜鲁门请求国会批准给伦敦提供近40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人须对美国开放劳务和商品市场作为回报。大英帝国实际上又一次（继大西洋宪章之后）向大洋彼岸的“亲戚”签了投降书。

要知道就连斯大林也没有失去对美国援助的期望，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天真，而完全是因为斯大林存有爱好和平的观念。

几乎就在美国向英国提供贷款一事得以落实的同时，1月23日，我们的主人公会见了美国大使哈里曼，并谈到了苏联想向美国贷款一事，但听到的回答却是：所出现的摩擦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非常困难。这是一种外交辞令，其实就意味着断然拒绝。

## 第三十二章

# 斯大林停留在战前的认识之上

斯大林停留在战前的认识之上、对选民发表演说：“苏联前所未有地巩固”、Д. 凯南的“长电报”、丘吉尔在富尔敦市发表“铁幕演说”

因被推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2月9日，斯大林在国家大剧院发表了演说。这一演说完全是一份国情咨文，其中对前一段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予以了总结，并为未来的发展制定了目标。但华盛顿还是感受到了其中的威胁，因为他们事先就认定能够听到这种威胁。

斯大林的演讲是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战争的原因作为开场白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的，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进行着一场争夺原料和销售市场的周期性的激烈斗争。

事实上，领袖是在重复自己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当时持这一结论的还有科学院院士瓦尔加。

斯大林一直保持着对瓦尔加的信任，邀请他参加了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并把“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放在了自己思想政治方针的首位。斯大林对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寄予厚望，但最终也未能等到它的到来。

但瓦尔加在1945年得出了其他的结论，于是斯大林与瓦尔加发生了冲突，这表明领袖没有意识到西方发生的变化。“战后的”瓦尔加的主要观点是：在战争进程中，

国家调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成长起来了，其中还包含了一些计划经济的成分，这缓和了危机的出现。

不过，2月9日，斯大林并未谈及资本主义的未来，他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问题。他说：“战争像是对我们苏联制度举行了一次考试”，“我们苏联的社会制度获得了胜利……并证明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按外国报刊的说法，苏联的国家制度（还有多民族的苏联）是“人为的且无生命力的建筑物”，斯大林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表示，这些问题令他深为激动。结论是：苏联前所未有的巩固。

接着，他列举了1913年和1940年国家经济的数据。生铁产量由1913年的422万吨增长到1940年的1500万吨，钢产量由423万吨增长到1830万吨，煤炭由2900万吨增长到了1.66亿吨，石油从900万吨增长至3100万吨，商品粮由2160万吨增长至3830万吨，皮棉由74万吨增长至220万吨。

斯大林并没有说，这些都是他领导下取得的成果，但即使不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说，没有集体化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果。他还提到了那些企图“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

他宣布“近期将废除配给制”，并将扩大日用必需品的生产，降低所有商品的价格。

在制定未来的目标时，斯大林说，在最近的3个五年计划内应该将经济水平提高到1940年的3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认为，我们的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这时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据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他们不应受到批评，不应受到检查。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这不仅对事业有裨益，而且对胜利者本人也有补益，这样会少一些骄傲，多一些谦逊。”（斯大林 И. В.，《斯大林选集》，3卷本，第3卷，第273页）

按照会议速记记录，听众对这段话报以了笑声与掌声。为什么会引起他们发笑呢？领袖又一次向他们提出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遵守严苛的要求和拧紧螺帽。但人们信任他，因而兴高采烈、笑逐颜开。是的，他们并不惧怕艰辛的劳动。

在美国，对这段演讲持有两种理解。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尽管情报专家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但问题并不在情报方面，而在于苏联并不打算步英国的后尘。

1946年2月初，美国报刊开始大肆炒作“古琴科案”。记者德鲁·皮尔逊就对“俄国最高层中军国主义小集团的伪善，以及他们实施的破坏和间谍活动提出了指责。很明显，这个小集团不仅打算要压制伊朗、土耳其、巴尔干诸国，还要尽可能获得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地位”。（《冷战（1945—1963年）历史的回顾》，莫斯科，2003年，第



385 页)

间谍案成了一个公开的丑闻。

就在这一时段,2月22日,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去一份史称“长电报”的分析报告。这份文件不是提出什么启示,而是明确断言未来美国和苏联将不可避免地相互对立。战时同盟的一页应该果断地翻过去了,对于苏联想要巩固自己世界地位的所有企图都应该用遏制政策予以回击,对双方合作和妥协抱有的幻想应该抛弃。不过,凯南也强调指出,可以“不诉诸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就遏制住苏联。

这位美国外交官对苏联内政(和斯大林本人)的批评是值得关注的。他说:

第一,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的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却承认武力的逻辑。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某个地方遇到强大阻力时,都会退却,而且也是经常这样做的。当它知道对方掌握着足够的武力,并准备使用这些武力时,它很少会急于展开鲁莽的攻击。因此,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下,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

第二,在与整个西方世界对抗时,苏联并不软弱。因此,他们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力量。而对于这个因素,我们自己是可以施加影响的。

第三,作为国内政权的一种形式,苏联体制还未最终被研究清楚。另外,这一体制是否能够较好地经受住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向另一群人)的权力顺利交接,现在也必须进行认定。列宁逝世是这一链条的第一环,结果导致了国家整整15年的衰败。斯大林的去世将是第二环。但这对于这个国家还不是最后的考验。苏联内部体制现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不久前领土扩张的成果,受制于一系列沙皇制度曾遇到过的额外压力。我们有证据证明,自俄国国内战争爆发以来,俄国人民的主体在感情上与共产党的学说从来未曾像今天这样疏远。在俄国,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如今也是最高的专制管理机关,同时也是鼓舞精神的源泉。因此,内部的巩固和不停的运动并不能视为是一种保障。

第四,在苏联安全范围以外的所有的苏联宣传,基本上都是具有消极性和破坏性的。因此,如果用具有建设性的、明了的纲领与其进行斗争,就不会构成大的困难。(凯南 Д.ж.,《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眼中的二战外交》,第468—469页)

我们注意到,这份电报里的一个重点就是谈到了斯大林之后的权力交接问题,即

很有可能是一场伴随着国家震荡的对领导地位的争夺战。

不难理解为什么白宫会需要这份“长电报”：报告的思想为未来扫清了道路，未留下任何疑问。

斯大林在2月9日的演说中提出了新工业化和自卫防御的任务，而凯南对此的回应是在任何方面都不退让。

但凯南只是个次要官员，所以他的报告里鼓动思想理由另外一个人传达给国际社会，不一定是官方人士，但必须是权威人士。

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在杜鲁门总统在场的情况下，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这恰恰是“这个城市和世界”所需要的文告。

丘吉尔谈到了这个“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的，横贯大陆”的“铁幕”。

丘吉尔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向苏联公开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甚至呼吁要吸取战前对希特勒采取绥靖策略的教训，不能再让“这样的灾难重演”了。

斯大林的这位前盟友的主要思想是：“通过战争年代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交往，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最蔑视的莫过于软弱，特别是军事上的软弱。因此我们应该根除力量均衡的理论，或者说根除国家间政治平衡的理论。我们不能也不该从取得最小优势的角度来制订自己的政策，这样会挑起别人与我们进行武力的较量。”（丘吉尔 V.，《和平砥柱》，莫斯科，2004年，第488页）

这位英国前首相理应还清欠美国的债。

3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对斯大林的采访。斯大林对这位英国人的演讲的本质下了定义：“丘吉尔先生的目标就是战争，是在号召与苏联进行战争。”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政策，对苏联扩张的指责进行了反驳：“苏联希望保证自己在未来的安全，渴望在这些国家里能够出现与苏联真诚友好的政府。”这意味着，斯大林还是抱有一丝期望的。

但已经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了。他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取得的胜利原来是个空彩头：美国行动了，就像坦克师进攻骑兵那样。



## 第三十三章 新的继承人

新的继承人、逮捕空军领导人、马林科夫失宠、“朱可夫案”、将军们的情绪

现在，斯大林又一次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了。

1946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前一天召开了全会。会上讨论了人事调整的问题，增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为政治局委员，布尔加宁和柯西金为候补委员。此时政治局委员的组成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候补委员是：沃兹涅先斯基、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和柯西金。

在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职位上总共才干了一年的 A. A. 库兹涅佐夫（战争年代他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和仍保留着莫斯科党组织领导职务的 Г. М. 波波夫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此时书记处的组成是这样的：斯大林、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波波夫。

同时掌管着干部管理局的列宁格勒人库兹涅佐夫在书记处的出现，说明了日丹诺夫地位的加强。库兹涅佐夫实际上成了书记处的负责人，因为正是由他在负责安排议事日程，并主持日常工作，除此之外，他还领导着俄罗斯各个州委的工作。

组织局里也出现了新面孔：从车里雅宾斯克调来了当地州委第一书记 H. C. 帕托利切夫，来负责组织指导处；从维尔纽斯调来了联共（布）中央立陶宛中央局主席 M. A. 苏斯洛夫，来领导对外政策处；高尔基州委第一书记 M. И. 罗季奥诺夫调任为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外省人在中央机关的出现说明斯大林开始实行一种新的触犯了老一代领导层利益的策略。也许,他想到了1941年7月时面对的恐惧,当时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来到他的别墅,并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

在向全体会议提出人事调动的动议后,斯大林按照既定程序问道,有无意见和其他建议。都没有。于是他笑着补充道:“多好的全会,没有人反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27页)

这句话里包含了轻微的讽刺,因为他对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作出了评价。

3月14日,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将苏联人民委员会更名为苏联部长会议。斯大林是这样解释这一更名的:“人民委员或是政治委员折射出的是制度尚不完善的时期、内战的时期、进行革命破坏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25—26页)

不过为什么要改变已经习惯了的名称呢?要知道,全世界各国都是部长,没有什么委员。这件旧的军大衣早就该换下来了。

现在斯大林变成了总理。这个称谓上的细微差别也表明了这个国家及其领袖地位的巩固。

3月19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成立了苏联部长会议,斯大林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兼国防部长。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谈到部长会议的人员组成时,斯大林忘了宣布造船工业部领导班子的变化,而提醒了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马林科夫。后者正是在这一瞬间表露出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

但忽然在领袖身边的人中出现一些新的征兆。马林科夫已经不是他的继承人了,而是列宁格勒人库兹涅佐夫!

4月13日,斯大林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央机关中各派的力量对比。此前,一份由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波波夫提出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各书记职责分工的建议报告交到了他的手中。按这份报告,马林科夫应该主管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主管向书记处会议和组织局会议提交议题,并主持这两个会议;库兹涅佐夫负责掌管苏维埃政府和党的机关中的领导干部的配置,监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州委的工作,主管中央委员会干部管理局;而日丹诺夫则主管宣传机关的工作。

但斯大林实际上却降低了马林科夫,提高了库兹涅佐夫。4月13日,政治局做出了决议,对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责进行了分工。库兹涅佐夫开始领导书记处,而马林科夫只负责组织处。同时,库兹涅佐夫还保住了监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州委的工作。这位新人地位得到如此的提升证明他获得了继承人的地位,而



对于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征兆。

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现在马林科夫既不是政府的副主席,也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主角了。

那么下面该轮到贝利亚失宠了吧?

不过类似的事件并未发生。3月28日,在部长会议分配职权的时候,他分得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下子从斯大林的众多副手中脱颖而出。由贝利亚掌管的部门有:交通部、黑色冶金部、西部地区煤炭工业部、东部地区煤炭工业部、西部和南部地区石油工业部、运输机械制造部、燃料工业的企业建设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国家监察部和天然气和燃料管理总局。

在党机关里失去了部分权力之后,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结盟在经济和强力部门得以加强。可见,这并不是失宠,而是另一种情况。

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斯大林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4月底,沙胡林、空军的诺维科夫元帅和几位将军,以及中央干部管理局两个分管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的处长被捕。据苏多普拉托夫证实,此事的发生是因为军事反间谍部对“抱怨飞机质量低下的飞行员”的信件进行了调查。

“当斯大林的儿子、空军少将瓦西里和阿巴库莫夫告诉斯大林,航空工业的最高层为了获得奖金和奖章而企图隐瞒设备的缺陷时,斯大林勃然大怒。而在政治局中,正是马林科夫负责工业事务,还因出色地组织了军工产品的生产而获得了金质奖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调查结果表明,造成悲惨后果的空难数量的统计是存在错误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空难的原因被归结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而非仪器设备的缺陷。在战前,对这种事故的惩罚极为严厉。当曾完成过跨越北极不着陆飞抵美国的飞行员瓦列里·契卡洛夫在1938年的航空事故中牺牲后,负责他安全的那位工作人员被逮捕并遭到枪决,因为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这位民族英雄的殉难。

“1946年7月,斯大林在国家安全部最高层会议上询问阿巴库莫夫:‘诺维科夫和沙胡林的罪行已被证实,您建议采取哪一种惩罚?’阿巴库莫夫毫不犹豫地回答:‘枪毙。’

“‘枪毙很容易,困难的是迫使他们工作。我们应该迫使他们工作起来。’斯大林出人意料地说道。

“沙胡林和诺维科夫被捕,斯大林要求从他们那里得到揭发军队领导层的供词。他们的供词又与朱可夫元帅和其他将军的案件联系在了一起,并对马林科夫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苏多普拉托夫 И.《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第498—499页)

正如我们所见,瓦西里·斯大林很少参与侦查。可以说,他起到了一个了解实际

情况的专家的作用。需要提醒的是,领袖是不能忍受欺骗的,而欺骗的事实的确是存在的。

1946年5月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斯大林提出的决议:

1. 经查实,马林科夫同志作为航空工业部门和飞机验收,以及空军力量的负责人,道义上应该对这些部门工作中被揭露出来的丑恶现象(生产和验收质量不合格的飞机)负责。他明知道有这些丑恶现象,却没有警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2. 有必要将马林科夫同志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除名。

3. 批准帕托利切夫 H. C. 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4. 本决议交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核批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206页)

也就是说,根据“各族人民之父”自己的提案,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他接班人的马林科夫的地位又被降了一级。不错,马林科夫依然是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但莫洛托夫也依然是政治局委员,而他的实际影响力其实是不大的。

5月4日,政治局任命军事反间谍局局长阿巴库莫夫为国家安全部部长,换掉了由贝利亚安插的梅尔库洛夫。这位新部长不属于贝利亚一派,在战时,“锄奸局”是直属斯大林领导的。于是,国家政权里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脱离了贝利亚的掌控。

苏多普拉托夫写道,在 A. A. 库兹涅佐夫和阿巴库莫夫之间“建立了最紧密的友好关系”。斯大林身边明显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与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公开对抗。这种对抗发生在1950年,并以“列宁格勒案件”而告终。

现在到了该谈一谈“朱可夫案”的时候了。这位伟大的元帅明显骄傲自大起来了。在1946年3月之前,他任驻德集团军总司令,驻防在柏林。他经常与艾森豪威尔会面。1945年8月,应朱可夫的邀请,艾森豪威尔来到莫斯科并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朱可夫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如他的同事科涅夫证实的那样,朱可夫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总是清楚的”。确切地说,朱可夫讲的是自己打败德国的杰出贡献。难道他还缺少哪一种荣誉吗?但看来,他还是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

这么做未必会让斯大林感到高兴。美国媒体上刊登的朱可夫的谈话和照片的选编呈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从中看到的不是朱可夫尚可原谅的自吹自擂的特征,而是他对昔日盟友们过分的同情,即“莫洛托夫综合症”。

朱可夫的“自我膨胀”发生在这个对于斯大林来说与西方关系极为复杂的时期:



苏联在战后没有得到任何战利品,没有得到的黎波里塔尼亚,没有得到在海峡的基地,没有得到卡尔斯和阿尔达汉,没有得到伊朗北部的租让权,也没有得到北海道。1946年5月,在美国甚至以开战为威胁的强压下,苏联不得不从伊朗撤出了自己的军队。同样,苏联也不得不从满洲里撤出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成功地固守在那里。但美国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军队从中国撤离。甚至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新疆地区(莫斯科曾在那里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也不得不停止援助并放弃了这一地区。

而就这黯淡的背景下,二战的英雄、全军高层公认的首领却宣称要效法拿破仑。

朱可夫案件由军事反间谍局调查。从被捕的诺维科夫元帅的口供中查明,朱可夫曾在小圈子里说自己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总之就是有过“反斯大林的言论”。

1946年6月1日,召开了讨论朱可夫案件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朱可夫元帅、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大将、装甲部队元帅雷巴尔科、赫鲁廖夫大将、Ф. И. 戈利科夫上将、什捷缅科上将,以及全体其他政治局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

讨论开始时并没有预示对朱可夫有什么不好。斯大林请最高军事委员会书记什捷缅科宣读了诺维科夫的供词,并从中得出结论,朱可夫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讨论形势时,“不赞许地评价了斯大林”。

科涅夫元帅是这样叙述这一讨论过程的:

A. A. 诺维科夫供词的实质可以归纳为,朱可夫元帅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对苏共中央和政府心怀不满,其党性值得怀疑。

什捷缅科读完材料之后,斯大林发了言。他指出,朱可夫把红军的所有胜利都归功于自己。朱可夫在柏林的记者招待会上、在报刊上多次声称,伟大卫国战争中所有重要的战役之所以能够成功进行,要归功于他——朱可夫元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大本营策略的制定者;正是他,积极参加了大本营的工作,从而保障了苏联武装力量的主要成就。

斯大林又说道:朱可夫周围的人同样卖力地、过分地抬高朱可夫在击溃法西斯德国中的功绩。他们强调朱可夫起到了主要活动家和在制定与实施所有战略作战计划中最积极的参与者的作用;而朱可夫对此并不表示否定,从一切迹象判断,他本人是赞同这种评价的。

“那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呢,”斯大林指着出席会议的大本营成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说道:“难道我们都是傻瓜?只有朱可夫同志一个人是聪明

人，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制定和实施所有战略作战计划的天才？”斯大林接着说道：“朱可夫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在这次会议上非常详实地审理清楚他的问题，并做出如何对他进行处理的决定。”（科涅夫 И. С.，《方面军司令员笔记》，第 588 页）

好像是，朱可夫这次要完蛋了，会议结束之后他将被逮捕。但实际上事情却按照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完全出乎了斯大林的意料。科涅夫、雷巴尔科、罗科索夫斯基、赫鲁廖夫先后发言，都为朱可夫做了辩护。他们说朱可夫性格古怪而固执，但是一位政治上忠诚的人。

接着武装力量部干部管理局局长戈利科夫发了言，他“向朱可夫头上泼了很多脏水”。

“在军人之后，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人分别发了言。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朱可夫骄傲自满了，将苏联武装力量的所有胜利都记在了自己的身上；说他是一个政治上不成熟、违背党的原则的人；说朱可夫性格的本质不仅在于他的古怪和难以相处，更主要的危险是，他有了波拿巴的派头。

“指责是严厉的。朱可夫垂头丧气地坐着，感觉很沉重，脸色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发红。终于轮到朱可夫说话了。朱可夫说他完全否认 A. A. 诺维科夫的说法；说他的性格不十分温顺，这是正确的，但他坚决不同意对他不忠诚和没有党性的指责；他是共产党员，负责地完成党指派给他的所有任务；他只承认有错，错在夸大了自己在组织战胜敌人中所起的作用。”（科涅夫 И. С.，同上，第 590 页）

总之，军方很明显不想“出卖”朱可夫。尽管有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支持，斯大林还是必须作出让步。朱可夫被撤销了陆军司令的职务，被打发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指挥二级的敖德萨军区（后来朱可夫还被整了两次：原因分别是违规给演员授予勋章和在别墅里藏有缴获的贵重物品）。

军方的情绪的确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安。在朱可夫被贬黜之后，他们感到了屈辱，而这一情况的高潮则表现在两位前线将军的事件上。在斯大林格勒先后指挥了集团军和方面军的 B. H. 戈尔多夫上将和 Ф. Т. 雷巴利琴科少将，1946 年初都在伏尔加河沿岸军区服役，戈尔多夫是司令员，雷巴利琴科任参谋长。在打击“朱可夫势力”的过程中，两人被武装力量部下令免职。这意味着，要么另有任用，要么就得退休。两位将军在戈尔多夫位于莫斯科高尔基大街（21/23 号）一幢莫斯科最好的大楼之一的寓所里见了面。不幸的是，寓所里安装了窃听器，他们的谈话被录了下来。

结果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就有了这么一份文件：



绝密

参考资料

1946年12月28日，窃听器录下了戈尔多夫和雷巴利琴科的谈话。雷巴利琴科是从索契路过莫斯科时来到戈尔多夫的寓所的。

雷：瞧现在这生活，你就躺着等死吧！可千万别再碰上歉收了。

戈：哪来的丰收，要想丰收得先要播种。

雷：秋播作物完蛋了。斯大林坐火车时难道就不看一下窗外吗？大家对生活都不满意，大家都在公开地讲，在火车上，到处都在公开地讲。

戈：唉！现在一切都得靠行贿和拍马。我三下五除二就被撸了，因为我不去溜须拍马。

雷：是啊，一切都得靠行贿。您瞧瞧周围都发生了些什么，饥荒极度严重，所有人都不满意。大家都在说：“至于报纸，完全就是在欺骗。”设置了那么多部长，机关人员庞大臃肿。过去有牧师、警察、村长，每个庄稼汉得供养77个人，现在也一样！现在的选举就是扯淡。

戈：你准备在哪儿选举？

雷：我哪儿也不……我不去选举。我哪儿也不去。这种情况只有在我们国家才会发生，只有我们能够这样对待民众。国外对待失业者比我们对待将军还要好！

戈：以前，一人当政，什么都有，而现在有这么多的部长，可什么成效都没有。

雷：连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没有，简直就变成了乞丐。只有政府活得好好的，人民大众却过着赤贫的生活。我很奇怪，难道斯大林看不到人们是怎样活着的？

戈：他什么都看得到，也什么都知道。要不就是他昏了头，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到处在上报，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有一次我们坐在汽车里遇上了一支红色马车队：一个妇人骑着一匹驽马，前面有块红色布条子在晃来晃去，车上装着两个口袋，她后面还有一个妇人，同样也运着两个口袋。这就是所谓的红色马车队！我们简直要笑死了。这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红色车队在完成计划！……可是朱可夫屈服了，接受了职务。

戈：表面上他是接受了职务，可内心并不高兴。

雷：我总是在想，用不了10年，我们就会被扇耳光。这是肯定的！如果到那时候还能幸存下来的话。

戈：毫无疑问会是这样。

雷：大家都在谈论将会发生战争。

戈：但不管什么地方，什么事情都没有得到解决。

雷：是什么都未解决。不管是组织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戈：在巴黎和美国召开的会议也一无所成。

雷：这完全是一场新战争的铺垫。他们是怎样给莫洛托夫送行的？

戈：杜鲁门一次也没接见过莫洛托夫。真是可笑！罗斯福的一个儿子过来，斯大林都接见了，而莫洛托夫竟然没人接见。

雷：我们的威望在下降，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就连黑人、捷克人都一次也没有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话。没有人跟苏联走了……

戈：菲利普，能做什么呢？做什么，要是……我们……做些什么呢？

雷：难道去干手艺活吗？我觉得，应该从写东西开始，轰轰烈烈的。

戈：从写东西开始？通不过的。

雷：这帮恶棍，要是……我们……

戈：你能理解，要是能跑到国外什么地方去就好了！

雷：唉，唉！这事想想就算了！不，我还是觉得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的，会走上正轨的。

戈：愿上帝保佑吧！

雷：这种政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在集体农庄里，把粮食采购得一点也不剩。什么也没留下来，甚至连播种的种子都没有。

戈：很奇怪，为什么俄罗斯人会落到这一步？

雷：因为我们实行的是这样的政策，让谁都不想工作。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所有集体农庄的庄员都憎恨斯大林，都在等着他完蛋。

戈：真理究竟在哪里？

雷：人们都在想，斯大林一完蛋，集体农庄也就完蛋了……

戈：是的，他们整得我们很苦。现在我的心情很沉重。哎，去它的吧！

雷：不过你需要去找一下斯大林。

戈：说我不接受清算吗，让斯大林自己来召唤我吧。我今天就去说清楚。要知道情况也不可能更坏了。他们抓还是不会把我抓起来。

雷：当然不会。

戈：我想去芬兰或者到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地方去工作。

雷：是，那儿对我们兄弟不错。

戈：哎，要是……我们……你还能说些什么？！

雷：能。民众表面上一点也没有表露出自己的不满，表面上一切正常，但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

戈：连猫、狗、老鼠都被用来充饥了。

雷：过去我们不管怎么说还有来自国外的援助呢。

戈：都花光了！现在他们什么都不给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雷：人们像狗一样挨饿，他们非常不满。

戈：但民众保持着沉默，他们害怕。

雷：没有任何前途，完全被隔绝了。

戈：是没有任何前途。我们无法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了……全都成了泡影！

雷：是啊，什么也没能实现。

戈：如果所有的事情能及时做成的话，是可以实现的。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雷：正是需要诚实的、真正的民主，以便所有的事情可以逐步地去完成。否则，所有事情都将成为泡影，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混杂在一起——土地、马匹、人员。我们现在有什么呢？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学校，又没有军队，一无所有。这简直就是愚蠢！我们要这些部长干吗？

戈：诚实的人越来越少了。

雷：少了很多。而现在的物价则太可怕了。就像拉着套着绳索的狗去干活那样，现在所有人都像这样在工作，现在工厂里谁也不好好劳动。

戈：是的，因为不是自愿地在劳动，所有的人都是被强迫的。

雷：拿农村来说吧，大量的土地都闲置着。

就在当天，雷巴利琴科离开莫斯科去了自己的居住地古比雪夫市。阿巴库莫夫。”（埃克施图特 C.，《胜利后的一千天》，莫斯科，2006 年，第 47—52 页）

1946 年 12 月 31 日，戈尔多夫与妻子塔季扬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的谈话同样也被录了下来。将军是这样说斯大林的：“这人干了什么，他毁了俄罗斯，要知道俄罗斯再也不存在了！”

1947 年 1 月初，戈尔多夫和雷巴利琴科被捕，等待他们的是审判以及在 1950 年被枪决。

## 第三十四章

# 1946 年的饥荒

---

1946 年的饥荒、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中绝不屈从于西方、斯大林给作家们下达新的任务

---

1946 年是可怕的一年。杜鲁门、原子弹、对外战线的全线后退，这还远不是全部。还有“空军领导人案”、“朱可夫案”，而这也并非全部。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就是歉收和饥荒。国家那点儿微薄的资金首先注入了国防、原子弹研究和恢复经济这三方面。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新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了最无保障的人们身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残疾人和单身母亲。而 1946 年初斯大林承诺的废除凭证供应制，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再提了。

1946 年 2 月 26 日，政府降低了商品交易中食品的价格，从而普遍降低了物价，但到 9 月份，那些凭票证供应的食品（面包、面粉、大米、肉、油、鱼、盐和糖），价格却上涨了 1—2 倍，对工业商品的价格则宣布了下调。

斯大林明白，应该至少做点给苦药加点糖的事。而且最穷的那批人（收入低于 900 卢布），领退休金的人、领补助金的军人家庭和大学生都该得到补助金。

不过局势如此多艰，以至于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作出决议，禁止所有企业、机关和团体给工作人员提高工资以及食物和工业用品供应的标准。

1946 年 9 月 16 日，供应标准被提高了。在这之后，肉价从每公斤 12 卢布涨到了 30 卢布，黄油从每公斤 23 卢布涨到了 60 卢布，白糖从 5.5 卢布涨到了 15 卢布，白面



包从 1.7 卢布涨到了 5 卢布,黑麦面包从 1.1 卢布涨到了 3.4 卢布。(埃克施图特 C.,同上,第 322 页)

但很快就清楚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尽管斯大林还抱有某种希望,但农业状况已经发生了灾难性的转变。

9 月 23 日,采购部部长 Б. А. 德温斯基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

米高扬同志就今年 9 月 7 日我写给您的报告的情况告诉我说,您当时认为我提出的由政府来研究尽一切办法来节省粮食消耗的建议是为时过早的。

斯大林同志!正是现在必须大量缩减消耗。现在,乌克兰、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斯大林格勒州、库尔斯克州、沃罗涅日州、坦波夫州、图拉州、布良斯克州、外贝加尔和远东、北顿河、斯塔夫罗波尔都受到了歉收的困扰。而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由于长时间的下雨造成庄稼收割缓慢和根部溃烂。全国范围内许多秋播和春播的作物都已被毁,谷类作物的播种急剧减少,已经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阔绰地生活了。我们正飞快地吃掉我们的粮食储备……而在新一季收成到来之前,我们还得熬过三个半季度。春天就需要种子。按照现在的消耗,粮食是不够的。

斯大林同志,我请求您下达命令立刻削减各项开支。在这特别的荒年不能容许有如此巨大的供给定额(全国近一半的人)和如此之高的标准……

斯大林同志,我还要请求您下令让中央委员会的直属机关像以前那样,参与到粮食收购的工作中来……

请求您审理这份报告。除了您谁也解决不了如何生存下去这一刻不容缓的问题,虽然贮备的状况是清楚的,国家所受灾害的程度和相应的收购前景也是清楚的。但我担心这项工作会耽搁下来,并陷入本可以预防或缓解的困境中。采购部部长 Б. 德温斯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 年)》,第 221—222 页)

正如我们所见,几天后便有了结果。9 月 27 日,政治局批准了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关于节约粮食和粮食支出的决议》。该决议将 10 月份国家准备发放的谷物从 162.67 万吨削减至 48.59 万吨;凭证发放的面包数量减少 30%;享受凭证供应面包居民的数量从 8700 万减至 6000 万人,其中包括农业地区靠国家赡养的人、国营农场工人和工作人员等的 2300 万人。从 10 月 1 日起,保留了领取定量口粮权利的被赡养者的面包供应标准,从一天的 300 克降到了 250 克,对儿童的供应也从 400 克降到了 300 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 年—1953 年)》,第 223 页)

饥饿的威胁迫使当局采取了强力措施。政治局决定“最大限度地强化地方上的

粮食采购工作”，也就是采取以前用过的向农村施加强压的方法。区委的特派员、检查员和警察被派驻到了集体农庄。他们用开除出党和予以刑事审判为威胁迫使集体农庄的主席完成向国家缴纳粮食的计划。那些敢于用收缴来的粮食帮助贫困农民的集体农庄主席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1946年有9511名主席被判刑（1945年是5757名）。

总之，苏联的整个农村地区在这些年承受着对于非战争年代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与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相提并论的重负。根据各种估算，当时由于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在100万至200万之间。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斯大林极权制度的牺牲品，也可以看成是那场不是斯大林挑起的“冷战”的牺牲品。如何看待取决于每个人获知的信息和所持的立场。

这段时间的残酷不仅在苏联民众的身上得到了体现，西方社会同样也意识到他们还生活在战时状态之中。比如，英国的作战部在德国设立了几个中心站，关押在那里的人经受着饥饿、失眠、寒冷和毒打的折磨，而这些人并不是被怀疑信奉纳粹主义的人，而是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1946年因支持苏联而被捕的人。伦敦也有类似的中心站。（《卫报》，伊安·科本，2006年4月4日）

这段时间的残酷无情波及了所有的人，只不过在疮痍满目的苏联，这种感觉尤为突出罢了。

斯大林在着手加快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堡垒之后，在1945年5月终于明白了，他没有能为国家取得所希望的安全。苏联国内发展所引起的扩张，首先是安全的屏障，停滞下来了。未能达到与西方的力量均衡，苏联明显要弱一些。

而且，除了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苏联在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也稍逊一筹。那曾经把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战争现在转向了另一个方面——人们企盼着富裕、安宁、愉快的生活和个性的张扬。如何与这些诱惑作斗争？谁也不知道，因为要禁止人们对美好命运的渴望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负责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是日丹诺夫，形势的发展把他推上了前沿阵地。这里我们要指出斯大林对他的特别亲密的关系和他是“列宁格勒集团”的成员——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位政治局委员理应在当前的事件中扮演突出的角色。

不过扮演主要角色的还是斯大林。他看到，在战争胜利后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真空中，“资产阶级艺术”的潮流，从好莱坞电影到剧院里上演的西方作家的剧本，再到爵士乐等等一拥而入。国家安全部的分析报告指出，在创作型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弥漫着期待苏联向过去的盟友作出政治让步的情绪。正是从这里可以找到今后一系列反对世界主义、颓废悲观和崇洋媚外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根源。

1946年4月13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发言时严厉批评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并指派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在3个月后准备好必需的材料。



根据这一指示还确定了当前的工作计划。其中一条就是制定中央委员会关于提高文艺杂志、戏剧院剧目的水平和关于1946年至1947年电影制作的决议草案。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制定出来的草案并不像它造成的结果那么有害。日丹诺夫的宣传员们虽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但并不想成为众矢之的，不想一概沦为牺牲品。为了接受“慈父的鞭挞”，他们挑选出了两份并没有政治背景的杂志——《星》和《列宁格勒》。

1946年8月9日，在有斯大林出席的讨论这些决议草案的组织局会议上，突然发现上述两份杂志的从属性发生了变化。以前它们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而现在则隶属于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即从作协中央被分割了出去。经查（由马林科夫发起），对于这一擅自行为列宁格勒市委是知情的，而且就在变化之后的几天内（6月26日）就批准成立了一个包括那位不止一次受到批评的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在内的新的《星》杂志的编辑委员会。

调查开始了。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П. С. 波波夫说：库兹涅佐夫是知道这一情况的。

如此一来，列宁格勒同乡们的“私下勾结”就被记录了下来。

于是马林科夫继续追问道：“为什么批准左琴科加入？”

波波夫回答说这是第二书记Я. Ф. 卡普斯京负责的。

的确，这如同某种私人会晤。波波夫是库兹涅佐夫的人，曾在库兹涅佐夫手下任列宁格勒市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库兹涅佐夫来说，事情发生如此转折是令人不快的，但现在离“列宁格勒案件”还为时尚早。

组织局会议上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列昂尼德·卢科夫的电影《伟大生活》的第二集，该集讲述的是顿巴斯矿场重建的故事。斯大林做了长篇讲话，不过开头首先是批评了普多夫金的电影《海军上将纳希莫夫》和爱森斯坦《伊万雷帝》的第二集。他指责前一部电影缺少文化和历史知识：“俄罗斯人俘虏了一大帮土耳其将军，而在电影中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来。这是为什么呢？无人知道。也许，因为这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而表现舞会则要容易得多。总而言之，是用一种玩忽职守的态度在对待事情，对待这个自己在从事的事情，对待这部影片将在全球放映的事情。”（《斯大林与世界主义（1945—1953年）》，莫斯科，2005年，第57页）

爱森斯坦被指责犯有形式主义的错误，且不理解伊万雷帝及其军队直辖军的作用，也不理解俄国统一成“一个反对旨在分裂和削弱国家的封建大公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意义。

在谈论《伟大生活》这部大量镜头都在高度概括地讲述私人生活的电影时，斯大林说出了——一个称得上是对于理解其对意识形态看法的关键思想：“当你看这部电影时，简直就感到痛苦，难道我们这些生活在极可贵的人和英雄中间的导演就不能塑造

出他们应有的形象，而一定要玷污他们吗？我们就有很好的工人，真见鬼！他们在战争中展现了自己，从战场上回来后更应该在战后重建中展现出自己来。”（《斯大林与世界主义（1945—1953年）》，莫斯科，2005年，第58页）

我们要强调一点：战争英雄也应该是战后重建事业的英雄。不应该有任何牢骚抱怨、思想上的屈服、走投无路感和优柔寡断。

也许，此时斯大林回忆起了自己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时的那个片段，当时身上结了冰的他正顶着暴风雪从钓鱼处回家，他克制着冻僵的身体陷入梦境，一直向前走啊走啊。应该承认，这种毅力是自始至终伴随着斯大林的。

而关于让苏联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做好进行斗争准备的进一步讨论，那已经是8月12日我们的主人公与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会面时的事情了。会面的结果是下令日丹诺夫准备一份报告，而报告的实质就是日丹诺夫记录在记事本上的这么几条：“痛击；积极进行撤换；合作；任命叶戈林；无赖的语言。”（茹科夫 Ю.，《斯大林：政权之谜》，第362页）

不过报告归报告，最主要的结果还是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8月12日，决议草案呈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做了不大却至关重要的改动（斯大林补充上去的文字用斜体标出）：“苏维埃制度不能容忍把青年培养成思想上对苏联的政治漠不关心、精神上目空一切和虚无缥缈的人。”他还给对左琴科作品的定性作了补充——“对苏联生活方式的卑鄙诽谤”，并说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表现出的是“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

决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清除毫无思想、不问政治、“为了艺术而艺术”、对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等现象。“苏联文艺的目标在于帮助国家正确地教育青年人，回答他们的疑问，把新一代培养成精神饱满、对自己的事业坚信不疑、不惧艰难、准备好克服任何困难的人”。（《斯大林与世界主义（1945—1953年）》，第68页）

不过，还有一个情况隐藏在对可怜的阿赫玛托娃的攻击之中：她显然是圣彼得堡社会文化核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在已经展开的与西方的对抗之中，谁也不应该怀疑，在争夺民众的精神世界的斗争中，克里姆林宫绝不会允许革命前的那种精英理想主义死灰复燃。

8月14日，《真理报》公布了这一决议，但没有全文刊登。如果把决议在思想领域方面的内容放到一边，而去分析其在人事方面的结果，那么很明显，列宁格勒的党员干部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卡普斯京受到警告处分，市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希罗科夫被解除了职务。

为了阐述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日丹诺夫去了列宁格勒。正是在那儿他做了自己那个著名的“无赖式”的报告，这也成了苏联强硬的文化管理政策的象征。该报告的某些观点对作家们来说是侮辱性的，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娜·阿赫玛托娃（“阿赫玛





托娃是那种与我们的人民格格不入的、思想空虚的诗歌创作者的代表人物……”。  
作出这种结论，完全没有考虑到她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那些诗歌。

我们知道，现在是一发千钧的时刻，  
现在正发生着什么。  
我们的时钟已敲响英勇之声，  
而英勇也不会离我们而去。  
我们不怕倒卧于枪林弹雨之下，  
也不会因无家可归而感到痛苦，  
我们会捍卫你，俄罗斯语言，  
伟大的俄罗斯的语言……  
(《英勇》，1942年)

在对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进行评价时，明显带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反资产阶级的激情：

美不可言，  
简直魂儿都被勾去了！  
我仿佛  
陷入了伯努瓦的水彩画中  
连同阿赫玛托娃的  
诗句。

(《凡尔赛》，1924年)

类似的评价也可以在批评家鲍里斯·艾亨鲍姆的文章《安娜·阿赫玛托娃试析》(1923年)里看到，在文章中，他说这位女诗人具有“修女和荡妇”的风格。

套用了20世纪20年代别人评价的中央委员会的宣传员们，证明了他们很好地执行了领袖的指示。

斯大林遵循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供他选择的方式也极为有限，特别是在迅速影响社会的情绪方面。也许有人会觉得他的这种深思熟虑完全丧失了人间的所有温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让我们从1946年8月跳到1947年5月13日。这一天，斯大林在自己办公室里接见了新任命的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鲍里斯·戈尔巴托夫，

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也参加了会见。话题首先涉及的是作家的物质待遇：稿酬、住房，以及苏联作家协会的机构设置。斯大林承诺在各个方面都予以帮助。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日丹诺夫两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该扩大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而斯大林两次都回答说，工作量增加了，编制也应该扩大。

从这个小小的争论中反映出了日丹诺夫极其顽固的立场，他与领袖保持着几乎同样的步调，甚至更为强硬。但斯大林此时不需要采取强硬的措施：他是人民的父亲、英明的领袖、一个强大国家的元首。这一点正是日丹诺夫没有考虑到的，他此时表现得不像一个政治家，而更像一个官僚。

话题就此结束了，该离开了。对这次会面写下回忆录的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指出，他“突然间感到非常遗憾”。不过，就在此时，斯大林开始谈起了他认为比稿酬和住房更重要的问题。斯大林特别询问了关于创作和作家们正在写什么作品的问题。

法捷耶夫回答道：大家主要都是在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而写关于现代生活的则较少。

法捷耶夫刚刚完成了一部描写矿区城市克拉斯诺顿的年轻而英雄的地下工作者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也许，法捷耶夫觉得自己是一个尽到了职责的人。

（本传记一位作者的母亲拉里莎·维塔利耶夫娜与“青年近卫军”的领导人奥列格·科舍夫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拉里莎的父亲是矿场的负责人，战争即将爆发之前他们被转移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如果不是这次转移，拉里莎就会留在克拉斯诺顿，以她炽热和公正的天性完全有可能成为“青年近卫军”组织的一员。她曾说过，这些年轻人都是普通的“苏联共青团员”，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斯大林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斯大林与作家交谈中说的正是这一话题。斯大林想听到的不仅是构思中的小说和剧本的题材，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作品的政治倾向。）

但法捷耶夫未能说出什么明确的东西。大作家们并不急于表态。

大家谈到了肖洛霍夫、卡塔耶夫、沙吉尼扬，还有那位从没有为了研究生活“素材”而“为创作而出过差”的列夫·托尔斯泰。从斯大林的话中可知，他对作家们创作出差的效果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个话题也快结束了。但是苏联作协的领导人还是未能“给出保证”。

又是一片沉默。

“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斯大林说道：“这种题材必须引起作家的兴趣。这就是我们苏联的爱国主义题材。就拿我们的普通知识分子、科学界知识分子、教授和医生来说，”斯大林以他特有的、让我牢记在心的语调继续说下去，我想我可以完整地复述他的话：“他们的爱国主义意识是不够的。他们对国外的文化有着不合情理的崇拜。大家都觉得自己还未成年，没有完全发育起来，习惯



于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学徒的地位。这是落后的传统,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就是这样。彼得大帝有一些好的思想,但很快就被众多的德国人侵蚀了,那是一个崇尚德国人的时期。请看,就拿罗蒙诺索夫来说,他的工作是多么艰难,科研成就就是多么巨大。可他却崇拜他人,开始是对德国人,后来又是对法国人,都是对外国人的崇拜。”斯大林说着,忽然狡猾地眯起眼睛,用快得听不清楚的话冷笑了一句“对这帮混蛋”,随后又恢复了严肃。

“一个普通的农民不会为一点琐事而卑躬屈膝和点头哈腰,可那些人却缺乏尊严和爱国主义,不理解俄国所起的作用。军人也存在这样的崇洋媚外,现在要好多了。而如今不是这个样子了,如今军人的尾巴翘起来了。”

斯大林停了下来,冷笑一下,打了一个几乎难以觉察的表示军人翘起了尾巴的手势,然后问道:

“为什么我们不如别人?问题在哪里?对于这一点必须深推细敲上几年,必须反复推敲上10年的时间。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做伟大的事业时,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他再一次谈到了上面提到的罗蒙诺索夫教授:“就拿这样的人来说吧,他不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人。”斯大林再次强调道:“可他在外国无赖面前,在比他矮三分的学者面前却心存敬畏,丧失了自己的尊严。所以我认为,必须与我们众多知识分子存在的自卑感作斗争。”(西蒙诺夫 K.,《我这一代人的见证》,载于《旗帜》杂志,1988年,第3期,第59—60页)

西蒙诺夫是在会见后的第二天将此记录在日记里的,其准确性毋庸置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斯大林批准《新世界》杂志刊登已失宠的左琴科写的小说,这也能证明他对该作家的危险性是持怀疑态度的。照此推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委员会决议里对这位讽刺作家的那些致命的批评只不过是抓一个典型的例子罢了。

西蒙诺夫是这么叙述在数次会面后领袖给他留下的印象的:“谈话时他常常露出微笑,但一讲到爱国主义和自轻自贱这些他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时,他的面孔就变得严肃起来,并且嗓子里充满着苦涩的感觉。还有那么两到三次,他打破了自己一贯平静的嗓音,语气显得非常激动。”(西蒙诺夫 K.,同上,第66页)

激动!这正是西蒙诺夫深深感触到的,他同样是斯大林时代的人,经历过战争,无疑也能够理解斯大林那些行为的非个人性而是国家性的特征。原来,领袖的内心也在挣扎。

## 第三十五章

# 马林科夫被宽恕了

马林科夫得到了宽恕、西方的经济危机和斯大林的新希望、“马歇尔计划”、美苏爱国主义的对抗

意识形态的对立,更准确地说,作为“冷战”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引发了诸多类似 20 世纪 30 年代残酷斗争式的动荡、不幸和悲剧。但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此时斯大林的地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稳固,可谁也不知道这能持续多久。

在此之后,包括“米格列尔人案件”和“医生破坏分子案件”在内的所有思想运动,都带有斯大林与其“继承人”争夺领导地位的性质。

1946 年 10 月 3 日,按照斯大林的提议,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小集团。根据政治局的决议,政治局外交事务委员会开始同时负责国内事务,并增加了第七位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其组成是: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差一点就成了第八位委员。看来,斯大林有些犹豫不决,扩大了战友的小圈子。

(1946 年 8 月 2 日,马林科夫得到了宽恕,并基本恢复了以前的权力,成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主管电气工业部、通讯设备工业部和通讯部。)

此时,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势力平衡得到了保障,第二书记日丹诺夫无形中与他的同乡列宁格勒人库兹涅佐夫产生了竞争,而制约他们的则是马林科夫。库兹涅佐夫与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交往甚密,而马林科夫则与贝利亚私交颇深。莫洛托



夫和米高扬自成一派，而由日丹诺夫提拔上来的野心勃勃的沃兹涅先斯基是直接围着斯大林转的。与斯大林关系最密切的还是日丹诺夫。属于“日丹诺夫集团”的还有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会书记 Г. М. 波波夫。要想指出所有的各个小集团是非常困难的。战友们都明白，斯大林老了，迟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会取代他的位置。

米高扬给予了库兹涅佐夫非常良好的评价(库兹涅佐夫的女儿嫁给了米高扬的儿子)，并且强调说，日丹诺夫与库兹涅佐夫关系友好，“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相互关爱”。

“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库兹涅佐夫还是显得有些幼稚了：他并不理解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里施展权术的重要性。要知道以前的人事安排是掌握在马林科夫手中，而国家安全部一向是由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贝利亚控制着。显然，此时斯大林作出的选择有利于党内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而马林科夫在斯大林的眼里已经地位下滑了。斯大林对贝利亚的态度，开始变得像当年对待亚戈达和叶若夫那样：他‘知道得实在太多了’，也把‘安全工作’攥得太紧了。不过，库兹涅佐夫还是应该拒绝如此大的权力，想办法回避。但是对于他来说，日丹诺夫是主要的谋士，而日丹诺夫正相反，首先就建议斯大林作出人事安排。在他看来，完全隔绝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接触才是最重要的事务。”(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第 564 页)

10 月 16 日清晨，按国际法庭的判决，在纽伦堡对多数德国战犯实施了绞刑。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是斯大林首先提出来的。早在战时斯大林就告知丘吉尔说，不经审判就处死纳粹战犯可能会使同盟国受到掩盖真相的指责。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了他的意见。

其实，在审判的过程中，审判员们的观点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一些纳粹分子得以逃脱，未被判死刑。莫斯科对此深感痛心。

此时有一点已经完全清楚了，西方在任何方面都不准备对苏联作出让步，而苏联也没有了像战时那么强有力的理由。因此，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只有在杜鲁门允许的范围内才能施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处处都在低头。他完全没有低头。他总是尽可能地去施压，然后再迂回和作出让步，以便在其他方面占据主动，并使对手的注意力从莫斯科身上移开。

斯大林清楚地记得瓦尔加院士过去作出的西方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危机的预测。想必，对斯大林来说，等待这场危机的到来就像当年库图佐夫的等待一样。当时，面对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作出撤退决定的库图佐夫就是在等待法国人拉长战线，并认为严冬迟早会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

1946 年的冬季在欧洲发生了一桩令人震动的事件，其对未来的影响难以估量。

这年冬天极其寒冷，泰晤士河到温莎市的河段全部被冰冻住了。而沐浴在墨西哥湾暖流下的英国，楼房里是没有集中供暖设备的。这似乎是大自然为去年夏天干旱给苏联造成的损失而向莫斯科表示歉意，转而来削弱莫斯科的对手了。煤炭供应的严重不足引发了能源危机。

在整个大不列颠境内的煤炭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关闭发电站，而这样一来工业用电的供应就大大减少了，甚至有些工业用电干脆就被完全停止了。失业率上升了6倍，英国的工业生产几乎中断了3个星期，而这是战时德国轰炸也做不到的事情。

突如其来的能源短缺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英国因战争而下滑到了贫困的边缘。它的大英帝国的角色现在成了沉重的负担。（耶金Ⅱ，《战利品：争夺石油、金钱和权力斗争的世界史》，第445页）

整个欧洲都缺少食品、原料和进口必需品的的外汇储备。欧洲陷入了停滞状态，而这很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为了生存下去，大不列颠迈出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步：他们开始把载不动的“帝国重负”从国家这条大船上抛下。1947年寒冬二月，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宣布，允许印度独立，并把境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的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审议。同时华盛顿也被告知，英国已经没有可能继续维持希腊的经济了，因此，美国要承担起对地中海、近东和中东地区的责任。大英帝国的萎缩使美国进入了原来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也使得这两个全球巨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在伊朗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里的油田是“英伊石油公司”最主要的财富。自苏联军队从伊朗撤出之后，亲共产党的伊朗人民党组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向德黑兰政府施压；而且在为抗议英国在阿巴丹的石油加工企业而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中，还有数人被打死。英国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撤离此地的，但它未必能够坚持下去。

克里姆林宫理应会认为，英国人在那里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

但英国人选择了与美国人分享此地，并通过邀请美国“泽西石油公司”和“索卡尼石油公司”进入伊朗而摆脱了困境。原本可能导致大英帝国这条大船沉没的窟窿被堵上了。

当然，这一措施还是不足以消除欧洲的经济危机的。

1947年2月26日，斯大林请求辞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一职。他说：“我的负担过重。同志们，我请你们不要反对，而且年龄也不饶人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45页）

新任部长是布尔加宁，但这不是一个军事的（虽然很快布尔加宁被授予元帅的称



号),而是一个政治的任命。

欧洲衰退和斯大林辞职在时间上的巧合其实是一种征兆——领袖的注意力转向了欧洲。

另外还有一个巧合。也就在这时,斯大林对瓦尔加院士的新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这位院士在该书中断言,西方是可以避免世界经济危机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规划自己的发展之路了。但这明显与斯大林的固有观点是格格不入的。斯大林一如既往地坚信,帝国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垮台。

沃兹涅先斯基在其专著(1947年)中写道:“美国对经济实施‘计划性’的可怜尝试,只要一超出帮助垄断资本家获取利润的范畴就会遭到失败。”(沃兹涅先斯基 H. A.,《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莫斯科,1947年,第31页)

瓦尔加对资本主义将不断发生危机这一思想的否定,使苏联领导层失去了斗志。这位院士不再受到信任了。

可是“来自华尔街的掠夺者们”却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遏制危机的方法,这就使斯大林的全部希望化为了泡影。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颁发学位证书典礼上阐述了这一方法的实质。他建议给西欧提供贷款,也就是说借给西欧足够的外汇,从而一下子解决好几个问题:遏制住欧洲分裂的趋势、保证美国的商品销路与劳务市场、削弱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用与收买英国完全同样的方式收买了西欧。

这个方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而在实施这一方案的过程中,该计划还导致了亲共产主义的矿工工会作用的下降,因为煤炭的不足被廉价的石油弥补了。于是,这些原来可以对政府起到威胁作用的、被较好地组织起来的矿工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原本建立在煤炭基础上的欧洲经济逐渐转化为以石油为基础了。从这一刻起,欧洲对石油的需求量与近东和中东石油的开采量得到同步提升,西方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对于斯大林和苏联来说,这带来了数不清的威胁。

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苏美对抗初期的那些重大事件上吧。

1947年1月,英美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双占区”,苏联政府对此表示了抗议。

1947年2月17日,美国的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开始在苏联领土上用俄语广播(从1946年4月起,英国BBC俄语部就已经开始了广播)。

1947年3月18日,“杜鲁门主义”宣告出台。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美国总统说希腊和土耳其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希腊此时正在打内战,一方是英国支持的君



主制度拥护者,另一方则是共和党人和共产党人。土耳其没有发生战争,但苏联要求重新审议关于海峡通航规定的蒙特勒公约。)杜鲁门呼吁国会分别拨给上述两国 2.5 亿和 1.5 亿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时华盛顿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变成了“捍卫自由和民主”。除此之外,杜鲁门还说,东欧国家已为苏联所“占领”。

莫斯科的确在大力拉拢这些国家,并努力将前不久还能平静对待的民主反对派清除出去。

在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通过政治施压、恐吓和逮捕的手段,反对党被挤出了执政的联合政府。鉴于发生了经济危机,莫斯科突然采取的加速东欧苏维埃化的方针,理应是与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将发生经济危机的乐观预测结合在一起的。

6月27日,在巴黎召开了讨论“马歇尔计划”的法、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起初莫斯科对美国援助计划的回应还是比较积极的,但莫斯科很快就明白过来,需要付出政治让步和放弃东欧的代价。(苏联情报人员 T. 伯吉斯告诉莫斯科,美国邀请苏联加入“马歇尔计划”完全是为了宣传,并不意味着会真的拨款。而且该计划还取消了对苏联重建极为重要的战败国赔款。)

7月9至10日,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这八个苏联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表示拒绝参加巴黎经济会议。

9月,成立了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出席了此次会议,其进程每天都向斯大林进行汇报。“马歇尔计划”被称为是“奴役性的”。日丹诺夫的报道中说道:“各国共产党不应该害怕高声宣称,他们支持莫斯科的爱好和平的和民主的政策;不应该害怕声明,苏联的政策是符合其他热爱和平的民族的利益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1947、1948、1949年)文献与资料》,第300页)

10月22日,伊朗下议院拒绝批准与苏联签订的石油勘探和开采协议。(1947年年初,在苏联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自治区被撤销,自治区领导人被处死。)

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停止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托管理并在该地区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的决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三国的代表团均投了赞成票(很快,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向犹太武装组织运送武器,以帮助以色列建立军队)。莫斯科希望,这个伦敦反对成立的新建国家能够在近东为莫斯科提供支撑。

如此一来,世界明显就分成了两个阵营。毫不奇怪,苏联国内生活变得更为严峻起来,因为这刚刚出现的希望原来只是一个幻影。对于美国给予欧洲的 120 亿美元



(分四年到位)的援助,苏联只能用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斗争作为回应。

顺便说一句,早在1947年3月20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类似“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特别会议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开始运转了。

几乎就在该委员会成立的同时,3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一项决议:在中央各部委和机关里成立“荣誉法庭”。受斯大林的委托,日丹诺夫起草了该决议的草案。“荣誉法庭”的设置如同是一个施加社会影响的工具,以“审查苏联各部委和中央机关的领导人、业务和科学工作者所犯的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的行为和活动”。(《斯大林与世界主义(1945—1953年)》,第109页)荣誉法庭成立的主要意图,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希望吸收普通公民来与精英阶层进行斗争。这些荣誉法庭有权作出行政处分,或是将案件移交给检察机关以进行调查。

在由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制定的《在居民中展开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宣传活动的计划》(1947年4月18日)中指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挚爱之情是不可能与对进行剥削的资产阶级的文化崇拜并存的。”崇拜就意味着“精神上对资本主义存在着依赖”。

1947年6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泄露国家机密和丢失含有国家机密文件的责任》的命令。

不管是关于“荣誉法庭”的决议,还是这份主席团令,都证明斯大林看到了在社会内部滋生着的这些威胁。所以,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就注意到:在1947年5月13日与作家们谈论爱国主义时,斯大林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焦虑。

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起了几乎相同的根除反爱国主义的体系之后,莫斯科和华盛顿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思想领域的战争。

尽管是一件小事,但还是要提一下H. Г. 克柳耶娃教授和H. Г. 罗斯金教授的案件。他们发明了一种在当时认为是可以治疗癌症的药剂,并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的同意之下,将自己著作的手稿交给美国出版。这一举动被卫生部的荣誉法庭认定是“反爱国主义的行为”,他们受到了行政处分;苏联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B. B. 帕林院士被以间谍罪判处了25年监禁,卫生部长Г. А. 米捷列夫被撤了职。

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危害性。最初,在1946年3月召开的苏联医学科学院全体会议上,当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他们是夫妇)宣布他们研制出了抗癌药剂这个轰动性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为两位专家提供国家支持。在征得了苏联外交部同意后,美国大使V. 史密斯参观了苏联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中央研究所,并提议用提供最新的实验设备来换取关于这种药剂的信息资料。这种交换的公平性如何,谁也没有去仔细考虑。6月20日,政治局批准了帕林院士去美国出差。他随身携带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所著《恶性肿瘤的生物疗法》一书的手稿和一些装有新药“克-罗药剂”的小玻璃瓶。在毫不怀疑自己行为合法性的情况

下，帕林把这些东西交给了美国人。

也许，这一行为也有可能并不会引起注意，因为战争年代的合作已将同盟国之间的相互帮助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同样因此“翻了船”的还有苏联的海军将军们，他们在战后的1948年1月，批准了把机密的PAT-52鱼雷交给英国人以换取抗电磁鱼雷的样品。“荣誉法庭”判定H. Г. 库兹涅佐夫、Л. М. 加列尔、B. A. 阿拉富佐夫和Г. A. 斯捷潘诺夫犯有“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除了库兹涅佐夫，其他人都被判以不同期限的监禁。

斯大林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关注绝非偶然。治愈癌症是世界性的大事，其意义不亚于发明原子武器(但后来这种新药的疗效并没有得到证实)。

这一事件成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非公开信”出台和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加深的推手。信里的每一段都流露出对“我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工作在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中一些阶层的非常不良的政治精神状态”的关注。斯大林简直迷上了爱国主义这一话题。

1949年春天，在讨论获得斯大林奖提名的作品时，领袖否定了那本正面评价26名巴库委员作用的书。他是这样解释的：“巴库的委员们不值得去正面评价。不需要大肆宣扬他们。他们抛弃了政权，不战而降，坐上轮船逃跑了。我们宽恕了他们，我们不批评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死得很惨，被英国人枪毙了。我们纪念他们，但他们应该得到严肃的批评。他们是不好的政治家。”(谢皮洛夫 П., 《未参与者》，莫斯科, 2001年, 第120页)

斯大林仿佛是在下一道命令：“死守！”

所以，任何自由主义、妥协主义、民族主义、帮会式的关门主义的表现，都会引起斯大林惩戒其代表者的愿望。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牵涉其中的有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崇尚“唯美主义”的戏剧评论家小团体、宣传鼓动局的领导人、瓦尔加院士及其同事、日丹诺夫的儿子、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分子”，还有一些他亲密的战友。这是真正的国家专政，不管是对人民，还是对其制度都是这样，在个别情况下还带着反美国主义、反犹太主义、反俄罗斯主义、反格鲁吉亚主义、反乌克兰主义、反南斯拉夫主义等等的特征。但对斯大林来说，国家及爱国精神的巩固，以及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巩固，才是最主要的。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历史纷繁复杂，因为其中既有世界革命的影子，又有反法西斯斗争的影子；既有地缘政治的影响，又反映出了一部分人群悲剧的命运——先是被推到了世界历史的高峰，突然之间又坠入了深渊。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之前的历史其实就是欧洲、美国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而犹太人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之后，按照捷尔



任斯基的指示，苏联情报机关开始对美国、西欧和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进行研究和渗透。正如苏多普拉托夫指出的那样，正是拥有诸多一流犹太专家的苏联情报机关向克里姆林宫建议，利用苏联犹太知识分子的关系，“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圈子”获得资金援助。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就为那些有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参与的特别行动提供了掩护，并被赋予了特别权力。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天生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是一个国家的机构，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维护和宣传犹太人利益的民族组织。如果考虑到在苏联的精英阶层，甚至在政治局中都有着可观的犹太人群体，那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组织——“犹太人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和贝利亚未必希望其具有这样的影响，但在战争年代可以不去计较这些。

然而，问题并不像开始时显得那么简单。被战争激化起来的民族感情不仅仅只波及了犹太人，居民普遍的反犹太情绪也日渐高涨。所以，一方面伊利亚·爱伦堡宣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与苏联的反犹太主义作斗争，而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则对苏联各机构、文化组织、大众传媒等部门的民族构成非常关注，这绝非偶然。

早在1942年8月27日(此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最激烈的时候)，宣传鼓动局就在给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安德烈耶夫的报告里谈到“党在挑选、提拔和培养艺术机关领导干部上的政策失误”，其中指出大剧院的“整个领导班子都不是俄罗斯人”。报告还列出了一张表格，从中可见，大剧院从代理经理到行政主管的12位领导人中，有10个犹太人，1个是俄罗斯人，另1个是亚美尼亚人。对莫斯科各音乐协会和音乐学院的领导层也作了这样的统计，而且还指出“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被清除了音乐协会”。报告还通报了中央一级报纸艺术专栏负责人的民族构成(全部都是犹太人)。不过，能够说明问题的不是这张汇总表，而是斯大林对此的反应。斯大林只同意对大剧院作出不大的调整：Ф. М. 邦达连科当上了经理，而艺术总监则由一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世袭兵的儿子 A. M. 帕佐夫斯基来担任。(科斯特尔琴科 Г. В.，《斯大林的秘密政治：政权与反犹太主义》，莫斯科，2003年，第264页)

因此，斯大林好像是在劝告大家，要现实地对待犹太人“强势弄权”的问题，不必歇斯底里。不管批评他的人如何竭力把分析简单化并把我们的罪孽深重的主人公描述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对所有犹太人都心怀仇恨的人，但斯大林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绝不是基于反犹太主义。持有这样观点的人最初就根本不可能进入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个中央委员会里，国际主义是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在后列宁时代，老一辈党的领导人在“世界革命和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分水岭上发生思想分化之后，包括不少犹太人在内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但这种情况与民族属性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斯大林一边同样站着很多犹太人。

斯大林的思维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他感兴趣的未必是犹太人本身。他经常提起,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恭维着“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但他甚至并不打算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任何与其他共和国同等的优惠权利。不过,当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问题变得尖锐,而其西部地区又不停地发生武装反抗之时,有着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斗争经验的斗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被派到基辅担任了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卡冈诺维奇当政期间,既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同时也与犹太民族主义做了斗争,包括封锁了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通道。

随着与美国同盟关系的结束,原先通过“犹太人之路”获得贷款的希望破灭了。苏联情报机关在巴勒斯坦继续着他们的斗争,但在国内,“犹太人事务人民委员部”已无任何存在的必要。1946年1月,宣传鼓动局局长亚历山德罗夫和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提议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宣传功能则交给苏联情报局。同时解散的还有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

两人在报告中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协助动员国外犹太居民与德国法西斯作斗争之中,发挥了某种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该委员会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越来越浓厚,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国外犹太人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作用,并使部分犹太居民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不断升温”。(《斯大林与世界主义(1945—1953年)》,第99页)

报告进一步指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擅自在苏联的犹太居民中开展活动”,接收了很多信件和申诉书,充当说情者,请求物质帮助等等,扮演着犹太居民与政府之间“中间人的角色”。

报告建议“鉴于它们的使命已经完成”,应该禁止这两个委员会继续活动下去。

在更早的1946年9月,苏斯洛夫已经以同样的理由提出了撤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七大建议”,并指出,其活动不仅不再是有益的,“而且在政治上已经变得有害了”。

不过,克里姆林宫并没有马上采取制裁措施。1947年4月16日,试图捍卫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地位的C. M. 米霍埃尔斯和И. С. 费费尔致信莫洛托夫请求接见。这封信是由与米霍埃尔斯有着友好关系的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转交的。虽然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并未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进行会面,不过他们还是得到了安抚。很快,宣传鼓动局拟定了允许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的界限:苏联境内的犹太民众不在其工作范围之内,并要坚决反对“国际反动势力及其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利用国外犹太人运动来达到其反苏维埃和反民主目的的企图”。

## 第三十六章

# 为什么米霍埃尔斯被杀死

米霍埃尔斯为何被杀、斯大林支持以色列建国、铁托有惊人之举、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重视有所提高

对于这场初露苗头的因目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也许本可以找到某种妥协的方式，但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并导致了事情以悲剧结束。第一个情况是米霍埃尔斯由于有着苏联强有力的支持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美国的作用；而第二个情况并不取决于米霍埃尔斯：苏美关系恶化，有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感觉。

这儿需要提醒一下的是，斯大林的新女婿格里戈里·莫罗佐夫就是一个犹太人，属于米霍埃尔斯圈子里的人。不过，也无需夸大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他只是跟与米霍埃尔斯熟悉的 И. И. 戈利德施泰因有来往，后者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所长是 E. C. 瓦尔加）。戈利德施泰因有一个小过失：他曾参加过崩得派，被联共（布）开除出党。

得知戈利德施泰因是领袖的亲戚叶夫根尼娅·阿利卢耶娃（战前猝死的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妻子）家的常客之后，米霍埃尔斯便要求戈利德施泰因去接近斯大林的女儿和女婿。

对于斯大林来说，对帕维尔·阿利卢耶夫一家的印象总是与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连接在一起的：娜杰日达用来自杀的那支手枪正是帕维尔送的。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帕维尔曾给自己有了情夫的妻子下过毒。这位情夫就是叶夫根尼娅现在的丈夫

H. B. 莫洛奇尼科夫,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工作人员。

早在 1929 年,在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工作时,戈利德施泰因就与阿利卢耶夫夫妇结识了。

而且,在更早的 1922 年,戈利德施泰因与瓦尔加一起参与了呈交给斯大林的《论苏德经济合作前景》报告的起草工作。总之,经济学博士戈利德施泰因是一位有威望的人,他成为领袖女儿朋友圈子的人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在戈利德施泰因与斯维特兰娜和格里戈里见面时的一些谈话中,话题的确涉及了斯大林本人。1947 年 5 月,在斯维特兰娜和丈夫离婚之后,在谈到斯大林不久前得了中风一事时,E. A. 阿利卢耶娃脑子动都没有动就喊叫起来:“怎么,你老爸彻底疯了吗?”从这个问话的语调就可以看出,叶夫根尼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自己这位至高无上的亲戚是持批判态度的。想必,有戈利德施泰因在场时,这些谈话是没有顾忌的。

在接受国家安全部审讯时,戈利德施泰因说他在 1947 年 7 月在犹太剧院遇到米霍埃尔斯,他告诉后者斯大林女儿离婚一事。而米霍埃尔斯对此好像是这样说的:“是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件悲伤的事情,莫罗佐夫还是没能在斯大林家里站稳脚跟……不过,应该修复这段婚姻。”(科斯特尔琴科 Г.,《斯大林的秘密政治:政权与反犹太主义》,第 379 页)

很难说,戈利德施泰因所说的话可信程度有多少,也许他是因为遭受了肉体的折磨才作了这番交代。不过,米霍埃尔斯对斯大林私人生活的关注和国家安全部对此的高度敏感都是显而易见的。(科斯特尔琴科 Г.,同上,第 384 页)

颇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亲家公,Г. 莫罗佐夫的父亲此时冒充起老布尔什维克和教授来了,常向周围的人讲述自己与斯大林会面的情景(杜撰出来的)。而他其实只是一个小商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开了一家药店,曾因向有关官员行贿而坐了一年牢,然后干过会计。儿子娶了领袖女儿之后,他认识了 П. 热姆丘任娜,当上了生理学研究所行政管理处的副主任,后来就成了“学者”。

当读到国家安全部对自己这些“亲戚”的报告时,斯大林的感受是什么呢?

斯大林自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他对女儿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你的第一任丈夫推给你的。”(阿利卢耶娃 С.,《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49 页)

如果那些与美国有联系的敌人把手伸向了他的家庭,那就超出了斯大林的忍耐限度。在这一不幸的情感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斯大林又一次的失败。他甚至不再相信自己的女儿,正如他对女儿说的,说她竟然能说出“反苏的言论”。在自己战友的小圈子里,斯大林同样看到了叛徒,莫洛托夫的妻子与米霍埃尔斯是有牵连的。

斯大林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作为一个受到全世界犹太人广泛支持、但已经脱离了控制的组织,开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危险性,成了国中之





国和美国势力的中心。对于斯大林来说，米霍埃尔斯成了在某些方面与托洛茨基类似的人物。

因此，所有参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渗透他家庭的阴谋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而米霍埃尔斯由于是一个有着巨大号召力的人物，应该被秘密处决。

所有的一切正像斯大林希望的那样实现了。E. A. 阿利卢耶娃、她的丈夫莫洛奇尼科夫、列坚斯的遗孀安娜，以及他们周围的人，还有亲家公莫罗佐夫都被剥夺了自由。但对自己的女婿格里戈里·莫罗佐夫，斯大林并没有去触动。

米霍埃尔斯在一次专项行动中被杀死于明斯克。

1948年1月10日，阿巴库莫夫把戈利德施泰因交待的“关于米霍埃尔斯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和通过斯大林的亲戚收集其情报的供词上报给了斯大林。

1月12日晚，米霍埃尔斯和他的陪同戈卢博夫-波塔波夫被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带到了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部长Л. Ф. 察纳瓦的郊外别墅，并在那儿被卡车轧死。此后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市郊，现场被伪造成一场交通事故。

米霍埃尔斯得到了厚葬，《真理报》上刊登了长篇悼词，还为他举办了追悼会。表面上，一切操办得都很体面，很少有人会产生某种不好的怀疑。不过，后来据继任犹太剧院经理的B. Л. 祖斯金说，П. 热姆丘任娜在葬礼上用勉强可听见的声音说：“这是谋杀。”（科斯特尔琴科Г.，《斯大林的秘密政治：政权与反犹太主义》，第393页）

斯大林去世后，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中，这个秘密被公开。批准了这一谋杀行动的斯大林不可能想到，这么快就发生了他最担心的事情。米霍埃尔斯的死亡毫无疑问地让斯大林的政体遭到了全世界犹太人和西方社会的憎恨。

但如果试着按照斯大林在如何处理米霍埃尔斯问题上进行选择时的逻辑来看问题的话，我们就不难看出，对于斯大林来说，米霍埃尔斯无疑是应该受到惩办的。那么是否可以举行一场公开的审判，来指控这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从事间谍活动及其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作呢？看来，这种方案可能被讨论过，但显然被否决了，因为若是进行公开审判，那么以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作为诱饵和与美国犹太组织勾心斗角就都会暴露出来。斯大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走这一步的。而如果在审判中查出他的亲戚与米霍埃尔斯身边的人有牵连，那么就会让人感觉这有个人报复之嫌。总之，此时这位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人是如此束手无策。他选择了谋杀，这不仅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也分裂了苏联的统治精英阶层。从此之后，他内心的行为准则就变得没有理性可言了。

斯大林本人未必能够明白这些。报复过他的敌人之后，斯大林投入到解决其他占据了他全部注意力的问题中去了。

其中之一就是以色列建国的问题。尽管前驻美大使M. 李维诺夫曾警告不要试

图对犹太复国运动施加影响，不要介入巴勒斯坦事务，但斯大林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李维诺夫认为，苏联的影响产生不了需要达到的效果，但斯大林需要的不是一个亲苏联的犹太国家，而是对近东国家的渗透。

实施“克里米亚共和国”的计划，除了希望借此获得贷款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把世界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除了巴勒斯坦之外能解决他们问题的苏联身上。这样一来，斯大林就有机会成为英、美和犹太对话的新的参与者。他不愿看到巴勒斯坦问题在没有莫斯科参与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英国人反对建立犹太国家，因为他们与阿拉伯的君主们在石油业务上联系紧密，害怕新玩家的出现会颠覆原先的一切。美国人则是部分地支持犹太人，其原因有两点：其国内存在着强大的犹太院外活动集团；本国石油公司的利益。

但美国国务院并不支持建立以色列这一想法，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国务院遵循了认为不应破坏石油产区现有秩序的英国人的路线。

苏联采取的手段是利用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提出有必要在听命于英国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一个独立和民主的犹太国家。与此同时，从1946年夏天开始，苏联经罗马尼亚向巴勒斯坦地区派遣了大量的情报人员，企图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能够在针对英国人的军事和破坏行动中用得上的”（И. 苏多普拉托夫语）地下组织。苏联还向巴勒斯坦运去了资金和武器。

所以，苏联是支持以色列建国的进程的，不仅政治上予以承认，还从捷克斯洛伐克运去武器（包括缴获的25架德国“梅-109”飞机）。

我们不要忘记，蕴藏着石油的近东是“马歇尔计划”地缘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斯大林却通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搅乱这一地区，以阻碍欧洲获得廉价的阿拉伯石油。

李维诺夫是这样评述我们主人公的外交才能的：“西方并不知道……如果有几个沙赫或者酋长算是我们的敌人的话，斯大林则比他们技高一筹。”（爱伦堡 И.，《人·岁月·生活》，莫斯科，2005年，第6—7卷，第256页）

当然，要说斯大林不明白英国人退出后事态将如何发展，那是不可能的。他已经预见到了华盛顿将会反对莫斯科，而最终以色列的领导人也会站到美国这一边。但那时“因其支持以色列而对英美感到失望的阿拉伯国家将回到苏联阵营这一边来”。（苏多普拉托夫 И.，《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第476页）

实际上，正是斯大林的这一手段使苏联成了近东事务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引用一下情报人员对他的观察是很合适的：“他的反犹太人倾向不比其反穆斯林的倾向更为严重。”（苏多普拉托夫 И.，同上，第457页）

这种游戏规则很快成了斯大林在几个方面的通用武器，使他在绝望的境地下也能坚持住，有时甚至还获得了胜利。



1948年2月初,由南共政治局委员卡德尔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已经与斯大林产生了纠纷的铁托不愿意来莫斯科。铁托很自信,在表现出对苏联仰慕的同时,他并不打算盲从这位“伟大的领袖”。

此时,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在莫斯科。而在不久前的1948年1月12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刚刚签订了关税同盟,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度不满。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不久前斯大林还是赞同斯拉夫联盟的,怎么突然之间就改变看法了呢。

在与阿尔巴尼亚谈妥了国家的联合之后,南斯拉夫人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但此时斯大林表示了反对。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下令“收缩”希腊的国内战争。南斯拉夫人是支持希腊的共和党人的,此前苏联也向希腊运去了收缴的德国武器。卡德尔对此表示反对。但斯大林没有理会卡德尔的反对,解释道:“他们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难道您认为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会允许他们在地中海的交通动脉出现裂口吗!这是无稽之谈!而我们没有舰队。希腊的起义应该尽快结束。”(吉拉斯 M.,《极权主义人物》,第130页)

但难道他是刚刚意识到希腊在地中海的重要地位吗?难道莫洛托夫不是昨天还为南斯拉夫击落两架美国飞机一事向其表达赞赏之情吗?

不过,支持希腊内战,尽管成功机会渺茫,却等于给了南斯拉夫更多的自主权。但把注意力转移到阿拉伯人的对抗力要强得多的巴勒斯坦,斯大林就省力多了。

吉拉斯后来想出了斯大林这一政策的动机:当领袖“本能地意识到在莫斯科之外建立一个革命的中心会威胁到他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垄断地位”时,就制止了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

这个“天才的配料工”(布哈林的定义)在瞬息之间就对力量均衡的改变作出了回应。

1948年初,南斯拉夫人已经开始对斯大林产生了恐惧感。早在1944年,斯大林就对他们讲过英国人是如何除掉波兰将军西科尔斯基的(“押上飞机,很漂亮地就干掉了他——既无物证也无人证”)。斯大林的这番话让他们顾虑重重,生怕斯大林现在采用英国人的这一经验。

在斯大林禁止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巴尔干联邦之后,“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就公开显露出来了。斯大林认定,铁托会压制年迈的季米特洛夫,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导人。所以说,吉拉斯的推断是有一定根据的。

为了能对斯大林的意图有一个全盘的认知,我们来关注一下克里姆林宫与教会关系的新特点。1948年,斯大林打算在莫斯科举行中断了几世纪的庆祝普世会议俄罗斯东正教独立教会成立500周年的纪念活动。同时,还提出了宣布莫斯科大牧首

教区为总主教区,使其成为所有东正教独立教会的首领。早在1945年4月10日,斯大林在与牧首阿列克西(牧首谢尔吉已于1944年去世)的会面中,就确定了教会的对外政策。此后,莫斯科教区便积极展开了对外联系,仅在1945至1946年间就向欧洲和近东的17个国家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并接待了13个来访的外国代表团。1945年,原本隶属于其他教会的3个都主教、17个大主教和主教归入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佩日科夫 A.、丹尼洛夫 A.,《超级大国的诞生(1945—1953年)》,莫斯科,2002年,第202页)

斯大林认为,这样可以对巴尔干和近东各国施加更大的影响。但普世会议未能召开,因为只有不多的教会领导人同意出席会议。不过,斯大林试图复兴“第三罗马”这一举动本身表明其具有巨大的合理性。

对教会的重视(甚至可以称之为一项新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众多居民恢复了履行宗教的仪式(洗礼、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和做安魂弥撒),这引起了首先将这些居民视为意识形态领域对手的地方党组织的恐慌。

而所有这些又导致高层产生了一个小的冲突。1948年8月10日,伏罗希洛夫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命令,允许新的28座教堂对外开放。而1948年10月28日,该命令被政治局决议撤销了(参与表决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卡冈诺维奇和柯西金)。刚刚开放的教堂又被关闭了,直至斯大林去世之前,再也没有开放过任何一座新的东正教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273页)。而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对教会的态度变得充满了敌意。

## 第三十七章

# 斯大林不害怕美国人的原子弹

斯大林不怕美国人的原子弹、东欧为何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封锁西柏林

1948年初,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克里姆林宫被秘密告知,苏联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原子弹,而且其威力要比美国人研制出来的更大。苏联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如风驰电掣一样迅速。早在1946年12月25日,在莫斯科郊外的第2号实验室就已经启动了铀石墨核反应堆的实验,并成功产生了核反应。

斯大林总是不停地收到有关苏联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了解所有的细节。尽管有苏联情报机关从在美国工作的德国反法西斯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处获得的数据,还有被带到苏联的德国物理学家的协作,但从公正的角度来说,主要的功绩和荣誉还是应该属于苏联专家。是他们发展了“一整套科研与生产的综合体系”,表现出了卓越的理论实验才能。

斯大林知道,1949年苏联将会有一颗自己的原子弹。但有这么一颗原子弹又算得了什么呢,杜鲁门早就有了原子弹,而且还不止一颗,另外还有能够把原子弹投到苏联的轰炸机。不过即便如此,美国总统还是不敢用它来对付苏联。

斯大林确信,只有一颗原子弹是不足以取得胜利的。1948年,斯大林并不害怕冲突发展到极限,开始封锁柏林西部地区,虽然看起来他的行为毫无逻辑可言,因为他刚刚停止了对希腊共和党人的援助。

但事实上,他的算计是基于对时局完全准确的评估。第一,11月将举行美国总

统大选，白宫的注意力被分散了；第二，根据他手上掌握的情报机关上报的情报可以得出结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国都不会拥有能对苏联军工力量造成决定性损害的、足够数量的核武器。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足以让苏联能够在欧洲和远东同时展开军事行动，那就是俄罗斯广阔的地域，此时这一点和以往一样，再次成为莫斯科强有力的武器。

对美国核储备规模的了解，使得斯大林可以在东、西两个方向开始进行激烈的争夺，而在东边的中国，此时美国人支持的国民党正和共产党人打内战。

在过去盟国的压力下，1946 年 3 月至 5 月，苏联红军的部队从中国撤出，而美国人则把自己的军队留了下来，包括在北平市内。仅从 1945 年至 1946 年，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就达到了 60 亿美元（拉赫马宁 O. B.，《过往的篇章》，莫斯科，2005 年，第 69 页）。1946 年 6 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大规模进攻“北方领土”，共产党人丢掉了他们占据的东北很大一部分地区。不过来自莫斯科的援助帮助共产党人击退了国民党的进攻，守住了作为日后打败蒋介石基地的东北革命根据地。1949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的军队进入北平，战争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早在 1946 年，苏联就在楚科奇半岛上部署了由奥列舍夫将军指挥的第 14 登陆集团军。“这支部队的战略任务是：一旦美国人向我们发动核攻击，这支部队就会登陆阿拉斯加，然后沿海岸线向美国展开攻击。”（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 100 页）

美国缘何要攻击苏联呢？

原因在于，各方都在向战争快速挺进。

1947 年至 1948 年间，西欧爆发了几次由共产党组织的大罢工。

如果认为斯大林一开始就认定东欧应该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只是用民主的游戏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意图，那就错了。事实上，他的主要想法是建立若干“旨在不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为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而实施必要改革的”的联合政府，1946 年 5 月 24 日，斯大林在会见由波兰总统 B. 贝鲁特和总理 Э.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提到了这一想法。斯大林的这一想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甚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波兰解放之后建立的制度有什么特点呢？”

“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也不需要这种专政。也许在我们苏联，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也会是另一种样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我们俄罗斯就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我们有着强大的对手，我们需要推翻三座大山——沙皇、地主和强大的、充斥着外国势力的俄罗斯资本家。为了战胜这些势力，就需要以强制为基础的权力，即



专政。

“而你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你们的资本家和地主因与德国人的勾结已经名誉扫地，以至于不用特别费力就打倒了他们。他们从未表现过爱国主义。他们犯下的这种‘罪恶’绝无仅有。毫无疑问，在波兰消灭资本家和地主的这件事上，红军也帮了忙。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波兰现行的制度是民主制，是民主制的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没有先例的。无论是比利时的、英国的，还是法国的民主制都不是你们的榜样和样本。你们的民主制是特别的。你们没有大资产阶级。你们实现工业国有化只用了 100 天，而英国人则为此斗争了 100 年。所以不要去复制西方的民主制，就让他们复制你们的吧。

“在你们波兰、在南斯拉夫，某种程度上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起来的民主制，是一种无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体制就能带领你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

“列宁根本就没有说过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话，相反，他允许通过利用诸如议会等一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机构来实现社会主义。你们实施改革的结果，无疑会导致出现一批中、小资本家。但中产阶级从来没有主导过社会生活。

“你们没有大型的私营银行，也没有大型的私营企业……

“你们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即你们的大型工业企业已收归国有、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情况下，就完全可以在工业企业建成相应的机制，提高生产，降低价格，给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国内的局势也会稳定下来。对新型民主制度不满的人数将逐渐减少，你们无需经过血腥斗争就能走近社会主义……

“这种制度是值得保留下去的。如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的联盟瓦解了，那华沙的这种新型民主制度也将消亡。那么该拿米科拉伊奇克怎么办呢？——斯大林继续说道——波兰的民主阵营里不能没有反对党，但这个阵营需要一个合法的、听话的反对党，一个用合法的方式批评政府，但不企图推翻政府的反对党。这样的反对党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益的，其作用就是销蚀那些地下的反对势力。”（引自：皮霍亚 P.，《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政权：战后四十年（1945—1985 年）》，莫斯科，2006 年，第 131—133 页）

“二战”之后，斯大林曾有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这与 1936 年苏联宪法草案中的议会制思想是一致的。但也正如 1936 年那样，最终迫于环境只能放弃这种想法。而他在试图建立一个中立的德国中遭受的失败则启动了欧洲的分裂。

1947 年冬天，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在 1947 年出现了大面积



的歉收，谷物收成只有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二，而土豆的收成还不到往常的一半。布拉格向美国求援，而美国大使却直截了当地要求布拉格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于是 K. 哥特瓦尔德又转向莫斯科求援并且得到了粮食。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部部长里普卡是这样评论美国人的：“正是华盛顿的这些白痴把我们直接送进了斯大林的阵营。”（乌特金 A.，《全球性冷战》，第 483 页）

通过把捷克斯洛伐克从饥荒中解救出来，斯大林有意识地加强了苏联在这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府控制的国家中的地位。到此为止，斯大林对这些国家的情况还是满意的，但当西方开始迅速复兴他们在德国的三个占领区的经济，并且现实离建立一个民主、中立的德国的构想越来越远的时候，苏联不得不改变战略了。

斯大林做出决定：贝奈斯总统应该退休了，总统一职由哥特瓦尔德来担任。为了不让贝奈斯图谋对抗此决定，苏联情报机关被授权可以用将公开捷克斯洛伐克与莫斯科合作的内幕作为威胁向其施加压力，包括公开贝奈斯 1938 年接受苏联驻外情报站站长祖博夫数万美元时所写的收据。多亏了这笔钱，贝奈斯才得以在接受了慕尼黑协定之后离开捷克斯洛伐克。

贝奈斯并未进行反抗，不过他未必是因为害怕拿美元的事情被公之于众。更主要的是莫斯科警告他，捷克斯洛伐克会不会发生大屠杀完全取决于他的决定。于是，贝奈斯作为一位悲剧人物退出了政治舞台。

2 月 25 日，共产主义政府成立了。如果不考虑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的自杀，可以说这次权力的交替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阵痛。马萨里克是在 3 月 10 日跳窗自尽的。

作为对此的回应，3 月 12 日，美国军事指挥部下令审议征召动员计划。3 月 13 日，美国决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并加强对核武库的保卫工作。陆军部长罗亚尔提醒杜鲁门总统说，一旦发生战争，美国部署在欧洲和日本列岛的军队将被消灭。

2 月 23 日（即在哥特瓦尔德政府成立的前两天），伦敦会议开幕（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公国）。会议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对德国的未来做出了决议，还决定建立新的德国货币体制。

3 月初，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开始有选择地限制向柏林的西方占领区运输。开始出现半包围的状态。而过去的这些盟国并没有在苏占区（空中走廊除外）内进行调动的法律权限。趁着把对手的全部注意力吸引到封锁柏林这把“保护伞”下，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对亲美的政权给予了致命一击。但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在柏林切断铁路和公路运输以及供电的举措，却将潜在的冲突提升到了危险的地步。

围绕着德国财政问题的冲突其实还有一个不便公开的原因。当时在德国流通着的是被称为“占领区马克”的货币，而印刷这种马克的机器是掌握在苏联驻德当局手中的。这种马克能自由兑换成美元，因此失去了这一外汇的来源，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II. 苏多普拉托夫认为这才是关键之一。



其实，是斯大林挑起了这场风险极大的游戏。

美国人开始用他们所有的运输机为西柏林提供补给，而6月29日，英国人批准了美国将60架能够携带原子弹的B-29轰炸机布置到不列颠群岛，此外还有一个轰炸机编队飞抵冲绳岛。苏联的两翼都处在了核威胁之下。

事态的发展明显反常。1948年5月至7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了一场代号为“佩德隆”的沙盘演习，对如果苏联和美国爆发冲突，双方最初两周在欧洲、近东和远东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分析。美国参谋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失望的：苏联军队将迅速占领柏林和维也纳，越过莱茵河，在伊朗和韩国成功展开军事行动，而苏联的盟友们则会在希腊展开行动；接着苏联的登陆部队会占领阿拉斯加州的诺马区，只有在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和安克雷奇，美军才能打退苏军的登陆部队。而且得出结论，苏军将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在美国国防部的会议上，空军参谋长X. 范登堡承认，他对用原子弹轰炸苏联本土的效果缺乏信心。

斯大林掌握了情报机关提供的“要与苏联打一场大战，美国的核贮备还太少”的情报。（《冷战（1945—1963年）》，第345页）

此外斯大林还被告知，位于柏林的法国占领当局并不相信美国人会长期从空中向西柏林提供补给，英国人同样对此表示怀疑。苏联驻德当局向莫斯科担保，美国空军的行动注定会失败，西方将作出让步。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不愿意听取从华盛顿和伦敦发来的由“剑桥五杰”（Д. 麦克林、Г. 伯吉斯、К. 菲尔比、Э. 布兰特、Дж. 凯恩克罗斯）和其他人提供的关于封锁无效的报告。他继续进行封锁，并等待着取得效果。

不管这让人感到多么奇怪，有一条来自伦敦的非常重要的信息竟然没有人向斯大林作过汇报：英国外交大臣 Э. 贝文声称：“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强硬的态度，那么我们在欧洲的处境将是毫无希望的。”这一情报只呈送给了莫洛托夫及其负责情报委员会的副手 B. A. 佐林。“同样也是如此，苏联的政治领导层也没有得到有关空运已成功解决了柏林的供给问题的准确消息。”（《冷战（1945—1963年）》，第342页）

但如果认为斯大林是企图在欧洲挑起军事冲突，那是错误的。在这里，在欧洲的中心，他只想恢复原状，即按照过去的“四方协议”共同管理德国。1948年7月底，斯大林在会见美国大使 У. 史密斯时说的话中就包含他对所发生之事的主要看法：过去的盟友想复兴德国，现在世界上将出现两个德国。

斯大林的话中还透露出一种对这个曾经两次给俄罗斯带来巨大损失的国家再次复兴的不安。

但是西方已经看不到可以恢复势力均衡的其他途径。

苏联的封锁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虽然更早之前就已经清楚，美国人完全挺得住这种封锁，并且今后将经常性地插手欧洲事务。华盛顿决定留下常驻德国的军

队。一度犹豫不决,并且也担心德国复苏的法国,现在也加入到了正在构建中的西方军事联盟之中。

可以说,柏林这一仗斯大林是打输了。他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的设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而杜鲁门则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柏林事件之后,罗斯福的方针是不可能再现了。

不过,苏联在东方的胜利掩盖住了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从 20 世纪 20 年代就与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强调不必插手中国事务)展开的那场争论有了结果:蒋介石和美国人失败了。

那么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个遍体鳞伤、经济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在抵抗强大的对手,并一如既往地相信自己能够取得胜利。

## 第三十八章 和铁托决裂

---

与铁托决裂、杜勒斯有关分裂苏维埃集团的方案：“爱国者都应该成为斯大林的敌人”、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苏联阵营精英们的分裂

---

当然，说“胜利”是夸大其词了。准确地说是“捍卫了自己的利益”。而随后，恰如斯大林命运中常见的那样，胜利之后就是失败。失败在哪里？在共产主义世界最巩固的一个地区——南斯拉夫。事由不是出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在于斯大林创造的这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合理性上。似乎，在越来越靠近他生命终点和苏联最终得以巩固的顶峰的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与斯大林相比，铁托算老几呢？战前，他只是众多共产国际战士中的一员，是战争使他成为了一位军事领袖，一位打败了德国人的胜利者，当然，这是在莫斯科和伦敦的帮助下实现的。难怪在1944年，丘吉尔在那张百分比的字条上向斯大林建议以“50%对50%”来划分在南斯拉夫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中心。波兰不在此列，这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对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都持敌对的态度。

但铁托可不是塞尔维亚人，他是克罗地亚人。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斯大林的原话是：“南斯拉夫的不幸在于，其领导层实际上是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克罗地亚传统上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sup>1006</sup>国家，深受罗马教廷和奥匈帝国传

统的影响。而拥有东正教居民、历史上就偏向俄罗斯的塞尔维亚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些东西在政治上同样也发挥着作用。”(日丹诺夫 Ю. А.,《回首往事》,第 221—222 页)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从铁托的民族性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吗?难道因此他就会与“莫斯科沙皇”不和吗?在南斯拉夫,一切均是学自苏联的模式——一党的体制,工业、银行、交通和批发贸易的国有化,还有集体化等等。1947 年春,铁托宣布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制订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目标的五年计划。在国际舞台上,铁托是斯大林的忠诚战友,完全支持苏联。

起初,没有任何要发生决裂的迹象。相反,在 1945 年,应铁托的请求,苏联契卡人员还被派去保护铁托,以防止可能发生的谋杀。1947 年 9 月,斯大林决定为南斯拉夫实现工业化提供帮助,给南斯拉夫派或送去很多专家、技术资料、物资和设备。但斯大林在地缘政治上谋划的范畴要比铁托宽广得多,这使斯大林在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上对西方作了妥协,而此事却招致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指责。在这起事件上,斯大林显得更有经验,也更沉着,而铁托则显示出了游击队员式的急躁。铁托希望尽快把阿尔巴尼亚并入到自己的国家来,还希望尽快与保加利亚签订同盟条约,而保加利亚此时的国际地位(“战败敌对国”)尚未通过签订和平条约而改变。斯大林不想在与西方势均力敌的地方制造麻烦,麻烦已经够多了。但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却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草签了条约,并在报纸上公布了。当然,在收到斯大林愤怒的来信之后,他们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并表示了悔过。

铁托独立自主的自行其是远非局限于此。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这种自行其是得到了延续,南斯拉夫人想在阿尔巴尼亚获得优势地位。斯大林对此并不反对,但建议不要急着去正式统一。而铁托却在没有通报斯大林的情况下就向地拉那提出了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为南斯拉夫的一个师提供基地的要求,理由是抵御希腊人有可能发动的入侵。

对此莫斯科自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宣称这是“严重的分歧”。铁托退让了,承认做得不对。

当斯大林得知季米特洛夫在 1948 年 1 月 17 日对记者表示要建立一个东欧国家联盟时,他的态度变得更强硬了。在莫斯科正尽全力阻止德国西部地区统一的时候,这不是忙中添乱吗!除此之外,斯拉夫兄弟国家的渐行渐远也破坏了东欧集团的整个管理秩序,没这些事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稳住。

1948 年 2 月 10 日,由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率领的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代表团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领袖的眼前。到达斯大林别墅的还有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佐林。客人们又一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2 月 11 日,苏联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分别签订了备忘录,规定双方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有协商的义务。



斯大林断然否定了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东欧国家联盟的设想,建议成立三个新的联盟: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与匈牙利、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及阿尔巴尼亚。而且,斯大林建议,首先应从建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联盟开始。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应该满足了铁托想当地区领导人的要求。斯大林是这样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行为作出解释的:“南斯拉夫人害怕在阿尔巴尼亚的俄罗斯人,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向那里派出自己的军队。”

贝尔格莱德马上就明白了斯大林的意图。2月19日,南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决定不再与保加利亚建立联盟,因为鉴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巨大影响,联盟可能沦为莫斯科控制南斯拉夫的工具。铁托还在会上表明了必须捍卫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地位的态度。

当然,这还不算是与莫斯科的决裂,但已经是明显的分歧了。看来,铁托元帅已经暗下决心,不会向斯大林的战略构想屈服。铁托的明显转变发生在2月21日,当与希腊共产党总书记H.萨查利阿迪斯和中央书记И.约奥尼迪斯会面时。铁托承诺将向他们提供援助(此举违反了斯大林结束希腊国内游击战的指示)。

铁托明显越过了雷池。1948年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称:苏联不考虑南斯拉夫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竭力施加压力,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

会上还讨论了苏联拖延武器供应的问题。不过,这还不是双方最终的决裂。在这之后,铁托转达了他想来莫斯科,当面解释争议问题的意愿。但3月9日,当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致电莫斯科说,南斯拉夫人违反惯例,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提供该国经济的有关资料时,双方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

一段小小的停顿之后,3月18日,铁托收到了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名的来信。信中谴责南斯拉夫领导层犯有机会主义、反苏主义和修正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

而铁托和卡德尔则谴责苏联方面进行反南斯拉夫的行动。

莫斯科予以了反击:中断了双方在1948年2月11日签订的协商备忘录,暂停了预定向南斯拉夫提供的作为航空和轮船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技术设备,取消了作为苏联专家赴南开发空中运输和轮船运输法定资本的技术设备,取消了向南斯拉夫派遣苏联专家。

南斯拉夫人逮捕了公开支持莫斯科的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C.茹约维奇和中央委员A.赫布朗。然后又有数万名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被捕,其中数千人死在集中营里。

这已经是一场战争了。

1948年6月19日至23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上,铁

托和南斯拉夫领导层受到了排挤。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指出：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不应该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的制度”。

“纯土耳其式的”似乎是出自这个来自高加索的人的手笔，但这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几乎在同一时间至少完成了几个重大的，甚至是极其重大的行动。除掉米霍埃尔斯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如果不是此事具有一定的意义，甚至根本不值一提。斯大林在全球展开了战斗：以色列、柏林、中国和南斯拉夫。

然而在对待其在东欧最坚决、最彻底的盟友的问题上，斯大林做得是否正确呢？

和以往一样，对于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直接答案的。唯一可以明确的是，斯大林没有时间等待铁托融入自己的战略构想中去，于是便展开了一场希望消灭或征服对手的战斗。

1948年9月8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民族主义在走向何方》的文章。文章署名“中央委员会”，其实作者正是斯大林。文章声称：“铁托集团正处在与自己的党作战的状态。”事实上，这完全是夸大其词。

斯大林本可以找到其他方式向南斯拉夫领导人施加影响，但他选择了最富斗争性的方式。这是为什么？因为必须阻止与莫斯科产生竞争的另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出现。

正如当时南斯拉夫领导层的一位成员证实的那样，斯大林的做法是建立在哲学推理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的思想出发点是正确的，那么剩下的事就应该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吉拉斯 M.，《极权主义人物》，第138页）也就是说，斯大林觉得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作为创造者，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喜欢的方式。

当然，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的思想出发点和其他一些创造者，而他们是相互敌对的。

既然用军事手段推翻苏联已不可能，杜勒斯便将斗争转移到了其他的时间段，并且不限于具体的时期。但历史时期要比人的生命期长。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他们就像罗斯福一样，终将离开人世。他们只是看上去显得不可代替和无所不能。

杜勒斯的想法是建立在斯大林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外人不易觉察的矛盾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在新联盟身上首先看到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支队，而这些国家则是苏联军事体系的前沿阵地。如果寄希望在这种历时数十年的公开和非公开的战争之后，在东欧国家被当成反苏联基地的时候，斯大林还能有其他的想法，那将是错误的。这些国家理应成为共产主义罗马的省城和堡垒。

不过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有着自己对未来的民族构想。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植根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先驱的经验之上的。





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间谍机关总是神经质地估算着铁托的自主性，而莫斯科外情局的领导层则下令沉着应对。

总部早在 1945 年 8 月发出的一个警告就显示出了它的预见性：“再一次请你们在得到类似的材料时牢记，英美的情报机构对营造一个对南斯拉夫现政府领导人不信任和猜疑的氛围极感兴趣。应该考虑到，将来还会出现不少想借我们的双手来除掉那些最忠诚和可靠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尝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全排除了某些共产党员在外部环境和外来因素的影响下，政治觉悟降低的可能性（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对于这种苗头，应该在做出觉悟下降和背信弃义的结论前，以最细致和负责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俄罗斯对外情报机关史概述》，第 5 卷，莫斯科，2003 年，第 308—309 页）

这里关键的思想就是“借我们的双手除掉那些最忠诚和可靠的人”。

杜勒斯的计划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也是“可分裂因素”行动的基础。参与这一行动的是那些活生生的人，那些有爱国情绪的反抗运动的参加者，那些同意杜勒斯分裂苏维埃阵营观点的共产党员。杜勒斯通过这些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反共产主义的“阴谋”网络，其分布的广泛和对东欧国家领导机构的渗透，对于莫斯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而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阴谋。这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并且受到了西方抛出的相应信息以及苏联特勤部门对防止侵略所抱的残酷无情心态的推波助澜。这种残酷无情既反映出了地缘政治的对抗、核武器的威胁，还反映出了对 1937 年那场反对公开和潜在敌人的国内审判的记忆。

1948 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局第 10 局（政治情报局）副局长、对德战争的参与者约瑟夫·斯维亚特洛中校与英国国家情报处的代表沙利文建立了联系。斯维亚特洛时年 33 岁。正如所有的波兰人一样，斯维亚特洛的爱国主义不仅是出于对波兰的热爱，同时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对德国和俄国扩张的反抗情绪之上的。整场战争中斯维亚特洛都是在苏联这一边的波兰军队里任职，一步步到了此时的这个职位上，他曾是与反共秘密组织进行斗争的积极参与者。

但是应该考虑到，在这一反共秘密组织中几乎所有的人也都是波兰的爱国主义者。明白了这一点的斯维亚特洛无法在感情和职责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线，成了叛徒。

第 10 局负责的是国内的安全，即政治监控。他的同事们监视着所有的波兰共产党员和各个层次的所有领导人。英国情报机关，接着就是美国情报机关都通过斯维亚特洛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间谍人员。

1948 年 6 月，还发生了一件符合杜勒斯构想的事件：南斯拉夫因不愿意“牺牲主权”而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在斯维亚特洛帮助下，利用南斯拉夫事件，并借助斯维

亚特洛身边的网络,英美理应可以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埋下反斯大林种子。

杜勒斯清楚地知道欧洲的局势,在那里知识分子普遍怀有一种亲社会主义的倾向,如果他要取得成功,必须为莫斯科编造一个逼真的故事:在东欧国家里存在着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网,这里面包括一些反法西斯斗争的知名人士,他们要么一起参与过在西班牙反佛朗哥战争,要么与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合作过,要么与诸如美国战略情报局或难民事务委员会这些美国在欧洲的机构有联系。

战后欧洲的政治精英们还沉浸在一致反对希特勒的思潮中,尚未感受到“铁幕”已经降临这一现实。

美国人诺埃尔·菲尔德的事件成了实现杜勒斯构想的第三要素。菲尔德时年44岁。他生于瑞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按政治观点,他属左翼,是共产党的支持者。22岁时,菲尔德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29年结识了艾伦·杜勒斯,并与他一起准备过用于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材料。

希特勒掌权以后,菲尔德更加坚定了他的左翼立场,并且由此结识了很多曾是苏联情报人员的德国难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菲尔德展开了与他们的合作,交给了他们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文件,并认为眼前的战争会促使所有有反法西斯倾向的人们联合起来。可以说,菲尔德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与菲尔德接头的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就是路德维希,也就是赖斯),但后者不久便逃走了,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清除掉了。而菲尔德的下一个联系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同样也投奔了敌方。后来,这些与投敌分子的联系成了菲尔德档案中的重大疑点。

1939年,菲尔德开始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工作,负责监督把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共和党人一方的外国参与者遣返回国。1941年,菲尔德负责法国贝当政府单一制机构委员会驻日内瓦代表处的工作。法国南部被占领之后,菲尔德被任命为单一制委员会欧洲部主任。在这里菲尔德与杜勒斯又一次走到了一起。帮助过那些流亡者,特别是流亡共产党人的菲尔德原来与这些很快成为自己党里显赫人物的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杜勒斯就利用从菲尔德处得来的情报说服军方加强对铁托游击队的援助。通过菲尔德,杜勒斯还得到有关其他国家的极有价值的情报。杜勒斯信任菲尔德,并在德国部队撤退后在解放地区建立公民自治团体的问题上采纳了菲尔德的建议。所以,这些团体是由反法西斯共产党人构成的便不足为怪了。

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当划分世界的重要性超过了协作斗争的重要性时,那些在战时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就变得不可接受了。杜勒斯指出菲尔德的错误。在杜勒斯的眼中,菲尔德成了共产党的间谍。



1949年,菲尔德被解除了援欧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在寒冷的一月,他飞抵华沙,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他在东欧认识很多大人物,他们理应向他提供帮助。

但菲尔德失算了。此时约瑟夫·斯维亚特洛登场了。为了诋毁自己的上司,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斯维亚特洛有意把菲尔德设计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斯维亚特洛向自己的联络人发出了信号:菲尔德是个什么人?能不能利用他?是否有反对意见?

后来美国的研究人员是这样描述这个事件的:

艾伦·杜勒斯早就认为,美国情报机关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挑起苏联附属国与莫斯科之间的分裂。南斯拉夫的情况证明,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再加上领导人足够强硬或足够恐惧,巨人是可以被推翻的。杜勒斯认为,应该好好利用斯维亚特洛-菲尔德这一环节,以便能在一些地区内冲破苏维埃帝国的缺口。艾伦·杜勒斯决定把斯维亚特洛积极利用起来,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正如他后来向一位朋友说的那样,这一计划理应成为他最辉煌的成绩。他看到每一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毫无希望地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并且斯大林不断增加的要求也使共产党联盟内部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忠诚的。只需要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给予一个不大的推动,就可以促使东欧人民奋起反抗,挣脱斯大林捆在他们身上的锁链。

一些西方外交官认为应该给予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一切可能的外交等方面的支持,期望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修复自“铁幕演说”之后被削弱的西方的影响力,而杜勒斯则无情地驳斥了这些想法。与之相反,杜勒斯认为只有在斯大林主义得到极大膨胀之后才能揭示出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杜勒斯看得更远:民族主义共产党人在更远的将来对于西方民主事业的威胁要比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得多;而如果“自由主义者”为之而斗争的那种共产主义形式在共产主义联盟内部占据了优势,那么这种共产主义还是可以接受的。

只有当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条件到了如此无法忍受的地步——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的贫困程度都超过了对自己冒险行动所带来的后果的恐惧时,才可能发生有效的革命。这个论题还可以拓宽:让像哥穆尔卡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在波兰掌权,大大减小了俄国人对该国的影响,且共产主义突然间成了能克服欧洲所有障碍的可敬力量。毫无疑问,唯一能够阻止法国与意大利工人投票支持自己国家共产党人进入权力机关的,是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意识到把票投给共产党人就是投给俄国人。无论如何,要让他们感觉到,处于美国善意的庇护下要比面对声名狼藉的苏联殖民主义安全得多。

按照杜勒斯的结论,主要问题不在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是全球的威胁,而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本质上都是不好的,理应被消灭。杜勒斯极清楚地看到了应该怎么做。(斯蒂芬 C.《“分裂”行动》,莫斯科,2003年,第162—164页)

这个计划对斯维亚特洛来说是无比庞大的:“他得四处去寻找‘奸细’,揭发党的高层领导人是美国的间谍,而美国人也将为他提供必不可少的证据。他要揭露出一个由美国资助的、席卷了所有俄罗斯帝国附庸国的庞大的托洛茨基分子阴谋集团。他得去证明,铁托主义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东德都筑了巢。他得向贝利亚本人汇报,说这一阴谋集团里,其中心环节是起着把这些叛徒与华盛顿联系在一起作用的名叫诺埃尔·菲尔德的人。而关于菲尔德,应该让贝利亚认为,他是在东欧和西欧的最重要的美国间谍。斯维亚特洛要指出,菲尔德在‘二战’时,利用其在单一制委员会工作的身份作掩护,非常成功地实施了美国的间谍行动。他要报告菲尔德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吸引共产党员,进而将他们发展成间谍的。他要揭露出,菲尔德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为美国的情报机关工作,同时还表现出一副同情共产党员或者自己就是共产党员的样子。他要说,‘二战’结束后,菲尔德将自己的间谍安插进了东欧国家党和政府的高层之中。而且这一切做得是如此之快,以至于那些忠于莫斯科的活动家尚未来得及展现出自己的实力,重要的职位就已经被菲尔德的人占据了。他要报告并证明,美国人甚至现在还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加强对菲尔德的掩护。比如说,美国参议院展开的调查其实就是在故弄玄虚,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菲尔德在东欧站住脚跟。总的说来,他应该证明,诺埃尔·菲尔德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瓦解整个苏联集团的活动,而且他的危险之处在于他已经接近自己的目标。”(同上,第165—166页)

斯维亚特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的关于存在一个反苏维埃阴谋集团的报告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案头。为了加强可信度,“自由欧洲”电台每天晚上都在播报加了密的文告,仿佛这是播给数不胜数的美国间谍听的。播送这些文告的“贝尔上校”其实就是美国记者拉吉斯拉夫·法拉戈。每当报纸上刊登出有关事故或火灾之类的消息之后,“贝尔上校”马上就会通过广播向他的“人”送去祝贺。这给苏联人,特别是特勤部门的领导产生了极为压抑不快的印象。

但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下令再一次进行全面复查。

问题在于,苏联国内的情况是艰难的。人民生活困苦,而理应缓解这种状况的政府却不得不增加国防预算并加快原子弹的制造工作。斯大林明白,人们对于过上好日子的期盼暂时是无法实现的,虽然他们为了获得胜利经受了极大的苦难,理应如此去期望。他个人的生活极为简朴。这位大元帅甚至没有外出穿的制服,也不允许给自己购置新的衣物。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统治着半个世界的人有比更新衣柜



更重要的任务。而这个世界正在逃离他的掌控，一场针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新的侵略威胁正从侧翼侵袭而来。

除此之外，在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中同样出现了“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路线的分歧。这一路线是中央委员会书记 A. A. 库兹涅佐夫和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H. A. 沃兹涅先斯基提出来的。

与老一代人相比，他们是另一类人。在东欧的共产党内同样也存在这一情况。

在谈及民族主义的威胁时，就应该想到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西部发生的军事行动，那里的人们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帜在武装反抗苏联当局。

克里姆林宫向苏联在美国的情报机关发出的调查菲尔德的任务，交到了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双重间谍手上。这位双重间谍提供的情况是：诺埃尔·菲尔德与艾伦·杜勒斯有联系，菲尔德在中央情报局里的档案不翼而飞，他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

正是这种措辞谨慎，但对什么也不反驳的回答让莫斯科感到是令人信服的。按照特工部门的逻辑，秘密间谍看上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千方百计地散布着正在展开针对苏联的秘密行动的流言，甚至连美国国务卿也参与到了这一流言的传播之中。总而言之，似乎一股恶浪正朝着苏联奔涌而来。

菲尔德作为“按铁托和帝国主义者的指示，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而在共产党最高层发展间谍的美国间谍组织的特工”被逮捕入狱。接着，这一所谓的阴谋链从菲尔德身上伸向了匈牙利。

拉伊克·拉斯洛是匈牙利最有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之一，战后曾任内务部第一任部长，稍后还担任了外交部部长。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在西班牙内战时他指挥过一个营，此后在法国羁押罪犯的牢房里被关了3年，并在那儿遇到了菲尔德。他曾是公认的毫无瑕疵、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员。

而西方竭力将他描绘成顽固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托洛茨基分子。专门组织了人从国外往匈牙利给他寄来了一连串的信，信中表示了对他这位民族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当然，谁也不知道所有这些信其实是出自一人之手。

拉斯洛注定要遭厄运了。1949年6月3日，他被逮捕。

与他一起受到审判的还有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乔治·巴勒菲中将，前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代办、在共产党情报局与铁托决裂后投奔了匈牙利人的拉扎尔·勃兰科夫，主管干部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季博尔·索尼及他的副手安德拉什·萨莱，秘密警察贝拉·卡隆兹上校，匈牙利广播委员会副主席帕乌利·尤斯图斯和党务工作者米兰·奥根诺维奇。（同上，第212页）

9月14日，拉伊克·拉斯洛、季博尔·索尼和安德拉什·萨莱在市中心的布达佩

斯监狱的院子里被执行了绞刑。

菲尔德“阴谋”链条接着伸向了保加利亚副总理特莱乔·科斯托夫、1948年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所有这些人对于杜勒斯来说都是危险的对头，他们都有能力在自己国家巩固共产主义政权。

作为国家财政经济代表团的团长，科斯托夫在与苏联的谈判中争取到了对保加利亚最好的条件。他还拒绝告诉苏联人保加利亚商品的成本价格，虽然“按照俄国人的话来说，这对制定一个公平的价格是必不可少的”。科斯托夫试图以最高的价格卖出自己国家的商品。不过除了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之外，他还支持建立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国家联邦，而斯大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是，科斯托夫被认为是年事已高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最有可能的接班人。

科斯托夫被指控在1942年保加利亚警方进行大逮捕时出卖了自己的“同志”、与英国国家情报处有联系、持有托洛茨基的观点、与南斯拉夫分裂主义分子有接触、破坏保加利亚与苏联的经贸合作，并企图在南斯拉夫的援助下推翻保加利亚政府。和他一起受到审判的还有几个著名的保加利亚经济学家。

在法庭上，科斯托夫驳斥了所有针对他的指控：“扪心自问，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法庭和保加利亚人民声明，我从来都没有当过英国的间谍，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阴谋策划，我始终尊敬和尊重俄国。”

1949年12月17日，科斯托夫在索菲亚监狱被处以绞刑。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在战争年代成为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的。他可不是像博莱斯瓦夫·贝鲁特那样总是看斯大林脸色行事的所谓“莫斯科的波兰人”。

哥穆尔卡是属于那种最能体现波兰谚语“波兰人不允许别人觊觎自己的粥”的人。这个谚语用俄语说起来则更简洁：“波兰人不会把自己的粥送给别人。”

在从俄国空降来的两位总书记候选人相继被害之后，哥穆尔卡成了总书记，但他从不觉得自己应该对莫斯科感激涕零。

波兰抵抗德国人的主要力量是非常反苏联和反俄罗斯的克拉约瓦的军队。莫斯科明白，战争结束后，“克拉约瓦人”将成为阻碍苏联扩大影响的一支力量，因而一直与之进行着角力。在克拉约瓦军队的背后，是波兰几世纪以来的历史传统，有占据莫斯科的瓦迪斯瓦夫国王，有充当伪德米特里的格里戈里·奥特列皮耶夫，有波兰哥萨克战争，有天主教在乌克兰的扩张，还有毕苏斯基元帅对苏联根深蒂固的仇视。

顺便提一句，每一个东欧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间故事，但是波兰人的故事却是最反俄的。

斯大林明白，这个问题是十分尖锐的。他能用什么来与之抗衡呢？难道仅靠马克思列宁的国际主义学说和苏联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吗？作为过去的教会学校学生，





斯大林还记起了基督徒的一条统一的教义“上帝是不分希腊人还是犹太人的”。也就是说,尽管是“红色的”,但波兰的民族主义在斯大林的世界地图上是没有位置的。

哥穆尔卡是一个果断的人。比如,他下令枪毙了几个抢劫居民的苏联士兵,并命令停止在从德国划分来的新土地上拆除设备,以迫使苏联代表进行谈判,进而得到了补偿。总体来说,哥穆尔卡是反对各国共产党过分依赖莫斯科的,甚至敢于在 1948 年 6 月共产党情报局于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反对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尽管这种抗议仅是以他缺席表现出来的,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位波兰领导人想表达什么。

逮捕并没有摧垮哥穆尔卡,而且也无法对他提出什么严重的指控。他那些被捕的战友也显得十分坚强。在监狱关了几年之后,哥穆尔卡得以获释。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是一个强硬、勇敢的人,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虽然是犹太人出身,斯兰斯基却并不沉迷于某种民族主义的感情之中。他确信反对派应该被消灭,认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空降到斯洛伐克之后,他参加了游击运动,是一位严厉、果断和冷酷的领导者。尽管如此,斯兰斯基还是被怀疑与非尔德的人有牵连,甚至被认为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不久之前,苏联还是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而且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向以色列人提供了与英国军队作战的武器。莫斯科把意识形态的斗争看作是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的进步犹太力量“在近东对大不列颠帝国主义的一次打击”。(恩德留 K.、戈尔季耶夫斯基 O.,《克格勃: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外交行动史》,莫斯科,1992 年,第 419 页)

不过,斯大林借助以色列的帮助巩固其在地中海地区地位的打算落空了。他不得不启动了与阿拉伯人长期合作的计划。

苏联犹太人情绪的转变,他们在 1948 年 10 月 4 日犹太新年欢迎以色列大使果儿达·梅厄时表现出来的热忱,特别是来自犹太精英阶层的美国“权威间谍”的潜在威胁,让斯大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弯。此刻,犹太复国主义成了“美国企图借助居住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犹太人只手摧毁社会主义阵营的惊天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恩德留 K.、戈尔季耶夫斯基 O.,同上,第 420 页)

这时,杜勒斯的行动对准了克里姆林宫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推论。调查机器开始运转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卷进斯兰斯基的案件中来。

然而,斯大林还是产生了怀疑,认为不应该轻信急判,指控有可能是捏造的。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副总理阿列克谢·契皮茨卡来到了莫斯科。

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对当下的局势发表了观点。“这也许是敌人的挑拨离间之计”,他说,并举了例子:“那些忠诚的党员因空穴来风的指责而被捕。为了不让侦查机关的调查结果被敌人利用,就需要让这些侦查机关一直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这



样才能防止对在领导岗位的活动家们的不信任情绪进一步扩散。”

斯大林突然有了一种直觉，洞察到了美国人有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图，但他还是没有想到，这样的行动其实已经在进行了。他托契皮茨卡回国时给哥特瓦尔德带去了一封信：“我们像以前一样认为，被审判人员没有证据的供词，不足以作为对自己的良好工作闻名党内的工作者进行指控的依据。因此，在涉及斯兰斯基同志和格明杰尔同志的问题上，您所表现出的谨慎和对那些犯罪老手的不相信态度是正确的。”（斯蒂芬 C.，《“分裂”行动》，第 288—289 页）

但是，实际上受到苏联顾问掌控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仍继续坚持认为，斯兰斯基是旨在进行国家政变的阴谋的头目。

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斯兰斯基被降职成了副总理，但他在党内的影响力并没有改变。

看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阻碍，艾伦·杜勒斯又展开了新的动作：中央情报局通过在德国的捷克侨民放出口风，说因降职倍感屈辱的斯兰斯基准备前往德国。同时，中央情报局还向苏联情报机关散布了似乎美国人已为把斯兰斯基送到西方做好了准备的信息。

莫斯科对这一信息极为重视，因为这一信息来自被认为是苏联间谍的中央情报局捷克分部驻慕尼黑的工作人员奥托·霍普特尔。但卢比扬卡并不知道，霍普特尔把所有的一切都汇报给了自己的上级，即他是一位双重间谍。

此时，斯大林的私人代表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来到了布拉格。他转告说，斯大林要求逮捕斯兰斯基。

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对此表示了怀疑，并要求出示斯兰斯基准备潜逃的证据。似乎，命运又一次为这位无辜的人消除了危险。而此时杜勒斯马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行动，以期除掉斯大林在捷克斯洛伐克最坚决的拥护者。

1951 年 11 月 9 日，布拉格截获了讨论斯兰斯基变节话题的信件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报道。

慕尼黑还盛传，说有一位捷克大人物将从“铁幕”中投奔过来。为了增加这些流言的力度，在美国的机场上还上演了一出有趣的剧目：每天晚上都有一些著名的捷克侨民被送到机场迎接某位“重要人物”的到来。夜复一夜，他们和一群美国高级军官一起站在跑道的尽头，不过没人告诉他们，这位“重要人物”究竟是谁。不过，他们自然而然猜出此人应是鲁道夫·斯兰斯基。虽然美国人强烈要求他们不要把这些晚上徒劳的不眠之事外传出去，但这一消息还是很快被传播了出去。操办这一切的就是中央情报局驻慕尼黑站长、前美国驻布拉格武官查尔斯·卡捷克。从这一刻起，莫斯科和布拉格就对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不再有疑问了。（同上，第 298—299 页）

这样，这件事就被画上了一个句号。



11月23日,斯兰斯基终于还是被捕了。斯兰斯基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受到了严刑拷打,但他没有屈服。在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信中,斯兰斯基写道:

我知道,我被逮捕自然有严肃的原因,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如果怀疑我对党犯下了什么罪行,那明显是大错特错了。我一生从未背叛过党,也未有意给党造成过损害。我从未与敌人有过勾结。

我想恳求你们发点善心,不要预先就判定我为敌人。我不是敌人。我坚信,你们会看到对我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但很快,斯兰斯基就明白了,所有的解释都是徒劳的。他也无力再抗争了。他有好几次痛得晕了过去。在绝望中,他试图吊在窗框上自杀,但医生救活了他。

他的意志已被摧毁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有数百名与斯兰斯基相识的人遭到了逮捕。

最终,斯兰斯基承认了对他的所有四项指控:间谍活动、叛国行为、暗中破坏和军事背叛。

在指控判决书上,自然也出现了菲尔德和杜勒斯的名字。

在整个行动的过程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阿尔巴尼亚共有10万人受到牵连,近千人被处决。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1952年12月3日,斯兰斯基和另11人被执行了绞刑,他们的尸体被焚烧,骨灰被装进袋子扔到布拉格郊区的某个地方。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庭上公诉人的用词:“所有这些叛徒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受过资产阶级的犹太教育。甚至在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进入党的高级领导层之后,他们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只想着谋取私利。他们的目的在于推翻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制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事实上是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以色列政府代表建立了联系。”(恩德留 K.、戈尔季耶夫斯基 O.，《克格勃: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外交行动史》，莫斯科，1992年，第423页)

在此前的政治犯审判中,还从来没有对被告的民族属性进行过深究,尽管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亚基尔、亚戈达,还有很多人都是犹太人。而现在,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

波兰特特工斯维亚特洛为之效劳的英国情报站站长沙利文除了收集情报之外,还挑拨民族感情,并在波兹南组织了反犹太人的集会。不过,集会的规模并不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被报纸上宣传的那些犹太姓氏的人所犯的种种罪行惊呆了。共产主义阵营的精英们一下子被分裂开来。

## 第三十九章

# 斯大林孩子们的命运

斯大林孩子们的命运、青年人的思潮和期望、斯维特兰娜再婚

常言道：“孩子小有小的麻烦。”而斯大林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斯大林与雅科夫是永别了：情报机关证实了雅科夫的死亡，甚至还送来了一名与雅科夫关押在同一集中营的法国难友的口供笔录。这位法国人说，斯大林的儿子不曾玷辱名誉，还当着敌人的面坚称苏联必胜。

雅科夫的遗孀尤利娅和他的女儿加利亚在她们原来居住的马罗塞卡街的大共青团胡同分得了一套住房。

瓦西里和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则受到了老天的保佑。除了在倒霉的捕鱼中被炸受伤，瓦西里没有受到其他的损伤。而阿尔乔姆则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早在1941年冬，在莫斯科郊区，一颗炸弹差点打断了他的右手，多亏杰出的外科医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巴库列夫将他的断手再接成功。此后，阿尔乔姆又投入了战斗，当了几天俘虏，然后逃了出来，接着在白俄罗斯的森林里打起了游击战，随后重新加入作战部队进行了战斗，先后曾3次负伤。1945年，24岁的阿尔乔姆成了中校，当了炮兵旅的旅长。

瓦西里则成了上校，是空军师师长，1946年晋升为少将。

正如战地诗人亚历山大·梅日罗夫所写的那样：



半大少年，半大孩子，  
离开学校就走上战场，  
你们还未在世间活够，  
你们年小还未长大……

但这已是来自另外一个年代——和平年代的观点了。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在得知雅科夫被俘的那个痛苦时刻，斯大林说道。

在把孩子送往前线时，斯大林并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幸免于难。这不，有两个孩子活了下来。不过，那又如何呢？瓦西里还是那种“斯基泰人式的野人”，尽管此时已戴上了少将的肩章。他结婚很早，1941年，儿子萨沙出生，1943年，女儿娜佳出生。在瓦西里的职务评定里写着：他是一个好飞行员，勇敢的人，但不够稳重，甚至敢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打架。1946年初，瓦西里再次结婚，娶了铁木辛哥元帅那位很厉害且精于算计的女儿叶卡捷琳娜为妻。叶卡捷琳娜是位黑发蓝眼美人，她母亲是西班牙人。

瓦西里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亚历山大·布尔顿斯基回忆说：“叶卡捷琳娜·铁木辛哥对我们很不好。妹妹就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她的肾至今都带着伤。在豪华的别墅里我们几乎被饿死。有一次我们小孩子们悄悄爬到放蔬菜的地方，装了一裤兜吃的，并在黑暗中用牙啃掉了未洗过的甜菜的皮。”（索科洛夫 B. B.，《瓦西里·斯大林》，莫斯科，2003年，第166页）

阿尔乔姆为人则要严肃得多。他在炮兵学院学习的时候，尽管很努力，但教授们还是对他的学业不太满意。这位年轻的战士对此非常痛苦，直到有一次得知自己是因为父亲才受到这样的刁难。是斯大林嘱咐要对他这位学生“更加严格一些”的。阿尔乔姆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才知道，为什么教授们会给他特别严格的责罚。直到1957年他才晋升为少将。

而瓦西里则在自己顶头上司的积极支持下，很早就获得了少将的军衔。虽然这一军衔并没有给他增添更多的幸福，却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灿烂和愉快。喜欢喧闹的聚会、漂亮的女人、骑马和踢足球的瓦西里，是一个善良、年轻、不算太聪明的骠骑兵。不过说实在的，一个除了战争之外什么都没有见过的年轻人应该就是这样的。他是被仆人和马屁精给宠坏的。从童年起就受到弗拉西克下流话熏陶的他，生活在自我之中，除了父亲他谁也不怕。与希望学有所成的阿尔乔姆不同，瓦西里似乎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

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瓦西里曾向他的童年伙伴坦言，他酗酒是因为预感到父亲去世后他将被除掉。不过他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不觊觎任何权力，对任何人也不构成威胁。他只是斯大林时代的符号之一。当时代结束时，这些符

号也将被抛弃。这个倔强、慷慨、狂妄和多情的年轻人甚至在当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之后也没消停过。大家只能期盼，他何时长大成人就好了。而在这时，斯大林也就只能忍受着儿子的种种胡闹，何况对瓦西里的工作，并没有人有什么指责，相反，莫斯科军区的空军是苏军中最棒的。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确定瓦西里·约瑟福维奇矛盾的性格，那么这句话显然是他的独立不羁。这或许也是年轻的前线战士共同的特性。由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瓦西里可以命人修缮学校、给军官建住房或体育设施，可以把芭蕾舞女演员从大剧院直接拉回家（有一次，戴着高筒羊皮将军帽的瓦西里从排练现场直接将一位穿着芭蕾舞裙的年轻芭蕾舞女演员带走了，此后这个女演员就成了名人），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瓦西里身上体现出了战后社会所特有的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

在斯大林与这个儿子的关系之中，必须把这一情况考虑进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瓦西里在1949年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主持了苏联马术运动协会的工作。领袖希望儿子不要辜负自己的期望。

能否说，瓦西里是在挣脱传统准则的束缚，进行反抗呢？

正是如此。对公认的准则的偏离，这就是一种反抗。少将斯大林是个体制外的人，他与社会的对抗不是表现在思想层面，而是表现在生活方式、恋爱态度、运动爱好的层面上。

领袖有时会环顾一下四周，一下子看到了自己那些处在帝国大业边缘的孩子们，于是便给他们捎去某种关怀，然后孩子们又被遗忘在他的全球战略之外了。

只有在1952年，当苏联第一次参加在赫尔辛基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时，斯大林才把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托付给了儿子。但瓦西里没有能够完成任务。苏联代表队仅得了第二名，排在美国代表团的后面，而主要由空军俱乐部球员组成的国家足球队更是输给了南斯拉夫足球队。斯大林视之为个人的耻辱。他说：“丢掉了旗帜的部队应该被解散。”于是，瓦西里的球队被解散了。

总体上，青年人当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在战争年代严酷但充满牺牲精神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男女，对未来抱有一种特别的期望。由于经济上困难重重，窒息了年轻人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又控制极严，在他们眼中，现实生活即使不是充满敌意的，至少也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可悲的。不，他们并没有反苏维埃倾向，他们只是希望生活得到改善。然而，数十名青年人还是落入了党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门的视线。当局用了包括刑事诉讼的一切办法企图阻止他们偏离“主干道”。1948年6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列宁格勒州委在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的不足》的决议中，谴责了“渗透进大学生群体的与苏维埃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与我们的道德背道而驰的不问政治和缺



乏思想性的种种事实,以及在部分大学生中,其中包括一些共青团员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中道德败坏现象的存在。”(祖布科娃 E,《战后的苏联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1945—1953年)》,第143—144页)

应当指出,这已经是第二次针对列宁格勒的打击了。很快就会有第三次打击——“列宁格勒案件”。

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从年轻一代的倾向中看到了外部世界威胁的影子。这个世界正在诱惑着年轻人,恰似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利巴》中写的那样,美丽的小姐迷住了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小伙子安德烈,而他也因这位小姐被自己的父亲塔拉斯所杀。

在与孩子们的关系上,斯大林有点儿像这位不幸的布利巴上校。

与瓦西里不同,斯维特兰娜还没脱离对父亲的精神依恋,但也已处于危险的决裂边缘。

现实也影响到了斯维特兰娜的生活,并总是给她带来伤害。1946年的一天,赫鲁晓夫来到加格拉市面见斯大林,还带来了各种礼物:“西瓜和香瓜多得抱不过来,还有蔬菜、水果和一捆捆金色的麦穗。领导们在忙着国家大事时,赫鲁晓夫的司机在厨房聊天说:乌克兰的情况糟透了,旱灾来袭,面临饥荒。敏感的瓦莲京娜·伊斯托明娜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件事的内在问题:“他们怎么这么不知羞耻,瓦列奇卡哭喊着,他们怎么能这么不知羞耻地欺骗他!而现在都把所有的事,所有的事都推到了他的身上!”(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44页)

在她的概念中,这位公正无私的父亲与这些灾难是没有关系的。

1947年夏,斯大林再次带着斯维特兰娜去了南方。后来,斯维特兰娜对此回忆道:“这是一次既愉快又痛苦的旅行,极为艰难。”她不知道与父亲谈些什么,很茫然。他们生活在两个相互依靠却又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感觉到彼此间巨大的代沟。

“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你站在高山的脚下,而他则站在山的顶峰,你朝着那儿叫喊,朝着山顶声嘶力竭地大喊,可传到山顶的只有几个单词……反之,从山顶传到你那里的也只有几个单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说得全面,也不可能谈得尽兴。我们有时会一起散步,这就轻松多了。我给他读报纸和杂志,他挺喜欢这样。他老了,希望得到安宁。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晚上会放电影,是战前的一些老片子,其中有他非常喜欢的电影《伏尔加-伏尔加》。”(阿利卢耶娃 C,同上,第145页)

毫无疑问,父女俩相互爱着对方。斯大林对与自己同名的外孙非常疼爱。但他是否预料到,在自己死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他是否思考过自己终将要离开人世?

在某些时刻,斯大林的铁石心肠也会因忧伤而难受,这一点从女儿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被层层警卫、围栏和清场几乎与世隔绝的斯大林,唯一能看到的来自普通世界的两个生灵就是女儿和外孙,他当然希望他们住在自己的身边。

与格里戈里·莫罗佐夫离婚后，斯维特兰娜搬回了克里姆林宫。她又恢复了单身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那种孤独。但这位年轻的女子是渴望爱情的。她非常喜欢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但斯大林却看中了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

日丹诺夫一家来自于另一个文化阶层。这位政治局委员的曾祖父是神学院的院长，父亲是神学院的硕士，日丹诺夫家族还出过不少大学教授。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本人是一个博学多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斯大林待他非常真诚。

那么，斯维特兰娜是否能嫁给谢尔戈·贝利亚呢？

后来，谢尔戈本人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并不爱斯维特兰娜，他心仪的姑娘是高尔基的孙女马尔法·彼什科娃。

1949年春，斯维特兰娜嫁给了分管中央科学部门工作的30岁的尤里·日丹诺夫，且不顾斯大林希望孩子们与他一起住在“近郊别墅”的想法，搬进了日丹诺夫的家。

斯维特兰娜的拒绝伤害了斯大林。他向不听话的女儿说明了日丹诺夫的家庭情况：日丹诺夫家里一切都是由老日丹诺夫的遗孀（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已于1948年8月31日逝世）和她的姐妹们做主，这对于自主独立的斯维特兰娜将是难以忍受的。结果证明斯大林说的是正确的。尤里从早到晚都在单位工作，这让斯维特兰娜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愁眉不展。体会到她的处境后，丈夫就让她把一些哲学家的名言抄写在小卡片上——这是尤里从事科研所需要的。斯维特兰娜认真地完成了这些任务，但她内心却更难受了。斯维特兰娜怀孕了，产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孩子（女儿卡佳）早产。住院时，斯维特兰娜正好与莫洛托夫的女儿毗邻，在看到其亲戚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本人都纷纷来探望自己的这位女邻居之后，斯维特兰娜感到谁都不需要自己了。她给父亲写了一封诉苦的信。父亲写了一个便条回复她道：“你好，斯维托奇卡！你的信我收到了。我很高兴你轻松地摆脱了病魔。肾脏可不是小事，再加上还生了孩子……你从何得出我已经完全不理你了？！这不是在做梦吗……我劝你不要相信梦幻。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女儿，国家需要人，包括提前出生的孩子。再忍一忍，很快我们会见面。吻我的斯维托奇卡。你的老爸。”（阿利卢耶娃C.，同上，第151页）

不过，斯大林最终也没有去医院看望斯维特兰娜。

在斯维特兰娜和尤里·日丹诺夫离婚之后，克里姆林宫圈子里都在传说谢尔戈·贝利亚准备娶斯维特兰娜为妻。初看上去，如果真是这样，贝利亚将获得王储的地位。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突然间觉得很不安，感到与斯大林结亲的前景是极其危险的。斯大林的前亲家、“学者”莫罗佐夫以及斯瓦尼泽全家的例子就在贝利亚的眼前，他们都曾试图跨越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而且,贝利亚其实看得更远。苏多普拉托夫认为,贝利亚“知道,他在政治局的对手们将把这场婚姻扯进权力斗争中去,而斯大林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如果贝利亚用婚姻的纽带与斯大林捆在一起,那么一旦斯大林去世,他必将倒霉。这种情况引起了他们之间的不和……”(苏多普拉托夫 И.,《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第510页)

这简直就是蒙太古和凯普莱特那样的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每一个人都在算计,遗产将被谁所得?

有证据显示,1952年初,瓦西里和斯维特兰娜都收到了来自格鲁吉亚揭发该共和国腐败和其他罪行问题的信件,他们把信交给了斯大林。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对女儿说,现在他明白了,贝利亚是他的敌人。(阿利卢耶夫 И.,《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第252、253页)

很难说这场未成为现实的婚姻与以后的事件的关联有多大。在斯大林的各种传记中,还从来没有人深入研究过其家庭关系和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尽管这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贝利亚两大集团的争斗中,有一次还打击到了斯大林的私生子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库扎科夫。康斯坦丁是斯大林在沃洛格达流放时与年轻寡妇玛丽娅·库扎科娃生下的孩子,登记时用的是孩子出生两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库扎科娃丈夫的姓。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帮助他们。命运的安排,让他们的人生道路有了交叉。康斯坦丁·库扎科夫成了宣传鼓动局局长亚历山德罗夫的副手。后者是“马林科夫的人”。

1947年9月末,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内成立“荣誉法庭”。9月29日,在斯大林出席的于老广场上召开的机关人员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兹涅佐夫做了报告。在谈到与反爱国主义的斗争时,他提到了自1935年以来中央委员会发出的一些非公开信,其中包括《凶杀基洛夫同志事件的教训》和《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以及其他一些帮助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文件。库兹涅佐夫强调:“在进行针对我国的破坏活动时,外国情报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拉拢我们的某些不坚定的工作人员。”他举了很多有关的例子,并主要针对亚历山德罗夫和宣传鼓动局的其他领导提出了批评。报告中被点名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宣传鼓动局的前副处长、国家外国文学出版社社长 Б. И. 苏奇科夫。苏奇科夫被指控向美国人出卖核机密和提供摩尔达维亚饥荒的情报。除此之外,苏奇科夫还试图帮助老同学、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了10年监禁的列夫·科佩列夫。苏奇科夫为科佩列夫向检察院写了一封辩护信,但这封信却从检察院转交给了中央委员会的马林科夫,于是事件就被压下来了。惊慌失措的苏奇科夫于是就与库扎科夫商量,询问自己是否该写

一封悔过信？库扎科夫则建议苏奇科夫等一等，不要去讲述真情，于是库扎科夫也就成了同谋者。

斯大林沉默地听完了库兹涅佐夫的报告，没有去干预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1947年10月23至24日，“荣誉法庭”审查了中央委员会前人事部部长M. И. 谢尔巴科夫和前宣传鼓动局副局长库扎科夫反党行为的案件。他们被指控在接到了揭发由他们推荐进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的B. Л. 苏奇科夫的任务之后，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和责任感。他们受到了公开的处分。根据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决议，他们被开除出党。苏奇科夫被判监禁，直至1955年才被放出来。

（所有这些审理的结果导致了宣传鼓动局的解散，亚历山德罗夫被打发去当了哲学研究所的所长，日丹诺夫的人进入了党的宣传领导层。M. A. 苏斯洛夫在保留对外政策部领导职务的同时，成了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在进行清洗的时候，日丹诺夫遵循的是“把小资产阶级从意识形态战线中清除出去”的思想。）

也许，库扎科夫本来同样也是要逮捕的，但斯大林没有同意。后来，领袖的这个儿子就一直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苏联中央电视台工作，任文学戏剧节目总编辑部的总编。

但父子两人从来没有面对面交谈过。

如果说斯大林知道康斯坦丁·库扎科夫并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那他对第二个非婚生儿子（1914年与利季娅·别列普雷金娜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库列伊卡村所生），就从未提到过。只是到了195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万·谢罗夫向赫鲁晓夫报告时才说到，斯大林的非婚生儿子亚历山大·达维多夫少校（随继父姓）正在军中服役。（伊利扎罗夫B.，《斯大林的秘密生活》，莫斯科，2003年，第289页）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主人公一共有5个由4个女人生的孩子，4个儿子和1个女儿。

## 第四十章

# 继承人之间

---

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日丹诺夫集团的覆灭、“列宁格勒案件”

---

斯大林对两个集团都感到满意。可以极为准确地说，日丹诺夫集团是一群思想家，而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则掌握了整个军工体系（很能说明问题的是：马林科夫是火箭技术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人，而贝利亚则是原子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苏联核力量的研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斯大林把权力中心从中央委员会移到政府以后，马林科夫的影响有所下降。在各种意识形态运动浪潮中，日丹诺夫的影响得以增强。但这决不意味着最终的势力平衡形成了。

现在还根本谈不上势力平衡，而且很快日丹诺夫的团队就遭遇了灾难，是尤里·日丹诺夫惹的祸。

对这段历史的概述可以引用这位肇事者本人的话：“当父亲得知我在研究生物学课题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可别跟李森科搞到一起，他会让你与黄瓜杂交在一起的。’我并未听取这一警告，结果的确让李森科给杂交了。”（日丹诺夫 Ю. А.，《回首往事：一个目击者的回忆录》，第 242 页）

1948 年 4 月 10 日，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的莫斯科州委和市委宣讲员讲习班上，苏共中央委员会科学部部长尤里·日丹诺夫做了题为《当代达尔文主义的争议问题》的报告。

安德烈·日丹诺夫劝儿子不要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是对的。尤里·日丹诺夫有些天真，希望进入中央委员会能够给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约在此事发生半年前的1947年10月18日，在加格拉度假的斯大林与尤里·日丹诺夫就生物学领域的状况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斯大林表达了对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T. Д. 李森科的支持，因为李森科通过实验得出了与西方流行的学说不同的结论。

在领袖的谈话中，公开赞扬了李森科不屈从“西方每一句话”的精神。

然而，已是副博士生化学家的小日丹诺夫在自己的报告中竟然反驳了斯大林。他说：不应该认为“似乎我们存在着两个生物学派的斗争，一派持苏维埃的观点，而另一派则代表资产阶级的达尔文学说”。

也就是说尤里·日丹诺夫在向斯大林宣告说是领袖错了。在接下去的讲座中，尤里强调，那些把“苏联生物学家”划分成两个派别的人，“追求的首先是狭隘的小团体利益而不是科学的利益，违背了真理”。

这个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根本没有想到，他闯入了一个禁区——在这个禁区里是绝对禁止与西方的世界观和平共处的。而承认所有科学流派都有其正确性就意味着向西方妥协，这一点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们不必把斯大林当成糊涂虫，他从来都不傻。相反，斯大林对李森科实验的信以为真其实是自己创造性的延伸——为成功不惜付出一遍又一遍的牺牲。1947年10月18日，在与小日丹诺夫谈话时，斯大林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在播种实验中，如果有95%的作物坏死，而5%存活下来，那么李森科取得的成绩就在这5%里面，而他的反对者则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与他其他的一些主张是完全吻合的。例如，他不同意瓦尔加院士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将得到缓解的预测。

斯大林似乎在向整个世界发出了挑战，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顺便提一句，斯大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同样也有其实践和政治的基础。他批判了科学院院士H. Я. 马尔关于阿布哈兹语不属于伊比利亚语系的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推动了阿布哈兹人的分离主义，因为这让阿布哈兹人得到了证明自己独立于格鲁吉亚的理论基础。

若不是尤里·日丹诺夫属于“红二代”，那么他的这个讲稿可以被认为是狂妄的举措。尤里把斯大林置于了一个难堪的境地：他最亲密的战友、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无可指摘的思想斗士的儿子原来竟站在堡垒的另一边！自小就了解尤里，并推荐他到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斯大林，丝毫不认为尤里会背叛自己，但不对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又是不可能的。

没过多久马林科夫就亲自要去了这次演讲的记录。尤里·日丹诺夫和“黄瓜”的



“杂交”开始了。当从批准了此次演讲的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副局长 Д. Т. 谢皮洛夫处得知马林科夫打去过电话之后, А. А. 日丹诺夫开始惶惶不安起来。但他又能做什么呢?

1948年5月31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年一度的斯大林奖的评选问题。报告人是谢皮洛夫,尤里·日丹诺夫也出席了会议。

突然响起了不安的信号。在讨论到沃兹涅先斯基写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时,谢皮洛夫说,作者发展了由斯大林同志创立的苏联战时经济学。这时斯大林打断他说:“我没有创立过这门学科。”

不过,沃兹涅先斯基还是被授予了斯大林奖,不清楚的只是,领袖对沃兹涅先斯基是否不满(如果是这样,“列宁格勒案件”就要从此时开始算起了),或者领袖是因为别的原因而生气。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说明,斯大林已“酝酿好”采取果断的行动。谢皮洛夫汇报完后,斯大林站起身来,用低沉的嗓音轻声说道:“我们这里有位同志做了一个反对李森科的讲演,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中央委员会不可能同意这种立场。这一错误的发言维护了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带有右倾和调和的性质。”(日丹诺夫 Ю. А.,《回首往事:一个目击者的回忆录》,第256—257页)

斯大林质问道:是谁批准了小日丹诺夫的这份报告的?

尤里·日丹诺夫在自己的书中证实,他的两个上司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当时都保持了沉默。不过,后来谢皮洛夫曾肯定地说,是自己批准了报告,而苏斯洛夫的确一直沉默不语。

显然,斯大林决定要深究下去,就说道:“不行,不能就这样算了。应该责成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去了解清楚此事。该惩办犯错之人以儆效尤。不是处罚尤里·日丹诺夫,他还年轻,也没有经验。该惩罚‘当父亲的’日丹诺夫和谢皮洛夫。”(谢皮洛夫 Д. Т.,《未参与者》,第131页)

令众人吃惊的是,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尤里·日丹诺夫竟然在7月10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封信。在信中,尤里承认自己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但并不认同那些摩尔根-孟德尔主义遗传学家是“被收买了的人”这一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小家伙仍在争辩。

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宣读了这封按马林科夫的说法,给人感觉“尚未完全解除武装”的信件。

正是这个时候贝利亚对日丹诺夫说了这么一段话:“这当然是令人不快的,但现在需要超越父爱。”贝利亚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同意给尤里定罪吗?但要知道斯大林先前已经说过了:无需去折腾这位“年轻且没有经验的人”。这多半是这位占了上风的集团领导人对心力交瘁的日丹诺夫(1947年12月刚犯过心肌梗塞)虚情假意的

劝告：把一切责任推到儿子身上。

当然，此时谁也不知道日丹诺夫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了。但从日丹诺夫的外貌也可能看出，他活不了多久了。

没过多久，斯大林就给尤里·日丹诺夫回了一封信，信中“毫无保留地批判了‘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谢皮洛夫，同上，第133页）这意味着斯大林原谅了“年轻且没有经验”的尤里。

7月5日，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 П. И. 叶戈罗夫院士签署了一份报给斯大林的关于 A. A. 日丹诺夫健康状况的医疗诊断书：“最近日丹诺夫 A. A. 同志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诊断书提出了休假一个月和实行严格静卧疗法的建议。7月6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日丹诺夫获得了两个月的假期。

1948年8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尤里·日丹诺夫撰写的一篇以其悔过信为基础加工而成的文章。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尤里·日丹诺夫的命运。1948年底，宣传鼓动局改组之后，他成为苏共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并于1949年春与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结婚。1950年，尤里就任苏共科学和高等院校部部长。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已与斯维特兰娜离婚的尤里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去世后，尤里被派到顿河畔罗斯托夫任州委书记，并兼任罗斯托夫国立大学校长。

8月31日，A. A. 日丹诺夫在瓦尔代的疗养院中猝死，享年52岁。

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政权更迭都是逐步积累而成的，不管初看上去是多么剧烈和突然。日丹诺夫的死只是意味着“思想家”当权时代的终结，但其实还在日丹诺夫生前，权力就已经开始从日丹诺夫（列宁格勒）集团向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转移了。

1948年7月1日，根据政治局的决议，马林科夫和波诺马连科进入了中央书记处。日丹诺夫把书记处的工作交给马林科夫之后，便开始了两个月的休假。

据波诺马连科的回忆，其任职的经过是这样的。马林科夫请他去了自己那里，并在会面时告诉他：日丹诺夫已“离职治病”，斯大林提议秘书处应该吸收“一些年轻的领导人”。斯大林有代表性的话是：“趁我们还活着，让他们从我们身上吸取经验，学会中央的领导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59页）。

很快一切就会清楚：我们的主人公预见日丹诺夫很快就要离去，于是想扶植起一个能与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抗衡的新力量。

在日丹诺夫还活着的8月10日，政治局（根据日丹诺夫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改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构》的决议。由部制替代了原先的局制，并且最有影响的党、团和工会机关部是由马林科夫来分管的（还分管农业部）。其他几位书记的分工



如下：日丹诺夫分管宣传鼓动部，苏斯洛夫——对外联络部，库兹涅佐夫——机械制造部和行政管理部，波诺马连科——运输部和计划-财政-贸易部。

人事局的撤销使日丹诺夫集团手上失去了王牌。不过，斯大林马上就部分地恢复了力量均衡：1948年9月3日，柯西金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不错，柯西金（其妻子与库兹涅佐夫的妻子是表姐妹）在政治上从不谋求升迁，也不觊觎高位。

很快，不管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老广场，大家都感到，随着日丹诺夫的离去，统治集团上层的震荡已不可避免。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斗争双方的不同立场。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的主张是发展国内市场，扩大民用必需品的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在由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牵头制订的联共（布）新计划中，加强社会保障的倾向十分突出：提出要大规模地进行住宅建设和大批量生产小汽车等等。而在政治思想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转向人民民主的国家，重大问题由全民公决来决定，赋予社会团体立法提案权。

对于在1948年不顾一切急于全副武装迎接一场新的战争的斯大林，这样的想法说好听一点是遥远的蓝图，说不好听一点就是马尼洛夫式的痴心妄想。

与军方和军事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日丹诺夫团队成员的主要对手。他们中一方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在这种受到斯大林鼓励的让身边人进行竞争的环境下，失败不仅会导致经费预算的减少和优势地位的丧失，还会导致政治上的垮台。

除了日丹诺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之外，属于列宁格勒集团的还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波波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但总体来说，他们没有显示出是一个统一的团队。应该说，军工生产和军队发展的任务使他们的对手团结得比他们要紧密得多。

马林科夫之子安德烈写道，当时正是他的父亲提拔了总参谋长 A. M. 华西列夫斯基、空军总司令 A. A. 诺维科夫、苏联科学院院长 C. И. 瓦维洛夫，以及 B. A. 马雷舍夫、Д. Ф. 乌斯季诺夫和 A. И. 沙胡林等人民委员。与马林科夫有着良好关系的还有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和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这里要提醒一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弧形圈战役的转折关头，在前线的国防委员会的代表正是马林科夫。

不过，即使如此也不必认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好朋友。是共同利益和实际需要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但他们彼此间也存在着内部的竞争。

事态将如何发展，原本不得而知。但在1948年底发生了一起事件，而这一事件很快被匿名告发给了斯大林，引起他对列宁格勒那帮人的强烈不满。事情是这样的：在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的联席会议上，有4位州委和市委的领导人在投票表决时各



有几张反对票,但计票委员会并未将这些反对票计算进去,还在记录上写道:党的积极分子对领导层百分之百地支持。

从党员道德操守的角度,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当然,那些被帮了倒忙的人对此并不知情,但他们却处于弄虚作假的阴影之下。此外,国家安全部还录下了在库兹涅佐夫住所里他与罗季奥诺夫和波普科夫关于俄罗斯联邦灾难性现状的谈话。看来,戈尔多夫和雷巴利琴科二位将军的悲剧要重演了。

“列宁格勒案件”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很快此案又增加了新的罪行。1949年2月15日,政治局出台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库兹涅佐夫 A. A. 同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罗季奥诺夫 M. И. 同志和波普科 П. С. 同志反党活动的决议》。他们的罪名如下:1949年1月,未经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在列宁格勒非法组织了全苏批发交易会;这些同志“在对列宁格勒党组织蛊惑人心的讨好中,在企图充当列宁格勒利益的特别保护人的尝试中,在企图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列宁格勒党组织之间制造隔阂的尝试中,表现出了不健康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倾向,并以此使列宁格勒党组织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疏远。”

这还不是全部。除了“给国家造成损失”和“挥霍国家商品贮备”的罪名之外,波普科夫还被指控“走上了一条无视党中央的道路,一条令人生疑的、幕后的,有时甚至是唯利是图的,有诸如库兹涅佐夫同志、罗季奥诺夫同志等形形色色列宁格勒自封‘头目’参与其中的耍花招的道路”。

沃兹涅先斯基也受到了牵连:波普科夫曾建议他对列宁格勒“负起责任”。

决议的结尾部分听起来极具威慑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醒大家,当季诺维也夫试图将列宁格勒党组织变成自己的反列宁党派的根据地时,也是采用这种反党的方法来捉弄列宁格勒党组织,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贬得一无是处,仿佛中央委员会毫不关心列宁格勒的需要,企图让列宁格勒党组织脱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使之与中央委员会分庭抗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67页)

提到季诺维也夫这个人,对列宁格勒人可不是什么好事,这是一个坏兆头。

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被解除了职务。需要等待一下再给以新的惩罚,而这些惩罚的确随之而来了。

如果考虑到,在列宁格勒举办的不是全苏,而是出售剩余产品的全俄批发交易会的话,那么所有这些指控都是牵强附会的:被告人完全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了活动。

下面轮到沃兹涅先斯基了。他显然未曾打算要将列宁格勒与莫斯科隔绝开来,但也远非没有罪过。他最主要的罪过恐怕就是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极度自信。他的同代人发现了他的这一特征。交通部长 И. В. 科瓦廖夫就曾对作家西蒙诺夫说过下



面一段话：“这位就是沃兹涅先斯基，他与其他主管相比有什么优秀的一面呢？——科瓦廖夫进一步向我解释说，斯大林有时就讽刺地称那些分管所属部委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为‘主管’——其他主管，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分歧，首先会尽力自己协调分歧，然后再以协商过的形式通知我。即使实际上相互之间仍存在矛盾，但不管是写在纸上，还是汇报上来的都是看似一致的。而沃兹涅先斯基呢，如果他不同意，那么写在纸上的也是不同意。会带着反对意见或意见分歧来找我。他们明白我不可能事事清楚，想让我当传话筒。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我会关注那些意见分歧、那些反对意见，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和意见，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先相互协商，再遮遮掩掩，就是想让我成为传话筒。这就是为什么比起他们的协调一致，我更喜欢沃兹涅先斯基的不同意见。”（西蒙诺夫 K.，《历史的重水》，第 399—400 页）

沃兹涅先斯基的过错在于，与 1948 年第四季度相比，国家计划委员会压低了 1949 年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这一情况的实质在于，在这个称之为“季节性的行业”里，冬季产量通常都会出现下滑的状况，而且第一季度的工作日相比而言也少一些。不过沃兹涅先斯基的“擅自处理”、对部长会议“耍花招”、篡改数据的“犯罪事实”、“在国家计委中培植不符合党的原则的风气”和“欺骗政府的事实”，所有这些都成了把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国家计委的根据。1949 年 3 月 5 日，苏联部长会议出台了《关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议》。

来自对手集团的 M. 3. 萨布罗夫再次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 1900 年出生于顿巴斯，毕业于莫斯科鲍曼工学院。先后在新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械厂（任总工程师）、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和国家计委工作。1941 年至 1942 年任国家计委主席，此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萨布罗夫和 M. Г. 别尔乌辛（1904 年生，任发电站和电气工业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样，都是马林科夫团队里的中坚力量。

1949 年 3 月 7 日，沃兹涅先斯基得到一个月的“在巴尔维哈疗养”的假期。不过这并不是最终结果，斯大林此时尚未对他作出什么决定。而且不久，斯大林还邀请沃兹涅先斯基来到自己的别墅，并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为他举杯：“今天我们与我们的亲密战友和朋友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告别。他犯了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的错误。但是我们了解他杰出的才能和领导者的品质，而且我相信，很快他就会回到我们的领导核心中来。为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的健康干杯！”（沃兹涅先斯基 Л. А.，《为了……的真相》，莫斯科，2002 年，第 140 页）

沃兹涅先斯基被开除出了政治局，等待新的任命。一个月后，斯大林请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但这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虽然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对马林科夫说该为沃兹涅先斯基找一个新工作，但这事就这么一直被拖了下来。

同时被免职的有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 Л. Ф. 卡普斯京、州委第二书记 Г. Ф. 巴达耶夫、市执委会主席 И. Г. 拉祖京、列宁格勒市区委书记 М. А. 沃兹涅先斯卡娅 (Н. А. 沃兹涅先斯基的妹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长 А. А. 沃兹涅先斯基(他的哥哥)。中央委员会派到国家计委的全权代表 Е. Е. 安德烈耶夫在给马林科夫和波诺马连科的报告中提到,发现国家计委丢失了很多机密文件(五年间丢失了 236 份机密和绝密文件)。这份丢失文件的清单让斯大林大为震惊(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军事技术装备、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石油等的生产情况)。

1949 年 9 月 11 日,政治局作出决议将沃兹涅先斯基开除了中央委员会,案件被移交给了检察院。1949 年 10 月 27 日,沃兹涅先斯基被捕,接着法庭判处了他死刑。

整个“列宁格勒案件”中共有 214 人获罪,其中有 145 人是主要被告的远近亲属。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波普科夫、卡普斯京、巴达耶夫、罗季奥诺夫、拉祖京于 1950 年 10 月 1 日被枪决。

枪决的命令是斯大林批准的。但在同意处以死刑之后的整整一个小时内,斯大林不停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思考着什么,然后他吩咐接通贝利亚的电话,并说道:“我还是不相信沃兹涅先斯基会背叛,请留下他的命。”

贝利亚答道:“他们已经全被枪决了。”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沉默了片刻,斯大林下令说:“别去动他们的孩子们了。”

沃兹涅先斯基的侄子用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前国家计委主席的两个女儿确实没有遭到逮捕,她们得以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业。(沃兹涅先斯基 Л. А., 同上,第 241 页)

“列宁格勒案件”成为领袖年迈时权力斗争的一个标志,但这远不足以显示出这一现象的全部特征。关于各个集团活动的内容方面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也包括最突出和最强大的列宁格勒集团在内的地方势力。

1946 年确认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任职名单上约有 42000 人,而在 1953 年则超过了 45000 人。这些人是苏联官僚中的贵族,本应遵纪守法、不考虑任何个人的政治利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克里姆林宫每过一个阶段都会调入一些地方领导。早在 1937 年那个著名的二至三月全会上,斯大林就指责地方领导人在实践中以对个人的忠诚度为原则来提拔干部,并注意到了形成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的小集团的危险。而这才是他对“列宁格勒案件”态度的关键所在。他害怕俄罗斯民族主义孕育成一股无法遏制的力量。莫洛托夫后来承认:“在‘列宁格勒案件’中已露出了某种民族主义的苗头。”(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 434 页)

如果独立看待此事,甚至就算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人都联合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危险,但后来查明(或者说人们向斯大林所报告的),列宁格勒分子的罪过



中增加了一条斯大林一直与之斗争的民族主义。在战争时期,适量的民族主义是必需的,但在战争结束后,在他寻找接班人的时期,这就不可接受了。在某种意义上,“列宁格勒案件”就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的一个翻版。想必,同一时期发生的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因“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牵连”而被捕、莫洛托夫被降职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被枪毙都不是偶然事件。

但清除了日丹诺夫集团之后,斯大林却陷入了对获胜一方的依赖之中。因此,为了制衡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柯西金的职位被保留下来,而布尔加宁则得到了提升。很快,布尔加宁被任命为斯大林在部长会议的第一副手,成为整个军事工业的监管人。

虽然,我们主人公早就权力无限,但到 70 岁时才登上了奥林匹斯山的巅峰。对于他最亲密的战友们来说,他孤僻、年迈且危险。

## 第四十一章

# 恢复时期结束

---

恢复时期结束、对农村的新“殖民”、  
外国电影上映、赫鲁晓夫调任莫斯科、斯  
大林的 70 岁寿辰

---

1949 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向全世界展示了苏联实力的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另一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进一步团结起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先后成立。对此,莫斯科针锋相对地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成为中立国家的期盼破灭了。需要回到俄国传统的政策上来了——西方防御、东方进攻。而这意味着苏联必须承担新的巨额支出。

1948 年 6 月 28 日,斯大林会见了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斯大林宣布将向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提供年利率为 1%、数额为 3 亿美元的 10 年期贷款。此外,苏联还应该向中国提供用于兴建发电站、机械制造厂、冶金厂、煤矿及铁路与公路交通等方面的 50 个基础工业企业所需的设备和材料。这笔贷款的条件之优惠是前所未有的:苏联向“东方集团”国家提供的贷款年利率都是 2%。其实质,就是莫斯科承担起了巨大的义务。尽管此举负担很重,但斯大林认为,全力支持新中国是苏联全球战略的独一无二的途径。所以他断然否决了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是小弟弟与老大哥的这种关系。当然,斯大林的反对,部分是出于外交礼节上的考虑,但中国在他全球版图上的特殊地位还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莫斯科的建筑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苏维埃式的文艺复兴”。这是斯大林时代一种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不朽语言。国家的辉煌胜利孕育出了胜利者的风格。在位于麻雀山(列宁山)的莫斯科大学主楼的规划过程中,斯大林不得不多次驳回以他的名字命名大学、用他的雕像装点校园的强烈建议。斯大林说:大学应该以 M. B. 罗蒙诺索夫的名字来命名。而对于纪念碑,斯大林则用了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据莫斯科大学校长 B. A. 萨多夫尼奇院士说:来参观即将建成的莫大主楼的斯大林看到正门前空着的雕像底座,并得知是为谁而留的时候,他的反应令人吃惊:“在这里立一个看门人的雕像吧。”(B. A. 萨多夫尼奇 2006 年对笔者的叙述)

斯大林有时会坚决反对建造此类的雕像。例如,有一次斯大林去参观雕塑家叶夫根尼·武切季奇的工作室,当看到计划安放在柏林的雕像是自己的雕塑之后,斯大林坚持用一个一手抱着小姑娘、另一手握冲锋枪的战士雕像来代替。的确,斯大林还建议用剑来替代冲锋枪。而对于自己的雕像,斯大林是这么对武切季奇说的:“您还没厌倦这个留胡子的人?”

当然,斯大林把对自己个人的宣传看作是巩固现制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方式,但这并未给他个人带来任何快感。

至 1949 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已经完成。

恢复遭到破坏的经济的过程是在高风险的背景下展开的。例如,顿巴斯煤田在 1943 年秋季刚一获得解放就马上开始了重建工作。从作战部队派来了矿业工程师,他们承担了重建这些被炸毁和淹没的矿井的任务。所给的期限是难以想象的短。期限一到,那些没完成修复的矿井也宣布开工了。为了让大家引以为戒,那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未能完成开采量的负责人,有时会以诈骗罪或谎报罪受到审判:因为他们自己在交货单上签了字的。

这种情况遍及各地:期限一缩再缩,人们干得精疲力竭。

但正是在这种异乎寻常的条件下,有能力的人们脱颖而出,他们的创造犹如黑暗中的光亮,比如火箭技术设计师 C. П. 科罗廖夫、核物理学家 И. В. 库尔恰托夫和在那个时代成为英雄的许多人。

而在一件事上,直接意义上的光亮是由尤里·米哈伊洛维奇·雷巴斯创造出来的,这种光亮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雷巴斯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理特性,使在矿井等行业易爆的环境下使用荧光灯(日光灯)变得绝对安全。过去的电力照明容易引起地下场所的甲烷爆炸,而现在这种用于地下黑暗处的照明灯则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并且成为恢复工作的一个标志。因此,它的发明者获得了斯大林奖。集创造、政府的强压和奖励于一体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之一。

1948 年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 1940 年水平的 118%。但这是靠恢复战前的动

员方式和向农民征收重税而实现的。就连领袖的战友们(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沃兹涅先斯基)都试图证明,有必要给农村留下更多的资金,但他们的建议总是遭到强烈的反对。

但是,即使是在第 88 军事科研所,在这个总设计师 C. П. 科罗廖夫研制远程弹道导弹的地方,食堂每隔一天午饭时供应的也只是荨麻汤(1946 年 5 月),那么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回到早在 C. Ю. 维特进行工业化时采取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现的“殖民农村”的政策之外,克里姆林宫别无选择。1947 年至 1949 年间,采取了一系列使农民的处境极度悲惨的措施。例如:有 590 万公顷能经营的土地被剥夺,“被集体农庄庄员非法据为己有”;禁止在没有专门许可证(证明集体农庄已完成了国家义务的证书)的情况下在集市上进行交易;提高了在自由市场出售商品的收费和赋税;义务上缴的数量逐年增加,同时谷物采购价格只有其成本的七分之一。1947 年的货币改革中,受打击最大的首先是那些钱不是存在储蓄所而是放在家中“储蓄罐”里的农民。

不过,工业领域却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过去的集体农庄庄员在工厂大门口排起了长队,增长起来的经济需要新的工人。

从实际情况来看,战后的苏联经济(包括有近 250 万犯人在劳动的建筑工地)与战时区别不大。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经济。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人们在消耗自己的体力达到极限的情况下,还能长久地支撑下去吗?

尽管在宣传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伟大工程”的口号,但大部分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多方面与国家宣布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当然,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上的工程浩大的水电站的修建、伏尔加-顿河运河和土库曼运河的开凿、干旱草原上防护林的种植,所有这些的确富有吸引力,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极具代表性的是,在经济和宣传部门按军事化运作的情况下,为了增加财政预算,政治局决定(1948 年 8 月 31 日)放映 24 部缴获的德国影片和 26 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文艺片,以这样的方式给民众一个可以进行模仿和比较的不同例子。正如后来某些具有反苏倾向的作家指出的那样:“人猿泰山呼唤自由的呐喊掠过了苏联的上空。”尽管口气尖锐,但这一评论的确反映出了当时的国家需要与民众生活之间的脱节。

那么,为什么斯大林,这个在文学事务中,按西蒙诺夫的话表现得“非常精通”的人和我们认为国家宣传和思想的头号人物,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有一个按我们的观点可以解释这一情况的总的答案:斯大林不是无所不知的先知。斯大林不可能看透这些娱乐片中潜在的长远危害。他首先是这样考虑的:就乐一乐吧,在日常生活中放松一下吧。难道这不





对吗？

12月中旬，由日丹诺夫提拔上来的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会书记Г. М. 波波夫被解除了职务。这事具有甚至决定着苏联未来命运的深远影响。其实，斯大林后期的任何一次人事调动都可能出乎意料地影响到后斯大林时期的力量配置。事实正是如此，波波夫的免职和把赫鲁晓夫从基辅调来接替他的位置这两件事就起了巨大的作用。初看上去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文化水平不高且倔强的赫鲁晓夫多年来待在政治局只是个意外，他的日子在工业化时期就已经该结束了。其实赫鲁晓夫是一个表面上看来并不觊觎高位，但却是一个很对某些人胃口的玩家。尤其是在斯大林的意识中，赫鲁晓夫的形象总是与对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回忆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是被马林科夫从基辅提拔上来的，马林科夫可能会对这个给了对手致命一击的人事决定感到满意。此外，在这一新任命的背后，站着—个具有巨大的工业和国防潜力的最大共和国的党组织。这个共和国有着像顿涅茨克（斯大林斯克）、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等拥有庞大领导干部资源的州。这些领导干部在20世纪30年代初受过工程技术的教育，战前已迈出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然后在战争中浴血奋战，后来又承担起了重建家园的重任。

在那些留在乌克兰的人当中，我们要单独提出来的有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还有安德烈·基里连科、尼古拉·晓洛科夫、康斯坦丁·格鲁舍沃伊和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正是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成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组成了勃列日涅夫团队的“小圈子”。在勃列日涅夫得以快速恢复、重建了扎波罗热冶金联合体和第聂伯河水电站之后，他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7年秋，冶金联合体的一期工程交付使用，一些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程也重建完毕）。斯大林亲自给勃列日涅夫打去电话，检查工程的进度。

后来历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主管工业的书记、乌共中央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摩尔达维亚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尼古拉·晓洛科夫，成了苏联内务部部长和勃列日涅夫团队中最重要的一员；基里连科后来成为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委员和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格鲁舍沃伊——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如果从赫鲁晓夫“团队”的分量这一角度来看待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出现，那么他无疑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但马林科夫低估了他的才能，未能看出他就是未来的对手。

其实，何况是马林科夫呢，就连斯大林也没有看出来！

不过赫鲁晓夫的崛起也不足为奇：在列宁格勒帮被粉碎之后，乌克兰帮（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和顿涅茨克帮）就成了势力最大的集团。

斯大林对自己的70岁寿辰表现得有点漠不关心。1949年12月21日，所有的报

纸都刊登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贺信，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授予寿星列宁奖章的命令。当日在大剧院，在这个悼念列宁时斯大林宣过誓的地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晚会。斯大林身着最高统帅制服，与毛泽东及众多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不少人都感到很难堪。

“热烈的致词之后，大会主席团和整个大厅的人都站起来长时间地给斯大林鼓掌。大家都期待着此时斯大林能够走上讲台，并像往常一样发表自己精心润色过的讲话；或者哪怕讲几句致谢的话，又或者仅是向来自世界各国的祝寿来宾对他的热情和真诚表示感谢。但斯大林并没有走上讲台。他只是冷淡地环视了一下大厅，缓慢地鼓着掌。大厅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斯大林无论是表情还是姿势都没有变化。大厅里的人们喧闹起来，要求斯大林讲话。斯大林依旧保持着冷静。

“就这样过了3分钟、5分钟、7分钟。具体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分钟。

“最后大会宣告闭幕。”（谢皮洛夫 П.,《未参与者》，第152页）

我们的主人公表现得就好像他来自另一个世界。这是为什么呢？他并不喜欢那些盛大的排场和对自己的吹捧，他只是沉默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这个角色里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唯一一次明确的致意看来是给中国领导人的，不久前他曾向这位中国领袖建议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这位半个地球的统治者是向在场的自己军队的司令员们表达敬意。

## 第四十二章

# 斯大林在朝鲜的战争

斯大林在朝鲜的“适度”战争、苏美  
歼击机之战、瓦季姆·马茨凯维奇的雷  
达跟踪器改变了空战的形势

在 1904 年至 1905 年那场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情感冲击的日俄战争之后，朝鲜成为东京向俄国与中国方向进行扩张的战略基地。而此时，局势发生了诸多变化：1945 年日本战败、美国军队开始在日本领土上驻扎（而苏联军队则没有）、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民族解放斗争在印度支那展开——所有这一切理应导致博弈各方新的平衡。可以说，东方在进攻，而西方则在防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被沿着北纬 38 度人为地一分为二，被划分为由美国人和将其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苏联军队分别掌控的南北两个地区。至 1950 年，朝鲜的南北两部分已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就像德国一样实际上已经分裂了。此时，如今被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北朝鲜由金日成领导，而南朝鲜（大韩民国）则是由李承晚在领导。

时局的特点是，无论是汉城，还是平壤，都需要一场战争。对于汉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人已决定从半岛撤走自己的军队，而李承晚想不惜一切代价留住他们；而对于平壤来说，则是为了巩固统治集团的地位和获得莫斯科的帮助。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斯大林、杜鲁门和毛泽东。斯大林和杜鲁门其实并不希望看到任何军事冲突，尽管苏美两国飞行员之间发生了一些造成伤亡的冲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9 年，美国轰炸机 B-25 闯入苏联领空，并在基洛夫格勒

地区投放了3名伞兵。但在回程途中,这架“空中堡垒”被两架苏联歼击机拦截并被击落。1950年4月8日,一架美国侦察机在利耶帕亚的苏联空军基地上空被击落。同年5月,在楚科奇上空,美国一架P-51“野马”歼击机被击落。9月,11架美国“海盜”歼击机从“福吉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黄海上空击落一架苏联侦察机。10月,两架美国“流星”喷气式歼击机攻击了海参崴附近的苏哈亚列奇卡飞机场。(海留佐夫B.,《俄国的空中之剑》,莫斯科,2006年,第78—79页)

早在1949年5月,金日成的私人代表就已经来到了北京。在商谈其他议题的同时,双方讨论了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队干部和武装援助的问题。毛泽东承诺将提供广泛的援助,但要在与莫斯科协商过后。

毛泽东将这些会谈的情况告知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专家组组长И. В. 科瓦廖夫(苏联前交通部长),后者则给斯大林发去了相应的电报。中国领导人的推论是:如果替代美国军队进驻南朝鲜的是日本军队,那么金日成就会发动进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继续等待。总之,不管什么情况,毛泽东都建议等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再说。

1949年夏,美国人把军队撤出了南朝鲜,不过日本人并未进驻。

9月15日,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Т. Ф. 什特科夫(战时曾是列宁格勒、沃尔霍夫、卡累利阿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还曾是滨海集群军军事委员会和远东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称,金日成打算进行军事行动。什特科夫在报告中还警告说,这可能导致美国出面干涉冲突,并以此为借口反对苏联。

什特科夫的报告被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9月24日,大使得到了发来的指令,其中指出:北朝鲜的军队尚未做好进攻的准备,因此进攻是不能允许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亦未做好行动准备;应该做的是在南朝鲜展开广泛的游击斗争。

总之,自1949年3月斯大林接见了刚刚成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团以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一直未曾改变。当时他就告诉金日成:“如果敌人有侵略的意图,那么他迟早都会发动侵略。而在回击侵犯时,我们就会有转为反攻的好机会。那时你们的反攻步骤将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冷战(1945—1963年)》,第260页)

斯大林实际上考虑的是,在美国人离开之后,南朝鲜人就会向北朝鲜人发动进攻,这将给莫斯科松绑。事实上,美国人是坚决反对汉城的这一计划的,但这一点斯大林并不知道。而且为了展示出苏联的和平意愿,斯大林下令撤销了苏联在清津的海军基地,并关闭苏联空军在平壤和江界的两个联络处。

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并与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之后,远东地区的战略局势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斯大林对此立刻作出了反应。与此同时,在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国安会第48号指令: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包括日本



和菲律宾,但不含朝鲜和中国台湾的“防卫圈”。

1950年4月,金日成再次来到莫斯科。斯大林向他提出了进行解放战役的条件:要有中国领导人的支持、要有精心的准备,还要有苏联额外提供的武器和运输车辆。与此同时,斯大林直言苏联不会直接参与到军事行动中去,“因为苏联另有重任,特别是在西方”。

5月14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向北京发去一封电报。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提出的着手统一的建议。与此同时商定,该问题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作出最终决定。若中国同志持不同意见,则问题的解决应推迟,并通过新一轮讨论来解决。我们这次会谈的详细情况可由朝鲜同志向您叙述。菲利波夫。(波波夫 И. М.、拉夫列诺夫 С. А.、波格丹诺夫 В. Н.,《战火中的朝鲜》,莫斯科,2005年,第73页)

斯大林把相当大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尽管那时他还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之间开始了一种新的关系,并显露出了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当然,中国和毛泽东在不少地方还是要感谢斯大林的,正是斯大林认为对中国的支持和友好是苏联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在与中国签订了同盟条约之后,斯大林批准了一项重大的外交行动:1950年1月13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 Я. 马立克在联合国宣布,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把台湾开除出联合国之前,苏联将拒绝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一些机构的工作,并且不会承认它们作出的决议。

但斯大林的类似举措并没有获得毛泽东的永久感谢,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有点像铁托。

美国空军开始对北朝鲜的生产和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接着美国人开始派步兵登陆了。

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电报:已决定“向朝鲜同志提供军事援助,尽管中国军队的装备并不充足”。

中国人领悟到了,金日成政权的崩溃将使美国人伸向鸭绿江沿岸700公里的中朝陆地边境,威胁到中国工业发达的地区。一度中断的苏中接触又开始活跃起来。

1950年9月中旬,平壤已处于灾难的边缘。9月15日,在北朝鲜人的大后方仁川,联合国派驻朝鲜军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实施了一次大型的登陆行动:一支5万人的队伍乘着300艘装载着坦克、火炮的战舰,在800架飞机的掩护下展开了行动。与此同时,9月16日,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又向釜山-大邱一线发动了攻击。10

月,他们在某些地区已经到达了中朝边界。周恩来总理向美国人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作出反应。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这些警告是虚张声势,并不打算就此打住。原则上,麦克阿瑟也不排除使用核武器。10月20日,平壤沦陷。

不过在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两支部队开始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30个步兵师和4个炮兵师。不惜付出惨重伤亡的中国军队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在装备上,特别是空军力量的优势在美国人和南朝鲜人一边,但在道义和士气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则远远地超过了他们。而且,在丘陵地形的自然条件下,美国人的军力并不占有优势。

麦克阿瑟(未经华盛顿同意)下令轰炸桥梁和渡口,接着又轰炸了满洲里的居民区。这种做法更加激怒了北京。12月5日,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夺回了平壤。战争的关键阶段结束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由已形成的战略因素来决定:杜鲁门和斯大林既不希望把一场地区性冲突发展成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打算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样的战略下,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解职就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麦克阿瑟急于扩大冲突,而这是白宫所不能接受的。

其实,这场在朝鲜半岛范围内进行的战争从某种角度也是一场苏美之间的战争。

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空军投入了44个空军中队共657架战斗机。而北朝鲜开始时有150架飞机,不过在机场遭到几次轰炸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名存实亡了。

苏联的正在作战的两个盟国都向斯大林发出了呼吁,请斯大林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提供了,但完全不是两国请求的那样。斯大林向中国东北(1950年7月至8月间)派出了4个经过人员精简的歼击机师和2个强击机师,以及16个教导团和10个坦克团,还有高射炮、探照灯手部队和雷达设备等等。军事设备是以苏联贷款的项目交付给中方的,并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识别标志,而且苏联的军人均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服(军官们脚穿红军的铬鞣革皮靴),持有相应的中国证件。这样一来,斯大林关于苏联不参战的指示算是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不过,尽管从形式上很难指责苏联参与了军事行动,但战争的必然性很快还是把苏联飞行员拉进了与美国人的战斗中。

朝鲜上空发生了上百场空战,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发生在1951年4月12日。当天美国空军对新义州旁横跨鸭绿江的铁路桥(向朝鲜运送部队的唯一一条铁路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苏联空军则予以了回击。美方有近40架B-29轰炸机,超过100架F-84和F-86(“佩刀”)歼击机参与了这场空袭。为了迎击这次空袭,44架米格-15从安东机场升空。根据经过证实的战斗结果,有13架B-29(其中3架去向不明)、4架F-84和1架F-86(去向不明)被击落。这对美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打击。

很快,冲突的结果就应由空战来决定了。早在 1950 年 12 月,最新式的喷气式歼击机 F-86 出现在美军的装备中,而苏联空军则有了米格-15 比斯歼击机。这两种歼击机的战斗性能旗鼓相当,正如第 196 歼击机团团、苏联英雄 E. Г. 佩佩利亚耶夫所写的那样:“在米格-15 比斯与 F-86 的空战中,胜利只取决于飞行员的技能和勇气、航向的选择和群战中的协作。”

佩佩利亚耶夫的歼击机团属于第 324 空军师。该师由三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 И. Н. 阔日杜布指挥,并由瓦西里·斯大林送行出征朝鲜。阔日杜布被禁止参加空战,但他违反了禁令,甚至击落了第一架美国喷气式飞机。

几乎所有苏联的王牌飞行员都是“二战”时的前线飞行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在“大战”结束 5 年之后,这些经验已经不值一提了,需要掌握新的经验:喷气式技术装备对飞行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正是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那些英勇的雄鹰们开始遭遇失败。原因很简单:“米格-15 比斯歼击机当时既没有安装雷达瞄准器,也没有安装保护机尾的雷达装置。”(佩佩利亚耶夫 E. Г.,《“米格”对阵“佩刀”》,莫斯科,2000 年,第 110 页)正是因为这一情况,美国飞行员可以在相距 2500 米处就探测到苏军飞机,从而在空战中掌握了决定性的优势。如果莫斯科的军事工程师们没有很快发明出保护装置,那么在朝鲜的战争将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

如果是这样,将会发生一场灾难:斯大林会做出继续打下去的决定,而杜鲁门则会启动核战争。

据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儿子、防空系统总设计师谢尔戈·贝利亚回忆:朝鲜战争初期,在斯大林那里开会时,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告知说,根据情报机关的信息,“如果我们卷入一场大战,那么美国将计划对我们所有主要的工业中心进行核打击,将轰炸莫斯科”。(贝利亚 C.,《我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莫斯科,1994 年,第 403 页)

这一情报迫使斯大林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但并没能阻碍他批准适度的军事行动。

可以认为,苏联飞行员的败北让美军指挥部看到了苏联的致命弱点——苏联的防空。

而这时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其创造者是并不知名的工程师瓦季姆·维克多罗维奇·马茨凯维奇中尉(1920 年生),其祖父是维捷布斯克省的一个神父,而外祖父是顿河哥萨克的首领库尔久莫夫。20 世纪 30 年代时,马茨凯维奇制造了一个能活动的机器人,并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展示。1951 年,马茨凯维奇来到从事无线电电子设备研究的空军的科研院所任职。在得知“米格”被击落的消息后,马茨凯维奇就主动研制出了一种灵巧的雷达测位装置,它能够测定远至 10000 米的敌机来犯,并



向飞行员发出警报。这个雷达测位装置如烟盒一般大小，而当时军事方面专业的第 17 科研所制造的雷达跟踪器居然重达 120 公斤，且探测距离只有 600 至 800 米。

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也正因为如此，马茨凯维奇所有试图为自己的发明“打通出路”的努力都遭到了竞争对手的阻挠。他们免去了这位中尉的工作，并指责他“崇拜美国人”、信奉世界主义和精神失常。唯一能够帮助马茨凯维奇的是空军科研所的试飞员格奥尔吉·别列戈沃伊(未来的宇航员)和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斯捷潘·米高扬。结果中尉被带到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弟弟、米格-15 的设计师阿尔乔姆·米高扬的办公室。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弄清了来龙去脉，承诺说，马茨凯维奇的反对者不敢拿他怎么样，他将被派往朝鲜以在实战条件下验证自己的雷达测位装置。

结果还真是这样。马茨凯维奇被派到了驻扎着第 64 空军军团的中国，在那里，他给 10 架飞机安装上了自己的微型测位装置。效果是惊人的。立即就有人汇报给了作战部长布尔加宁，后者又向贝利亚和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把此事置于了亲自监督之下。工业部门被要求在 3 个月内生产出 500 台这种装置，以“防止我们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悲剧重演”。而厂长们请求将交货期限延至一年半！

这一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科学工作者在与幸运的竞争者抗争时，工厂企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在拒绝执行政治局的任务。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一情况也证明，1945 年之后国内各种各样的帮派和集团开始出现了危险的独立倾向。

当然，马茨凯维奇雷达测位装置的生产还是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了，苏联的歼击机总算得到了免遭突袭的保护，但此事最终得以解决完全是一个超出常规的特例。由院士 A. И. 贝格院长领导的第 108 科研所完成了斯大林的订单。(马茨凯维奇 B.，《帝国战士，或美国为何没有进攻苏联的实情》，莫斯科，2006 年)

事实上，马茨凯维奇雷达测位装置的整个事件是以奇迹而告终的。但奇迹能出现几次呢？

到了应该考虑从紧急的、超常的管理方式过渡到更稳定、更可靠的正常方式的时候了。

很快，在朝鲜的战事变得不那么紧张了。中国人明白斯大林是不会越过自己设定的界限的，于是开始了和谈事宜，但我们的主人公对把美国继续拖在冲突之中很感兴趣。所以战争一直持续到领袖去世。

在这场战争中，共有超过 2700 架美军飞机被击落，美国的盟友也损失了 150 架飞机，共有 1144 名飞行员丧生，40 名失踪，214 名被俘。(克拉马连科 C. M.，《在两场战争的上空》，莫斯科，2004 年，第 198 页)



苏联的第 64 歼击机军团则损失了 120 名飞行员,335 架米格-15 歼击机。(波波夫 И. М.、拉夫列诺夫 С. А.、波格丹诺夫 В. Н.,《战火中的朝鲜》,第 275 页)

谁是胜利者的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如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为纪念朝鲜战争阵亡美国军人纪念碑揭幕时说的那样:“既然存在着三八线,就意味着在那场战争中我们并未获胜。”(克拉马连科 С. М.,同上,第 201 页)

这场冲突的结局是消除了“大战”的可能性。因为不管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在适度的冲突中都试探了对方,都想把搞清双方关系的结论放到以后再说。如果当时苏联没有进行干涉和把中国拉进来,那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不复存在,而战火也会转移到中国的领土上。但如果美国没有出面干涉,那么苏联就会将此视为软弱,就会开始在其他地区试探对手的实力。苏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相互敲打了一番之后,这两个过去的盟国总体上保持了和平。

而中国由此变得强大起来,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军队,这使中国不久以后就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并成为其竞争对手。

朝鲜战争之后,还有一个情况上升到了第一位——北约加快了军事建设。西方明白,必须进行防御。其结果就是西德的经济与军工生产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再来看一下斯大林的朝鲜之役,那么就很难简单地说,苏联是得多还是失多了。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让我们主人公头疼的事并未减少。但我们知道,斯大林是不怕出现问题的。

## 第四十三章

# 阿巴库莫夫被捕

---

B. 阿巴库莫夫被捕、“医生案件”的内幕、“米格列尔人案件”、新的权力中心、“该治治国家政治保卫局了”、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们的被免职

---

朝鲜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苏联建起了一个环绕莫斯科的导弹防空圈（C-25“金雕”系统）。该系统的研发是由特种设计局的总设计师谢尔戈·贝利亚（1924年生）领导的。因建立“金雕”系统，这个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儿子本应该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但他却没有得到。据苏多普拉托夫回忆，此时斯大林对贝利亚父子的嫉恨（因斯维特兰娜的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之后，老贝利亚的声望如日中天；另一方面是其天才的儿子（确实如此）的不断升迁，想必也使斯大林不得不将其与自己的儿子瓦西里作个比较。贝利亚的儿子比领袖的儿子更有成就，对国家更有用！不过，如果不是让斯大林苦恼的继承人的问题，这个情况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该把自己的宏图大业留给谁呢？

在消灭了列宁格勒集团之后，贝利亚在格鲁吉亚的积极活动不可能不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在格鲁吉亚，所有的主要领导岗位都是由贝利亚提拔上来的人和贝利亚的族人——米格列尔人在担任。

1951年，斯大林批准对格鲁吉亚的贿赂问题进行调查，下令在贝利亚的母亲玛



尔塔的住所里安装录音装置,认为会录下她对被贬黜的米格列尔领导们的同情言论。这与“列宁格勒案件”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时就是安装在库兹涅佐夫住所里的装置录下了房屋主人与他的同志们的“民族主义”主张。现在这一做法理应在对付另一个集团中发挥作用了。“实质上,米格列尔人案件是建立在捏造的罪名和所谓从事旨在从苏联分裂出去的阴谋串通等莫须有的指控上的。”(苏多普拉托夫 П.,《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第509页)米格列尔人的民族主义并不比俄罗斯人或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强到哪里去。

此时的情况是,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已不复存在,而莫洛托夫的威信又受到了破坏,未触及的只有布尔加宁、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了(马林科夫已被贬去管理空军事务了)。不过,布尔加宁并没有觊觎最高权力的野心,而赫鲁晓夫还未成气候,也就是说只剩下贝利亚一人了。除此之外,随着列宁格勒集团竞争者的消失,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联合也随之瓦解。贝利亚和布尔加宁是军工部门的主管,而马林科夫则主要管理着民用工业领域,这意味着双方在财政预算和干部人事方面将有一番竞争。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构架并引进新人,而另一方面则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为维护自己的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斗争。

1951年7月2日,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高级侦查员 M. Д. 柳明中校给斯大林发去一封信。他在信中报告: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阻碍他调查承认杀害中央委员会书记 A. C. 谢尔巴科夫的心脏病专家埃廷格尔教授的案件;另外,阿巴库莫夫还阻碍调查“维斯穆特”股份公司(在东德开采铀矿石)的前经理、投敌分子萨利曼诺夫的案件;总之,阿巴库莫夫是“一个对国家有危险的人”,在身边聚集了一帮自己的人等等。

柳明写这封信是出于投机钻营的目的,想败坏对他持绝对批判态度的部长的声誉。柳明给马林科夫的接待室打去电话,向其助手 Д. 苏哈诺夫说有要事汇报,于是很快便见到了马林科夫本人。

马林科夫对阿巴库莫夫是持否定态度的,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正是时任“锄奸局”局长的阿巴库莫夫编织了“空军领导人案”。

7月4日,阿巴库莫夫被免去职务,并于7月12日被捕。

7月13日,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封《关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不良状况》的内部通报。其中讲道:为了验证柳明的信件,成立了由马林科夫、贝利亚、什基里亚托夫和伊格纳季耶夫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查明了“无可辩驳的事实”。阿巴库莫夫被定了如下罪名:“欺骗党和政府”,包庇埃廷格尔的“恐怖活动”,对中央委员会隐瞒萨利曼诺夫案件的调查结果,隐瞒“犹太反苏维埃青年组织成员”的供词,策划“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破坏侦查工作的程序和拖延调查等。

信里谈到的下面这个情况,很快就演变成了“医生案件”：“医生们当中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个秘密组织起来的群体,他们企图在治疗时缩短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生命。决不能忘记某些知名的医生在不久前犯下的罪行,例如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和列温医生犯下的罪行。他们在外国情报机关的指使下毒害了 B. B. 古比雪夫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些凶手在公开审判中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列温被枪决,而普列特尼奥夫被判 25 年监禁。”(《卢比扬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1917—1991 年)》,莫斯科,2003 年,第 661 页)

C. Д. 伊格纳季耶夫被任命为内务部的新部长。此人来自马林科夫掌管的机构,曾任中央委员会所属党、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多个机关的部门负责人。柳明成了国家安全部侦查局的代局长,接着几乎又马上成了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亲自接见了。在谈话时,领袖还表达了对青年人的看法,他说:“年龄完全不是妨碍进行恐怖活动的因素。”斯大林回忆起了“向沙皇的马车扔炸弹的”民意党人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和热利亚博夫。他以此间接地回答了被捕的阿巴库莫夫说的“如果我们用中小学生来填满监狱,那么除了鄙视,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的话。

7 月 20 日,公布了一个重要的任命:先前遭到“荣誉法庭”审判且被指控犯有背叛罪的海军上将 H. Г. 库兹涅佐夫再次被任命为海军部部长。这意味着马林科夫的势力得到了加强。总之,布尔加宁和贝利亚的地位下降了。

7 月 24 日,《真理报》刊登了失宠的朱可夫元帅在华沙举行的波兰复兴日庆祝活动上讲话的全文。

对“医生案件”的调查开始了。国家安全部高级侦查员伊万·伊万诺维奇·叶里谢耶夫想出了进行一次实验的办法:拿出存放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的日丹诺夫的心脏,在告知是普通人的心脏的情况下,让 5 名经验丰富的病理解剖学家对心脏进行切片研究。结果 5 名医生一致作出结论:该心脏的主人死于心肌梗塞。5 人中,就连日丹诺夫死后马上解剖了尸体,并断言没有任何心肌梗塞迹象的病理解剖学家 A. H. 费奥多罗夫也承认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医生们隐瞒了这位政治局委员真实的死因。

一场阴谋诡计就此开始了。

对于叶里谢耶夫提出的为什么费奥多罗夫明知日丹诺夫患有心肌梗塞却仍作出了相反鉴定的问题时,这位病理解剖学家说,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叶戈罗夫找过他说:“我希望您在列举病人所患的疾病时,就不要提及心肌梗塞了。否则我们会被硬扣上在诊断、治疗和其他过程中犯有过失的帽子。而且,反正已经于事无补了。死亡,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现象。”(克沃尔科夫 B.,《处决前的忏悔》,莫斯科,2006 年,第 96 页)



如果从指控的角度去看待此案,就会发现一连串的事实:1948年8月7日,索菲娅·卡尔帕伊给日丹诺夫做了心电图,此后便去休假了,一直到8月28日再也没有给日丹诺夫做过心电图;在这22天里,给日丹诺夫规定了积极活动的作息制度;对他的照料漫不经心;他的私人医生马约罗夫竟然钓鱼去了;日丹诺夫反复出现发绀和气闷的症状,这些也没有在医疗记录中反映出来;护士夜间未给病人提供救助,都在睡觉。还需要补充的是:8月28日,心脏病医生利季娅·季马舒克又给日丹诺夫做了一次心电图,并判断病人患有心肌梗塞、急需静卧治疗;而叶戈罗夫却对季马舒克提出的申请不屑一顾,还指责自己的这位下属不学无术。在8月31日的莫斯科会诊中,叶戈罗夫并未说出在日丹诺夫治疗和去世的整个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对病人要进行怎样的治疗?“他没有回答,为什么在更为严肃的诊断时,没有遵从现有的医疗惯例,不制定严格的长期静卧疗法,还允许日丹诺夫在公园散步,去看电影和做腿部推拿?”(布连特瓦、瑙莫夫B,《斯大林的身后事》,莫斯科,2004年,第41页)

8月29日(日丹诺夫此时还活着),季马舒克到日丹诺夫病房取了心电图,当看到有心肌梗塞症状时,就给斯大林的警卫长弗拉西克写了一封信,并交给了日丹诺夫的警卫长亚历山大·别洛夫。别洛夫马上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在瓦尔代的日丹诺夫的妻子季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季娜伊达是一位说话刻薄的妇女,她马上找到了医生,进行了一次非常沉重的谈话。

8月31日,日丹诺夫去世。鉴于在治疗过程中大量负面的事实,再加上季马舒克的信件和季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介入,这位政治局委员的死因理应受到调查。

但是季马舒克没有收到对自己信件的回复,于是,她又写了第二封信并于1948年9月15日送交给了A. A. 库兹涅佐夫。当时库兹涅佐夫还有权。日丹诺夫去世后,他去了瓦尔代(同去的还有沃兹涅先斯基和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都是后来的“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角色)。但是这位心脏病医生从库兹涅佐夫那里也没有等到回复。季马舒克所不知道的是,她的第一封信就已经被弗拉西克转交给了阿巴库莫夫,而后者则上报了斯大林。

斯大林并不倾向于展开调查,因为他知道日丹诺夫身患重病。是医疗事故,还是专家们的争议?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日丹诺夫是不会活过来了。季马舒克的来信被放进了档案室,一直到1951年柳明提审了埃廷格尔。在审讯时,柳明得以让埃廷格尔承认不太喜欢自己的病人、也是猝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谢尔巴科夫。于是,这位侦查员就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

阿巴库莫夫明白,柳明获得的埃廷格尔搞“恐怖行动”的资料根本不足为证,并指责柳明缺乏专业性。但是,阿巴库莫夫并没有解除柳明职务,反而在这位中校下跪求饶时原谅了他。这是阿巴库莫夫上将犯下的致命错误。

埃廷格尔不仅是一名普通的医生,还是一位优秀的专家,被邀请到过贝利亚的家

里。的确，埃廷格尔是有反苏倾向，他的电话遭到监听，有一次还录下了这么一句话：“谁能把国家从像斯大林这样的怪物手中拯救出来，谁就是英雄。”（布连特 П.、瑙莫夫 В.，《斯大林的身后事》，第 91 页）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秘书费费尔在受审时指认埃廷格尔是犹太民族主义反苏分子。这样一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就扩展到了“医生案件”，而很快又从“医生案件”扩展到了“国家安全部案件”。在国家安全部，那些供职于此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和受到他们影响的阿巴库莫夫）阻碍了对针对苏联领导人的“恐怖阴谋”的揭发。此外，还有正在进行中的朝鲜战争、对美国发动核攻击的预测、东欧的大清洗和克里姆林宫的派系斗争等。

倒在日丹诺夫死亡车轮下的还有警卫总局局长 H. C. 弗拉西克，他是斯大林的“永恒的影子”、察里津保卫战时就相识的老熟人。1948 年 9 月 6 日，举行了医疗会诊，日丹诺夫被确诊为高血压（而不是实际上的心肌梗塞！）。弗拉西克在此次会诊的记录上写道：“部长得到报告，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看了诊断书，并认为诊断是正确的，而季马舒克同志的判断是不正确的。”（茹科夫 Ю.，《斯大林：政权之谜》，第 589 页）

清除阿巴库莫夫，一下子就引起了政治局里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委员的兴趣（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对于赫鲁晓夫来说，阿巴库莫夫非常清楚他在乌克兰镇压中扮演的角色，是个危险的证人。所以阿巴库莫夫是难逃厄运了。阿巴库莫夫即使在严刑拷打之下，也没有在任何一张笔录上签字，他被枪决已经是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掌权时的事情了。

但即使是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饱受摧残、在劫难逃的阿巴库莫夫还是报复了柳明。1952 年，他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写信说，柳明“利用上呈给斯大林的绝密报告中的信息，对政治局的内部关系”很感兴趣（П. 苏多普拉托夫）。除此之外，心脏病医生索菲娅·卡尔帕伊尽管受到了严刑拷打，也没有在承认谋杀日丹诺夫的供词上签字。同时，斯大林也看到，柳明关于医生进行阴谋串联的流程图漏洞百出。1952 年 11 月，柳明被解除了职务，并在斯大林去世后被枪决。

这样一来，由于开启了“医生案件”的柳明的积极活动和伊格纳季耶夫被提拔到了国家安全部，一个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的新的权力中心就此形成。他们之间的隐藏的矛盾后来才明显暴露出来，而现在他们都忙于对国家安全机构，甚至是整个党的领导层进行大清洗。

贝利亚对伊格纳季耶夫并不满意，因为他是“马林科夫的干部”，但伊格纳季耶夫的第一副手 C. A. 戈格利泽却是贝利亚提拔上来的人。后来戈格利泽被派到乌兹别克斯坦供职，白俄罗斯的安全部长 Л. Ф. 察纳瓦调到莫斯科担任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反间谍局）局长的职务。

伊格纳季耶夫是在工业化年代脱颖而出的（他于 1904 年在赫尔松省出生，曾是





政治工作人员和布哈拉军团肃反委员会军事处的工作人员；工业学院毕业后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业部工作；1937 年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领导了布里亚特-蒙古州委和巴什基尔州委；“二战”之后，成为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他为人并不残忍，而其作风的正派也是当时所认可的。1952 年，他得了心肌梗塞（并未完全让伊格纳季耶夫插手“医生案件”，Ф. 博布科夫所言）。斯大林去世后，控制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贝利亚试图清除伊格纳季耶夫，但未得逞。

事实上，尽管柳明已被撤职，“医生案件”还是在自行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推动之下。遭到逮捕的有：П. И. 叶戈罗夫、他在医疗卫生局的前任 А. А. 布萨洛夫、斯大林的私人医生 В. Н. 维诺格拉多夫、В. X. 瓦西连科、M. C. 沃夫西（米霍埃尔斯的表弟）和 Б. Б. 科甘。1952 年 12 月 15 日，弗拉西克被捕。他承认：“我和阿巴库莫夫没有采取措施来验证季马舒克的声明，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这么做，实质上就是将她置于叶戈罗夫的迫害之下。”（茹科夫 Ю.，《斯大林：政权之谜》，第 591 页）

我们要强调一点，弗拉西克的解职是有益于贝利亚的。贝利亚 1946 年从国家安全全部领导岗位上被免职正是弗拉西克“引导”的结果（当时是阿巴库莫夫接替了贝利亚的位置）。除此之外，格鲁吉亚贪污的信息也是通过弗拉西克上报给斯大林的，其结果直接导致政治局出台了一个毁灭性的决议（1951 年 11 月 9 日）。

这份决议给了贝利亚沉重一击，使他步了“列宁格勒案件”受害者的后尘。

最近一段时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得到消息，说在格鲁吉亚行贿受贿行为在迅速蔓延，说那里与行贿受贿的斗争远不合乎要求。

最近对事情的了解表明，行贿受贿的行为在格鲁吉亚的确在蔓延，尽管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也采取了一些斗争措施，但行贿受贿现象并未减少。同时还了解到，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反贿赂斗争之所以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是因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以及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机关内部有这么一伙庇护受贿者并千方百计为他们帮忙的人。

事实说明，这一小伙人的头领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巴拉米亚。这伙人全是由米格列尔民族主义者组成的。除了巴拉米亚同志以外，其成员还有司法部长拉帕瓦同志、格鲁吉亚检察长邵尼亚同志、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行政部部长库恰瓦同志、党员干部部部长奇奇纳泽同志和其他人。这个团伙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米格列尔人中的犯罪分子，教他们规避法律。为了救出“自己人”，他们甚至不惜采取欺骗中央政府的种种手段……

毫无疑问，如果被巴拉米亚同志所采纳的米格列尔头头的反党原则没有得到应有的抵制的话，那么格鲁吉亚的其他省——卡尔塔利尼亚省、卡赫季亚省、

伊梅列季亚省、古里亚省和拉恰省也将出现新的“头目”。他们都想控制自己的省,想庇护那里的犯罪分子,以提高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格鲁吉亚共产党将分裂成一系列握有“实权”的党的外省公国,而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层将只剩下一个空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349、350—351页)

根据政治局决议,格鲁吉亚的37名领导成员被捕,约万人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用斯大林的话说,应该找出格鲁吉亚事件背后的“大米格列尔人”,即贝利亚。这样,贝利亚就被逼到了悬崖的边缘。

与此同时,马林科夫的地位明显得到了巩固。1952年12月1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关于医疗工作中的破坏活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状况》问题的会议上,斯大林说了这么一段话(按马雷舍夫的日记整理)。

斯大林同志(1952年)12月1日

我们成绩越大,敌人就越会千方百计地对我们进行破坏。在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影响下,我们的人忘记了这一点,表现出了温情、粗心大意和骄傲自大的思想。

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是美国情报机关的暗探。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是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在美国可以成为富人、资产者等等)。他们认为自己要感谢美国人。

医生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者。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情况不如人意。警惕性放松了。

他们自己也承认,屁股上有屎,失败了。

该治治国家政治保卫局了。

部长们应该是政治家和侦察员。

国家政治保卫局未能摆脱任何组织机构都面临的危险,即因成绩而盲目乐观,头脑发热。

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监督和批评。在具有特殊保密性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些方法并没有被采用。契卡人员本身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应该制定某些监督和检查的方式。要让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活跃起来。

现在党支部在给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歌功颂德。党支部的所有主动性都被剥夺了。这些党支部没有权力,阿谀奉承的小人骑在他们的头上。该结束这种情况了。应该给予基层党组织批评上级领导的权利,使每个人都有权进行批评(批评是有界限的)。



州领导要向州委汇报工作。

中央委员会要对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实行监督。

懒惰和腐败已严重侵蚀国家安全部。

共产主义的观点在向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转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394—395页)

这段记录表明，马林科夫的势力是如何增强的。从这时起，党理应置身于安全部门之上。“革命的惩罚之剑”被封存进了博物馆。

“该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了”、“中央委员会要对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实行监督”。在这之后，老广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译注)就高高地凌驾于卢比扬卡之上了。又颁布了一项《关于国家安全部的状况》的决议，其中列出了一条在此之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条款：第一书记“应该清楚所有情报人员的名单”。这破坏了情报工作的最基本的原则。马林科夫还争取到了一项特权：在中央委员会建立了一条自己的不受国家安全部控制的有安全保障的通讯线路。

不难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安全部门进行清洗，就像贝利亚接替叶若夫后所做的那样。

(现在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在斯大林去世后，当上了政府主席的马林科夫在权力斗争中会败给掌管党务的赫鲁晓夫，那是因为赫鲁晓夫控制着国家的安全部门。)

在赶走自己忠诚的助手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舍夫(1952年11月被解职)的时候，斯大林是怎样想的？

“此事似乎与1938年至1941年间政治局工作和全体会议决定被经常泄露出去有关。在1946年就展开了对此事的调查，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也没有查出任何结果。由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C. П. 伊格纳季耶夫向斯大林本人递交的指控材料成了逮捕斯大林最亲近的助手A. H. 波斯克列贝舍夫和私人卫队长H. C. 弗拉西克的依据。”(皮霍亚P.，《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政权：战后四十年(1945—1985年)》，莫斯科，2006年，第276页)

在被解职之后，弗拉西克说道：“如果我被搞掉的话，那么主人也就快了。”事实正是如此。

弗拉西克之后，警卫总局局长一职由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兼任，所以不能认为贝利亚取得了对警卫队的控制权。

但如果像我们的主人公这样谨慎且聪明的人，决定免去自己身边两个中流砥柱的职务的话，那就意味着，他认为，他们留在他身边带来的危险要超过他们的离去。由此可以推断，日丹诺夫的死也是这样。

## 第四十四章

# 斯大林的遗嘱

---

斯大林的遗嘱、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继承人做了报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退居次位、更换统治精英的尝试、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为中央书记

---

斯大林考虑过自己的死亡吗？显然没有。继承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马林科夫。1952年9月7日，政治局通过决议于1952年11月20日召开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做例行报告的是马林科夫。而在这以前，工作报告一直是由斯大林来做的。

1952年7月9日，马林科夫负责政治局修改党章委员会；7月15日，马林科夫成为又一个五年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如果考虑到他在国家安全部的绝对影响，马林科夫实际上已经成了“皇嗣”。

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在斯大林身上常常会发生偏离常轨的情节：他思考起苏联存在的理论基础的问题来了。据尤里·日丹诺夫回忆，领袖甚至重新审视了黑格尔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学说。在斯大林看来，当现实生活中斗争占主导地位时，承认这两个因素相等就等于解除武装。“也许，应该完全否定统一，因为这会导致在政治上作出错误的实际结论。”（日丹诺夫 Ю.，《回首往事：一个目击者的回忆录》，第373页）

在1951年至1952年主持专家组(Л. 列昂季耶夫、К. 奥斯特罗维佳诺夫、П. 尤金



和Д. 谢皮洛夫)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工作时,斯大林不仅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深刻了解,还表现出了对其他方面的深刻了解。“与斯大林在这些话题上的交流,让你感觉是在与一个对话比你掌握得更好的人在共事。”(谢皮洛夫 Д.,《未参与者》,第 184 页)

谢皮洛夫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斯大林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文章(1952 年,第 20 期),其中写道:斯大林发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特征的规律。这遭到了我们主人公的反对。斯大林打电话给作者说,发现这一规律的是马克思。

谢皮洛夫只能回答说,是斯大林把马克思原理“发展”到了客观经济规律之中。谢皮洛夫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不可能不明白,斯大林是在温和地批评他。

斯大林一直关注着教科书的编撰工作。他对 3 个章节和序言进行了审订,显示出保持了思想敏锐和用词准确的一向风格。这从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一章里,斯大林亲自补充上去的一大段文字中可见一斑。我们举出其中的一部分为例:“的确,小生产者与世袭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场自由阶层内部的以消除债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地主贵族阶层特权、交权予民众(即人民)为目的的民主运动。但它通常并不能给小生产者带来什么减负,而只是增强了那些‘非贵族出身’的在战争和贩卖奴隶中借助世袭地主的影响和权势暴发起来的新一批大奴隶主的影响和权势。至于这种民主运动不仅没有解放奴隶或改善其遭遇的目的,甚至都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去谈论了。”(谢皮洛夫 Д.,《未参与者》,第 192 页)

由此可见,斯大林轻而易举地就搞清楚了使人们发生冲突和让过去的战友变成势不两立敌人的内在原因。其实,在列举这一片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字里行间折射出的苏联社会的现实情况——统治精英的内部斗争。斯大林认识到,这种斗争不会停止,并终将演化为公开的冲突。

在忙于教科书编撰的时候,斯大林起初并不打算对外公布自己的标注,这是写给经济学家们看的,而且允许不用注明作者就可以运用在“授课、教研和政治学习之中”。但之后斯大林却改变了主意。于是,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真理报》上发表了他的文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无法解释。显而易见,其原因要到斯大林预见到了经济自由化的危险(在马林科夫将于十九大上作的报告的草案中就有显露)并且想提出理论上的矢量中寻找。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里包括下面几个重要的思想:

在苏联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也起着作用;

价值规律:生产利润原则的作用是受“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所调节的,而这种发展规律对国家是重要的,它使利润低的部门(重工业)与赢利部门之间的不平

衡得以修正；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规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用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方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持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斯大林 И. В.，《斯大林选集》，3卷本，第3卷，第406、407页）

换言之，斯大林最先想出了一条经济改革之路，这就是一条如今被称为“中国模式”的道路。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预言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西方获得世界资源的渠道将减少，生产和销售将下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将加深。斯大林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是万能的。瓦尔加院士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将稳定化的预测并不能使他信服。斯大林还特别指出了“某些同志”声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并且驳斥了这一结论。瓦尔加是被马克思打败了。

而要是斯大林接受了瓦尔加的结论呢？那就很难说当时会发生什么了。

是的，正是斯大林“停止”了世界革命，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在他心中仍保留了对世界革命的浪漫幻想。

属于他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这一阶段承前启后、包罗万象：

以作为国家精神领袖的沙皇为首的伟大东正教帝国；

从绝对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变；

上层政治集团反对帝国政权的密谋；

这个上层集团的惊人软弱和国家的灾难；

布尔什维克变革；

在世界革命和国家复兴之间的艰难抉择；

经济的现代化；

新一代精英内部的战争；

与德国的战争；

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建立；

恢复受到破坏的经济；

在朝鲜与西方国家的战争；

研制出核武器和导弹；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关系的和谐相处；



全世界都在变化。

但斯大林不曾明白，他如此大地改变了世界，以至于自己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新世界了。时间吞噬了这位巨人，正如他曾经吞噬了时间那样。

1952年10月5日，党代会开幕了，这次大会将对上次党代会以来的13年作出评定，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作出规划。与以前的五年计划相比较，新的五年计划对重工业与轻工业制定了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即“A组”为13%，“B组”为11%。

马林科夫的报告延续了斯大林思想。在国际方面，是“与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在国内方面，是工业生产的增长从1950年至1955年要达到70%（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要达到80%，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增长要达到65%）。

但是，报告并不心平气和。相反，还令人忧心忡忡：“问题在于，由于战争的胜利结束和战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党的队伍里，一种对党、经济和其他一些组织在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不去批评的态度有所滋长。事实说明，这些成就催生了党的队伍里的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和苟且偷安的情绪，只想着活在过去的成绩之中，不思进取。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我们什么都能做到’、‘什么对我们都是小菜一碟’、‘事情进展顺利’，认为无需用诸如与我们组织内负面的和不正常的现象作斗争这些不太愉快的事情麻烦自己。这种后果有害的情绪侵蚀了部分未培养好因而党性不够坚定的干部。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常把一些集会、积极分子会议、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变成一场阅兵，变成自我吹嘘，其结果是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问题和弱点不被揭露和不受批评，并导致骄傲自满的情绪进一步增长。疏忽懈怠的情绪渗透进了党组织。在党、经济、苏维埃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之中，存在着警惕性放松、粗心大意和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情况。一些工作人员沉迷于经济事务和取得的成绩之中，开始忘记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忘记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仍顽固地向我们派遣自己的间谍，并利用苏联社会中的不坚定分子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马林科夫Г.，《第十九次党代会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莫斯科，1952年，第138—139页）

（关于疏忽懈怠、丧失警惕性、粗心大意这些话，斯大林在1952年12月1日，即代表大会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又原原本本说了一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林科夫说出了领袖的想法。）

马林科夫同样还对弄虚作假、地方主义这些“危险和恶劣的现象”、对在全国统计中隐瞒部门资源和帮派林立现象表达了深切关注。

马林科夫引用斯大林的话，对“轻率地仓猝行事和在没有创建必要条件时就向高级经济形式过渡”提出了警告。马林科夫重复了斯大林关于经济规律不容否定的论点。



在谈到文化问题时，马林科夫出人意料地批评起了“在我们的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中有大量的不足”：有很多平淡的、枯燥的、完全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我们需要苏联的果戈理和谢德林，用讽刺之火烧尽生活中所有负面的、腐朽的、呆滞的以及一切阻碍前进的东西。”（同上，第 115 页）

报告里，再次谈到了斯大林先前宣扬过的关于需要“苏联的果戈理和谢德林”的思想。这段话是斯大林于 1952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斯大林奖提名者（K. 西蒙诺夫）时说的。至于那些尖锐的批评，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主人公对黑格尔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学说的态度。

那么，在马林科夫的报告中，斯大林总体上提出了哪些问题呢？与西方和平共处、发展经济、提高居民的福利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进行过选举后，斯大林也讲了话。

目击者作了这样的描述：

整个大厅的人都站了起来并鼓掌。斯大林从主席团的桌子后起身，然后绕桌子，以饱满、有点急促的步伐几乎是跑上了讲台。他把一叠我感觉是上讲台时他拿在手上的小纸片放到了自己的面前，然后开始了讲话——平静从容，不急不忙。对他的每一段讲话，大厅里都报以掌声，斯大林仍然是平静从容、不急不忙地等着掌声过去。有一次他的讲话被大厅里的掌声打断了，如果他从被掌声打断的那个单词继续发言，那么严谨的段落结构将被破坏。斯大林停了下来，等着掌声结束，然后他并没有从被掌声打断的地方开始，而是从前面，那个以关于旗帜的“再没有人能将它举起来”结尾的句子的第一个词开始继续发言。

在发言的最后，斯大林第一次稍稍提高了嗓音说道：“我们的兄弟党万岁！祝兄弟党的领袖们健康长寿！人民和平万岁！”说完之后，他作了一个长时间的停顿，然后说了最后一句话：“打倒战争贩子！”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像其他的演讲者那样说最后这句话会提高嗓门。相反，他压低了声调，低声而轻蔑地说出了这句话，同时左手做了一个淡然而藐视的手势，好像要挥手把他想到的战争贩子赶到一边去，然后他转过身，慢慢走上台阶，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西蒙诺夫 K.，《历史的重水》，第 462—463 页）

斯大林说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信任、同情和苏联对兄弟党及其人民的支持。大厅里坐着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刘少奇、路易吉·隆哥、莫里斯·多列士……斯大林说，现在他们斗争起来要容易一些，因为他们的眼前就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制度斗争和胜利的榜样”。而最重要的是：



以前,资产阶级纵容自身的自由主义,维护自身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并以此建立了自己在人民中的威信。而现在,自由主义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了所谓的“个性自由”——现在,只有那些掌握资本的人才拥有个人权力,而其他所有的公民则被看成是只能受剥削的人力资源。人民和民族平等的原则遭到践踏,取而代之的是少数剥削者享有充分权利和大多数被剥削者不享有权利的原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党和民主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并举着它勇往直前,如果你们希望把大多数人民团结到自己周围的话。除了你们,再没有人能将它举起来。(热烈的掌声)

以前,资产阶级被视为民族的领袖,它捍卫着“高于一切”的民族的权利和独立。而如今,“民族原则”已再无踪影。现在,资产阶级正靠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去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也已被抛弃。毫无疑问,你们——共产党和民主党的代表们,必须高举这面旗帜,并举着它勇往直前,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国家的爱国者,想成为本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再没有人能将它举起来。(热烈的掌声)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显然,所有这些情况必然会有利于那些尚未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和民主党展开工作。

因此,有一切理由可以期待兄弟党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里获得成功和胜利。(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兄弟党万岁!(长时间的掌声)

祝兄弟党的领袖们健康长寿!(长时间的掌声)

人民和平万岁!(长时间的掌声)

打倒战争贩子!(全体起立,响起热烈、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斯大林同志乌拉!”、“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乌拉!”、“各族人民间的和平万岁!”“乌拉!”)(斯大林 И. В.,《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莫斯科,1952年,第11—14页)

斯大林只字未提国内事务、五年计划和继承人这些方面的问题。他似乎超越了这些问题。

第二天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斯大林做出了一件令许多人震惊的事。原来要早一点在小范围内先讨论一下领导机关的人员组成,但斯大林直到全会就要开始的时候才来到会场,并未进行任何讨论。当与政治局老委员们一起步入大厅时,迎接斯大林的是欢呼声,而他则阴沉地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无需如此兴高采烈。

他的发言基调十分强硬。很快大家都明白,将要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了。斯大林谈了坚忍不拔和英勇无畏的必要性,回忆了列宁在1918年国家处于敌人包围之中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

“他的语调,以及说话时眼睛紧盯大厅的方式都使所有在座的人感到某种茫然失措,我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他讲话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如果不是逐字逐句的转述,那也是按其推理的过程):他已经老了,由别人来继续他所做的事情的时间快到了;世界的形势很复杂,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将是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惊慌失措和退却投降。而最主要的意思是,他想不仅只是说一说,而是要与会者意识到一个话题,他已处于老迈之年且有可能离开人世。

“这些话讲得很生硬,有的地方甚至不只是生硬,简直就是严酷。也许,在他讲话的某些地方也有博弈和算计的成分,但在其背后你可以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带有悲情的担忧。正是由于考虑到有退缩、害怕和投降的危险,斯大林诉诸列宁,说了我已经在笔记中提到过的那些话。此时,实质上,这些话说的就是他本人,是可能要离去的斯大林,还有那些在他离去之后可以留下来的人。但他没有提到自己,而是谈论了列宁,谈到列宁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西蒙诺夫 K.，《历史的重水》，第466页)

斯大林在建议把所有的老近卫军都选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之后,又突然建议成立一个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并“宣读了一连串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名单”。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未被提名。

《文学报》主编、中央候补委员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回忆这次全会(也是斯大林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时提到,斯大林公开指责了自己的老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胆小怯懦和投降主义。

按斯大林的话,莫洛托夫在与英美关系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政策,“破坏了政治局的路线”,作出了退让,而米高扬则支持了莫洛托夫提高谷物采购价格的提议。

(米高扬回忆说,他是在1946年或1947年提出采购价格有问题的,也就是在发生粮食危机的时候。他并不清楚,为什么斯大林在事隔6年之后要重提旧事。)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为自己作了辩护。米高扬称自己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但斯大林否认了这一定义:“我没有学生。我们所有人都是列宁的学生。”此外,米高扬还试图把所有罪名都推到莫洛托夫身上。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斯大林说自己已经很老了,无力履行全部的职责;说他可以继续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和主持政治局的会议,但不能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主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会议了。

西蒙诺夫此刻在马林科夫的脸上看见了一种真实的惊恐表情,因为马林科夫意识到这是斯大林在试探自己的战友们。马林科夫做了一个表示反对的手势。克里姆



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炸开了锅：“我们不会让您离开！请留下来！”

一般认为，这是斯大林在故弄玄虚，并不是真心的。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即使不担任总书记一职，他的权力也是极大的。而在他“半退”的情况下，马林科夫可以为党的正式领导人（后来事实也是如此）。那谁会是输家呢？只有贝利亚。但对贝利亚很了解的马林科夫害怕起来，害怕自己很快遭到与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的命运。

形式上斯大林仍然是总书记，但他给自己准备了一条后路。会议通过决定，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书记处的会议将由马林科夫、别哥夫和苏斯洛夫轮流主持；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则是上述三人再加上布尔加宁；而部长会议主席团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则是由贝利亚、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三人主持。

在这种“拜占庭式”的座次排序中，斯大林仍居于每一处的最高领导地位，马林科夫成了第二号人物。

但在这看似最终的人员安排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前途无量的新面孔。他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前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和前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长官П. К. 波诺马连科。

1952年12月11日，波诺马连科被任命为分管农产品和农业原料采购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团及其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他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

进入书记处的除了波诺马连科，还有 А. Б. 阿里斯托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Г. М. 马林科夫、Н. А. 米哈伊洛夫、Н. М. 别哥夫、И. В. 斯大林、М. А. 苏斯洛夫和 Н. С. 赫鲁晓夫。

进入由斯大林提议成立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是这样一些知名的人士：贝利亚、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斯大林和赫鲁晓夫。

“五人领导小组”的组成是：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这些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决定了国家的进程。

1952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聚集了一帮不请自到的客人，他们是来祝贺主人生日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来了。斯大林接待了所有的人，但后来通过赫鲁晓夫转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说，他和他们“不再是同志，也不希望他们再到他这里来”。斯大林把他们列入了黑名单。

米高扬将自己的失宠归结于自己不喜欢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这一解释并不能说明什么，要知道我们的主人公可不是一个容易受到伤害的写作狂。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米高扬承认，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开始称赞这一著作，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这除了说明他的狡猾，其他什么也说明不了。

想必，他的战友们并不明白，斯大林是想再次强调自己的主要思想：国家的利益高于宗派集团和地方主义的利益。这些人企图通过院外活动，使自己掌握的部委获得更轻松的计划任务和更安逸的工作条件，并准备与敌人和解。斯大林不再信任米高扬，这与他不再信任莫洛托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有走“投降主义”路线的可能性。

总之，从友好信任到怀疑敌对、从爱到恨的心路历程要经过许多阶段。掌管外交事务的米高扬是“苏联的第一号商人”，并认为苏联动员式的经济需要哪怕只是最低限度的自由化，而斯大林认为还不具备这样的现实条件。所以米高扬成了外人。

领袖已经老了，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凌晨三四点刚与密切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分手之后，斯大林又想着再把他们召过来，并问警员：“今天是几号？现在是早晨还是晚上？”

可以想象，饱受失眠折磨的斯大林是如何在近郊别墅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的。他的眼前浮现出了逝者：母亲、父亲、神父、警察、卡托·斯瓦尼泽、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娜佳·阿利卢耶娃……他们都在哪里？为什么只剩下他一个人？瓦西里和斯维特兰娜在哪里？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他不清楚，在有生之年是否能够完成自己的未竟之业，并把它交给可靠的继承人。

但他们，那些可靠的继承人在哪里？沙皇尼古拉在1917年2月放弃了权力，并认为把权力交给了当之无愧的人们，然而他们却败坏了政权的名声。要知道那时整个受过教育的社会——杜马、将军、企业家、知识分子都渴望夺取他的皇权。他交了出去，以避免内战。可继承人们却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地狱之河？这就是说，他，斯大林就是地狱之河。

事态是这样进一步发展的。1953年1月10日，斯大林对《真理报》上的《医生面具下的间谍和杀手》一文的校样做了修改（斯大林改成了——《医疗专家面具下的卑鄙间谍和杀手》）。

文章中列举出很多可怕的用推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医学鉴定确认，日丹诺夫患有心肌梗塞，在对谢尔巴科夫的治疗中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都没有疑问。而其他的就纯属猜测了：医生们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企图在苏联建立“第五纵队”等等。

但是，从斯大林的校改来看，“医生案件”对他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得出了一个推论：“剥削阶级在苏联早已经被粉碎和消灭，但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私有制心态和道德的残余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载体也仍然存在——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我们人民的暗藏敌人。正是这些受帝国主义世界支持的暗藏敌人今后仍将进行破坏活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年）》，第393页）



这才是斯大林的主要思想。似乎一切都很清楚：敌人并未投降，必须消灭他们。不过他又补充了最后一段结束语：“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事实。但还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除了这些敌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敌人：我们人民群众的麻痹大意。毋庸置疑，只要我们存在麻痹大意，破坏活动也就会存在。可见，想要清除破坏活动，就需要终结我们队伍中的麻痹大意。”（同上，第 394 页）

这里的重心变了，麻痹大意的人不是间谍，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穿着白大褂的杀人犯，而是普通的苏联居民。

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真理报》出现了纯粹的反犹太人的论调，不过很快就不见了，而开始了对俄罗斯姓氏的“麻痹大意者”的抨击。

所以，1952 年底在讨论斯大林奖时，斯大林说了“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竟然有反犹太主义者在活动。这太不像话了！”这样的话，就不足为奇了。（科斯特尔琴科 Г. В.，《斯大林的秘密政治：政权与反犹太主义》，第 679 页）

想必，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让一些杰出的苏联犹太人在报纸上发表一个集体声明，以表达他们对苏维埃祖国的忠诚，并揭穿美国和以色列的阴谋诡计。在声明上签名的有诗人 С. Я. 马尔夏克、作家 В. С. 格罗斯曼、歌唱家 М. О. 赖森、电影导演 М. И. 罗姆、物理学家 Л. Д. 朗道、作曲家 И. О. 杜那也夫斯基和其他很多人，其中也包括伊利亚·爱伦堡。不过，与此同时爱伦堡致信斯大林说，他支持与“企图将犹太民族的人隔绝起来的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作斗争，又提醒说，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可能会在全世界引起更加负面的效应。

斯大林否定了声明的两个方案，于是这一想法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这种想法是建立在以民族出身为原则把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基础上的，而这是斯大林永远不能接受的。

从 1953 年 2 月 20 日开始，报刊上明显放低了调门。似乎克里姆林宫已经想好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了。该给这件事画上句号了。

（所有现存的有关斯大林准备把犹太人放逐到远东的推测，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同样还有传言说，准备驱逐所有的乌克兰人，那简直就是荒谬了。）

而此时，美国国内的一系列事件应该影响到了美国针对苏联的计划。1950 年 4 月 1 日，美国空军作战局局长 C. 安德森少将在给空军部长 C. 赛明顿的报告中指出，一旦开战，美国空军将没有能力完成对苏联实施核轰炸的计划（“特洛伊计划”），也没有能力保障包括阿拉斯加在内的美国领土的空中安全。

所以，战争的问题就退居其次了，取而代之的是策划一场有所有北约国家参与的同盟战争的想法。开战的时间定在 1957 年 1 月 1 日。（雅科夫列夫 Н.，《中情局反对苏联》，莫斯科，2002 年，第 64 页）

除此之外，华盛顿积极采用了 K. 克劳塞维茨早在 19 世纪初就提出来的一个定

律：“俄罗斯不是一个可以被真正征服，即占领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只能用它内部的弱点和内讧来战胜它。”（克劳塞维茨 K.，《战争论》，第 2 卷，莫斯科，1941 年，第 365 页）

1949 年 9 月 14 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8 号指令。指令强调了在苏联支持“敌对领土上的友好团体”的重要性，下达了“把心理战、经济战、秘密战争和军事行动合为一体”和“建立反莫斯科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任务。

斯大林得知了这些计划后，自然应该想起对他私人生活极感兴趣的米霍埃尔斯，想起阿利卢耶娃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接触，想起热姆丘任娜在克里米亚的积极活动等等。再往下还会想起，医生杀手及其隐藏在国家安全部内的工作人员、弗拉西克、波斯克列贝舍夫、莫洛托夫、米高扬，以及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麻痹大意的人”。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自然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更新倍加关切。如我们主人公所愿，波诺马连科、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尤里·日丹诺夫（他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进入了领导层。

事实上，这一代人直到 1964 年赫鲁晓夫被免职之后才掌握权力，斯大林的意图推迟了 10 年才得以实现。而这导致在精英交替过程中出现了危险的停滞状态，这一停滞是以外省来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高升而结束的。



## 第四十五章

# 致斯大林于死地的疾病

---

斯大林弥留之际、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共谋拥戴马林科夫、领袖之死、新的“三驾马车”、修正斯大林的遗产

---

1953年3月2日凌晨，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尚未来得及完全分配好最高权力的斯大林丢下了克里姆林宫、近郊别墅、成年的子女、疲惫不堪的战友和全体苏联人民。他在尘世间的生命即将结束，他在慢慢地成为过去。

对于昏倒在地的主人公是何时被发现的，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3月1日夜晚，有的说是3月2日凌晨。这一差别未必能够说明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对他的医疗救助被延误了很长时间，而这首先归咎于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伊格纳季耶夫。

按照官方的说法，斯大林是在3月1日晚突然发病的。但实际上这发生在3月1日（星期天）的早晨。前一天晚上，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来做客，凌晨4点才离开。因为斯大林一向起床晚，警卫很长时间都在等着他醒来。就这样，在等待中过了一天。直到晚上22点30分，副警卫长П. В. 洛兹加切夫上校才违反了“未唤不入”的规定走进了斯大林的寝室。在小饭厅，洛兹加切夫发现了躺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的主人。斯大林穿着睡裤和内衣，裤子已被尿液浸湿。警卫们把斯大林抬到了沙发上，洛兹加切夫随即给伊格纳季耶夫打去了电话。

罗伊·梅德韦杰夫将事情所有亲历者的回忆作了对比，按照他的说法，伊格纳季

耶夫当时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选择。他本应该将此事报告给马林科夫或是贝利亚,但这会立即让他受制于(甚至有可能被逮捕)与自己敌对的贝利亚。所以,伊格纳季耶夫就给负责国家安全机关的赫鲁晓夫打去了电话。正是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在领导人中最先赶到位于沃伦斯基区的斯大林的别墅里。他们商量好支持马林科夫作为领袖的继承人担任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虽然按惯例,在斯大林缺席时,代替他领导政府的应该是贝利亚,而马林科夫应该领导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事实上,很快马林科夫就一人身兼这两个职务了,而赫鲁晓夫则成了党的实际领导人。(梅德韦杰夫 Ж.、梅德韦杰夫 P.，《无人知晓的斯大林》，莫斯科，2001 年)

至于斯大林被谋杀的说法,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对昏迷的斯大林的第一次检查是在 3 月 2 日的早晨 7 点。斯大林躺在沙发上,右手和右脚都已麻痹,右脸鼻唇处的皱痕已经变平。医生诊断是中风,“伴有大脑血管初期损伤、心脏硬化和肾脏硬化”的动脉硬化,动脉血压是 190/110 毫米水银柱。

采取了保守的治疗方法:贴了用于降血压的医蛭、使用了冷压布和微型硫酸镁灌肠器。取下了他嘴里的假牙。

14 点 10 分,斯大林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呼吸(陈施二氏呼吸),间有长时间的可怕的停顿,血压也上升了。渐渐地,生命体征变得越来越弱,心脏搏动缓慢,血压极不稳定。

3 月 3 日傍晚,情况突然有了好转。斯大林恢复了意识,睁开了双眼。对于这一时刻发生的事情,有马林科夫的陈述为证:“我、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来到了斯大林的近郊别墅。他已经丧失活动能力,不能说话,仅一只手的手指能动一动,做出一些轻微的手势。莫洛托夫走近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走开’的动作。贝利亚走上前,同样是一个‘走开’的动作。接着是米高扬,还是‘走开’。此后,我走上前来。斯大林握住我的手不放。几分钟之后他便走了,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嘴唇在无声地颤动……”(马林科夫 A.，《我的父亲格奥尔吉·马林科夫》，第 62 页)

但事实上,3 月 4 日和 5 日斯大林仍然活着,只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3 月 4 日午后,斯大林脸色变得青紫,大量出汗,开始打嗝,呼吸困难。3 月 5 日早晨,病危症状更加明显,开始吐血。19 点 15 分,心跳加速,脉搏跳到每分钟 118—120 次,而到 20 点 10 分时达到了 140—150 次。医生给他注射了 5% 葡萄糖溶液以维护心脏的运转。21 点 30 分,斯大林全身大汗,已感觉不到脉搏,脸色发黑。21 点 40 分,给他注射了茨酮和肾上腺素,然而无济于事。21 点 50 分,他去世了。(布连特 Д.、瑙莫夫 B.，《斯大林的身后事》，第 280—281 页)

他的女儿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她用强烈且悲痛的语句写下了当时的场景:



最后的一两个小时，人简直就喘不过气来了。濒死前的痛苦挣扎是十分可怕的。大家眼看着他被憋死了。有那么一瞬间，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是否如此，但我明显感到，在最后一刻，他突然睁开了眼睛，目光扫过站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可怕的目光，也许是疯狂的，也许是愤怒的，充满了面对死亡和朝他弯下身子的医生的陌生面孔的恐惧。这种目光在一瞬间扫过了每一个人。而在这时（这是无法理解和可怕的，我至今仍无法理解也无法忘却），他突然举起左手（还能动的那只）的手指，好像指向上空某处，又好像在威胁着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手势让人无法理解，但令人畏惧，并且不清楚它是针对何人何事的……在最后一刻，灵魂在作了最后的挣扎之后，就离开了躯体。

我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了，紧紧地抓住站在一旁的一位认识的年轻女医生。她痛得叫了起来，我和她紧靠在一起。

灵魂消逝了。躯体不动了。脸色变白了，恢复了往日熟悉的面容；过了一会儿，面容变得安详、平静和好看了。所有人都沉默着呆立在一旁站了几分钟，到底几分钟我也不知道，但感觉很长。

随后，政府成员一起奔向门口，他们需要去莫斯科，去中央委员会，大家都在那里坐等消息呢。他们赶去通告大家已暗中预料到的那个噩耗。无需相互推诿，和我一样，他们的心也被悲痛和解脱这两种矛盾的感情撕碎了。

所有人（我不是指贝利亚，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唯一一个与众不同的怪物）这些天以来一直都在奔走忙碌着，都在竭力帮忙，与此同时也在害怕：结局会怎样呢？在这些日子里，许多人都流下了真诚的眼泪。我看到 K. E. 伏罗希洛夫、Jl. M. 卡冈诺维奇、Г. M. 马林科夫、H. A. 布尔加宁和 H. C. 赫鲁晓夫都流了泪。这说明，除了把他们与父亲联系在一起的事业，他天生的魅力是如此巨大，它抓住了人们，吸引了人们，让人无法抗拒。这是很多人都有体会和认识的。有些人现在装出一副好像他从未感受到这一点的样子，但也有一些人，并没有装出这种样子来。

……在父亲这座别墅工作了18年的女管家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伊斯托明娜（大家都叫她瓦列奇卡）前来告别。她扑通一声跪倒在沙发旁，将头埋到逝者的胸前，像个村妇似的放声哭了起来。很长时间她都没能停下来，谁也没有去打搅她。

所有在父亲身边服务过的人都爱他。在日常生活中，他并不挑剔，相反，他生活朴素简单，对家政人员和蔼可亲，要责备也只是责备他们的“头头”——警卫队和管理部门的将军们。家政人员既没抱怨过他的任性，也没有抱怨过他的残酷，相反，还经常求他帮点忙，并从来没有被拒绝过。

……深夜，或更准确地说是凌晨，来人搬运遗体去作解剖。此时，一阵神经

性的痉挛使我全身发抖，我立刻开始神经质地颤抖。哪怕是流出眼泪，哪怕是大哭一场也好，可是没有，只是全身发抖。抬来了担架，遗体被放在上面。我第一次见到裸露着的父亲。这是一具完美的躯体，一点也不衰老，不像老年人的身体。就像刀刺进了心脏，一种奇特的疼痛袭来，此刻我体会并理解了什么叫“血肉相连”。我明白，那个赋予我生命的人已经远去，而我仍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生活下去。

没有亲眼目睹父母的死亡，你是不可能理解这一切的。要想理解什么叫死亡，至少要见过这么一次，见过“灵魂出窍”留下一个即将快速腐烂的躯体。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到这一切，只是感受到，这一切掠过我的心房，并在那里留下了烙印。

遗体被运走了。一辆白色的汽车开到别墅的门口，大家都走了出来。那些原本就站在街上和台阶上的人也脱下了帽子。我站在门口，有人给我披上了一件大衣，我仍然全身发抖。此时谁搂了一下我的肩膀，原来是 H. A. 布尔加宁。车门砰一声关上，汽车开走了。我将脸埋到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胸前，终于大哭起来。他也哭了，并抚摸着我的头。大家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散去。

……已是清晨 5 点了。我去厨房，在走廊上听到有人大声哭泣。这是在盥洗室冲心电图片的护士在哭，她哭得如此伤心，就像她全家人一下子都死了似的。别人告诉我：“她锁在里面已经哭了很久了。”

大家都坐在餐厅里，好像是无意识地等待着一件事。过不了多久，早晨 6 点，广播里会播出一条我们已经知道的噩耗。然而大家都想亲耳听一听，好像不这样就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终于到了 6 点。列维坦那缓慢低沉的嗓音，或者是类似于列维坦的播报重要事件时常用的嗓音响了起来。这时大家都明白了：是的，这是真的，确实已经发生了。于是，大家又哭了起来，男的，女的，所有的人……我也嚎啕大哭，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不是一个人，所有我身边的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并和我一起哭泣。

这一切都是由衷和真诚的，谁也没有要在谁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悲伤或忠诚。我们相知多年。大家也都了解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的女儿，而我的父亲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也知道父亲还是爱着我的，我也爱着他。

这里没有人把他当成上帝、超人或天才，也没有人当他是恶人。人们爱他、尊敬他，是因为他具有最普通的人的品质，而对这些品质，家政人员的判断总是不会错的。（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11—14 页）

整个国家都在痛哭。人们不仅是为斯大林的离去而难过，还感到一个时代终结



了,一个非常艰难甚至极为艰难且悲壮的伟大时代结束了。斯大林走了,而他们留了下来。他们要在没有了斯大林的情况下生活下去,并去思考自己的生活,那些已成为历史的生活。

3月6日早晨,国家领导人来到停放着斯大林灵柩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斯大林身穿那件旧的最高统帅制服躺在那里,制服特意经过了清洗,磨破的袖子也缝补过了。大厅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人和葬礼主持人站在那里。主持人在棺木旁放置了花圈。离棺木不远处站着一群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赫鲁晓夫哭的声音很响,其他人则悲痛地沉默着。(波普科夫 Ф. Д.,《最后的二十年:政治反间谍局局长的札记》,莫斯科,2006年,第181页)

此时已经召开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马林科夫成了部长会议主席,副主席是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仍然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贝利亚获得了由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而成的新的苏联内务部的监护权。

但马林科夫在保留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同时,还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主席一职,也就是说,他成了一号人物。“年轻”的被提拔者——勃列日涅夫、别哥夫、波诺马连科都被挤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有这么一种说法:去世之前,斯大林曾下令就任命波诺马连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事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进行过一次投票咨询。如果波诺马连科真的得以委任的话,那么那批“老的”战友们就会失去一大部分职权。)

勃列日涅夫得到一个小职位——国防部政治管理总局副局长(分管海军舰队),从高处跌了下来。他的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娃回忆道,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勃列日涅夫、阿里斯托夫、波诺马连科聚到了他们的住处,而那里的家具已被中央委员会总务局的工人搬走了,于是他们就坐在铺在地上的报纸上,喝着伏特加酒,也不知道明天会拿他们怎么样,会不会被逮捕。

继任的“三驾马车”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他们就像曾经的“三驾马车”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那样,开始领导起国家来了。

3月9日,装有斯大林遗体的石棺被安置在列宁墓里,与列宁的石棺并排放在一起。

## 第四十六章

# 斯大林去世后

后斯大林时代之始、胜利和灾难、尚未被认识的经验

“三驾马车”瓦解的事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需要提示一下的是，贝利亚于1953年6月26日被捕，并于同年12月被枪决。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被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而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成了苏联的领导人。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将斯大林描述成一个独裁者、镇压的始作俑者、红军在战争初期失败的罪人，被称为胆小鬼和战后各种“案件”的制造者。

1961年10月31日夜，斯大林的石棺被从列宁墓里移出来，埋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下，直到1970年才在墓前树了一个纪念碑。

如今，在公众意识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是赫鲁晓夫开始了与“个人崇拜”的斗争，并认为这是他在苏联民主化道路上的最主要的成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最先站出来改变斯大林政策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早在1953年3月10日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在谈及苏联出版物的问题时就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终止个人崇拜的政策。”就在昨天，马林科夫还在列宁墓的追悼会上，面对领袖的灵柩讲了话，而第二天就调转口风，说出了如此不恭之词！不过，他虽说了，但没有什么下文。



新领导人希望尽快走出斯大林的阴影。早在2月20日,在讨论到畜牧业的悲惨境地时,斯大林建议向农村增加400亿卢布的税收。很明显,斯大林认为农村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而实际上当时农村的状况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马林科夫是最了解这一情况的,他分管农业。农村的经济压力指数(即农业税)从1940年到1951年增加了5倍:从112卢布到了523卢布。(波波夫B. П.,《大平局:从胜利到解体的苏联》,莫斯科,2005年,第88页)与此同时,到1952年,苏联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于1940年。1940年与1952年相应的对比情况是(以公斤计):肉和油脂:21比24;鱼:4.9比7.3;糖:8.7比16.2;土豆:112比190;面粉、大米和通心粉制品:195比190;植物油:2.6比3.7。虽然购买食品要排队,商店也少,但人们已不再挨饿。做到这一点是有其工业基础的:1950年的拖拉机产量是1940年的3倍(《祖国历史文选(1946—1965年)》,莫斯科,1996年,第39页)。1952年的一份中等月工资可购买的食物数量要远高于1940年。

总体来讲,国家财政已经难以承受庞大的开支。需要重新审定整个预算政策,并且要缩减在东欧、军备、核研究、整个军工业和重工业的投入。

马林科夫提出的“停止个人崇拜政策”的要求表面上看是针对宣传的,但按其本质却是要对整个政策重新审视。这意味着,财政体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商店和集体农庄市场里堆满了商品,1953年4月1日对零售价实行战后的第六次下调,仅此一项就使民众在一年里节省了530亿卢布。但出现的问题是,在工业增长的同时,农业却在下滑。

采取主动的首先是贝利亚。贝利亚掌管合并后的内务部(把国家全部和内务部合二为一了),但那里有许多异己分子。于是,他下令重新审查战后的所有案件。责成C. H. 科鲁格洛夫、B. З. 科布洛夫和C. A. 戈格利泽主持这项工作。

1953年4月2日,贝利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递交了一封关于米霍埃尔斯被杀案情况的信。信中说:与米霍埃尔斯有关系是指控M. C. 沃夫西、B. B. 科甘和A. M. 格林施泰因三位医生及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犯有恐怖与间谍活动罪的原因。贝利亚证实,对米霍埃尔斯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斯大林被指认为是暗杀的倡议者,而组织和实施者则是阿巴库莫夫、奥戈利佐夫和察纳瓦。

4月3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为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彻底恢复名誉、追究“捏造出这一挑拨离间案件”的原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被免去中央委员会书记一职,并开除了中央委员会。

早些时候,贝利亚曾建议对那些对社会没有危险的罪犯实行大赦。他向中央委员会通报说,全国共有在押犯2526402名,其中特别危险的犯人只有221435名。根据他的建议,1953年3月27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赦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囚犯。

1953年4月4日,贝利亚签发了《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



的命令》。他还建议撤销古拉格经济结构,转归建设部、水利部、矿业部、林业部的相应部门和内务部的其他部门。

英勇而悲惨的“伟大工程”史,北方和远东的“古拉格”殖民延伸就此结束。

贝利亚对国家安全部进行改革,把第一总局(侦察局)、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第九总局(政府警卫局)、第十总局(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部)、干部管理局、密码局、侦讯处、监察局和其他一些部门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除此以外,贝利亚还开始积极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他提议放弃消耗巨资在东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坚决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一个中立的民主国家。他还想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使苏联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走上务实的轨道。

很难说清,如果他的建议得到实行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苏联离开东欧(就像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这些想法得以实现了那样),还是会导致其他的事件?但事实终究是事实,贝利亚是第一个试图给苏联经济减压(与此同时还会获得领导地位)的人。

在普遍认同要加强俄罗斯联邦在苏联的地位的情况下,他在民族问题上提出的倡议(提升地方干部在加盟共和国权力机关中的地位)足以证明他对国家制度问题的深刻理解。

在党的问题上,贝利亚试图削减党务机关的特权。实际上,如果不算赫鲁晓夫,他成了最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强调内务部机构不受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管辖的独立性,甚至开始搜集反马林科夫的系列材料(P.皮霍亚)。

精力充沛、意志坚定且不拘礼节的贝利亚使他的同事们面临着一种选择:或是对他退避三舍,或是与之展开一场危险的斗争。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在此问题上都联合了起来,只有米高扬说过一句贝利亚“还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的话。

阴谋的结局是,贝利亚在克里姆林宫被捕,这对他来说是完全意料不到的。军方的立场在这次行动的筹划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可夫元帅亲自指挥了逮捕自己仇敌的行动。

马林科夫有一个较为温和、合理的改革计划,这源自于他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陈述的(也是斯大林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要想实现我们主人公的战略构想,需要他离开人世,即消除这个构想的主要限制者。

1953年8月8日,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在工农业领域和进一步改善人民福利中的迫切任务》的报告,宣布要大幅降低农业税,支持个体副业(农村、乡镇和中小城市中的),而最主要的是经济政策的改变,扩大对轻工业的财政拨款。政府还提高了采购价格:牲畜和禽类的收购价格提高5.5倍多,牛奶和黄油提高2倍等等。

马林科夫的想法在于逐步改善多数居民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小商品的生产。这一



时期他的经济和政治观点是：显著扩大自留地的面积；保障农民获得购买机械、种子、建筑材料和化肥等的贷款；在城市发展中小企业；取消对经济活动和合作社活动的一切禁令和限制；国有银行要向私商提供贷款；缩减对重工业和军工业的投入。总之，这是国家控制下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

不是所有这些想法都是马林科夫在 1953 年提出来的，但在多年之后，在 1987 年，当已是戈尔巴乔夫在领导苏联的时候，马林科夫重申了这些想法是正确的。对于戈尔巴乔夫，马林科夫相当明确地谈到：“开始时我对他怀有好感，而现在我看到，他在玩政治游戏而不是搞经济。首先应该是搞经济。玩政治游戏会犯许多错误的。”（马林科夫 A.，《我的父亲格奥尔吉·马林科夫》，第 99 页）

毫无疑问，斯大林一直在探索市场关系的本质，但他提出的逐渐以产品交换取代商品周转的建议是出乎人意的。他对此未进行任何解释。这是为什么呢？是希望从经济生活中清除控制贸易的小集团，是渴望摆脱农业税并使农村经济得以巩固，还是另有原因？

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马林科夫指出：“这种论点，即有关商品交换的论点，如果对它不加以修正的话，那么它就会成为许多年中解决全力发展商品流通最重要任务之路上的障碍。”（《拉夫连季·贝利亚（1953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莫斯科，1999 年，第 352 页）

正是从此刻起，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受到冲击。1953 年 4 月 11 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允许企业出售本企业不再使用又非统一分配的物资。这些物资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容许转让给任何人的。当然，这还不能算是计划分配制度的终结。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积压物资”和“剩余物资”以及半成品成了沉重的负担。无论什么样的国家计划也不能清点出它们的数量，并转让给新的主人。

马林科夫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性决定刺痛了党的权贵阶层，而这个阶层一直是斯大林所担心的。马林科夫取消了月正式工资之外以“信封”装的私下津贴，并提高了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这一决定明显降低了党机关的领导作用，而这正是马林科夫一直所期待的。但只过了 3 个月，赫鲁晓夫就恢复了“信封”津贴，甚至还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经费中拨款来支付未下发的奖金，为此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对他感激涕零，而马林科夫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不可饶恕（这些继任者迅速证实了离世的领袖所悟出的真理：最高统治者要实施现代化，而权贵们则渴望停滞不前）。

可以认为，正是马林科夫试图实现 1936 年宪法委员会有关扩大执政阶级的政治基础的思想，但结果却造成了党机构的崩溃，而党的机构将斯大林的管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斯大林的模式）变成了党内官僚的僵化的和不受控制的统治。

在马林科夫领导国家的这段时期，在押犯的数量（1954 年 1 月 1 日）要比 1953 年 1 月 1 日时减少一半（53.6%）。可以说，苏联在摆脱前一时期的重负。

总之，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代表了两种趋势，而其中之一理应成为主导的路线：或是进行快速的政治变革，或是进行缓慢的经济改革。不过，两种趋势都暗含着对党和军队机构的威胁。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第三种趋势（第一种与第二种的奇妙组合）占了上风，而赫鲁晓夫则成了国家领导人。说到赫鲁晓夫就不能不让人想起，年轻时他曾是托洛茨基思想的拥护者，认为要进行快速的社会变革，而且世界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

马林科夫有可能取得胜利吗？还是他的退出是不可逆转的？谁也无法断言。

形象地说，1953年以后，斯大林就像某种可怕、可恶又无用的东西，被多次从坟墓里挖了出来，又被扔回了历史中去。结果是，我们主人公作为人的形象就掩盖住了他处于公众分析之外的经验。

他被称为暴君、独裁者。这样的称呼完全准确地反映出了他极权的本质，但对他个性的多面性、所完成事业的规模，以及俄罗斯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位领袖，却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要知道斯大林可不是横空出世的，他是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俄罗斯历史环境的产物。俄罗斯立宪民主党人与当局作斗争时曾请求过“地狱之河”的帮助，他们当时并未料到这将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意志坚定、清心寡欲、理智且残酷的领袖的出现，是对那些毁掉了俄罗斯国家的帝国精英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的革命报复。斯大林站在与维特和斯托雷平未完成的改革相反的那一面。他重建了国家，并依靠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将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丘吉尔的评价是“他接手的是一个犁耕手种的俄国，而留下的是个有原子弹的苏联”，这些评论都是客观的。而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评价则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因素，并不是分析。

以下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斯大林的评述（第 21 卷，第 301—303 页）：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毅力、坚定和冷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创建者”，“斯大林的明显成就就是依靠奇异的个人崇拜取得的”，“他是‘胜利之父’”，“他的成就被他本性的专横和残酷所扭曲”，“是世界历史上最复杂、最强大和最矛盾的人物之一”。

丘吉尔说得更深刻一些：“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生活于其中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1959 年 12 月 23 日在英国下院的讲话）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的，而他犯下的罪行也是可怕的。这似乎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让我们来注意一下 E. 瓦尔加院士的结论。“也许这种说法有点恬不知耻，但是，若从前瞻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事，看待被不公正地关押在劳改营中的成百上千万人的痛苦，看待足有百万优秀共产党员的过早死亡，只不过是历史上转瞬即逝的小事而已。”（瓦尔加 E. C.，《政治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164 页）



这个由斯大林反对者得出的结论已接近真理。不管多么遗憾,苦难从来都不是评价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参数,自古至今,目标和精神的是否崇高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在对斯大林一生的教训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以追求公正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巨峰。

毛泽东称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以牺牲轻工业的代价过度地发展重工业,给农民施加了过重的经济压力,过度强调中央集权而损害了地方的利益。但这些错误就历史而言也只是小事一桩。

斯大林最主要的错误,大错而特错的,就是把苏联变成了一个由官僚集团控制的官僚主义国家。巴赫梅季耶夫大使关于斯大林主义变形的预言得到了应验:“斯大林集团被推翻之后,掌握权力的将是富农、耐普曼和专家。”(《绝对私密和可信:Б. 巴赫梅季耶夫与 B. 马克拉科夫在 1919 年至 1951 年间的书信集》,第 3 卷,第 434 页)准确地说,斯大林集团并没有被推翻,而是按照既定的方向进化了。

苏联的各个集团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毁掉了苏联。这是斯大林的第三次葬礼。

那么斯大林留下了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形象直到现在还使俄罗斯和整个世界感到不安?这种记忆是与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的,从圣者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大帝,他们在生活中都远非天使,也曾让鲜血流淌成河。时至今日也难以理解,这个无政府主义的、没有清晰国家理想的人民是怎么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国家的?似乎,有两类人民:一类创建了强国,而另一类则背离国家并与它的高压进行抗争。而在某个瞬间,斯大林将两者合二为一,像彼得大帝那样创建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依靠强有力的盟友——工人阶级,并赋予他们在第一时间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还大量派遣自己的代表到政权机关中去并支持他们的创造性。

新的精英阶层的大多数都是由旧精英阶层中的中下阶层的代表组成的,并且准备吸纳从牧师的孩子到将军的所有人。但是,当现代化进程一开始,这个精英阶层马上就封闭了起来:自由的、好争善变的和追求各种真相的人们,因为他们拥有摧毁国家的经验,就成为不需要的人了。

白卫军将军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与伟大诗人普希金有着血缘关系,历史极为奇特地展现了他的家族中俄国精英和苏联精英相脱离的事。将军的祖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特劳贝格(娘家的姓)是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的女儿索菲娅的孙女,嫁给了罗特基希,是普希金的堂表妹。而 А. П. 汉尼拔是彼得一世的养子和诗人的先祖。

所以,在俄罗斯历史中才出现了这象征性和悲剧性的滑稽一幕:圣彼得堡的伟大帝国在 1916—1917 年间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却因一个鞋匠的儿子而得以复兴。

所以说,斯大林是一个与彼得大帝比肩的强国的创建者。

同时他也是一个破坏者,因为他所构建的文明社会不愿生活在一个只能遵从上层政治集团(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且建立于凯撒式宗法传统之上)发号施令的状态下。他也在国家的基础上奠定了一种破坏的机制。(“斯大林永远不能弥补的罪过是,他把一个‘带有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工人国家’变成了一个官僚国家。发生这种事……是因为取消了‘党员最高月工资’限额,苏联社会分裂成了收入有巨大差异的不同阶级和阶层。平等、克己和自我牺牲的思想遭到嘲笑,较高收入阶层,首先是官僚阶层的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化……”——瓦尔加 E. C.,《政治研究》,1991年,第3期)

这种指责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本该迅速构建起苏联的精英阶层,并使他们成为特权阶层,而这自然就给“为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造成了“资产阶级化的威胁”。

斯大林时不时地通过对精英的清洗来控制局面。短期内这是有成效的,但最终未能建立起一种使社会的各种利益得以平衡的机制。1936年,进行了不成功的民主化尝试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回到过差额选举的想法上来。先是战争,然后是将军们的反抗、原子弹的威胁、德国的分裂、朝鲜的战争……他没有来得及,生命有限了。

本质上,斯大林几乎走了一条尼古拉二世从绝对的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的政治道路。他的头戴王冠的前辈在民主杜马前遭到了失败,而我们的主人公却避免了这一结局。然而,斯大林的隔代政治继承人们在向民主冲刺的时候,未能掌握住政权,毁了苏联。所以,在20世纪,俄罗斯在从专制制度(极权主义)到现实的、经选举而产生的民主陡坡上两次都跌得头破血流。

斯大林本是能够确保这种过渡的安全的,但他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了。

时至今日,还没有对斯大林进行真正的分析研究,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不理解他个人所起的作用,归根结底他的作用已经属于历史,而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因为不理解与那个时代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活动,没有让俄罗斯有认识自己在当今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生的各国及其人民的斗争中的现状和前景,这些斗争或是为了争夺世界资源,或是为了自我生存,为了获得按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的权利。

问题不在斯大林,问题在于俄罗斯。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俄罗斯若是否定斯大林和他的残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会出现的环境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斯大林对国家是一个统一经济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的认知,在后苏联时期中所出现的众多问题的解决中都表现了出来。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北方的海上通道、俄罗斯“第二”经济中心(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经深水海湾(千岛群岛)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北海舰队的创建、高科技工业的创办、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当



然,还有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和建立起一个作为苏联社会中流砥柱的受过教育的阶层。

一提到斯大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统治的强暴和残酷。从人性的角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像看待彼得大帝、拿破仑、克伦威尔、俾斯麦或是毛泽东那样(也只应该这样去看待),那就应该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暴力是历史的接生婆”。

所以,在谈论主要的结论的时候,我们要把两个因素放在首位:他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功绩和他所造成的灾难(没有能力完成从极权主义到民主制的转化)。实质上,从斯大林身上折射出了彼得大帝的命运——为管理帝国构建了知识分子阶层,但那些未能从统治阶级手中得到参与国家管理权的知识分子则在1917年推翻了帝制。斯大林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子辈和孙辈)在1991年时也这样做了,在没有理解伟大共产主义变革的情况下就谴责它。而俄罗斯在不经思考地谴责时,实际上也就是在谴责自己。(“过去之所以需要认识,不是因为它正在消失,而是因为它把自己的痕迹席卷得无影无踪。”B. 克柳切夫斯基语)

斯大林的命运是悲惨的:不幸的个人生活、妻子自杀、孩子们的失败人生。他缔造的那个国家也已不复存在。历史的流沙正在冷漠地覆盖他所有的事业。留下的只有一件事——共产主义的中国正繁荣昌盛。

让我们回忆一段往事。1901年,在清政府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俄国、英国和德国的军队进入了中国。在北京慈禧太后的宫殿里的一次谈判中,一位英国外交官不讽刺地对老态龙钟的清朝外务大臣说: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们争辩,要知道你们是一个战败国。对此这个中国人回答道:“让我们过一百年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吧。”也许,这个中国人就是我们主人公的志同道合者。

众所周知,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是斯大林喜爱的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主人公一样,也是一个完全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毅力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人。斯大林正是背诵着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添加的是他自己的革命者的英勇形象)俘获了年轻女中学生娜佳·阿利卢耶娃的芳心。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斯大林对其他俄罗斯文学的天才们,态度也是相当宽容的。他之所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害之人,那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揭发过革命者。

所以,在即将完成这部传记之时,我们采用了契诃夫的道德标准来评价这个历史人物的精神实质。当然,我们并没有证明这种方法正确的法理依据,但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天才们都对自己的时代有过最为充分的表述,并给了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方法。契诃夫与斯大林都是19世纪的产儿,而随后一个世纪的所有精神上的剧变都是这个时代所引起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契诃夫的小说《决斗》,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冯·科连和拉耶甫斯



基分别代表了人的两种不同本性——与纯理性活动的冯·科连相对立的是软弱的、对新生事物无法适从的拉耶甫斯基。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И. 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里对奥勃洛莫夫和施托尔茨的描写。在小说中，善良温和的伊利亚·伊里奇·奥勃洛莫夫就无法适应新的充实的生活。

但契诃夫讲得更透彻，并且提出了有关基督教的存在价值观的问题，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例如，冯·科连认为拉耶甫斯基是对社会有害的，而清除他是造福社会，因为清除的是过时的、没有用处的和有害的人。他计划在决斗中杀死拉耶甫斯基，只因偶然情况才未能实现。

然而，还有另一种情况：契诃夫谴责聪明、坚定、进取、敢于承担上帝赋予的使命的冯·科连。也就是在这里，契诃夫似乎是把一面魔镜转向了我们的主人公。

年轻的助祭（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令人产生好感的人物之一）试图让冯·科连看到自己的主要错误：“您看，您在教导众人，探寻大海的深处，识别弱者和强者，您在著书立说，挑起决斗，一切却都还在原地未动；但您瞧瞧，某个圣灵附体的羸弱老翁只要嘟囔一句话，或是有个新的穆罕默德持刀骑马从阿拉伯飞驰而来，那我们的一切都会人仰马翻，并且欧洲也会被夷为平地……没有事业的信仰是死的，而没有信仰的事业就更糟糕了，除了浪费时间之外，将一事无成。”

那么斯大林，这位过去的教会学校学生从这面镜子里能看到什么呢？看到自己是个可怕的罪人？要是这样的话，那所有的历史活动家都会是可怕的罪人。

问题在另外一方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赎罪吗？有过信仰吗？有过天意吗？

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丘吉尔和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就无足轻重了。尽管根本就无法知道，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否有答案。

毫无疑问，斯大林相信革命的暴力和世界的公正可以使人们变得幸福。在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传道者。后来，在围绕着这一思想开始进行国家建设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工程队队长或修道院院长。他明白，传承给他的这个国家不会屈从于直线变革。而其他的一切就都好理解了：社会工程、国家对生活所有领域的干预、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地缘政治斗争。但与此同时，由于缺少进行一场真正较量所必需的资源，大部分居民又主要生活在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为了国家利益压制个人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结果甚至连他的孩子们也都被压垮了。

一切就是这样。但他几乎实现了自己伟大的理想，为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衡量人的存在价值的新尺度。

让我们重温他的理念：斯大林就是苏联。

惊人的腾飞、残酷的代价、国家的解体以及在世界历史上永恒的存在——这就是他，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阿门。



## И. В. 斯大林生平大事年表

1879年12月21日(俄历12月9日) И. В. 斯大林的官方出生日期。他生于梯弗利斯省哥里城的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农民家庭,父亲是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母亲叫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不过根据哥里圣母升天大教堂出生登记册上的记录,他的实际生日应是1878年12月6日(俄历)。

1888年9月至1894年6月 就读于四年制的哥里教会小学。

1894年9月4日至1899年5月29日 在梯弗利斯神学院学习(未毕业);参与了梯弗利斯总铁路工厂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

1899年12月29日至1901年3月28日 在梯弗利斯观象台工作。

1901年4月22日 领导第比利斯五一示威游行。

1901年9月 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委员。

1902年4月5日至1903年4月19日 被捕并被囚禁在巴统监狱。

1903年11月27日至1904年1月5日 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巴拉干县的新乌达村;后从流放地逃跑。

1904年 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巴库总罢工。

1905年 在高加索从事党务工作。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代表会议。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代表出席了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

1906年 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发表了以《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的系列文章。

1907年 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持编辑《巴库无产者报》。领导了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竞选运动。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

1908年 被捕,关在巴库的巴伊洛夫监狱。被判流放沃洛格达省两年,受警察公开监视。

1909年 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镇;逃跑。返回巴库。

1910年 被任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地区特派员。被捕,再次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镇。

1911年 流放期满。在彼得堡被捕,流放到沃洛格达,受警察公开监视。

1912年 在第六次(布拉格)全党代表会议上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逃出流放地。在彼得堡编辑《星报》,《真理报》创刊号的编辑者之一。被捕,流放纳雷姆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逃跑。领导第四届国家杜马竞选运动。参加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 В. И. 列宁主持下)成员会议。

1913年 撰写《民族问题和民主》。和 Я. М. 斯维尔德洛夫一起编辑《真理报》。被捕,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

1914年至1916年 流放于北极圈内的库列伊卡村。

1917年 回到彼得格勒。加入《真理报》编辑部,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与 Я. М. 斯维尔德洛夫共同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第二次代表会议,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与 Я. М. 斯维尔德洛夫共同领导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并作工作报告。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

1918年 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缔结和平条约谈判的全权代表。被任命为俄罗斯南部粮食事务全权领导人;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副主席。

1919年 (与 Ф. Э. 捷尔任斯基一起)担任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授命成立的党内侦查委员会委员,负责查明彼尔姆失陷的原因并重整东方战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派往彼得格勒战线;任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授予红旗勋章。与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结婚。

1920年 担任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的负责供给军队枪械和弹药的军工厂委员会的主席、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1年 发表《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儿子瓦西里出生。收养已故费奥多尔·谢尔盖耶夫(化名阿尔乔姆)的儿子阿尔乔姆为义子。前往高加索。再次受命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

1922年4月3日 根据 В. И. 列宁的提议,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领导中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起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条文》的工作。



1923年 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并由 B. И. 列宁提议,批准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任命。

1924年 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列宁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悼列宁》的讲话。当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确认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25年 在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26年 当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生。当选共产主义科学院院士。

1927年 在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8年 因不满意粮食采购进度前往西伯利亚。

1929年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题为《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讲话。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50岁寿辰。

1930年 被授予第二枚红旗勋章。在《真理报》上发表《胜利冲昏头脑》。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批准为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

1931年 书面答复犹太通讯社关于苏联对反犹太主义的态度询问。监督和领导经济建设。

1932年 参与全苏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批准成立苏联作家协会。起草《关于保护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以及巩固公共(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法律》。在 M. 高尔基的寓所与作家们会谈。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

1933年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在 C. M. 基洛夫的陪同下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审阅将向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递交的《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年至1937年)》的报告提纲。

1934年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导召开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与高尔基争论。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谈话。与赫伯特·威尔斯会见。与基诺夫和日丹诺夫一起讨论《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提纲。因基诺夫被害前往列宁格勒。

1935年 政治局批准了《关于实施逮捕的程序》的决议。对农业劳动组合的示范章程进行修正。对“莫斯科中心”和“克里姆林宫小集团”案进行调查。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讲话。决定纪念 A. C. 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从事宪法委员会

的工作。

1936年 在《真理报》上发表《混乱代替了音乐》。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关于揭露恐怖活动的秘密信件。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苏联第一部宪法文本。

1937年 修改 M. 图哈切夫斯基的《当今德国的军事计划》一文。与 Г. 奥尔忠尼启则发生争执。参加普希金纪念大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谴责 H. 布哈林。核准在军人中实施逮捕行动。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参加营救“切柳斯金号”船员的人员。

1938年 作出在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给予援助的决定。召开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批准哈桑湖战役。帕维尔·阿利卢耶夫去世。逮捕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

1939年 决定解除 H. 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 Л. 贝利亚。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编撰、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达除掉 Л. 托洛茨基的命令。决定派遣 Г. 朱可夫率领军队前往哈勒欣河。与德国签订条约。

1940年 废除列宁 1919 年的反教会的法令。与芬兰开战；决定以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开展军事行动。撤销 K. 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致函 E. 瓦尔加院士。H. 沃兹涅先斯基、Г. 马林科夫、A. 谢尔巴科夫进入政治局。下令创立战略储备以备战时之用。刺杀 Л. 托洛茨基。

1941年 授予 M.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彼得大帝》)和谢尔盖耶夫-岑斯基(《塞瓦斯托波尔的磨难》)三位作家斯大林一等奖。对军事学院毕业生讲话，号召他们准备打仗。当选国防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与美国总统 Ф. 罗斯福的代表 Г. 霍普金斯、英国外交大臣 A. 艾登会谈。任命 Г. 朱可夫为西方面军总指挥。

1942年 下达全线进攻的命令。下达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进攻的命令。签署“不得退后一步”的 227 号令。与科学院院士 B. И. 韦尔纳茨基和 A. Ф. 约费会面，讨论核武器问题。采纳斯大林格勒作战计划。与 У. 丘吉尔会谈。

1943年 会见 И. В. 库尔恰托夫教授。批准库尔斯克作战计划。与财政部长 A. Г. 兹韦列夫电话商谈货币改革的必要性(1947 年实施)。德黑兰会议。视察斯大林格勒。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发生冲突。

1944年 与丘吉尔会谈。斯维特兰娜出嫁。

1945年 克里米亚会议。会见大牧首阿列克西。胜利大阅兵。波茨坦会议。下令加强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召开俄罗斯东正教会地区主教会议。在为到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Э. 贝奈斯举行的招待会上表达了建立斯拉夫国家联盟的想法。

1946年 解除 Г. 朱可夫陆军总司令一职。

1947年 会见火箭技术设计师 С. И. 科罗廖夫。决定支持以色列建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



1948年 试图在莫斯科召开普世会议。封锁西柏林。与南斯拉夫决裂。支持毛泽东。

1949年 核准“列宁格勒案件”。斯维特兰娜再嫁。70岁庆典。接待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批准莫斯科多层大厦的建筑方案。

1950年 参与朝鲜战争。核准“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制定电气化十年计划、“伟大工程”方案。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1年 逮捕国家安全部部长 B. A. 阿巴库莫夫。“医生案件”、“国家安全部案件”、“米格列尔人案件”。

1952年 主持编写教科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国家新的领导人员组成。

1953年3月5日 И. В. 斯大林逝世。

## 参考文献

### 一、资料与史料

01. 阿利卢耶夫 B.，《一个家庭的纪事：阿利卢耶夫家族与斯大林》，莫斯科，2002年
02. 阿利卢耶娃 C.，《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莫斯科，1990年
03. 巴扎诺夫 И.，《一个前斯大林秘书的回忆录》，圣彼得堡，1992年
04. 巴格拉米扬 И.，《我们是这样走向胜利的》，莫斯科，1977年
05. 巴伊巴科夫 Н.，《四十年的政府生涯》，莫斯科，1993年
06. 贝利亚 C.，《我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莫斯科，1994年
07. 《苏美英三大同盟国领导人的柏林(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莫斯科，1980年
08. 博布科夫 Ф.，《最后的二十年：政治反间谍局局长的札记》，莫斯科，2006年
09. 别谢多夫斯基 Г.，《通往热月政变之路》，莫斯科，1997年
10. 《大检查：苏维埃国家中的作家和记者(1917—1956年)》，莫斯科，2005年
11. 布留斯·洛克尔特，《来自内部的历史》，译自英文版，莫斯科，1991年
12. 布尔加科夫·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娃·叶莲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日记》，莫斯科，2001年
13. 布坎南 Д.，《外交官回忆录》，莫斯科，2001年
14. 华西列夫斯基 А.，《一生的事业》，莫斯科，2002年
15. 维特 С.，《我的回忆录》，3卷本，莫斯科，1960年
16. 《政权和文艺界知识分子》，莫斯科，2002年
17. 沃兹涅先斯基 Н.，《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莫斯科，2003年
18. 沃兹涅先斯基 Л.，《为了……的真相》，莫斯科，2004年
19. 古科夫斯基 А.，《清除彼尔姆灾祸》，莫斯科，1939年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自德国的观点》,译自德文版,莫斯科,2005年
2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日夜夜》,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5年
22. 哈尔德 Ф.,《战地日记(1941—1942年)》,译自德文版,莫斯科,2000年
23. 《工农红军最高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13日—1941年6月20日):文件与资料》,莫斯科,2004年
24. 伏罗希洛夫 К.,《斯大林和红军》,莫斯科,1938年
25. 《危机之年:文件与资料(1938—1939年)》,2卷本,莫斯科,1990年
26. 高尔基 М.,《不合时宜的思想——革命和文化札记》,莫斯科,1990年
27. 《苏联时期的国内战争》,2卷本,莫斯科,1986年
28. 《古拉格(1918—1960年)》,莫斯科,2002年
29. 《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莫斯科,2005年
30. 古尔科 В.,《往事如烟:细节与剪影》,莫斯科,2000年
31. 《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案件:前最高统帅 Л. Г. 科尔尼洛夫将军及其同谋案件调查特别委员会卷宗(1917年8月—1918年6月)》,2卷本,莫斯科,2003年
32. 邓尼金 А.,《俄国混乱时期概述》,6卷本,明斯克,2002
33. 《尼古拉斯二世私人档案中的日记和文件》,莫斯科,2003年
34. 杜格拉斯 Г.,《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招募谈话录》,莫斯科,2000年
35. 季亚科夫 Ю.,布舒耶娃 Т.,《法西斯之剑在苏联打造》,莫斯科,1992年
36. 日丹诺夫 Ю.,《回首往事:一个目击者的回忆录》,顿河畔罗斯托夫,2004年
37. 朱可夫 Г.,《回忆与思考》,2卷本,莫斯科,2002年
38. 扎列斯基 К.,《斯大林的帝国》,莫斯科,2000年
39. 扎哈罗夫 М.,《战前的总参谋部》,莫斯科,2005年
40. 《斯大林传略》,莫斯科,1947年
41. 《家庭怀抱中的约瑟夫·斯大林》,莫斯科,1993年
4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45年
43. 卡冈诺维奇 Л.,《备忘录》,莫斯科,2003年
44. 凯南 Дж.,《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眼中的二战外交》,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2年
45. 克伦斯基 А.,《历史转折关头的俄罗斯》,莫斯科,1992年
46. 克伦斯基 А.,《科尔尼洛夫案件》,佛蒙特,1987年
47. 科科夫佐夫 В.,《我的过去》,第2册,莫斯科,1992年
48. 波扎尔斯卡娅 С.,萨普林 А.,《共产国际与西班牙内战:文件汇编》,莫斯科,2001年



49. 科涅夫 И.，《方面军司令员笔记》，莫斯科，2003 年
50. 康德拉季耶夫 H.，《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粮食市场及其调控》，莫斯科，1991 年
51. 克拉马连科 C.，《在两场战争的上空》，莫斯科，2004 年
52. 克里维茨基 B.，《我曾是斯大林的间谍》，莫斯科，1991 年
53. 库马涅夫 Г.，《在斯大林身边》，斯摩棱斯克，2001 年
54.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文化与政权：克里姆林宫影剧院（1928—1953 年）》，莫斯科，2005 年
55. 《拉夫连季·贝利亚（1953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莫斯科，1999 年
56. 拉林娜-布哈林娜 A.，《无法忘却的岁月》，莫斯科，2003 年
57. 列宁 B.，《列宁全集》，第 5 版
58. 《卢比扬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1917—1991 年）》，莫斯科，2003 年
59. 《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 年 1 月—1936 年 12 月）》，莫斯科，2003 年
60. 《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1937—1938 年）》，莫斯科，2004 年
61. 《卢比扬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锄奸局”（1938—1946 年）》，莫斯科，2006 年
62. 马林科夫 A.，《我的父亲格奥尔吉·马林科夫》，莫斯科，1992 年
63. 马林科夫 Г.，《第十九次党代会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莫斯科，1952 年
64. 曼施坦因 Э.，《二十世纪的战士》，译自德文版，莫斯科，2006 年
65. 迈斯基 И.，《一个苏联外交官的回忆录》，莫斯科，1987 年
66. 《苏联元帅 Г. К. 朱可夫：生平和活动研究》，2 卷本，莫斯科，2005 年
67. 马茨凯维奇 B.，《帝国战士，或美国为何没有进攻苏联的实情》，莫斯科，2006 年
68. 米高扬 A.，《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1999 年
69. 米留可夫 П.，《回忆录》，莫斯科，2000 年
70. 米留可夫 П.，《第二次俄国革命史》，莫斯科，2002 年
71. 涅韦任 B.，《斯大林论战争：宴会上的讲话（1933—1945 年）》，莫斯科，2007 年
72. 诺维科娃 C.，《父亲的时空肖像：空军主帅 A. A. 诺维科夫》，莫斯科，2000 年



73. 尼基京 Б.，《决定命运的年代》，莫斯科，2000 年
74. 奥科罗科夫 А.，《法西斯主义与俄国侨民》，莫斯科，2002 年
75. 《俄罗斯对外情报机关史概述》，6 卷本，莫斯科，1996—2004 年
76. 佩佩利亚耶夫 Е.，《“米格”对阵“佩刀”》，莫斯科，2000 年
77. 《1941 年至 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2 卷本，莫斯科，1976 年
78. 穆林 Ю.，《作家与领袖：М. А. 肖洛霍夫与 И. В. 斯大林通信集(1931—1950 年)》，莫斯科，1997 年
79. 《И. В. 斯大林致 В. М. 莫洛托夫的信件(1925—1936 年)：文件汇编》，莫斯科，1995 年
80. 《俄共(布)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欧洲：“特别卷宗”中的决议(1923—1939 年)》，莫斯科，2000 年
8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1945—1953 年)》，莫斯科，2000 年
82. 皮亚特尼茨基 В.，《历史天平上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明斯克，2004
83. 《共和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1991 年
84. 《致命的决定(汇编)》，译自德文版，斯摩棱斯克，2003 年
85. 罗科索夫斯基 К.，《军人的天职》，莫斯科，1968 年
86. 《20 世纪战争中的俄罗斯和苏联：研究中的统计》，莫斯科，2001
87. 雷宾 А.，《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员的笔记》，莫斯科，1992 年
88. 谢尔盖耶夫 А.、格卢希克 Е.，《关于斯大林的谈论》，莫斯科，2006 年
89. 科金 Е.、希基 М.，《美国历史文献中的斯摩棱斯克事件》，斯摩棱斯克，2000 年
90. 《绝对私密和可信：Б. 巴赫梅季耶夫与 В. 马克拉科夫在 1919 年至 1951 年间的书信集》，3 卷本，莫斯科、斯坦福，2002
91. 《苏联的日常生活和公众的意识(1939—1945 年)》，莫斯科，2003 年
92.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1947、1948、1949 年)：文献与材料》，莫斯科，1998 年
93. 斯普罗格 В.，《工程师笔记》，莫斯科，1999 年
94. 费尔世蒂斯基 Ю.，《苏联和德国(1939—1941 年)》(文件汇编)，纽约，1989 年
95. 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13 卷本，莫斯科，1947—1951 年
96. 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 14—18 卷，莫斯科、特维尔，1997—2006 年
97. 斯大林 И.，《斯大林选集》，3 卷本，基洛夫，2004 年
98. 斯大林 И.，《论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莫斯科，2005 年

99. 斯大林 И.,《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莫斯科,1952年
100. 洛巴诺夫 М.,《同代人回忆录和同期文献中的斯大林》,莫斯科,2002年
101. 《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年)》,莫斯科,2001年
102. 《斯大林与世界主义(1945—1953年)》,莫斯科,2005年
103. 司徒卢威 Я.,《一位政治家的日记(1925—1935年)》,巴黎、莫斯科,2004年
104. 斯托雷平 П.,《书信集》,莫斯科,2004年
105. 苏多普拉托夫 П.,《秘密战争和外交的不同岁月(1941年)》,莫斯科,2001年
106. 苏多普拉托夫 П.,《特别行动:卢比扬卡和克里姆林宫(1930—1950年)》,莫斯科,2001年
107. 《俄罗斯农民的命运//文集》,莫斯科,1996年
108. 蒂佩尔斯基希 К.、凯塞林 А.、古德里安 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结》,译自德文版,斯摩棱斯克,2001年
109. 托洛茨基 Л.,《我的生平》,莫斯科,2001年
110. 托洛茨基 Л.,《斯大林评传》,佛蒙特,1985年
111. 托洛茨基 Л.,《俄国革命史》,莫斯科,1990年
112. 托洛茨基 Л.,《斯大林的伪造学派》,莫斯科,1990年
113. 托洛茨基 Л.,《日记和书信》,莫斯科,1994年
114. 托洛茨基 Л.,《被背叛的革命》,莫斯科,1991年
115. 特尔科娃-威廉斯 А.,《回忆录》,莫斯科,1998年
116. 乌斯特里亚洛夫 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莫斯科,1999年
117. 乌斯特里亚洛夫 Н.,《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莫斯科,2005年
118. 福伊希特万格 Л.,《莫斯科 1937年//给我朋友们的旅行报告》,塔林,1991年
119. 《祖国历史文选(1914—1945年)》,莫斯科,1996年
120. 《祖国历史文选(1946—1965年)》,莫斯科,1996年
121. 菲林 М.,《巴黎普希金中央委员会(1935—1937)》,莫斯科,2000年
12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的委员会(1945—1953年)》,莫斯科,2004年
123. 丘吉尔 У.,《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自英文版,莫斯科,1991年
124. 丘吉尔 У.,《和平砥柱》,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4年
125. 丘耶夫 Ф.,《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莫斯科,1991年
126. 丘耶夫 Ф.,《卡冈诺维奇如是说》,莫斯科,1992年
127. 丘科夫斯基 К.,《1930年至1969年的日记》,莫斯科,1994年



128. 舒伦堡 B.，《迷宫》，译自德文版，莫斯科，1991 年
129. 谢皮洛夫 Д.，《未参与者》，莫斯科，2000 年
130. 施魏策尔 M.，《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自内部的报告》，莫斯科，1995 年
131. 施佩尔 A.，《回忆录》，译自德文版，斯摩棱斯克、莫斯科，1997 年
132. 什捷缅科 C.，《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2 卷本，莫斯科，2005 年
133. 舒利金 B.，《日子(1920 年)》，莫斯科，1989 年
134. 舒利金 B.，《三个首都》，莫斯科，1991 年
135. 爱伦堡 И.，《战争》，莫斯科，2004 年
136. 雅科夫列夫 A.，《生活的目标——一个飞机设计师的笔记》，莫斯科，1987 年

## 二、专著和文章

01. 阿古尔斯基 M.，《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巴黎，1980 年
02. 阿列克谢耶夫 H.，《俄罗斯民族与国家》，莫斯科，1998 年
03. 《阿富汗的教训：A. E. 斯涅萨廖夫思想遗产留给未来的结论》，莫斯科，2002 年
04. 阿希耶泽尔 A.，《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意义》，新西伯利亚，2002 年
05. 巴兰金 P.、米罗诺夫 C.，《争夺权力的阴谋与斗争：从列宁到赫鲁晓夫》，莫斯科，2003 年
06. 巴兰金 P.、米罗诺夫 C.，《斯大林的外交战：从毕苏斯基到毛泽东》，莫斯科，2004 年
07. 别济缅斯基 Л.，《搏斗之前的希特勒和斯大林》，莫斯科，2002 年
08. 别济缅斯基 Л.，《希特勒与德国将军们》，莫斯科，2004 年
09. 别尔佳耶夫 H.，《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涵义》，莫斯科，1990 年
10. 博克 Ф.，《我曾站在莫斯科城下：战地日记(1941—1945 年)》，译自德文版，莫斯科，2006 年
11. 布连特 Д.、瑙莫夫 B.，《斯大林的身后事》，莫斯科，2004 年
12. 布兹加林 A.、科尔加诺夫 A.，《斯大林与苏联解体》，莫斯科，2003 年
13. 贝科夫 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莫斯科，2006 年
14. 瓦谢茨基 Я.，《清算——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莫斯科，1989 年
15. 瓦西里耶娃 Л.，《克里姆林宫的儿女们》，莫斯科，2001 年
16. 弗多温 A.，《俄罗斯民族》，莫斯科，1996 年
17. 魏德勒 B.，《艺术的消亡》，莫斯科，2001 年

18. 韦尔特 H.，《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莫斯科，1995 年
19. 韦尔霍图罗夫 Д.，《斯大林：经济革命》，莫斯科，2006 年
20. 《知识分子在俄罗斯》，莫斯科，1991 年
21. 《路标——知识分子在俄罗斯》，莫斯科，1991 年
22. 维什涅夫斯基 A.，《镰刀与卢布——苏联的保守现代化》，莫斯科，1998 年
23. 沃尔科夫 C.，《肖斯塔科维奇与斯大林：艺术家与沙皇》，莫斯科，2004 年
24. 沃尔科戈诺夫 Д.，《斯大林的政治肖像》，4 卷本，1996 年
25. 盖达尔 E.，《漫长的时间》，莫斯科，2005 年
26. 加拉耶夫斯卡娅 И.，《彼得·帕尔钦斯基》，莫斯科，1996 年
27. 加列耶夫 M.，《朱可夫元帅：伟大而独特的统帅艺术》，莫斯科，1996 年
28. 加列耶夫 M.，《战争中无可争议的一页》，莫斯科，1993 年
29. 格尔利茨 B.，《德国总参谋部》，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5 年
30. 吉姆皮尔松 E.，《耐普——列宁和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20 世纪 20 年代的问题与教训》，莫斯科，2004 年
31. 格拉济耶夫 C.，《长期技术经济发展的理论》，莫斯科，1993 年
32. 戈曼-戈卢特维娜 O.，《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历史演变的里程碑》，莫斯科，2006 年
33. 格列戈里 П.，《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6 年
34. 格罗莫夫 E.，《斯大林：艺术与权力》，莫斯科，2003 年
35. 戈里科夫 Ю.，《克里姆林宫·大本营·总参谋部》，莫斯科、特维尔，1995 年
36.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历史与现实》，莫斯科，2004 年
37. 霍特 Г.，《坦克会战》，译自德文版，莫斯科，2006 年
38. 戈罗杰茨基 Г.，《致命的自欺欺人：斯大林与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0 年
39. 古巴列夫 B.，《斯大林的白色群岛》，莫斯科，2004 年
40. 古德里安 Г.，《士兵回忆录》，译自德文版，莫斯科，2003 年
41. 达马斯金 И.，《斯大林和情报机关》，莫斯科，2004 年
42. 丹尼洛夫 C.，《西班牙的内战》，第 6 册，2004 年
43. 邓恩 Д.，《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们》，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4 年
44. 吉拉斯 M.，《极权主义人物》，译自塞尔维亚文版，莫斯科，1992 年
45. 多伊彻 И.，《托洛茨基传》，3 卷本，莫斯科，2006 年
46. 杜纳耶夫 M.，《困惑磨炼中的信心——18 世纪至 20 世纪的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学》，莫斯科，2002 年



47. 叶梅利亚诺夫 Ю.，《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莫斯科，2002 年
48. 叶梅利亚诺夫 Ю.，《关于布哈林的札记》，莫斯科，1989 年
49. 耶金 Д.，《战利品：争夺石油、金钱和权力斗争的世界史》，译自英文版，莫斯科，1999 年
50. 日德科夫 B.、索科洛夫 K.，《俄罗斯思维方式的十个世纪：世界与政权的图景》，圣彼得堡，莫斯科，2001 年
51. 日罗姆斯卡娅 B.，《俄罗斯 1930 年间的人口历史：放眼未知之事》，莫斯科，2001 年
52. 茹科夫 Ю.，《另一个斯大林》，莫斯科，2003 年
53. 茹科夫 Ю.，《斯大林：“埃尔米塔日”行动》，莫斯科，2005 年
54. 茹科夫 Ю.，《斯大林：政权之谜》，莫斯科，2005 年
55. 兹维亚京采夫 A.，《命运主宰者的沉浮：俄国律师传记的悲惨篇章》，莫斯科，2006 年
56. 季诺维也夫 A.，《斯大林——我们少年时期的飞人》，莫斯科，2002 年
57. 祖布科娃 E.，《战后的苏联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1945—1953 年）》，莫斯科，1999 年
58. 《来自深处：关于俄罗斯革命的文章汇编》，莫斯科，1991 年
59. 伊万诺夫斯基 O.，《苏联的导弹和宇宙》，莫斯科，2005 年
60. 伊利扎罗夫 B.，《斯大林的秘密生活》，莫斯科，2003 年
61. 伊林斯基 M.，《人民委员亚戈达》，莫斯科，2002 年
62. 欧文 Д.，《阿道夫·希特勒的原子弹》，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4 年
63. 约费 Г.，《一九一七年：列宁、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莫斯科，1995 年
64. 《俄罗斯历史（二十世纪）》，莫斯科，1999 年
65. 卡拉-穆尔扎 C.，《1918 年至 1921 年的国内战争：给 21 世纪的教训》，莫斯科，2003 年
66. 卡拉-穆尔扎 C.，《从起始到伟大胜利的苏联文明》，莫斯科，2004 年
67. 卡尔 Э.，《俄国革命：从列宁到斯大林（1917—1929 年）》，莫斯科，1990 年
68. 卡普琴科 H.，《斯大林政治传记》，2 卷本，特维尔，2005 年、2006 年
69. 卡特科夫 Г.，《科尔尼洛夫案件》，巴黎，1987 年
70. 克沃尔科夫 B.，《处决前的忏悔——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查员的回忆录》，莫斯科，2006 年
71. 克劳塞维茨 K.，《战争论》，3 卷本，莫斯科，1941 年
72. 科日诺夫 B.，《斯大林镇压的真相》，莫斯科，2005 年
73. 科利佐夫 M.，《西班牙日记》，莫斯科，2005 年

74. 科恩 C.，《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年)》，译自英文版，莫斯科，1988年
75. 科尔帕基季 A.、普鲁德尼科娃 E.，《双重密谋——斯大林与希特勒：未得手的叛乱》，莫斯科，2000年
76. 科斯特尔琴科 Г.，《斯大林的秘密政治：政权与反犹主义》，莫斯科，2003年
77. 克拉斯诺夫 B.、代涅斯 B.，《不为人知的托洛茨基：红色波拿巴》，莫斯科，2000年
78. 库尼亚耶夫 CT.、库尼亚耶夫 C.，《谢尔盖·叶赛宁》，莫斯科，1997年
79. 拉图尔 A.，《宗主国的诞生——莫斯科(1930—1950年)》，莫斯科，2002年
80. 列克曼诺夫 O.，《曼德尔施塔姆》，莫斯科，2004年
81. 列昂季耶娃 T.，《信仰和进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东正教农村僧侣》，莫斯科，2002年
82. 列斯科夫 B.，《斯大林与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莫斯科，2003年
83. 林德尔 И.、丘尔金 C.，《红色罗网：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情报机关的秘密》，莫斯科，2005年
84. 利特文 A.，《1918年至1922年间俄国的红色和白色恐怖》，莫斯科，2004年
85. 洛塔 B.，《侦察总局与原子弹》，莫斯科，2002年
86. 马卡列维奇 Э.，《政治侦查：历史、命运及其不同的版本》，莫斯科，2001年
87. 马斯洛夫 M.、祖布科夫 C.，《珍珠港事件：失误还是挑衅？》，莫斯科，2006年
88. 梅德韦杰夫 Ж.、梅德韦杰夫 P.，《无人知晓的斯大林》，莫斯科，2002年
89. 梅里丘霍夫 M.，《斯大林失去的机会》，莫斯科，2002年
90. 梅里丘霍夫 M.，《斯大林的解放远征》，莫斯科，2006年
91. 梅里丘霍夫 M.，《苏波战争》，莫斯科，2001年
92. 曼弗雷德 A.，《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幅肖像画》，莫斯科，1978年
93. 米纳科夫 C.，《斯大林和他的元帅》，莫斯科，2004年
94. 米纳科夫 C.，《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军事精英》，莫斯科，2004年
95. 米罗诺夫 B.，《帝国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史》，2卷本，圣彼得堡，1999年
96. 莫佐欣 O.，《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之剑》，莫斯科，2004年
97. 纳罗奇尼茨卡娅 H.，《我们为了什么及与谁而战》，莫斯科，2005年
98. 瑙莫夫 A.，《法西斯国际：征服欧洲》，莫斯科，2005年
99. 尼古拉耶夫斯基 B.，《历史的秘密篇章》，莫斯科，1995年
100. 奥尔登堡 C.，《尼古拉二世王朝》，华盛顿，1981年
101. 奥尔洛夫 A.，《斯大林的罪行秘史》，莫斯科，1991年
102. 奥斯布林格 C.，《诺贝尔帝国》，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3年





103. 奥西波夫 B.，《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莫斯科，1995 年
104. 奥斯特洛夫斯基 A.，《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莫斯科，2002 年
105. 派普斯 P.，《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罗斯》，译自英文版，莫斯科，1997 年
106. 派普斯 P.，《司徒卢威——右翼自由主义者》，2 卷本，莫斯科，2001 年
107. 佩列古多娃 Z.，《俄罗斯的政治侦查》，莫斯科，2000 年
108. 彼得罗夫 A.，《二十世纪之初的莫斯科资产阶级》，莫斯科，2002 年
109. 彼得罗夫 H.，《克格勃的首任主席伊万·谢罗夫》，莫斯科，2005 年
110. 皮霍亚 P.，《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政权：战后四十年（1945—1985 年）》，2 卷本，莫斯科，2006 年
111. 普洛特尼科夫 K.，《苏联国家预算史概述》，莫斯科，1954 年
112. 波利扬斯基 A.，《叶若夫——斯大林“铁血”人民委员的历史》，莫斯科，2001 年
113. 波波夫 B.，《大平局：从胜利到解体的苏联》，莫斯科，2005 年
114. 波波夫 И.、拉夫列诺夫 C.、波格丹诺夫 B.，《战火中的朝鲜》，莫斯科，2005 年
115. 普赖斯曼 Л.，《暗杀者和革命者，守卫者和挑拨者》，莫斯科，2001 年
116. 普鲁德尼科娃 E.，《贝利亚：未曾发生过的罪行》，圣彼得堡，2005 年
117. 佩日科夫 A.、丹尼洛夫 A.，《超级大国的诞生（1945—1953 年）》，莫斯科，2002 年
118. 拉宾诺维奇 A.，《彼得格勒 1917 年的革命》，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3 年
119. 拉波波特 B.、黑勒 Ю.，《背叛祖国》，莫斯科，1995 年
120. 拉赫马宁 O.，《过往的篇章》，莫斯科，2005 年
121. 勒热夫斯卡娅 E.，《戈培尔：日记里的画像》，莫斯科，2004 年
122. 罗伯茨 Д.ж.，《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3 年
123. 罗戈温 B.，《斯大林的新新经济政策》，莫斯科，1994 年
124. 雷巴斯 E.，《在斗争、爱与死亡中的俄罗斯领袖们》，莫斯科，2002 年
125. 雷巴斯 C.，《斯托雷平》，莫斯科，2003 年
126. 雷巴斯 C.，《库捷波夫将军》，莫斯科，2000 年
127. 萨夫琴科 B.，《西蒙·彼得留拉》，哈尔科夫，2004 年
128. 萨哈罗夫 B.，《列宁的政治遗嘱》，莫斯科，2003 年
129. 萨哈罗夫 B.，《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作家与政权》，莫斯科，2003 年
130. 谢尔科夫 M.，《俄国共济会发展史（1845—1945 年）》，圣彼得堡，1997 年
131. 西蒙诺夫 K.，《我这一代人的见证》，《旗帜》杂志，1988 年第 3、4 期
132. 西蒙诺夫 K.，《历史的重水》，莫斯科，2005 年

133. 西罗季宁 E.，《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莫斯科，2003 年
134. 斯拉塞尔 P.，《斯大林在 1917 年》，莫斯科，1998 年
135. 斯米尔诺夫 B.，《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莫斯科，2005 年
136. 索博列夫 B.，《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体制：争夺政治权力和精神文化的内部战争》，莫斯科，2007 年
137. 索尔仁尼琴 A.，《古拉格群岛》，3 卷本，莫斯科，1989 年
138. 索洛维约夫 C.，《从古至今的俄国史》，28 卷本，第 3 卷，莫斯科，1988 年
139. 斯蒂芬 C.，《“分裂”行动》，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3 年
140. 索科洛夫 B.，《瓦西里·斯大林》，莫斯科，2003 年
141. 苏哈诺夫 H.，《革命札记》，莫斯科，1991 年
142. 《1939 年至 1940 年冬季战争的秘密和教训》，圣彼得堡，2000 年
143. 塔克尔 P.，《执政中的斯大林》，译自英文版，莫斯科，1997 年
144. 特里 Θ.，《1914 年的俄国：经济概述》，译自法文版，巴黎，1976 年
145. 捷普利岑 B.，《火焰上的比利牛斯：西班牙内战和苏联“志愿者”》，莫斯科，2003 年
146. 图姆什斯 M.，《全俄肃反委员会：宗派之争》，莫斯科，2004 年
147. 乌兰姆 A.，《布尔什维克：1917 革命的前因后果》，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4 年
148. 乌索夫 B.，《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 世纪 20 年代）》，莫斯科，2002 年
149. 乌特金 A.，《第一次世界大战》，莫斯科，2001 年
150. 乌特金 A.，《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2003 年
151. 乌特金 A.，《俄罗斯的耻辱：布列斯特、凡尔赛和慕尼黑》，莫斯科，2004 年
152. 乌特金 A.，《日俄战争》，莫斯科，2005 年
153. 乌特金 A.，《全球性冷战》，莫斯科，2005 年
154. 法林 B.，《第二战场——反希特勒联盟：利益冲突》，莫斯科，2000 年
155. 富勒 Дж.，《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年）：战略和战术综述》，译自英文版，莫斯科，2006 年
156. 海留佐夫 B.，《俄国的空中之剑》，莫斯科，2006 年
157. 赫列夫纽克 O.，《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30 年代政治局里的冲突》，莫斯科，1993 年
158. 《冷战（1945—1963 年）：历史的回顾》，圣彼得堡、莫斯科，2003 年
159. 霍赫洛夫 E.，《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苏联军事经济》，圣彼得堡，2005 年
160. 霍斯金 Дж.，《苏联历史》，译自英文版，斯摩棱斯克，2000 年



161. 切列帕诺夫 B.，《政权与战争：卫国战争时期的斯大林国家管理机制》，莫斯科，2006 年
162. 切尔卡索夫 П.，《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时代背景下的人物肖像》，莫斯科，2004 年
163. 切鲁舍夫 H.，《无罪者是不存在的……》，莫斯科，2004 年
164. 切鲁舍夫 H.，《对自己人的打击：红军(1938—1941 年)》，莫斯科，2003 年
165. 切尔托普鲁德 C.，《科技间谍》，莫斯科，2002 年
166. 施瓦贝迪森 B.，《斯大林的雄鹰——1941 年至 1945 年苏联空军的行动分析》，译自德文版，明斯克，2002 年
167. 希罗科拉德 A.，《俄罗斯和中国：冲突与合作》，莫斯科，2004 年
168. 希什金 O.，《谋杀拉斯普廷》，莫斯科，2000 年
169. 席瑟尔 Г.、特拉乌珀曼 Ы.，《俄罗斯轮盘赌——用于俄国革命的德国资金》，译自德文版，莫斯科，2004 年
170. 希绍夫 A.，《俄日战争中未知的一页》，莫斯科，2004 年
171. 舒宾 A.，《领袖与阴谋家》，莫斯科，2004 年
172. 恩德留 K.、戈尔季耶夫斯基 O.，《克格勃：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外交行动史》，译自英文版，莫斯科，1990 年
173. 埃克施图特 C.，《胜利后的一千天》，莫斯科，2006 年
174. 爱伦堡 И.，《人·岁月·生活》，3 卷本，莫斯科，2005 年
175. 雅科夫列夫 H.，《斯大林：上升之路》，莫斯科，2000 年
176. 雅科夫列夫 H.，《中情局反对苏联》，莫斯科，2002 年
177. 雅科夫列夫 H.，《富兰克林·罗斯福：人与政治家》，莫斯科，1981 年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斯大林传 命运与战略 下

作者 = (俄罗斯) 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 叶卡捷林娜·雷巴斯著; 吴昊, 张彬译

页数 = 1 0 9 6

S S 号 = 1 3 4 6 8 6 2 3

D X 号 =

出版日期 = 2 0 1 4 . 0 2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